

世界十大传记文学名著

罗斯福

[美]J·M·波恩斯 著
多巴 译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责任编辑 赵 凯

封面设计 尚升广告

世界十大传记文学名著

罗斯福

J·M·波恩斯 著

多巴 译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海德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mm 1/32 字数 4400千字

印张 139 2006年1月第1版第2次印刷

印数 2000套

ISBN 7-5385-0467-2/I·402

定价 348.00元(全12册)

总 目 录

第一卷

希特勒(上)

第二卷

希特勒(下)

第三卷

墨索里尼(上)

第四卷

墨索里尼(下)

第五卷

林 肯

第六卷

拿破仑

第七卷

华盛顿

第八卷

甘地自传

第九卷

罗斯福

第十卷

彼得大帝

第十一卷

斯大林

第十二卷

俾斯麦

作者序

本书主要是一部有关富兰克林·D·罗斯福的政治性传记,除了他在社会生活之外,还详细地讲了他的个人生活。因为一位伟大政治家的政治生涯无可避免地会把他的这一切卷入政治的漩涡中去,其中也包括他的家庭,甚至他的爱犬。罗斯福当时是如何变成这样一位政治人物的?他为什么可以那么有效地取得政权?从长远的观点来看,他到底是一位多么强有力的领袖?他在什么方面遭到了失败?为什么会失败?他的一生对于美国人和美国国策究竟有什么价值?

本书也致力于探究美国民主体制中的政治领导问题。它主要是集中于罗斯福本人,但也涉及到他开展活动的政治环境,因为我的方法扎根于社会科学家的主要研究成果:领导不是一个普遍的性格的问题,而是基于一种具体的精神文明。我们只能依据罗斯福的政治、社会和意识形态等各方面的具体环境,也就是说,只能按照他塑造社会以及他又被社会所塑造的那种方式来理解这位政治家。

罗斯福是他那个时代的一位伟大的政治家,也可以肯定地说是一位最成功的拉票者。他的政治手腕是从他和美国政治的现实长期接触中发展起来的,这些现实是,人们的雄心、忧患和忠诚通过政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预选、选举、官职、法规、民意测验机构而产生作用。因此,本书也旁及美国的政治方法。

然而,仅谈方法是不够的。为什么使用这些方法?对于罗斯福来说,这是一个根本问题。除了其他情况以外,政治还是一种妥协的艺术,但是这位民主党领袖必须和那些不忠实的势力进行妥协来达成一个理想的目的吗?他必须在大选中获胜,但要是他为了争取选票而作出的妥协严重伤害到他自己的纲领,那又要怎么办呢?在目前这个盛行马基雅维里权术的时代,这位民主党政治家要像狐狸那样行动不可吗?他究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摆出狮子的姿态?

罗斯福赢得了辉煌的胜利。但在第二届任期内,他却被他无法左右的各派势力缠住,并且遭到他所无法控制的人们的阻挠。我认为,这届任期是他一生事业中最具有历史意义的一个阶段。它不但可以清楚地表明罗斯福的个性、他的权宜之计以及这种应付局面的策略的意义,而且还提出一个更基本的问题:美国的政治制度到底能否应付这个艰难世纪强加给它的危机。

因此,本书最后的目的也就是试图探寻个性和政治二者的内在活动,以便在一定程度上阐释当前的政治领导问题。

任何一个传记作者想要在此时论述罗斯福的整个一生,会面临进退维谷的困境。战争年代对于罗斯福和他的国家来说,代表着以往年代许多事情的高潮,因此值得重视,但遗憾的是,学者们至今为止还没能掌握进行详细论述和分析所必需的记录、回忆录和其他资料。我力图摆脱这个困境,其办法是用摘要形式来记述战争年代并在其他地方对罗斯福的性格作出估价,这或许能够有助于解释他处理某些战争问题的方法以及他的早期领导的性质。关于战争年代的详细叙述需要留给以后来谈。

我也需要在本书后面向许多帮助过我的人们致谢,但其中特别需要提出两人。一位是我在威廉斯学院的同事、政治学家威廉姆·H·布鲁贝克。他与我一同在海德公园作了大量研究工作,帮助我形成了书中的许多概念,并对每次草稿与我作了详细的评论。另一位则是我的妻子珍妮特·汤普森·伯恩斯。她也做了同样工作,并承担了抄写和速记等杂务。她还和孩子们一起,在家中创造了一些条件,使我可以连续地进行艰巨的工作。因此,我对我的同事和我的妻子表示深切的谢意。

詹姆斯·麦格雷哥·伯恩斯

目 录

第一卷 从政训练	1
第一章 优美的环境	1
第二章 奥尔巴尼的幼狮	20
第三章 华盛顿：官僚政治家	44
第四章 为捍卫国联而斗争	63
第二卷 权势日增	77
第五章 小插曲：政治家商人	77
第六章 奥尔巴尼的实习生涯	98
第七章 微弱的胜利	115
第八章 神奇的竞选运动	130
第三卷 风云际会	148
第九章 入主白宫	148
第十章 他是全国人民的总统吗	166
第十一章 愤怒的葡萄	187
第十二章 右派的咆哮	202
第十三章 实用主义的外交政策	219
第十四章 1936年：反法西斯联盟	234
第四卷 临渊蛟龙	257
第十五章 改组法院：对风险估计错误	257
第十六章 罗斯福时代的经济衰退	279
第十七章 波托马克河畔的困境	296
第十八章 党内分歧	314
第十九章 外交：些许的指责与严正的抗议	333
第五卷 越过陷阱	357
第二十章 无声的斗争	357
第二十一章 老竞选高手，新竞选运动	379

第一卷 从政训练

第一章 优美的环境

在奥尔巴尼到纽约中点附近，赫德森河流入狭窄的航道，稍向左拐，然后继续缓缓地流向大西洋。有一条铁路和一条侧线蜿蜒在河湾东边。一条土路从侧爬上陡坡，穿过茂密的森林，通到一片略有起伏的高原。高原下的河水浩浩荡荡地向南流去，在它的一个小山丘上，至今还有一座宽敞的宅第，房顶上有一个眺望大海的阳台，房子正面是一个长长的带栏杆的门廊。

早在 1882 年，这幢房子还没有现在的两翼——中楼很宽敞，有护墙板、百叶窗和狭长的阳台仅有正中的部分。1882 年 1 月 30 日，晨曦初露，天气阴冷，北风呼啸，天上有马上要下雪的样子。房子里弥漫着紧张焦急的气氛。仆人们东奔西跑，忙忙碌碌，厨房里几把水壶正在冒着蒸气。全家都在关心着躺在楼上小房间里的女主人。当晚，就在这间小小的房里，萨拉·德拉诺·罗斯福经过长时间的痛苦挣扎，在医生使用了大量麻醉剂后，终于顺利分娩了。那天夜间，她的丈夫詹姆斯日记中写道：“8 点 45 分，我的萨莉生下一个胖胖的男孩，非常可爱，体重十磅，不算衣服。”

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从他那安全的大摇篮里发出咯咯的笑声，可见从小他就是个幸福的孩子。在楼上那间洒满阳光的风子里，他过着恬静的日子，一天天地慢慢长大。萨拉自己给孩子喂奶约有一年之久；后来她带着一点自豪的口吻回忆说：“我和保姆按我们自己的方法喂他，没有采用什么婴儿食谱。”在罗斯福眼中，俯视着他的那个晃动的模糊影子逐渐清晰，变成了他母亲的脸庞——面部的轮廓安详柔和，乌黑的头发梳向脑后缩成一个髻，浓浓的双眉，凹下巴。他的父亲也经常来到房里，面容清瘦，身体消瘦，中等身材，留着浓密的胡子，双手粗壮有力，但温柔地抚摸着，对他低声细语。

富兰克林是个家里的独生子。他的母亲对他并没有“娇生惯养”——真的，詹姆斯觉得她对孩子唠唠叨叨甚至有些挑剔——可是全家似乎都在围绕着这个幼小的孩子团团转。因为没有兄弟姐妹和他争宠，同他抢玩具，或是背着父母教他学校里的活动和游戏。家里的仆人都溺爱他。他一点也感觉不到家庭不和，粗言恶语和严厉惩罚。萨拉和詹姆斯对于如何培

养他们的儿子取得了完全一致的意见：逐渐地但是坚定地把他们塑造成一个具有海德公园气派的绅士。他的一位家庭女教师说：“他是在一个美好的环境里成长起来的。”

父母和婴孩是这幢宏伟宅第的中心。房屋和庭院里有着许多保姆、女仆、厨师、花匠、车夫、马僮和雇工。这个庄园的面积有好几百英亩，里面有农田、森林、花园、暖房、葡萄园、冰窖、谷仓、厩棚等等。富兰克林胆怯地探索着“海德公园”的天地。他起初见到外人，感到特别羞怯。但是他却喜欢和他的父亲一起到庄园各处去视察。他的父亲是当地一位乡绅，穿着带马刺的靴子，头戴圆顶硬礼帽，手拿短柄马鞭。

萨拉勉强地允许富兰克林独自活动了。五岁以前，他穿着童装，留着长长的金色卷发。有时候他脱去裙子，却换上了苏格兰式折叠短裙和方特罗依勋爵装。他快到八岁半时在给他父亲的信中写道：“妈妈今天早上走了，我必须自己洗澡了。”但是，他很快就将这座庄园变成了他自己的儿时的王国。把房子前面的斜坡当成滑梯；张弓带箭在树林里“打猎”；看人把大块大块的冰从河里拉上岸来；穿着雪鞋在田野上行走（最难忘的是6岁那年一场暴风雪以后的那一次）；在河上溜冰和乘坐冰船；在他楼房附近的铁杉树上筑了一个了望台；骑上他的小马驹戴比；喂养他那条特种红毛猎狗麦卡斯曼；在赫德森河里游泳，跟着河上繁忙的船只起伏漂动；打鸟，把它们制成标本作为他的一种收藏。他在房子里开始障碍赛马，部署他的玩具兵，并且开始集邮。

萨拉和詹姆斯常陪他一起玩。他和他爸爸相聚的时间比一般美国孩子的要多得多。孩子在信中流露出他对父亲的爱。1888年5月18日，他六岁时，曾经写道：

我亲爱的妈妈

昨天下午爸爸和我一起去钓鱼。我们一共钩到了十几条鲈鱼，我们把它们都丢在岸上了。因为爸爸对我说如果把它们放到池塘里去，那会把鱼吓坏的！我亲爱的外公他好吗？亲爱的妈妈，我希望他身体比以前好一些了。

吻你

你亲爱的儿子 富兰克林

当然，富兰克林也经常和海德公园其他名门望族的孩子一起玩耍。但他同大人相处的日子，要比他和其他孩子一起玩耍的时间多得多。实际上，和他交往的人，不论是谁，都与德拉诺家族或罗斯福家族有非常密切

的亲戚关系，否则就是来自赫德森河知名的几个家族。

他对他的家庭具有十分强烈的忠诚和感情，而这种感情又与浓厚的家族观念融为一体。爸爸妈妈常带着孩子外出旅行——到马萨诸塞州的费尔黑文，芬迪湾的坎波贝洛，英国，或欧洲大陆的许多国家——然而，旅行仅仅意味着换个新地方，与罗斯福接触的仍然是同一类型的人物。罗斯福一家旅行时乘火车，坐的是私人专用车厢。要是坐船的话，就象萨拉自己说的，总是“和熟人在一起”。他们所到之处总有一大群叔伯姑表亲朋好友。富兰克林是通过他的家人的眼光和视角来观察世界的——他们则按自己的看法让他来认识这个世界。而这个世界总是以他的父母一统天下的那个海德公园开始，也在海德公园告一段落。

当时的世界局势是安定的。美国也处于和平时期。到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南北战争造成的巨大创伤基本上已经平复。美国真正的经济上的首都都是坐落在赫德森河下游七十五英里处的纽约。资本家们在这里敢想敢干；他们就象将军们征战沙场那样建设着美国；在码头上大量招募瑞典、德国、波希米亚移民，把大批的人力投到各个战略要点去从事各种活动，修筑铁路，开采矿藏，创建工厂，兴建一座座完整的城市。人们很恰当地评论说：这些人讷于言而敏于行；而华盛顿的政客们则是做得少说得太多。在国会山，议员们为任命权、为关税、为改革、为州的权利争论不休，而实际上重大的决定都是在华尔街做出的。两党轮流执政——1889年，坚定而可尊敬的哈利森终于接替了坚定而可信赖的克利夫兰——但是两党的斗争往往只是名义上的虚假的争斗而已。

在大西洋的另一边，巨大的女王宝座上坐着维多利亚，这位身材纤细的人物正以庄严高贵的气派统治着英联邦，她那仿佛永恒的统治时期已进入第五十个年头了。女王陛下的海军在世界各大海洋上游弋。欧洲这时也处在和平时期；“欧洲协奏会”发出的调子可能不太和谐，但是列强觉得，它们颇有把握在国内进行一些小规模战争，而企图在国外建立庞大的帝国。《伦敦新闻画报》每周都带给海德公园一幅这样的欧洲图画——霍亨索伦王朝和哈布斯堡王朝的君主们都安稳地坐在他们的宝座上；阅兵典礼和宫廷新闻；国际社会的活动；巴黎到伦敦、到维也纳的各种消息，其中包括游览各地风景名胜，骑马去打猎和参加化装舞会。

遗憾的是海德公园人士不大了解，就在这些表面事务的掩盖下，仇恨和斗争将要爆发出来。他们不知道玛丽·利斯正在宣传农民“少种玉米多闹事”，不知道罢工工人和破坏罢工的人正在进行小规模凶狠的格斗，

而为数众多的移民们正拥挤在肮脏的经济公寓里，对这个陌生的新大陆感到迷惘和愤恨。海德公园人士确实完全觉察不到有一部分人会在这些势力的帮助下被推上二十世纪的政治舞台。艾尔弗雷德·E·史密斯出生在曼哈顿的一幢非常拥挤的房子里，他父亲是一个联畜运输车驭手，很不幸在艾尔十三岁时便去世了。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艾尔当过打扫教堂祭坛的小厮，还干过报童和鱼贩子。在宾夕法尼亚州的矿区，汤姆·刘易斯因为领导一次罢工而被当局列入黑名单。他被迫流浪，从一个矿井转到另一个矿井，在那可怕的黑名单还没有跟踪到来以前继续做工，艰难地养家糊口。他的儿子名叫约翰，是个好斗的小伙子，不久也辍学到矿山去做工了。此时在衣阿华州的西布兰奇，赫伯特·胡佛可能正在铁路桥边的杨柳树下游泳，用屠夫绳钓翻车鱼，或是给人家捉马铃薯虫，每一百个索费一便士。

意大利中部的罗马尼河流域一向以政治动乱著称，在这里，本尼托·墨索里尼在装着玉米叶的麻袋上偷懒睡觉。他比富兰克林小一岁，是一个信仰社会主义的铁匠的儿子。他按部就班地上小学，在三等饭馆里用餐，十一岁就被学校开除了。八十年代末期，在巴伐利亚边境的一个小镇里，有个男人，五十多岁，长着一张活象兴登堡的方脸，但只是一名小公务员。他有一个儿子，可是，他对这个儿子的奇异梦想和艺术爱好一无所知。阿道夫·希特勒十五岁就成了孤儿，无人管束，自然就沦为流浪汉。同样是在十九世纪八十八年代，东欧小国格鲁吉亚出了个约瑟夫·朱加施维里，就是后来的约瑟夫·斯大林。他肤色黝黑，脸上有麻子，比富兰克林年长三岁。他父亲是一个农村补鞋匠，住在一个透风漏雨的棚屋里，在一个充满着民族与种族仇恨的国度里长大。

土壤和种子

谁也不会料到罗斯福在他的政治生涯里将在某个政治舞台上和上述的所有这些人物进行较量，而且终将会以某种方式制服他们，当然唯独最后一个人例外。这里出现了在他那充满矛盾的一生中第一个悖论。人们当然可以找出种种原因，说明为什么象阿道夫·希特勒和约翰·刘易斯这样的人物具有强烈的领袖欲。因为他们在早年都曾经为生活而焦虑不安，四处流浪，朝不保夕。生活对他们来说，就是对权力进行贪得无厌的索求。

罗斯福的情况却又如何？他不是出生于一个衰败破裂的家庭，也不是成长在一个饱经灾祸的国家。他根本不理解什么是家庭不和、物质匮乏和白眼相待。萨拉有一次曾经回忆说，他的父亲“从来没有嘲笑过他”。他热爱他的父母。他是个独子，因此，甚至他也从来没有尝过人们由于家庭

的中心位置被弟妹所取代而普遍经历过的那种失宠的滋味。他周围的环境根本不强调在商业经营或政治斗争方面必须依靠竞争来取得成就。他将被他的生活环境塑造成一个海德公园气派的绅士。

那么，罗斯福是不是生来就有权力欲呢？他的母亲一直非常重视遗传特性。她认为富兰克林身上有“德拉诺家族的强烈影响。”从罗斯福家庭史来考察，有一个引人注目的事实：经过六代庸庸碌碌的人物以后，“这个专出庸才的家族在第七代中却突然大放异彩，因为它的后代产生了美国历史上两位而不是一位最杰出的人物。”关于富兰克林·德·罗斯福这位伟大政治家的情况，我们能从罗斯福家族的祖先中找出什么线索吗？

富兰克林·罗斯福和美国另一位历史人物西奥多·罗斯福的共同祖先是尼古拉斯·罗斯福。尼古拉斯的父亲在十七世纪四十年代从荷兰飘洋过海来到新阿姆斯特丹。尼古拉斯有两个儿子：长子约翰尼斯（1689—？），次子雅各布斯（1692—1776）。从长子这一世系后诞生了西奥多，而富兰克林则是次子这一世系的后裔。

富兰克林的祖辈中只有一位算是小有名气的政治家。此人乃雅各布斯之子艾萨克（1726—1794）。他是一位经营有道的糖商，对于歧视他这一行业的英国贸易法毫无好感。他在美国独立战争爆发后，大力支持爱国主义分子，帮助起草了纽约州第一部宪法，并且因此当选为第一届州参议院议员。作为州代表会议的一名北部联邦同盟盟员，他在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英明领导下，投票修改新联邦宪法，与赫德森河沿岸的大土地所有者的势力相抗衡。

从此以后，罗斯福家族和政治的关系一代代疏远开来。艾萨克之子詹姆斯（1760—1847）来到普林斯顿，是一位制糖商和银行家，并以北部联邦同盟盟员的身分在纽约州议会众议院当过一届议员。他开办养马场，在赫德森河畔的波基普西附近购置土地。他的儿子艾萨克（1790—1863）对政治毫无兴趣。他是普林斯顿大学的毕业生，专业是医学和植物学，养牛养马，后来成了达切斯县的一名乡绅。同时，随着世世代代的通婚，荷兰血缘和英国、德国以及其他血缘相溶合。艾萨克的儿子詹姆斯（1828—1900）——富兰克林的父亲——如果从遗传特征来说，已经主要是盎格鲁撒克逊人了。

“我的儿子是属于德拉诺家族的，根本不是罗斯福家族的，”这是萨拉挂在嘴边的话。果真如此的话，关于罗斯福在政治上获得成就的原因还是无法获得合理的解释。毫无疑问，德拉诺家族喜欢把他们的显赫家世一直

追溯到英国威廉一世和一位在格兰特总统执政时的内阁成员。但是，德拉诺家族的大多数人是与政治无关的。他们之中不乏船主、商人、投机商、慈善家、企业家或乡绅。他们以作为 1621 年到达普利茅斯的菲利普·德·拉·诺依的后裔而感觉良好。萨拉的父亲沃伦·德拉诺年轻时在经营对华贸易中发了一笔财，却在 1857 年发生经济萧条时失去了大部分财产，遂又被迫回到香港去挽回损失。后来他带着妻子和十一个孩子退居赫德森河西岸的庄园。沃伦是一个坚定的共和党人。他的口头禅是：“我不想说民主党人全都是盗马贼，但如果说盗马贼全都是民主党人，似乎也不过分。”这可能并不完全是因为一时兴起。他注意不让孩子们参与他的商业活动和接触他那个阶级以外的人士。

曾经有人说：“德拉诺家族的人不论走到哪里，都保持着他们那套独特的生活方式，仿佛身上有一个外壳，它是透明的却又无法穿透。”

这个谜底仍未揭开。人们无论从德拉诺家族或者罗斯福家族的谱系中都找不到有关富兰克林·德·罗斯福作为一位杰出政治家的任何征兆。当然，政治技巧不能代代相传，遗传基因也无法将特殊的性格和气质传给后代。但是生物的遗传却不容忽视。遗传能提供形成个性的素质，又能确定限制变异发生的范围。生物个体的基本特性，诸如肌肉运动技能和反应速度等，肯定要受遗传的影响，而且，象情绪稳定和感情容易激动这类气质上的特点也可能受到遗传的影响。特别是对于象罗斯福家族这样一个倾向于近族通婚的家族来说，遗传可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罗斯福刚出生时，他的未来发展完全具有不确定性。在他的祖先身上，如上所述的那些个性种子已经在航海、发家致富和赢得社会地位方面初露端倪。在下一代，这些个性因素将在赢得选票和维护权力的活动中呈现出来。种子先天已经具备了，那么土壤又如何呢？富兰克林所处的第一块土壤是由詹姆斯·罗斯福和萨拉·罗斯福共同创造的，而他们本身又受到罗斯福和德拉诺这两个家族先代所创造的环境的影响。罗斯福的政治风格和力量是否在这种土壤里开始形成的呢？

詹姆斯·罗斯福 1847 年毕业于联邦学院，四年后又在哈佛大学法学院获得学位。他稳步地进入法官和商人的行列。只有一次，他的情况显然是个例外：青年时代，他和一位游方牧师徒步在意大利旅行。他们参加了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领袖加里波迪的军队，穿上了红色上衣，在军队里呆了一两个月，然后脱去军装又继续徒步旅行。詹姆斯在他在母亲家的帮助下从事煤矿和运输业。他最后当上了德拉韦尔和赫德森运河公司的副董事

长，成为几家较小的运输企业的董事长和其他一些公司的董事。德拉韦尔和赫德森运河公司的大部分利润都是来自对无烟煤的开采所进行的大额投资。这些活动给詹姆斯提供了可靠的物质基础，使他能够在海德公园维持他那个开支浩大却又朴素无华的家。

但是，詹姆斯先生并不满足于当铁路公司的董事长。他多次在金钱和权力上押了很大的赌注，遗憾的是三次都赌输了。他协助兴办了一家巨大的烟煤联合企业，但在1873年的经济危机中又蒙受了重大的损失。结果，罗斯福和他的同事们由于股东们投票反对而失去了控制权。随后，他和其他一些资本家企图建立一个控投公司，以便控制南方的一个庞大的铁路运输网，但这一冒险事业也以破产告终。他帮助组织了一家公司，准备开凿一条横贯尼加拉瓜的运河。他成功争取到国会和克利夫兰总统批准了合股经营法案，成功筹集了六百万元，并且这一工程当时已经开工。然而，1893年的大萧条又把这笔资金吞没了。

据传詹姆斯的这些倒霉的投资活动使得他的儿子永远对那些成功的企业家和投机商产生反感。这种说法不是很可靠。因为，罗斯福在他的大半生中从来没有对发财的人表示过丝毫的敌意。他似乎把他祖先的不幸当作饭后谈资。而且，詹姆斯不愿让他遭受的挫折打扰他的整个家庭。他有惊人的潜力，善于把他的生活截然分成若干互不影响的部分。他可以从海德公园庄园的宁静环境从容地步入乱哄哄的商业世界，然后又回去过平静的生活。在以后的岁月里，他的儿子每当自己投身于高风险的政治冒险的时候，总以眷恋的目光朝着他的家望去。

虽然詹姆斯和萨拉是远房的表亲，但他们直到1880年才在西奥多·罗斯福家族在纽约的家里第一次见面。那时詹姆斯已经五十二岁。他的前妻已在四年前故去。他们的独子詹姆斯·罗斯福时年二十六岁，与萨拉的年龄相同。他和一位名叫阿斯特的女子成婚，对于他将来准备当运动家、受托管理人、慈善家和低级外交官各种生涯来说，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萨拉身材苗条，仪态大方，美丽端庄，出身于国际知名的上层社会。她在少女时代曾乘横帆船前往香港，在国外受过教育，并且经常出入于纽约、波士顿、伦敦和巴黎等地的社交场所。萨拉不禁对这位鳏夫温文尔雅的态度和开朗真诚的性情十分倾倒。她的父亲了解詹姆斯，并且也喜欢这位和他一道经商的老朋友，但他认为，对他的女儿来说，詹姆斯的年龄未免太大了。萨拉以行动打消了父亲的异议。1880年10月，詹姆斯·罗斯福和萨拉·德拉诺终于结婚了。他们经过一段时间的国外旅行，然后退居到

詹姆斯的海德公园庄园。

人们一直认为，家庭是“社会的心理学掮客”——它是培育人们的生活习惯和人生观的主要经纪人。既然如此，那么詹姆斯·罗斯福和萨拉·罗斯福，不管是处心积虑还是出于偶然，是否给他们的儿子创造了一个环境，来培养他对政治的兴趣呢？人们找不到任何有关的证据。罗斯福所处的环境不是一个充斥着妒忌、野心和权力欲的世界，而是一个靠仁慈持家的世界。在这个世界，由三人组成的那个幸福的小家庭高高在上，社会等级的分界线把他们同保姆和家庭女教师分割开来，更不用说又把这些同里面女仆和厨师，进而再把他们同外面的马僮和雇工分割开来。这个世界充满着海水的奔腾澎湃声；萨拉少女时代前往中国，在漫长的航行途中学会了水手歌曲，海水声就是从她演唱的这些歌曲中传出来的。而且，在罗斯福的世界里，人们的眼界开阔，巴黎、伦敦和瑙海姆都是熟悉的地方，几乎每年必去。从社交的角度来说，这是一个与世隔绝的世界，它以同样厌恶的目光打量着波基普西的那些喋喋不休的爱尔兰政客、海德公园的那些吝啬的生意人和新兴的游览胜地的那些庸俗的百万富翁。这个世界在美国的过去历史中深深地扎下了根，它除了希望保住赫德森河畔的庄园，过优裕舒适的生活以外，对将来并无过分的奢求。

格罗顿：教育的目标

萨拉试图要把她的儿子长期留在这个与世隔绝的环境中。富兰克林在萨拉的密切看管下开始在家里接受正式教育。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教育从来都超越不过家庭的范围。詹姆斯对海德公园的公立小学比较满意。但是，萨拉很可能始终没有想到要把富兰克林送到那里去上学。孩子有一年夏天到一所德国民族学校上学，这才算尝到一点普通小学的滋味。他的母亲认为这“很有趣”，但不大相信他学到了很多知识，富兰克林似乎很乐意和他称作“许多小米老鼠们”的同学们一起上学。

萨拉自己负责对孩子进行了启蒙教育。罗斯福六岁时，在附近他父母的朋友家里进了一个由一位德国家庭女教师主持的幼儿班。以后家庭女教师和私人教师又不断地被请到家里来。其中有一位珍妮·桑多斯小姐非常具有社会正义感，很可能对孩子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她主要是教富兰克林学习拉丁文、法文、德文、书法和算术，也教一点欧洲史。不过萨拉对她儿子的教育仍然严加管束，如果家庭女教师如不按照她的意愿进行教学，就会被辞退。

但是，富兰克林不能永远在家里读书。萨拉很久以前就为他将来到外

地读书作好了安排。她和詹姆斯在儿子出生后的第二年，曾到马萨诸塞州的格罗顿拜访朋友。格罗顿是一个位于波士顿西北四十英里的小城镇。他们的朋友们曾把附近的土地捐赠给一位名叫恩迪科特·皮博迪的牧师，由他为贵族子弟办一所学校。皮博迪的办学思想得到了萨拉的关注和支持。他坚决主张学校规模要小，就象一个大家庭，由他本人来作家长。校长和董事们，包括费利普斯·布鲁克斯、维廉·劳伦斯和皮尔尼特·摩根等人在内，都属于显赫的名门望族。

萨拉牢牢控制罗斯福的学习生活直到他十四岁。尽管皮博迪只愿接受准备学习六年的孩子而不愿意收插班生，富兰克林还是从三年级开始入学。他的海德公园邻居埃德蒙·罗杰斯和他一起入学。他的侄子塔迪·罗斯福——詹姆斯和他第一个妻子的孙子——反而比他高一级。1896年9月，詹姆斯·罗斯福夫妇依依不舍地把他们的儿子送到格罗顿学校后，萨拉在她的日记中悲伤地写道：“和我们亲爱的孩子分别，真不容易，詹姆斯和我为此感到非常难过。

这个十四岁的孩子在陌生的环境里所经受的，如果说不是一次危机的话，也是一次真正的考验。他直到此时才离开母亲的庇护，走出家门。在家的時候，他在海德公园一直是大家关注的中心，甚至可以说是宠爱的主要对象；现在他只不过是一百一十名普通学生之一。过去，他享有许多舒适的生活条件；现在他住在一间小卧室里，过着几乎是僧侣的生活，房门口挂着一块布帘，在皂石洗涤槽里用铁皮脸盆洗漱。在家里，生活节奏完全由他自己掌握；现在他必须遵照校方的严格规定的日程度过一天，从早晨进教室开始到晚上上自习，必须准时，不得有误。

当然，每一个新来的孩子在格罗顿都面临这样的问题，但是富兰克林还有别的问题。他到三年级这一班，必须冲破同学们为“新来的孩子们”所设下的森严壁垒。特别是因为他说话还带一点英国腔调。他有一个年龄比他大的侄子，这也招致了麻烦。大家很快就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富兰克叔叔”。更不幸的是，塔迪是一个“有点古怪的孩子”，这个坏名声会很快影响到他的亲戚身上，总之，富兰克林有点不太正统，这在格罗顿可能受到年纪大一点的孩子们的无情惩罚。一种惩罚手段叫做“皮靴箱”，就是先叫受罚者弯下身来，然后强行将他关入一个小柜子。另一种惩罚叫做“灌水”，也得到了教师的许可，就是在自习时间，由若干名六年级学生找出犯规者，随即把这个吓得发抖的孩子拉到附近的水房，强迫他脸朝上屈身躺在水槽上面，然后把一盆盆的水倒到他的脸上和喉咙里，直到他饱尝

将要淹死的滋味为止。

不过，富兰克林既没有被关进“皮靴箱”，也没有被灌过水，而且第二年还获得了“严格守时奖”。教师们很少给他记下品行不良的罚点，而事实上，当他确实被评为品行不良时，他感到宽慰，“因为老师和同学们以前认为我缺乏格罗顿学校的精神”。如果有人叫他富兰克叔叔，“我倒宁愿当富兰克叔叔，而不愿当罗西侄儿，可是，他们正是这样称呼塔迪的！”富兰克林不久后就和占统治地位的大多数学生站在一起，而不与少数几个造反派为伍。他表现出有点瞧不起那些刚到校的“新孩子”。他在信中津津有味地写道，“那个叫比德尔（蒙邱尔）的孩子既弱智又冒失。同学已经让他尝过一次‘皮靴箱’的滋味了，有好几次还威胁说要给他‘灌水’哩。”

富兰克林非常老练地适应了新的环境。如果有人怀疑在这种适应能力的后面还隐藏着紧张不安的心情，不过，这，在他和父亲闲话家常的信中却没有反映出来。他在第一封家信中写道：“我的心情和身体都很好。”他的言行举止完全符合格罗顿学校的传统习惯：他参加校内足球比赛，所在的球队由十一人组成，在校内是第四流的。他经受着多次擦伤、碰伤和软组织撕裂，可是情绪仍然很高；给学校足球代表队当啦啦队，喊哑了嗓子，参加唱诗班，搞一些小恶作剧，批评学校的伙食不佳，还向家里要好吃的东西。皮博迪向他的父母报告说，“在我的印象中，他是个聪明和诚实的学生，也是个好孩子。”

他之所以能够顺利地完成了从家庭到学校的过渡，是什么原因呢？部分在于富兰克林发现自己是与那些与他类似的孩子们生活在一起，这个阶层是他在海德公园就早已熟知的。他只是换了个地方，而所处的社会圈子却没有变化。在富兰克林那个班里的其他孩子中，九个来自纽约市，七个来自波士顿，两个来自费城。布莱格登、查德威克、格里诺、皮博迪、拉姆斯福德、塞耶——他班里的这些姓氏，包括他自己的，都属于聚居在东海岸或靠近东海岸的几个中心城市的有社会地位的豪门。据可靠消息称，早些年对格罗顿学校的班级作过随意的抽样调查，它表明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学生他们的家庭都被列入社会名人录。

校长是另外一个重要因素。毋庸置疑，皮博迪在某种意义上成了富兰克林父亲的替身。当时，他的父亲已经七十多岁了，而且多病。这位杰出的校长似乎用自己的人格在每一个格罗顿学生身上打下了烙印，在年轻的富兰克林身上打下的烙印并不是最少的。

皮博迪身材高大，精力充沛，忠厚诚实。他有一头金发和运动员的骨

架。富兰克林来到格罗顿的时候，皮博迪当时三十九岁。他讲课单调呆板，布道索然无味；他对于智力活动，不论是宗教性的或者非宗教性的，都不感兴趣。他是一个独断专行的人，有一副令人生畏的威严，可以把最傲慢自负的孩子制服。艾夫里尔·哈里曼有一次曾对他的父亲说：“如果他不是这样一位虔诚的基督徒，他一定是一个大恶霸。”曾经有一次，一个桀骜不驯的学生当着全体同学的面说校长处事不公，他给那个学生记了六个品行不良的罚点并且强调，服从高于一切。”皮博迪相信宗教、品格、体育和学业，而它们的重要性似乎递减。按照他的传记作者的说法，“正象许多年轻人一样，他对足球运动员要比对非足球运动员本能地产生更大的信任。”他和他的先辈们一样也反对奢侈生活，禁止学生在星期日溜冰。在格罗顿学校的毕业生离开他的宗教约束以后很久，他还责备他们在个人道德方面的失检之处。

但是，皮博迪的个人美德超过他的这样或那样的局限性。他的献身精神和充满热情的性格教育了全校师生。他有着自己十分明确的教育目的。那就他训话中所说的培养出“果断的基督教性格，不但重视智力发展，而且重视道德和体力方面的发展”。他本人就是这些目标的具体化。他身着蓝色西服，衬衫的领口打着白领结，步履矫健地巡视各个教室，或劲头十足地参加学生的各种比赛。他主宰着校园的一切，在他身上体现了他所笃信的光辉的基督教教义。学生对他既爱戴而又畏惧，所以不敢胡作非为。一位毕业生在其他方面对校长颇有微词，但却说学生从皮博迪身上学到了决心和无畏。

罗斯福需要这样的榜样。尽管他从容地从海德公园的生活过渡到格罗顿的学生生活，但有时仍有不安全感，对自己在格罗顿的生活缺乏信心。他时常担心自己的考试成绩。他写了一篇故事投给校刊，忐忑不安地在家信中写道：“我的稿件几乎没有被接受希望。”

实际上，富兰克林偶尔产生的这种力不从心的感觉不是没有原因的。他在许多方面都感到自己不占优势。尽管幼年在家中接受过家庭教师的极好的启蒙教育，而且口齿伶俐，但在格罗顿学校的最初几年，各科成绩仅是勉强及格，以后几年他也只把成绩勉强地提高到 B。他积极参加足球、垒球、曲棍球、高尔夫球、网球等各种球类活动——因为皮博迪要求全体学生参加集体体育活动，而对个人体育活动，只是勉强地予以接受——但他除了“踢高球”以外，在其他方面都毫不出色。他踢高球在学校创造了记录，其所以引人注意只是因为他成功地跃身踢中离地七英尺多的高球，

结果身体落地时麻木了左半身和左臂。这也证明富兰克林为了在某个方面出人头地，是会全力以赴的。

富兰克林在格罗顿的生活遵循着一成不变的程序：上午是祈祷和上课，下午参加体育活动，晚间又是祈祷和自习，一天结束时学生们换上伊顿公学式的硬领、蓝色服装、浅口无带皮鞋，列队从皮博迪身边走过，与他握手，互道晚安。

秋季有足球赛，大家高兴极了。随后，圣诞节来临，校长的老父亲给学生们朗读狄更斯的《圣诞节颂歌》，这令他们终生难忘。冬季，下午的时光特别短促，他们乘雪橇滑坡、坐雪橇滑行、穿雪履滑雪。春天的时候，他们便去划船、游泳、打高尔夫球、为参加阵亡将士纪念日的游行而进行操练。格罗顿学校的全体师生全神贯注地忙于这些日常活动，对外部世界毫不关心。然而，1898年发生的那些激动人心的事件犹如晴天霹雳，震撼了格罗顿。富兰克林毫不例外地因为美西战争而异常激动。他和另外两名同学确实曾经打算乘卖馅饼的小贩的货车从格罗顿逃走，入伍当兵。但是就在这个关键时刻，他却因患猩红热而不光彩地病倒了。

格罗顿有位毕业生后来回忆说，一到假期，学生们对学校那种与世隔绝的、修道院式的生活作出的反应，就像远洋后上岸度假的水手那样。不过富兰克林并不如此。没有任何蛛丝马迹可以表明他有越轨行为，甚至连调皮的事也没有。在短暂的假期里，他全身心地重新投入海德公园的生活。暑假，他通常是在坎波贝洛度假，最大的乐趣就是驾着他父亲赠给他的那艘二十一英尺长的帆船“新月”号出游。他那时对女孩子还没有表现出有多大兴趣。他充分遵守社交礼仪，可是又花费许多时间去躲避一些被他称为“讨厌鬼”或“庞然大物”的女孩子。

罗斯福在格罗顿的四年学业结束了，他显得比以前更加成熟和自信。他对妈妈现在有了更大的独立性，过去她是经常来学校看他的。他的学业也有所进步，而且当上了宿舍长和九人垒球队干事。有些同学认为他师心自用，好与人争吵。有些同学却很喜欢他；有一位同学记得他有“灰色的眼睛，冷静，沉着，聪明”，脸上挂着“最热情的、最友好的和充分体谅别人的微笑”。但是，事实上罗斯福并不认为他在格罗顿一帆风顺。他试图取得高年级级长这个人人都想干的职位，不过未能如愿以偿。对于校长出自“偏爱”而选中了别人，他感到愤慨。他在高年级仍然庇护“新来的孩子”，但他自己却是个身材消瘦、戴着夹鼻眼镜、牙齿上装着矫形的钢丝套的小伙子。

格罗顿校长在很多年以后将他的情况概括如下：“他是个文静的、令人满意的学生，智力超群，在班上有一定地位，但并非出类拔萃。在体育运动方面，由于身体十分瘦弱，没有什么特别的成就，我们都喜欢他。”

格罗顿学校对罗斯福这位未来的政治明星究竟产生过什么影响呢？这个问题至关重要，因为皮博迪十分重视并期望把他的学生培养成政治领袖。他本人毕业于切尔特南和剑桥大学。他对英国的公学（即私立学校）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它们成了英国政界领袖的招募站；伊顿公学在十九世纪中叶产生了六位首相，而有些内阁会议仿佛是哈罗公学校友的聚会。格罗顿在美国是否能成为另一个哈罗公学呢？皮博迪说，“如果格罗顿的某些学生没能进入政界，为国家作出一些贡献，那并不因为他们没有受到督促。”他对学生是进行了劝勉的。

劝勉——不过在劝勉之外没有做过多少其他的努力。格罗顿确实没有向学生们传授任何从事政治活动的专门技巧。在一个民主国家里，不可或缺的政治手腕就是善于同三教九流的人物打交道。一位校友说过，格罗顿的毕业生习惯于“在和一位不大熟识的人交谈时抬头凝视前方，眼光比对方头顶高出二英寸”。离开格罗顿十年以后，罗斯福仍然把头抬得高高的，顺着鼻子向下看人。他在格罗顿学到的唯一政治技巧似乎是一种有效的辩论术，但是，这种辩论术对于他以后的政治斗争的作用微乎其微。

格罗顿教授的课程也不大可能鼓励学生对他们本国的政治产生极大的兴趣。语言课，特别是希腊语和拉丁语这些呆板的语言，在课程表上占很大的比例。历史则是欧洲史。没有开设任何与美国直接有关的课程。校长和大多数教师都是照本宣科，死记硬背；学生们与其说是接受教育，不如说是接受训练。富兰克林的一位同学说：他在格罗顿学了六年圣经课。但他从来没有听说雷南和汤姆·佩恩；从来也没有人对他说过《旧约全书》和《新约全书》中充满着最尖锐的矛盾。从富兰克林在格罗顿四年期间所写的几百封信中，丝毫看不出他的智力受到了任何启发。所开的课程都是阻碍智力开发的。

有人说，罗斯福对下层社会的关心是在格罗顿成形的。这种说法只是在某种意义上才是正确的。皮博迪带有一些基督教社会主义者的色彩。他同情穷困的人们。而格罗顿一直为穷苦的孩子举办夏令营。富兰克林有时也协助参加工作。但是，这位校长的社会主义思想和他在剑桥大学的老师查尔斯·金斯利的思想有一些相近之处。金斯利到了后来对于改善卫生条件要比对于实行经济和社会改革更有兴趣。皮博迪校长的人道主义则体

现于他对公众的健康卫生和伦理道德的关心，但从未超出这个限度。富兰克林对穷人的关心主要是给予他们救济。至于涉及到一些公众关心的具体问题，在辩论中罗斯福主张扩大海军，反对兼并夏威夷群岛，主张菲律宾实行独立，反对保证中国的领土完整——但他偏袒任何一方的立场与其说是他自己确定的，也许不如说是别人告诉他的。当时工业主义正在国内兴起，它造成了日趋尖锐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但是这些情况却没有引起他的兴趣。

至少从某种程度来说，格罗顿对于这位未来的政治家完全没有尽到责任。政治在皮博迪看来是一种社会改革运动，而格罗顿的游侠骑士们参与其间（也许佩着伊顿式的宽硬衣领），迫不及待地冲向政治舞台，与邪恶势力进行激烈的斗争。皮博迪对富兰克林和他的同学们说，必须使政治“变得廉洁”。但是，他的鼓励的话却忽视了一个热衷于追求成功的美国政治家所面临的各种残酷的形势。这位校长劝勉他们决不要说谎。但他忽略了更深一层的问题：在政治活动中，为了实现“善良的”目标，说谎有时似乎成为必要的手段。这位校长警要说，决不要和恶势力妥协，但他却未说明一个政治家为了完成民众所委托的重任，是否必须和腐败势力妥协。对于一位人道主义的政治家来说，皮博迪的目标都是善良的目标。但是，他的死板的说教与美国政治的严峻的现实竟全不相干。林肯·斯特芬斯最后得到的经验是：“单凭诚实是不够的”，想要在一个民主国家里进行有效的政治活动，必须要有知识、勇气、毅力、幽默感和领导能力。

可以肯定地说，皮博迪力图解决的是一个难以解决的古老的问题。因为，至少两千年以来，人类社会一直努力想要解决如何发现和培养政治才能的问题。在希腊，依据脑力与体力同时并重的精神，对年轻人进行考查，看谁具备一个领袖人物的必要条件——常识、智力以及为公众利益而献身的精神。若干世纪以来，出版界给欧洲提供了大量的书籍，论证王子应当接受什么样的教育，统治者应当如何使自己的举止合乎规范，其中以马基雅维里所著《君主论》最负盛誉。英国的国立学校培养出一代又一代的掌握领导艺术的毕业生。而格罗顿和美国其他的私立学校，正象他们模仿希腊的运动练习和中世纪的修道生活那样，则模仿了伊顿公学和哈罗公学的教育方式。但是它们仿效的只是形式，而这种方式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以及美国这种独特的民主政体之下是毫无意义的。

罗斯福从格罗顿毕业了四十年以后，在写给皮博迪的信中说：“我认为在我的性情正在塑造阶段，有幸接受你的教诲，是我一生中的一大幸

事。”这位校长成为在他身上集中了基督教各种理想的一位奇特人物。格罗顿也给罗斯福留下了各种美好的回忆——徒步进城去买苹果汁和苹果，青春的声音在柔和的5月的夜空中回响，灿烂的阳光穿过教堂的窗户照射进来，以及校长为了使大家理解他的简单的教诲，使劲地把绷紧的手指象劈刺那样向前戳去的手势。皮博迪和格罗顿学校帮助罗斯福形成了他对社会问题的基本看法，然而，他们对于罗斯福将来成为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却没有产生多大影响。他在政治斗争中所获的胜利，没有一次可以归功于格罗顿学校操场上的训练。

哈佛大学，理想园地

富兰克林·罗斯福在1900年9月写信回家时说：“我最亲爱的妈妈和爸爸：我现在坎布里奇。十二小时以后我将完成所有注册手续而成为1904级的新生。”他的卧室看起来好象“被片状闪电击中”，一片狼籍，卧室内没有窗帘和地毯，床铺看起来“不适合睡觉”——但他却很高兴。他就要成为哈佛人了。

从格罗顿学校进入哈佛大学比较容易。许多老同学和他一起进了哈佛。他立即开始同格罗顿校友同桌吃饭，而不去那些大型的公共餐厅。他经常在晚上去桑伯恩弹子房，可以会见“格罗顿、圣马克斯、圣保罗和庞弗雷特等校的大多数校友”。和他同寝室的莱恩罗普·布朗就是格罗顿校友。他们在威斯特莫利大院合住一套房间，地点在哈佛的“理想家园”，即租费昂贵的宿舍和高级俱乐部集中的地区。

哈佛和格罗顿不同，它不与世隔绝。查尔斯河对岸就是沐浴在午后的金色阳光下的波士顿。这座号称“宇宙的中心”和“美国的雅典”的城市对拥有新英格兰名门世家、布尔芬奇修建的州议会大厦、自己的雅典娜神庙即著名的私人图书馆感到自豪；这个城市在对爱喝啤酒和信佛的杰克·加德纳夫人感到习惯以后，也把她当作自己的骄傲，她捐资修建的那个传奇性的艺术宫开放了（在年轻的罗斯福上大学三年级时）哈佛大学对于波士顿这样一座城市来说是一个素养高的智囊团。大学和波士顿的关系虽然很紧密但并不是一直都很融洽的。一位哈佛的历史学家说，波士顿是附在大学身上的一条“社会水蛭”；灯塔山的女侍——他称之为“波士顿的性感女郎”——希望招待哈佛的那些“诱人的青年男子”，并挫败了要把哈佛大学建设成为一所“社会民主主义”的大学的一切企图。

罗斯福立刻和波士顿—坎布里奇的社交圈子扯上了联系。他和波士顿的上层人物相处很好。他们的家庭从社会地位来说虽然显赫得多，但和他

在海德公园熟知的那些家庭非常类似家庭富有，出身上层，只在这些家庭之间通婚。他在哈佛四年期间几乎每个星期都要进行一轮社交拜访，一本正经地把名片递给令人生畏的男管家。他写信告诉家里说，他的大礼服太漂亮了，大家都赞美不已。他有修长的身材和几乎可以说漂亮的面容——头发中间分开、双眼深陷而且靠得很近、细长的鼻子和下巴、感觉灵敏的双唇——他随时脸带微笑，但不再露出牙齿上的钢丝套，他举止优雅，所有这些优点都成为他的有利条件。

但在运动场上，他的体格却不能让他自己满意。就像在格罗顿一样，他努力想在一个大的体育项目中出类拔粹。可是，他的体重仅有一百四十六磅，而且体育技能并不娴熟。他竭尽全力当上了一年级足球队的后边锋，可是仅仅维持了两个星期。经过第一天的训练以后，他当上了一个非正式球队的队长，这对他也是一种慰藉。他也试图参加划船比赛，但在在这方面，他至多也只不过在校内比赛队里当一名尾桨手。

罗斯福为了补偿在体育运动方面遭受的挫折，便积极参加课外活动。他被选为“一年级快乐俱乐部”的干事，他为此感到高兴。最有意义的是《校旗报》。他写信告诉家里他已经“脱离”一年级足球队并且告诉他家里，他正在努力争取参加大学生日报的工作，“如果我好好干上两年，我可能当上编辑。”他的确努力工作——时常一天几小时。到了三年级，他取得了主编这个最高职位。运气或者是亲戚关起了一定作用。富兰克林在给他的堂兄西奥多·罗斯福打电话要求去看他时，发现这位副总统即将在哈佛作一次学术性讲演。所以，他抢先在自己的报纸上发表了这条重要的内幕消息。但是，他的成功主要还是他的那种锲而不舍的精神的结果。

勿庸质疑，罗斯福希望在哈佛取得成功。这种抱负的根源何在呢？显而易见，一般地说，这多半是由于他十分希望赢得同学们的尊重，而从特殊意义上来说，则是由于热衷于赢得社会名流的尊重。罗斯福在大学时期是个喜欢参加各种社团的人。但是有些团体，人们不能要求参加——而是应邀参加。

罗斯福在哈佛遇到那种俱乐部，对入会者的限制在全国也是最严格的。二年级学生首先要由“麦片糊”俱乐部加以筛选，首批当选者享有优越的社交地位。然后是真正的考验——看是否能被选进一个“终极”俱乐部。

哈佛的各个分会一度曾附属于一些全国性的团体，因此，它们没有和俄亥俄州及其以西的各地方团体建立关系，而且愿意放弃它们的资格。这些分会实际上直接将哈佛大学与波士顿社会连结起来。这些团体表面上有

个空架子，但几乎没有开展任何有意义的活动；重要的在于，一个人应当参加它们，而不是要在其中积极开展活动。

富兰克林非常高兴地讲入社交界。他在得知自己已被一个二年级俱乐部选中后写信回家说：他快要忙死了，但他仍然感到很高兴。作为罗斯福家族的一员和格罗顿的毕业生，他几乎有把握参加一个最终的俱乐部。但对于参加哪一个他犹豫不决。在这些五花八门的俱乐部之中，最好的是波斯利恩俱乐部。许多年前这个俱乐部曾吸收过他的堂兄西奥多。但被波斯利恩俱乐部拒之门外。所以富兰克林参加了一个名叫“飞球”的高级俱乐部，据埃莉诺·罗斯福说，这个打击使富兰克林多少产生了一种自卑感。他的另一位亲戚则说，这是他一生中最痛苦的时候。关于这一点，各种说法证明是互相矛盾的，但有一个事实则是确信无疑的：对于年轻的罗斯福来说，他是否被社交界所承认，则具有极重要的意义。

罗斯福也必须把时间用于学习方面。他学文科。主要课程有英国文学和法国文学、拉丁文、地质学、古生物学、美术和演讲术。但他把精力集中在社会科学上面，选修了十几门历史课和几门与政治学和经济学有关的课程。包括欧洲史、英国史、美国史、美国政府、立宪政治、美国立法倾向、国际法、货币法规以及有关运输、金融和企业的经济学课程。同在格罗顿时一样，他依然是一名中等学生，成绩平平，达到“体面的及格”水平。但是，由于他在格罗顿学校时已经预修过几门课程，因此用了三年时间就具备了获得学士学位的资格。然而第四年，他仍留在哈佛，编辑《校旗报》，同时正式升入研究院。但由于他并不认真学习各门课程，因此，最后未被授予硕士学位。

在他大学年代的大部分时间内，他时常和母亲见面。詹姆斯·罗斯福因患心脏病，经过长期的病痛挣扎，在富兰克林刚进大学那年逝世，享年七十二岁。萨拉后来说：“在他离开我以后，我简直不知道我该怎样活下去。”她勉强在海德公园孤独地度过了一个冬天；然后，她在波士顿距离儿子只有几英里的地方，找到了一套公寓。富兰克林和她的关系亲密而不拘谨。他聪明地和充满深情地对待她，并且勇敢地担负起海德公园和坎波贝洛的一些责任。夏天，他有许多时间和妈妈在一起，象以往那样过得自由自在。在他念完大学一、二年级以后，他们都去欧洲旅行一次，还要游览挪威海岸、德国、瑞士、法国和英国。除了这些旅行以外，他还剩有时间打高尔夫球和网球，在坎波贝洛荡舟。

罗斯福在哈佛大学参加的活动涉及六方面事。有一段时期他采纳了波

士顿一位售书商的建议开始藏书，起初收藏一般有关美国的书籍，逐渐把收藏的范围缩小到“船舶”，最后只限于美国军舰。他作了“飞球”俱乐部的图书室负责人，但任务很轻松。他同时还从事慈善活动，他时常在波士顿的一个俱乐部给穷孩子们上课。他甚至在一次足球比赛时带领啦啦队，不过，他自己也觉得感到在几千名热情洋溢的观众面前指手划脚，好象是个大笨蛋似的”。但是，他的大部分大学生活可以归纳成他给母亲的信中的这样一句话：“……念一点书，有时骑骑马，有时也参加一些社交聚会。”

在罗斯福毕业于哈佛的几百年前以前，两位美国总统的后裔亨利·亚当斯曾经在那里学习过。亚当斯后来说，当年的哈佛是一所具有宽容精神和自由主义色彩的高等学府，它把学生们培养成高尚体面的公民，然后输送到社会上去。但是，它从未企图培养出公众领袖。……因为它教授的知识有限，而且，连这一点知识也教得不怎么样。但它却使学生们思想开阔，毫无偏见，对事实不甚了了，但却驯服听话。虽然亚当斯在哈佛学习以后的日子里，特别是在查尔斯·W·埃利奥特任校长期间，学校发生了许多明显变化。但是，亚当斯的话贴切地说明了哈佛对富兰克林·罗斯福一生的意义。

他学习的课程看上去好像挺适宜于培养一位未来的政治家，但这些课程实际上却空洞抽象。比如，罗斯福所选的政治学课程强调立宪程序和抽象的法理，而不重视政治现实。罗斯福本人抱怨说，他所学的课程“好象是一个没有灯丝的灯泡”。而他想要学习的是“实行一种政治制度的具体计划——包括预选、政党预备会议、选举和立法的具体计划”。当时，他的第一门政治学课程是由哈佛大学有史以来讲课最枯燥无味的一位讲师教授的。

当然这不仅仅是学校的错。罗斯福对于学习多半是不很认真——即使他所学的课程比这生动有趣得多，他也可能仍然漠不关心。他在家信中除了谈到要努力达到课程要求以及应付考试死记硬背外，一点也没有提到他对哈佛的智力培养所产生的兴趣。当他讨厌一位近视眼的讲师时，他就和班里大部分同学一起离开教室，爬出后窗，顺着太平梯溜之大吉，而毫不感到内疚。

哈佛传授给罗斯福的那些学说对这位三十年代的政治家的观点肯定没有什么影响。这位将来要控制议会并企图“操纵”最高法院的总统，在大学里所学的却是政府各部门之间要保持良好而牢固的制衡这一永恒的真

理。这个将来做了总统以后要推行“疯狂的”经济实验和金融计划的人在大学里却在古典经济方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是后来他说：“我在大学学了四年经济学课程，而教给他的东西全都是谬误的。这个将来被称为他那个时代的政治心理学大师的人却没有学过心理学课程，就连唯一的一门哲学课也只上了三周就退选了。他本来可以从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那里学到许多关于美国西部对美国的历史与政治所产生知识，可是在特纳讲课的头六个星期，他没有去听课。

他的教授有极右派人士也有温和的自由主义分子。他只同一位名叫艾布拉姆·皮亚特·安德鲁的经济学教师结为挚友，安德鲁风度翩翩，有些名气。他后来进入政界，在塔夫脱任总统期间被任命为财政部助理部长。艾博特·劳伦斯·洛厄尔本来可以在实际政治方面对他有所助益——洛厄尔曾任波士顿院校委员会委员，后来民主党和共和党均未再提名，让他连任——但罗斯福似乎很少和洛厄尔接触。洛厄尔和至少其他两位老师后来在罗斯福任总统时仍然健在，他们激烈地反对罗斯福新政的大部分内容。

罗斯福在大学时代，他持什么样的社会观点呢？如果说他那时有社会观点的话，那也不过是由政治上的保守主义、经济上的传统立场和反帝国主义组成的混合物，它充满了模糊的利他主义，也充分地反映出很大的无知。他在一年级时写道：“当然哈佛企图提高黑人的社会地位和道德标准，也可以说，企图把他们从半牲畜状态提高到人的地位。”在西奥多·罗斯福协助平息了1902年的煤矿工人大罢工以后，富兰克林指责堂兄干预这一事件，并批评他“企图使行政部门的权力压倒国会”。虽然他曾听过著名的历史学家爱德华·钱宁抨击英雄崇拜的观点和编造历史的作法，但他在四年级时同样也写了一篇论述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文章，其中充满阿谀奉承之词并扭曲了史实。另一方面，他帮助建立了“布尔人救济基金会”，而且在一篇论述革命战争以前的罗斯福家族的文章中，吹捧了他的祖先们的“高度的民主精神”和责任感。

想要了解罗斯福在哈佛时期的政治观点，也许最好是阅读他在《校旗报》上发表的社论。由于被秋季足球赛中出现的问题弄得心烦意乱，他在社论中愤怒地批评比赛时啦啦队没有大声喝采，正面看台上有人抽烟，观众没有热情，运动员不大卖劲等。冬天到了，他又把目标直接转向冬季运动会。他偶尔也写一些社论，评述多年来学生报纸编辑所关注的问题：比如宿舍的防火设备不齐全，需要在海滨铺上木板路，以及学校安排的活动过多等等。他还努力提醒人们注意大学里的政治讲演人。他对哈佛以外的

事务丝毫没有一点兴趣。

罗斯福在校内的政治活动中表现平平。当他在一年级时，一些“外来人”打破了格罗顿校友们对班长这一职位的垄断。他那时还是个局外人。四年级时，他被提名竞争班长这一众人争求的职务，却被有组织进行竞选的人所击败。但是，他却获得了一个职位：他当选为班委会的永久主席，这多半是由于他作为《校旗报》的编辑而久负盛名带来的结果。但是，他在哈佛并未显示出赫伯特·胡佛十年前在斯坦福大学所显示的政治能力。当年，胡佛领导“野蛮人”对社团控制校园里一切活动的状况发动进攻，并且取得了胜利。

大约就在罗斯福在哈佛学习的期间，一个名叫乔治·华盛顿·普伦基特的坦慕尼协会的地区领导人，坐在他那心爱的擦皮鞋摊子上，议论怎样在政治活动中获得成功。他说，你必须研究现实而不是书本——书本只会碍事。“如果你上过大学，那就坏透了。你必须把学过的东西全部忘掉。”出路是什么呢？“到人民中间去，去看他们，也让他们看看你。”罗斯福早年所受的教育与普伦基特的这些经过时间考验的格言全然对立。但是，在未来的岁月里，来自海德公园的这位年轻人将会击败普伦基特这类人物。罗斯福如何坚持他从幼年开始，先后在海德公园、格罗顿和哈佛逐步培育起来的理想，如何为了实现这些理想而投身于美国政治的惊涛骇浪之中，这将成为他未来生活中的主题。

第二章 奥尔巴尼的幼狮

有一个事实特别惹人注意，就是在我们的年代，许多伟大的公众人物是从国家的“中心地带”以外的地区崛起，然后上台执政的正如更早时期的拿破仑是科西嘉人，而不是法国人一样。劳合·乔治来自威尔士，而不是英格兰；希特勒出生于奥地利，而不是普鲁士；斯大林来自格鲁吉亚，而不是俄罗斯本土；麦克唐纳来自苏格兰北部，而不是英格兰，从地理上来说，罗斯福不是一个外地人，但从文化的角度来看，他却是个外地人。他从海德公园、格罗顿和哈佛转移到纽约市，如同从一个世界转移到另一个世界——即从家庭和学校的那种阶级界限森严的上层社会转移到二十世纪初期繁华喧嚣的商业大都市。

当时美国的大都市经济上和政治都处在巨大震荡中。从年轻的富兰克林·罗斯福初次眺望明轮汽船沿着赫德森河奋力地逆流而上，直到1904年6月那天他头戴学士帽，身着长袍，参加哈佛毕业典礼的那一时刻，其间

发生了许多变化。就在这一年，有一位经济学家发现摩根财团和洛克菲勒财团两大家族成为了构成全国商业与贸易活动的核心。在罗斯福在哈佛攻读古典经济学的四年期间，有一百五十多家托拉斯宣告组建。其中有十家资本额为一亿美元或超过一亿美元；托拉斯又进一步发展成超级托拉斯。虽然出现过经济萧条，虽然1890年又通过了谢尔曼限制托拉斯法案，虽然人民党和社会党也极力加以抨击，但是，资本家们却不屑一顾，仍然信心十足地把持着自己的权力。

这种制度并不是没有受到任何挑战。1896年，年轻的威廉·詹宁斯·布赖恩曾号召西部奋起反抗华尔街和金钱的势力。他在草原的阳光下讲演时，面部神情激动，时而苦苦恳求，时而发号施令，时而嘲笑挖苦。但是这些未起任何作用。威廉·麦金利表面上冷静沉着，坐在自己家的前廊上直到竞选运动结束为止。布赖恩这位“孩子演说家”却丢掉了东部全部的选票，在新英格兰所有的县里也都落选。四年后，他的境遇甚至更加恶劣，在许多美国东部人看来，布赖恩主义似乎是遥远的西部的一件麻烦事，在东部惟有一些大中城市中的无业游民才支持它。在布赖恩的第一次竞选运动时，富兰克林·罗斯福开始在格罗顿学习，在布赖恩进行第二次竞选时，罗斯福正在哈佛，因此，对他来说，布赖恩主义没有什么影响：在他周围，大学的围墙挡住了布赖恩分子的呐喊声。

但是，在二十世纪初叶，情况却大为改观。突然之间——后来看来似乎是一夜之间——一股令人沉迷的改革气氛到处弥漫。一大批爱管闲事的、目光敏锐的新闻记者开始报道二十世纪美国的种种弊端。这些弊端与双手长满老茧的农民和卑鄙无耻的社会主义者的那些老掉牙的怨言毫不相干。这些弊端也伤害着那些上层人士。人们揭露，专卖药品往往是有毒的——而且能够杀人。人寿保险公司用别人的钱——包括中产阶级的钱——进行投机活动。街道拐角的杂货店出售的罐头食品可能不卫生，甚至是有毒的。法院的作风腐化，参议院贪污腐败。据专门揭露丑闻的人报道，在许多城市中，犯罪行为涉及甚广，从有钱的太太和贪赃的警察到政客和市长，乃至常去教堂做礼拜的公共运输大王和公用事业公司的经理。

这些被揭露的真相并没有淹没在五花八门的马克思主义的刊物或人民党的周刊之中。一些畅销杂志如《柯里尔杂志》、《麦克卢尔杂志》、《美国杂志》、《世界主义者》月刊——都以令人触目惊心的标题将它们刊登出来。阿尔奇街那位爱讲大道理的酒吧侍者杜利先生说，过去，一本杂志“令人赏心悦目”，“可是现在，当我从地板上拿起我中意的杂志时，我看

到的是什么呢？一切都变得出格混乱了。”改良主义不仅搅乱了酒吧侍者的平和的心态，而且也使理发师、家庭妇女、牧师、教授和年轻人也激动起来。

罗斯福 1904 年从哈佛大学毕业时，揭露贪污事件的浪潮正方兴未艾。以后的六年，是弗雷德里克·刘易斯·艾伦所称的美国人良心上的觉醒达到高潮的时期。而在这些日子里，罗斯福是在纽约度过的，起初是在哥伦比亚法学院当学生，后来成为一个年轻的律师。对于他来说，要领略改革的气氛，纽约是再好不过的选择了。因为，二十世纪的纽约既沾染上了时代的弊端，也带来了将来的希望：它是一座拥有一百万移民的城市，它既有居住条件极其恶劣的贫民窟，又是坦慕尼协会及其头子墨菲控制的大城市，也是大规模地进行贪赃枉法活动的城市。但是，纽约也是大多数揭发贪污事件的杂志的总部和多次发生的改革运动的活动中心。罗斯福的堂兄西奥多曾在这里当过警察局长，但在竞选市长时却又遭到了失败。

这个环境究竟对罗斯福产生了多大的影响？直接的和立即产生的影响并不大。和以往一样，罗斯福往往受人的感染而不易于受学说的影响。但是，长远的和间接的影响却是重要的。从长期的观点看来，他不可能逃脱包裹在他周围的改革主义的气氛，正如他不能使自己和周围的空气隔绝一样。在使他和新的美国发生真正的接触方面，起了决定性作用的两个人。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个人都出身于他的那个社会阶层，而且同属于他的那个家族。

西奥多堂兄和埃莉诺堂妹

富兰克林·罗斯福五岁时，有一次把埃莉诺·罗斯福驮在背上，在他的娱乐室的地板上玩耍。那时埃莉诺才两岁，她是奥伊斯特湾的罗斯福家族的成员。但在以后的日子里，他们只间或会面。在罗斯福家族中奥伊斯特湾分支中，第一个给富兰克林留下深刻印象的就是家族中他第五代堂兄西奥多。

西奥多比富兰克林大二十四岁。他在事业上始终遥遥领先于富兰克林，这使他成了年轻的富兰克林心目中的英雄。在富兰克林的孩提时代，“西奥多堂兄”即“特德叔叔”出征西部抓拿匪徒。富兰克林在格罗顿求学时，西奥多曾在纽约成功地担任警察局长，在华盛顿协助主管海军部，他在对西班牙的战争中成了英雄，后来又出任纽约州州长。这位义勇骑兵团的骑士喜欢用他那满腔的热情来感染青年。他告诉那个崇拜他的堂弟和一群听得发呆的格罗顿学生说，“一个人只做到行为端正是不够的。他必

须机智，和勇敢。”

西奥多完全符合格罗顿学校的理想标准：他是一个勇敢的斗士，努力要实现“廉洁的政治”，反对贪污、腐败和各种随处可见的政治恶习与弊端。他在纽约州任州长时，抨击地方上的领袖，因此他们急于帮忙把他从纽约州送走，推举他去当副总统。谁又能够预料到一个发狂的无政府主义者的子弹呢？另一个领袖人物——共和党的主席——简直被吓呆了。马克·汉纳惊叫道：“我对威廉·麦金利说过，在费城把那个疯子提名为副总统候选人是个错误。现在，你们看，那个该死的牛仔当上美国总统了。”他在给西奥多·罗斯福的信中写道：“你要小心行事。”

总统的答复是：“我将遵您所意。”但是，无论从体力或性情方面来说，他似乎都不可能缓和行事。他就任总统以后七个月，便指示解散北方证券公司，而不顾约·皮·摩根的彬彬有礼的答复：如果公司作错了事，“请派你的人〔司法部长〕来找我的人，他们会圆满解决的。”在后来的几年中，他主张制定法律对工人实行补偿并且限制童工，并且制定关于销售卫生的食品和药物的法律，实行更有效的全国性的铁路规章，征收所得税的遗产税，采取扫除保守主义的措施。可以肯定地说，他不是一个始终如一的和彻底的改革家。正如一位研究改革问题的人说的，“他也许有蛮横的战斗精神，在对待托拉斯问题上也许会采取回避态度，在社会立法问题上也许会进行妥协，他也许没看到那些没有把改革和西奥多等同起来的改革家们的长处。”但他却把改革搞得有声有色，而且赋予它以一种让人尊敬的气氛。

富兰克林无法逃避特德叔叔曾称之为“公众心中的激动和愤怒的情绪”。这位作为义勇骑兵团骑士而曾经赢得年少的富兰克林的崇拜的人，如今又作为一位改革家而受到他的尊崇。富兰克林在和总统的侄女结婚前后曾多次在白宫见过总统。他肯定考虑过他的事业与他的堂兄早年经历的事业相似之处：西奥多曾在哈费念书，竞选级长失败，后来上了哥伦比亚法学院，然后进入政界。富兰克林几乎不可能忽略这些潜在的相似点。1907年有一天，他告诉他在法律事务所的几位同事说，他对他的事业已经早有打算：先在州议会里赢得一个席位，然后去海军部当助理部长，随后当纽约州州长，最后登上总统宝座。他的朋友们没有讥讽他，他好像是一本正经地说出了他的人生计划的。西奥多堂兄的事业不就恰恰是这样的吗？

但是，他们在一点上他们是根本不同的。西奥多始终是一个共和党人，而富兰克林呢？他是什么党？他的父亲深信联邦政府应该诚实、节俭

而且精简机构。他是克利夫兰的一个民主党人，他的儿子同样也是一个民主党人。但是，那段时期对于一个身为克利夫兰民主党人的罗斯福家族成员来说，是一段艰难的日子。在 1896 年，詹姆斯这个东部的资本家确实不可能拥戴布赖恩；他完全有可能投票支持麦金利。1898 年，詹姆斯为西奥多竞选纽约州州长进行活动。富兰克林从格罗顿学校写信说听到西奥多当选，他们都欣喜若狂。1900 年，富兰克林加入了哈佛大学的共和党俱乐部。他曾参加一次为支持麦金利与罗斯福被提名为正副总统候选人而举行的在波士顿火炬游行。1904 年，他把有生以来的第一张选票投给了西奥多。这再一次表明，家族关系是最有力量的。

罗斯福早年究竟是不是一个民主党人？从子承父志的观点来看，他是个民主党人。但遇到具体的问题，他却同意共和党。实际上，他的党派倾向，正如他的思想倾向一样，是不成熟的。那么他为什么不以共和党的身分进入政界呢？在那种情况下，他就完全可以直接继承西奥多的政治路线。关于这点，最有力的解释似乎是，富兰克林从法学院毕业时，西奥多在共和党内的威信，如同进步主义派在共和党内的影响一样，正在被不断削弱。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西奥多于 1904 年断然声明，他不再竞选下一届总统。1910 年，富兰克林可能更多地是由于偶然因素，而不只是因为他本人的有意使然，富兰克林竟有可能被列入两大政党中任何一党提出的候选人名单而参加竞选。他参加了民主党，这倒不是因为他对民主党抱有信心，而是因为民主党支持他，并且找上门来。

埃莉诺·罗斯福是西奥多·罗斯福的弟弟埃利奥特和安娜·R·霍尔的女儿。富兰克林是她的远房堂叔。她是特德叔叔的侄女，具有总统家庭成员的全部魅力。这一点对于富兰克林决不是无关紧要的，但也不是最重要的一点。埃莉诺在小的时候，曾是一个害羞、忧郁的姑娘，她有罗斯福家族天生的那种凸牙，上面带着矫形钢丝套。在富兰克林上大学三四年级的时候，他突然发现埃莉诺长成了一个身材高挑而苗条的姑娘，浓浓的头发下面长着一张漂亮而生动的脸庞。富兰克林坠入情网，在 1903 年晚些时候向她求婚。她答意了。那时，富兰克林才二十二岁，而埃莉诺也只有十九岁。但是，她后来说：“这好象是自然而然的事，我甚至从来没有想过我们俩都很年轻，而且涉世尚浅。”

但是，萨拉却想到这样的问题。她对儿子突然宣布的婚约感到不知所措。她守寡不过三年，本来希望儿子能陪伴着她，在海德公园安定下来。她对富兰克林说，他们年纪太小，不宜很早结婚。但她的儿子态度坚决，

而且很聪明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他在写给她的信中说：“我心里明白……。亲爱的妈妈，对于你来说，你也知道任何都无法改变我们俩之间过去存在、将来也不会改变的关系。唯一的变化是，你现在要爱两个孩子，同时也得到两个孩子的爱。……”埃莉诺写来了一封充满着伤感的信，要求大家不要再烦恼了，她说：“……我确实非常希望你能学会对我有一点爱。你要知道，我将永远努力按你的意愿行事，因为在刚刚过去的夏天，我对你的爱变得更深了。”

萨拉想推迟婚事，便在1904年初带着富兰克林到加勒比海地区游览。到他返回美国时，他还象以前那么坚决，一定要和埃莉诺结婚。萨拉妥协了。对于埃莉诺这个人，她并不反对。确实，如果富兰克林非得这么年轻就要作出决定的话，那么她对他选中这个姑娘是感到满意的。这对未婚夫妇，在细心的陪伴下，在坎波贝洛一起度过了几个星期，以便更好地互相了解。

1905年3月17日富兰克林和埃莉诺结婚。恩迪科特·皮博迪主持婚礼。刚刚宣誓就任总统的特德叔叔从华盛顿赶来送侄女出嫁。西奥多·罗斯福在婚礼上不可避免地喧宾夺主；客人们围聚在这位温和的总统身旁，使新婚夫妇遭到冷落。一位亲戚看到这种情景，挖苦说：“他去参加婚礼，就想作新娘；参加葬礼就想作尸体。”富兰克林和埃莉诺按照传统的奢侈风俗去欧洲度蜜月。在伦敦住在布朗饭店，在巴黎参观画廊，在威尼斯的月光下乘狭长形平底船游览，横穿阿尔卑斯山脉悠闲地向北旅游，最后到英格兰和苏格兰的庄园看望亲戚。

富兰克林的童年是欢乐愉快和无忧无虑的，而他妻子的童年却是动荡不安和充满悲伤的。她在纽约市那些豪宅里度过的童年生活可以作为伊迪丝·沃顿的小说的素材。她的母亲是个性情阴沉、冷酷无情的人，因患剧烈的头痛而受尽折磨，在埃莉诺八岁时去世。她的一个兄弟几周以后也死去了。她深爱她的父亲，他是一个性情愉快、乐于助人的人。他叫她“小内尔”，后来小内尔就成了她梦中的人物。但是，他因酗酒而患病，长期住在疗养院，在埃莉诺十岁时去世。她回忆说：她的姑妈告诉了她这个噩耗，但她怎么也不能相信。她哭了很久，上床睡觉时还在哭，最后她入睡了。第二天一开始，她又像往常那样生活在她的梦幻世界之中。她母亲的父亲把她抚养长大，但是，他们根本没有作出任何努力使她重获自信心。埃莉诺的母亲因为自己的女儿总是板起面孔和缺乏风度而感到厌烦，曾经当面称埃莉诺是个“老婆婆”。她的一位姨妈说，她是一个老处女，永远

也没有希望嫁出去。更糟的是，另一位姨妈在爱情上一再遇到极其不幸的打击，而一个舅舅酗酒。整个霍尔家族的人过着令人头昏眼花的社交生活，而这远远不是他们的经济力量所能支撑的。

埃莉诺大约十五岁时，去英国学习了三年。后来回到纽约，已经变得远比以前更加自信和沉着了。但是，她的童年生活使她对于遭受同样痛苦的人们产生了深切的同情，而且永远也不会把他们抛弃不顾。他曾经看见一个外表令人厌恶的男人企图把坐在她身旁的一位妇女的钱包抢走，这个人的面孔萦绕在她心中达几个月之久。她对于那些衣衫褴褛的小报童非常怜悯。她还曾帮助她的父亲向他们供应一顿感恩节晚餐。十九岁时，她在一家移民服务所任教，并为消费者联合会调查女性的工作条件。她的同情心和敏感性必然给富兰克林打开了一个新的社会视野。

但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对新婚夫妇 1905 年秋天度过蜜月归来以后，关注的是眼前的事情。他们搬进东三十六号大街上一幢萨拉租的并且配备了家具的房子里。在这里，他们住了两年，直到萨拉在六十五号大街上建造的两幢比邻的房屋完工后才搬家。这两幢房子萨拉自己住一幢，另一幢由儿子和儿媳居住。1906 年 5 月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安娜出世。在以后的十年中，还将有五个孩子诞生，其中有一个因患流感夭折了。对埃莉诺来说，这些年是艰苦的日子。她对于繁重的家务缺乏准备。她因为孩子夭折而严厉地责怪自己，虽然这不是她的过错。她的婆婆设法为她安排家庭生活，而且往往做得很成功。

埃莉诺非常希望参与她丈夫的活动，于是便努力学习驾驶富兰克林的福特小轿车，学着骑富兰克林的那匹名叫博比的马。但是，她开车时撞了门柱，而且也无法学会骑马。她独自练习打高尔夫球好多天以后，就鼓起勇气和她的丈夫在草坪上一起打。他观看她猛打高尔夫球几分钟以后说，她还是放弃为好，她听从劝告，也就不打了。

富兰克林的年轻的妻子感到自己能力不足，在萨拉这位婆婆的控制下觉得拘束不自在，而且希望更多地参与丈夫的社交。但富兰克林对妻子的这些思想感情似乎浑然不觉。当他发现埃莉诺有一次在他们的——或者说萨拉的——那幢座落在六十五号大街上的房子里，坐在梳妆台前伤心哭泣时，他的反应更多的是一种莫名其妙不知所措的灰心丧气，而不是一种充满关爱的同情。他追问“到底怎么啦”虽然他对待妻子和家庭很热情，兴致勃勃而又精力充沛地和家人一起野餐或乘游艇航行，但他也能在纽约市的大学俱乐部里消磨大多星期六下午打扑克。和他的父亲一样，他似乎能

够毫不费力地把他的生活一分为二。

罗斯福 1904 年秋进了哥伦比亚法学院，度蜜月归来后不久升入二年级。在这里，除了不再参加课外活动外他还重复以前在哈佛的生活方式，虽然哥伦比亚法学院拥有一批杰出的法学教授，但富兰克林对法律课程毫无兴趣。他的成绩平均又是 C。并且他有两门功课不及格——其中一门是“辩护与实践（一）”，需要补考。他在三年级结束前通过了纽约律师考试后，立刻退学，因而没有获得法学士学位。显而易见，学习法律对年轻的罗斯福没有什么吸引力。

至于开业当律师，则是另外一回事了。他通过亲戚关系，在旧华尔街的卡特—莱迪亚德—米尔本法律事务所找到了一个职位。第一年，工作不给报酬，而且干的都是一些琐事。但是，他承办了一些诉讼案件——其中许多来自他那好打官司的家族。他对诉讼谈判中那些争执不休和讨价还价感到有趣。他对法律教育和司法实践之间的差距感到惊奇和沮丧。他发现法律的“崇高原则”与他的亲戚由于一只皮箱在勒哈弗码头上被弄坏而引起的纷争以及对一份遗嘱或一个土地转让契约所作的解释等问题之间没有多大关系。

罗斯福对于法律的更广泛的内涵不感兴趣。如果他感兴趣的话，他在卡特—莱迪亚德—米尔本法律事务所的前途——以及他的整个人生——都会变得全然不同。这个事务所为诸如新泽西州美孚石油公司和美国烟草公司等诉讼委托人进行辩护，以抵制政府对托拉斯发动的限制。面对进步党人的主张，它为维护法人的利益而进行的辩护充满着冷静的、负责的精神。事实证明法律概念对罗斯福的影响还没有在与当事人、律师、债权人以及法庭周围的那些政客和未来的政客们日常的接触中所受的影响大。

然而，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他就厌倦律师这个职业了。他身上的某些因素推动他到更广阔的范围内进行活动。

对于罗斯福来说，哈佛毕业以后的六年，除了忙于家庭事务以外，从表面上看，是平静无事的六年，但也是韬光养晦的六年。而实际上一切却潜藏着一股暗流，它是由于时代的特色、他的妻子和同事们以及工作提出的要求而被不断激发起来的。到了 1910 年，这一时期宣告结束。罗斯福为了迎接摆在他前面的机会已作好了准备。

州参议员的竞选

一般的美国政治家为了取得由选举产生的公职，都采取前人的传统方式。他们在一个可能竞选获胜的社区中深深地扎下根去。他们参加诸如共

济会、农民协进会、埃尔克斯协会、退伍军人协会等各种各样的社团，在那些组织中能够与各方面进行有益的接触。他们积极参与做礼拜、办慈善事业和尽公民的义务等活动。他们谨慎地避开导致人们分裂的议论，这样就会迅速地使自己在任何得到广泛社会支持的运动中居于领袖的地位。最重要的是，他们尽量使自己成为善于同各阶层人士打交道的“交际家”。

实际上，罗斯福一件也没有做。他可能梦想过要参加竞选获得公职。但可以肯定的是，他没有做过什么准备工作。从他离开海德公园到格罗顿去念书，已经十四年了，但在这一年，他在海德公园也没有住到一年。他曾在母亲家度过许多个周末和夏季，但很少和镇上的人们见面。他担任了赫德森河水上游艇俱乐部副主席和圣詹姆斯主教派教会的教区委员。但这些活动的目的不是要使他和各阶层人士进行接触。当然，罗斯福也加入了第一鹰发动机公司的第一救援钩和救援梯公司，但这都是在他当选参议员后来的事了。

罗斯福的第一个机会不是他自己创造的，而是送上门来的。

这个良机的初次到来是在1910年初的纽约市，达切斯县的区律师和波基普西的一位主要民主党人约翰·E·麦克因一件法律事务来拜访罗斯福。麦克告诉罗斯福，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刘易斯·斯托伊弗桑特·钱勒可能辞去他目前担任的州议会众议院议员的职位。他问罗斯福有没有兴趣参加竞选。罗斯福作出了十分肯定的回答。在这一年秋季，达切斯县的民主党人在几次大规模的集会上对这个年轻人进行了审查。结果对他褒贬参半。他的举止和谈吐优雅，但有点高傲；他对本地区的情况却缺乏了解；而且年轻，缺乏经验；尤其重要的是人们对于他的发展前途无法预测，因而感到犹豫。但另一方面，他有罗斯福这个具有魅力的姓。而且非常有钱——这些钱他自己可以用来竞选，剩下的钱或许足够增加党的经费。

罗斯福没有什么疑虑不安。他想在政治上一显身手。他渴望回到海德公园居住。更为关键的是，他获胜的可能性很大。波基普西由于有爱尔兰人与其他民主党人的势力，在钱勒当选的那个众议员选区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毫无疑问，他的母亲对于这个想法半信半疑。许多朋友和亲戚也抱同样的态度。他们觉得这样做有点象一位英国绅士要去“做生意”了。但是，虽然富兰克林是以赞助民主党的态度进入政界的。“特德叔叔”却很高兴，而对于埃莉诺，她正在第四次怀孕期间，也只是默认了。她从来没有想过她能决定什么。到夏天，罗斯福已下定决心参加竞选了。

这时事情突然出了变故。钱勒看来又无意放弃他在州议会众议院的席

位。钱勒 1906 年当选为副州长，但 1908 年作为民主党候选人竞选州长却没有成功。不过，他不准备退出政治舞台。罗斯福邀请钱勒共进晚餐，并力劝他竞选州参议员，但他却没有答应。他们所在的州参议员选区包括几个农业发达的县，历来都是共和党的势力范围。自 1856 年以来，民主党仅有一次在本选区中获胜，而那一次则是因为有第三方的加入进行较量。钱勒不想冒这个风险。

罗斯福应该怎么办呢？要么试图竞选州参议员，要么完全退出角逐。他对于参加一次似乎是毫无希望的竞选，犹豫不决，另一方面，他的政治热情这时正激励着他，使他欲罢不能。同时这次竞选即便是失败了，也将成为一次有益的政治经验，一旦钱勒放弃州议会众议员的席位，他便可以轻而易举地取得胜利。再者，这个选区并不绝对地操在共和党手中。现任州参议员约翰·F·施洛瑟 1908 年仅以 18,366 票对 16,294 票获胜。党的领导人一次敦促罗斯福；他在这次商讨后不久说，他们告诉他说，他有义务同意参加竞选。他考虑了二十四个小时，赞同了他们的意见，因为他们一时物色不到合适的人选。”

一旦罗斯福下了决心，党的领袖们就容易安排一切了。他们在党内给他正式的身份，任命他作为代表出席州参议员选区的提名大会，在这次大会上，他将被提名为候选人。他们使他的提名很容易地获得通过。党的领袖们轻易地控制着大会，这使罗斯福获益非浅。如果当时和今天一样是在党的预选大会上决定州参议员候选人的提名，那么，可能一个热情的青年律师为了出风头或招揽诉讼案件，可能与罗斯福进行竞争，使他在选举中获胜的机会减小。但是，当时没有人会这样去做。

罗斯福在接受提名的演讲中说：众所周知，他以绝对独立自主的态度接受这一提名。他不效忠于任何个人，不受任何特殊利益的影响，而且将永远如此。他宣誓献身于旨在实现政治清明的事业，并且要求“独立思考的选民们”给予支持。

然后，他说了仿佛出自西奥多·罗斯福之口的一句话。他说：“我们要迎接非常紧张的一个月。”

这的确是非常紧张的一个月。更关键的是，这是非常成功的一个月。不论是出于刻意或偶然，罗斯福根据全国形势和州的形势制定了精细的、正确的策略。

到了 1910 年晚期，共和党内发生了深刻的分歧。过去十年中的积怨，由于揭发贪污案件的新闻记者和煽动者们的激化，已达到了破裂的程度。

它引起人们强烈的愤怒，结果使那位随遇而安的总统无法抑制也无法解决。塔夫脱总统签署了一项高税率法案，批准西奥多·罗斯福执政时期的大部分的研究员辞职，任命了更多的保守分子，并且在许多的领域里和国会里的共和党守旧派站在一起。人们已经看不到塔夫脱进步的一面，而且也看不到他那有节制地打击托拉斯的政策，也看不到他所宣称的保护自然资源的方针。人民需要一个有些改革派样子的人。总统若有所思地说：要想使他威廉·霍华德·塔夫脱成为一个按照罗斯福的作风行事的人，那是办不到的。……西奥多·罗斯福已从非洲归来，年纪不到五十二岁，而且没有职业。国会中共和党的反叛者弄得众议院议长约瑟夫·G·坎农举步维艰。他们把白宫那位身体高大的人作为攻击对象大加批评。

全国的形势在纽约州反映了出来。农民和牛奶场主们被税率搞得坐立不安。这种税率看来抬高了工装裤、方格花布和金属器具的价格，偏偏没有提高他们出售的牛奶的价格。这个州的守旧派是由一些地方党魁领导的，他们的声誉同坦慕尼协会的名声差不多。而且，西奥多·罗斯福当时在纽约州仍然很有力量。他在对共和党内的保守派发动一次公开的猛烈抨击时，选中了亨利·L·斯汀生做共和党竞选州长的候选人。西奥多·罗斯福说，争论的焦点在于“老板专断”（Bossism），即保守派领袖对党的控制问题。富兰克林·罗斯福立即利用了这个形势。通常，纽约州北部地区的民主党候选人必须应付人们关于坦慕尼协会对他的党实行控制所作的批评。现在，罗斯福能够指摘反对党内的“老板专断”的现象，并引用他那位身为共和党人的党兄说的话来加以证实。更有利的是，在他自己的选区内就有一个合适的靶子。这个人当地的共和党党魁。共和党著名领导人伊莱休·鲁特称他为纽约“人民鼻孔里的一股臭气”。

在其他方面，这个选区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困难。农场主们——牛奶场主，家禽场主，果园主和菜农——对“老板专断”和贪污腐败等弊端感到不满，但同时他们都又是保守的共和党人。大多数媒体都坚定地拥护共和党。另外参议员施洛瑟是参加重新竞选的候选人。他即有财产又有名望。他出生在波基普西，毕业于联邦学院，曾在费什基尔兰丁办一个法律事务所，步入政界后一帆风顺，青云直上。他广泛参加当地的志愿消防队员协会中的活动，这使他能够同各地区建立有意义的关系。但他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在他两度担任参议员期间，总的来看，他是和守旧派站在一起的。

面对这种形势，罗斯福决定把争论的焦点集中在“老板专断”与廉洁的政府二者的对比之上。要他做到这一点是很容易的，因为他恰恰具备这

种本领。在格罗顿学校和哈佛大学，他听到大家把政治说成是好人与坏人之间的斗争。宁要廉洁的政府，而不要进步的政府，这一直是他的父亲和克里夫兰其他的民主党人的战斗口号。采用这个口号作为这次竞选运动的旗帜是再合适不过的了。罗斯福成功地利用了共和党内保守派与进步派之间的分歧。即使这时已经是 1910 年，这位年轻的政治家也没有把进步主义作为他在竞选运动中讨论的问题。

与之相反，罗斯福的重要手段是故意模糊进步派与保守派之间的分歧，既向民主党人发出号召，同样也向共和党人和无党派人士发出呼吁。这种超党派的行动采取如下形式：

他以同样的激烈言词，谴责民主党与共和党的党魁们。

他发表大而化之的谈话，回避可能使他表明自己党派立场的具体问题。

他实际上不考虑州的民主党候选人名单和党的记录。

他强调他和“特德叔叔”的关系。在一次集会上，他一开始就说：“我不是‘特德叔叔’。有个小伙子前几天对我说，他知道我不是‘特德’。我问他‘为什么’。他回答道，‘因为你不发火。’”

他有意规避那些可能使选民们按照自己的党的路线而产生分裂的全国性问题。他后来在写给一位共和党人的信中说：“他本人始终认为一名州候选人和一名地区候选人在全国性的政策方面没有什么区别。”

他和“正直善良的”共和党人站在一起。罗斯福谴责了施洛瑟企图阻碍当时的共和党纽约州州长查尔斯·埃文斯·休斯的改革方案以后，有人问他是否赞同休斯的政策。他爽快地答道：“当然赞成。”

然而，关键却在于罗斯福必须能够解决一切参加竞选者所面临的根本问题——到人民中间去并和他们建立联系，否则，上述策略就是毫无意义的。他遇到的第一个阻挠就是，甚至在他的家乡海德公园，他也没有什么名气。要想骑马和乘轻便马车走遍方圆二万五千平方英里的广大地区，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他用罗斯福家族的典型方式正面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当时，这个地区仅有一辆没有风挡玻璃和车篷的大型红色的马克斯韦尔轿车，装有闪闪耀眼的黄铜车灯，罗斯福租了这辆汽车并用旗帜加以装饰。当时，汽车还给人以一种新鲜感，甚至使农民的马受到惊吓。但这辆马克斯韦尔轿车以每小时二十五英里的速度跑遍许多地区，吸引了公众的注意。众议院议员汉密尔顿·菲什（即后来反对罗斯福新政的菲什之父）曾抨击罗斯福甚至不是本区真正的居民。但由于罗斯福采取的这种竞选方式非常有效，结果菲什的指责未起作用。

罗斯福那时还称不上演讲家。他的妻子后来回忆他说话总是慢慢吞吞，有时停顿很长一段时间。每当遇到这种情况，她总担心他再也说不下去了。但罗斯福很快就学会了政治家惯用的把戏。他总不忘记对他所到的地方说一两句恭维话。他很快地学会了使他的论点能迎合听众。他像一个精明的推销员那样，只是在和听众在其他问题上建立了一定的联系后，才接触到他的竞选问题。他已经使用“我的朋友们”这种称呼。有时，他还显示出一些将来他所采用的演讲技巧。对一句话一再强调，例如他说他不知道施洛瑟（罗斯福这时还没有领会根本不提对方姓名的重要性）是代表本地的党魁还是只代表他施洛瑟本人，就说，但是“我确实知道他不代表我，也不代表你们。”然而，一般地说，他的演说认真诚恳，通俗易懂，却不雄辩服人。

实际上，在地方城镇参加竞选时，应做的主要工作就是同人民当面接触，而不是在讲台上发表演说。罗斯福确实和人们进行了谈话——和路上过往的卡车司机、商店里闲逛的人以及摘苹果和打玉米的农民们聊天。罗斯福每天都把许多时间花在路上。许多年后，他的一位同伴说：“我想我和他在一起工作时比我一生中的任何其他时间都更辛苦。”在进行竞选时，他不由自主地迅速露出笑容，赶紧和人握手。他叫一个神色惊奇的房屋油漆工人称呼他富兰克林，而他则把对方叫做汤姆。罗斯福同一些有经验的民主党政治活动家一起出游，他们知道各个地区选民的名字，这使罗斯福获益匪浅。虽然他保持超党派的态度，但他特别依赖那些和他共同竞选的民主党人。这些人认识成百上千的选民。这决不是一人独自就能进行的竞选运动。

罗斯福的对手们一开始就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们小瞧了这位二十八岁的候选人获胜的机率。一家共和党的报纸不相信施洛瑟会受到“很大的竞争。”等到共和党人发现事态的发展，时间已经晚了。不得已，对方的一家报纸大事渲染罗斯福和纽约的一家律师事务所的关系，说“他们替一些正被塔夫脱总统的政府起诉的大托拉斯进行辩护。……”这一行动非常失败，因为这只是提高了罗斯福这位不带布赖恩主义色彩的民主党人在与共和党的斗争中的地位。

罗斯福在海德公园发表了最后一次演讲。在向他的家乡表示热爱以后，他表示希望依照他父亲的榜样，和海德公园的各项事务保持密切的联系。他再度谴责施洛瑟“同一小撮竭尽全力阻碍实现进步和政治廉洁的共和党政客为伍”。他的讲演主题和以前一样——州政府必须要有公正诚实

与厉行节约的作风。

1910年11月的选举日，天气阴冷而且飘雨。关于选举结果的统计工作进展缓慢，但形势很快就变得明朗化了。罗斯福以15,708票对14,568票击败了施洛瑟，赢得1,140票的多数。他在海德公园的比数为406票对258票，在达切斯县所获多数为3850票，在哥伦比亚县所获多数为469票，而在帕特南县却以179票之差而失败。他的胜利部分地反映了全国总的形势。民主党人在美国众议院中赢得了几乎五分之三的席位，竞选纽约州州长获胜并在纽约州参众两院中占有多数。伍德罗·威尔逊在新泽西州获胜。来自全国各地的选票记录表明了过去十年党派斗争的结果：这是一股反对塔夫脱的浪潮，一个倒向民主党的趋势。

而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罗斯福在这股浪潮中只是个无足轻重的人物。但他的胜利不能只用好运使然的说法来作解释。在他的选区中，他比民主党的州长候选人约翰·A·迪克思多获了近700票。当然，迪克思的敌人亨利·L·斯汀生比施洛瑟更难以击败。但是，罗斯福在他的那个选区中的得票一般也都超过了民主党州议员候选人。他所以获得了多数，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持超党派的立场，而这种策略显然有用。在“一般的”选举年，罗斯福似乎也很可能以微弱多数获胜。

但是，这位当选的州参议员大概没有花多少时间进行这种推测。选举获胜，这使他已十分高兴了。他在奥尔巴尼州议会大厦附近租了一幢宽敞、豪华的房子。1910年年底，他和妻子及全家搬到新家。对于一个未满二十九岁的年轻人来说，他有着一个人口不少的大家庭。在第一个孩子安娜之后，两个儿子相继出生。詹姆斯生于1907年12月，埃利奥特生于1910年9月。和以往一样，家中有保姆和仆人等服侍他们。埃莉诺仍然被家中的一些杂务压得喘不过气来：詹姆斯心脏有杂音，要人抱着上台阶；她给埃利奥特雇的奶妈随着罗斯福一家迁来奥尔巴尼，她害怕奶妈自己的孩子将要受委屈，因此感到非常抱歉。丈夫对她的痛苦表示理解，但他主要致力于即将开始的工作。当他开始投身于政治生涯之际，这位当选的州参议员正满怀希望和激情，等待着在新的事业中一显身手。

年轻人和坦慕尼猛兽

有一个故事可能是真实的。1911年1月，“大个子”蒂姆·沙利和另一个坦慕尼头子在奥尔巴尼一家饭店的休息厅里闲坐时，看见一个体形高挑的年轻人健步走过大厅。罗斯福那时身材瘦长，脸庞清秀，戴金边弓形眼镜，身穿燕尾服。有些人看他象是一位神学院学生。另外一些人注意到他

那清朗的容貌，修长的体形，和稍带弯曲的头发。一位记者说，这一切足以“使那些崇拜男电影明星的女士由于微妙和快乐的激情而怦然心动。”但是，在“大个子”蒂姆的眼中，罗斯福那天象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幼稚的大学生”，趾高气扬，神灵活现。

这就是罗斯福吗？“大个子”蒂姆咆哮着说：“你知道这些罗斯福家族吧。这个小子还年轻，不等他长大就把他淹死，不是更可取吗？”

几周后“大个子”蒂姆就必然会想到他早该按他自己对人提出的忠告办事。这位年轻的政治家在竞选中曾经攻击“老板专断”，而来到参议院后，他立刻就抓住一个绝好的机会领导一场反对坦慕尼协会的恶战。

那时，代表纽约州的美国参议院议员不是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而是由州议会和州参议会的联席会议选出。民主党在1910年的选举中取得了对两院的控制。如果他们团结一致，他们是能够提名下一届参议员的。罗斯福初到奥尔巴尼的时候，参议员人选似乎尚未确定，许多候选人正在两院争取支持。一夜间，整个局势发生了变化。坦慕尼头子查尔斯·F·墨菲命令，威廉·F·希恩将作为民主党的候选人。人们称希恩为：“蓝眼睛比利”，他在坦慕尼协会的头子中，即不是最大的坏蛋，但也不是最大的好人。他原来是布法罗的一名政客，曾和当时正在平步青云的格罗弗·克利夫兰进行过激烈的斗争。后来，他在纽约市成为公共运输与公用事业方面的一个大老板，暴富起来，很有势力。现在，他渴望在参议院——“世界上入会限制最严的俱乐部”获得一个席位，使他的一生事业有一个体面的地位。

这件事情的各个方面——希恩早年对克利夫兰的反对，他以后的所作所为，党魁墨菲专断地命令民主党人将采取一致的行动，坦慕尼对各方面的影响——都促使这位年轻的参议员采取行动。并且在此以外，宾夕法尼亚铁路的法律顾问和公众领袖、布鲁克林区的爱德华·谢泼德是一位献身于“诚实政治”的最佳候选人。罗斯福1月1日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毋庸置疑，谢泼德最能胜任这个职位。但是，坦慕尼的一帮人对他间或闹独立性，似乎不能原谅，形势发展到这个地步，希恩似乎是他们看中的人物。但愿事情的结局证明我错了。我肯定地认为民主党正在接受考验。它主要是由于纽约州北部地区的选票而获得了对政府的控制权。决不能轻易把这种权力让给纽约市的组织。”

坦慕尼协会在罗斯福出席的民主党第一次预备会议上显示了它的力量。州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汤姆·格拉德有时没有组织性和酗酒。在预备会

议上，墨菲轻而易举地把格拉德罢免了。罗斯福对这个结果感到满意。他在日记中以高兴的心情写道：格拉德的能力是无可非议的，但是“他的生活习惯和性格却是可以指摘的。”的确，假如坦慕尼不罢免格拉德，罗斯福可能当时在会上就退出民主党。来自曼哈顿东区北部的一位沉着稳重的年轻参议员罗伯特·瓦格纳取代了格拉德。另一个年轻的坦慕尼成员艾尔弗雷德·史密斯在七届任期内表明他是一个聪明、敏捷的议员，这次当上了议会的多数派领袖。政党实行控制，办法是十分简单的。民主党人在每个议院里都占多数，而坦慕尼在民主党人中又占多数。因此，如果一切按照党的惯例进行，少数坦慕尼成员即可操纵整个议会，包括选举美国参议院议员。

1月初，希恩遭到反对的消息越来越多，传到了墨菲的耳中。他的反应完全符合他的性格：如果民主党人不严格遵守党的纪律，他将不拨款资助，也不任命委员会。以布鲁克林区的埃德蒙·R·塔里为首的一小群议员不能接受这种做法。他们决定抵制预备会议，以避免会议决定的约束。他们及共和党人团结起来，就可以阻止坦慕尼取得为使希恩当选所需的必要票数。

关于这一形势，罗斯福听到消息后，立即加入了造反派。1月16日晚，大多数民主党人都出席预备会议，参加对希恩的选举，而罗斯福却和塔里在他们的总部会面。他们二人都焦躁不安。墨菲不断对造反派施加压力，迪克斯州长则拥护这位坦慕尼头子。其余的不同意见者（别人这样称呼他们）陆续到来，事态发展已经很清楚了，民主党预备会议不能获得足够的选票使希恩当选。造反派满怀期望，希望坦慕尼提出停战建议，但他们没有接到任何建议。墨菲只是刚刚展开斗争哩。

墨菲一直在纽约市煤气厂区进行政治活动，从中受到了磨炼他凭拳头和聪明在坦慕尼协会中为自己闯出了一条路，平步青云，一直爬到这个组织的最上层。此人身材魁武，性情忧郁，沉默寡言，喜欢在德尔曼尼科饭店接见他的部下。他对反叛行动，已习以为常，而且懂得怎样处理。他对反叛者采取的行动灵活机动，同时也残酷无情。共和党党魁威廉·巴恩斯以幸灾乐祸的心情关注着民主党队伍中的分裂，墨菲从巴恩斯那里得到一个承诺：共和党人在墨菲没有驯服造反派以前，将坚决地支持他们本党的现任参议员昌西·M·迪普。墨菲联系了反叛者所在各区的州委员会委员，对他们最薄弱的侧翼——下届选举——施加压力。在政府中任职的反叛者遭到解雇，他们的法律事务所受到抵制。此外，还威胁他们要采取其他的

报复行动。最后，更有甚者，坦慕尼放出消息说：对希恩的攻击就如对天主教徒和爱尔兰人的攻击，这个说法是最令人担心的。罗斯福略带夸张地对媒体说，他们对反叛者施加了“各种可以想象得出的压力”。

罗斯福虽然不是这次造反的发起人，但逐渐成为造反派的领袖。在开始的一次会议上，他被非正式地推举为主席，通常都代表造反派说话。他和坦慕尼派进行了外交谈判。他主要是担任会议召集人，而不是一个支配一切的首领。他所以担任主席，部分地因为他的家就在议会附近，同时也因为他是参议员，而别人大多上都是众议员。此外，还因为他坚定果断，性情温和，足智多谋。

随着斗争的深入，反叛者引起了全国的关注。反对“老板专断”的斗争迎得了普遍的同情。进步党党员长期以来就谴责美国的参议院是一个“百万富翁俱乐部”，里面充满了托拉斯的爪子。人们持续不断地严厉批评美国参议院扣压一项修改宪法的动议，内容是要求直接选举参议员。伍德罗·威尔逊刚在特伦顿就任州长，立刻就在新泽西州议会上，反对一项关于指派一个著名的地方党魁担任美国参议员的动议。西奥多·罗斯福 1910 年曾出来参加直接预选，似乎也拥护由民众直接选举国会参议员。这些新的趋势，加上公民创制权和公民投票权，是进步党党员的改革计划的主要组成部分。

全国的报纸都大幅报道这位新的罗斯福反对“老板专断”的斗争。这个年轻的参议员甚至更感得意的是，他收到了他的选民们寄来的几百封信。大多数人都鼓励他“坚持立场”，只有少数一些信是带有恶意的。有人威胁说：“你知道他们是怎样对待你的特德叔叔的。”但他从本区收到的信多数都对反叛者表示支持。

斗争开始不久，希恩曾当面警告罗斯福，他将到反叛者的选民中间去，“揭露他们的品行”。这位坦慕尼政客把他的威胁付诸实践，但他对达切斯县的入侵遭到了明显的挫败。波基普西区的那些忠实的民主党领袖企图和党内这个有势力的坦慕尼分子保持友好关系。他们宴请希恩，并且为一份号召书征集了二百六十五个人的签名，要求罗斯福赞同预备会议的决定。这份呼吁书并没有使罗斯福感到不安。忠于领导的民主党人越是激烈地反对他，他也就越发得到无党派人士和共和党人的支持。

1 月 30 日，墨菲亲自出面，争取罗斯福。反叛者有可能更改立场吗？罗斯福的答复道：“墨菲先生，绝不可能。”反叛者坚持他们的战略立场。他们决不屈服。

向报界发表声明，在平等的基础上和墨菲谈判，在家乡选民的注视下摆出英勇战斗的姿态——这一切对于二十九岁的罗斯福来说，都是使他感到新奇的事。但斗争还未结束，他就感到烦了。

首先，这一斗争变得漫漫无止境。时光一周又一周地过去，但僵局仍未突破。议员们每年仅有一千五百美元的收入，通常在一年的头三四个月每周只在奥尔巴尼呆一两天。这次议会延长开会时间，使他们留下未走，对他们来说，这既开销太大，又诸多不便。他们自然就会责怪反叛者。对这一小群反叛者施加的压力越来越大。罗斯福和塔里想使他们的队伍保持团结，却遇到了困难。更有甚者，随着时间的推移，斗争愈加复杂化。由于希恩获胜的机会日益渺茫，更多的候选人——至少有二十人——加入了竞选者的队伍。每个新的候选人都采用不同的施加压力和表示效忠的方式。反叛者就是在这种环境中开展斗争的。

至少对于罗斯福来说，更加重要的是，斗争的道义氛围有所变化。要把斗争提到崇高的道德标准，要站在正义一边反对邪恶，这并不难。但问题并不这么简单？坦慕尼协会并不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邪恶组织。罗斯福不能不尊敬诸如瓦格纳和史密斯等诚实正直人士。他发现，那个核心小集团并不真正是个整体，而是一些抱有互想交叉的忠诚和动机的人所杀合的一个集合体。在坦慕尼势力最强大的一些选区，甚至发生了反抗墨菲的行动。最令人惊讶的是，墨菲本人并不死抱着希恩不动摇；僵局持续下去，希恩获胜的可能性愈来愈小。这时，墨菲暗地里开始为他的助手和女婿旦·卡哈兰争取选票。首领巴恩斯和他亲信的那些共和党人玩了一个狡滑的手段，有一段时间和坦慕尼谈判，但后来又和反叛者谈判。这个斗争已经不再是在黑白分明的两股敌对势力之间进行的战斗，它看起来象是托尔斯泰所描写的战争中人与人之间、集团与集团之间的一场混战。

反叛者这一边也采取了一些古怪的指施。罗斯福由于同巴恩斯的谈判未能取得战果，试图通过克利夫兰一些著名的、持保守观点的民主党人——其中最著名的是 J·P·摩根的律师弗朗西斯·林德·斯特森——同有影响的共和党人建立一种两党关系。罗斯福希望争取共和党人的赞成，以便使一个持保守观点和主张诚实政治的民主党人当选参议员。但斯特森集团中许多人显然要求交换条件——他们要求达成一种妥协，即反坦慕尼协会的民主党人将继续作为一个反进步党的集团保证反对比如当时悬而未决的所得税修正案等法案。当提名塞缪尔·昂特迈耶看来有可能成为一个妥协的方案时，斯特森集团，由于对昂特迈耶的反托拉斯和反摩根的活动记忆

犹新，帮助破坏了他当选的可能性。墨菲没有放过这个机会。他抨击反叛者，说他们只不过是反动的斯特森集团的好出风头人物。

到了3月下旬，这场斗争已经成为激烈的精神战。罗斯福和塔里对他们的小团体已失去控制。罗斯福后来说：“我们有好几次几乎惨遭失败。”坦慕尼仍然担心在共和党人和反叛者之间可能达成一致，因而坐立不安。就在这时，墨菲采取了一个精心预谋的行动。他提议推举法官维克托·道林为拆衷的候选人。罗斯福和他的伙伴们知道反叛者力量薄弱，无法支配民主党人，就同意了这个方案。出人意料的是，第二天，就在反叛者即将前往参加他们曾拒绝参加很久的预备会议时，他们才知道林拒绝接受提名；墨菲换上了坦慕尼协会前总干事、法官詹姆斯·A·奥戈尔曼。

反叛者能立刻接受奥戈尔曼吗？他们实际上没有力量不同意？奥戈尔曼虽然同坦慕尼关系不错，但他也曾对协会的核心人物闹过独立性。况且，他曾任圣帕特里克互助会主席，深受爱尔兰人的爱戴。反叛者中有些人以前也表示，他们将接受奥戈尔曼。其中两人立即前去参加预备会议，投票赞成奥戈尔曼。其余的人发生了严重的分裂。当天下午，他们争论了好几个小时。最后，除了罗斯福和其他少数几个人仍持反对态度以外，大多数人在史密斯和瓦格纳保证不采取报复行动后都决定赞成奥戈尔曼。罗斯福的小集团已经四分五裂了。

结局很不光彩。当反叛者列队进入议会参加最后投票时，迎接他们的是一片倒喝采、叫骂声和呵斥声。罗斯福争辩地说，他们尽了自己认为应尽的义务。“我们是民主党人——不是不忠分子而是忠实分子”。舆论界认为反叛者在战略上已遭击败。罗斯福则坚持说反叛者赢得了胜利。但他在写给他的选民们的信中却流露他已处于守势的心情。关于反叛者将来采取的方针，他的态度异常小心。他在给一个朋友的信中写道：“我认为，要想把以前所有的反叛者都重新组织起来，将是一个错误。但是，我们还有十到十二个人，可以组成一个相当团结的核心去开展工作。”

罗斯福可以列举这场斗争带来的一些成绩。他已经引起全国的注意；他加强了自己在本选区的地位；进步党人即便忘却了他最后失败的结局，但很久以后可能仍会记得他对坦慕尼进行的这场长期的斗争。从长远的观点看，也许更重要的是，这位年轻的政治家在如何应对压力和阴谋诡计方面接受了一次深刻的教育。

但是，他也遭受了挫折。在斗争中途，萨姆纳·杰拉尔德曾力劝他采取忍耐态度。他说：“如果他毫无必要地做得太过分，那就有危险使他将

来的政治战斗力遭受完全不必要的损害。”罗斯福懂得杰拉尔德所谓的他“将来的政治战斗力”是什么意思。坦慕尼一旦被激怒，则将破坏这位参议员可能怀有的任何涉及全州的野心。但罗斯福决不想让步。一名选民警告他，老虎对此事不会忘记。罗斯福却说，正确的事情就是正确的，不管它刺痛了谁。

他不愿就此放弃。在希恩事件过去了几个月以后，他在布法罗的一次聚会上对听众说，必须打垮黑菲“及其一伙”，“吃人的野兽开始走向末日了”。坦慕尼激烈地进行反击。墨菲的一名助手说：这是“一个政治扒手的愚蠢的自我吹嘘。”党不应容忍这些花花公子、小青年和侥幸的政治暴发户。“他们看起来近似政治领袖，就好象青豌豆看起来近似马戏团的帐篷一样。”这个坦慕尼分子把罗斯福所受的教育和经历同他自己的领导地位相比较。他说他的领导地位依赖的是“人类的同情心、人类的理想以及与我一起出生和成长的人们彼此间的友情。……”

那些品德高尚而有教养的人和那些粗俗而有人情味的头目之间的战争还要长期持续下去。但是，关于希恩问题所引起的斗争，罗斯福在多年以后担任总统时对弗朗西斯·帕金斯说出了也许是最后的结论。他说：“你知道，在我最初步入政界时，我是一个非常平庸的人。”

农民—劳工代表

反对希恩的斗争结束后，参议院便专心致志于立法工作。参议员罗斯福参与这些活动。多年以后，弗朗西斯·帕金斯回忆起他在参议院里的情景：“……非常活跃而机灵，在议会大厅里四处活动，从各委员会的房间里走来走去，很少和议员们说话（他们多少有些想避开他），并没什么魅力（后来他才变得比较吸引人了）。他脸上装得正二八经的，很少露出笑容，还有把头抬得很高的那个令人讨厌的习惯——这已成为习惯，连他自己都毫不知觉。”罗斯福在州参议院的两年期间，似乎总是看不起人的样子。但他一直在学习怎样运用议会政治手段，而且进步非快。

罗斯福早期在议会的活动并不是只有一种行事方式。大部分时间，他都和坦慕尼协会进行着接连不断的斗争。有时，他也会对地方党的领袖们的某项值得怀疑的方案表示赞同。他大声疾呼地宣传和维护关于实现廉洁的政府的主张。但是，他却运用任免权在许多次要的空缺上安插了私人，这些任命都是他小心地和他的选区的民主党领导人经过磋商并征得同意的。他私下曾说过，“如果党要建立组织”，用这种方法任命人员“就非常必要”。他特别注意他的选民的利益。但有一次，他提出动议，请求从年

度拨款法案中删去一个为他的选区修桥的条款。他坚持保护当地农业的利益，但是，1912年10月纽约州劳联说，罗斯福在他们议案上的记录是“极好的”。作为州参议员，罗斯福的记录是由反叛行动、正统观点、考验与错误这些内容组成的。

当出现“道德”问题时，他仍然能够满怀斗志，精神抖擞地向对手冲锋陷阵。这使他的选民们感到满意。虽然他自己偶尔也进行一些赌注不大的赌博，但他却反对将赛马赌博合法化。他批评职业拳击和星期日棒球。他为“七天中应有一个休息日”的法案竭尽全力，由此从他选区的牧师那里受到了许多赞扬。他用纽约州的政治家们多年使用的手法绕开“禁酒令”：宣布支持“当地人民有选择权”，即允许当地的选民投票决定他们这个区是否施行禁酒令。他支持全国实行统一的离婚法，得到了议会一致的赞同，甚至得到了全国基督教促进纯洁联盟的拥戴。

在最开始几个月，参议员罗斯福的进步主义的含义是政治性的，而不是经济性的或社会性的。他提出建议，规劝纽约州的议员为实现直接选举美国参议员而奋斗。这个提案得到普遍的支持，因而获得通过，成为决议。他支持市政机构实行地方自治。而且，经过一段时间的考虑，他宣布支持妇女选举权。关于提名候选人的直接预选是他全国以赴为之奋斗的一个目标。直接预选议案于1910年得到两党认可，虽然曾经由前几届议会进行讨论但没有得到通过。这个问题在“希恩事件”后不久又在议会中被提了出来，因而又引起了一场激烈的争吵。虽然在希恩问题上，罗斯福毫不妥协，但这一次却比较愿意和头目们就此事进行谈判。但在反叛者中有些人持反对态度。1911年7月，他竭尽全力地支持通过一项强有力的预选法案；两个月后，他又投票支持一项软弱无力的预选法案，其中有许多规定都是对坦慕尼作出的妥协。第二年，在帮助发动选民的积极性后，他和一个由两党的进步主义分子组成的群体一起工作，力图推进一些改革，使党组织在预选中的影响有所削弱。但他遭到忠于党魁的分子的反反对，没有取得多大进展。

劳工立法——进步主义阴暗和肮脏的一面——却是另一回事了。罗斯福刚到奥尔巴尼时，对劳工问题的立场（如果说他有什么立场的话）是家长式的乐善好施观点。他赞成援助进入纽约市的外国海员；他主张给予家境贫困的孩子们以更卫生的牛奶。他坚决反对制定法律使工会的抵制活动取得合法地位；在关于赔偿工人所受损失和采取措施禁止十六岁和二十一岁的男青年每周工作超过五十四小时这两个问题上，他的立场模糊不清。

但在以后的两年中，他的态度发生了迅速的变化。他不但支持五十四小时提案，而且就这一提案进行辩论时，他占住参议院的讲台就鸟的问题大发议论，直到能把“大个子”蒂姆·沙利文从床上拖起来投了他那关键性的一票才结束了讲话。他不顾一些选民的反对，宣布赞成制定使工人获得补偿的法律。到了1913年2月，他表示愿意在一次关于立法的意见听证会上发言，赞同由工厂调查委员会起草的全部三十二项提案。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变化呢？这并不是由于罗斯福的基本社会观点发生了变化，因为他还没有形成自己的政治哲学。可以肯定的是，部分原因是由于他受了堂兄西奥多的影响。他的这位堂兄在1912年年中公开支持如下一些措施：给予工人以补偿，限制劳资争议的命令，为妇女儿童制定社会福利法规。同时，罗斯福在态度上的变化和当时的政治气氛也有一定关系：在1912年的选举中，美国发展的趋势是进步的辩论和行动正逐渐达到高潮。这种变化还由于罗斯福认识到，他的那些坦慕尼同僚们，尽管有各种短处，但就社会正义而言，其关心的程度并不逊于他本人。而最重要的原因是，参议院进行的调查，所作的报告和展开的辩论给了他一次生动的、严厉的教育，使他看到了“另一半人民”的生活状况。

参议院的全部经历对罗斯福来说的确是一次政治教育。他向史密斯和瓦格纳这些奥尔巴尼的政界老手，向媒体，向院外活动集团的说客，向州政府的官员们学习，而且进步很快。他掌握了耍政治手段的技巧：比如怎样避免在有争议的问题上表态以免卷入毁灭性的地方纠纷；怎样和本地的党魁们打交道；怎样处理人员任免权而不树敌过多；怎样引起公众的瞩目；怎样答复对你缠扰不休的信件等。特别是，他获得了民主的政治家们必须获得的教训：政治斗争不是在两个对立的政党之间、正确与错误之间、忠实于党魁的党员和不忠实于党魁的党员之间进行的单纯的和双边的斗争，而正象希恩事件一样，它是牵涉到许多方面和触及许多人的利益的一场多边斗争。比如，一项简单的农业提案不仅牵涉到个体农民，而且涉及到县的农业团体、罐头食品厂、大学教授、商人、铁路和政府官员。在这些集团之间，甚至在它们的内部，都可能在政策问题上产生分歧。

当然，受教育要付出代价。坦慕尼如果想要彻底击败这个年轻的参议员，他们仍有实力做到这一点。罗斯福在1911年末，在改革派的支持下，抨击由坦慕尼赞助的授予纽约市的一项特许状。参议院内的阵线分明。罗斯福有否决这个提案的能力。但是，坦慕尼从侧面包围了罗斯福：威胁说它要重新划分议员选区，把达切斯县划入共和党人占绝对优势的地区。罗

斯福在威胁之下动摇了。他表示支持这项提案。但是，由于进步人士的抗议愈来愈强烈，他又反对提案。罗斯福发生动摇也不仅限于这一次，例如在他试图权衡自己的政治野心的反常的和相互矛盾的因素时，在权衡正确处世的各种不同的原则时，在权衡两党的州领袖之间的复杂关系时，在权衡他的选民的福利时，在权衡区、州乃至全国的各式各样的公众舆论时，也还有常常出现这种情况。

有人认为，沿着政治阶梯爬上总统的宝座，主要是靠运气；在一场不可预测的竞选中获胜的人只不过是鸿运当前罢了。这种理论完全适用于罗斯福：他的财富、名声、家族关系和外表都是外在赋予的；而且他有幸在两个民主党获胜的年头参加竞选。但他也有不走运的时候。1912年，在重新竞选州参议员的活动达到高潮时，他身患伤寒，无法把竞选进行到底。

就在这个紧急关头，他邀请路易斯·麦克亨利·豪为他竞选。豪是纽约《先驱报》驻奥尔巴尼的记者，也是在州议会周围活动的一个不起眼的政治掮客。其人身材矮小，象只雪貂，不修边幅，看起来象一个刚从卡茨基尔洞穴里钻出来的侏儒。1912年他正失业，因此，对于一个他认为在政治上可能有灿烂前程的人，他乐于为之效劳。埃莉诺·罗斯福一开始就不喜欢这个小个子，好多年来也没改变。但是，她的丈夫却认为这个人可以发挥许多作用。罗斯福患病卧床期间，时常对选举结果失去信心。但是，豪却以他那特殊的才干、丰富的想象力和狡猾的手段，将预选运动进行下去。他拥有大量的金钱，便用罗斯福的名义向全区的农民发了几千封“亲启”信。他在报纸上刊登大幅广告，鼓吹罗斯福为了他的选民的利益曾提议过的——或将要提议的——一切具体措施，其中包括把赫德森河沿岸捕鲱鱼的渔民们的捕鱼牌照税降低，并制定法律使种苹果的农民使用标准化的水果桶。他出面处理那些忠实的民主党人的各种各样的抱怒，如批评罗斯福处理任免权的做法以及对坦慕尼的态度。

豪使用的一些手法是他独树一帜的。比如，他批评罗斯福的对手，一个名叫雅各布·索瑟德的银行家兼一家公用事业公司的董事长，说索瑟德在竞选活动中没有访问哥伦比亚县；他大方地把五万元一张的支票发放给几十名竞选工作人员；他用狡诈的手段在共和党人内部进行挑拨离间。但是，他的策略主要还是他的首脑两年前使用过的手段：宣传罗斯福的农业进步主义思想、他的两党关系的立场、他的反对“老板专断”的主张以及他对他的选民们的具体需求的关注。

这种策略又一次奏效了。罗斯福获得了 15,590 票，而索瑟德则获得

了 13,889 票，公廩的候选人乔治·沃斯勒只得到了 2,628 票。他在他的选区所得票数比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和州长候选人多 800 票。沃斯勒在这个选区比西奥多·罗斯福少得 1,400 票。毫无疑问，这位年轻的参议员的票数比他全部对手的票数总和只少一千票左右。但如果是一场纯粹的政党之间的斗争的话，沃斯勒的选民至少有二分之一要改投富兰克林·罗斯福的票。一位细心的观察家估计，每个选区平均有八个民主党人背叛了罗斯福，但有三十个共和党人转而支持了他。

致果农们！

在进行了仔细的调查以后，我坚信把 17. 1 - 8 英寸的桶作为法定标准桶的现行法律，对果农们来说，是不公平的，也是让人难以忍受的。

我发誓，我将提议并努力争取通过一项修正案，规定标准水果桶为 16. 1 - 2 英寸。

这种桶应作为法定标准桶，并应印上“标准水果桶”字样。

显而易见，这个修正案是公正的，因此，我肯定认为它将获得通过。

我愿对哥伦比亚县民主党的议员候选人亚历山大·胡佛先生致谢。他本人也是一位有经验的果农。我感谢他非常明确地和令人信服地向我提供了有关的数据和实情，使我确信这项法律必须加以修改。

胡佛先生掌握了具体了解的情况，而我在议会工作的两年期间，在克服委员会成员们的说客为了阻得这项提案而在议会中设置的障碍方面，也积累了经验。具备了这两个条件，我保证这个错误会得到纠正。

富兰克林·德·罗斯福

州参议员候选人

如果富兰克林·罗斯福说他要为某个目标而奋斗，那就意味着他不达目的决不罢休。这一点大家都很清楚。

1913 年 1 月，新选出的参议院召开会议，罗斯福在会议上象以往一样充满活力地参加工作。民主党人在 1912 年竞选时获得大胜。他们在两院中都获得多数，并在州长竞选中也胜出。罗斯福此时已担任农业委员会的主席。他采取的第一个步骤就是履行他在竞选时许下的诺言：他曾答应缩小纽约市的代销商收购农民的农产品的价格与农产品的销售价格之间发生的巨大差距问题。罗斯福立即提议采取一项措施，它通过发给许可证，进行检查和公布情况等办法来支配推销商。豪这时已成为罗斯福的院外说客，为了使这项提案顺利通过，他正在对格兰奇在各州的组织进行游说。

与此同时，罗斯福在议会大厦召开意见听取会。他在利益集团政治活动方面接受了一次深刻的教育：出现在奥尔巴尼的推销商有二百五十名，但实际上没有农民。罗斯福对他的提案采取强硬的立场，但对推销商们也愿作出若干妥协。

罗斯福还提出了其他几项由他和格兰奇以及农业问题专家共同起草的提案。这些法案将使州政府对于进行销售或收购的农民合作协会提供赞助；允许农业信贷银行为改善农业生产发放贷款；也将使州对县的农业局提供支持。在自然保护工作方面，这位参议员也持进步的立场。他支持休斯和共和党内的进步主义分子为开发本州的水利资源所做的努力。他也为扩大州政府对造林事业的管理权努力，但由于遭到伐木业的强烈反对，他的努力没得到成功。

参议员罗斯福在有关农业和自然保护的提案方面取得的巨大胜利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与他在劳工立法问题的立场放在一起审视，这些提案提出了一个尖刻的问题：罗斯福在开始实行他的“新政”二十年以前，是否就已经在农业问题和劳工问题上实质上向新政的措施过渡了呢？在具体方面，他确实如此。但是，这种过渡并不是因为一种新的政治哲学的形成，而是为了解决他认为需要采取具体行动才能解决的一些具体问题。埃莉诺·罗斯福后来评价时，那时，他也许还不可能把他的政治哲学发展到完善的地步。他对“政治科学”的兴趣远远大于他对政治哲学的兴趣。他所说的“政治科学”，其内容就是“如何了解人们，如何影响人们”。

等到这些农业提案交付议会表决时，罗斯福已不在州参议院了。更广阔的政治前景已经向他发出了召唤。

第三章 华盛顿：官僚政治家

州参议员罗斯福在奥尔巴尼度过的那些日子里，政治事件层出不穷。1912年初，当西奥多·罗斯福正逐渐向左转的时候，他开始了争取被提名为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的紧张活动。虽然塔夫脱说：他并不想展开斗争，但是“困兽犹斗。”虽然西奥多在大多数的总统预选中获胜，但是因为塔夫脱有权控制在职的代表和党的机构，所以在1912年6月下旬获得共和党的提名。那位义勇骑兵团骑士拒绝给予支持，因此，一位民主党人当选总统的机会便大大增加了。

谁将是这位民主党人呢？富兰克林·德·罗斯福已经作出了抉择。他在

1911年就曾以欣赏的眼光注意到新泽西州的新任州长伍德罗·威尔逊同该党将他引入政界的核心小集团决裂，排挤他的头目吉姆·史密斯，使他失去当选美国参议员的机会，并且领导了该州的进步势力为制定公用事业的法规、规定对工人的赔偿、通过反行贿受贿法案与预选和选举立法以及实行市政改革等而进行战斗，终于获得了成功。威尔逊和罗斯福是同一类型的民主党人——政治记录清白，举止文雅，思想进步却又不过激。1911年早些时候，罗斯福去新泽西拜访这位州长，向他表示拥戴。

威尔逊身材瘦小，面庞清癯，鼻架眼镜，神态庄严，露出一副学者的风度。总是使人对他肃然起敬，但他的态度却又不显得书生气十足。经过一番礼节性问候之后，他直截了当地进入了正题。在出席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的纽约州代表中，有多少人会支持他？罗斯福回答说九十名代表中约有三十名支持他，但是墨菲将控制大部分的代表。并且，根据单位投票法（依据这种方法，代表团将按本团的多数意见，投票选举候选人），这九十个人将全都是反对威尔逊的。

尽管形势不利，罗斯福还是非常积极地支持这位新泽西州的进步主义分子。他回到纽约后，准备和州内其他支持威尔逊的民主党人合作。他希望在纽约能够激起对威尔逊的支持，以削弱墨菲对出席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团的控制。罗斯福又一次和强大的坦慕尼集团直接冲突。他邀请了二十几名纽约州北部的民主党人出席为支持威尔逊而设立的晚宴，但只有三人接受了邀请。在民主党代表大会上，墨菲提出的九十名代表名单轻而易举地获得了通过。罗斯福甚至连候补代表也没当上。他和他的朋友们组织了纽约州威尔逊讨论会，组织了一些威尔逊俱乐部，而且雇用了豪进行宣传，但这一切最多不过是一种姿态。墨菲手中掌握着代表大会的九十张选票，稳坐钓鱼台。

1912年6月下旬，民主党人纷纷涌往巴尔的摩，提名“下一届总统”。气氛十分紧张，战线混乱而且变幻莫测。罗斯福以充沛的精力来补偿他在权力和影响方面的不足。他和别人一起在代表大会会址附近设立了威尔逊讨论会总部，向代表们连续不断地提出各种支持威尔逊的理由，而且在发表了为威尔逊争取提名的演说后，组织了纽约州北部的威尔逊支持者举行一次示威游行。此时，墨菲的代表们正面色漠然地坐在他们的席位上。然而，罗斯福却远离权力的中心——在那些烟雾腾腾的房间里，钱普·克拉克的人和威尔逊的人正在为选票进行着你死我活的争夺。当墨菲突然把纽约州的票投给克拉克，使罗斯福陷于绝地时，威廉·詹宁斯·布赖恩转向威

尔逊，因而扭转了逆境。永无休止的投票日复一日地进行着。威尔逊逐渐地积累了力量；在第四十六次投票中，他获胜了。

罗斯福给他在坎波贝洛的妻子发了一封电报告诉她威尔逊中午获得提名。他的各项计划尚不明确。胜利辉煌。他的计划不久就明确了。他自己的地位突然发生了变化。他在纽约州是从一开始就支持威尔逊的人，而这个州的代表团始终支持克拉克。他肯定，威尔逊在反对派已分崩离析的情况下，将会在纽约州获胜。坦慕尼已处于绝境。它的领导人可能不会给威尔逊以积极的支持，但他们也绝不敢对他施展阴谋。罗斯福认为，时机看来已经成熟，可以对坦慕尼在纽约州的势力给以狠狠的打击了。他和朋友们迅速地组织了“纽约州民主党”，由亲威尔逊的进步主义分子组成，这个组织实际上构成了民主党内的一个党。

他们的策略给人以深刻的印象，至少在纸上是这样。罗斯福7月下旬在一次组织集会上对二百名民主党人说：这是采取行动、进行打击的一年，而且他们已经有了棍棒。但愿他们不需要用它。……这个棍棒是什么呢？这个棍棒就是威胁要提出一个全然不同的州候选人名单，由此来打乱墨菲的计划；墨菲打算用一个由平庸的坦慕尼人士组成的候选人名单轻而易举地击败西奥多·罗斯福和塔夫脱的候选人而取得竞选州长的胜利。肯定地说，富兰克林搞的是一种狗占马槽的作法，纽约州民主党提出的候选人名单也不可能获得通过。但是，据猜测，这一威胁可以迫使墨菲接受一位“好的”民主党人。

但是由于运气不佳，处理不当，再加上墨菲计谋多端，都使他们的计划归于失败。反墨菲的运动受到了一些敌对的小派别组织的勒索，纽约州民主党的经费在关键时刻却没有了，而罗斯福正面临在他的区赢得再度提名和再度当选州参议员的时刻。9月，他退出了濒于垮台的纽约州民主党。威尔逊要求墨菲同意召开一次不受地方党魁控制的州代表大会，罗斯福对此感到兴奋；但这位坦慕尼的领袖表示完全支持，这却又使罗斯福感到困惑。墨菲说，代表大会肯定不会受党魁们的操纵。为了进行表白，他当即放弃他提名的候选人、平庸的迪克斯州长，这就为别的提名大开方便之门。反墨菲的各派又惊又喜，因而放松了警惕，墨菲玩了一些手段，促使大会选中了一个他认为可以与之共事的人，坦慕尼总部的威廉（“平凡的比尔”）苏尔泽。反叛者们没有其他出路，只好表示赞同。

到了这时，罗斯福正为自己再度当选参议员而奋斗。正当他卧病在床、豪在选区内到处奔忙的时刻，全国的竞选运动大张旗鼓地展开，达到

了激烈和骚动的高潮。伍德罗·威尔逊宣称：“他在战斗。但不是为了已经取得成功的人战斗，而是为将要取得成功的人——正在努力敲开那扇紧闭的机会之门的人——战斗。”西奥多·罗斯福大声疾呼：“我们主张自由，但我们主张的是给被压迫者以自由。……”一个反对第三届任期的过激分子在西奥多将要离家外出发表演说时开枪击中他的胸部。他向全国又展示了过去的特德·罗斯福的那种英勇精神。他说：“他拚死也要发表这次讲演”，而他确实发表了这次讲演。塔夫脱和社会党候选人尤金·德布斯在这两个主要竞选人物到处搜寻选票。11月5日星期二，选民们做了裁决：威尔逊6,293,019票，罗斯福4,199,507票，塔夫脱3,484,956票，德布斯901,873票。

威尔逊政府完全有理由给参议员罗斯福封官进爵。1月间，他应约和总统会面商讨任免权问题。在这次会面时，罗斯福可能已向总统表达想去华盛顿的愿望。在威尔逊宣誓就职前不久，即将出任财政部长的威廉·吉布斯·麦卡杜曾试探这位年轻的州参议员是否有意在他的部门任职。但罗斯福却另有打算。在总统就职日那天早晨，他偶然碰到新任海军部长约瑟夫·丹尼尔斯。这位编辑出身的北卡罗来纳州的政治家喜欢罗斯福的进步主义倾向、跟坦慕尼作对的声誉以及他那奔放的热情；而且，由于罗斯福和丹尼尔斯来自不同的地区，因此可以使海军部取得地理上的平衡。罗斯福祝贺他被任命为海军部长。丹尼尔斯问道：“你到华盛顿来担任海军部助理部长，怎么样？”

罗斯福满面笑容。“问我是否愿意？我太愿意啦。这比什么都让我高兴。”丹尼尔斯是一位办理国会手续的老手，他和参议员奥戈尔曼一起处理了任命问题。这位参议员表示同意，但却没什么热情。为了表示礼貌起见，丹尼尔斯还征求了来自纽约州的共和党参议员伊来休·鲁特的意见。

鲁特脸上露出一种惊诧的表情。他问道：“你了解罗斯福家族的人不是吗？只要罗斯福家族的人骑马，他总想跑在前面。”

海军助理部长

这位新任海军军部助理部长从一开始就试图走在前面。在他就职两天以后，当丹尼尔斯离开华盛顿时，他半开玩笑地对记者们说：“今天有一位罗斯福在职。你们还记得上次有一位罗斯福担任同样的职务时发生了什么事情吗？”他无缘无故地提醒人们美西战争爆发前两个月西奥多·罗斯福给杜威的那几道挑起战争的命令。在以后的七年半的时间里，富兰克林·罗斯福常常和上司意见分歧，而且很少努力掩饰他的反感。令人奇怪的

是，丹尼尔斯心甘情愿地容忍这个不懂事的年轻人。甚至更加令人吃惊的是，罗斯福很快就明白了他的工作在政治上的重要性。

按照传统，助理部长的职责是管理性的工作。即使在 1913 年，这份差事也很繁重，那时，联邦政府的大部分机构规模很小，而且工作效率比较低；近二十年以前，范德比尔特家族的人用于农业和林业的经费比美国政府花在这方面的钱还要多。然而，美国海军的任务既繁重庞杂，范围又很广泛。它在几十个造船厂和海军部门里聘用文职人员，并支撑一支相当庞大的舰队。罗斯福是海军部的唯一的助理部长。他负责管理文职人员，处理海军军官和文职官员之间的麻烦的关系问题，还要协助编制海军的预算。但是，他的兴趣很广泛。他过去一直说：他插手每一件工作。法律并不禁止他这样做。

据说，官僚政治并非英雄用武之地。它可以用一大堆规定、惯例和手续，用上级的权势和下属的服从所形成的无穷无尽的层层约束，来使一个人受到压抑而变得毫无生气。它本来可能使对管理一个庞大的机构毫无经验的罗斯福感到压抑，但官僚政治却没有能压抑他。他始终没有从他的工作中获得象他的“特德叔叔”所获得的那种戏剧性的效果。但是，从最初——只有一个例外——他就显示了他做政治管理工作的才能。这种能力在以后的岁月里对他颇有助益。

这个例外涉及他的上司。对于约瑟夫斯·丹尼尔斯这个人，这位来自达切斯县名门望族的年轻人用了许多年的时间才有所了解。丹尼尔斯在南北战争时期出生于北卡罗来纳州。他在那些同烟草和铁路利益集团进行斗争的农民和政治家中间成长。他一生大半时间都担任一家小城市报纸的编辑，是一个布赖恩主义分子、和平主义者、禁酒论者和农业改革的激进派。他那细长的黑领结、朴实的面孔和农民式的礼貌举止，使人根本看不出他是一个精通政治艺术和政治家手腕的人。

丹尼尔斯是罗斯福在漫长政治生涯中碰到的唯一的一位行政上司。罗斯福对这位长者待人接物的方式感到不耐烦；他认为丹尼尔斯是他有生以来所遇到的“最滑稽可笑的乡下佬”，在社交界的朋友们面前模仿这位部长的言行来取乐，而且为他写了一些极不得体的备忘录。只是由于丹尼尔斯的大度宽容和他对罗斯福的喜爱——如这位长者所说的“一见钟情”——才把这位助理部长保留了下来。此外，丹尼尔斯承担了作为任何一个部的首脑都必须面临的主要任务——和国会保持良好的关系。罗斯福就一大堆次要的问题同参议员和众议员们打交道。但是，丹尼尔斯要和国

会山那些给海军拨款重要人物进行谈判，这都是缓慢而艰难的工作。

海军的将领们对罗斯福的印象都不错；但他们却瞧不起部长——那位特别拘谨的卫理公会教徒。他们都觉得，威尔逊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任命他来做上司。这位年轻的助理部长热爱航海，说的是航海行话，以平等的态度待他们，而他的妻子也对他们的妻子友好相待。年轻的罗斯福对海军鸣礼炮十七响向他致敬表示满意，而且自己还特别设计了一面助理部长旗，要求在他在舰上悬挂。对于这些情形，这些将领们可能暗地里发笑。但他们也钦佩他的领航才能，他能够指挥高速驱逐舰通过坎波贝格岛和大陆之间狭窄的海峡。

不过，罗斯福和海军将领们之间的业务联系已超过了个性相近的范围。他一直就主张建设“强大的海军”的人。一位朋友在罗斯福就职后不久写信对他说：“我希望，你‘穿上军装’以后，不会象海军大臣温斯顿·丘吉尔爵士那样，被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的热情冲昏了头脑，有许多海军部长为这件事垮台。”但是，罗斯福立即表示他支持建设一支“强大而有作战能力的海军”。丹尼尔斯本人赞成扩大海军，可是，罗斯福在此事上的热情却超过了他的上司。

关于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的主张，最强大的有组织的压力来自美国海军同盟。美国海军同盟主要是由金融界、航海界和钢铁界的大企业家控制的。罗斯福就职不久，就向美国海军同盟的全国大会发表“关于建立强大的海军”的演说。他说：“这不是一个战争与和平的问题。我相信在海军内部主张仲裁与国际和平的人同其他的行业中一样多。但是，我们正面临的事实是——我们的国家过去曾经决定要建立一支舰队，而且战争仍然可能发生。”这篇演说的内容并未超越威尔逊的思想体系。但是，罗斯福在幕后却对美国海军同盟暗送秋波，这和国务卿布赖恩乃至丹尼尔斯本人所奉行的和平主义形成鲜明的对比。例如，为讨论美国海军同盟全国大会的计划而召开一次的全体会议是在罗斯福的办公室举行的，而且同盟请他主持会议。

罗斯福必须对付组织起来的劳工，这是最大的而且可能是最不容易对付的一个集团。同各造船厂和补给站的几千名民工接触经常会引起各种纠纷和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许多工人都被吸收到美国劳联的各行业工会中去。劳联这个组织对于威尔逊政府以及罗斯福可能怀有的任何政治野心都至关重要。同时，选民们要求海军节省支出，海军将领们要求劳工们遵守纪律，部里的工程师要求各造船厂提高工作效率，而国会议员们则又要求

海军在雇用他们选区的选民时给予一定的优惠政策。

罗斯福以惊人的方式绕过了这些可怕的暗礁。最突出的事例是他处理因“科学的管理”而引发的纠纷。泰勒的“秒表”制，即给工作定时、使工作标准化并为工作排定次序的生产方法，受到了管理部门的欢迎，他们认为这种制度是提高生产效率的途径。然而，工会则认为这种方法加强了对工人的剥削，结果会导致减少工资和停工。罗斯福急于创造工效的最高纪录，因此对实行泰勒的“秒表”制的可能性感到很大兴趣。但他很快就意识到工人的反对态度。最后他没有推行“秒表”制。他说，一方面必须树立权威和执行纪律；但另一方面国会调查委员会的调查结果也给留下深刻的印象。调查报告指出：“不论是泰勒的‘秒表’制，还是其他任何方式，都不应该自上而下地强加给对其抱抵触情绪的劳工队伍。”

罗斯福作出的一些行政决定本质上就是妥协。这些妥协从狭隘的管理观点来看是有缺点的。但是，他在这些年受到的最深刻的教育就是，官僚、工人和水手全都是人，因此他们便有人所共有的问题和弱点。他认识到人们既需要得到承认，也需要提升和增加工资。例如，他想尽办法使劳工代表被派到工资委员会任职。他对一批机械工人说：“我希望你们都知道，你们随时都可以到我的办公室来，一同商量问题。”他的劳工政策表现良好，在他卸任助理部长以后，他能够略带夸张地为自己吹嘘说，在以前的七年半的时间内，海军从未发生过一次罢工事件。

在华盛顿，罗斯福步入了一个世界，使他的视野远比他在海德公园、哈佛和奥尔巴尼时更加开阔。他结交了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路易斯·D·布兰代斯、弗利克斯·弗兰克福特；重要的外国人士如英国大使塞西尔·斯普林-赖斯爵士、法国大使让·朱尔·朱瑟朗；当然，还有威尔逊政府中的高层人物，其中有内政部长富兰克林·K·来恩、邮电部第一助理部长丹尼尔·C·罗珀。他和一部分年轻的外交官也经常会面。当约瑟夫·E·戴维斯组织了一个小规模的共同协商俱乐部来提倡“进步的民主主义”的原则时，罗斯福也是它的成员之一。

他通过人——各种各样的人——继续关注并了解政府中那些令人棘手的复杂状况。陆军部长牛顿·贝克对弗朗西斯·珀金斯说：“罗斯福这个年轻人大有前途。但是，我倒认为他这样不加区分地和人们保持广泛的交往会搞得他一事无成。”“可是，据我观察，他正是运用和人们交谈的这种方式阐明自己的观点，与此同时使自己受到教育。”罗斯福有时象一块海绵，没有选择性地吸收各种知识和意见。但是，某种反应性的有机体发生着作

用，他不仅仅是一块海绵。例如，1913年6月的一天夜晚，在与著名编辑、业余政客乔治·哈维上校共进晚餐后，罗斯福在日记中写道：“哈维上校才华横溢——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他会改变战线，否则就发表一个结论性的声明来结束辩论。希望能和他时常会面，但我预感到我们会发生冲突的。”

罗斯福由于海军事务缠身，因此他只是处在威尔逊政府的主要行动的边缘。这位新总统在就职演说中说道：“谁也不会误解全国人民现在试图使用民主党的目的何在。”此后不久他就向人们表明了这一目的。在此以后的九个月中，他竭力督促国会通过了联邦储备法，这项法令为国家的银行和货币制确立了新的方针；国会还通过了关税法，大幅降低税率把税率降低到南北战争以来的最低点。关税法有一个附件是联邦所得税分级税率条例，这个条例有可能成为一项最激进的措施。在以后的几年内，国会还通过了其他的一些重要的法令：如防止不公平的竞争、提高海员待遇、发展职业教育、铁路工人八小时工作制等法令。

华盛顿充斥着威尔逊实行改革的气氛。罗斯福支持总统的建议。当然，这些建议在全国范围内体现了他在奥尔巴尼为之奋斗的理想。不过，他还未形成他自己的一套完整的政治哲学，虽然他确实希望能做到这一点。例如，他在担任州参议员期间，有一次曾在纽约州的特洛伊举行的“人民论坛”座谈会上，大胆地提出他认为“合作”应该成为政治学中的新概念，这种合作从“竞争停止之时”开始。合作是“为集体的自由，不是为个人的自由而奋斗，……我们所指的自由的含义幸福和繁荣。……”从表面上看，他的论点是西奥多·罗斯福的新国家主义和威尔逊的新自由主义二者的混合。如果仔细地进行分析，就会发现这些论点是信口雌黄。他的论点唯一可取之处在语言学方面：他向听众保证，合作这个词从政治角度看比下列名词更容易为公众心理所接纳，如“集体利益”（它社会主义味道太浓），“人与人之间的手足情谊”（它具有过多的理想主义色彩），“调节”（它又可能吓坏了那些“老顽固”）。显然，他觉得他应该形成一种政治哲学，但他的注意力却并不集中于此。

然而，政治哲学对于管理海军事务来说并非不可或缺。结果证明，罗斯福处理政府事务所采取的实用主义、非教条主义的观点使他在华盛顿正如他在奥尔巴尼时一样实行了一种“进步的”政策。一个最能说明问题的例子就是海军部处理垄断问题的情况。罗斯福和丹尼尔斯必须同那些为争夺装甲钢板的营造权作出相同投标的钢铁制造商，和那些垄断优质煤的矿

场主以及索取高额佣金的经纪人及投标集团进行斗争。丹尼尔斯是从仇视托拉斯的农民观点来看待这个问题的，而罗斯福的立场则是，作为一名政府官吏，他企图尽量利用他的经费来购买尽可能多的舰只。两个人的动机不同，但在对待托拉斯的问题上却采取了相同的态度。

对于威尔逊总统，罗斯福与之接触不多，但关系十分融洽。这位助理部长懂得密切地观察威尔逊如何巧妙地对付国会。许多年后，他还记得总统有一次曾对他说：“在一个世代中，只有一次机会能够将一个民族的思想境界凌驾于物质生活之上。这就是保守的政府为什么能在三分之二的的时间里执政的原因。”

坦慕尼再次旗开得胜

罗斯福在到达华盛顿后不久，给他从前的一位选民的信中说：“请你尽管放心，我和纽约州的政治活动与公共事务并未一刀两断。”海军部的工作使他在许多方面都受到了很好的政治训练。海军本身仅在纽约州就雇用了几千名工人。他在波基普西的朋友约翰·麦克后来透露，罗斯福在海军部工作的那些年对麦克写信推荐的每名求职者都很“关照”。布鲁克林海军造船厂中有许多人都是这位助理部长由于政治方面的原因而任用的。在华盛顿，罗斯福也能和邮政长艾伯特·S·伯利森、财政部长麦卡杜以及其他政府机构的头目们保持联系。这些人在纽约州都还控制着几百个联邦的职位。

另外，罗斯福在海军事务方面担负政治管理工作使他有机会在国家的关键性场合露面，并和人们进行接触。这些活动对他都大有裨益。他多次视察海军的各造船厂，每次都谈到要扩大设备关心改善海军人员——包括应征入伍、现正服役和担任文职的人员的生活与工作条件、改善住房以及稳定就业等等问题。他视察时讲究排场：礼炮轰鸣向他致敬，军乐队奏进行曲，海军陆战队列队欢迎。记者们大事渲染他向地方的利益和公民的自尊心所作的呼吁。多年以后，路易斯安那州的政治人物们仍然记得他使得新奥尔良的海军造船厂重新开工的情况。

路易斯·豪在所有这些政治活动中都始终不渝地协助罗斯福。豪的官方名义是罗斯福的助手。他在采购、签订合同、基本建设、劳工关系等方面花费了大量精力，并为这些问题花了大量时间。实际上，他是负责政治事务的助手，这种工作对于他这样一个把上司的成就看成是他本人的生活目标的人来说是非常相宜的。豪不断地把政治斗争的攻守策略的微妙处指点给罗斯福听。关于他的劝告，一个最能说明问题的例子是关于一个名叫

弗兰克·库珀的求职者写来的一封信，罗斯福指示予以答复。豪建议不要复信。“克卢特 [库珀的竞争者] 的任命已由参议院批准。如果你写信给库珀表示遗憾，那么，将来万一库珀求于克卢特，或者他要求你做的事而你并没有做到，他一定会首先把你的信拿给克卢特看。”豪对于妨碍罗斯福的事业的那些政治家本能地怀有敌意。这一点往往经事实证明是屡试不爽，但也为他树立了许多敌人。

豪在罗斯福身边的主要贡献在于他在形势要求采取观望政策时可以控制他的年轻上司的急躁情绪。不幸的是，当罗斯福决定竞选美国参议员时，豪不在他的身边，无法提出意见。这个决定导致了他的仕途中唯一的一次真正的竞选失败和坦慕尼的一次巨大的胜利。罗斯福在把他的决定告诉豪的时候，几乎带着抱歉的口吻。他说：“我还没有失去理智。”

较斯福或许已经丧失了政治判断力。他企图争取被民主党提名为美国参议员候选人，但这一过程却表明了他不仅是仓促应战，情报失误，而且时运不佳。

1913年纽约的政治形势急转直下。新州长“平凡的比尔”苏尔泽——墨菲在1912年击败罗斯福和纽约州民主党的所依靠和利用的人——甚至在就职前已把坦慕尼作为攻击目标。从州政府大厦——“平凡的比尔”把它改称为“人民大厦”——连续不断地发出了对头目们的大量谴责。墨菲给予猛烈反击。坦慕尼开始对苏尔泽进行弹劾，指责他滥用了选举经费。1913年10月，苏尔泽受到裁决，被解除了职务。副州长马丁·H·格林原是奥尔巴尼的一名靠拢墨菲的政客，这时继任了州长。民主党陷于分裂，在11月的州议会选举中遭到惨败。

罗斯福感到这是一次绝好的机遇，可以给墨菲一个毁灭性的打击了。在选举中，坦慕尼失去了对纽约市的控制和大部分任免权；全国总部对此十分反感；如果“老虎”失去了对州政府的控制，它就有可能饿死。罗斯福本人受到很大的压力，特别是来自旧时的纽约州民主党集团的压力，他们希望他在第二年竞选州长。

威尔逊总统在此时刻至关重要。一旦有了政府作为后盾并拥有任免权，罗斯福就能够在州的各项事务中占统治地位。如果没有威尔逊的认可，罗斯福作为政府的一员根本不可以采取任何决定性的行动。好几个月过去了，但威尔逊却没有给他信号。反而，总统继续把一些任免权分配给坦慕尼分子和独立的民主党人。1914年3月，罗斯福要求威尔逊抽出“五分钟”的时间召见他，以便弄清楚他在坦率地评述纽约州的政治活动时可

以谈到什么程度。威尔逊作了书面答复：“我的意见是，如果政府成员对他们那几个州的政治事务尽可能多地施加自己的影响，同时尽可能少地发表意见，那就再好不过了。”总统又写道，在这个问题上尤其如此，因为纽约的“情况还不明朗”。

罗斯福试图使情况明朗起来。由于不能公开采取行动，他在短时间内对纽约进步党表示友好。显而易见，他希望既被民主党、又被进步党提名为州长候选人。当然，如果进步党提名他的堂兄西奥多出任州长候选人的话，则当另作他论。富兰克林说：“我不会与他竞选。你们都知道血是浓于水的。”但是，西奥多堂兄自己既未参加竞选，也没有帮忙把进步党的支持转向富兰克林。所以，富兰克林加倍努力，通过运用任免权来加强反坦慕尼的民主党人的力量。在这个方面，他得到了麦卡杜的帮助。麦卡杜在建立独立的民主党的问题上也有自己的长远利益。他们共同想办法给反坦慕尼的人搞到几项职务。而且谣传不久还要作出一些任命。

坦慕尼被击中了要害，迅速地采取了报复行动。众议院重要的拨款委员会主席警告威尔逊说，他和其他来自纽约州的民主党众议员们决不会听任那些自称总统代言人的人对他们进行诽谤而束手待毙。纽约州的民主党主席声称该州北部地区的党由于任免权问题已经变得堕落腐化，因此他感到民主党恐怕连一个国会议员也未必能够选得出来。

威尔逊注意到了危险信号。他针对坦慕尼发表了一项提议和解的声明。罗斯福过去曾经屡次正式声明拒绝当候选人，7月23日却发表一项声明，听起来像煞有介事似的。

威尔逊的策略是很审慎的，而罗斯福的策略则相形见拙。总统喜欢这位年轻的助理部长，但他了解还有比罗斯福企图整治纽约州的努力更加重要的问题处在风雨飘摇之中。为了使他的计划在国会获得通过，他需要一个团结一致对党。几个坦慕尼的代表由于资历关系出任了几个关键性的委员会的主席。任免权非常重要；参议员奥戈曼只是在威尔逊任命了一个他认为满意的人担任纽约市的海关税务司后，才投票赞成联邦储备银行法。此外，总统必须时刻谨记他自己在1916年重选的前景。如果民主党变得四分五裂，他在关键的纽约州获胜的可能性也将化为乌有。

罗斯福受到了沉重打击。然而，他在放弃了竞选州长的念头以后三个星期，又突然宣布他是参议员候选人。这是为什么呢？

罗斯福虽然忸怩作态，但在1913年下半年和1914年初仍然急于在全州范围内竞选纽约州的一个重要职位。这一部分是由于有了“特德叔叔”

的先例，因为“特德叔叔”担任海军部助理部长两年后就入主奥尔巴尼政府大厦。同时这也部分因为富兰克林认为，当人们对他在反希恩斗争中的表现记忆犹新，或共和党人与公廩分子仍处于分裂状态的时候，他必须在纽约州的政治斗争中获得成就。此外也可能是由于他担心，如果他在政治舞台上长期不能崭露头角，纽约的民主党政治活动中涌现出来的后起之秀将占据舞台核心。可以断定，即使在他放弃竞选州长的念头时，他也在谋划参议员的位置。他在7月19日给他即将分娩的妻子的信中说：“我可能在民主党和进步党的预选中宣布我是参议员候选人。感谢上帝，州长一职已经走出我的视野。……我真想进入参议院，以便每隔三、四年我就可以真正同我的家人一起度过夏天了！”

罗斯福竞选参议员，没有事先征得威尔逊的同意。他的策略在写给一位朋友的信中表达得非常清楚，是要迅速地进入这场竞赛，因为“这必然会将查尔斯·F·墨菲可能提出的任何其他候选人置于反对我的地位。我想把提供证据这种事情推给别的律师。”同时，如果他是第一个参加这场竞赛的，他就可以要求纽约州的那些著名的领袖们给予支持，而不致使他们为难。经过一系列的磋商以后，他和力争被提名为州长候选人的反坦慕尼协会的约翰·A·亨尼西进行了合作。

目前看来，罗斯福可能没有对手。换句话说，要是有的话，那将是威廉·伦道夫·赫斯特。这两种前景都使罗斯福感到欣慰。他认为他能击败这个臭名昭著的报刊出版商，“尽管他有金钱，又有报纸。”不过，罗斯福并未设法把墨菲的人排挤到这场竞争之外。恰恰相反，正如豪本人所承认的，罗斯福对坦慕尼头子的谴责非常激烈，这“将迫使他们提出一个人来反对他。”

罗斯福对于墨菲的智谋又一次估计过低。不久，消息传来，说坦慕尼将支持驻德大使詹姆斯·杰拉尔德争取成为候选人。杰拉尔德为人诚实正直，是一个深受欢迎的坦慕尼成员。他是威尔逊的支持者，此时正在帮助由于欧战爆发而流落当地的美国人，所以声望极佳。罗斯福有好几天都不相信杰拉尔德会接受墨菲投出的这个骗他上钩的诱饵。豪获得机密情报，据称杰拉尔德“毫无可能”参加竞选。罗斯福和豪都对杰拉尔德曾打电报给威尔逊和布赖恩请求批准他接受提名而总统又未加反对的事一无所知。

杰拉尔德宣布参加竞选——但是却从遥远的德国参加竞选。他说由于工作责任关系，他不可能回国参加竞选活动。他知道他可以把竞选事宜交给墨菲。罗斯福问杰拉尔德，如果他当选参议员，是否会受墨菲的控制。这位大使不置一词。但这位助理部长却说一个离开自己战斗岗位的人不适

宜做参议员。不过，他对他自己已在战火已在欧洲燃起时离开海军岗位的事却闭口不提。

尽管罗斯福遭到了这一打击，而且结局也不看好，他还是全力以赴地展开了竞选活动。在到纽约州北部巡回讲演，一再攻击墨菲，并且要求杰拉尔德不要离开现职。他通过他在华盛顿的工会朋友得到劳工方面的赞助，组织人员在工厂门前散发几万份赞同书；不幸的是有一些赞同书上没有工会的标记。在豪的谋划下，他向几十位报纸编辑发出热情洋溢的信，同时准备刊登广告。但是，他基本上没有机会向大批的听众发表演说。1914年9月，在战争头几次的重大战役期间举行的预选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

有一位编辑写道：“他的态度从容而且谦虚。他有学生的举止和姿态。他的面容显得年轻，风度象个学者，说话时轻声细语，看不出他的朋友们所说的有时他会露出的那种固执态度。……他的某些发言是用一位竞选高手的技巧，经过深思熟虑才说出来的。……”但是这位编辑——一位共和党人——留下的印象并不过分深刻。他指出，罗斯福在他的演讲中对“当时一些重大问题”完全没有阐明他自己的立场。他还指出，与即将退休的参议员伊莱休·鲁特相比，罗斯福作为一个伟大的政治家来说，显得十分逊色。

豪留在总部正在为任命问题四处奔波。他希望靠最后一刻对职位安排的控制，把朋友们牢牢拴住，同时从那些愿意参加投票的民主党小派别中争取异化分子。罗斯福要求由他任命的约翰·B·贾德森支持他。贾德森直截了当而又不动声色地回答，他不能给予支持。对此，豪的反应是冷酷无情的。他认为，“象这样的情况，采取突然而迅速的报复行动极端必要。”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必须使贾德森的朋友失去职位，而把职位给予他的“死敌”；可以诱使一位有影响的民主党人和贾德森决裂，条件是给前者一些任免权；同时反贾德森的媒体也必须加以利用。罗斯福认为必须给叛离者以惩罚。

这一切都是徒劳无功的。在预选日，杰拉尔德虽未亲自参加，却以210,765票对76,888票击败了罗斯福，另一位候选人获得了23,977票。墨菲的候选人格林以微弱的多数击败了亨尼西。罗斯福聊以自慰的是，他在纽约州六十一个县中的三分之二的县获胜，其中包括他大获全胜的达切斯县，但是在大部分的县中民主党人数稀少。坦慕尼甚至在纽约州北部也显示了他们的势力。在那里，杰拉尔德所获的票数超过了二与一之比。总而言之，对于罗斯福这位初出茅庐的政治家来说，这是一次惨重的失败。

罗斯福立即打电报给杰拉尔德，表示祝贺。罗斯福在电报中声称，如果这位大使宣布他将坚定不移地反对墨菲的领导，他将为大使竞选。杰拉尔德圆滑地答复，如果当选，他必定将代表全党和全体人民，而不代表任何派别和个人。于是，罗斯福为他作了几次演讲。但在11月的选举中，杰拉尔德和格林都败于他们的共和党对手。罗斯福说：“我感到遗憾，……但并不完全出乎意外。”

罗斯福对于他自己在预选中的失利本来也不可能感到意外。作为州参议员，他凭借敏锐的观察力曾在辩论中指出，在预选中实行直接提名不会破坏党的组织。他和那些热烈支持预选的人们看法不同。那些人认为预选可以整治民主政治的弊病。但他预言投票的人将寥寥无几，派别组织将动员它们自己的人去投票。然而，他支持直接提名，因为这种作法至少可以引起人们对候选人更大的兴趣。罗斯福在1914年的经验充分证明他的推论是完全正确的。

他的失败一度使他感到非常伤心。但是，失败却是一个具有说服力的教育过程。他懂得要击败一个强大的州的领导核心，单靠联邦任免权是不够的；他体验了在全州范围参加竞选的方法与技巧，知道需要少使用嗓子和节省精力。他还学会了如何接受失败。

更为重要的是，这位年轻的政治家对于坦慕尼拥有的权力又受到了一次严厉的教训。他可以在纽约州北部地区击败这个组织，但在全州范围内却不可能。如果民主党不团结起来，那么，在11月的大选中获胜的可能性就微乎其微。尽管这个核心小集团和独立的民主党人互相仇视，但彼此却又需要对方。再说，他们之间的是非之争并不是黑白分明，而是含糊不清的。坦慕尼的首脑是墨菲，然而，这个协会的成员中也有象杰拉尔德这样的正直人士和象艾尔弗雷德·史密斯这样的进步分子。

罗斯福接受了教训。他不再采用骑士般的猛打猛冲的方法来攻击坦慕尼了。

罗斯福政治上遭受的挫折很快就被国际舞台上的划时代事件所淹没。当美国人对于一位大公在遥远的波斯尼亚遭到暗杀的事件几乎将要遗忘的时候，欧洲的火药库突然发生了爆炸。1914年8月1日，德意志向俄国宣战。罗斯福在前往宾夕法尼亚州的雷丁途中得知这个消息。当时他是去主持“缅因号”主力舰将一只锚献给雷丁作为纪念的典礼。他在火车上写信给妻子说：“全面的冲突已不可避免。这将是世界有史以来一次最大的战争。”

罗斯福心理上对这一冲突早已有所准备。其实，他曾组织一两次实战

演习。1913年在日美之间发生战争危机期间，他制定了一个关于假想战的计划，而且命令驻在新港的潜艇鱼雷部队进行了一次紧急动员。当美国军队1914年初强占墨西哥的韦拉克鲁斯时，罗斯福曾说过：“我不希望爆发战争”，但他认为美国应当“现在……就到那里去，收拾墨西哥的残局。”在他就职以来的几个月中，在海军的战备工作方面，他的成绩远远超过了丹尼尔斯。

这时战争已经打响，他感到忍无可忍。罗斯福到达华盛顿后，直接前往海军部。“在那里，果不出意料，我发现一切都处于静止状态，似乎对历史上最可怕的戏剧即将开场这一事实毫不在意。”他在几天后写给妻子的信中说，他正在做真正的工作，而丹尼尔斯却“被这一切搞得不知如何是好，他非常亲切，但非常悲伤。”他说，丹尼尔斯和布赖恩对欧洲大战的本质的认识程度，就象四岁的埃莉奥特“对高等数学的认识程度一样”。

这番话预示了罗斯福在即将到来的“保持中立”的几个月中所起的作用。他支持海军将领，竭力要求加速扩大海军，劝说威尔逊设立国防委员会，公开主张实行全面的军训。他的热情促使他采取了可疑的立场：他和西奥多·罗斯福、亨利·卡伯特·洛奇以及其他一些反对威尔逊政策的人保持联系，甚至包括向共和党人提供海军秘密情报。共和党便利用这些情报诋毁丹尼尔斯，指责海军对战争毫无准备。

如果说罗斯福的热情已经发展到不服从上级的地步，他的这种态度部分地也是缘于他对将来的困难有比较现实的了解。战争爆发时，他意识到这可能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他和他在金融界的一些朋友的看法有所分歧，认为一个决心打仗的国家不会因为财力不足而缩短战争。他十分理解世界大战对于海军战略的含义所在。他和海军上将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长期保持通信联系。这位海军上将告诫他不要把海军舰队分散在大西洋和太平洋。他知道一旦战争爆发，无论在人力或物力方面都需要大量的后备力量。为了料理重整军备中那些千头万绪、令人厌倦的琐事，他一周又一周地忘我地工作。

1916年秋，罗斯福对他的上级说：“我们必须参战。”丹尼尔斯不需要问究竟站在哪一边。罗斯福一开始就倾向于支持协约国。在获悉德国已经入侵法国时，他写道：“为了避免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我希望英国参战，同法国和俄国一起用武力迫使柏林实现和平！”他对比利时进行的“光荣的抵抗”感到非常欣慰。威尔逊曾要求美国人不但在行动上而且在思想上都要保持中立。然而，在1915年初罗斯福难过地对妻子说：“我只知道我

要做一些非常不合乎中立的事才能顺利得到通过！”

罗斯福在战备问题上采取这种咄咄逼人的立场，本来可能使他陷入四面受敌的境地，但事态的发展给他解了围。1915年5月“卢西坦尼亚号”被击沉后，国务卿布赖恩辞职。他不赞同威尔逊对德国的潜艇政策提出抗议，他担心抗议可能必需用战争来兑现。一年以后，战备活动全面铺开。这年通过的海军拨款法案本来可使美国最终会建立一支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在1916年的大选中，政府加强了团结。罗斯福抛开个人过去的一切怀疑，针对共和党关于威尔逊和丹尼尔斯备战不力的批评，热情地为他们辩护。他在普罗维登斯发表的一次演说中声称：“总统的对手们利用了错误的引语和错误的转述——甚至可以说是谎言。我用‘谎言’这个词，因为这是一个‘罗斯福式’的好字眼。”

西奥多·罗斯福目睹威尔逊对德国采取“逆来顺受”的方针感到怒不可遏，1916年6月离开了进步党转而支持共和党候选人查尔斯·埃文斯·休斯。共和党的队伍重又团结起来。随着选举日的迫近，他们觉得有把握在总统选举中取得胜利。第一次的选举结果报告证实了这一预测。与威尔逊一样，富兰克林·罗斯福睡觉时满以为休斯已经获胜。但是，第二天来自西部的选举结果截然不同。罗斯福在给妻子的信中兴奋地说：这是“我一生中最非凡的一天。”最后的选举结果报告表明，威尔逊获得9,129,606张选民票，休斯得到8,538,221张选民票，而选举团的票数差额为277比254。

这位海军部助理部长感到无限欢欣而且如释重负，几天后开玩笑说：“据传我的一位著名的堂兄现在正忙于修订他那本最有名的历史新著《西部的胜利》。”

一战领袖

1917年1月9日，德国皇帝在西里亚的一座城堡里忐忑不安地主持了一次关系重大的皇家委员会会议。前一年，战事的进展变得对德国及其盟国不利：协约国的战线由于遭受沉重的打击，虽然在凡尔登向后收缩，但是阵地仍然屹立；在日德兰半岛海战以后，德国海军不敢再度冒险和英国人正面作战；协约国的联合封锁正在削弱德国的经济力量。军事首脑争辩说，只有一个办法：进行不受限制的潜艇战。两年多以来，外交家们一直成功地抵制了这种极端的政策。他们的理由是，这样做将会促使美国参战。在这次会议上，军方的主张占了上风。不久，在2月1日，向各潜艇艇长迅速发出指令，要求展开不受限制的潜艇战。

1917年2月初，电台广播德国的这一通告时，罗斯福正在圣多明各。丹尼尔·斯立立即召他回国。在嗣后几周焦躁不安的气氛中，美国正犹豫不决地走向战争。罗斯福力促采取行动。3月初，他请求威尔逊批准舰队作好战斗准备。罗斯福后来回忆，总统当时曾说：“不行，……我不希望美国通过战备形式做出任何军事行动。这将使得历史学家能够在多年以后结论时……说美国对德奥匈三个盟国采取了敌对的行动。”但是不久，有关美国船舶遭到鱼雷袭击的消息接连传来。内阁团结一致，建议总统要求国会宣战。

4月的某一个阴雨的夜晚，富兰克林和埃莉诺·罗斯福聆听威尔逊发表他那雄辩而又庄严的宣战演说。埃莉诺回家时，“由于感到即将来临的重大变化而萌生的迷茫还没有完全摆脱”。她的丈夫则对报界宣称：这篇演说“对于每一个真正的公民来说，不论他的政治信念和宗教信仰如何，不论他来自哪个国家，都是一种支持。”

大势已定。罗斯福精力饱满、镇定自若地投入有关战争的行政管理工作。他有大量工作要做——大规模地征募新兵和采购物资，加速海军建设工作，迅速制订防御措施，制定海军作战计划，同商船队进行合作，和英法两国就舰艇的调度进行细致的安排，以及许多其他事务。他需要大规模地处理重要的工作，这使他感到兴奋。他喜欢果断采取行动，即使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行动都是明智的。埃默里·S·兰德对他关于舰艇设计的意见作出了评论：“他是一个了不起的家伙，他不断进行试验，有时会发生错误，但总会成功，而且确有一些主意非常不错。”这个评语道出了他的一般活动的特点。

战争动员并未使罗斯福此后不再需要用政治手段解决行政问题。1916年末，罗斯福向丹尼尔·古根海姆采购黄铜时企图压价。他告诫古根海姆说，削价将会向公众表明作为商人并不只是为了牟取私利才对战备发生兴趣。在战争时期发生劳资纠纷时，他会出面和工会领袖们举行谈判。合同很有效率地得到批准，但并不总是严格遵照非政治性的基础。

在威尔逊发出战争动员令以前的那几周气氛十分紧张，使人窒息。在此期间，罗斯福企图施展的一次政治花招本可以使一个历史性的插曲不一定发生。罗斯福希望给通过德国潜艇出没的水域的商船配备海军火炮时却发现不允许把火炮卖给私人船主。但他聪明地根据一项旧的法令，他可以将火炮租借出去。他通过丹尼尔·斯立向威尔逊汇报了这个情况，但总统不愿这么做。相反地，他要求国会授予一定的权力，结果这个提议由于被威尔

逊所称的“一小撮刚愎自用的人”使用冗长的演讲阻挠议程而被否决了。后来，总统未经国会授权，便下令给商船装配火炮，罗斯福必然以异常的兴奋心情注视这一情况。1940年在准备采取租借法案的措施时他是不会忘记这个事件的。

为了使他的一些提议得到批准，罗斯福要使用他所能施展的各种政治手腕。其中一条建议是，在苏格兰和挪威之间布雷设障，以阻拦德国潜艇进入大西洋。但所需的经费令人吃惊而技术困难使人生畏，因此罗斯福遭到英国海军部和当时在伦敦的威廉·S·西姆斯海军上将的反对。不过，由于发明了一种电动天线点火装置，而美国海军部又派遣了一名高级将领亲自想办法使计划能通过伦敦的海军部门，再加上罗斯福不断地努力，终于打破了僵局。事实最后证明这一计划完全合乎实际需要，不过，因为太迟了，所以在反潜艇战中不起多大作用。

在战争到来以前的几个月里，罗斯福对丹尼尔斯的审慎作风的焦躁情绪达到了新的高潮。1916年11月，他在给妻子的信中说：“约瑟夫斯·丹尼尔斯做事的效率极低。”然而，这位助理部长一点也不支持由海军同盟带头发起的一个有组织的活动，其目的要使罗斯福在威尔逊连任总统期间担任海军部长。他说，他不喜欢一个下属总是想尽办法要取代他的上级；但他也知道，丹尼尔斯在私交和政治方面都和威尔逊保持亲密的关系。在战争开始以后，他和丹尼尔斯之间的矛盾多半都是围绕着方法问题而不是目的问题。罗斯福私下仍然尖锐地指责他的上司。有一段时间，他帮助美国小说家温斯顿·丘吉尔起草了一系列指责海军管理工作的意见书。丘吉尔当面将这份材料交给威尔逊。罗斯福认为要做成一件事情，其办法就是拿起一把剪刀，狠狠地剪断红带子。他并不完全理解许多“红带子”只是一系列复杂的核准与协商手续。而丹尼尔斯跟一大批决策人物打交道，必须办完这些手续以后才能采取有效行动。

“我正想忘掉还有政治这件事。”这是罗斯福在1918年初说的话。可是他却没有办法去忘记。朋友们一直希望并支持他竞选州长。更重要的是，坦慕尼摆出一副愿意和解的姿态。

这一惊人的变化主要是由于罗斯福本人对坦慕尼的态度有所变化。他没有忘记1914年和那以前几年中的种种教训。他不声不响地采取了双赢的政策。1915年，他运用任免权给几名坦慕尼派国会议员以好处，他们一年前曾对他进行猛烈的攻击。1916年，由于从总统那里得到了暗示，他在州一级和全国性的选举中都奉行了党内协调一致的政策。他对史密斯、瓦

格纳以及其他思想进步的坦慕尼成员表示了极大的热情。1917年7月4日，罗斯福应坦慕尼之邀在威格沃姆担任主要讲演人，并和他的老对手墨菲合影。此时，双方达成艰难的和解。到了1918年春，他接到报告说，至少有十二名纽约市的领袖人物支持他，甚至还可能有墨菲本人。实际上，坦慕尼并不是突然变得喜欢罗斯福了，但看出他是一个可以获得纽约州北部地区选票的人。

罗斯福本来很可能会获得提名并在选举中获胜。但在1918年6月，他果断地公开声称他不想参加竞选。

他的注意力贯注在其他方面。他敏锐地意识到他的政治生涯中缺少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当成千上万的人都穿着军装的时候，他却没有机会。他甚至没有海外工作经历。特德叔叔本人迫切希望能去法国作战。他竭力主张罗斯福也参加战争。但丹尼尔斯不让他离开。退而求其次，哪怕以平民身分到靠近战场的地方去一下也好。他终于成功说服部长派他去完成了一项公差，即视察海军基地并和协约国的领导人进行磋商。罗斯福怀着冒险的迫切心情，于1918年7月初乘一艘驱逐舰前往欧洲。

这是一次令人兴奋而又令人满意的旅程。罗斯福乘坐驱逐舰在大西洋上曲折航行。他们只受了几场虚惊，但就连这些虚惊也给以后的故事提供了素材。在英国，和他会见并进行交谈的有劳合·乔治（罗斯福后来说：“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那惊人的活力”）、鲍尔弗勋爵、温斯顿·丘吉尔（当时他们都未能给对方以深刻的印象）、克莱蒙梭、奥兰多以及许多著名的海军与陆军将领。这次公差也不只是宴会酬酢，他的主要时间用来研究研究合同、供给和人员等单调的细节问题。他试图就意大利海军的作战行动计划——或者说缺少这些计划——的问题在外交上和军事上所造成的难以解决的纠纷寻求一个和解方案，但没有获得成功。

他终于目睹了战争，这是此行的主要目的。值得注意的是，他只有一次动怒了，那是因为一位海军武官企图使他绕过战区。罗斯福事后有好长时间都设解原谅那位可怜的人物。他参观了海军陆战队战斗的战区，用敏锐的目光详细地介绍了这满目疮痍的战区的状况。他从远处眺望战斗情景。最使他兴奋的是，他遭遇到了一些小规模部队的袭击。

这一些都是令人兴奋的，但他仍然没有穿上军装。他在9月回到美国，决心要求丹尼尔斯给予他军官资格。但是，由于旅途劳累，他染上了流行性感冒和肺炎，只好用担架抬上岸来。他费了几周时间才康复，而日子在一天天过去。大约在10月底前后，经过丹尼尔斯的批准，他去见威

尔逊，请求委派军职。但总统对他说，现在已经太迟了。他已经收到了要求停战的最初信息，而且他希望战争不久将会结束。

罗斯福感到十分失望，但他打算充分利用这个机会。他后来给一位正准备在格罗顿学校树立一块世界大战纪念碑的校友写信说：“我认为我的名字应列入第一批‘服兵役’的人员表中，特别因为我曾在大洋彼岸观察了战斗实况，而且险些被鱼雷或炮弹击中。……”

有一位年轻的奥地利士兵比他沮丧得多。那个士兵 1918 年 11 月 11 日在普鲁士的一所医院里躺在病床上痛哭流涕。据他后来说，这是他从他母亲死去后第一次流泪。他并不是因为错过了战争而悲伤（他曾英勇地作战四年，遭受过毒瓦斯的袭击，也受过伤），而是因为德国遭到失败并被协约国征服了。就在这时，阿道夫·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声称：“我决心从事政治活动了。”

第四章 为捍卫国联而斗争

战争年代对罗斯福产生的影响是让他成熟起来。漫长的工作时间、难于达成的协议、无休止的会议、令人精疲力竭的旅途以及同华盛顿和国外掌握实权的权贵们进行的讨价还价，这一切已经把他锻炼成为一个富于经验的政治家和行政官吏。他在大部分时间内大刀阔斧地开展工作，极力敦促他的上司和下级行动起来。对他来说，这种做法是很容易的——而困难却在于要有耐心先走一条曲折的道路然后再采取行动。这类工作大都需要煞费苦心，而且是默默无闻的。

岁月在他脸上留下了痕迹。他的前额显出了隐约可见的皱纹；他在奥尔巴尼时期那副平滑的、几乎可以说是白嫩的面庞，此时比以前略微清瘦，皱纹也更深了。鬓发逐渐稀疏了。一双蓝眼下面开始出现黑圈——这是罗斯福家族的一个特点。但他依然显得年轻，容貌基本不减当年。他依旧保持了良好体型，身体仍很柔软。在炎热的夏季打高尔夫球一天能够获得五十四分，而且可以不费力地跳过一排椅子。耶鲁大学知名教练沃尔特·坎普说罗斯福“体形优美，象一个运动员那样肌肉发达”。坎普是罗斯福专门请到华盛顿来为海军制定健身计划的。

他的家庭负担也有所增加。他此时已有了五个孩子。小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 1914 年 8 月诞生，约翰·罗斯福 1916 年 3 月出世。全家在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都住在华盛顿，夏天总要到坎波贝洛逗留一段时间，其间还常到海德公园去。侍候他们全家的佣人不少，经常超过十名。罗斯福

的薪金和投资收入加起来每年大概两万七千美元，然而，奢侈的生活开支庞大，他的母亲偶尔对他经济上有所帮助。

社会活动也迫使他在另一方面付出了代价。他很多时间都离开了家人，当孩子们病得比较厉害，或者一个孩子在野餐时被火烧伤了，他都没有陪在孩子身边。由于远离家人，他的忧虑反而加深了。有一次当小儿麻痹症正在流行时，他死缠着丹尼尔斯不放，最后这位部长只好允许他派遣一艘驱逐舰到坎波贝洛，把子女从海上送回家去。象其他知名人士一样，他的私生活也成了造谣生事者攻击的对象。有个谣言不胫而走，说罗斯福另有新欢，埃莉诺提出解除婚约。造成困难的原因最多不过是长期两地分居。他从华盛顿写信给他妻子说：“如果你认为或者主观臆断我不需要你整个夏天都住在这里，那你真是太神经质了，因为你知道我确实希望你整个夏天都住在这里！但是老实说，你应当在坎波贝洛连续呆六个星期。我也应当这样，只是你能够，而我做不到罢了。……”

罗斯福在战后初期给公众留下的形象是：一位生气勃勃的年轻的行政官。这时，他的工作要求他承担许多的紧迫的“实际”任务，而不是冒险性的作战行动。主管这项任务的大部分工作落在这位助理部长肩上。他现在对于改进联邦政府的组织和管理工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深刻领悟到行政管理机构在政治方面的关联，反复敦促应使总统在编制预算方面享有更大的决策权，国会应把拨款活动交给一个综合委员会来对参众两院进行整顿，人员的晋升应当根据工作效率而不是资历，现有的政府机构应加以改组、重新分工，各行政部门的负责人应该拥有更多的权力。

他谨慎地参与着政治活动。1920年2月他写信给一位支持者说：“坦率地说，如果今年共和党占优势的话，我个人则不愿在秋天过早地去作牺牲品。”但这却正是他将要做的事。

挑战和应对

1919年的最初几星期，罗斯福在欧洲忙于海军事务。他协助清理战争的善后问题，而伍德罗·威尔逊则在巴黎试图为和平奠定基础。总统当时正处在他的事来颠峰，他对欧洲进行访问时仿佛是一位无冕之王。一位评论家说：“从来还没有人得到过如此热烈的欢呼。我曾看过福煦、克莱蒙梭驱车而过，也曾见过劳合·乔治、将军们、凯旋归来的部队、旗帜，但威尔逊在车上听到的欢呼却不同，它是非人的或者说非同凡响的。”

威尔逊在2月中旬风雪交加的一天离开法国返美。他得意洋洋地把计划中的国际联盟盟约的一份草稿带了回来。同船的有助理海军部长，他和

妻子一同返回华盛顿。一天，罗斯福夫妇同威尔逊夫妇及其一行共进午餐，谈话内容多半是互相交换情报。席间，总统谈到了国际联盟。他说：“美国必须参加进去，不然就会使全世界的人丧失信心。因为美国是唯一能够使大家感到它是公平无私、可以完全信任的国家。”

他们的船在波士顿停泊后，罗斯福夫妇乘车加入庆祝胜利的游行队伍，一同护送总统去旅馆。大约有二十五万波士顿市民向总统高声欢呼，表示欢迎。甚至卡尔文·柯立芝州长都受到感动，“确信人民一定支持总统”。埃莉诺看到在前往华盛顿途中的每一站，群众都疯狂似地向总统热烈欢呼，因而确信群众已经“明白了他的理想”。

他们或许懂得了他的理想。不过，盟约是必须获得美国参议院三分之二的票数才能通过的一项条约的其中之一部分。而参议院则有许多这样的人：他们和威尔逊一样妄自尊大、顽固倔强，异常珍视参议院在对外关系方面拥有的特权，对势力较大的民族利益集团非常敏感，而且清楚地认识到总统选举即将来临。另外，参议院是在共和党的控制之下；尽管威尔逊1918年吁请人民支持由民主党来控制国会，以便于“统一领导”，但选民们还是以微弱的多数使在野的共和党掌握了参众两院。

罗斯福沮丧地注视着总统在参议院的政敌屡次在小问题上击败了政府。1919年2月，仍属于少数派的共和党人，在民主党控制国会的最后几周中，用冗长的演说阻挠议事，扼杀了一些极为重要的拨款方案。所以，威尔逊由于形势所迫，在例行会议以前的几个月，召开即将由共和党控制的国会的一次特别会议。就在这次短暂的会议即将结束时，参议员亨利·卡伯特·洛奇玩弄了一种议会策略，向参议院提出一份“联合声明”。这份致三十九名共和党参议员和当选参议员的声明宣称，国际联盟盟约“按目前提议的形式”是不能接受的。7月，威尔逊在巴黎与劳合·乔治和克莱蒙梭经过几周艰难的磋商后，将条约提交参议院讨论。8月，总统表示愿意接受参议院在一项单独的决议中对条约所声明的温和的保留意见。不过，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却继续破坏这个条约。9月，威尔逊前往全国各地，发表了四十次热情洋溢的演讲，遇到了挫折，回来时精疲力尽，病了一场。11月，总统敦促民主党参议员投票反对洛奇对条约提出的保留意见。这些保留意见被否决，但要求无条件地通过这个条约的议案也以三十八票赞成、五十三票反对的比数而未获通过。

何为事实的真相呢？1919年初，威尔逊为成立国际联盟所作的努力受到美国人和欧洲人同样的热烈赞扬；可是到了年底，他的希望完全破灭

了。人们给出了种种理由。意大利裔美国人由于拒绝让意大利占有阜姆而感情激动，爱尔兰裔美国人由于英国控制国联大会的“六个席位”而十分不满，德国裔美国人则由于协约国对他们故国的处理而情绪不佳。其他美国人则对欧洲的动荡不安感到十分厌倦。他们被劳工纠纷、物价上涨和赤色恐慌弄得心烦意乱。国际联盟问题卷入了两党激烈斗争的旋涡之中。特别是威尔逊在那些玩世不恭的人物已经在凡尔赛炮制了一个强权政治的条约之后，还在对理想政治评头论足。他在需要作出让步的条件已告成熟以后很久，还在继续坚持他最初提出的条文。

真相如何，暂且不论。值得注意的是，罗斯福处理这个问题的方法和总统有些差别。这位助理部长赞同成立国际联盟，这一点不需多加解释。但他的演说缺乏威尔逊的那种高尚的道义热情。威尔逊谈论追求“理想”、“命运”、“远大的眼光”、美国的责任、美国的梦想；罗斯福则更强调实际，更强调实验。1919年3月，他说：“重要的是不要分析文件，而是先批准总的计划。”他告诫说，如果美国不参加，国联只能成为一个新的神圣同盟。“国联可能不会消灭战争，但各国要求举行实验。”

罗斯福比威尔逊显得更具妥协精神。早在1919年3月29日，他就赞成一项承认门罗主义的修正案。但他认为即使不可能通过令人满意的修正案，对国联也应加以试验。他在这年年底告诫人们说，对国联盟约提出其他的保留也是必须的。他不大相信国联会防止将来可能发生的一切战争，即便美国加入国联以后，国联也不能防止这样的战争。战争结束几个月以后，他仍要求进行强制性的军事训练。

他在7月说：“我把国联盟约草案看了三遍，每看一遍，总会发现一些不合我意之处。还有别的人也不满意。……我个人愿意就目前的文件进行一次试验。”在此时期内，罗斯福仅仅一次用威尔逊的词汇、冠冕堂皇地评价这个盟约。他在国联为促进和平而召集的一次会议上发表的演说上提到了盟约，将国际联盟与英国大宪章和美国宪法相提并论。他了解他的听众想听些什么。

威尔逊越来越关注盟约和国联问题而无暇他顾，但罗斯福和他不同，在战后时期似乎关心大大小小的各项问题。1919年和1920年初，他就各种各样的问题发表了许多次演说。他还发表了二十多次讲话，描述和维护海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战绩。他再三地鼓吹实行和平时期普遍军训，认为这是维持一支军队的最合理的方法。他呼吁对行政和立法机关进行改组。他甚至还有时间对一个次要的但却敏感的问题采取政客式的骑墙态

度：他在一些保护动物协会召开的一次会议上说，活体解剖在科学研究中很有必要，但医学界不能继续滥用。

他的有些考虑简直愚蠢之至。有一次，他期望战后各州和联邦政府事务应和战争期间一样，“不受党派关系的影响。”他的有些演说充斥了对美国作沙文主义夸耀的口吻，常常提到“优良的美国特性”、“严谨的生活”、“正直的理想”。不过，贯穿于他的许多演说中的一些内涵是：民族主义（“美国特性”）胜于地方观念或他方主义；国际主义胜于民族主义；利用行政管理办法去解决问题；改进政府机构以承担更繁重的任务。

他依然是威尔逊的拥护者。5月，在共和党保守派于参议院获胜第二天，他在对芝加哥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发表的演讲中说，“共和党内的进步主义运动从1916年以来一直在走向终结，昨天它已寿终正寝。”共和党仍然是“保守和反动”的政党，是具有“极少美国风味但有沙文主义恫吓”的政党。他预言两党将重新组合，共和党自由派会加入民主党，而他自己的党内的保守派将转到反对党。他严厉斥责刚刚召开的新的一届共和党代表大会，指责他们只关心给“他们所喜爱的制造商集团恢复旧时的特惠关税税率”，批评他们一心讨好凯旋的士兵却又不给多少好处，指责他们修改所得税法以便百万富翁从中获利，同时指责他们诽谤造谣。

当地的一位人士说，这是一篇令人振奋的演说，一篇极其出色的演说。罗斯福后来议论说，他只不过是企图“重新宣传与美国本身历史一样悠久的一些基本原则”罢了。

1920年——庄严的公民表决

随着总统选举年的即将来临，罗斯福的朋友们象以往一样，竭力敦促他竞选州长或参议员。他也象往常一样，没有表示明确的态度。他在1920年开头几个月对他的支持者说，许多条件要取决于7月间民主党全国大会提名什么类型的总统候选人。

民主党人步履维艰。他们党的领袖是白宫里的一位病人。共和党人已经克服了由于进步主义分子退党而产生的沮丧情绪，正在利用国会的讲坛大造反政府的舆论，并且正在从战后内政与外交问题带来的后果中捞取私利。对国际联盟持反对态度者的人数不仅在保守派中而且在进步分子中都有所增加。而这些进步分子已经成为威尔逊的民主主义的支持者。

民主党内许多领导人都希望不要把国联问题作为竞选中引发争论的一个主要问题。北部城市的党魁们，由于同总统在任免权问题上发生了争执，准备抛弃威尔逊，不再把他当作民主党的领袖和象征。但是，这一点

完全不能实现。威尔逊已经把他的党和国联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他坚信人民是支持他的，所以他公开告诉全党，大选应当是一次“伟大而庄严的公民投票”，决定如何解决战争与建立和平的问题。成千上万的民主党人由于对国际问题在参议院中通过的前景非常担忧，把大选看作是打破僵局的一种方法。

罗斯福也是这样的一个民主党人。和他在 1912 年的地位不同，他在民主党 1920 年于旧金山举行的全国大会上具有相当大的份量。他既是政府的一位要员，也是由他的选区的民主党人选出的一名正式代表。而且他的一票举足轻重。他试图劝说纽约州的民主党代表放弃单位投票法，但未能成功。根据这种方法，（墨菲手下的）纽约州大多数代表，正象他们在 1912 年那样，可以控制整个代表团的投票。不过，大会规章委员会帮了罗斯福的忙，他们不顾坦慕尼的反对，认定单位投票法不适用于预选中选出的代表团。

在大会开幕那天，罗斯福利用一个机会把他对威尔逊的支持搞得十分惹人注目。给患病的总统的一幅巨大的油画举行揭幕式，在会场内引起了一次喧闹的示威行动。代表团一个接着一个涌到会场的通道里，挥动他们手中的标语牌。可是，纽约州代表团却没有动静，他们惹人注目地坐在自己的席位上。游行的人们大声喊道：“纽约州，站起来！”但没人理会。罗斯福感到无法忍受，跑到紧握纽约州旗帜的一名身材魁伟的坦慕尼领导人面前，用力抢夺旗帜，把那个愤怒的坦慕尼分子拉起身来，和他搏斗了片刻，随后举着旗子得意洋洋地沿着通道走了过去。

大会在接下来的几天里进行了四十轮投票，由于在俄亥俄州州长詹姆斯·M·考克斯、司法部长 A·米切尔·帕默和前财政部长而现在是总统女婿的威廉·麦卡杜之间的争夺难解难分，结果陷入僵局。罗斯福赞同提名纽约州州长阿尔弗雷德·E·史密斯为候选人。但在史密斯和其他几名纽约州拥护的候选人中途退出竞选后，他和其他许多纽约州北部的代表数次投票支持麦卡杜。然而，麦卡杜不是公认的候选人，而且被那些担心威尔逊对大会施加影响的人奚落为“王储”。威尔逊本人保持缄默。

考克斯在第四十四轮投票中赢得胜利。民主党人提名考克斯，是合乎逻辑的，这种情形与早些时候共和党人在其领导人开会后决定选择俄亥俄州另一位编辑出身的政客沃伦·G·哈定的情形一样。考克斯是一名妥协的候选人。他的亲威尔逊的，但只达到不和政府疏远的程度，因此还没有被人认为是“威尔逊派”从而受到这个不利条件的牵连。他在任州长期间的

经历说明他的进步倾向和卓有成效的工作能力。担任上述职务，他可以回避一些难以解决的全国性的争论。在禁酒问题上，他持反对态度，但并不过激。

与往常一样，选举副总统候选人是全国大会事后考虑的问题。根据多年的惯例，他必须在总统候选人名单上起平衡作用。从地理上来说，他不能与总统候选人来自同一地区。从政治方面来说，他必须代表党的各个不同的利益集团。与考克斯相比，罗斯福的立场却和威尔逊政府完全一致；他是一个温和的禁酒论者，而且被认为是党内的独立派。此外，他在政府中的工作成绩突出，同时他的名字可能会从共和党的营垒中争取过来一些进步分子，因为西奥多·罗斯福在前一年已经去世。

提名工作毫不费劲地完成了。考克斯从提给他的可供考虑的候选人名单中，表示愿意选定罗斯福。但是作为一个富有经验的政治家，他希望得到曾在全国大会上全力支持他的坦慕尼协会的同意。当考克斯的代表人埃德蒙·H·穆尔打电话把墨菲从床上叫起来时，这位坦慕尼头子的态度是坦诚的。

他说：“我不喜欢罗斯福。他在全国并没有多少名气。不过，埃德，民主党提名的一位总统候选人能够待我以礼，这还是破天荒第一次。因此，即使考克斯希望我投票赞成魔鬼，我也会听从吩咐。告诉他等我们集合起来，我们在第一轮投票中就会提名罗斯福。”

墨菲一如既往，遵守诺言。还有几名其他候选人也在提名之列。但据说考克斯和墨菲赞成罗斯福的消息在会议厅中不胫而走。当艾尔·史密斯对海军助理部长的提名表示支持时，坦慕尼的立场已经非常明白。人们撤回了其他的提名，罗斯福在一片掌声中被提名为副总统候选人。罗斯福对自己这次被选为候选人，没有进行什么努力。

回过头来看这次选举，罗斯福的被提名如果说不是必然的，似乎也是完全自然的。但事实并不是这样。其他的候选人也符合被推选的条件。虽然罗斯福的一些朋友为他开始进行一些小规模的支持活动，但他缺少有组织的机构为他展开竞选活动。他曾经支持麦卡杜，而且考克斯从未和他见过面。罗斯福本人对选举结果也感到有些吃惊。如果说他被提名是由于他的姓名和他的住址等幸运情况，则另一方面也由于他和坦慕尼的关系已经改善（这一政治名声已传到纽约州外），以及他在海军中优秀工作成绩。

罗斯福和考克斯马上就面临关键性的策略问题。他们应当在多大程度上把国际联盟问题当作他们竞选运动的基础？他们显然不可能离开这个问

题，但可以降低调子，同时大事渲染一些国内问题——诸如税率或“共和党的反动”等经过考验的问题。而这正是许多民主党领袖竭力要求他们做的事。人们指出——后来事实说明他们的分析相当准确——共和党人由于没有对国联盟约承担任何义务，可以使国联的支持者和反对者都支持哈定，而民主党内的一些大集团，特别是爱尔兰裔和意大利裔民主党人将不予支持。

但是，考克斯和罗斯福决定把国联问题作为他们竞选运动的中心议题。他们一起拜访总统，以这个行动来表明他们的意图。威尔逊坐在白宫的门廊里，头发灰白、面容憔悴，一条披巾盖在他那瘫痪的左臂上。根据罗斯福后来的回忆，考克斯当时说：“总统先生，我们完全同你以及你的政府意见一致，也就是说，在国际联盟问题上和你完全一致。”总统显得有些生机了。“我非常感激”，这是他所能说出的唯一的一句话。

有人规劝这两位民主党候选人，因为他们是执政党的代表，他们在竞选中对共和党人应后发制人。但是他们没有采纳这个建议，决定采取一个大胆的计划。另一方面，哈定决定采用当年麦金莱的方式展开前廊竞选运动。罗斯福则期望启程。从8月中旬到选举日，他几乎毫不停歇地旅行，一般乘坐挂在普通火车后面的专车，有时乘汽车，有一次乘飞机。8月，他的足迹遍及西北部，然后在9月间到了新英格兰和纽约州，接着重又折向西部，采取更南面的一条路线，一直到达科罗拉多州。他在竞选的最后几天，又在他家乡所在的州紧张地开展竞选活动。10月初，他在麦迪逊广场公园作最后一次讲演。他总共发表了一千多次演说。

作为选遣人员替他效命的是民主党的一位宣传人员，名叫斯蒂芬·厄尔利；随他一同旅行的是一位名叫马文·麦金太尔的总助手。豪则先在华盛顿和纽约，后来在竞选火车上给予帮助。厄尔利断断续续的报告给这位候选人提供全国的政治形势情报。他从斯波坎发给麦金太尔的电报说：“华盛顿州禁酒。兴趣集中在开垦土地和击败超党派同盟等问题方面。老板将被要求发表他对超党派同盟以及他们的激进派的观点。这个地区非常感兴趣。……我坚决建议你不要直接打击超党派同盟。伐木业是重要的行业。小麦为主要农作物。发展农业是全部目标。……”

厄尔利最后断定人们对于国际联盟没有多大的兴趣。威尔逊在全国旅行时未能引发人们对它的兴趣。随着罗斯福竞选足迹的延续，关于人们反对国联的情绪的报告更加令人沮丧。看来几乎在所有地区，都无外乎两种态度，即冷漠或断然反对。厄尔利报告说：“新罕布尔州毫无希望。爱尔

兰人猖狂已极。”麦金太尔在明尼阿波利斯发现人们对国联缺少兴趣，他们想的是他们的“肚子是否填饱了，而不是他们的战时盟友。”

但是，罗斯福抓住国际联盟问题不放。他极力企图用直接向共和党候选人发问的方式迫使对方采取守势：“如果美国能参加目前的国际联盟，条件是国联不能违反我们的意志把它的意志强加给我们，如果事实能够表明我们在宪法上和议会方面有关战争的权利充分地得到维护，那么，请问哈定参议员，你会赞成我们参加吗？”罗斯福知道他不会得到回答，而且也知道哈定所以保持缄默是因为害怕疏远以参议员海勒姆·约翰逊为首的反对参加国联的共和党人和以前总统塔夫脱为首的赞成参加国联的共和党人。哈定以他那令人恼火的方式，继续在他的前廊上发表充斥陈词滥调的言论。

然而，罗斯福并没有把他的全部火力都用来攻击国联问题。他论及各种各样的主题：税率、传说哈定将采取对农民生产的小麦给予美元补贴的办法、共和党人的竞选经费开支庞大、人数不多的一个小集团对哈定的控制等。他提出了一个方案，这个方案大体上比以后的计划在时间上有所提前，其内容是：给农民提供较好的销售便利和居住条件、一项斥资十亿美元的自然资源保护与发展计划、较高的劳工标准、同拉丁美洲改善关系、和各国建立更密切的经济关系。他赞同威尔逊执政时期通过的法律。

罗斯福在许多时间里开展了机智巧妙而又积极进取的竞选活动。这些活动引人注目，但又没有过分突出罗斯福自己而使主角考克斯州长黯然失色。但他也犯过错误，最严重的一次错误发生在比尤特。当时共和党人批评说，英国会在国际联盟大会上掌握六票，这句话刺激了罗斯福，于是他便说美国将控制十二票——即美国南面的那些小弟弟的票。事实上，他甚至说，他和丹尼斯确实控制了其中两票，因为他们“和两个小共和国的统治有些关系”。他还微笑地补充说，他在海军部工作期间，曾亲自起草了海地的宪法。

这是一个可怕的、愚蠢的失误。共和党人小题大作地指出这个错误，拉丁美洲人感到受了侮辱，国务院弄得狼狈不堪。而罗斯福则运用政治家惯用的手法使自己下台——宣称他的话被人错误引用了，应加以“澄清”。

罗斯福这个姓氏继续发挥它的魅力。人们挤到这位候选人跟前说：“我曾投过你父亲的票，”或者说：“你和你父亲一模一样。”共和党人为了抵消这个可怕的误会所造成的影响，派年轻的小西奥多·罗斯福上校跟随他的堂兄。这位上校在谈到他的远亲时说：“他是一个有自己独特想法的

人，他身上没有罗斯福家族的印记。”更重要的是，哈定终于离开他的前廊，发表了一些树桩演说。

虽然罗斯福知道一个候选人往往会被那些向他欢呼的听众和表示良好祝愿的人弄昏了头脑，但他在选举的前一天仍抱有极大的希望。他的希望很快就化为泡影。共和党以超过七百万票的比数取胜，双方的票数为 16, 152, 220 对 9, 147, 553。这是总统选举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共和党人将以三百席位对一百三十二席位的比数控制众议院，以五十九席位对三十七席位的比数控制参议院。在罗斯福的家乡纽约州，哈定所获的票数超过考克斯一倍多。

威尔逊感到异常痛苦。他说：“我们本来有可能可以在世界上取得领导地位。可是我们丧失了机会，我们很快就会目睹这一切造成的悲剧。”考克斯以一个竞选老手的风度接受了失败。罗斯福的做法以及有些人故意成为“符合大众需要的多面手”的倾向感到可叹。“我不能相信我亲爱的富兰克林本人说出的话恰如其份地代表他的思想感情”。萨拉·德拉诺·罗斯福认为，贵族的职责就是要使自己胜过别人，给那些不如他们幸运的人们树立一个学习的榜样。对于她——以及和她相似的许多其他人——来说，幸福康乐是涉及个人而不是公众的事，而且过去比将来更为珍贵。但是，她的儿子虽然对她谅解而且充满深情，却早已走出了海德公园的圈子。

这封信是一个母亲试图对她的儿子继续保持控制的一种绝望的努力。从更深的意义来说，它甚至是旧日的海德公园向必须成为“符合大众需要的多面手”的这位青云直上的政治家发出的一个没有希望的呼唤。差不多十二年的时间过去了，罗斯福已经从海德公园、格罗顿学校和哈佛大学的狭窄的生活圈子里走了出去，出任了各种责任重大的职务：政治家、议员、行政官吏和战时领袖。这个出身于乡绅家庭、赫德森河流域的贵族后代以平等的态度同衣着随便的劳工及戴圆顶礼帽的坦慕尼分子交往得游刃有余。难怪这位母亲不懂得她的儿子为什么要从海德公园出发，去作这么遥远的旅行。其实这种旅行在许多年前却已经开始了。

这个家庭一直被恰当地称作缩微了的政治王国，在这个王国内，一些与后来的政治生涯相关的习性已经根深蒂固地形成了。在富兰克林的童年时代他的个性中显示的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他对家庭的灵敏的接受能力，以及经过一段感到羞怯的时间后对仆人们的灵敏的接受能力。在一般情况下，他愿意和他身边居于统治地位的势力进行妥协。这不仅是由于他有适应能力，也是因为他有能力找到办法和形形色色的不和谐的集团和个人处

好关系，同时不打乱使他自己成就一番事业的微妙的平衡。在格罗顿学校，他和教师们相安无事，因此他不得不有意从“老顽固”那里招来一次惩处，借此调整平衡，以便和他的同学们保护良好的关系。在哈佛大学，他设法一方面参加一些要求严格的俱乐部的活动，另一方面又积极参与班极里的政治活动。在奥尔巴尼时，甚至在他和劳工以及对他的政治前途具有重要作用的其他集团建立密切联系的过程中，他也赢得了农业集团的支持并且将这种支持保持下去。在海军中，他和海军将领、劳工领袖、“主张建立强大海军”的人士、地方政客、威尔逊政府中的领导人物，以及对丹尼尔斯和总统抱敌对态度的人们同时保持良好的关系。

罗斯福交际广泛，而且善于应付。这一点从阶级意义上来说也是如此。他出身名门，从未放弃他的阶级联系和活动。即便在战时最繁忙的日子里，他也不惜时间和精力推荐朋友参加纽约那些限制极严的俱乐部，同达切斯县的一些望族保持来往并参加华盛顿的社交活动。他的友谊超越了党派界限。即便在亨利·卡伯特·洛奇、奥古斯塔斯·P·加德纳等共和党人起劲地攻击威尔逊和丹尼尔斯时，罗斯福仍然与他们保持友好关系。他的阶级关系对他起了巨大的作用，使他能够接近各种各样的重要人物。诚然，他的阶级关系超越了政党界限，并具有类似城市机构的权力和影响。不同之处在于：这种阶级关系是靠个人的家庭关系和社会地位结合在一起，而不是靠恩宠和提供饭碗的办法。

那个星期天夜晚，萨拉·罗斯福在海德公园产生的烦恼也许没有意义。因为，从最重要的意义来说，罗斯福从来也没有离开过家庭。不知为何，他竟然跨过了美国生活中的几乎一个横截面，不停地参加新的团体和从事新的活动，却依然保留深深埋在海德公园的根。他从父母和皮博迪那里学到的教诲和道德标准始终是他的人格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罗斯福的母亲所以看不出他深受海德公园根深蒂固的影响，就是因为他能够以表面上那种十足的自信走出家庭，进入其他社会圈子。

他既具备表层的自信——同时也有强烈的内心的自信。这种内在的自信是他在性格形成时期的另一产物。他一出生就拥有安全感，身分和地位。他具有强烈的亲属感，他“知道他是谁”。当他置身于新的环境时，他不会感到自己失去了身分，或同原来的出身切断了关系。他可以轻易地担任不同角色，因为他对自己的出身与归宿没有产生过丝毫的怀疑。在角色变化的过程中，连续性始终存在。因此，罗斯福也不需要精心炮制一种社会哲学。他与知识分子不同，他们创立一种思想，然后为了这种思想所

提供的安全感而投身其中；而他却有自己的家庭。他对这个家庭规定的朴素的道德规范、应尽的义务以及仁慈感到满足。

罗斯福后斯的政治成就举世瞩目，往往容易使他早期政治上的成就显得黯然失色。事实上，在1920年11月以前，他地位的提高就非常引人注目。他在奥尔巴尼和华盛顿时期政绩突出，引起了极大的重视。他在三十八岁时就赢得了一个主要政党的副总统候选人的提名，就连他的堂兄西奥多·罗斯福在共和党于1900年提名他为副总统候选人时，年龄还比富兰克林大四岁。

要对这一切给出一个圆满的解释，并不是难事。人们可以争辩说，他早期在事业上的成就只不过是由于一连串幸运情况造成的。如果达切斯县的民主党人在1910年不缺少一名候选人，如果1910年和1912年对于纽约州北部的民主党人来说不是好年头，假如希恩事件没有发生，那么，罗斯福仍将是纽约州一家公司的一位有相当身分的法律顾问。这种“假设”方法的破绽在于我们可以把它完全颠倒过来。如果罗斯福在关于希恩的斗争中采取另一种的手段——譬如说，如果他在坦慕尼协会和造反派之间充当调和者而不是担任后者的领袖的话，那么他在1912年、1914年或1916年很可能成为一位妥协的州长候选人。如果他赢得了州长职位，他就很可能成为政府主要官员或在战争时期取得军职，这两种身分都会使他在1920年成为争取民主党总统提名的一个主要竞争者。

这种“假设”方法不能说明问题。恰恰相反，罗斯福早期的事业只能理解为一位初出茅庐的政治人物同一种易起反应的环境之间的强大的相互作用。尽管罗斯福在1910至1920的十年间显得不愿表态，但他几乎每时每刻都密切关注着重要的机缘。如果说有时候——例如在1914年——形势对于实现他的抱负是不利的，那么大部分时间却是有利的。政治环境不仅仅是对他的抱负具有消极的接受能力；它也不仅仅是静止的舞台，它有自己的生命和力量。例如，在1910年和1920年，民主党求助于罗斯福，如同他在1914年求助于民主党。时间和地点、占优势的思潮和政治形势全都发挥了它们的作用。罗斯福生长于社会发生巨大变迁的时代，生活在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州的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地方，他利用了人们当时对党魁统治和贪污腐化的仇视，他依附于一个经过半个世纪的连续失败后十年来一直获胜的党，这样，他从一开始就居于优势的地位。

但是，罗斯福的成功并不纯粹是靠运气。他当然是走运的——他的姓名、他的家庭和阶级关系，他的相当优厚的收入，以及上述这一切赋予他

的自信都带给他好运。但以上种种因素如果不加上他本人的其他两个特性的话也还不够，这两个特性是：雄心壮志和学习能力。

他的特德叔叔作为拳击家、牛仔、军人、政治家和捕捉大猎物的猎人，具有一股拚命要出人头地的精神，相比之下，年轻的罗斯福的抱负看起来确是微不足道的。但他确有宏图壮志。而且他愈卷入竞争性的关系，他的抱负看来也变得愈大。罗斯福在踏入政界仅仅四年之后，年龄不过三十二岁时就能够试图从人口最多的一个州竞选美国参议员，这一事实很能说明他的胃口有多么大。

罗斯福的干劲在一定程度上来自他对自己能力的自知之明。他能够迅速地适应新的环境，他可以满怀自信地采取行动，但他不能够始终出类拔萃。在格罗顿学校，他既不是一个受人羡慕的运动员，也不是一个惹眼的学生。在哈佛大学，他未能被“瓷器俱乐部”接受为会员。在纽约市，他当律师也没有留下出色的成绩。当他在纽约州的政治活动中追求不切实际的目标时，他遭到了严重的挫折。在海军中，他没有成为主要人物，尤其是当他的国家和他的阶级希望它的身强力壮的年轻人参军时，他却没能穿上军装。

罗斯福在战后请求格罗顿学校把他的名字列入学校树立的世界大战纪念碑上第一部分的名单中，这个要求是荒唐的，但也很能说明问题。罗斯福显然希望得到特德叔叔在创造了“义勇骑兵团”的功绩后曾经充分享受的那种公众的赏识。战争结束后，富兰克林·罗斯福申请加入美国退伍军人协会。随着岁月飞逝，他所述的有关他的战斗经历和在海外所冒的风险的事迹愈来愈夸张，最后以致于他声称他的战争经历可能比任何人都多。

但是指引着罗斯福的抱负的是他具备一种从经验中迅速吸取教训的能力。在他早期政治生涯中有两个主要事例说明，他没有迅速向环境屈服，他从两次失败中接受了更多的政治教训。第一次是他对坦慕尼的攻击：这次攻击的直接后果是引起公众对他的注意和喝采。但付出的代价却是他入主州政府的希望遭受了危害。他的反应是与坦慕尼和解，但他的行动谨慎小心，以免使许多支持他关于政治清明的主张的人们产生反感。1920年，围绕国际联盟问题而进行争论的竞选运动是毫无希望地抵制政治现实的另一个例子。考克斯和罗斯福知道国际联盟问题是个危险性的争端，但由于各种情况混合在一起，他们主要以这一政策为基础展开竞选运动。这是一个勇敢的姿态，但去归于失败。事实上，其结果比失败还糟：竞选的失败除了由于国际联盟问题以外，实际上还有许多其他原因，但共和党人可以

把选举结果阐释为对孤立主义的拥护。

罗斯福始终牢记这些教训。他在后期的全部政治生涯表明自己特别赞赏这一原则：政治是为实现了解实现的事而奋斗的艺术。特德叔叔在格罗顿学校时曾告诫过他：一个人仅仅做到善良是不够的——他必须精明而且勇敢。他根据切身经验从马基雅维里对帝王们的忠告中学到了智慧。这个忠告是：他们有时应当英勇地采取行动，有时则应谨慎从事——他们应当有几分像狮子，又有几分像狐狸。

第二卷 权势日增

第五章 小插曲：政治家商人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一个气候温和的秋天的下午，在后来被查尔斯和玛丽·比尔德称作“正常时期的夏至”达到顶峰时，做煤炭生意的伯恩斯兄弟公司的领导人登上了“贝兰加利亚号”前往欧洲度假。他上舷梯走到半途，转身朝下，向聚集在码头上给他送行的职员们望去。他一面喊道：“伙计们，祝你们走运！”一面伸手从衣袋里掏出一把金币和银币，洒了下去。铁币落在鹅卵石上，响起了一片叮咚声。他饶有兴致地看着他的职员们争抢钱币的情景，过了一会，才转过身去，走进船舱。

路易斯·豪第二天从《先驱论坛报》上看到了报道这件事的新闻。虽然他平时一向对他的同胞们不动声色，这次却大为震动。他在给罗斯福的一封信中，愤怒地写道，成年人竟象一群饥饿的孩子扑在垃圾堆上抢东西，这正是当前商业态度的一个绝妙的素描。而且，共和党的经济哲学认为财富是从富人手里零星地慢慢转到穷人手里的，这件事正是这种哲学的一个佐证。他极力主张他的上司在将来的演说里利用这条新闻。

如果说这件事对于豪来说是正常时期的现象，那么，别人回顾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时，却有自己的记忆，回想起某些事情似乎能够成为那个十年的象征。他们可以记起的，也许是田纳西州“猿案”审判，也许是麻将牌，也许是私酿的杜松子酒，也许是蒂波特多姆，也许是孤鹰，或许是艾尔·卡彭，或是纽约州州议会把五名社会主义者当作“异端”开除出去的事件，或是1929年10月一天下午股票交易市场的股票行情自动记录器持续下跌的狂叫。历史学家回顾往事考虑到更多的基本事实——农业收入微薄而且不稳定，那十年期间组织工会的活动逐渐失去势头，犯罪现象越来越多。商业兴旺——汽车、收音机、电冰箱、化妆品和电话机产销两旺。股票不规律地上涨，利润节节攀升。广告业成了一项庞大的行业。这十年完全集中于商业经营，是一个没有人揭发贪污腐败事件的时期。

至于罗斯福，他从容不迫地适应了这十年商业时期。他变成一名商人。1920年秋天，经过他遭受的那次失败以后不久，他就出任一家规模很大的债券保证公司的副董事长。那家公司名叫马里兰信用与储蓄公司。他主管该公司纽约办事处，年薪二万五千美元（相当于他在海军的薪俸的五

倍)，同时他又回到律师业。在以后的八年中，他涉足各种各样的商业冒险活动，其中最主要的包括海外投资。罗斯福支持一家加拿大公司，那家公司买进贬值的德国马克，用这些马克去购买各种德国公司的股票，后来出手时获得了巨额利润。另一家公司对德国股票进行投资，他又买了这家公司的股票。他是联邦国际投资托拉斯的创办人之一，创办这个托拉斯是为了帮助美国投资者接受外国银行所保证的股票，以偿付美国出口商品应得的信贷结余。在所有投机买卖中，只有那笔加拿大的交易给罗斯福带来了收益。

然而，这些投资和罗斯福的其他一些投机买卖相比，却是不足一提的。一家公司在怀俄明州盲目开掘油井而导致失败，他却曾买了它的两千股股票，他又加入一项购买龙虾的计划，将龙虾囤集起来不投放市场，等待价格上涨，结果计划落空，使他损失了二万五千美元。他和欧文·D·扬等人开办了一家企业公司，经营纽约和芝加哥之间的飞艇运输业务，但不久事实证明，他们只有积极性而没有从技术上来详加考虑。罗斯福以一个老资格的鲁莽投资者的热情和想象力，构思出各种计划，如兴办一批旅游胜地的旅馆联号，计划由通用电力公司在帕萨玛科狄湾利用潮汐发电，制造自动售货机，经营商业性林业，经售出租汽车上的广告栏等等。

罗斯福的确是一个不顾一切的投机家。在当时的某些人眼中，他的所作所为似乎和他的性格背道而驰，但这显示了他本人的一个侧面，而这个侧面在他的一生事业中曾经多次展现出来。不论是作为战争时期的政府官员，作为商人还是总统，他都喜欢尝试新鲜事物，喜欢采取果断行动，喜欢以戏剧性行动来完成某件事。而且，进行冒险的尝试对他来说也不是太难。他所以能够如此，这是因为他有保证：他和埃莉诺有继承的收入以及在需要时可望从萨拉那里获得帮助。他的商业冒险与智力冒险具有某种有趣的共同之处。他能够用金钱来投机，因为他有继承的财产；他能够诞生一些投机性思路，因为他有一种模糊的但却根深蒂固的思想意识方面的遗产，可以作为依靠。

即使如此，他的许多商业活动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相对其商业色彩而言。如果说他具备投机家的果敢精神，他同时也表现了一位政治家不肯对一次选举进行孤注一掷的谨慎作风。罗斯福最后既没有受到巨大损失，也没有获得暴利，因为他很少在一笔买卖上大量投资。在马里兰信用与储蓄公司的罗斯福办公室里，政治气氛十分浓厚。这家公司的活动以经营债券业务为主，而市和州的一些政治家则掌握了大量的债券。罗斯福不仅自夸

他如何通过他在奥尔巴尼和华盛顿政界的关系把买卖弄到手，而且还指责他的同事们未能结交那些有权和他们签订合同的“大人物”。后来，他可以面无愧色地说他在这方面取得了成就。

罗斯福的商业活动中最离奇的一项就是他在二十年代初在建筑业中作为一位特权人物所担任的职务。在战争时期和战后期间，建筑商由于牟取暴利、工程质量低劣和价格昂贵而失去了公众的信任。他们建立美国建筑理事会的目的在于组成一个体系，囊括二百五十个全国性组织，其中不仅有承包商和建筑行业工人，还有建筑师和工程师，并有能力控制它的成员。建筑商还希望遏制进一步的要求，即按照反垄断法对建筑行业各协会进行直接起诉。罗斯福作为一位可敬的挂名首脑，发挥了他应有的作用。其实，他的作用不仅如此，他收集资料并制订出长远规划，以便消除这个行业中明显的季节性波动，对于这些，他都有极大的兴趣。

罗斯福在某种程度上采纳了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围绕着他的一些商人和企业创办人的政治立场。就在他在建筑业中担任职务以前，他抨击了政府的规章，说这种规章是不实用的而且耗费金钱。在另一次演讲中他指出，要使投资者避免在证券上赔钱，唯一的办法就是教育，并非保护性的立法措施。当他指责政府为商船业提供的津贴过高时，他的态度可能反映了象他自己那样的小船主对于那些从华盛顿受惠最多的大船主所持有的敌视情绪。

另一方面，罗斯福并没有全盘采纳支配商业方法的一切基本原理。有人认为，商人应该做出社会上的重要决定，政府对于商业应该绝对奉行不干预政府，并专为公众的政府是危险的，他则决不接受这些看法。即使作为一个商人，他仍然保存一个威尔逊主义者的一些特征。特别是在从事建筑业的工作时，他确实接受了关于各经济集团的利益基本上应该一致的论点以及商业应该在一定程度上实行自我协调措施的主张。这些思想在他当选总统以后还会再度表现出来。

罗斯福摒弃商业主义的一个原因是他憎恶任何形式的一概而论。他是从实际面临的问题，而不是将什么永恒的绝对论作为出发点来思考和采取行动的。另一个原因是他不能接受他的许多商业界朋友所抱的基本目标——赚钱。他对投机活动本身要比对投机盈利更感兴趣。特别重要的是，即使作为一位商人，他仍然密切注意着最重要的机会，对于他来说，这种机会就是政治。

他完全有理由这样做。因为任何人不象一位失败的副总统候选人销

声匿迹得那么快。罗斯福的境遇本来可能特别令人恼火，因为这时另一个罗斯福——小西奥多·罗斯福当上了海军部助理部长，正在视察造船厂，并接受敬礼。然而，富兰克林·罗斯福绝无悄然隐退的打算。他担任海军俱乐部的主任，纽约童子军组织的主席、瓦萨学院的理事；他为美国退伍军人协会和主教派教会对约翰大教堂筹款；他仍然积极参加哈佛大学的活动，并为纪念他的老上司的理想，而在组织伍德罗·威尔逊基金会中发挥了主要作用。

在他的整个政治生涯中，这个时期应该说不过是一个插曲。他将等待时机，他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说，一直等到“华盛顿这帮人表明他们能够成功，或者表明他们已经完全失败”。他对斯蒂芬·厄尔利说，他在未来的岁月里期待厄尔利在许多方面给予帮助——“感谢上帝，你我还都比较年轻！”但是，他的人生之路突然发生了变化。

严酷的考验

1921年的夏天对于罗斯福来说是不顺利的。共和党人按照美国的政治传统，在前任政府遗下的政治废墟中搜寻弹药。他们发现在罗得岛的纽波特发生的情况是对他们有利的事实与证据。战后各种不道德的习俗，包括酗酒、吸毒和同性恋都在当地层出不穷。罗斯福研究了这种形势并派了一个调查组去收集证据。但是调查人员自己却使用了令人发指的不正当手段。罗斯福发现这一问题后，便命令他们停止调查活动。参议院一个调查委员会的共和党成员们指责罗斯福对这些不正当手段负有直接责任，罗斯福拒绝承担责任。1921年7月，罗斯福到华盛顿去陈述自己的立场，但是未想到他还没来得及提出证据，委员会中的多数成员已经照原样公布了他们的调查报告。他觉得这是一种失信行为，因而十分恼火。他最后离开了纽约到坎波贝洛去度假，那时他显得疲惫不堪。

随后，在8月中旬阳光灿烂的一天，罗斯福在坎波贝洛海岸外乘船游弋时不慎从船上跌入海中。他感冒了，但第二天又恢复了他平时那种精力充沛的假期生活。那天，他和全家人从乘坐的小船上发现岸上森林失火了，便弃船登岸，用了几个小时终于扑灭了一场大火。然后，罗斯福马上就到附近的湖里游泳，紧接着，又小跑了一英里半路程，还在芳地湾冰冷刺骨的海水里洗了一会澡，最后又穿着湿衣服坐下来看了半小时的信。

之后他突然感到身上发冷，便上床睡觉了。第二天，他的背部和双腿疼得厉害，并且伴随着高烧不退。罗斯福夫人请来了医生，他诊断只是感冒。第二天，罗斯福就不能走路，连腿也不能动了。另一位医生——当时碰巧就

在附近的一位“诊断专家”判定，罗斯福的病是脊髓下部的一个血块引起的，后来他又改变了自己的看法，确诊为脊髓受损。罗斯福卧病两个星期以后才由另一位专家做出了正确的诊断：脊髓灰质炎（小儿麻痹症）。

在这段日子里，罗斯福大部分时间都忍受着极大的痛苦。他的膀胱和直肠括约肌瘫痪了，必须插导管。曾经一度连他的胳膊和背部也瘫痪了。他的体温极不正常，不是过高就是低于正常。他还要忍受着极度的精神恐慌，医生们的犹豫不决和他自己病情的不见好转都加深了这种情绪。在整个这段时间以及以后的好几个星期里，他都卧床不起。

在罗斯福病后的第一个月里，罗斯福夫人睡在富兰克林房里的一只长沙发椅上，日日夜夜看护着他。正如约翰·根室描述的那样，“希望与绝望相互交织；对医生不得不盲目信任，即使当医生在一筹莫展、连他们自己都不敢信任自己时也还得盲目信任他们；她想到自己肩负的重大责任；尤其是对病人本人变化莫测的情绪需要给予最坚定的、最微妙的和最温柔的照顾”——这些都是罗斯福夫人所经受的严峻考验的一部分。罗斯福的母亲萨拉·罗斯福当时正在欧洲，8月底刚回到家，就收到埃莉诺写来的一封信：“富兰克林病得很严重，因此，他星期二不能去看你，他感到很遗憾。……”

豪在夏初就到了坎波贝洛，罗斯福出事时幸好他仍在那里。他的第一个本能反应就是不要让公众知道罗斯福真实的病情及其严重程度。他向新闻界发布了隐晦的通告，他和埃莉诺告诉罗斯福的一些远亲说，罗斯福由于受凉而病倒了，但目前正在康复中。豪直到最后，当他能够引用医生的话，说这次患病绝对不会留下永久性的后遗症的时候，才透露出脊髓灰质炎这个可怕的名词。等到9月中旬，罗斯福终于可以被送往纽约了，豪安排用担架把他从汽艇上转送到一辆大行李车上，然后送上一节专用的火车车厢。而在这时候，由于豪暗渡陈仓，那些满怀希望的旁观者却等候在另外一个地方。

罗斯福在纽约长老会医院度过了六个星期。第一个星期过去后，给他治病的专家乔治·德雷泊大夫的报告里说，“罗斯福经常感到全身性疼痛，现在这种疼痛消失很慢，而且抽动肌肉的起码能力也恢复得非常缓慢，这些都使他十分关切。”他发现病人下肢的状况很不乐观。病人两只脚的脚趾略能活动，但不能伸脚。罗斯福坐不起来，只能依靠头顶上的一条带子把自己拉起来，才能在床上翻身。10月底他出院时，病历上注明：“无好转迹象。”

德雷帕大夫特别关注罗斯福的心理状况。他在报告中写道：“他有着巨大的勇气，巨大的抱负，但同时又有这种特别敏感的感情结构，所以，我们要想尽一切巧妙办法，使他既能令人放心地正视自己所面对的现实，而又不会使他的精神崩溃。”一方面由于埃莉诺和医生们的精心照料，另一方面由于罗斯福具有某种内在的力量和坚定性，因此，当精神崩溃的危险期一旦过去以后，他就变得愉快起来。

罗斯福在数年后才明白自己再也不能走路了。他永远充满了希望。在医院时，他深信自己两三个星期后就可以架着双拐出院了，不久以后，他在信中欢快地写道，他会完全康复的。在以后的岁月中他曾经多次告诉朋友们他很快就可以架着拐独立行走，最后单靠手杖的帮助就可以走路了。在他患病达六年之久时，他写信给他的一位医生说：“我的腿的情况在继续好转，”但是“我还摆脱不了左腿上的那个支架。左膝关节为什么不起作用了呢？这仍然弄不清楚。……”

罗斯福花了七年时间想尽办法来治疗自己。他在马萨诸塞州马里恩找到了一个医生，那位医生教他作一些体操活动。在四个冬天里，他都有一部分时间消磨在佛罗里达州沿海一带，乘着宽敞的游艇游弋；有时候他畅游于浅海，或者在偏僻的海滩上匍匐行进。他的重大发现是乔治亚州的温泉，那里的泉水温暖，含有充分的无机盐，使病人可以做持久的运动而不致过于疲劳或者削弱体力。他每年冬天都到温泉去，把那个地方从一个相当破落的疗养地发展为第一流的水疗中心。

关于医疗情况，如上所述。对于罗斯福这位政治家来说，患了脊髓灰质炎，意味着什么呢？

关于这个问题，一个影响很大的传言逐渐形成了。据传罗斯福的疾病把他从一个有点高傲的年轻的社会名流和业余政客变为一个具有野心、权力欲和民主信念的政治领袖。这个传奇的缘起是很明白的。罗斯福对脊髓灰质炎进行的斗争具备了现代英雄传奇的一切戏剧性情节。他昨天还“象一位希腊神话中的神一样”，顺着全国代表大会会场的走廊阔步前进，今天却象个孩子必须让人抬来抬去，或者放在轮椅上让人推来推去。他当时年仅四十岁，曾经以自己的生气和活力给大家深刻的印象，现在却要花费许多小时在地板上缓慢地移动，重新学习走路。人们从他身体状况变化的事实武断地得出了他的性格发生变化这个虚假的结论。

事实表明罗斯福的疾病不但没有改变，反而进一步加强了他的性格中已经存在或者潜在的倾向。

比如说，小儿麻痹症并没有使他在耐心方面得到什么锻炼。他在纽约州政界长期玩弄政治手段，在和地方政客打交道以及在处理关于任免权和职位问题的无穷琐事等方面，都曾经突出地表现了善于忍耐的性格。他的这场病也没有骤然间使他自己产生新的信心。他的那种对于自己在政治斗争和其他斗争中有能力取胜的信心，或者按他的政治对手的说法，他的那种“骄横”，实际上随着他的社会活动的扩大而逐渐地发展起来了。

他的政治见解没有任何根本的变化。一些人认为从病榻上起来的是一个新的人道主义者，其实他们忽略了罗斯福曾有十年信仰威尔逊的进步主义。事实上，他在病后完全和病前一样，显示自己是一个机智的政治家，密切地注意着最重要的机会，随时准备改变自己的观点以适应政治现实。他在政治倾向上所处的位置也没有改变——仍然是中间略微偏左。虽然他坚持说自己是一个坚定的自由主义者或进步主义者——他交替地使用这两个词——但也坚持说他是站在“建设性的进步”的立场上，即站在一个介乎保守的共和主义与拉弗莱特的“激进主义”及进步主义之间的立场上。在涉及诸如国际联盟和禁酒之类的问题时，他也持一种政治家的观望态度。

他的病显然是给了他一个机会，使可以想出一些主意来，但他几乎没有利用这个时机。他开始着手两项雄心勃勃的、富于理智和创造性的计划——写一部美国历史和一部分分析美国政府实际作用的书。其实这两部书，他都只写了十几页，然后便放弃了这个计划。虽然写的那几页历史明显地反映出他试图用社会经济的观点来分析历史，而与历史问题上的“伟人”论相对比，但这两部未完成之作都没有表现出任何新颖的或独创性的见解。他在漫长的恢复期间阅读了许多书，其中有一些传记和历史书，但几乎没有经济学、诗歌或者哲学书，不过无论病前还是病后，他仍最爱阅读游记和探险故事。

他是一个富于思想而不是具有犀利见解的人。他在米尔顿公学发表了一次讲演，他相当重视这次讲话，并在1926年将它作为一本书出版，并冠以一个张狂的书名《出路何在》。这次讲演表明他的思考范围相当广泛，但也只是兼容各种见解的大杂烩。无论他讲什么问题，都是粗粗涉及，如谈论科学革命，接受变化的必要性，机会均等的重要性，以及大多数人的倾向：观点进步但手段不同。所有这些主题，他都巧妙地简单涉及一下，而根本缺少一个核心思想，或者贯穿整个讲演的线索。以后他在佐治亚和纽约为报纸写的专栏文章，也表现出同样的倾向。

在这段时期，难道罗斯福作为一个政治家的前途就不曾有过一次黯淡

吗？显然，关于罗斯福的前途问题，在埃莉诺和萨拉·罗斯福之间曾引起一场纷争。他的妻子希望他继续积极从事政治活动，而他的母亲则要他隐退到海德公园的休闲环境中去。不论妻子和母亲之间的斗争变得如何激烈，但却没有多么长远的影响。罗斯福从政界隐退是绝对不可能的。如果说他和病前稍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疾病反而使他想要更加积极、更加专注地从事政治活动。他在患病将近一年时给一位好友写信说：“你的体格有点象我，你的身体需要某种更加剧烈的活动，需要在许多不同的地方同各色各样的人不断进行接触。”1924年，他脱离了1920年他协助建立的埃米特·马文和罗斯福法律事务所，主要原因是他由于对那些产业和遗嘱之类的事务“感到厌烦得要命”。他创立一个新的事务所——罗斯福和奥康纳事务所，在这里他可以直接参加积极的冒险活动的“活人”一道工作。

当然这一切并不意味着小儿麻痹症对于罗斯福和他的政治生涯没有任何影响。在肉体上他经历了一个巨变，仿佛是为他残废的双腿做出补偿似的，他的两肩和胸部变得健壮、肌肉发达。他曾经兴奋地宣称自己身体的这几部分“就连杰克·登普西看了也要忌妒的。他的残废意味着他只能乘坐轮椅或者由别人挨扶着才能移动，豪规定绝不能公共场合搀扶他，但是他的侍从人员在做这方面的工作中已经变得很内行了。他那残疾的双腿实际上已成为他的一种政治资本了。它们为他赢得了同情，否则，他就可能得不到这种同情。在以后的日子里，千百万美国人为罗斯福在公众场合露面而深受感动——为他那紧张、痛苦而笨拙地向舞台中心移动的样子，为他周围的助手和政客们的忙乱，尤其是为罗斯福容光焕发的微笑和强劲有力的手势所深深感动。

他身体方面的残疾也给了他某种优势。由于他对自己两腿的状况已经完全适应了，他就能一再地利用他的残废作为借口，来避免参加他希望回避的政治活动。这个借口使任何人也不能够加以反驳，直到1928年艾尔·史密斯成功地迫使他参加州长竞选为止。他的病积极促使了埃莉诺·罗斯福更加积极地参与政治活动，要不然，她不可能象这样参加政治活动。她参加了妇女工会同盟，并且成为了纽约州民主党妇女组织的领导。她时常把她那些民主党和工会的“女友们”带来看望她的丈夫。豪在1921年本来曾经计划去经商，但在这个危机期间和以后的日子里，也一直陪伴在他的上司的身边。

罗斯福患病的主要政治意义仅仅表现在时间方面。疾病使他的广泛的政治接触和通信只停止了几个星期，而另一方面却使他参加竞选总统的日期推

迟了几年；他要等到最大程度的完全康复后才争取当选。这可以说是一桩幸事，因为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叶对于许多民主党人来说，都是不幸的。结果，他一直拖到民主党力量的高潮即将来临的那段岁月，才重返政界。

亲爱的艾尔和弗兰克

1921年11月选举刚结束之后，在州议会竞选中获胜的民主党人收到了罗斯福的贺信。这是一个表明他并没有和政治绝缘的信号。几个月后，他便大量地参与艾尔·史密斯企图在1922年重新获取州长一职而预先策划的种种活动。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发生的事件使罗斯福和史密斯在政治上建立了紧密的关系。他们的命运最初是在希恩闹剧期间交织在一起的，当时他们处于对立的双方；史密斯是一个效忠于领导的人，罗斯福则一个反叛者。多年后，当罗斯福掌权而史密斯进行对抗的时候，他们的联盟彻底决裂。但是，从1920年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他们彼此支持对方的提名时开始，直到1928年史密斯选中罗斯福担任党内职务为止，他们这对搭档，以史密斯为主要伙伴，一直配合默契，珠联璧合。

建立这种联盟的原因是很简单的——双方的彼此需要。从地理上、宗教上和社会上来说，他们结成联盟可以满足民主党内的广泛要求。为了在选举中获胜，他们都需要对方拥有的实力。他们之间的私人关系也是亲密的，彼此都尊重对方的政治才能。新闻记者们尽管仔细地叙述了他们两人的差异：一个出身贵族，另一个是平民，一个来自纽约州北部，另一个是纽约市人，一个属于主教徒，另一个是罗马天主教徒。但他们却是宽宏大量、老于世故的人，不会强调这些差别的。从表面上看，在这一时期，他们之间的关系完美无瑕。但在这种表面现象的掩盖下，他们都是饱经沧桑、讲究实务的政治家，洞悉党内政治的阴谋权术以及变迁和发展；毋庸置疑，两个人都知道他们的友谊从本质上说是一种政治上的友谊。

在希恩事件的斗争中，艾尔的坦白给罗斯福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那次大会上，史密斯作为多数派领袖坦率地告诉反叛者们：既然他们参加党的预备会议，他们就得投预备会议候选人的票。就1918年州长选举一事而言，罗斯福对史密斯的态度有点不够坦诚。这位海军部助理部长后来坦白，他自己曾支持提名艾尔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但实际上，他和豪在这个问题上非常狡诈，不敢表态。他很可能希望史密斯在1918年的选举中失败，这样就可以为他在1920年参加选举扫清道路。然而，艾尔却获胜了。1920年，艾尔为竞选连任所作的尝试失败了，但他在纽约所获票数，

比考克斯和罗斯福加在一起还多一百万票。

虽然处在失败的境地，史密斯仍然是纽约民主党的头号人物。罗斯福已经不能反对他或者避开他了，于是他只好和他“联合”。1922年初的事件给罗斯福带来了机遇。威廉·伦道夫·赫斯特希望获得民主党州长候选人的提名，墨菲让他在代表中组织力量。史密斯不想放弃他那利润丰厚的货车运输业，但是他永远不会忘记，在他第一届任期内，这位媒体大亨曾经指责他竟然批准把有毒的牛奶发送给纽约市的儿童去饮用。到了最后时刻，史密斯才对一项草案表示赞成，而罗斯福则被选中去发出号召。之后，他们之间交换了一些措词亲切的信件，彼此的称呼是“亲爱的艾尔”和“亲爱的弗兰克”。

墨菲这时想让赫斯特竞选参议员。史密斯尽管受到极大的压力，仍然坚决地拒绝接受这位报纸出版商做他的竞选伙伴，于是赫斯特退出竞选。罗斯福可能获得参议员候选人的提名，但他觉得时机还不成熟。最终，墨菲和史密斯达成妥协，由赫斯特的门徒洛伊·科普兰竞选参议员。罗斯福为候选人名单奔波，并且任科普兰竞选委员会的名誉会长。史密斯击败了在职的州长内森·米勒，乘胜使科普兰进入参议院。

史密斯的胜利标志着他已成为竞选1924年总统的重要候选人。虽然罗斯福谨慎地和布赖恩及民主党的其他全国性领袖保持良好的关系，但他除了支持自己的这个纽约州同乡外毫无选择。但是，他非常关心的是，史密斯可能在全国范围内没有足够的影响力。他多次敦促史密斯就全国性问题的看法。但是这位州长总不想离开他的纽约州的问题。

罗斯福最为担心的事情就是史密斯会无可挽回地被打上“反对禁酒的候选人”这个印记，从而完全失去党内主张禁酒者的选票。在州长面临着批准还是否决一项禁酒法案的尴尬处境时，罗斯福写信告诉他对于他在禁酒这个该死的老问题上陷于困境，他感到非常遗憾。他接着简要地说出一个巧妙的策略，使史密斯可以既否决了这项提案，又不致于疏远两方面的势力，然后，再要求议会召开特别会议通过新的法律。史密斯拒绝了他的建议，史密斯采取了更直接的和更诚实的行动。但这种做法使他易于受到禁酒主义者的抨击。

罗斯福在1923年夏末在写给朋友的一封信中说，如果他不是还架着这副拐杖的话，他自己也会决心参加竞选的。几个月内，豪确实在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几个代表团中，为他的老板组织了一群将在第一轮投票中投赞成票的人。但这并不是重要的姿态。1924年4月底，州长公布罗斯

福将担任纽约州的史密斯竞选总统委员会主席。据说史密斯派任命罗斯福，只不过是想要用他姓，但他立刻投入工作，在代表中为州长拉选票。

这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各地的民主党人一致认为，史密斯是一位诚实的、有才干的和进步的州长。但是把他选为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却是绝对不行。三 K 党当时已经不仅是一伙穿睡袍的歹徒了，它已成为深入到州长官邸和州议会里的一股强大的黑色势力。就连那些不担心艾尔一旦胜出、白宫会受到“罗马天主教廷”控制的民主党人也不情愿把赌注押在一个罗马天主教徒、一个反对禁酒者身上。虽然如此，罗斯福着手进行工作了。通过大量的通信和复杂的情报系统，他获得了关于各州代表团中的个人和政治方面的情报。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在全国视野中详细地看到了全国代表大会上推推让让的表面工夫后面隐藏着的潮流和逆流、互相敌对的个人和派系，选举法和选举机器。他为史密斯争取到的代表虽然为数不多，却为自己的政治教育补充了一课。

史密斯试用了其他几个演讲人以后，邀请罗斯福为他发表提名演说。这是罗斯福从 1920 年以来所发表的第一次重要演说，而且他在演说时游刃有余。他发表的演说没有哗众取宠、悦耳动听的词藻，却获得了代表们的注意。他称史密斯为“政治战场上的快乐战士”。这个说法非常合适，它使那些为史密斯欢呼的人激动不已，以致演说的最后几句话都被欢呼声淹没了，马克·沙利文把这篇演说称为“高尚的言词”。沃尔特·李普曼说它是“杰出的、感人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最初有人建议罗斯福使用“快乐战士”一词时，他担心这个说法太富于浪漫了，而结果是，他过早地使用了它，而不是等到作为全篇演说高潮的末尾才予以使用。虽然如此，这次的演说使他成为公众的注意焦点，民主党人几年后对它仍记忆犹新。也许罗斯福在使用“快乐战士”这个词时，实际上是替自己歌颂；显而易见，这又是一个实例，表明他在帮助艾尔的过程中发展了自己的事业。

但是不论什么演讲，都不能对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产生影响。在麦迪逊广场花园闷热的、烟雾腾腾的会场里，一轮又一轮的投票不断进行下去，终于可以清楚地看出：无论是集中在支持史密斯的东部势力，还是集中在南部或西部的、支持麦卡杜的势力都很难获得当选所必需的三分之二多数。罗斯福参加了会议，在第一百零三轮投票中，约翰·W·戴维斯获得提名。戴维是一个马鞍制造商的孙子，曾担任英大使，英王陛下称他为“我所见过的最典型的绅士之一”。戴维斯属于相信民权的那类保守主义者，终生都是民主党人，而且是一位优秀的律师。但他是一个平凡的妥协人

物，既没有艾尔的色彩，又没有麦卡杜的威尔逊主义背景。与会代表们已经厌倦不堪，作为对进步主义转达的一个玩世不恭的姿态，他们选择无可匹敌的领袖的兄弟查尔斯·布赖恩为副总统候选人，然后便散会了。

代表大会对于民主党是一场灾难，对于史密斯是一次失败，但是对于罗斯福，却是一次个人的胜利。他那雄辩的、措词得体的演说，他使人们忽视了他的双拐的那种愉快的、骑士风度的派头，他对艾尔的耿耿忠心，再加上他对于其他派系所持的友好态度，都给民主党的普通党员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李普曼祝贺他为纽约州所作的贡献。堪萨斯城民主党党魁汤姆·彭德格斯特告诉一位他和罗斯福的共同朋友说，罗斯福的性格是他平生所遇到的人中最富有魅力的。在政治生活中得到几乎处于对立两极的两位人物的同声赞扬，对于罗斯福具有的广泛的魅力是一个莫大的褒奖。

但是他的胜利是转瞬即逝的。戴维斯的人根据政治传统在党的全国大会以后立即接管了民主党的全国领导机构，罗斯福被排挤在外。史密斯再度竞选州长，而罗斯福在州长竞选中没有起什么作用。事实上，选举前的一个月，他完全是在温泉度过的。事实充分证明他对民主党获胜希望所持的悲观态度是正确的。柯立芝以七百多万张选票的优势击败了戴维斯，共和党人在参众两院都取得了绝对多数，但在纽约州，史密斯毅然抵制了共和党的潮流。他打败了小西奥多·罗斯福。这一胜利标志着后者政治生涯的终结，并为四年后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再度出现奠定了基础。

民主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令人疲惫的争夺和 1924 年大选令人失望的结果使得民主党陷于分裂，群龙无首。罗斯福在 1924 年 12 月写道：“一定要采取行动，并且现在就要开始”，以恢复选民对民主党的信赖。但是采取什么行动呢？他在 1925 年为振兴民主党几乎独自做了努力，这次尝试对他是一次严厉的教育，使他了解到民主党内部势力的排列情况。

他早已对党的情况十分忧虑。他在 1920 年开展的竞选运动证实了他原来的怀疑：党的领导机构已不适应形势，而且尾大不掉。1921 年底，他在写给民主党全国主席科德尔·赫尔的信中便这样认为。赫尔对他的看法表示响应，但也无能为力。三年后，情况似乎更差。罗斯福说：只是两个党有执政机会。他坚持认为：共和党是保守的；“民主党才是这个国家的进步党。”1924 年进步势力处于严重的分裂状态。但是决不能对拉福莱特的党示弱；一切进步势力都应该加入民主党的行列。

对于这些情况，他是很明白的，但也仅此而已。但是，民主党是否能被变为一个工具，引用它在选举中获胜并管理国家？他认为这个党如不加

以改造，就不可能完成这一使命。民主党缺乏全国组织，使他感到惊诧。他曾厌烦地说：党的全国总部的组成不过是“在华盛顿办公大楼里共占一个房间的两位妇女”。戴维斯将全国主席的职位传给克莱姆·谢弗，当时谢弗正四处游说一些百万富翁，请求他们为民主党捐款。“还有比这更可笑的事吗？”罗斯福问道。“我们没有金钱，没有名声，什么也没有！”他要求全党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消除党内的“派系主义”和“地方主义”，做一些更有效的宣传工作，建立起更坚实的财政基础。

罗斯福精心地制订了自己的计划。他担心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将阻碍一切进行改革的努力，因为这个委员会的大部分成员都是来自各州的从事多年党的工作的老手，他们是现存机构中的旧派人物。他决定避过全国领袖们，直接向地方党的党魁，其中包括最近曾出席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们，发出呼吁。他给三千位属于这一类的党员写了一封信，呼吁他们提出如何改进党的建议，但是信中主要谈到的还是他本人对于应该采取何种措施的见解。他不拘礼仪地说：他认为大家对于某些基本事实都是赞同的。然后，他一一列举这些基本事实：党的全国组织应该更加活跃，其工作应该更加紧密地与各地组织相配合；应当加强党的宣传工作；党的领袖们应该更经常地碰面，商讨如何采取联合行动。

他的信把基层党员中多年埋藏的烦恼都挑起来了：南方党员抱怨党内的自由主义；西部党员抱怨城市党魁，东部党员抱怨布赖恩主义和反天主教势力及禁酒派势力。但是几百名回信者中的大部分人，大都按照罗斯福的暗示行事，要求实行激烈的党内改革。他们要求加强团结、改进组织、加强领导、增强纪律性、减少派系主义和地方主义，一位衣阿华州的民主党领袖气愤地说：“民主党人完全是一群混帐。”大部分人主张党应该成为或者继续作为一个自由主义的组织，但并非所有的人都持有这样的看法。

这些意见加强了罗斯福的地位，他建议召开一次小型的民主党全国会议来讨论有争议的问题和组织问题。起初，这个计划的前景是光明的。著名的民主党人，包括戴维斯、考克斯、赫尔和丹尼尔斯在内，都赞同这一计划，而且也还受到一部分公众舆论的支持。由于党内一些人怀疑这个计划是罗斯福代表史密斯或者代表他自己为取得党的领导地位而谋划的活动，所以罗斯福和豪看来必须让谢弗作为党的全国主席出面召集这次会议。但是，谢弗却不肯这样做。他说：党的主要任务是彻底精简其组织并赔还债务。罗斯福越是对谢弗施加压力，事情就变得越清楚：这位民主党全国主席是跟随那些反对改革的党的领袖的。

这些领袖是哪些人呢？罗斯福不必费多大力气就可以了解。他们是国会内的民主党党魁们。他们对如何保住自己在本州或本地区的席位的关心，远远超过他们对改革党的队伍以取得 1928 年总统选举胜利的关注。许多民主党领袖都是南方人，他们作为一党地区的代表在委员会里的资历越来越长，因而在一次又一次的选举中一成不变地当选，仍继续留任原职。虽然这些议员保持着一个国会竞选委员会，他们的团结和组织却很不足。他们真正担心的是，党在全国范围内的一致努力会危及一些议员的地位，而只有靠修改党的纲领，采取适合地方利益的立场，才能保全他们的政治生命。豪说，除非迫于地方形势的需要，否则他们是不会采取任何支持行动的。但是，他们这些人所在的地区一般都不是能够反映全国倾向或斗争的哪一类地方。民主党国会议员，对于罗斯福那项获得批准的关于仅从参众两院各邀请五、六名民主党员的计划，也是不会感到满意的。

“从全国意义来说，我们实际上根本没有领袖。”罗斯福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这是一种“难以形容的在黑暗中摸索的形势”。豪说，选择驴子作为民主党的党徽，是有预言性的，他的这一说法无疑地反映了罗斯福的当时的心情。

罗斯福在改革党的财政管理方法上也是不成功的。他对于杰西·琼斯从财力雄厚的捐助人手里筹集经费的方式感到义愤填膺。琼斯听说此事后给罗斯福写了一封信，表示感到震惊。这个得克萨斯人在信中写道：他正在把党的欠债还清，难道这还不够吗？罗斯福回信说，党的财政应依靠小捐助者支持。他曾估计如果每个有一千人的选区只捐助五美元，民主党人便可筹集五十万美元。这个建议也石沉大海，毫无音讯。

从全国来讲，民主党仍然是一个松散、缺乏领导的各州派系和各地方集团的组合。它所奉行的政策正是罗斯福最害怕的——一种机会主义的政策，或者照他所说的，是一种采取袖手旁观，等待共和党人自己犯错误的路线。党的软弱必将影响他重新进入政界的计划；而若干年以后，这种软弱性还将打击执政的民主党人和作为总统和党的领导人的罗斯福。

号召采取行动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叶，罗斯福的政治影响好像下降到了最低点。但是，在六个星期的时间内他一跃而为全国最大的一州州长，所以自然变成最有可能成为总统的一位人物。最突出的并不是这一成功本身，而是达到这一成功的手段。罗斯福政治命运的突变，最初主要倒不在于罗斯福本身的行动，而是他的党发出的号召。

他的党在 1925 年的改革努力的失败，使得他自己和民主党一样，在政治上变得软弱无力。他在党内毫无地位——他现在只是一个失败的副总统候选人——一些反对史密斯的民主党人觉得，整个改革计划不过是一个阴谋，旨在于促使“快乐战士”在 1928 年成为候选人。事实上，如果说这项计划是为了促进某一个民主党人的利益的话，那么这就是罗斯福本人的私利。

他在纽约州内的立场是尴尬的。在 1924 年大选以后，有一段时间他公开表示对各民主党候选人持中立态度。他写道：“所有想当总统的个人都该死！”但是，史密斯在 1926 年第四次夺得了州长职位，这使他在纽约州的权力和在民主党总统竞选中的力量都得到了巩固。在 1928 年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以前的一段时间，罗斯福替史密斯进行竞选活动，甚至在中西部度过了两个星期，试图把代表组织起来。

在政治上他靠近史密斯，但又不是核心集团的成员，那个集团在一个富有的曼哈顿承包商的楼顶房屋那间著名的“虎室”里，和他们的领导人进行无休止的讨论。在这段时间——实际上在 1913 年至 1928 年的全部时间里，罗斯福除了担任一个不拿薪水的塔考尼克州立公园委员会主席的职务以外，在纽约州没有任何公职。

美国的政治家们为了保住权力，即使在其他位置上已被赶出政界，也要在党或政府的某个位置上留下一个立足点。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罗斯福在二十世纪二年代在他家乡达切斯县民主党内的影响削弱了。它的原因之一是他长期不在海德公园。他试图打碎老“县政府帮”对党的支配，但是毫无办法。到 1928 年，他几乎对这达切斯县民主党组织不抱什么希望了。他抱怨说：“由于财务上的原因，地方的民主党领袖们和共和党人发生密切联系的，大有人在。”

鉴于上述一切原因，对于罗斯福持续不衰的政治声望又如何解释呢？他的声望是如此之高，以至纽约州的民主党领袖们希望他能接受提名，作为 1926 年美国参议员候选人，并且在两年以后选派他竞选州长。

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在这一时期内他仍继续积极从事政治活动。他写了几千封信——向当选的民主党人的表示庆贺，向落选者表示同情，至于从他在参议院和海军工作时起在纽约州和全国各地所结识的朋友们，他也写信询问他们的近况，向他们提出各种建议。如果经过华盛顿，他一定要去拜见民主党的国会议员们。就连在南方，他也设法结交政治友情：在佛罗里达州，他邀请劳联的官员们到他的豪华游艇上做客，在迈阿密拜访布赖恩（在布赖

恩于1925年去世以前)，在温泉和南方政治领袖进行商谈。

他在党的有争议的问题上所持的立场在政治上帮助了他。他在温和的自由主义党内是一个温和的自由主义者。他相信党应该信奉“踩着油门的进步主义”而不应该奉行“踩着刹车的保守主义”。对于林林种种的国际与国内的问题，诸如战争债务、银行业务、自然资源保护、一党报刊、密西西比河洪水控制等问题，他都密切关心并发表富有创见的评论。对于象禁酒一类的敏感问题，他采取中间立场，而不苟同党内的两种极端意见。在一次纽约州的党代表大会上，他发表了拥戴史密斯的主要讲话，在涉及禁酒问题时他讲话象踩钢丝一样巧妙得体，甚至赢得丹尼尔·史密斯这位禁酒主义者的赞美：“我觉得你只是洗了一个小澡就神采奕奕地出来了。从这次讲话以后，谁也不会再把你叫做艾·史密斯那样的浸礼会教徒了；人们会认为你不是浸在水里而是把水撒在身上或者倒在身上的。……”

1926年，罗斯福很容易就拒绝了参议员候选人的提名。他在温泉的疗养刚刚开始，他希望今后几年自己的健康状况能迅速改善。而且他感到自己天生不是作参议员的料。最重要的是他对自己事业的考虑：如果他竞选参议员失败，累计起来，他就有连续失败三次的记录。而倘若他竞选成功，则他又必须要在参议院内表明他的立场，这就会招致本来四分五裂的民主党内另一派别的记恨。

但是，到了1928年，形势就全然不同了。这一年，史密斯以绝对优势进入了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罗斯福在一次演说中再度提名这位州长为候选人。在起草这篇演讲稿时，他特别考虑到以电台听众为对象。这是讲话值得注意的主要原因。罗斯福已经预感到这个新的宣传媒介对于未来的政治生活具有的意义。他在休斯顿有效地使用了这一媒介。《纽约时报》评论这次演讲是同类演讲的一个典范——表达清晰，毫不矫揉造作，没有浮夸之词。”他还在议会里担任史密斯的助选员，但是竞选工作主要还是掌握在史密斯亲密的同僚们手里。就这次民主党全国大会来说，情况相当顺利。史密斯在第一轮唱票时，就轻而易举地获得了提名。

史密斯知道罗斯福在商业界的联系，请他组织商业界人士和从事各种专业的人们参加竞选运动，并且，埃莉诺·罗斯福在纽约州民主党事务中日益起到积极的作用，她协助管理妇女行动局。罗斯福并没有十分积极地参加竞选运动，一般是由豪作为他呆在总部的代表。事实上，罗斯福对竞选的安排感到不快。他反对史密斯选择约翰·J·拉斯科布出任全国竞选委员会主席，因为拉斯科布是一个反对禁酒者、天主教徒和富有的通用汽车

公司董事——罗斯福担心这些因素只会在信奉新教的南方和有进步主义倾向的西部使得本已强烈的反史密斯情绪进一步激化。

7月底，他在给一位密友范·李尔·布莱克的信中写道：史密斯是已经破釜沉舟了。他本人要起到一个老政治家的特殊作用，就是不在总部里当应声虫。他觉得史密斯的副手们正在把他从最高一级竞选会议中排挤出去。他很不满意宣传方案。那是史密斯的一个下属在通用汽车公司的宣传专家们帮助下设计出来的。“换句话说，你我在现在的境遇之下，很难有机会积极地进行工作，但是从长期来说，我们的地位将会更为有利。……”

罗斯福所说的“从长久来说”究竟是什么意思？这个词可能为我们提供了某些线索，以便在不久以后产生的混乱形势下了解他的动机。

9月中旬，罗斯福到温泉去了，他在离开纽约前就知道民主党的领袖们准备让他竞选州长；史密斯已经向他提出了这个建议。罗斯福为什么不情愿呢？首先是由于他的健康情况。在温泉曾经有过一个短暂的令人兴奋的时刻：他居然能不用手杖走了几步路。他认为再在温泉住上两年，就可以完全不依靠手杖了。当然，这并不包括支架。当时他必然已经承认自己需要永远佩戴支架了。同时他对温泉经营的成功与否也很关心，他在那里有大笔投资。

但是，他不愿意竞选州长主要还是出于一个政治家的动机。他很长时间以来就对民主党在1928年大选中获胜的机率持悲观态度，而在民主党全国大会以后，他的希望也没有增加。国家经济繁荣；胡佛是共和党的一个有竞争力的候选人；竞选运动越发展，史密斯作为天主教徒和反对禁酒者的短处就变得越明显。在1928年参加竞选，就意味着有可能跟史密斯同归于尽；可是史密斯一旦失败了呢？各种可能的前景就都自然展现出来了。

9月底，纽约州民主党代表大会在罗彻斯特召开。史密斯和他的副手们，以焦急的心态对竞选州长的前景做了仔细的分析。史密斯在多大程度上想让罗斯福竞选，这一点是不清楚的。大部分压力来自州领导人，他们担心艾尔退出以后，共和党会重新控制奥尔巴尼。豪坚决反对他的上司参加1928年的竞选，他给罗斯福打电报说，真正需要他的人只是公务员。他告诫罗斯福说：“警惕图谋害人者的礼物。”

不管他自己的立场如何，史密斯带头对罗斯福施加压力。代表大会召开的第一天，罗斯福躲藏起来，不见任何人，但是史密斯最后用电话和他联系上了。这位州长都一一驳斥罗斯福的反对意见，拉斯科布愿意帮助他向温泉提供资金。州长的职务也不致繁重到能够妨碍他的康复计划。总而

言之，党需要他，党要选派他作候选人。

显而易见，这最后一个论据打动了罗斯福。他在政治方面的长远前途显然压倒了他在这个问题上的个人选择。史密斯和其他领导人这样坚持要求他参加竞选，如果他一再推迟，就会显得这是一种不忠的行为。这种做法本身就会使党内对罗斯福产生一种怨恨情绪，从而危及他的前途。

史密斯好象对他的这个弱点有所察觉。如果党代表大会提名罗斯福为候选人，他就不会拒绝了。

罗斯福犹豫不决。这种形势是他所无法控制的。史密斯看到了自己的有利地位，于是挂上电话了。1928年10月2日，罗彻斯特民主党代表大会提名罗斯福为纽约州州长候选人。就这样，罗斯福悖弃了自己的愿望和豪的忠告，在他的妻子犹豫不决的情况下，朝着总统宝座迈出了第一步。具有深远意义的是，他的重返政界和他十八年前初次踏入政界一样，主要是为了响应他的党给他的指示。

大会以鼓掌欢呼一致通过了对罗斯福的提名。当消息传到温泉的时候，罗斯福所住的小别墅里不是充满胜利的高兴，而是忧伤的感觉。豪发来一封措词微怒的电报：请找出你在参加参议员预选会时我发去的电报，作为我对你的祝贺。豪是在提醒他的上司不要忘记1914年和杰拉尔德竞选时失败的教训。过了不久就传来了罗斯福愉快的声音：“好啦，既然我除了参加州长竞选以外毫无选择，我们大家都不必为这事愁眉苦脸呢。”

共和党人立即做出的判断是：他们认为下肢残废的罗斯福成了史密斯想当总统的野心的牺牲品。一家报纸说民主党这种强制的做法是无情的，令人可怜的。史密斯迎头反击了这种攻击。他说：“我们选州长，不是看他能不能连续做两个后滚翻，或是翻一个跟头。州长的工作是脑力劳动。”罗斯福的回答更谨慎一些。他声明自己并不是被迫着参加竞选的，史密斯一直愿意尊重他不愿竞选的立场。他说他被提名候选人是因为党的领袖们在集会时一致坚持这样的看法：由于他经常表示信赖史密斯州长的政策，因此，提名他为本党候选人，是一个最好的保证，使选民们相信原来的政策将继续下去。但是，罗斯福感到对这些攻击的最好反击就是在全纽约州进行强有力的竞选活动。

两党的候选人名单都反映出纽约州是一个各种族融合的地方。罗斯福的共和党对手艾尔伯特·奥廷格是一位优秀出的犹太人、一位有经验的政治家，他曾经担任州检察长的职务，尽管史密斯担任州长。和罗斯福一起竞选副州长的是赫伯特·莱曼。他也是犹太人，是一家赚钱的私人金融财团的老板，在

史密斯参加竞选时期曾经大力捐助。参议员科普兰在争取连任。

罗斯福已经有了一个核心班子，以后将跟随他进入白宫。由于他知道自己对当前州内问题的了解有限，他请他的竞选事务总管和民主党议会领袖莫里斯·布洛克物色一名助手。布洛克推荐了，塞缪尔·I·罗森曼他是位年轻的前州议员。以前他曾在立法委员会里呆了三年。罗斯福在纽约市的竞选总部由詹姆斯·A·法利负责。法利是一个承包商、州职业拳击队管理人。他最近被任命为州民主党委员会秘书。布朗克斯区骚乱不安的民主党党魁爱德华·J·弗林在纽约帮罗斯福开展工作。豪很快就克制了自己的气愤，把一切事情都管理起来。他的主要职责之一是为罗斯福建立起几个“独立的”委员会，以迎合各个群体如商人及专业人员的需要。

罗森曼费劲地拖着箱子，里面装满红色马尼拉纸信封，上面工工整整地印着“劳工”、“税收”以及州的其他的问题等字样。他在霍伯肯渡口会晤了罗斯福，他们一群人开始在纽约州各地进行一次巡回竞选活动，行程一千三百英里。当时是10月中旬，距离选举时间只有三个星期。罗森曼听到过许多谣言，说罗斯福是个花花公子，软弱无能等等。罗森曼后来评价说：“但是，他那宽大的下颚、向上翘的下巴、奕奕有神的敏锐目光以及一双坚强有力的手”，却没有一样和传说的情况相符。

罗斯福有三天时间没有理会罗森曼。很奇怪，这次竞选运动仿佛是毫无计划似的。最开始，罗斯福把注意力过份集中在国内问题，以至布洛克给罗森曼发来这样一封电报：转告候选人他是在竞选州长而不是总统。……但罗斯福却没有行动自由。他必须在史密斯作为州长的政绩基础上进行竞选活动——史密斯的政绩很好，但它却使罗斯福无法公开大胆的新计划。而且，他还必须在纽约州以及全国其他地方进行竞选活动，这些地方存在着严重的反天主教和反爱尔兰人的偏见。

他在第一次主要演讲中就对这种顽固的偏见加以批评。他这次演讲是在一个名叫宾厄姆顿的城市发表的，该地在本世纪初曾经是三K党的一个根据地。他谈到他在佐治亚州见到的铅印传单，上面说如果史密斯当选总统，新教教徒的婚姻就变为非法，而他们的孩子也就成为私生子了。他说：“是啊，你们也许会发笑。”但这确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我相信教育在我国大大普及的一天迟早总会到来——这里我要顺便说一句：我们纽约州从来没有一位州长比艾尔弗雷德·E·史密斯为教育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等到那一天，在我们州以及其他各州，在城市、乡村及农庄、在偏僻的小路和崇山峻岭之间，教育会变得非常普及，非常纯洁，那样具有美国

风格，等到那一天，象在总统竞选中笼罩在我们头上的那种污秽不堪的氛围就将不存在了。”

连续两天，那辆载着竞选队伍的列车在宾夕法尼亚的铁路以北，嘎嘎地穿过处于农业区的各县梯田。在詹姆斯顿，罗斯福对州竞选纲领上写的要任命一个委员会研究农业税和分配问题的主张表示赞同，但是他的讲话明显超出了竞选纲领的限度。他说他想看到农民和他们的家属每年年终的劳动收入，不低于在美国任何一家大企业最优越的条件下熟练工人的收入。在1928年，这是一种“平等”的过渡说法——比罗斯福可能认识到的还要更极端化。

当他到达布法罗时，他就利用罗森曼的那些内容丰富的信封，其中装着有关州立法的实际情况。他向罗森曼显示了如何把一堆枯燥的事实变为一篇政治讲话——如何使这样一篇讲话闪烁着智慧和幽默的火花，如何把统计数字变成连珠炮似的责问，而又不让人感觉出你在运用统计数字，如何使有关细节的细密陈述围绕着富有戏剧性的主题。罗斯福这时还没有成为他以后变成的那种杰出的演说家。他的许多次演讲都有即席之作的味道，缺乏核心思想。他反复提到奥廷加的名字，这是一个错误。另一方面，他了解并且使用了一些手段，比如攻击共和党领导——特别是州立法机构的共和党领袖们——而不攻击全体共和党人。总的说来，无论是从他那活泼的带着善意的口气，还是从他那对敌人的空口许愿和颠倒是非所表示的愤慨，他的讲话都迎得了选民的好感。

由于罗斯福想要密切地接触选民，他在西部各县从事竞选活动时改乘了汽车。他从纽约州中部的莫霍克峡谷乘车，经过长途跋涉到达奥尔巴尼地区，最后来到纽约市。两辆大旅行车跟在后面，一辆车上坐着新闻记者，另一辆坐着速记员、油印员和他们的设备。坐汽车旅行，可以使罗斯福在十字路口和选民们握手。在大厅里发表讲话是有障碍的。有时候，罗斯福必须被别人从太平梯或后楼梯抬上去。弗朗西斯·帕金斯有一次看见罗斯福这样被人抬入会场时，她了解到他已经承认了自己在身体上需要别人帮助了。这是一种最谦卑的行为，而他微笑地表示接受。“他从这个危险的、让人不愉快的、令人屈辱的入场口上来，而他的态度却是愉快的，彬彬有礼而又充满热情。他靠着自己的支架站起身来，把支架调好，伸直了身体，整理一下头发，然后用胳膊挽住他儿子吉姆的胳膊，走到台上去，好象这一切都是极正常的事情似的。”

罗斯福喜欢向他的听众讲述他的紧张的竞选运动——如他在一天内发

表了七次演讲，顺道访问了许多地方，被人“绑架”去作计划外的社交。“对于这个可怜的病人，太过分了吧，是不是？”

巴塔维亚、罗彻斯特、卡南德瓜、锡拉丘兹——车队在一片绚丽的秋色中穿过田野，蜿蜒前进。在罗彻斯特，这位候选人号召实行大规模的州卫生计划，实施条件比较优厚的老年退休金法，废除州的过时的济贫法。在距圣劳伦斯河通向安大略湖的出口处一百英里的地方的锡拉丘兹，他声称人民希望有“他们的”电站——正象那条河上的朗苏特湍滩电站那样——由州的电力管理局，而不是由私营公司来经营。在尤蒂卡这个禁酒情绪高涨的地方，他明确表示反对“小禁酒法案”，而根据这个法案，纽约州将和全国一起实行禁酒——这一立场使他几乎和史密斯同样反对禁酒了。回到曼哈顿后，他在演讲中作出承诺说，民主党人将制订“真正的四十八小时法”。在布朗克斯，他提出了一个野心勃勃的司法改革方案。在扬斯克，他以不屑的口吻提到一家重要报纸特载一篇题为《胡佛有人性吗？》的文章。他宣称，关于艾尔·史密斯，就连最善于幻想的人也不能提出同样的问题。

罗斯福的竞选活动为他自己毋庸置疑地争取到了选票了，但是，这个因素可能并不比暗藏在表面事件背后的其他因素更为重更。奥廷格在伊利县被共和党的一个派系击败，而且输得很惨。在纽约市，有人暗地里说他不是个“好犹太人”。这位候选人只得公开声明他是“在犹太教中心教堂被施以坚信礼的”。然而真正遭到抛弃的却是史密斯。成千上万的过去曾投票选他任州长的纽约人。这次，他们都没有支持他竞选总统。他的鲍厄里派头，他通过他称之为“收音机”（radio）的那种刺耳的回声，他佩着色泽鲜艳的手帕的华丽衣着——所有这些都和他们心目中应该入主白宫的人物里不相符的。

选举日前夕，史密斯和罗斯福闷闷不乐地在纽约的一个美军后备队训练场所等待选举结果报告。到了午夜，情况已十分清楚：史密斯在纽约和全国均告失败。据说艾尔曾说：“嗯，一个人能在白宫里数念珠，进行祷告的时机还未到来呢。”各州长候选人的票数很接近，选举结果报告迟迟未到。罗斯福和弗林了解纽约州北部共和党某些选举官员的手段，那些人一向扣压选举结果报告，直到他们可以估计他们党的需要才会公布。所以，他们两人打电话警告纽约州北部的行政司法长官，“由一百名律师组成的一个班子”次日一早就出发，前去调查选举中的舞弊行为。这在一定程度上是进行恐吓，但可能起了作用。罗斯福遂即就入睡。次晨，弗林报

告他获得了胜利。最后的选举结果报告是，罗斯福得 2, 130, 193 票，奥廷加得 2, 104, 629 票，票数差为 25, 564 票。

这对罗斯福来说是微弱的险胜，而对史密斯来说，则是他在自己州内的一次具有讽刺意味的惨败。前者在纽约州北部比后者领先 73, 000 票，但在纽约市仅以 33, 000 票落后于后者。这样，罗斯福在纽约州北部培植力量的同时，也和坦慕尼协会保持友好关系这一策略似已得到了回报。总的来看，罗斯福在派系斗争和党内人事更迭的大舞台上比较没有遭受多大损失就登上了政治舞台。即使如此，罗斯福的表演并未给人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他在选举中落后于莱曼和科普兰。这两个人得到了赫斯特的支持，而赫斯特是公开反对罗斯福的。

共和党人不仅依靠宗教问题，而且也凭借繁荣问题，赢得了竞选总统的胜利。选举后的第二天，华尔街的一次“胜利暴涨”把股票行情抬高至截至当时为止的第二个最高潮。

第六章 奥尔巴尼的实习生涯

1929 年元旦，罗斯福在盛大壮观的就职仪式上和礼炮轰鸣声中宣誓就任纽约州州长。一群显要人物在奥尔巴尼张灯结彩的议会大厅内观礼。艾尔·史密斯在告别演说中回顾了纽约州从他最初到奥尔巴尼到今天的二十五年间所取得的进步。随后，他转过身去，抬头看了看他身旁的罗斯福。

“弗兰克，我祝贺你，”史密斯真挚地说。“我希望你能用你聪明的头脑来解决纽约州的问题。”

罗斯福相应地致了答词。他在就职演说中一开头就说，这一天之所以具有重要意义，与其说是在于新州长的就职，不如说是更多地表现在原任州长的离职。他盛赞了史密斯对于纽约州的事务所进行的“明智的、有成效的和光荣的”治理。这位新州长处理问题很有巧妙，把过去的成就归功于史密斯，同时也提出今后的巨大任务。“保证农民能享有更多的生活乐趣；保护工厂里辛勤劳动的人们，并保证他们获得合理的工资，同时不受他们所从事的行业的伤害；对于他们在为我们工作期间遭受的危害，应当以足够的保险措施进行补偿；向他们的孩子们更大地敞开受教育的大门；帮助残废者和病人；对于那些掠夺他们同胞的恶人必须严厉地绳之以法；并且，要对那些做坏事的人理智地伸出同情与援助之手，帮助他们改邪归正——所有这些伟大的目标在我们这个州比在美国其他任何州都更加充分地得到了实现。我们仅仅开始走上征途，前程还很广阔。然而，就在过去

的六年期间，本州人民已经对一些人表示了不耐烦情绪。这些人试图把这些目标当作政治皮球来踢，或者设法使用盲目的、不明智的阻挠手段，企图妨碍进步的征程。……”

任职典礼象征着这两位政治家紧密交织的事业关系的一个转折点。在1928年这次意义重大的选举以前，他们之间的关系是这样组合的：史密斯为主要伙伴，罗斯福则是副手，每个人都因为对方力量的加强而壮大了自己的政治实力。罗斯福比史密斯小八岁。如果史密斯在1928年成为总统，那么，罗斯福作为州长或内阁成员，八年后，即1936年，将可能成为民主党提名的总统候选人。而豪在很久以前就计划要在这一年夺取白宫了。

但正如刚才所展示的那样，两人之间的政治联系被纽约州的一小部分人打断。这些人在1928年投票支持罗斯福，但却反对史密斯。罗斯福成了纽约州政界的核心人物，而史密斯则成了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挂名的首脑。而且，和所有被击败的总统候选人一样，无职无权，也没有头衔。

新的形势充满了发生误会的可能性。史密斯曾经说服罗斯福参加竞选，因此，可以理所当然地承认，罗斯福欠了他的人情。罗斯福也可以无可非议地认为，他曾在纽约州北部地区为“快乐战士”的竞选出过力，因而也偿还了史密斯的情。许多纽约人投票支持罗斯福，而没有投史密斯的票。这使史密斯感到非常失望。这位新州长曾经表示他完全拥护史密斯的事业，从而削弱了这种支持。这也是事实。最后，史密斯不仅想在州政府事务方面继续发挥作用。而且认为罗斯福需要——事实上是希望得到——他的帮助。他不认为罗斯福自己完全有能力接管新职务，而且急切地希望单枪匹马地干起来。

两人身边的工作班子使这种形势加剧了。史密斯希望罗斯福能让他的州政府各个部门的负责人留任，而这位新州长也的确留用了许多人。但是，关于他周围的工作人员，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贝尔·莫斯科维兹曾以熟练的才干和热情为史密斯工作，可是罗斯福并未将她留用。他也没有让史密斯的另外一名亲信官员罗伯特·摩西继续担任州政府秘书，却让布朗克斯的弗林接管。法利接管了州的党务工作。罗森曼出任了州长顾问。豪负责管理他的上司在纽约市的利益。一个新的核心班子代替了另一个。它全心全意、忠心耿耿、野心勃勃地为他们的上司服务。

史密斯和罗斯福没有公开决裂，只是关系愈来愈紧张，矛盾愈来愈多，当更重大的问题发生危机时，冲突会达到高潮。

对于罗斯福能否独立地承担起州长重担的疑虑，很快就烟消云散了。

首先，担子并不过分沉重。史密斯留下了一个工作效率很高的州政府。他没有遗留任何需要采取剧烈行动或进行彻夜会议的紧迫问题。再者，罗斯福能够既完成州长职责，又不过多地改变他的生活方式。冬季在奥尔巴尼住三、四个月，4月和5月去温泉，夏天在奥尔巴尼度过，偶尔到海德公园打发漫长的周末，或者到州内外旅行，待到深秋，再去温泉住几个星期，去海德公园过圣诞节，然后又回到奥尔巴尼。这就是他在担任州长的年月里的生活节奏。

罗斯福在所有这些地方都在处理繁忙而愉快的事务中生活，政治生活与家庭生活十分和谐地交融在一起。他的四个儿子和他们的朋友从学校或大学回到那幢古老而难看的州长官邸，或海德公园的公寓后，到处就充满了叽叽呱呱的谈笑声。埃莉诺·罗斯福仍然积极地参与民主党事务和教育工作。她时常邀请形形色色的朋友和同事到家里来就餐。秘书们忙进忙出。海德公园的来访者对于全家在阳台上闲坐的一幅画——帕金斯说象柯里和艾夫斯公司的一幅版画——印象极深：萨拉坐在柳条椅上看书，埃莉诺在织衣，罗斯福膝上放着一本没有打开的书，眺望展现在眼前的南面的赫德森河。有时甚至萨拉也卷进了政治活动的圈子。她招待罗斯福的政治伙伴们，提醒他不要忘记老朋友的结婚纪念日和生日。

罗斯福以温和的态度，老练的政治手腕在政治、家庭和州长事务这三个同心圈内开展活动。一位名叫欧内斯特·K·林德利的年轻记者和奥尔巴尼的州长家庭交往密切。他不能忘却他在州长官邸目睹的一个场景：

“茶具拿走了。……罗斯福的一名秘书从议会大厦到来，拿着两只公文包，里面装满了当天上午口授的信件。罗斯福看过以后签字，偶然作一些修改，便把这些信放在一边，需要重新打字。他一边看信，一边详细地回答问题。那天是圣·瓦伦丁节。

隔壁是餐厅，外面的窗帘拉上了。人们可以想象里面正在装饰餐桌，准备招待州长办公室人员晚宴。豪遇到这样的场合，总充当一个恶魔似的主持人，整个下午都忙着摆弄硬板纸、剪刀和各色颜料，制做适合每位客人特色、放在餐桌中央的幽默怪诞的装饰品和圣·瓦伦丁节贺年卡。透过帘幕不时传来尖细的笑声。人们听到餐厅里有个人说，豪的杰作是送给罗斯福的一张特别有趣的圣·瓦伦丁节贺年卡。罗斯福抬头看了一眼，会心地笑了笑，然后又继续完成批阅信件和答复问题的双重任务。罗斯福夫人悄悄地走了进来，递给他一张上面画着一个人头的纸片，低声说他得给豪画一张贺年卡。他暂时放下手中的信件，迅速地勾画了一个滑稽人像，身

穿睡袍，手拿蜡烛，最后一笔又加上了一顶睡帽，他还在画下面注词，使他们两人放声大笑。罗斯福夫人走了出去，他又开始工作，用了几分钟时间完成了，准备上楼更衣去吃晚饭。正在这时，又来了一位客人，是一位举止庄重的州政府部门负责人。

“州长说，‘到楼上来和我谈谈’。他们一边朝着餐厅走去，一边严肃地谈话。到了餐厅的入口处，罗斯福转身走开一会儿，把帘幕拉开，得意洋洋地大声喊道：‘我都看见了。’回答他的是餐厅里的一片尖叫声和喧哗声。他回转身面对来客，一边继续交谈，一边走进电梯。”

纽约州的政治生涯

罗斯福将要主持四年工作的这个州是担任全国性领导工作的试验场。六位总统曾从这里关键的政治生涯中取得了资历：万·伯伦、菲尔莫尔、阿瑟·克利夫兰、还有两个罗斯福。另外一些纽约州人曾是著名的总统候选人：格里利、蒂尔登、休斯、史密斯、杜威。还有一些人他们也曾任在内阁和国会中担任全国性的领导职务。如鲁特、斯汀生、瓦格纳、莱曼、哈里曼、杜勒斯等。

纽约州之所以这样突出，有几个原因。首先，纽约州是个大州——人口众多，工业、金融、商业和农业的规模都很庞大，而且其面积在东部也是最大的。纽约州拥有类似美国本身那样的力量和威严。纽约市是全国的，并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全世界的金融、商业、艺术和知识中心。一位政治家曾说，它的多语种的市民与其说象个大熔炉，不如说是象一只沸腾的煮锅。纽约州顺着三个新英格兰州向北延伸，境内有连绵的山脉，肥沃的土地，以及漫长的峡谷，一直延伸到圣劳伦斯河。向西伸出的“半岛”是一个独立的小型亚文化群，它有象布法罗和罗彻斯特这种重要的工业和运输中心，还有六七所学院和大学，还有其有力的政治传统。

一个政治家如果想在纽约州获得州长职位，必须讨好形形色色的集团，它们就象全国的各种集团那样五花八门。不仅纽约市象它的历届市长所吹捧的那样，拥有比“都柏林更多的爱尔兰人，比罗马更多的意大利人，比雅典更多的希腊人”，而且，即便象布法罗那样的北部城市也有几十个不同民族形成的集团。一些由犹太人和天主教徒组成的许多少数群体有优良的组织，农民、工人和商人等主要的经济集团也是如此。

在这片富裕的和多样化的土地上争夺政权的斗争，促成了一个健全的两党制。两党间的激烈斗争把本地的政治家塑造成全国性的领袖人物。在本世纪，无论从党的组织工作的彻底性或党的领导的活力来说，纽约州在

各州中都是最好的。每个党从范围上讲几乎遍及全州，其基础是县委员会的委员，他们遍布全州九千个区中。每个党结构上都有一个金字塔式的形式，每一层都有许多党委员会，从基层的选区、区和城市委员会开始，逐级向上，通过州境内的选区，一直到最高层的州的党委员会，而组成这些委员会的宗旨在于夺取选任的职位。事实上，每个党都是由州的官员和城乡的党魁们所组成的小型、时常变动的联盟来领导的。

纽约州内的党派斗争往往被说成是纽约市的民主党人和纽约州北部的共和党人之间的战斗。然而，这种说法未免把情况过分简单化了。共和党在纽约市的昆斯和里士满占微弱多数，但在日益扩张的郊区却占绝对多数。民主党在横贯纽约州中部、从特罗伊到布法罗的工业地带拥有坚固的努力。诚然，“谁得到什么，何时得到，如何得到”的政治争论点有时确实会生成纽约市和州的其他地区之间的鲜明的激烈斗争。纽约市人口占全州人口一半以上，它通常缴纳的税款额大约超过全州每年税款额的四分之三，而从州所获的返还不过二分之一。再者，州对市拥有主权，而从法律上讲，市只是州的手段而已。党魁乔治·华盛顿·普伦基特灰心地声称：“纽约市是乡下佬的馅饼。”

纽约市虽然在选票数上占多数，却不能控制州政府，这是因为按照历史悠久的美国模式建立起来的议会代表制是以牺牲城市的利益为代价而把代表权授予乡村的。很久以前，州内六十二个县中的每一个县（两个人口稀少的县除外），都可以保证，在众议院中至少占有一个席位，而众议院的席位“永远”固定为一百五十个。这样一来，纽约市就成了少数。参议院的代表制也是对城市实行控制的，因而，纽约州政治舞台上的竞争就成为州长和立法者之间的激烈斗争。纽约州的议会被称为“根据宪法是共和党的”。民主党人在本世纪只有两次在参众两院中占多数，但他们却有十二次获得了州长宝座。一个民主党州长，由以城市为基础的多数选出后，必须对付对于农村和小城镇的压力有迅速反应的参众两院。

罗斯福于1929年就任州长时，这些因素全部存在。他主要是由城市选民选出的，却要同共和党控制的立法机构相斗争。罗斯福曾保证要立刻地应对工业主义和都市化所带来的弊端，因此，不得不对付代表远离现代紧张生活的乡村的人们。既然罗斯福气质如此，议员们又有权而高傲，那么两种势力之间的冲突肯定是不可避免的了。

罗斯福在就职演说中说过，他希望他所领导的州政府将标志着一个“富于美好感情的时代”。他保证不让州的事务卷入党派的政治斗争，同时

他也不会因为他和议员们在取得协议的事务上有所成绩而过份地邀功。这个保证只不过是一种姿态。不到两个星期以前，罗斯福还曾写信给威廉·詹宁斯·布赖恩夫人说：“埃莉诺和我已经为今后度过两年紧张的日子而做好了准备。我猜想将成为共和党全部力量的攻击目标。但是，如你所知，在好斗这一点上，我有点象我亲爱的朋友布赖恩先生。”政府事务和党派斗争是不可分离的；政治家办成了选民喜爱的事来邀功请赏，而对选民所憎恶的事情则推卸责任，这就是他们争取选票的方式。史密斯曾经越固权的共和党议员们直接向选民呼吁，从而使他获得了雄厚的政治资本。

既然促使罗斯福和立法机构分裂的因素已经存在，美好感情的时代就不能持久，事实上，也没有持久。1929年4月，关于州长与议会控制预算的权力问题，就忽然引起了一场激烈的争吵，终于使这一时代结束。

问题本身错综复杂。纽约州的人民经过几年的热烈辩论后，根据一项宪法修正案采纳了所谓的“行政预算案”，旨在将具体经费支出的直接决定权集中在州长手里，而把总的控制权保留于参众两院。议会可以赞成或否决州长提出的方案，但是，没有州长的赞同，却不能增加新项目。罗斯福和共和党领袖们都嘲笑这个新的法律程序。州长提出的预算没有具体地列出各个细目；而议员们从预算委员会提出修正的预算案时也没有说明修改了哪些项目。再者，议会决定某些总付款的细目既要经州长批准，也要经两院委员会的主席（当然是共和党人）同意。这一点尤其使罗斯福感到生气。

在法律技术细节后面掩盖着政治家们的斗争。行政预算案的目的在于使议会不必干涉预算中的细节，而政治家感兴趣的正是这些细节。议员们对于那些帮助他们当选的人们欠下了债，这些债务可以通过与州政府签订合同、解决就业、采购产品等这类方式予以补偿。每一个议员对于州花在他自己选区的经费开支都有特殊的利害关系。议会编制预算的活动必然引起议员们为使彼此提案通过而互相勾结。而两院的两名财务委员会主席则成为裁判，利用审查预算细目的权力，以谨慎的态度，把预算优惠授予或扣留不给予那些普通的共和党议员，借此巩固他们在议会中的领导地位。

每一方都摆出维护宪法正义的高尚姿态。罗斯福说：“他提出一个概括性的问题，这个问题影响到政府的行政、立法、司法三个部门之间有关政府职责的分工问题。议员们反驳说：人民的权力必须加以坚持，使之不受一个过分自信的行政首脑的傲慢和专横所扭曲。罗斯福好像很喜欢这种战斗。他在写给一个朋友的信中高兴地说：他正在同共和党的议会领袖们

进行不断的、光荣的抗争。

当议会把修订后的预算案交给他时，罗斯福考虑了两个星期后，否决了涉及五千六百万美元的所有提案。他承认这是个激烈的行动。但是，他说：纽约州必须实现行政预算案的原则，从而显现人们为了把州的事务置于现代化高效率的事务基础之上而在过去十五年中所做的努力；否则，我们会逐渐陷入一种绝望的境地，使承担行政职能的责任分裂。罗斯福又递交了一份和最初的预算完全相同的提案。共和党又作了完全相同的修改，并立即休会。他们的地位由于州司法部长发表的法律见解而得到了加强。这位司法部长是个共和党人，在选举中靠了一次巧辩，在1929年担任得了这个职位。这时，他在议会中当然袒护他的同党。

罗斯福现在还能做什么呢？他的顾问们意见分歧。有人认为他曾要求对行政预算修正案作出的解释过分僵化，他现在应当签署预算草案而体面地告假，否则就得要求议会召开一次特别会议，而大家都清楚这种会议将徒劳无益。另外有些人认为，他在法律上具有充分的理由，因此他应该把这个问题提交法院。罗斯福决定采取最后一个措施。共和党选定的法律顾问不是别人，正是前州长内森·L·米勒。这位共和党人从未由于必须和两位财政委员会主席分享权力而感到苦恼，因为，正如罗斯福私下评论的那样，这个三人小组组成了一个小型家庭茶会，在这个茶会上米勒能够支配一切。1929年6月，纽约最高法院上诉法庭的一项判决支持了议会的立场。但是，几个月后，上诉法院在主要问题上支持了州长的诉讼。

罗斯福获得了这场斗争的胜利，但取胜的手段却很奇怪，很不符合罗斯福的个性。他向法院提出诉讼，而不向人民发出呼吁，这也许是由于他认为争论的问题过于专门，超出了人民的理解力，或者说，不易唤起他们的注意。他公开或暗地里采取的立场是：他为“维护立宪政府而斗争，贯彻美国原来的关于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权分立的理论”。对于他这样一位政治家来说，这个立场是很明显的，因为他在奥尔巴尼，后来在华盛顿，将设法绕过这三个政府部门之间的许多传统的障碍。

无论如何关于预算问题的斗争，只不过是更大规模的政治斗争中的一次小冲突，而在这种政治斗争中，罗斯福将不会取胜。

对相持形势的分析

麻烦的问题是罗斯福找不出什么办法来克服一种难以改变的现实：议会和他分享政府的权力，但却反映了另一种不同形式的政治权力。他尝试了超党派的行动原则，但是，充满着善良愿望的姿态不能轻易抹杀政治家

忠诚和野心相互冲突的现实。他企图越过共和党领导人而向人民发出呼吁，但是那些领导人作出了足够的妥协，使公众消除怨恨，然后又采取另一种姿态，妨碍议案获得通过。他知道他可以在1930年的选举中向选民陈述他的理由，但是共和党仍有可能保持他们对议会的控制。他始终在一种困难的形势下艰苦地工作，这种事实就是：纽约州没有足够的实力来解决那些具有全国性和国际性的问题。关于圣劳伦斯河的动力问题所展开的斗争——罗斯福在任州长期间，心中没有比这再重要的问题了——说明了这种政治僵局难以处理的性质。

河水在北美五大湖聚集后，流入圣劳伦斯河，然后通过一个狭窄的峡谷奔腾而下，倾入圣劳伦斯湾和大西洋。罗斯福发表就职演说，讲到一半时曾说：就在他讲话的这段短短的时间里，美国的河流白白流入大海的河水所具有的动力足以转动一千家工厂的机轮，足以给一百万户农民提供照明电力。……这些未予利用的动力有相当一部分是通过圣劳伦斯河流失的。罗斯福了解这种形势的内幕——议会如何在几年前就曾批评一家私人公司免费开发朗苏尔特湍滩的电力资源，后来又收回了原决定；史密期如何在水力资源问题上和共和党领导人进行了长时间的不断斗争；公用事业利益集团在共和党支配的议会中的代表势力如何强大等等。到了1929年，私营动力利益集团在纽约共和党内的力量仍和以前一样强大。前众议院议长、马上将出任共和党纽约州委员会主席的H·埃德蒙·麦克霍尔是弗洛伊德·L·卡莱尔的合伙人，而卡莱尔则被其竞争者称为纽约州东北部的“动力大王”。

罗斯福作为候选人在纽约州中部发表竞选演说时曾严肃地警告：“你们不得偷窃”，接着他又痛斥共和党领袖们是阴谋家和窃贼。现在，罗斯福对议会宣称，让人不能容忍的是，对于水力资源这笔“巨大的资源”的开发，竟然被“微小的口角和党派纠纷”长期延搁下来。这番话并没有引起共和党人的重视。第二天，这位州长在给议会的咨文中再次申诉，人们对于他们的水力资源的控制不能通过长期租借的办法予以转让。最后，他抬头望了一下听众，微笑地补充说：“这个问题是我希望我们之间能够达成协议的那些问题之一。”

怀疑的笑声在议会大厅里震荡。显而易见，达成协议是不可能的。但罗斯福至少可以明确主要问题：关于开发和分配人民的水力资源所发的电力，州政府应出多少力，而私人企业又应出多少力？

罗斯福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什么呢？他就职时还没有详细的计划，

但他学得很快。他主要是向这方面的专家学习。研究公用事业管理的专家利兰·奥尔兹就是应邀前来州长官邸的专家之一。他在2月的一天傍晚到达，受到罗斯福的热情接待。奥尔兹在州长大厦后面一间旧温室内观看罗斯福和罗森曼在温水池里游泳，水花四溅，晚餐桌上他坐在那里困惑。大家在轻松的气氛中认真谈论了各种问题，但却不谈今天的正题。饭后，罗斯福回忆海德公园的历史以及达切斯县那些农民仍用不上电。然后，他向奥尔兹提出问题，直到午夜时分。他询问了结算方法、价格理论、法院判决、研究费用的人民委员会等问题。他提出的问题既长而又详尽寻问。罗森曼一直在旁聆听他们谈话，觉得州长已经把奥尔兹问得无话可说了，而该提的问题也都已经提完了。

到了1929年3月，罗斯福已经搞出了一个关于圣劳伦斯河的计划。他提议，电力应由州政府开发，但可由私人企业输送和分配。困难在于各公司开出的价格。罗斯福对议会说，州公用设施委员会制订的收费规定已变得毫无意义，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法院基于定价猛涨而准许实行高利率，他坦诚地提议实行合作制，不再按费用规定办事，同时催促议会授权州政府和一些电力输送与分配公司签订合同，“依据这些合同的条款，将保证使用户所付的费用合理，而各公司也只能根据对这一具体的电站电力的输送和分配工程的投资，收回合理的利润。”这一建议悖离了史密斯的办法，即依靠公用设施委员会来规定费用。

罗斯福对议会提出的唯一具体要求是成立一个机构，由它将开发圣劳伦斯河的具体计划提交议会。州长为了使提案为两党都接受，曾要求共和党领袖们向议会正式提出，但他们拒绝了这一要求，甚至不让民主党人就议案发表意见。1929年的议会会议结束时，这些议案仍被悄悄地搁置在委员会中。

下一届会议带来了不同的结果，主要是因为1930年是选举年。罗斯福曾要豪准备一项提案，其中将纽约人使用私营电力和加拿大人使用政府开发的电力进行比较。同时，他已经作好准备，使用这些调查结果同公用事业公司进行斗争。反对派已发生分裂。萨福克县一位新的共和党青年领导人W·金斯兰·梅西要求共和党州委员会前主席的伙伴、新任主席麦克霍尔德辞职，理由是共和党正是在如水力发电这样的纷争上“受到了攻击”。1930年1月水力发电的议案按罗斯福规划的方式提交给议会。沃尔特·李普曼写信告诉罗斯福：这次大获全胜。

但这只不过是第一步。1930年末，州长任命的圣劳伦斯河电力开发委

员会研究了形势，同时罗斯福在争取连任的竞选活动中又把这个问题提了出来。1931年1月委员会的报告从工程和财政的角度来说对这一开发计划都极其有用。委员会的大多数成员听从了州长原先的建议，即由州政府开发电力，而私营公司则依据合同制进行分配。两个月后，一项包含这些建议的法案提交给了议会。

此时又爆发了一场争吵，并且又是围绕着州长与议会的权力的一场争吵。州议会参议院共和党领袖、参议员约翰·奈特提出了一项修正案，提议废除州长任命电力管理局成员的权力，并具体地提出了五个人的名字。罗斯福十分恼怒。他曾在一次会议上警告共和党领袖们，他决不接受这样的议案，他声称，他不得不作出结论：共和党人企图否决议案。他说，电力开发计划属州长的职权范围。“行政职责必须以行政权力作为后盾。”双方都明白，任命新的电力管理局的权力意味着对于实际利用圣劳伦斯河巨大的电力资源拥有支配权。

罗斯福使用手段是直接向人民发出号召。他把共和党的行动描绘成为公用事业公司玩弄一种手法，目的在于妨碍人民开发他们自己的动力资源。他宣布他计划几天后就这个问题发表广播讲话。但是，就在预定的讲话以前，奈特及其一伙放弃了他们的要求。州长利用他发表广播讲话的机会进行宣传。他说，“普通选民先生和夫人”的努力比私营公司和一小撮政界领袖更为强大。

事实也可能如此。但是，即便议案最终得到了批准，而一个根据罗斯福的想法组成的电力当局也得到了任命，但整个计划还将泡汤。因为这一计划现在陷入一大堆难以解决的具体问题之中：只有联邦政府才有权和加拿大就圣劳伦斯河的问题缔结条约；胡佛总统对于私营电力和铁路利益集团的反对非常在意；到了1931年末，罗斯福已经作为胡佛在下次选举的可能对手的姿态出现。1932年7月，罗斯福在接受民主党的提名后一星期，要求和胡佛见面，以便在同加拿大完成谈判以前，一起讨论纽约州分担开发费用的问题。胡佛恼怒地答复说：“他没有必要到华盛顿来，以免中断他乘艇出游。”

结果是，超过二十五年以后，圣劳伦斯湍急的河水才照亮了纽约州北部农民的家，驱动了他们的脱脂器。

罗斯福在担任州长期间提出的许多重大计划都遭到变形的抵制，而且常处于困境。议会对他的提议的反应在一种不稳定的平衡点上左右摇摆，一方面受乡村支持的议员们不喜欢罗斯福具有进步主义色彩的提议，另一

方面又害怕因为否定和阻挠进步的建议而坏了声望，以致下一届共和党在全州的竞选活动归于失败。由于他们主要并不太在意他们自己的席位，同时他们对候选人名单并不十分关心，因此上述平衡点更接近于无所作为而不是采取行动。即使罗斯福以某种方式促使议会立法，他仍然必须直面前景黯淡的现实：甚至象纽约这样的州也不过是四十八州之一，它的法定权力和物质力量非常有限。

政府的无所作为，在罗斯福任期的第二年，已成为一个更加突出的问题，因为这一年，经济萧条开始严重地侵害本州的经济。生产减少，价格下滑，工资降低，农业收益急剧降低。纽约市的美国银行在美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银行破产中倒闭了。大批的失业者很快就流落街头。由于税收锐减，州政府减轻痛苦的责任加重了。采取激烈措施的必要性也随之增多，但这种必要的行动在奥尔巴尼却陷入僵局之中。

农业政策即是一例。罗斯福深知农民艰苦的困境。甚至在经济大萧条到来以前，农民已经在工业品价格飞涨和农产品市场某种不景气的压力下，饱经忧患达八年之久。他也知道这些困难是难以一时改变，它们关系到供求关系、经纪人的开支和利润、关税、农民的荒废、都市化等等因素。他在 1929 年的年度咨文中说：最终目标是农民及其家庭成员在赚钱能力方面应和他们在城市居住的同胞们居于相同的水平。他熟悉农业经济各方面的具体问题：运输费、农业在全国范围内的相互关系、牛奶供应基地倾向于越过州的界线、对土地的使用不当以及毫无计划地任意大量生产和销售农产品等。

他的演讲不仅给纽约州内，而且也给其他各州的农民以及与农业有关的政治家们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威斯康星州的一位官员在罗斯福生动地阐述了农民出售产品的价格与消费者付出的价格剪刀差后，写信给罗斯福说：他们本来以为他只熟悉华尔街的巨头呢。

但是，议会实际通过的法案和问题的重要性相比，几乎微不足道。州在建设公路、铲除积雪、消除铁路和公路的平面交叉和农业研究方面所给予的更多帮助，满足了农民的一些具体要求，但他们生活的水平却几乎没有什么改善。随着 1930 年和 1931 年经济萧条的日益严重，州又采取了一些较为基本的措施，如通过了一项议案，为粮食生产提供更多的贷款方便。对于采取更多的激烈措施的障碍，主要不在于议会，因为议会相当注意农民的要求，并且急切地想要阻止州长获得对农民的领导权。阻碍在于这样一个不争的事实：一个州不能单枪匹马地解决一个全国性问题。

在劳工立法问题上，罗斯福需要同时对付怀有敌意的议会和一个全国性问题。他在第一届任期内，促使议会通过议案，给予在工厂和商店工作的妇女每周半天假日，在运用劳工禁令方面作了一些修改并稍微增加对工人的赔偿。只是到了1931年，议会才通过议案，规定妇女和儿童每周工作六天，四十八小时。更加彻底的提议比如最低工资措施等则遇到了无法避免的、而在某些问题上往往是无法回答的争辩：由此而造成的更高的成本可能使得工业迁出纽约州。

所以，州的计划受限制的性质是一个尺度，它可以衡量严酷的政治环境，而不能衡量罗斯福本人的奋斗目标。用他自己后来的话，他的行动在那时就是“中间稍微偏左”。他在继续不断地寻找解决具体问题的具体办法的过程中，已经提前实施了新政中的许多措施。在经济萧条期间，随着问题的严重程度的加深，他解决问题的范围也变得广泛。在思想上，他对问题所作的探索超过了东北部的大多数政治家。1930年初罗斯福在给内布拉斯加州一位银行行长的信中写道：“有没有可能根据自愿原则制订一种办法来将全国小麦种植总面积减小到和全国实际消耗量相当的程度。”在田纳西流域管理局成立以前很久，他就谈论政府和私营公用事业公司进行竞争的必要性，“至少作为一种衡量的标准”。

罗斯福所亲信的一些主要人物的观点，进一步证明了他的一般自由主义思想。他的工业局长弗朗西斯·帕金斯是一个身材苗条、容貌端丽、办事严肃仔细的女士。她在罗斯福担任参议员期间和他初次认识时，是一个社会工作者，曾有十年时间先后出任史密斯的工业委员会委员和主席。罗斯福任命她为工业局长，使她担任了管理许多男人的行政职位，这一举动当时曾经使某些人为之惊诧。并且，他让她自由地行使局长职权。他在水力发电问题和公用事业方面的顾问，包括了后来在实行新政时期地位显要的人物：莫里斯·L·库克、利兰·奥尔兹、詹姆斯·C·邦布莱特，以及非官方人士、哈佛法学院教授费里克斯·弗兰克福特。其他一些未来的新政支持者在农业政策、社会保险问题、救济等方面向他提出建议。

总的说来，罗斯福担任州长期期间的政绩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罗斯福考虑到史密斯在成绩突显的八年任期后不可能取得更杰出的成就，考虑到议会准备阻碍任何野心勃勃的改革企图，因此他充分利用了他获得的一切时机。他没有取得一次引人注目的胜利，但他在州内广泛的活动中以及在应付工农业生产危机造成的各种更严重的困难中却取得了卓越的成绩。以上这些广泛的活动包括社会福利、政府工作效率、监狱改革和公用事业规章。随着经济

不景气的加剧和州内各种问题的增加，罗斯福在应付这些问题时，日益显示出更大的能力和气魄。

更重要的是，这位州长具有一种不可缺少的品质，即承认有必要实行改革，实行新方针，进行新尝试。他意识到政府不是一个怪物，而是应付变革问题的一个工具。他具有学习能力。正是由于这些品质，他的州长职务真正成为一个人实习场所，使他培养了进行政治活动和管理国家事务的能力。

党的实力

在第一届州长任期之初，罗斯福发现州政府有一艘用于视察运河的小艇。于是他决定把接吸过来，在自己作视察旅行使用，这正是他所喜爱的那种新花招。于是出现了一个可笑的场景——州长巨大的身躯，他那众多的家属和船员们都栖息在一艘小船上，从一个船闸缓缓驶向另一个船闸。而州长的汽车和司机以及一大群州警察沿着最近的公路，紧随其后。然而，从政治视野看，这也是一个精明的活动，因为它突显了州长对北部事务的兴趣。

即使罗斯福夫人必须充当他的耳目，这些旅行对于这位州长来说，却是真正的巡察旅行。罗斯福被人从艇上抬到汽车上，他所能做的也只是驱车于医院、救济院和其他州立机构的庭院。然而，罗斯福夫人很快就知道如何查出她丈夫所需要了解的实情：住院病人和救济院收容的人能不能吃到菜单上的东西？床铺是否过于密集，或者白天需要折叠起来？如果这样那就表明地方拥挤不堪。病人对工作人员的印象如何？对工作人员的态度如何？罗斯福 1929 年在给豪的信中写道：“我们必须使这些公共机关非官僚化。”

罗斯福在第一届任期内，还开始了他那著名的“炉边谈话”。这些广播讲话语气直率而亲切，主要针对纽约州北部人民，他们通过共和党的报纸，了解主要情况。广播当时仍面临大量的技术困难。法利必须向全州各地发出征求意见表，向当地民主党人调查各地电台所收听的效果。罗斯福在第一次谈话中当然就宣称这些谈话都是超越党派的。事实上，大部分谈话都有浓厚的党派色彩，而且是对共和党议员的批评。

实际上，罗斯福在担任州长时间老练地、不知疲倦地玩弄政治花招。他虽然间或也披上无党派的外衣，但他基本上还是有个党派的政治家。美国的州长通常都是州的党魁通过他所选定的副手操纵党务。罗斯福正是这样一位州长。但他在领导纽约州民主党的工作中，却碰到了前几年他在全国性党组织中发现的同样短处。他曾试图解决这些问题，但却毫无所获。

法利进行的一次调查证实了罗斯福对于这个问题所作的最坏猜测。法利直截了当地报告：“根本不存在州的北部地区民主党组织这么一个机构。”后来发现的少数几个地方组织虽仍有战斗力，但也只是对于地方选举感兴趣，在一些情况下，还拿选票和政敌作交易，用支持共和党人在州一级和联邦一级当选，来换取地方职位。法利发现了深深的冷漠和灰心情绪，“作为在全州范围内获胜的一个组织的一部分”的观念极其少。州委员会处于瓦解状态。党在州的北部地区的工作人员名单根本毫无用处，州委员会主席威廉·布雷是史密斯安插的一个毫无生气与想象力的老年政客。

罗斯福和法利一起制订了一个计划，越过布雷和州委员会来加强民主党州北部地区的基层组织。这个计划具有罗斯福早期思想的特征。他将组织一个新的机构——民主党俱乐部联合会。这个组织的组成人员，不是州委员会的委员们，而是直接从富有活力、热情洋溢的民主党普通党员中选拔出来的。在联合会的协助下，将把那些萎靡不振的地方领导人清除出去，而让富有进取精神的年轻民主党人取而代之。

这个计划的关键在于选举法利担任联合会秘书。因为他已经是民主党州委员会的秘书，由此，他可以协调党的全部活动。法利非常出色地完成了这一任务。他在州内各地不停地往来旅行，平息地方派系之间的争吵，使无所作为的地方委员会恢复活力，发掘有潜力的政治人才。地方领导人已经习惯于几乎每天都要收到他那用绿墨水签名的潦草的信件。他在信中不断要求那些领导人注意竞选运动中很重要的细节：选民登记、不在本州的人的票数、第一批投票人、选举监察员、文化测验、一份又一份的名单。1930年，罗斯福解除了布雷的主席职务，而由法利接替。

罗斯福还解决了另一个长期令人担忧的问题——共和党人控制的农村报纸。他在看过关于农业区的意见调查后，在写给他的朋友小亨利·摩根索的信中说：“他对于偏见、个人的愚蠢行为和错误想法的担忧，不如他因为数众多的农民所表现出的那种十足的愚昧无知而感到的担心。根据摩根索的建议，在奥尔巴尼设立了一个新闻局，它的主要任务是给州的北部地区的农村报纸提供具有民主党观点的新闻。

这些包括到纽约州各地进行频繁的巡察，发表广播谈话和新闻公报，而最重要的是，逐渐加强党的活动——这些紧张的活动都给罗斯福后来赢得的最大的选举胜利（至少从统计数字来说）打下了基础。

罗斯福1930年5月写信给雷曼说：“你我都有同样的责任感，对于已经着手进行的一项任务，必须加以完成。”他很可能从来没有产生过不参

加竞选的想法。在锡拉丘兹召开的一次秘密的州代表大会上，人们听见史密斯称赞州长“头脑清晰”、“胸怀广阔”；这次大会一致提名他为候选人。罗斯福在接受提名时说，他奉行的主义和两年前完成一样：“进步主义的政府，顾名思义，应当是一个充满生气的、不断发展的政府。维护这样一个政府的斗争永远不会停止。如果我们有片刻或一年松懈下来，我们将停滞不前，而且将在文明向前突飞猛进中向后倒退。”

民主党人完全有理由感到信心十足。经济萧条日趋恶化，这把共和党套上了他们自己创造的政治绞索：他们在1928年曾就过去的经济繁荣为自己请功，而今天他们必须对当前的艰难时期承担责任。罗斯福曾经巧妙地使用共和党故意阻挠议案通过的办法，引起人们对他的纲领的注意，而他比共和党所能提名的任何候选人都更加有名。虽然罗斯福明确表示他持超党派的立场，但他的州长职务本身就是为再度当选所进行的不间断的竞选活动。

两个可能发生的危险问题放在民主党人面前。其中之一是禁酒问题。罗斯福长期以来对于这个问题一直持模棱两可的态度。他曾热烈地希望，这个问题将从政治斗争中消失。但这个问题并没有消失，却朝着有利于民主党人的超穷发展。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期——在这十年中出现了非法酒店、财政部人员的查抄、打群架和酗酒等情况——纽约州的共和党人逐渐意识到禁酒问题在政治上是个不利条件。罗斯福并不想以反对禁酒者的身分参加竞选。但当他知道共和党可能的被提名者即将提出赞成废除禁酒法的提议后，这位州长立刻站在反对禁酒的立场上打败了共和党的那名候选人。他在1930年9月写信给参议员瓦格纳说，他主张彻底废除禁酒法，恢复各州对酒类的控制。

这是一个有力的措施。共和党人非但没有争取到许多反对禁酒者的拥护，而且还得罪了纽约州北部那些主张禁酒的人们。结果是一名主张禁酒的候选人获得了提名，这样就很可能把一些共和党选票分裂出去。

另一个问题就比较难处理了。贪污问题一年多来已使群情激昂，在选举前一个月，这个问题由于司法机关进行肮脏交易的证据被揭露而激发了。罗斯福将这个案件交给了州检察长（共和党人），并指定一名共和党最高法院法官召集特别大陪审团进行审理。他还命令最高法院上诉法庭对地方法院进行一次普遍的审查。罗斯福自己也卷入这个案件之中，因为他按例行手续任命了一个坦慕尼分子担任短期的普通法院法官，而据说这位法官曾花了三万美元从坦慕尼协会买到了这个职位。

共和党人看到这是一个大好机会，可以使罗斯福陷入政治困境：他们猜测，如果罗斯福对坦慕尼协会采取制裁行动，他可能失去这个组织对他的拥护；如果他不采取行动，他就可能被看成是坦慕尼的帮凶。共和党把他们的大部分希望放在这个行动上，提名美国司法部纽约南部地区法官查尔斯·塔特尔为州长候选人，此人一头红发，生性好斗，曾在坦慕尼和法官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中谨慎地摸索前进，并在一些尽人皆知的起诉中获胜。

罗斯福依靠让步的手段摆脱了困境。他采取正式行动使共和党能对坦慕尼进行调查，但他绝不允许产生一种情况，即使他直接卷入那种以调查为名而对坦慕尼采取的攻击。这种尴尬的姿态使他要作大量的解释工作，特别是他的朋友们对他平时在某些方面以办事麻利果断著称，这次却拘泥于法律细节而感到奇怪，因此更加需要进行解释。罗斯福写信告诉一位为他担心的哈佛同学（纽约市某校校长）说：这种局面不是坦慕尼和他个人之间的问题。这是保持立宪政府、还是听任自由的保障遭到瓦解的问题，犹如在黑索里尼的意大利和列宁的俄国，自由的保障被瓦解的情形一样。他接着仔细阐述了州长的调查权所受的种种限制。

罗斯福在信的结尾写道：“在仔细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请你一定记住我和你一样迫切地希望揭露这种腐败现象，但也请你一定记住，1929年1月1日，我是作了某种就职宣誓的。”显而易见，罗斯福的立场使他失去了纽约市一些独立的民主党人的支持。民主党的纽约《时报》和独立的共和党人的《太阳报》给他支持，但强烈地拥戴史密斯的《世界报》发回了它的支持，而《新闻报》则表示支持塔特尔。

竞选活动围绕下列中心展开：塔特尔就贪污案不断地对罗斯福进行攻击，而州长则一直地企图把辩论集中在水力发电、农业、劳工、公共工程、公用设施规章以及州的其他普遍性问题方面。他的对手究竟是竞选州长呢，还是竞选区法官？罗斯福以辛辣的语气问道。他按照自己通常的作法，把第一次的竞选演说内容限于为州政府的一项主要计划进行辩护。在布法罗，他宣读了美国苏联主席格林对他表示大力支持的一封信。在罗彻斯特，他谈到了监狱、医院、公共工程。在锡拉丘兹，他向家庭主妇们仔细地介绍了电费高昂的情况，表达生动具体，所以，附近的人在很久以后还谈论着“烘蛋奶饼的铁模的那次竞选活动”。

然而，人们也对另外一个问题也感到兴趣：职业问题。全国各地的民主党候选人都在嘲笑共和党人在1928年奢谈“装满食品的饭盒子”后，却没有办法对付经济不景气。胡佛总统在白宫至少还可以坐上两年，但这

时已经开始扮演他将保持一代时间之久的历史角色——苦难年代的替罪羊。罗斯福在受经济萧条影响特别严重的布法罗演讲时，引用了共和党人为1928年的繁荣请功的话。他看看他的听众又说这些讲话的摘录今晚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他又补充说，他引用近这些话，不是为了党派的利益，而是为了表明不论哪一个党，也不会垄断繁荣。

共和党在竞选运动末期，从华盛顿请来了一些内阁阁员作为后备军向罗斯福发起反攻。其中最著名的一位是国务卿亨利·L·斯汀生。到了此时，塔特尔需要援助；他的单一纲领竞选运动逐渐失去公众的支持。一部分原因在于他忙于竞选活动，愈来愈缺少新的发现。斯汀生从华盛顿发表了一次广播讲话，他说，罗斯福已经“显示出他不能胜任愉快地处理纽约州当前面临的巨大危机”。

竞选前夕，罗斯福在纽约市所作的回答中，谨慎地利用纽约州的骄傲和对联邦政府的厌恶。“我对这些尊敬的先生们说：如果你们回到你们在华盛顿的岗位，努力把时间用来解决整个国家在你们政府领导下所承担的各种问题，我们将感激不尽。请放心，我们在纽约州的人能够而且也会照顾我们自己，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

罗斯福以1,770,342对1,045,341票击败了塔特尔，相差725,001票。更加值得注意的是，在纽约市以外，他在五十七个县中的四十一个县获胜。他在纽约州北部地区，以167,784票获胜，这对于民主党来说是绝无仅有的。票数差距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位主张禁酒的候选人的离间战术。但即使没有这种有效的干预，罗斯福在纽约州北部所获票数也会和塔特尔接近。他在纽约市比别人多出五十万张票，证明他在贪污案件上采取的骑墙态度是正确的。

这是一次引人注目的个人胜利。州内其他民主党候选人获胜时所得的多数票数比罗斯福要少。更加重要的是，共和党人仍在州议会的参众两院拥有多数，民主党人没有能够从共和党在州北部占据的二十个席位中夺回一席。虽然法利做了大量工作，这次胜利是一次行政上的、而不是立法上的胜利，所以，也不是民主党的胜利。

但这不是挑剔的时候。由共和党控制的议会对于罗斯福也有好处。更广阔的前景还在前头。选举过后三周，罗斯福在给法利的信中谈到了后者的工作：“这不仅是一次光辉的记录，而且也是巩固我们收获的极好机会。

“当我想到纽约州民主党前主席与前几位州长打交道，或者后者与前者打交道时所出现的种种困难，我有一个想法，那就是，你我应建立一种

从克利夫兰和拉蒙特以来未曾有过的合作关系。这种关系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因此，不论是你或我，除了阅读历史书以外，对此是一无所知的。”

第七章 微弱的胜利

罗斯福再度当选州长后第二天，法利和豪宣布罗斯福准备竞选总统。法利在庆祝胜利的声明中说：“我认为罗斯福先生没有什么办法能使自己避免成为民主党下一届的总统候选人，即使无人帮助促成这件事，它也是必然要实现的。”法利把这一行动告诉州长时，罗斯福笑着说“吉姆，无论你说什么，我都同意。”

据法利说，在这以前，他从未和他的上司商讨过关于总统候选人的事。这并不奇怪。即使对于他的同事们，罗斯福也一直保持着一种假象，即他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在纽约州的事务上。他有政治家的那种迷信，在安排竞选活动时不要做出过早的计划；而且，他知道1930年的胜利是他准备在1932年获胜的关键性一步。他再次当选州长的结果，等于制订了行动的时间表，而1932年就是采取行动的一年。

在再次当选州长后的一、两个星期，他对弗林说：“埃迪，……我相信我会被提名为1932年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

他本可以加上一句：“而且一定当选。”随着1930年经济情况的衰退现象恶化，民主党对1932年取胜的希望也日益看好。不论哪一个政党也很少会象共和党在萧条时期那样完全陷入自己造成的死胡同里。他们的演说家在1928年高唱什么在共和党领导下繁荣是稳固的，他们把这种自吹自擂当作竞选运动的主要议题。“究竟是要胡佛和幸福呢，还是要史密斯和施必坚？你们说该要哪个？”共和党的标语牌这样问道。共和党在总的方面遵循一种放任自由的思想，不肯对联邦政府为防止萧条所采取的任何行动切实地承担义务，所以，共和党的立场从理智上来说，是不诚实的，而从政治上来说则是危险的。然而这个战略却起了作用。

现在，领救济食品的长队，从一个街区伸展到另一个街区，施粥棚发放稀粥和淡咖啡，而“胡佛村”——由简陋的棚屋、废弃的汽车和包装箱构成的一种小型住宅区却大量地在大城市的垃圾堆和土屋旁边出现。但是，萧条却是异常消极的事。暴乱很少发生，几乎没有罢工。美国人好像已麻木了。也许他们只是在等待，等待象过去经济不景气中时常出现的那种转机，也可能是等待他们的领导人采取措施。胡佛采取行动了：他组织了私人救济活动，命令联邦各部节省开支，要求商人保护现有的工资标准，创办了“重建基金

信贷公司”，将资金贷给银行和其他机构，勉强支持联邦政府拨给各州救济援助款项。但他所做的一切努力似乎都毫无作用。

罗斯福对于 1929 年股票行情猛跌的最初反应，与其说是一个民主党政治家作出的反应，不如说是一个共和党商人产生的反应更恰当。10 月 24 日，正当股票市场动荡不定的时候，一家报纸询问他对前景的看法。他在回电中说，他对详细情况并不清楚，但他深信基本的工业情况是良好的。过了不久，他在波基普西发表了一次演讲，猛烈地攻击了投机活动。五个星期过去后，当股票行情下跌到 1929 年最低点时，他对豪说：近来市中心的小小波动，很可能造成行情比较低落”，并且要求豪核实一下某些股票的情况。

令人惊奇的是，罗斯福费了一段时间，才弄明白困难时期终于到来了，而他早就预言这种情况将会打破共和党对白宫的支配。到了 1930 年秋天，他就已经在竞选演说中利用这种形势了。同年 12 月，他收到了威廉·艾伦·怀特从堪萨斯发来的警告。

“这些日子对于你们民主党人来说，是大好时机，但是不要太谨小慎微了，”这位《商业中心新闻报》的编辑写道，“假若这条老帆船能在新的一年里恢复平稳的话，那么不管那是由于纯熟的驾驶技术，还是由于风平浪静的原因，人们都会忘却它曾经面临倾覆的危险。但是，我担心的是，如果这条船不能很快地恢复平静的话，船员们将会从水手舱里跑出来，把后甲板上那群官员统统扔向大海，无论他们是民主党人，共和党人，全部抛入大海。”

然而，这艘老帆船并没有恢复平稳。当“严重的萧条”开始侵蚀罗斯福那个州的城市地区时，他采取了越来越激烈的行动。他的第一个重大措施是在 1930 年 3 月建立了一个紧急救济失业委员会，由一位银行家领导，考虑提出关于稳定失业情况的长期性方针。同一年早些时候，罗斯福又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及时地缓解人民的疾苦以及扩大公共事业。就在美国劳联仍反对把强制性失业保险当作一种“施舍或救济”的时候，罗斯福却赞助这一计划，最后提出了一个本州的方案。1931 年 8 月，他促使议会拨款两千万美元，批准成立了一个临时紧急救济局，使大批陷入绝境的纽约人度过了 1931—1932 年那个惨淡的冬天。这个机构是由一个面孔灰黄、瘦削的年轻社会工作者亨利·霍普金斯领导的。

在经济萧条初期的大部分时间里，罗斯福对于国内救济和经济恢复政策的思路与胡佛没有本质的区别。他们都反对由联邦政府直接支付救济

金，而又都主张主要依靠州的和私人的救济机构，同时相信政府应将经常性开支降低到最低限度。但是，他们在公众中造成的形象却不相同——罗斯福是一个善于活动的人，而胡佛则是一个顽固不化的人。当然，罗斯福尽量利用他的地位。早在1931年，他就曾在奥尔巴尼召开并主持了一次广为宣传的地区性会议，由各工业发达的州的州长参加。他还十分聪明地把议会中的反对势力作为陪衬角色来加以利用。

罗斯福在1931年12月写给伯纳德·M·巴鲁克的信中说：“我很高兴你我都坚信在即将来临的一年中，议题将更多地涉及经济而不是其他方面。”他补充说，国家需要一个态度比较明朗的领导。

贪污案的政治用途

罗斯福被提名总统候选人的始末充分展现了一场战斗如何在最初阶段几乎取胜，却在竞争的最后关键性的几个月中由于一错再错而险遭失败的全过程。

罗斯福开始参加这场竞争时，处于极为有利的地位。民主党人期望有一位能赢得总统职位者；而罗斯福在1930年州长竞选获胜后，就成了参加1932年大选的主要候选对象。他在农业地区的号召力，引起了一个在东部的实力主要以城市为基础的政党的重视。他作为州长的良好政绩，他的家族，他在这个人口最稠密的州的声望，他曾拥护威尔逊总统的背景，他广播演讲时的声音以及个人的仪表这一切都使他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他怎么会失败呢？

然而他面临着三重威胁。一群民主党候选人，其中包括本州拥护的候选人，感觉到民主党有可能取胜，便投入了竞争。罗斯福的领先地位使他成为他的对手们的共同敌人。他在全国代表大会上不仅必须取得简单多数票，而且必须是三分之二的多数票，因为民主党仍然遵循他们的历史悠久的规章，即要求候选人必须获得三分之二的多数票才能获得本党的提名。

罗斯福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一直否认自己的总统候选人身份，部分原因是为了掩饰自己的领先地位。1931年3月，他说：“我稳坐不动，不管闲事，闭口不言——至少目前如此。”他甚至对朋友们说：他真不明白，在这样一个时期，怎么还会有人想当总统呢？他的策略与马里兰州州长艾伯特·里奇的策略南辕北辙。里奇密切关注着这场提名之争，当一家报纸问他是否愿当总统时，里奇说：“我当然愿意，有谁不愿意呢？”

罗斯福的方法是把竞选的实际操作交给在纽约市的豪和法利以及在全国各地的朋友们去办，关键性的决定则由他本人来做。他的两位副手配合

默契。豪的脾气比以往任何时候更拗，眼窝也比以往任何时候更深，他担任了州长的顾问、鼓励者和心腹。对于任何人，只要和他的“富兰克林”过分接近，豪都怀着一种小肚鸡肠的嫉妒，对于任何人只要不是百分之百地忠于罗斯福的事业，他都十分猜疑。他有善于精于权术的马基雅维利的那种锐利眼光，能搜寻出种种复杂的施加影响的渠道。他不知疲倦地施展计谋和反计谋，发表长篇演说，猛烈地攻击罗斯福的对手和敌人，借以掩饰他所受到的挫折。法利的情况恰恰相反。他不论跟谁都合得来，甚至和豪也可以相处，他的工作所以得力部分原因在此。他那硕大柔软的身体缓和了各个派别之间的相互争斗，他那张脸孔看上去那么光滑红润，仿佛是被他所充当的中间人角色给磨光和擦亮了似的。他是一个穿针引线者，一个交际家，一个善于打交道的人。他善于记住别人的名字——不管是什么人的名字都牢记不忘。

罗斯福熬费苦心地向不同党内任何主要派别疏远，这也是他的力量的来源之一。诚然，他在1930年宣布支持废除宪法第十八项修正案，但在以后的岁月里，关于这件事，他就放下了调子。他在1920年曾支持美国加入国际联盟，但这时完全撤销了他的支持，以致对于他在1920年的立场记忆犹新的那些国联支持者大失所望，给他寄来了几十封措词尖刻的信。他赞同美国拥护世界法庭，但是他不支持公开加以宣布。甚至对于民主党关于关税问题的历史性争议，罗斯福也采取骑墙态度。他对西部主张实行高关税的派别表示，关税问题实际上是地方问题，借此赢得他们的支持。但是，对于大多数的经济和社会问题，罗斯福都走在舆论潮流的前面。

这种局面形成的结果是，南部把罗斯福看成一个反对禁酒者，不过却是一个颇通人情的反对禁酒者，西部则把他看作一位进步主义分子（主要是因为他的水力发电政策），而在东部人士眼中他成了一名温和的反对禁酒者和明智的自由主义者。

罗斯福为争取提名所采取的第一个行动是很隐蔽的。1931年7月，法利出发去西雅图，参加“珍爱及保护麋鹿协会”举行的一次代表大会，他是该协会的一位重要人士。他和罗斯福根据一张地图，精心安排了这次穿越十八个州的旅行。每到一州，法利都要停留，和各州的主席相互沟通，表面上是谈党务，实际上却是试探大家对于这位纽约州州长的看法。在这十九天里，法利和大家握手，仔细记下名字，小心翼翼地商讨候选人问题。凡是在他发现罗斯福拥有支持者的地方，他就敦促他们设法使该州代表团尽快地向他的上司保证给予支持。法利向州长报告说：“已经暗示他

们必须摆脱‘支持本州推荐的候选人’的想法。我的理由是，这种做法只不过是束缚大批代表的手脚，以便别人操纵。”他警告代表们不要期望由于投票支持了自己所在州的州长或者参议员，就能够换取他们对副总统候选人提名的支持。

甚至在罗斯福取得的总统候选人资格以前，法利调查的事实就已经显示了罗斯福的实力。在加利福尼亚州，他发现“目前除了对我们州长之外，对任何别人都毫无感情”。他认为“伊利诺伊州一切顺利”。罗斯福在印第安纳州的朋友们必定已经“完全控制了代表团。……”在其他六个州里，形势至少也是令人满意的。法利满怀着乐观情绪，兴高采烈地回到了纽约。

实际上，法利的报告总的来说过分乐观，而有一些情况还给人以误导。作为国内政治舞台上的一个新手，他认识不到在有一些州里，派性达到了严重的程度。他对一个地方只访问一两天，因而没有时间对许多权力中心进行考察。一些民主党领袖们保证派出可靠的代表团，其实根本无力兑现自己的诺言。代表们一方面同意拥护总统候选人，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向本州以及地方职位的形形色色的候选人效忠，二者互相冲突，却又难解难分地纠缠在一起。

这一错误估计是影响全局的；因为它导致法利把希望和战略完全寄托到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全面显示力量上面了，而且他一再地断言在第一轮投票中，罗斯福将取得胜利。这种预言虽然使一些代表摆脱了原来的观望态度，但是也促使反对派集中力量来反对这位领先者。而且，这些预言引起了一个问题：假如罗斯福在第一轮投票中不能取胜，大家该怎么办呢？

在1931年整整一年里，罗斯福在他的州内遇到的麻烦成堆。一位纽约州州长，想要赢得总统候选人的提名，他的强大力量存在于他能派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那个人数众多的代表团。根据所有的惯例，罗斯福在1932年本来就应该拥有这种支持，但情况并非如此。

麻烦来自于坦慕尼协会，这是他的一贯薄弱的环节。经济萧条迫使罗斯福不得不对坦慕尼总部施加重大压力，要求给予职位和特惠。继承坦慕尼首领墨菲的人没有领导才能，也不能执行纪律。大部分的贪污案件金额不大，但却一直波及坦慕尼协会上层，而且突然变为戏剧性事件——一个红头发的女投机家遭到谋杀，对县行政司法长官托马斯·法利受贿以及他的“小锡杯子”的揭露——这些都帮助制造了贪污案的新闻，持续达几个月之久。

罗斯福不得不再一次冒险行事了，但这次他倒向反坦慕尼协会的一方。他和共和党人合作，组成了一个配备齐全的议会调查委员会。他委派了令人敬畏的塞缪尔·西伯里调查对坦慕尼地区检察官公署的指控，并认真考虑了对坦慕尼宠爱的花花公子纽约市长詹姆士·J·沃克玩忽职守的指控。罗斯福以非常谨慎的态度处理同坦慕尼领袖的关系，经常利用豪、罗森曼或者他在法律界的伙伴巴兹乐·奥康纳做他的中间人。

只要坦慕尼不支持其他人来争夺总统候选人的提名，罗斯福对它略加声斥，是毫无危险的。当然史密斯还在，然而几年来，史密斯和这个组织的关系一直很冷淡。然而，将近1931年年底，坦慕尼发现罗斯福受到反坦慕尼势力以及热衷于分裂纽约州民主党组织的共和党人所施加的压力日益增大，这个组织便寻找出路，以求摆脱困境。正在此时，史密斯下决心争取获得提名。史密斯与坦慕尼重归于好便水到渠成了。

史密斯加入竞争，使拥护罗斯福的势力左右为难。有好长一段时间，他们拒不相信他不是为某个更重要的候选人进行掩护的角色。法利和弗林只是在得到史密斯保证不参加1932年的竞选以后，才开始为罗斯福筹备竞选的。史密斯在1928年由于一股宗教偏见的浪潮使他竞选失败，因而对这种潮流十分反感，当时他说不再参加竞选，那无疑是句实话。但有两件事使他终于变卦。一件是1931年越来越多的迹象显示民主党人将要取胜。另一件是他和罗斯福的关系不断地恶化。

压抑多年的冲突终于在1931年11月的选举中公开爆发出来。当时，罗斯福提出一项要求拨款二千万美元重新造林的修正案（亦称第三号公民复决案），而史密斯在坦慕尼协会的一次集会上，对这项修正案做了恶意的抨击。罗斯福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写道：“艾尔竟如此激烈地反对第三号公民复决案，真是怪事！我不禁想起他当州长时，我对他提出的所有政策，几乎全都赞同，在八年中我只反对过一两项。然而，为了党的团结，我却没有开口。……”这一修正案的获得通过，被人们看作罗斯福在州内颇有势力的标志。

12月，罗斯福收到了亚特兰大市《宪法报》发行人克拉克·豪厄尔的一封信。豪厄尔刚在帝国大厦史密斯的办公室拜会了他。来信明确地告知罗斯福，史密斯对他的憎恶感情到了什么地步。豪厄尔和史密斯略事寒暄后，便问史密斯对罗斯福的个人敌对情绪的起因。史密斯回答说，他们之间的私人关系是不错的。但是，据豪厄尔说，史密斯接着便站起身来，踉踉跄跄，然后问道：“我的天！你知道吗？自从他当上州长以后，连一件

屁事也没征求过我的意见？他不恰当地采用了许多坏点子，而且是从一些对我很不友好的人那里听来的。他根本没把我放在眼里！”史密斯提高了嗓门，用拳头咚咚地敲着桌子，继续指责罗斯福说，他不肯告诉史密斯他竞争总统候选人的事，他在禁酒问候上态度暧昧，他那伙“该死的蠢朋友们”正在安排拥护罗斯福竞选的宴会等等。政治友谊只是因为政治原因而崩溃了。

坦慕尼派——正象党魁普伦基特一样——看到了机会并且紧抓不放。史密斯是两个恶人中的较好者，而且，他在纽约市民主党基层组织里仍然深孚众望。纽约州的代表团是由州委员会选出的全州性代表以及由地方选举的地区性代表组成的。坦慕尼协会公然对抗罗斯福，他们在州委员会里的势力所挑选的全州性的代表，大部分是他们的自己人；而在地区选出的代表中，支持罗斯福的和支持坦慕尼的，几乎各占一半。狡猾的坦慕尼首领们不给那些全州性的代表任何指示，于是在贪污案的问题上，他们可以被用作火力来攻击州长。结果是罗斯福发现自己在本州代表团里只能控制不到半数的代表。

在基层的争夺战

1932年1月23日，也就是罗斯福五十诞辰的前一周，他授权北达科他州民主党中央委员会把他的名字列入该州按选择投票法进行的预选名单。这样，他就正式宣布他已出马竞争民主党提名的候选人了。两个星期后，史密斯宣布，如果提名他为总统候选人，他将予以接受，不过决不会进行积极的竞选活动——政治家们分析，这一说法实际上是授意他的支持者们要为他进行积极的竞选活动，这种解释完全合理。还有六名其他候选人也参加了角逐，或者密切注视着这场角逐。

此时，罗斯福的竞选已经成为一个重大的行动。除了豪和法利及其助手们这些身边的随从以外，罗斯福还有一批老朋友和支持者。爱德华·豪斯上校，这个不知疲倦的矮小的得克萨斯州人，曾经追随过威尔逊，后来又离开了。他和散布全国各地的朋友们悄悄地在幕后策划。在华盛顿，有田纳西州的科德尔·赫尔、肯塔基州的艾尔本·巴克利以及蒙塔拿州的托马斯·沃尔什这样有影响的参议员们帮助斯福。然而，没有一个全国性组织能够从事这项工作。法利和豪所依靠的主要是州一级的政治家。竞选运动需要金钱，头三个月几乎就花掉了九万美元。不过，钱却不是一个棘手的问题。雷曼·老亨利·摩根索、威廉·H·伍丁、约瑟夫·P·肯尼迪、罗伯特·W·宾厄姆以及其他二十多个金融家、商人和实业家捐助了大量款项。这

个竞选活动的中心人物是罗斯福本人，他以书信方式与外界联系，在奥尔巴尼或海德公园宴请外州显要的政治家，几乎每天都要对法利和豪的活动发出指示。罗斯福在接待来访的全国知名的政治家方面，尤其擅长。华盛顿州参议员克拉伦斯·C·迪尔多年以后仍记得那一次州长如何得悉他在奥尔巴尼并邀请他赴宴的情形。“我和他交谈了三个小时，离开时，我成了他的一名忠实和热情的赞助者。……”

罗斯福的支持者是一大群五花八门的人物——有哈佛大学的老校友、城市政党头子、百万富翁、西部的激进派、南部民主党的极端保守分子、善于骑墙的中西部人、三K党人、老威尔逊派、老布赖恩主义者、教授、主张高关税率者、主张低关税率者——这是一种非同小可的人才荟萃。罗斯福正在直接地或间接地与一些当时或后来在美国政治生活中最有争议的人物周旋：赫斯特、休伊·P·朗、密苏里州的托马斯·J·彭德格斯特、波士顿的詹姆士·M·柯利。这种来自不同方面的支持给罗斯福带来了力量，同时也具备先天的弱点——其力量在于它给罗斯福树立了一个具有全国号召力的形象，其弱点在于他的支持者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可能不能团结一致和缺乏持久力量。

赢得总统候选人的提名，一般来说，不是依靠一次大规模的全国性竞选活动，而是依靠一系列的游击战，也就是说依靠在每个州和领地进行迂回的、往往是隐蔽的操纵。大规模的战略必须服务于小规模的战略，同时小规模的战略又必须让位给彻底掌握具体细节的策略。关于上千名可能成为党的全国大会代表的人物所需了解的细节形成了一个错综复杂的情报系统，而这正是法利的拿手好戏。

罗斯福的势力，依靠一年来不屈不挠的努力，在1932年最初的几次争斗中，都遥遥领先了。阿拉斯加、华盛顿、北达科他、佐治亚、艾奥瓦、缅因和威斯康星等州的势力纷纷开始倒向罗斯福，生动地表明他获得了范围广泛的支持。然而，罗斯福却始终没有取得决定性的领先地位。他面临着双重的困难。对于罗斯福的势力来说，即使它比联合的反对力量处于领先地位，那也是不够的，他们必须赢得具有魅力的三分之二多数。有几个州的代表团，由于预感到可能出现僵持局面而做了恰恰是法利一直竭力避免发生的事情——他们对本州的候选人提出了支持的保证，以此作为一种手段，或者把他们的选票暂时不用，以便将来讨价还价；或者在僵持局面出现时夺取提名。俄克拉何马州指示其代表们投票选举他们那位粗俗的州长阿尔法尔法·比尔·默里，而这位州长政治上的一些古怪行为和一撇

仿佛往下滴油的胡子成为漫画家们特别关注的焦点。密苏里州做出保证：它的三十六名代表将支持老牌反威尔逊的孤立主义者、性格暴躁的参议员詹姆斯·里德。马里兰州投票支持里奇，此人在风度、背景和辩才方面堪与罗斯福匹敌，而且已经四度当选马里兰州州长并且所获的多数不断增加。伊利诺伊州的五十八张选票归于参议员 J·汉密尔顿·刘易斯。他是一位有经验的人民党政治演说家，他的假发、粉红色的络腮胡子和惹眼的服装为他赢得了“伊利诺伊州的北极光”这个雅号。

1932年4月底，罗斯福的竞选机器似乎出了一些问题。史密斯在马萨诸塞州的预选中以三对一比例获得了选民投票的多数，这样，他就能获得整个代表团的三十六张票了。宾夕法尼亚州虽然把多数选票投给罗斯福，但是史密斯却显示了出乎意料的力量，特别是在反对禁酒者控制的地区。最沉重的打击5月初终于来临了。在同史密斯和众议院议长约翰·N·加纳三方竞争加利福尼亚州的四十四张选票中，罗斯福尽管比史密斯领先，却没有想到地落后于加纳。于是在第一轮投票中取胜的前景开始变得暗淡了。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

马萨诸塞州的形势极为糟糕。在竞选刚开始时，波士顿市市长詹姆斯·M·科利看风使舵，突然加入罗斯福的竞选行列。科利多年来一直是波士顿政界的一个臭名昭著的政客，经常遭到击败，但总能卷土重来，用他那甜如蜜的声音抚慰公众，并且无情地攻击那些保守然而可敬的民主党人。科利的动机很简单：他看到罗斯福是一个政治上很有成功希望的人，而 he 可以利用罗斯福来同参议员戴维·I·沃尔什、州长约瑟夫·B·伊利以及州的党组织相抗衡，以满足自己赢得州长职位的野心。科利也有点走运。罗斯福的长子詹姆斯在波士顿涉足保险行业，很想涉足政治。科利与他结成了牢固的联盟。当时在奥尔巴尼的罗斯福，作为父亲看见儿子对政治活动产生兴趣，既感动而又高兴。和历史上许多政治领袖一样，他很可能因为家庭关系妨碍了自己理智地作出的良好判断。

在马萨诸塞州，科利简直是毫无准备地投入了罗斯福的竞选活动。但是除了对他自己的派系以外，他没有取得什么进展。豪后来愤怒记述科利对竞选运动的领导如何地“糟糕”，“我们的力量一向存在于农村地区，而他却完全不予注意，同时也没有作出丝毫努力来争取农村选票。科利坚持要把竞选活动在全州范围内搞成一场城市中的战斗，而所有的组织工作和负责选举的官员都由沃什和伊利控制。这种作法和他原来同我达成协议的情况基本一致。该协议规定竞选活动由一个六市长委员会来办理，而他本

人只负责波士顿市。然而他根本没有遵守这个诺言，致使委员会中至少有四名市长对于罗斯福的事业不感兴趣。……”科利开展的竞选活动产生的主要效果，只是刺激方更加奋发地负隅顽抗，而史密斯这个被马萨诸塞州民主党当作偶像的人物的参加竞选，正好完全符合他们的需要。

罗斯福预感到他可能失败，最后一刻想达成妥协。他在波士顿召开了一次和解会议，没有通知科利参加，当时取得了一些进展。但后来消息传来，科利恰好在那天下午大肆抨击史密斯欺骗人民和破坏了民主党。会议无果而终。科利本人极力设法要和史密斯达成一项交易，规定如果罗斯福在后来的投票中能够得到代表团的完全支持，那么，在前几轮的投票中史密斯可以得到整个代表团的支持。但是沃什和伊利觉得没有进行妥协的必要。竞选活动在一场典型的“科利滑稽戏”中收场了，罗斯福在这出戏里被来自个人和宗派的一阵猛烈的抨击和谩骂所吞没了。

罗斯福在马萨诸塞州遇到的困难在于他不大可能肯定史密斯是确实希望为自己夺取最后的胜利呢，还是打算在某个时刻把他的实力全部较交别的什么人。从这种意义上说，罗斯福抢先开始竞选，也成了不利因素；他的对手都清楚他在为自己竞选，但是，在“阻止罗斯福”的势力拼凑起来的临时联合中，谁会突然现身而成为他的敌手，这却是罗斯福根本无法预料的。在加利福尼亚州，他也遇到了同样的困难。

竞选开始时，罗斯福的势力对这个州的形势十分放心，部分原因在于他们认为加纳参加竞选的热情和当选希望不大。加纳是得克萨斯州西部一个小镇的银行家和房地产经纪人（他喜欢把得克萨斯州称为“山羊之国”），现已爬上了众议院民主党势力的领袖地位，为了阴险而又好斗。他被人们视为一个极端的反对禁酒者并且敌视东部的商业利益集团，因此，他在全国范围内缺乏号召力，但在加利福尼亚州却有两个因素使他获得了力量：一个是庞大的“得克萨斯—加利福尼亚”协会，凡是得克萨斯州的候选人，它都宠爱，另一个则是赫斯特的支持。加纳在洛杉矶大大领先，如同史密斯在旧金山的情况一样。

由于罗斯福在党内寻求全国性的支持，这就使他在面临那些采取迎合地方的立场的候选人的情况下处于不利地位。在关于禁酒和坦慕尼协会等问题上，他都是小心谨慎地向前推进，或者保持沉默。但是不表明明确的立场，在政治上也往往是危险的。他的一位哈佛校友在写给他的信中气愤地说：“难道你希望为自己博得一个‘四怕候选人——胆小怕事、怕表态、怕自己不虔诚、惟独不怕陈词滥调的罗斯福’这样一个讨厌的别号吗？”

鼓吹自由主义的《民族报》的编辑奥斯瓦德·加里森·维拉德在写给罗斯福的一封公开信中直截了当地向他提出了十四个问题，例如“你是不是一个保护贸易主义者？请回答‘是’或者‘不是’。”“你主张废除宪法第十八条修正案吗？请回答‘是’或者‘不是’。”这位州长没有做出回答，他在私下写给维拉德的信中生气地说，这些都属于“你已不再打你的妻子了吗？”之类的幼稚问题。

但是，关于总的经济问题，罗斯福却采取了进攻的姿态。1932年4月，他在一次广播演讲中声称：“当前这个不幸的时代要求我们制订以那些被遗忘的、缺乏组织的、但却必不可少的经济力量单位作为基础的计划，要求我们制订的计划是……从下往上，而不是从上而下的，是再一次把信念寄托在经济金字塔底层的那些被遗忘者身上。”“被遗忘者”变成他那些最令人难忘的名言之一。他在奥格索普大学向一个毕业班发表演讲时说：“我们国家需要的——如果我没有把它的特征看错的话——而且也是它所要求的，是大胆的，持续不断地实验。”大约在1933年3月之前的一年，他就曾宣称，美国正面临着一种严重情况，它至少不亚于战争状态。

史密斯等待着从右的方面来击垮他。在罗斯福发表了那次关于“被遗忘者”的演讲后不久，史密斯说：“不论哪个候选人，只要他坚持对这个国家的劳动群众发出蛊惑人心的呼吁，唆使他们挑动阶级斗争、贫富之间的斗争以致断送了他们自己，那么，我一定脱掉外衣和背心，和他战斗到底。”

罗斯福在一方面与史密斯作战的同时，另一方面还要抵挡其他候选人。牛顿·D·贝克是一个特别令人烦恼的威胁。贝克是一位坚决推行改革的克利夫兰市市长，一位杰出的公司法律顾问，曾在威尔逊任内出任国防部长。因为他反复鼓吹美国应当加入国联，所以，人们一直没有认真地把看成是一位可能的候选人。但是，1932年1月，他却一反常态，宣称“除非人民中有一个开明的多数赞同加入国联”，否则他不会让国家走这一步。随着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的会期的逼近，法利和豪忙碌地采取行动，抵制贝克可能获得候选人的提名，他们警告西部人士，贝克是一个亲国联派，同时告诫劳工领袖们，他是“金融界大众”的候选人。

然而，人们的目光又重新注视到史密斯身上。罗斯福在6月间给一位朋友的信中写道：“我真希望艾尔不要进行一场接命的、卑鄙的战斗。这时所有的人都没有好处。虽然他可能妨碍全国大会的顺利进行，造成全面混乱，但是，如果你能忘记个人而首先为我们的国家作出努力，那岂不是好得多吗。……”

奇妙的三分之二多数

在芝加哥的罗斯福竞选总部里，法利在墙上贴了一张五颜六色的地图。这张地图不久便得了个雅号：“法利陆军元帅的作战图”，上面，标明他的上司在全国的实力，同时，也可以看出罗斯福的薄弱环节。因为，在1932年6月27日民主党全国大会开幕时，形势已经很明显，除非在最后时刻，代表们突然全部倒向罗斯福，否则，他要想取得人们经常预言的第一轮投票的胜利，那是不可能的。可是，谁能使这种一面倒的局面发生呢？法利还不知道，为了再赢得另一百张选票以便稳操胜算，他却受到一次又一次的挫折。

他觉得关键在于中西部三个州——俄亥俄、印第安纳和伊利诺伊所结成的集团。开局的时候，俄亥俄州看来很有希望，现在它让代表们支持本州候选人乔治·怀特州长。据报道，这是为了将来使这批支持者转而支持贝克。印第安纳州的状况令人严重失望和困惑不解；法利曾主动提出，使保罗·V·麦克纳特在全国大会上获得一个高级职务，条件是要他帮助通过谈判指示代表团支持罗斯福。然而，麦克纳特却不愿或者说不能照办。在伊利诺伊州，法利受到的打击最为严重。参议员刘易斯在全国大会召开以前退出了竞选，所以原来预期他可参获得的票数将归于纽约州州长，但是，他的退出却安排得过早了。伊利诺伊州的代表团竟然又提出了一个本州候选人，一位芝加哥银行家，而且他们并不打算改变主意。

在压力不断增大的情况下，罗斯福的势力在最后时刻采取了一项冒险的策略，险些使他们在这场战斗中失败。这就是废除关于三分之二多数的规章。这个想法是很简单的：每一次党的全国大会开幕时，都要按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投票决定大会的规章；拥护罗斯福的人们确信，他们有把握取得这种多数，所以他们只需要修改一下规章，就可以按多数裁定原则提名候选人。

如果安排的时间恰当，这一策略也许会成功，但情况并非如此。这个问题是在全国大会开幕以前由法利召集拥护罗斯福的代表们举行的一次组织会议上提出来的。路易斯安那州参议休伊·P·朗出人意料地起来发言，提出一项决议案，宣布州长的朋友们将为争取通过简单多数的规章而战斗。这位领导人物敞开上衣，两只胳膊忽上忽下地挥动着，抬起那张又圆又胖、布满麻子的脸，大嚷大叫要采取运动。法利不敢阻止这位人物，因为他控制着路易斯安那州全体代表的选票。此人曾告诉过弗林，他之所以支持罗斯福只是因为他遇到了其他竞争者。决议被通过了。

反对派怒不可遏。参议员卡特·格拉斯说，按这样的方式获得总统候选人提名，与“赌徒使用花招赢得残缺不全的货物”没有两样。罗斯福的反对派迄今为止仍然四分五裂，现在却有了一个涉及道德问题的争端使他们空前团结起来了。更糟的是，南部的亲罗斯福的代表团在有关多数裁定原则的问题上，显示出背叛的迹象，因为三分之二多数的规章已经成为一个令人尊敬的结构，用来保护南部在党内的权力。

法利通过电话同当时在奥尔巴尼的罗斯福和在芝加哥的豪商议后，决定放弃原来的打算。他曾小心翼翼地避免把他的上司牵涉到原先的决定中去。事实上，正如罗斯福在这场争夺提名的战斗中曾参与了一切重大的决策那样，他也直接参加了改变三分之二多数原则的企图，但是由于朗的鲁莽行动，他和法利对于时间安排失去了控制。州长的让步在当时所能允许的条件下，做得十分体面。他说：“我相信并且一贯相信，三分之二多数的原则不应再加以采用了。这种规定是不民主的。不过，事实是这一问题直到参加全国大会的代表们产生后才提出来的；我不能容忍我本人和我的朋友们遭到下列指控，说我们不够正大光明，或说我们使用了那种被抨击为压制反对派的方法。……”

罗斯福派整顿了支离破碎的阵线，现在又要面临关于全国大会组织问题的最初战斗了。在这些热身赛中，只需要获得简单的多数就能取胜。罗斯福势力动员了足够的票数使来自路易斯安那州和明尼苏达州的这两个关系友好的代表团当选，并且推选明尼苏达州参议员托马斯·沃尔什为常务主席，而击败了史密斯的候选人朱厄特·肖斯。这场关于常务主席职务的竞争，又引发了对罗斯福派的新的指责，说他们涉嫌欺诈，因为他们在那年早些时候，曾经表示要支持肖斯。在夺取常务主席的竞争中，626票对528票这一比例显示了在争夺总统候选人提名的竞争中双方实力将多么接近。但是，史密斯派人士由于提出了要求撤销“彻底反对禁酒的主张”这一政纲而取得了巨大胜利，从而使他们的士气大振。而这一政纲引起的兴趣居然大大超过了民主党关于经济恢复的宣言。

提名候选人的唱票终于开始了。法利到处奔走，和人们握手，声称胜利已经在望，游说各代表团趁着现在还有机会，赶快加入胜利者的行列。豪在一家旅馆的房间里遥控最后一刻的情报行动，向支持本州候选人的代表团中的关键人物进行试探。在奥尔巴尼，罗斯福守候在收音机旁，不时通过一条专用电话线和他的副手们商谈。而史密斯嘴里叼着一支雪茄烟，坐在一群坦慕尼代表中间，这群人对罗斯福非常敌视，法利几乎难以找到

一个座位以便在唱票期间投票。直7月1日凌晨4点多钟，关于提名和赞成提名的讲话才完全结束。代表们被长达十小时的浮夸的演讲、示威游行以及震耳欲聋的奏乐声搞得精疲力尽，现在都筋疲力尽地倒在椅子上了。

首次选举的唱票结果和预期的一样。罗斯福的票数一开始就遥遥领先，并且一直保持领先的地位。第一轮唱票的结果：他最后得票666又四分之一张，与此相比史密斯所获的201又四分之三票，加纳的90又四分之一票及怀特的52票都相形见绌。然而，若要获得三分之二的多数，大约还差一百张选票。在唱票人检票时，法利又回到台上坐下，等候着代表们踊跃加入得胜者行列的热潮到来。

然而，他期望的事情并未发生。

法利慌忙从台上下来，跑到代表席上，恳求其他代表团转变立场。他手里有副总统候选人这张牌，但是，那些代表团却一味拖延，想等着观望一下潮流会不会还有逆转的可能。代表们疲惫不堪，一心想要休会，但是罗斯福派却希望在他们自己的那些代表团开始动摇以前，趁势再搞一次唱票。第二次唱票结果揭晓，罗斯福又多得了11又二分之一票，增加的票数微不足道，结果使法利将希望全放在第一轮投票上的作法显得戏剧化了。

这时依然没有一个代表团投诚过来。而反对派现在却要求再投一次票了。他们声称罗斯福已经被遏制住了。第三次投票表明，罗斯福的票数又向上增加了5票。他的阵线总还算坚定，但是对方的阵线也同样牢不可破。上午9点钟，第三轮唱票过后，代表大会宣布休会，代表们蹒跚地从会场走到阳光下去。

随后的几小时至关重要。法利必须赶在自己的阵线发生动摇以前取得相当数量的选票。一个代表团的背叛就有可能引起连锁反应，使其他代表团纷纷投奔加纳，因为在第三轮投票中，加纳又捞到11张选票了。密西西比州的20张选票已经岌岌可危，这个州的代表团是依据单位投票制的表决结果：10又二分之一票对9又二分之一票来支持罗斯福的，在第三轮投票中，吃力地为纽约州州长保住了这个州。阿拉巴马、阿肯色和明尼苏达等州也都有弱点。

法利手里仅剩的一张牌却是张重要的牌。在这一时期内，他一直与加纳的一批亲信进行接触，其中有得克萨斯州的众议员萨姆·雷伯恩。加纳是一位严肃的候选人，但他不希望代表大会出现僵局，而且他个人也不同意三分之二多数的规章的。法利还和赫斯特直接接触，警告他一旦出现僵局，贝克就会坐收渔翁之利，而贝克的国际主义观点正是这位报刊发行人

所竭力反对的。赫斯特对于史密斯更加反感。法利在全国大会上想尽办法对加纳派的人士施加压力。当罗斯福派的一些领袖们向十几个不同的方面表示同意使他们获得副总统候选人的提名时，法利却已经可以作出明确的提议了。这场交易一拍即合。史密斯整整一天在华盛顿希望同加纳取得联系，但这位众议院议长除了雷伯恩以外不肯和任何人谈话。当天傍晚，雷伯恩从加纳那里获得了弃权的正式通知。时间一点不嫌过早。密西西比州代表团已经垮下来，加入了联盟。

获得加纳的同意，让他的代表们自行其是是一回事，而获得他的支持者的同意却是另一回事。得克萨斯州的庞大代表团到芝加哥来，是为了给杰克·加纳争得总统候选人的提名。除此以外，法利还面临着一个特殊障碍。那年早春，罗斯福派曾经企图夺取对得克萨斯州代表团的控制，结果一败涂地，而加纳的势力把代表团里亲罗斯福的人士排挤得所剩无几。现在要这些得克萨斯人加入纽约州州长一方，他们未免有点犹豫不前。他们召开的选举候选人的会议一片混乱：加纳派领袖们主张为加纳的提名战斗到底，请求代表们站稳立场；妇女们歇斯底里般的大嚷大叫；其他州的代表们也悄悄溜进他们开会的房间，忙着许诺在下一轮投票中一定为加纳多投一些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许多反罗斯福的人都不在场，他们正在其他代表团中进行活动，给众议院议长拉选票。在这种混乱状态下，雷伯恩以 54 票对 51 票的微弱优势勉强地使得拥护罗斯福的立场获得通过。

于是，倒向罗斯福的连锁反应开始了。得克萨斯州改变了立场，从而使加利福尼亚州也改变了态度。到第四轮投票时，麦卡杜发言了，八年前他曾是三分之二多数裁定原则的受害者。坐席上亲史密斯的代表们用嘲讽或讥笑声淹没了他的声音，但是他的声音终于冲破了一切。他大声宣称：“加利福尼亚州代表团到这里来是为了提名一位美利坚合众国的总统候选人。它不是为了把全国代表大会搞成一个僵局才到这里来的，也不是为了让它重蹈 1924 年那种破坏性竞争的覆辙。加利福尼亚州把它的 44 张选票投给富兰克林·D·罗斯福。”

罗斯福的办公室里回荡着收音机传来的疯狂的欢呼声。他倾身向后靠着，咧开嘴快活地笑着说：“麦卡杜真够义气！”其他的代表团很快就都表示同意了。但那些支持史密斯的顽固分子仍然反对。他们不肯让这一提名得到全体通过。

在华盛顿的一个屋顶花园里，一位身材矮小的人坐着抽雪茄。一个记者发现了他。“你倒向罗斯福了？”“对啊，年轻人。”记者表示了惊讶。雪

茄烟头闪耀着红光。“小伙子，我的年纪比你稍大几岁，政治是有意思的事。”在芝加哥，代表们纷纷关心为什么加纳会改变态度。甚至在他开始让步的时候，还有几个州转而支持他呢。当然，他已正式被提名为副总统候选人了，然而用一个稳固的众议院议长职位交换一个成败未卜的副总统地位，对于这位精明的得克萨斯人来说，这笔交易似乎有些玄乎。难道真是由于害怕出现僵局吗？是不是因为赫斯特的原因呢？加纳的支持者们感到茫然。一个失望的得克萨斯州政治家说：“这叫袋鼠候选人，后腿比前腿壮。”

罗斯福的势力得到了胜利——不过同时也遭到了失败。他们支持了一位竞选搭档，而这位伙伴所在的那个区域在11月的大选中是肯定要投民主党的票的。他们使一些西部的支持者感到失望，而这些人远在芝加哥举行全国大会以前就替罗斯福效忠了。他们犯了一些严重的失误。然而，这场争夺候选人提名的战斗显示了他们的候选人的基本力量，这种力量可以战胜他和他的副手们的失误所带来的困难。真正的考验还在前头。

第八章 神奇的竞选运动

罗斯福以他所钟爱的那种戏剧性姿态发动了他的竞选活动。当党的全国大会正等待着他的时候，他从奥尔巴尼飞到现场接受提名，而不是按照常规，在几个星期后再宣布接受。由于受到风的袭击，他乘坐的那架脆弱的三引擎飞机晚点了几小时，而全国大会的领袖们一度眼巴巴看着那些民主党人的演讲均已结束，只好借助于乐队指挥和歌手们来把疲惫不堪的代表们留在座位上。在飞机上，州长从容地准备了他的讲稿，后来睡着了。罗斯福夫人、罗森曼以及其他人都冻得发抖。他的儿子约翰坐在飞机后舱，一声不响地忍受着晕机之苦。

从飞机场前往全国大会会场的那一段路，仿佛是一次凯旋游行。罗斯福对大会说他出来接受提名，就标志他不想采用那些虚伪和假冒的东西。“让这个行动标志着我打破了传统。从现在起，我们党的任务就是要抛弃这些愚蠢的传统；而让共和党的领导人去违背诺言吧，因为他们倒是更加精于此道的！”

这篇演讲之所以冗长而且杂乱无章，部分原因是由于州长的顾问们围绕他的演讲内容展开了激烈的争论，部分原因是由于他从机场到大会会场时，一路上一边向群众频频点头，挥手致意，一边考虑：为了照顾豪的情绪，他宁愿采用豪所起草的讲稿的开头几段来代替自己的讲稿。讲稿本质

上是一份呼吁书，要求实行一项试验性的复兴计划，这个计划既不极端，也不反动，它将有利于全体人民，而又不致沦为一种“权宜之计的、不计成败的、不负责任的机会主义”。他说：那一年，人民需要一次真正的抉择。“我们的党必须改造成为这样一个党：它具有自由主义思想，有计划地采取行动，对于国际问题持开明的观点，而且为我国最大多数的公民谋取最大的福利。”他对党的政纲表示“百分之百”的赞同，同时在共和党领袖的种种失败上大作文章，对他们大加声讨，并且用一些含糊的措词阐述了关于税收、农业、关税和复兴的计划。

罗斯福以如下语言结束他那篇冗长的演讲：“我向你们保证，我决心要为美国人民实行一种新政。”出现在演讲中的“新政”这个词，当时无论是对于罗斯福，还是对于其他参与起草讲稿者来说，都是没有特殊意义的；但是，事隔不久，它就会比这篇讲话里所有其他的词加起来还要引人注目了。第二天，罗林·柯尔比画了一幅漫画，画面上是一个新的“荷锄者”，他正在迷茫地，却又满怀期望地抬头望着一架标有“新政”字样的飞机。

大象和狐狸

如何使所述新政起飞，则是法利的使命，而他由罗斯福推荐已当选为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了。这位新主席从前任手里接收了一名杰出的宣传工作者，名叫查尔斯·麦切尔森。他是一个代人捉刀的业余作家，曾写过几十篇对胡佛政府进行无情抨击的演讲稿。罗斯福的个人组织迅速地转化为一个开展竞选活动的指挥机构，总部设在纽约。不久，六百名工作人员分别在二十几个专门部门进行工作了。妇女部门也得到了高度的重视，它是由一批富于想象力而又坚持不懈的妇女工作者领导的，其中包括埃莉诺·罗斯福。

罗斯福和法利一向坚守一个原则：他们必须越过州级与县级委员会所构成的金字塔式的重叠机构，而同十四万名地方的党务工作者建立直接的个人联系。这些人员的姓名，在全国大会召开以前的竞选活动中已经收集完毕。数以百万计的圆形小徽章和传单分发下去。另外，这些委员们还接到罗斯福和法利写给他们的私人信，其中法利的信是用绿墨水签名的。法利把竞选活动当成一场党内斗争，努力使支持罗斯福的民主党上层人士控制形势。8月初，他在民主党领导人会议上说：“我们将尽力获得候选人后授会所能发挥的作用，但是我们不想让它们为所欲为。”法利想要防止混乱情形的发生，但是纯粹由党来实行控制也有不利的一面。专业团体没

有获得充分的注意；尤其对于劳工问题，总是随便地予以处理。

但是，罗斯福势力的最大的薄弱环节是坦慕尼协会。坦慕尼领袖们会采取什么行动呢？在法利从芝加哥归来的那一天，得到了一个答案。那天，他竟然孟浪地闯入坦慕尼总部，那里正在举行爱国仪式。听众席上一片嘘声；台上坐着几位首领，一言不发。然而，坦慕尼却没有多大的行动自由；它的路线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两个人：史密斯和沃克。

史密斯因为遭到失败而心怀怨恨，在罗斯福到达芝加哥前就离开了。他是否会公开攻击胜利者呢？可能性是有，但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知道。他没有发动攻击；但是当罗斯福的密使敦促他支持候选人名单的时候，他又犹豫不前了。罗斯福在给弗兰克富特的信中写道：“我想他是要按他自己的方式，在他自己选定的时候采取行动的。”艾尔的确是这样做。在大选前的最后几周里，他在马萨诸塞州和康涅狄格州为罗斯福进行了有力的竞选活动。

沃克的情况却有所不同。西伯里在纽约市对贪污案的调查，恰好在全国大会召开前的几个星期达到关键时刻，他对市长进行了指控。罗斯福认为他们把调查有意安排在这个时候，其目的是为了使他难堪。沃克曾在党的全国大会上傲慢地投票反动罗斯福，不久就提出了自己的答案。8月底，竞选活动正在进行时，罗斯福在奥尔巴尼主持了一系列的意见听证会。当时的情势需要他运用所有政治手腕，疲于应付。一些坦慕尼领袖情绪烦躁，公开宣称要拒绝支持党的全国大会所通过的候选人名单。甚至广播电台的牧师查尔斯·库格林神父也从底特律来信要求由法庭审理沃克一案。敌对的共和党人则把这件事夸大为罗斯福与坦慕尼派的一个全国性争议。罗斯福日复一日地以司法人士的风采耐心询问这位市长有关他的那些纠葛。由于压力日益增大，沃克突然宣布辞职，指责罗斯福采取了“不公正的、非美国式的”方式听取申诉。州长又以熟练的技巧来走政治钢丝了。他既排除了共和党制造一个全国性争议的可能，又没有失去坦慕尼的支持，这一派在大选问题上意见不一，但无论如何，他们不敢公开反对罗斯福。

在解决了沃克案件后，罗斯福便能认真地开始他的竞选活动了。他曾得到许多人的建议，他们的意见大致如此：（1）对于这次大选他已经“稳操胜券”；（2）倘若进行一次竞选旅行，则反而可能危及民主党的领先地位。罗斯福对于这两种意见都不予考虑。他十分谨慎（几乎谨慎到迷信的程度），不敢设想自己一定会取胜。他深信他作一次竞选旅行，会使胡佛直接受到打击，而且可以借此显示他的体力，平息关于他的健康状况的种种

怀疑。另外，也就是他想出去走一走。他对法利说：“我正在火头上呢。”

也许以前从来没有一个候选人象罗斯福那样，为自己的竞选活动网罗了这样一个庞大的、人才济济的顾问队伍。其中的人物从充满高尚理想的大学教授到愤世嫉俗的党内政客应有尽有，他们的言论包括了左中右各种政治观点。其中有一两位高参试图为候选人把这些意见综合成合乎逻辑的形式，但这却是一项艰巨的任务。罗斯福喜欢玩弄计谋而不愿树敌。他在寻找一些能够吸引形形色色的社会集团的建议，哪怕这些建议再缺乏内在的连贯性也无所谓。当这位总统候选人在大街上穿行，或在火车尾部的平台上发表演讲时，在演讲起草会议上爆发激烈的争论，它爆发在主张实行高关税与主张实行低关税的人士之间，在各种不同的农业政策的倡导者之间，在主张保持预算平衡者与鼓吹扩大公共工程基本建设的人们之间。

这位候选人说了些什么呢？当国家形势到了这个紧要关头，他为美国人民提出了一个什么纲领呢？

罗斯福遵循他在以往的竞选活动中的惯例，把每一篇重要演讲的内容限于一个重要的问题。在托皮卡，他作出保证，保证改组农业部；他支持“有计划地使用土地”、通过税制改革来减少对农民所征的税、联邦实行贷款以便为农场抵押人重新提供经费，同时赞成实行低关税率；一个为解决农业生产过剩而制订的资源国内配给计划，尽管仅仅粗具雏型，他便公开表示支持。在盐湖城，他扼要地介绍了联邦制订的一项全面的计划，目的在于调整和援助运营状况不佳的铁路运输业。在西雅图，他对鼓吹高关税者发动了极为猛烈的攻击。在波特兰，他要求把公用事业的财政收支全部公开，要求联邦能源委员会对控股公司实行管制，要求对股票和证券的发行加以限制，要求在制订利率时坚持慎重投资的原则。在底特律，他号召消除造成贫困的根源——但拒绝详谈作法，因为那天是星期天，他不愿谈政治！

其中一次演讲特别使左翼的观察家们激动不已。在旧金山的联邦俱乐部，罗斯福雄辩地申明建立经济宪法秩序的必要性，谈到政府作为仲裁者的作用，以及政府具有联邦法规这个最后手段。虽然作为一个具体的政治纲领来说，这些想法的含义还是不明确的，但在这篇演说里却充满了诸如经济寡头政治、制订经济权力法案、需要提高购买力以及每个人都享有生活的权利等语，而罗斯福给最后一个术语下的定义是：它应包括享受舒适生活的权利。但是，这些观点以后在竞选活动中都不再被提起，因为这位总统候选人有了其他的想法，其中有些比胡佛本人的还要正统。

对于细心的观察家来说，罗斯福的政治主张都令人难以捉摸。记者埃尔默·戴维斯写道：他确信罗斯福是反对禁酒的，至于别的问题则一无所知？——“关于他的空泛议论，你连一个题目也无法加以非议；你几乎没有可以讨论的余地。但是，这些说法如果还真有意义的话，那也只有富兰克林·罗斯福和他的上帝才能知道。”

罗斯福发现抨击胡佛的政策要比讲清自己的明确建议更加容易。他宣称：政府通过它的虚伪的经济政策鼓励了投机和生产过剩；它竭力地低估经济萧条的严重性；它错误地指责其他国家造成了经济大崩溃，它“拒绝承认和纠正国内引起了经济崩溃的弊病，它迟迟不发放赈济；它遗忘了实行改革。”罗斯福及其手下上千名演讲人把胡佛总统描绘成坐在白宫里的一位行动迟钝、无动于衷、凡事不问的总统。

胡佛发动了强有力的反击。他集中火力抨击罗斯福观点中的他称之为激进主义和集体主义的观点。也许正是为了对付他的攻击，或者是为了某些未知的其他原因，罗斯福在竞选活动的中途把他引人注目的论调降低了。他把自己关于减少关税的立场作了极大的改变，以致他的立场和他那位身在白宫的对手的立场变得十分接近了。他希望政府为了稳定商业而进行的干预能够“保持在最小的范围以内”——也许仅仅是限制在不引起公众注意的范围以内。他在失业问题，采取了软弱的立场，保证在新政方针下没有一个人挨饿，保证联邦政府在工资和工时方面将会树立榜样，并劝说实业界加以仿效，政府将成立就业介绍所，由各州实行失业保险。他许诺要和国会进行合作，同国会的两党都要合作。他在竞选活动中发表了数次总结性的声明，其中有一次他就浪费和赤字问题声斥了胡佛。他允诺要使预算平衡——这回所用的例外字眼算是最少了。

在这个声明里，他没有号召人民采取行动，也没有号召进行一个改革运动。罗斯福没有提出什么纲领，只是聚集了一些建议，其中有些经过深思熟虑，譬如铁路计划，其余则处于两可之间，甚至毫无意义。全面看来，他是非常稳健的，很少流露激烈的感情或摆出好斗的姿态。在罗斯福的一些演讲里，当他引导听众剖析胡佛的政策，然后又阐述他自己的政策时，他的论述颇有学术演讲的风味。对于一个陷入经济危机的国家来说，这是一场颇有新意的竞选活动。

罗斯福的目的是什么呢？他的目标是在这次选举中获胜，而不是要展示一套连贯的政治哲学。他也没有这样的哲学。但是，他知道如何赢得选票，如何获得各个集团的支持，如何改变步调和政策。有一次，雷蒙德·

莫里向罗斯福提供了两份关于关税政策的演讲稿，观点截然不同，而罗斯福却对这位学究说：“把这两份材料编成一份吧”，结果令他大为震惊。罗斯福在写给弗洛伊德·奥尔森的信中谈到他在托皮卡发表的关于农业的讲话：“我想你会同意这篇讲话是够左的，这就可以防止再有认为我右倾的说法了。”

胡佛怒不可遏：“真是一条变色龙，反复无常。”胡佛的工程师头脑习惯于有条不紊的思维，而罗斯福却在他的周围舞剑，忽而在左，忽而在右，有时进攻，有时又突然退却，使得他无法进行搏斗。社会党总统候选人诺曼·托马斯尽管有精心制订的、雄辩而详尽的竞选纲领，也无法与罗斯福对抗。现在不是 1896 年或 1912 年，甚至也不是 1928 年了。美国人民在他们历史上最严重的经济危机时期，仍然处于麻木不仁、不知所措的状态，他们在政治家掀起的狂风暴雨中似乎也只能作出没精打采的反应。

大选前夜，罗斯福在波基普西对他的乡亲们发表了最后一次公开演讲。他回忆起这次竞选活动中的一些“光彩夺目的掠影”——在杰弗逊城议会大厦前耀眼的灯光下的广大人群，在托皮卡炎热的阳光下专心倾听讲话的堪萨斯人，跋涉几百英里来支地他的怀俄明人民所流露的那种“强烈的、直爽的亲切感情”，内布拉斯加州麦库克的落日，在温泉坐着轮椅的孩子通讯他横贯新英格兰的那次激动人心的北方之行。

“一个人历经多年的社会生活，变得聪明起来。他明了当人们的赞助降临到他头上，这不一定是因为他本人多么厉害，而是因为人类的变迁与进步的漫长过程中这一短暂的瞬间，人类的某种共同的愿望在他身上令人满意地体现出来了。”

人们的赞助发出夺目的光芒。大选当天夜晚，罗斯福在纽约市的竞选总部里，高兴地坐在朋友中间，这时选举结果的汇报源源不断地传来。他获得 22,815,539 票，胡佛获得 15,759,930 票。他在四十二个州获胜，得到了 472 张选举团票。这几乎是一场席卷全国的胜利；只有宾夕法尼亚、德拉瓦、康涅狄格、佛蒙特、新罕布什尔和缅因六州拥护共和党。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一次个人性的胜利：除去南部和新英格兰地区以外，罗斯福在占联邦五分之四的州里所获票数的百分比都超过了民主党各众议院候选人所获票数的百分比。当然这也是民主党的一次胜利。民主党在新选出的参议里，以 59 席对 37 席，在新选出的众议院里，以 312 席对 123 席而赢得了多数。

当晚，胡佛发来了贺电。翌晨，罗斯福在六十五号大街的那幢房子

里，坐在床上就用胡佛来电的背面随便写了下列回电：

“我欣赏你的慷慨贺电。我想向你承诺，在我履行州长必要的行政职责的同时，我已作好准备，和你携手合作，为了我们——”

罗斯福停下笔，划掉了最后两句话，把它改成：

“作好准备，以各种方式来达成挽救我们的国家这一共同目标。”

准备工作就绪

有人说：一个伟人在历史上的地位大半取决于他退出历史舞台的方式。其实，一个伟人在历史上的地位也大半取决于他登上历史舞台的方式。罗伯特·舍伍德评论道：“世间没有一个剧作家能够为任何一位新总统、新独裁者或新救世主设计出一种比给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所设计的更好的登场方式。”

舍伍德写道，这位当选总统享有大显身手的全部有利条件。胡佛面临着一切落选的总统的同样命运——他的声望在大选结束后甚至更加下降。罗斯福的首要目标就是要和胡佛政府留下的烂摊子不发生任何联系。从大选揭晓到就职典礼之间的四个月里，这两位政治家进行了一场顽固的、秘密的决斗：一方面，胡佛在不断严重的经济危机面前极力挽救自己的声誉；另一方面，罗斯福小心翼翼地尽力躲避，以免与之发生任何牵连。

大选以后不久，这种形势就逐渐明朗起来，当时外债问题突然发展到了危急关头。1932年11月12日，胡佛通知罗斯福：英国希望暂缓向美偿付一些应交的款项，并要求对债务进行一次全面的检查。这位当选总统是否愿意和他会商这个问题？罗斯福看出前面会有阴谋。胡佛对于战债问题的看法是根据他的基本理念，即经济萧条是由国外的因素造成的，因而最好的办法是通过国际行动予以解决——这个设想在竞选运动中曾受到罗斯福的猛烈抨击。再者，罗斯福对于这个问题也不十分清楚。他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曾要求民主党在这个问题上有一个建设性的全面立场，而且他曾嘲弄过柯立芝说的那句话：“好啊，是他们借的债务，是不是？”但是他做的也只有这样了。

罗斯福懂得，不管前面会有什么陷阱，他也必须响应民众的要求：为了国家的团结一致，他应当和即将离任的总统和衷共济。他的策略是遵守实行合作的一切礼仪——如同胡佛会面、互通信件和电报，但是逃避采取共同的行动，因为共同的行动意味着共同的责任。他的公开立场是：如果需要采取行动，胡佛总统是有权采取行动的；当选总统无需任命过渡时期的代表，他在3月4日前不承提任何义务。但他私下却告诉记者们说：

“那不是他的事。”胡佛争吵一个月后，一无所得，便把他和罗斯福的全部通信公诸报界，并且冷冷地评论说：“关于我在最近给国会的咨文中略述的外国提议，我曾建议罗斯福州长采取合作行动，但是，他认为对于我的建议不愿表示同意。我将尊重他的愿望。”

1933年1月，国家的状态与这个毫无成果的谈判在背景上相互吻合。夏季以来，农产品价格猛跌；工厂的生产、零售商业、股票和证券全都下降。失业人口增加一二百万，剧增至一千五百万左右。农场主们使用武力来保护自己的家园以免被取消赎回抵押品的权利。在城市中，失业的白领阶层人员一夜之间出现在街头，叫卖苹果了。底特律几家主要银行陷入严重困难，这个秘密消息通过金融界慢慢地公诸于世。

与此同时，国会采取一些无聊的行动来度日如年。这些议员们闷闷不乐，因为其中一百五十八名在11月的大选中已经从选民手里接到了免职命令，他们由于党派控制而陷于四分五裂，对总统满腹抱怨，对当选总统又感到高深莫测，因而找不到采取行动的基点。罗斯福在一些问题上，通过民主党领袖们表明了自己的观点，但是他没有效仿当年威尔逊在1912—1913年间的做法，在就职以前的几个星期，就忙着动员他的领袖们和起草法案。有一个共和党众议员问道：当选总统持什么立场？“他今天站在这里，明天又站在另外一边。”疲倦的国会议员们一边喝啤酒，一边喋喋不休地争吵。他们在救济问题上陷入困境，对于银行业、农场抵押救济、银行存款立法等问题一味拖延，不肯采取行动。没有总统的领导，什么事情他们也完成不了。

在大洋彼岸的世界各国，危机也初现端倪并时隐时现。1933年1月30日，正当罗斯福五十一岁寿辰那一天，昏聩无能的兴登堡总统解除了总理的职务，而让阿道夫·希特勒继任。希特勒马上解散了德国议会，下令进行一次选举，逮捕反对党领袖，并且用制造出来的恐慌来威吓选民。日本由于他在中国满洲的侵略行径受到了国联的谴责，竟骄横地从国联大会撤走了自己的代表。据泄露的消息说：墨索里尼治下的意大利正把武器运进奥地利，武装当地的法西斯党徒。拉丁美洲国家正酝酿着不满的情绪。

在这漫长的几周里，罗斯福依旧轻松愉快，镇静自若。他对州长事务进行了扫尾工作，把任命名单一再地加以变动。他和国务卿史汀生以及他自己的顾问们商讨了外交事务，在温泉以及文森特·阿斯顿的游艇上消磨了几周，和国会领袖们保持着联系，并抽出时间和参议员乔治·W·诺里斯一同视察了田纳西河地区。但是他的一切行动都是以徐缓的圆舞曲节奏来

进行的。任凭记者们的百般请求，任凭社评人的种种非难，他都拒绝针对日益尖锐的经济危机发表声明，或者宣布自己的计划。他只是等待着。

在就职前的几周内还发生了一件事，使原来的紧张气氛变得更加严重。2月中旬，在迈阿密罗斯福汽车周围的人群之中，有一个名叫赞格拉的皮肤黝黑的矮个子，一边高呼：“快要饿死的人太多了！”一边对着罗斯福接连地开枪射击。一位妇女眼明手快，使劲把他的枪向上撞了一下，他没有击中罗斯福，但是击中了几个旁观者，并且使芝加哥市市长舍马克受了致命伤。当时就在现场附近的莫利，看到罗斯福在众人面前安然自若，并不感到奇怪。但是使他吃惊的是，在这个事件以后，当选总统到了他的朋友中间时，他毫无害怕、气馁的神态。莫利说：一点也看不出发生过什么特殊的事件的迹象，“就连动一动肌肉，皱一皱眉毛的情形都没有，甚至他那快活的神情也让人找不出一假装的痕迹来。”

到2月中旬，银行业经营状况也正接近紧急关头。2月17日，即罗斯福乘游艇旅行归来的那一天，胡佛亲笔写了一封信给他，措词表露出不安的情绪。胡佛总统说：人们的信任正不断地下滑；他敦促罗斯福向全国保证不会“对通货加以干预，或造成通货膨胀”；保证预算平衡，虽然这样做意味着要征更多的税；保证维持政府的信用。罗斯福回信说，仅仅发表声明也于事无补。毫无疑问，罗斯福怀疑：如果他发表了这样的表明，那就等于赞同他在竞选活动中所攻击的胡佛的政策。而胡佛私下也承认了这一点。当选总统终于保持缄默。他还要等待两个星期。

2月底，胡佛做了最后一次绝望的斗争。他想要发布一项行政命令，规定对银行提款加以控制，但是他不敢肯定自己是否有权这样做，而且他也担心一个民主党国会可能拒不接受这种行动。当选总统会同意这种行动吗？罗斯福没有阻止。他说：总统有权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现在事情已发展到危急关头。银行家们深夜还坐在办公室里，统计已被提取的存款总数急得要发疯，不知道自己的银行是否能渡过危机。在新总统就职前一天夜里，财政部官员们恳求纽约和伊利诺伊两州州长关闭银行以防第二天早晨发生挤兑，使银行倒闭。

罗斯福没有预见到在举行就职典礼的那一天，银行界的局势会达到戏剧性的高潮。这是谁也无法未卜先知的。但是他把手里的牌打得十分漂亮。尽管政府再三请求，而他的朋友也热切地规劝，他都没有摊牌。他没有采取任何不得体的行动来影响他登上这个伟大的历史舞台。

关于内阁成员的名单，罗斯福迟迟不予公开，一直拖到过渡时期快要

结束时，内阁人选的公布，只能使新任总统的形象变得更加鲜明了。

罗斯福挑选的内阁阁员囊括各种各样的人物，从人选方面很难分析出罗斯福的政治纲领。科德尔·赫尔，六十一岁，身材瘦削、头发花白，一看就知道是国务卿的人选。赫尔的两眼喜欢垂视、肩膀下垂、声音柔和，但是在这种外表之下，却掩藏着一种坚强的力量和不屈不挠的精神，而在他任众议员以及后来任田纳西州参议员和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的漫长政治生涯中，正是这种力量和精神使他出类拔萃。赫尔是克利夫兰的民主党人，经济观点偏向保守，多年以来，领导了降低关税的斗争，他用充满统计数字的论述对外贸易的演说，使议会感到信服。他将成为总统和国会保守议员之间的一个有用的桥梁。

最初罗斯福的财政部长人选是卡特·格拉斯，他曾在威尔逊任总统时担任此职。但是，这位性格暴躁的弗吉尼亚州人拒不接受，一个原因是由于他的妻子生病，另一原因是由于他担心罗斯福会试行一些非正统的财政政策。这样，当选总统便选定了威廉·伍丁。他是一位资本家，在总统竞选期间，既出谋划策而又提供金钱，这两方面的贡献是很可贵的。伍丁是美国汽车和铸造公司的董事长，他的身材矮小，头形上宽下尖，举止天真烂漫，几乎有点孩子气。他的经济观点虽然不算死板，但是也 and 格拉斯的观点一样灵活性不足；显而易见，罗斯福不想物色激进分子来掌管财政部。

罗斯福从最初就物色了蒙太拿州参议员托马斯·J·沃尔什来担任司法部长。沃尔什曾经巧妙而又无情地披露了蒂波特多姆贪污案丑闻，作为洛基山地区的优秀政治家和 1932 年民主党全国大会主席，他曾对罗斯福的竞选活动以有力的支持。但是在罗斯福就职前不久，沃尔什娶了一个孀居的古巴女人，他在度完蜜月返回华盛顿的途中突然因病辞世。罗斯福便又匆忙选定康涅狄格州的霍默·S·卡明斯来填补沃尔什留下的空缺；卡明斯原来被预定为菲律宾总督。选择卡明斯这样一个成熟的、中间派的民主党政治家来取代沃尔什，这使得罗斯福内阁比他原来计划的更具有美国东部的色彩了。

罗斯福以骑士风度任命了内阁的两个军事职务。他个人对犹他州的乔治·H·德恩州长开始产生好感，这位州长是西部力量的支柱，罗斯福希望他在自己的内阁里担任一个职务。罗斯福首先考虑授予德恩的职务是内政部长，但是德恩在犹他州有敌对的地方势力，于是国防部长就成了适合的岗位。在海军部长职位上，罗斯福安排了一位温和慈善的弗吉尼亚州老人，克劳德·斯旺逊参议员，他的高高的衣领呈翼状，身穿一件长礼服。

斯旺森的任命，说明罗斯福自己要主宰海军部事务。这样做也有一个好处，罗斯福可以使自己的老朋友哈利·F·伯德替代斯旺森而在参议院任职。

选择丹尼尔·C·罗珀担任商业部长，是罗斯福对旧的民主党做的一次最后的让步。罗珀一度曾是威尔逊的政治副手，后来成为民主党麦卡杜派的一位领袖。这位戴眼镜的南卡罗来纳州人的立场和交际都使他格外得到商业界的欣赏。吉姆·法利是民主党内新兴力量的象征，直到罗斯福风趣地谈起“吉姆的一个先人”为了使自己在车厢里能戴丝制的礼帽而买了一辆新的政府汽车的故事时，他才知道自己已被委任为邮政部长了。

在任命内阁中的劳工、农业和“西部”事务等职务时，罗斯福采取了中间偏左的态度。他选中了他任纽约州长时的地方工业官员弗兰西斯·珀金斯来当劳工部长，她懂得怎样通过与政治家们和睦相处的手段来提出社会福利的法案，同时她使得罗斯福打破另一个传统，任命了一个妇女为内阁部长。至于农业部长，他看中了亨利·A·华莱士。华莱士在主要出产玉米的农业地带是较有战斗性的农场主们的领袖，他的父亲曾任共和党的农业部长。这个纯朴、略显羞涩的人物在发展玉米新品种和饲养猪和鸡等方面是个先行者。罗斯福起初想把内政部长的职位授给海勒姆·约翰逊，后来又给予布朗森·卡廷，但是这两个人都没有接受。罗斯福同哈罗德·L·伊克斯会面一次后就请他担任这一职务。伊克斯是芝加哥人，素以独立的共和主义主张、诚实和好斗而闻名。罗斯福说：“我欣赏他的风采。”

莫利在罗斯福确定内阁人选的过程中扮演了中间人的角色。他后来写道：将来的历史学家们也许会发现罗斯福在作出这种选择时所依据的基本原则，但是罗斯福却无法找出这种原则。时间的推移没有使他所做的工作变得比较简单。这个内阁在某种程度上符合标准的美国惯例：它聚集了一批老练的党员，其中掺杂几名无党派人士，他们是从各州和联邦政界罗致来的，多少代表了全国的各个地区。这个内阁与几乎所有以前的内阁一样，和英国的制度截然不同，在英国的制度下，是选择在政治道路上多年密切合作的那些政党领袖们来共同组阁的。实际上，新内阁中有好几个成员以前是互不相识的。

然而，即便就美国的内阁而言，罗斯福内阁也是一个奇怪的混合体。从思想和政策体系上来说，它包括民主党的保守分子和进步分子、共和党的一名保守分子和两名进步分子；既有通货膨胀政策的支持者，也有反对者；既有一个曾经支持过西奥多·罗斯福的人，也有不少当年威尔逊的人；既有提倡社会福利的拥护者，也有国际主义者；既有形形色色的共和

党人，也有忠实的民主党人。从政治角色上来说，这个内阁迎合几乎所有的主要社会集团：商业界、实业界、农场主、工人群众；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北部、南部、中西部和西部边陲地区。但是，即便这点也不构成一项组织内阁的原则。罗斯福从不盲从社会集团领袖们的愿望。华莱士得不到某些农业领袖的欢迎；劳联主席威廉·格林愤怒地宣称劳工界永远不会支持对珀金斯女士的任命；还有，内阁里也没有犹太人。从个人来说，新内阁是一个由老年人组成的机构，平均年龄为五十八岁。这说明它是一个经验丰富、办事小心的班子；同时，它又是第一个有妇女参加的内阁。

总之，就是新内阁的组成所依据的唯一原则。罗斯福并未形成一项完整的政治纲领；因此，他也不可能依照政治纲领的路线来任命阁员。

内阁的真正意义在于他们完全服从罗斯福的领导。对于他的同事们的忠诚，他完全可以信赖：他们几乎都是“罗斯福拥护者”（即“在芝加哥全国大会以前就已拥护罗斯福的”），而在1932年的民主党全国大会上，他们无人曾是重要的反对者。在这伙人中，没有一个人有希望当总统，也没有一个人想超过罗斯福，至少在他的第一届任期内是如此。对于这个内阁，新任总统可以方便地予以控制。虽然它决不是一个“人才荟萃的内阁”，但这个班子通过罗斯福本人那种精力旺盛、众星捧月般的领导作用，可以获得生命和意义。

这样，罗斯福在他自己的内阁中没有对于任何个人、任何概念或者任何政纲做过最后的承诺。对于最接近他的随从人员，也是这样。后来担任总统秘书的豪，多次参与许多决定政策的活动，但他也总是表述总统本人的意见，而不是提出独创性的见解。而且，豪的健康状况开始不佳。罗斯福为他选择的助理秘书是1920年竞选活动中他的两名副手：斯蒂芬·厄尔利和马文·麦金太尔，前者负责与新闻界联系，后者负责安排总统的约会。他们两人都具备新闻记者那种对政治人物所产生的兴趣；两人都是精干的政治工作者。然而，他们两人对政策和政治纲领都没有特别的关心。显然，罗斯福无意在白宫树立一位强有力的参谋长，或者出类拔萃的谋士。

没有出现任何喧宾夺主的情况。当就职日迫近的时候，一切目光都聚焦在罗斯福的身上。

罗斯福的就职前夜

罗斯福在当选后不久曾声称：总统职位的“最突出的特点是实行道德上的领导。”从作为联邦的理想的化身华盛顿总统开始，直到把总统职位当作布道坛的西奥多·罗斯福和威尔逊为止，“我们所有杰出的总统，在国

家生活中某些具有历史性质的概念需要弄明白的时候，都是作为灵魂上的领袖出现的。”

总统的职务给予了“一个最佳机会，使我们重新应用或在新的条件下应用人类行为的简单原则，这些原则是我们一贯遵从的。如果没有灵敏的、对变化敏感的领导，我们都会陷入泥淖或者迷失道路。”

当罗斯福正在称颂历史上的伟大领袖时，美国人民却想知道他将成为一位什么样的总统。有些人把他看成为一位与民主党的哈定不相上下的总统。生性好斗的自由主义专栏作家海伍德·布龙鄙夷地贬斥罗斯福是：“错综复杂的全国大会选出的一名畸形的候选人”。沃尔特·李普曼说他是一个“和蔼可亲的人，富有许多仁慈的情感冲动”，然而，他既不能牢固地控制公共事务，又没有非常坚定的信念。批评家埃德蒙·威尔逊则作了更深入的研究。他说他有罗斯福身上找不出一样特别引人注目的个性——看来罗斯福基本上是一名兴致勃勃、满心愿意效力的童子军队员罢了。威尔逊认为罗斯福关于美国民主政治的观点有点浅薄空洞。他通情达理、庄重正派、有外交技巧、而且干练，但是在政治上，是不是有什么更持久的特点呢？

另外一批人士对他持有不同的看法。他们觉得在他富于魅力和待人和蔼的外表下面隐藏着一个坚硬的核心——一个包含着精明、勇敢、顽强和信念坚定这些品格的核心。他的老朋友们发现自从战争年代以来他的成长是巨大的。在他们记忆中，罗斯福原是一个富于吸引力、热心而有能力的人，但他同时又有点容易受人影响，不够成熟，而且也缺乏宽阔胸怀。他们觉得到了1932年，罗斯福在智力和能力方面都已经取得了突飞猛进的进步。既然他在十几年间就有了这样大的进步，那么，在担任这个需要付出巨大努力的总统职务时，他就不会更进一步地成长起来吗？

这个处于舆论中心的人物在1932年12月已经快度过他的五十一岁了。他有高高的身材，体重约一百八十磅，如果撇开那双瘦弱无力的腿，可以说是一个魁梧的人。由于不断从事运动，他的躯干变得特别发达。从遭受那次小儿麻痹症的袭击后，他的腹部肌肉已经完全重生了，大腿肌肉也有了一定程度的新生。

尽管在1932年，他还奢望能使他的双腿进一步恢复，他却没有能克服小儿麻痹症对它们的影响，但是他也得到了一些进展，使他可以克服下肢瘫痪状态所带来的一些不便之处。他有一辆专门装配的福特汽车，喜欢驾车在海德公园庄园里转一转。他常去游泳，发明了一种强有力的仰泳法。在温泉的游泳池中，他喜欢让朋友们先下水，然后转身仰泳，拖着两

条残腿，使劲用手划几下，便超过了他们。他甚至可以骑马，两腿的上部把马鞍紧紧夹住。

他对于自己的身体状况毫不敏感，也不感到难堪。当他被抬上汽车或火车，或从车上抬下来时，周围几十个人看着他的样子暗暗不自在，他却仍然旁若无人。他对自己的腿唯一感到忧虑的是，有人会担心他身体不够健康，不能胜利这种要求严格的工作。在第二次竞选州长时，他炫耀地从二十二家保险公司取出了价值五十万美元的人寿保险，并且竭力广泛充分地宣传那份对自己极为有利的健康证明书。他指示手下工作人员不要发出关于他的健康或瘫痪情况的信件。

他在紧急形势下能够保持镇静。这一点确是常人所不具备的。他在压力之下仍能保持优雅的风度，这种品质一度曾被厄内斯特·海明威称为顶级的勇气。当紧张局面出现时，他就说个笑话，或者很快转向另一个话题，不然，就开始讲一个长而有趣的故事。很明显，这种从不急躁的品质绝不仅是强装出来的，因为他在特别紧张地工作了一个星期后做了一次体格检查，检查结果显示心脏和血压都正常。尽管如此，有一件事却肯定会搅乱他的镇静，那就是他认为新闻界对他进行了不公正的攻击——甚至他担任总统以前就是如此。

罗斯福之所以能镇静自若，其主要原因就是他自己对于自己正在做的事情的价值和重要性，具有明确的、绝对的信念。另一个原因就是他的参谋班子多年来已经学会了如何和他配合，顺利地进行工作。他的秘书玛格丽特·莱汉德是一个头发过早灰白的漂亮女人，她非常能干，善于安排他的时间表和来访者，完成各种紧急任务。另一名女秘书格雷丝·塔利负责听写他口授的函件。她们每小时可以一同处理几十封信件，做法是总统用简短的几句话概括信中应写的内容，指示她们写回信。路易斯·豪在罗斯福的全部事务中仍然发挥作用。他挡住总统不想会见的来访者，执行秘密的政治使命，并和“富兰克林”当面争论——敢于这样做的人实在太少了。

埃莉诺·罗斯福精心细致地协助丈夫工作，同时又单独地有她自己的一部分生活。每周的开始几天，她以纽约市协助管理一所女子学校，然后乘火车返回奥尔巴尼，以州长官邸女主人的身份出现。此外，她还向妇女组织发表演讲，注意使两三处房屋的管理工作井井有条，留心海德公园里一家家具店的情况，同时抽时间骑马。孩子们很快地陆续离开了家庭的圈子。安娜和詹姆士都结了婚；小富兰克林正准备进哈佛大学，约翰也打算这样做。埃利奥特不想上大学，故意在入学考试中让几门课考不及格，

现在他能够自己供养自己。

在他的家庭和私人幕僚这个圈子以外是一大群顾问、政界同事和新闻记者。这些人在一定程度上为当选总统提供了许多思路和奋斗目标。

1932年，罗斯福身边的人们有两件事值得注意：其一，他们的背景和想法是五花八门的，其二，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能控制罗斯福吸收各种思想的渠道。他们是一群风格各异的人物，因为罗斯福考查一个人不是凭他的基本哲学，或者看他是否缺少一种哲学，而是看他的知识面、表达能力以及他是否愿意与人分享自己的想法。于是，在罗斯福周围毫无计划地发展起一个“智囊团”——这是记者们开始给它的称呼。

这段时间主要的智囊人物之一就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雷蒙德·莫利。莫利有一个穹窿似的高高前额、一双紧靠在一起的敏锐的眼睛、两片薄薄的嘴唇，这些都忠实地反映了外貌下面的复杂性格：一个有教养的、善于思考而又博览群书的人。他有行动热情，为人精明敏感，喜欢和大大小小的政治家接触。他一生的涉足于广泛的领域：在俄亥俄州度过童年，在地方上有一段时间进行政治活动，后来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曾经潜心研究政治和刑事犯罪之间的关系达十年之久，在西伯里对贪污案的调查进入高潮的最后一年时，也曾参与其事。尽管莫利以罗斯福激进派教授而知名，但他总体上是一个保守主义者，他相信政府和商业界之间应建立一种仁爱的伙伴关系，这种关系能够给予资本家以权力和地位，同时通过国家计划获得效益并结束自由竞争和极端个人主义带来的漫无目标现象和浪费。

罗斯福身边的其他顾问也倾向于实行国家计划的主张，不过不象莫利那样偏袒资本家。雷克斯福德·特格韦尔是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年仅四十二岁，一头卷发，相貌出众。他喜欢随口抛出“重新改造美国”，借以惊吓朋友和敌人，但是他对于农业经济的研究以及对苏俄的一次访问使他把注意力放在经济萧条期间独特的竞争所带来的混乱。另一位教授小阿道夫·A·伯利是公司法的权威，并且是这方面的经典著作《现代公司及私有财产》的作者之一。他从小就是个神童，但他的敌人说虽然他早已不是神童了，却仍未失去儿童本色。他年已三十七岁，仍是一个急躁的年轻人，能够使用他那锋利的言词和对于金融业务的广博知识来制服银行家和官僚。

新闻记者十分重视智囊团是因为它对罗斯福思想所产生的影响力。他们对于这位总统还是不了解。如果说这些年轻人和他们才气横溢的见解确实使总统感到兴奋，但他对身边顾问团里其他许多人的意见也能够兼收并包，其中有乔治·F·沃伦教授及其货币理论、公共事业专家詹姆斯·邦布莱

特，另一位货币理论家弗兰克·A·皮尔逊以及研究公共行政管理的学者斯凯勒·华莱士。

教授只是罗斯福的顾问团的一个组成部分。他经常请教的人有伯纳德·巴鲁克这样的金融家，考克斯和豪斯上校这样智慧的资深政治家，美国劳联的威廉·格林这样的劳工领袖，还有商人、农业政治家、州的官员、报纸编辑、老朋友和党的领袖。特别重要的是一群参议员和众议员，他们曾经在各自的州里帮助组织拥护罗斯福的代表。从这些议员的政治观点来说，他们代表了整个政治光谱，然而罗斯福却特别感恩于一群南部人士，特别是得克萨斯州人：加纳、雷伯恩和参议员汤姆·康纳利。

罗斯福懂得怎样利用这些人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仿佛是霍桑笔下的安德鲁·杰克逊那样，无论哪个人，只要一进入他所控制的领域，就不得不成为他的工具，这个人越是狡猾，充当工具也就越是有效。但是这个过程也会产生相反的作用。通过这些人，罗斯福使他在实行“公平政治”和“新的自由”过程中，以及在纽约州和海军的多年工作中所形成的自己的思想得到了补充，并从这些曾经历过一两项美国广泛的政治传统熏陶的人们思想中大获裨益。他把智慧之根一直深深扎入美国人的全部经验之中。

因为在这些人的身上——有时甚至在一个人身上——形形色色的思想同时并存而又混合：这些思想可以被追溯到许多不同的思想家和运动，其中有民主党的英雄人物如杰弗逊和克利夫兰，他们两人都警告不要建立庞大的政府；有拉福莱特和休斯在各自的州里进行实验的场所以及社会改革试验；有索尔斯坦·维布伦那样的思想家及其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资源浪费现象进行的嘲讽式的调查，或者像赫伯特·克罗利那样的思想家及其关于在一个强有力的全国政府下实行全国福利协作的观点，或者象约翰·杜威那样对于实验和实用主义极为热情的思想家；有对抗东部财团的民粹主义者的反叛；有塞缪尔·冈珀斯及其为争取劳工的平等地位而进行的斗争；有路易斯·布兰代斯及其为了掌握事实和统计数字而表露的热情；有南部的经济国际主义和中西部的国家主义；有西北部特别风行的想法：由政府控制和发展国家资源，尤其是水和电力；有希望通过对货币与贷款制度的调整来得到拯救的为数众多的人们及其运动；有揭发贪污案件者及其为了实现廉洁的政府和提倡市民道德而开展的运动；有西奥多·罗斯福及其迫切希望使用政府来限制经济势力和特权的想法；有威尔逊为了争取使小人物能同经济界巨擘进行公平竞争的权力而作的斗争；有第一次世界大战所获的经验，即动员和统一整个国家的全部工业实力来进行战争；有美国建

设委员会和许多商人的观点：商业必须制止过度的竞争而一同组成较大的、比较和谐的单位。

在这些见解中，有许多是相互抵触的，有些会在危机的压力下被排斥掉。无论如何，罗斯福没有把它们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一律接受。他有一个轻重缓急的次序，在一定程度上相当于他的政治信条。他相信，或者说大部分时间都相信，政府可以被当作一个手段，借以使人类达到更高的层次。他宣传有必要使政府提高工作效率和廉洁奉公。他想要帮助失意者，尽管这样做并不一定意味着得意者成为牺牲品。他坚信私人的，特殊的利益必须从属于总的利益。他力求既能保存美国的自然资源，又能维护它的道德标准。

这些见解揉合了一个一般概念的综合体，而不是一个行动的纲领；罗斯福的一些同事对于他的这种兼收并蓄的态度感到惊讶甚至害怕，不论什么意见，凡是在他的广阔的思想领域中能够适应的，他一概来者不拒。他通常很爱惜时间，但他却肯花费好几个小时，和一些奇怪的人兴高采烈地高谈阔论。罗斯福对于知识如饥似渴地追求，而又善于领悟，他有一种海绵样的惊人吸收能力，把意见和事实加以吸取并储存起来以备随时运用自如。他可以举出大量事实，勾勒煤炭生产的暗淡景色，从而使矿工们为之折服；他也可以详尽地刻画一些企业内部的复杂情况，从而使经营这些企业的商人们惊叹不已。特格韦尔说，罗斯福的大脑就象一张捕蝇纸那样具有吸附力。

尽管他有这种兼收并蓄的能力，但他却不作出最后的承诺。罗斯福喜欢人民，也热爱他们的想法；但是如同他从不依赖任何一个人一样，他也从不彻底信赖任何一种想法。罗斯福让大家知道，即便他的主要顾问莫利，也只是充当一个思想情报交换所的作用，而不参与决定一个具体政策。莫利指出，罗斯福的思维时常匆匆地涉猎一个问题，接着便转到另一个问题，正如他本人匆忙地和各种各样的人举行了一系列的会谈磋商以后依然显得精神抖擞、轻松愉快一样。从长远来看，这种不做最后承诺的办法是有其危险方面的。但是在 1932 年，这种办法却大有裨益，当时那些陈旧的教条已经把经济瓦解了。

不仅是时代的要求，也不仅是罗斯福的知识分子性格，而且还有美国的政治文化本身，它们共同抵制了系统的原则和统一的哲学。一种不是左也不是右的实在的哲学，使 1932 年实行新政的人不得不首先检验各种原则，并制订出一个完整的和连贯的政治纲领。社会主义者对于改革与改善

的思想做出了重大的让步，但即使如此，他们在政治上仍然不能成为一个威胁。前后一致的保守主义思想体系几乎是从来不存在的，充其量不过是商业哲学家们形成了绝对主义的放任自由思想，以求提高私营企业的利益。至于进步主义和自由主义的传统，西奥多·罗斯福和伍德罗·威尔逊在面对难以驾驭的经济与政治现实时，都改变了他们的政治纲领。所有的情况在 1932 年都不约而同地使罗斯福成为一个实用主义者、机会主义者和实验者。

总的说来，观察家们在 1932 年对罗斯福的能力持有如此纷纭的观点，也毫不足怪。在一部分人看来，他似乎缺乏持久性、信念以及智力上的深度与成熟，这些看法也不无道理。其他人则看到这个人的另一面。在他们眼中，他既有杰弗逊的热切的人道目标，也有汉密尔顿的富有创造力的方法；他既有布赖恩的道德上的热情，却又不象那位“伟大的众议院议员”那样缺乏智力上的生气；他既包含了威尔逊的理想主义，又不像他那样顽固执拗；他既有鲍勃·拉福莱特和艾尔·史密斯的某些务实精神，却又不象他们那样无情和残酷；他在很大程度上具有西奥多·罗斯福的活力和热情。

那时，大概没有第二个人能够对罗斯福作出如同一位形象非凡的老人后来所做的那种果断和恰如其份的评价。第二年初，罗斯福就任总统后不久，在华盛顿拜会了退休的最高法院法官奥利弗·文戴尔·霍姆斯。霍姆斯此时已九十二岁高龄，他从战争年代以来一直对罗斯福保持这样的印象：他是个好人，不过有点软弱。总统离开他的书房后，这位伟大的法律学家坐在那里，陷入了沉思。一位朋友以好奇的眼光审视他。

霍姆斯说：“你知道吧，我就是他的特德叔叔任命的法官。”

“是吗，法官先生？”

老人望了望罗斯福刚从那里走出去的一扇门。

他突然冒出了这句话：“智力是第二等的。但气质却是第一流！”

第三卷 风云际会

第九章 入主白宫

1933年2月27日晚，海德公园阴森而又寒冷。呼啸的西北风掠过赫得森河漆黑的水面，罗斯福家周围老树上的枯枝在北风中摇曳。在温暖的房间里，一个高大宽肩的男人坐在炉边处理公文。房间两端，他的两位祖先的肖像俯视着他：一位是艾萨克，他曾在早期的艰难岁月同他的人民一起反抗过异族的统治；另一位是詹姆斯，资深的商人、大地主和绅士。

富兰克林·德·罗斯福手里的铅笔在黄色的法定信笺上刷刷作响。“我确信我的同胞们期待着我在就任总统时，能以国家当前形势急迫需要的坦率和决心与他们对话。”炉火发出嘶嘶声，不时劈啪作响。那只指头很粗的大手在纸上奋笔疾书。“美国人民需要的是直接而果敢的行动。他们现在以我为实现他们愿望的工具——暂时的卑微的工具”——他去掉了“卑微的”这个词；这不是表示谦逊的时候。

这位当选总统的豪放、犀利的斜体字写出一串串字句。黄纸慢慢堆积成一沓。到凌晨1点半钟，就职演说准备就绪。

但这还不是最后定稿。以后两天里，骇人听闻的消息又陆续传到海德公园。这个国家的信贷机构逐渐瘫痪了。到入弥漫着危机的气氛——可是，这是一种特殊的、令人麻人的危机，它会突然袭击一个西部城市，接着又袭击到千里之外的南方。它比入侵的军队更加肆虐；它无所不在却又无处可循，因为它在人们的脑海中。它意味着恐惧。但在海德公园里，下届总统依然神态安详，甚至兴致勃勃。他在同他那些忧心忡忡的顾问们开会的间隙，继续加工他的就职宣言，略作增删，加紧写作。

3月1日，罗斯福动身离开海德公园前往纽约市，当晚在那里住宿。第二天早上传来的消息更为糟糕。又有十二个州或将银行关闭，或是紧缩其营业范围。危机正逼近华尔街，这是最后的堡垒。那天，当局宣布，由于救济金匮乏，对于纽约几千名待领赈济的工人将不予救济。纽瓦克市发不出雇员的薪金。前面由一辆警车鸣笛开道，后跟满满一车行李，罗斯福驱车去车站，登上列车前往首都。列车驶过宾夕法尼亚州和马里兰州时，这些地方的银行都已关闭了，但他仍然心平气和地同他的顾问们谈话。

3月的华盛顿一片阴霾，寒雨萧萧。当列车闪烁着宝石般的灯光徐徐

倒开进联合车站时，一群人悄悄在那里恭候多时。穿着黑色雨衣的警察在后面车厢周围忙碌不停；特工人员双手插在大衣口袋里，目光打量着人群中的一张张脸庞。罗斯福头戴一顶灰色帽子，穿着深色大衣，在昏暗中很难分辨出来。他慢慢地来到后站台上，他的妻子站在身边。他的两个儿子，詹姆斯和约翰，很快地帮助把他送上一辆轿车。他满怀信心地坐在车后面，面带笑容。摄影记者们围拢过来，对准镜头。闪光灯的闪光交织，一片强光笼罩了这个庞大的身影和他的微笑；强光消失，轿车急驶而去。

华盛顿的紧张情绪日甚一日。联邦储备委员会报告一周内已抛出价值二亿五千万美元的黄金。如此下去，纽约的银行也非关闭不可了。那位精疲力竭、闷闷不乐的总统的信息传到了五月花饭店罗斯福的套间：当选总统是否愿意同他一起发表一项应急声明？经过焦急的磋商以后，罗斯福作出的答复是：仍请总统自行其是。

在旅馆的房间里，罗斯福又将他的演说稿浏览了一遍。他手边摆着一本索洛的著作，上面写道：“最可畏者莫过于畏惧。”

在就职仪式以前还有一项仪式——按惯例，当选总统拜会即将离任的政府首脑。3月3日罗斯福到达白宫的时候，他惊觉胡佛试图利用这次会见，最后一次吁请同他采取联合行动以制止银行恐慌。这两位政治家在经过精心安排保持一定距离的两张椅子上正襟危坐互相争论。罗斯福依然拒绝采取任何行动。在起身告辞时，当选总统低声说，既然总统很忙，如不回拜，他——罗斯福——也会谅解。胡佛眼光紧紧锁住他说：“罗斯福先生，等你在华盛顿住的时间象我现在这样长，你就会明白，美国总统向来不拜访任何人。”

“献身的日子”

3月4日是星期六，清晨阴沉多云。全国所有的银行几乎都关闭了。胡佛惊呼：“我们已经无能为力。”罗斯福到教堂去，格罗顿学校的老恩迪科特·皮博迪负责主持礼拜仪式。胡佛和罗斯福驱车前往国会，罗斯福想交谈几句，可是胡佛只顾对人群的欢呼呆板地答礼。罗斯福在国会里等得焦躁不安的时候，随手在就职演说稿上匆匆地加了一句开场白：“这是一个献身的日子。”在外面，一大群人在国会的圆形大厅前静静地等待着。罗斯福既没穿大衣也没戴帽子，十分缓慢地来到高高的白色主席台上。主席台被安置在缠着常春藤和装饰着旗帜的希腊式圆柱之间。

罗斯福撇着下巴，神情严肃，用洪亮的声音跟着大法官休斯宣读就职誓词。在他转身面向群众的时候，冷风掀动了他就职演说的纸边。这一席

话清晰地传到他面前黑压压的人群中，也飞传到全国千百万坐守在收音机旁的人们耳中：

“这是一个我们的民族正在做出极大牺牲的日子。我坚信，我的同胞们期待着我在就任总统时，能以国家当前形势所迫切需要的坦率和决心对他们讲话。现在首要的是讲真话，坦率地、大胆地讲出全部实情。我们不必畏缩以致于不敢正视我国今天的情况。这个伟大的国度将会象它曾经忍受过的那样忍受下去，它将得到复兴，它将得到繁荣。”

黑鸦鸦的人群伫立着，全场一片肃静，几乎毫无声响。

“所以，首先让我表明我的坚定信念。我们唯一必须畏惧的就是畏惧本身——无可名状、毫无道理、决不应有的恐惧，它将瓦解人们变退却为前进所需要的勇气。在我们民族生活中的每一个黯淡无光的时刻，坦率和有力的领导都得到人民自身真诚的谅解和支持，而这正是胜利之本。我确信在这关键的时候，你们会再次给我以这样的支持。……”

他指出，困难在于物质而不是精神方面。“我们手边的物资十分丰富，可是一看到供应的情况就不敢慷慨地使用了。”这主要是因为主宰人类货物交换的统治者没有尽职尽责，擅离了职守。“货币兑换商也从我们文明殿堂的高座上逃逸了。”现在的任务是要应用比单纯的金钱利润更为高尚的社会价值。但是复兴所要求的，不仅仅是改变道德标准。“这个国家要求的是行动，而且是立刻行动。”

“我们的最重要任务就是安排人们就业。”不动声色的人群听到这里开始激动了。这可以“由政府自己来直接招募”。我们要更好地利用资源，提高购买力，保护家庭和农庄不会因为被取消抵押品赎回权而蒙受损失，要降低政府的一切开支，统一救济，并在全国的基础上来计划交通运输。必须“制止用别人的钱搞投机”，必须要有足够的健全的货币。

在外交政策方面，他要求全国奉行“睦邻政策，做一个坚决尊重自己的好邻居，因为只有首先尊重自己，才会尊重别人。……”国际经济关系，当然十分重要，“但从时间和必要性来考虑，它与建立一个健全的民族经济相比，却只好居于次要的地位。”急事必须先办。他将尽力恢复世界贸易，但处理国内经济的紧急情况则是刻不容缓的。

罗斯福的神色冷峻而坚定。“如果我正确理解了我国人民的心情，那么，我们现在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清楚地认识到我们是紧密相连的；我们不能仅仅要求得到什么，同时也必须决定献出什么；我们如果要想前进，就必须象一支训练有素的忠诚的军队，愿为维护一种共同纪律的利益而奉

献一切。……我知道，我们是心甘情愿为这种纪律奉献出我们的生命财产，因为如此，才可能有一个以争取更大利益为目标的领导。我是准备奉献出这些的。……”

罗斯福降低了嗓门，语气更严厉了。他说，根据宪法，领导可以产生，纪律必须得到维护。他希望行政和立法两个部门权力的正常平衡足以应付这项任务。然而，暂时离开正常的轨道也许是必要的。他将“提出一些措施，这些措施对于一个遭到经济打击的世界上的一个受害国家来说，可能是需要的”。他要设法迅速推行他的政策，或由国会提出的类似的其他措施。

“但是万一国会不能在这两者之间选择其一，万一国家危机仍然紧急，我也不会回避到时摆在我面前的我必须走的明确道路。我将要求国会赋予我为应付危机所剩下的唯一武器——赋予我广泛的行政权力，以便为克服紧急状况而战，这种权力应当像我们真正遭到外敌人侵时所赋予我的权力那么大。”

公众早已要求采取直接果敢的行动，要求有领导的纪律和指挥。“既已授权于我，我就要担任此重任”。最后他祈求上帝的指示。

演说结束时，他向人群挥手致意，突然露出笑容，露出了他那伟大的令人激动的微笑。赫伯特·胡佛握手告别走了。罗斯福独自乘车驰过稠密的人群，马上回去参加一系列的会议。

后来，埃莉诺·罗斯福在白宫对记者谈话时流露，“仪式非常严肃，简直令人有点恐惧。聚集的群众真太多了，使人感到只要有人告诉他们去干什么，他们什么都干得出来。”

“行动，立刻行动”

形势就象一场战争。当陆海军战士精神焕发地在庆祝总统就职的长长的游行队伍中行进的时候，当一对对舞侣在总统就职庆祝舞会上兴高采烈、翩翩起舞的时候，面容憔悴的人们在桌旁连续几小时地举行紧急磋商。宾夕法尼亚大街巨大的大理石建筑物里灯火彻夜通明，透出窗外的黯淡光芒照着下面沿街地上撒满的五彩纸屑。新到华盛顿的民主党人和上届政府留下来的共和党人并排坐在一起，与焦急的银行家通电话，掌握全国金融的讯息，草拟应急政令。凌晨他们抽空休息几个小时，然后又赶回工作岗位。新闻记者们在门外一连几小时地守候着，急匆匆地采访过往行人，想得到一星半点引人注目的新闻。华盛顿因为谣言和希望并存而变得极为敏感。

新总统入主白宫——现在白宫成了处理经济危机的指挥部，他很从容，面带笑容。他在日记里（他只记了两天，以后就放下了）记下了他那忙碌的第一天和关键性的决定。他同全家一起到教堂去做礼拜，又同家属和友人共进午餐，然后立即连续召开几个会议。“下午两点半在椭圆形办公室召开内阁全体会议，副总统兼参议院议长雷尼报告银行界目前状况。一致同意于3月9日（星期四）召开国内特别会议。此项声明已经拟好并已发出。随后与参议员格拉斯、海勒姆·约翰逊、乔·鲁宾逊和众议员斯特盖尔和贝尔纳斯以及少数党领袖斯内尔磋商——意见均取得一致。伍丁部长汇报说银行界的代表们对于采取什么对策，感到不知所措。结论是处理银行形势的四十八种办法都没有奏效。司法部长卡明斯在报告中主张根据1917年法行使权力。这项立法批准总统有权对黄金或货币作出特许，进行管制以及输出贮藏或指定用途。根据这个建议和应急的需要，决定发表通告宣布银行休假。……在小富兰克林和约翰返校前匆匆用罢晚餐。晚上同沃伦教授谈话。与四个通讯社代表谈话，解释银行休假声明。夜晚11时半为美国退伍军人协会发表五分钟的广播演讲。国务卿来访。就寝。”这就是他所记录的第一天当总统忙得喘不过气来的日程。

整个第一周，罗斯福都疲于处理银行危机。总统和他的顾问们意识到问题的关键在于公众的心理状态。人民希望见到的是行动。总统已经许下了诺言，要采取行动。奇怪的是，各州和银行界本身已经采取了重大的行动：关闭银行。作为危机时期的总统，罗斯福最巧妙的一招，就在于他让银行继续关闭这一行动本身，它象3月的春风使全国为之振奋。从实质上分析，他的行动是防御性的、消极的，并且也是保守的——然而他却以此号召人们行动。他甚至玩弄了新闻记者；总统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抱怨他们在报道他延长银行的休假时，过分强调了延长而没有强调他本意是要有例外的。

3月9日，星期四，国会应总统的要求举行了特别会议。当新议员还在寻找自己座位的时候，两院就急急忙忙地组织起来并且收到了总统的咨文，它要求通过立法以掌控银行界的恢复活动。代表们乱哄哄地推挤着，迫不及待地要行动。经过一致同意，民主党领袖们提出一项紧急银行法，重申罗斯福的声明，并授予他操纵金融和货币的新权力。到凌晨两点钟，这项议案尽管已经总统及其顾问们定稿，但仍然是粗线条的。但是，甚至就在规定用来进行讨论的那短促的四十分钟时间里，大厅还不时传出：“表决！表决！”的叫嚷声。共和党议会党团主席伯特兰·H·斯内尔不满地

说：“房屋都要烧光了。美国总统大人却说这就是救火的办法。”众议院很快通过了这个议案，赞成的票数并不很多；参议院在几小时后予以批准；到9点钟，总统发令签署了。

伍丁说过，需要的是迅捷而又又是断续的行动。就在第二天，3月10日，总统突然出人意外地送交国会一份经济咨文。咨文是以应付危机为落脚点写的。罗斯福说，联邦政府正在走向破产的边缘上。如不立即采取行动，下一财政年度的赤字将超过十亿美元。“在近代史上，挥霍浪费的政府由于触到了松弛的财经政策这块礁石而翻船的例子实在太多了。”他要求国会授以更广泛的权力以便使政府实行节约，同时要坚信他会“以公正无私的精神”来使用这个权力。这个提案的标题颇为奇特，叫作“维护美国政府信誉”案。

美国退伍军人协会和其他退伍军人组织的院外政治活动家十分惊愕。他们打电报给州的或地方的分支机构说，退伍军人的利益受到损害了。电报象雪片似地纷纷飞往国会山。公然对抗有组织的退伍军人，对于国会来说，是一剂有副作用的药。在以往的十年里，国会不顾总统否决，曾再三地通过了退伍军人法案。众议院的一般议员们造反了，民主党领袖们在一段时间内控制不住局势了。民主党代表的决策核心小组几乎都同意了一项经过削弱了的条款。经过激烈的辩论，议会休会了。首脑们在发言过程中，擅自用总统的名义维持秩序。

一个领袖警告说：“明天早上，《国会记录》送到罗斯福总统的办公桌上，他会查看我们用来点名的花名册。我可要对你们新民主党人打个招呼，小心你们的名字会记在上面。”这番威胁性的话立刻引起了一阵嘘声和起哄。尽管头头们拥有议会权力，但提案所以能在众议院获得通过，是因为有六十九名共和党议员不分党派界限去支持总统。九十名民主党议员，包括七名党魁，在他们的白宫新首脑提出第二个议案时就没有支持他。随着美国退伍军人协会发来的电报越来越多，参议院内也酝酿着更多的纠纷。

可是总统的攻势是不可阻挡的。在他就职第一周的最后一天，3月12日，他在第一次“炉边谈话”中同人民建立起直接的联系。就在他发表谈话开始前，他的讲稿找不着了。但是他不慌不忙，拿起一份新闻记者的油印稿，熄灭了烟火，转向扩音器，开门见山地说：“我想用几分钟的时间同美国人民谈谈金融情况——”他谈了二十分钟左右，他那热情的令人安心的声音涌进千家万户，他用浅显易懂的话语解释金融形势，却又不使

民众产生他以首长口吻对听众说话的印象。这次讲话极为成功。

总统攻势不断。第二天，当一个意见不能统一的参议院就要考虑有关节约的提案时，他又发给国会一个简明扼要的咨文，这份咨文内容仅有七十二个字，涉及一个新问题：啤酒提案。他建议立即修改禁酒法案，使啤酒和淡酒的生产和销售合法化；他同时要求对这些饮料征收高额税收。民主党议员四分五裂的队伍在这个深得人心的措施下，迅速地团结起来，这是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所许下的诺言。罗斯福巧妙地选择了时机，使他的咨文发挥最大的效果。参议院于15日通过了节约法案，第二天又通过了啤酒法。

罗斯福就职十几天，全国掀起了一阵赞颂总统的热潮。仅在一个星期内，白宫就收到了一万多封电报。报纸的社论是一片赞誉和颂歌。新总统看来明白事理；看来颇有勇气；而最主要的是他在努力开展实际工作。这在全国带来了希望。黄金开始回流到金融机构；银行重新开业，存款人也不成群结队地吵吵嚷嚷要提款了；就业和生产看来也在上升。

艾奥瓦州的一位众议员写信给总统表示：“你吩咐我做什么事我都会做。你就是我的领袖。”

然而总统却没有欺骗自己。他深知，他所做的努力均属防御性的。他在与记者谈话时指出：尽管有了第一批通过的三项议案，“除非你认为啤酒法还部分地具有建议性意义，否则，我们还是做出什么建设性的事情。”按他预定计划，他想让国会在通过第一批议案后就休会，然后等长期立法准备就绪后再复会。但是，为什么不在全国人民的情绪如此有利的情况下一鼓作气地趁热打铁呢？议会领袖们都愿意使国会继续开会；总统的一批顾问在十几个机构里，在旅馆的房间里，在他们能够找到一张办公桌的任何地方，草拟立法提案。其结果是采取了更多的迅捷而又断续的行动，而以“百日”的字样载入史册。

3月16日——总统要求通过一项农业法案，目的是提高农民的购买力，减轻农业抵押的压力并增加银行发放的农业贷款额。华莱士部长和他的助手们匆匆起草好法案，其部分措施是以农业界领袖的一次会上提出的建议作为依据的。总统后来指出，这是在和平时期所提出的一项最富于戏剧性的、也是意义最深远的农业法。众议院在3月22日经过五个半小时辩论后，以315票对98票通过了这项法案。五个星期后，参议院以同样的压倒多数通过了它。5月中旬总统签署了这项农业调整法，使之具有法律效力。

3月21日——总统要求迅速授权成立民间资源保护队，既为植树造林，同时也是从人道主义的立场出发。这个法案同“百日”里其他任何一项措施一样，引起了罗斯福本人的兴趣。这是规划在初夏组织二十五万青年去修筑堤坝，清除沼泽的水、扑灭森林火灾，种植树木。过了十天，众议院以唱名表决通过了这项议案。

3月21日——总统要求议会批准各州直接进行失业救济。他的动议显示他不采取上届政府的政策；断然反对给各州拨救济款。胡佛到最后曾经勉强支持贷款给各州和城市的办法。罗斯福宣称国家要设法不让一个人挨饿，因此准备开展一项有史以来最大的救济工程。国会大多数赞成通过了联邦紧急救济法，并授权复兴金融公司，通过联邦紧急救济局准备五亿美元以供救济所需。

3月29日——总统要求联邦监督州际贸易投资证券的交易。以往的惯例是：“货物出门，概不退换”，现在罗斯福说，必须加上一条“让卖主当心”。基本想法是，在州际贸易中出售新证券要完全公开。为了恢复人民的信心，如果不向政府提供有关证券的充分和准确的情报，则将被处以严重的处罚。这项法案在5月初获得通过。另一项议案，1933年的银行法案，目的要迫使银行同它们的保证金分行完全脱离。5月初，参、众两院通过议案，与政府共同把货币兑换商赶出了圣殿。

4月10日——总统要求通过一项立法，成立一个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其主要职能是负责计划“适当利用、保护并开发田纳西河流域盆地及其邻近土地的自然资源。……”罗斯福视野宽广，他看到这个工程的意义远远超出了单纯地开发电力，他考虑到广阔的范围，如蓄洪和水土流失，植树造林，开发边沿土地，工业布局和多种经营——简言之，“国家计划全面治理并规划建设一条河的整个流域。……”这个议案的背景富于戏剧性，内布拉斯加州的乔治·W·诺里斯和其他国会议员，十几年来力尽所能地反对有人企图把政府出资兴建的马瑟肖尔斯水坝和发电站卖给私人资本家。他们仅仅做到推迟这宗买卖。现在罗斯福则力主把马瑟肖尔斯水坝作为一个庞大计划的一个小部分，这个工程计划要将一个广阔的不发达地区连接起来并使之蓬勃发展。这个议案要求广泛采用公有制和国家控制，几乎是一个纯社会主义色彩的措施，但国会却以决定性的多数予以通过。总统在5月18日签署了这项法案，参议员诺里斯站在一旁，兴高采烈地看着。

4月13日——总统要求通过立法，目的是使小住宅的抵押不会因抵押品赎回权被取消而蒙受损失。由于抵押品赎回权被取消而引起的案件增

至每天一千件，他试图以维护住宅所有权作为保障社会稳定与经济安定的一项措施，同时将成立专门机构，通过它可以按低利息率来调整小住宅的抵押债务，并有条文规定，在极其困难的时候可以延期还本付息。在罗斯福的努力下这项立法在一个月内就通过实施了。

5月4日——总统提议通过紧急铁路法。按照这项法案，一个运输协调人被授权促进或强制运输人的个体行为，以避免机构重叠，防止浪费，并鼓励金融改组。他还建议废除州际贸易委员会法案的政府征收条款，并建议由州际贸易委员会管理铁路股份公司。在罗斯福提出要求的一个月内，两院就批准了上述法案。

5月17日——总统建议设立机构，“在整个工业界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合作运动，以达到广泛的再就业，缩短工作周，在缩短工作周后支付合理工资，并防止不公平的竞争和灾难性的生产过剩。”他还要求授给他全权，以便开始实行一项大规模的直接就业计划。他估计在公共建筑方面可投资三十三亿美元，以便安排“尽可能多”的人就业。全国工业复兴法在参议院遭到严重非难，特别是来自左翼的责难，然而它却基本上完整地获得通过。总统在6月16日予以签署。

“直率而强有力的领导”

这些行动让人目不暇接，也使人们心中充满希望。可是这究竟起多大作用？国家正在走向何处？3月末，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一个记者承认他有些惶惑不解。他说，总统最初的一些措施是紧缩通货膨胀的。然而，后来的那些法案，诸如农业法等，却似乎意味着增加了政府的支出。罗斯福的答复是很审慎的。地方机构将加以使用，而政府的一般的经济性开支的预算也要平衡。但是“你总不能让人家挨饿，”总统最后这样解释。

罗斯福并没有遵循什么高明的政纲。象他后来曾经开玩笑地说过的：“既没有复兴经济的灵丹妙药，也没有什么奇特的计划。”他不但承认他不依照陈规陋俗行事，而且以此为荣。他喜欢对记者们说，他是橄榄球队的四分卫，分析了前一场的比赛结果，他就决定改换新的打法。5月中旬，他在给豪斯上校的信中写道，形势“发展如此之快，头一天还是问题的事，第二天就解决了，或被取代了。你会看到，我必须当机立断不可。”

然而，当机立断的背景又是什么呢？假如说罗斯福的政策明摆着是试验性的，那么，他根据什么来试验呢？对罗斯福发挥作用的主要影响在他的党内，在他的顾问们身上，也在国会里。

美国人喜欢嘲笑政党的宣言和总统竞选时许下的诺言。可是罗斯福在

“百日”里采取的行动，只有对照着他的政党和竞选的形势才能理解。他曾许诺要在政府中厉行节约；节约法案正是兑现这个诺言的一个决定性步骤。民主党曾经放言要解决啤酒问题，而他的关于啤酒的简短咨文几乎是一字不漏地引用了民主党的政策要点。在民主党的政纲和罗斯福接受总统提名的演说和托皮卡演说里都可以看出农业法的轮廓。事实上，每个其他的重大的行动都曾经在政纲或讲演中，或在这二者中比较详细地作了概述。在他以前，从来没有哪一位总统那样快地把那么多的诺言兑现成了那么多的法律。

当然，其后果之一是百日政纲反映了政党纲领和竞选保证的不一致性。但是最足以证明罗斯福有承担重任的能力的事实就是他从怀疑自己主要行动的正确性，不管它们彼此之间多么不一致。厉行节约就是一个案例。就在政府出资兴建浩大工程的时候，罗斯福给政府规定了厉行节约的计划。例如，把完全残废的退伍军人的抚恤金由每月四十美元降低为二十美元。当丹尼尔斯写信给罗斯福对州的立法机构大量减少学校拨款表示担忧时，他在复信中却抱怨教师的工资过高了。与此同时，埃莉诺在白宫里创办十九美分一顿的经济午餐，总统也就按时吃这种份饭。

由于有意安排，或是由于碰巧，罗斯福在自己身边聚集了一批顾问，他们的观点很不相同，就象他的新政本身相互抵触一样。1933年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是总统的预算局长刘易斯·W·道格拉斯。他平易近人，和颜悦色，身材单薄，一眼看去象个牛仔而看不出他的真实身份。他却是亚利桑那州一个开铜矿致富的名门的后裔，一个曾在众议院工作的能干政客。他协助总统厉行节约，干得如此出色，以致罗斯福在就职后一个月内就称他为“政府发现的用途广泛的巨大宝物”。因为道格拉斯把预算控制得极严，很快他就得到一个美名，叫做“决一死战的预算平衡家”。

他有许多持同一政见的朋友。财政部集中了一批人敦促政府节约和实行保守的财经政策。1933年春天夏，伍丁大部分时间在生病。迪安·艾奇逊经常在白宫代行他的职务，艾奇逊是个衣冠楚楚的青年律师，格罗顿的老校友。穿着讲究、面带学究气的小亨利·摩根索是总统的老朋友，是总统在农业信贷和其他农业问题方面的顾问。摩根索尽管基本上持人道主义观点，但在处理许多经济问题时却小心保守。罗斯福任命他的老友、得克萨斯州银行家、民主党人杰西·琼斯为复兴金融公司的负责人。保持正统思想的领地还有商业部和联邦储备委员会。

然而，具有新思想新主张的人在白宫也大有用武之地。罗斯福任命雷

蒙德·莫利为美国国务院助理国务卿，并有意让他继续在总统身边工作。哈里·霍普金斯受命任联邦救济署主任，在有关救济和恢复的许多关键问题上，他是有发言权的。特格韦尔这时已经出任农业部助理部长，可是他所提的意见却不局限于农业问题。伯利参与草拟了“百日”的一些关键性议案。上述人物仅仅是一大批热情的、孜孜不倦的律师、经济学家、教师及社会活动家其中的四个而已。其中有的年龄不大，他们聚集到旧的政府部门和城里临时设立的新的应急机构担任了关键性的职位。

这些智囊人物中的某些人发挥的作用超过了他们原来的设想，因为罗斯福不愿由于他的重要职位而使新鲜思想和方案遭到抛弃。华莱士、伊克斯或珀金斯女士时常向他汇报饶有趣味的新思想，而他则贪婪地紧追不放。有时他也在秘书们堆在他案头的长篇报告的摘要中筛选出新的思想。不少意见和信息来自各地的邮件；同他通讯的人的名字已经开始成为一本小型的“美国名人录”了。

埃莉诺·罗斯福的作用是无法估量的。虽然她的新职责多样而又庄重，但这位第一夫人却不满足于担任白宫的主妇。她本人就是一个引起人们的兴趣和活动的中心人物，所以到 1933 年底，她接到的信函就达三十余万件。那一年，她开始旅行，到过国内无数地方，而且最后还到了国外许多地区。《纽约人周刊》有一幅漫画，画着一个矿工从深井下朝上看，惊异地对他伙伴说：“嗨，上面是罗斯福夫人！”这幅画很好地反映了群众对第一夫人到处走动而产生的惊奇和高兴的反应。

罗斯福还让他妻子学会体察民情，向他汇报。“要观察人们的脸色，”他告诉她。“要观察晾衣绳上挂着的衣服，根据那些情况，你可说明不少问题。注意他们的汽车。”她一回到家，总统就要仔细地问长问短。例如，有一次她从加斯佩半岛回来，他要详细了解渔民的生活状况——他们吃什么，住得怎样，农场是什么样子，房子是怎么造的，有哪些教育设施。

总统需要获得情报的心情异常迫切，不管由此引起的事情多么繁杂忙乱，他还是有意识地组织他的办事机构制造出一个尽可能大的情报网。他不满足于在内阁可以听到的各种不同意见，又在 1933 年 7 月成立了一个咨询会议，收罗了所有的内阁成员以及十几名复元机构的首脑。他仍意犹未尽，同年早些时候又成立了一个全国紧急事态委员会，参加的多属上述机构成员。这些机构很臃肿，尾大不掉，办事效率不佳；同重大问题一起出现的，也有不少小麻烦；它们往往浪费了与会的那些忙人的时间。不但如此，这些机构还降低了内阁的地位和冲淡了它的重要性。到后来，连伊

克斯也偷偷地在内阁会议上打盹，还躲着不让总统看见。

然则，内阁和这两个委员会确实起到了一个作用：周复一周，它们令罗斯福对于在实行新政后最初几个月中那段冒险的、敢作敢为却又杂乱无章的时日里出现的大小、成堆成堆的问题有了一个深刻的印象。而且，这些会议使四十个机构中的三十个机构的负责人直接受到罗斯福的富有感染力的干劲和热情的熏陶。罗斯福满怀信心地坐在那些钦佩他的僚属当中，讲故事，开玩笑，一块儿商量研究，敦促行动，要求迅速报告，果断提议，总之几乎是单枪匹马地策划和指挥这场新政战役。

一位平时相当冷静的机关领导人对他的朋友惊叹地说：“同总统在一起呆一个小时以后，叫我把钉子当饭我都吃得下去！”

国会山上的九十六名参议员和四百三十五名众议员，即使在危机期间大概也同总统共享大权。他们同这位新总统的关系如何呢？国会一开会，这个问题的部分答案在众议院里马上显露出来了。坦慕尼协会、田纳西州和得克萨斯州的国会代表团三方相互妥协的结果，选了伊利诺伊州的众议员亨利·T·雷尼为议长。这是半个多世纪以来首次当选为议长的北部民主党人。在这场交易中，议会中党派领袖由田纳西州的约瑟夫·W·伯恩斯坦担任，一个得克萨斯州人出任了拨款委员会的主席职务。另外还有两个民主党的领导职务由北方人担任。在参议院中，地位极为重要的是罗斯福的三位盟友：副总统加纳，他出席内阁会议；临时议长内华达州的基·皮特曼；此外还有议会中党派领袖阿肯色州的约瑟夫·T·鲁宾逊，他是民主党的忠实拥护者。

但是，在两院内部，强大的势力既有向左的，也有向右的。南方人，除了同华尔街敌对以外，一般都具有保守的观点。他们由于民主党在北方多年失利而积累了自己资历，所以一般都担任了各委员会的主席或主要成员。与历史悠久的范畴——公共工程、垦殖、农庄主、劳工等等——同时并存的，有由于萧条而加深了分歧的派系集团：主张实行银本位的人，通货膨胀政策的支持者、退伍军人。在刚当选的那几十名新议员中也有一种完全不可知的因素，其中有些人聒噪刺耳地兜售万应灵药，另一些人对于首都万花筒似的变化感到无所适从，一言不发。参议院对政治趋势反应不那么灵敏，但是它也同样有许多思想分歧，有两党成员组成的集团和党的各种派系。

国会里的民主党队伍如果失去指挥，就会四分五裂变成游击队了。参议院的民主党人成立了一个指导委员会和一个政策委员会，均由亲总统的

资深参议员予以操纵。众议院的新领导建立起各级委员会，表面上是要为争取议员的支持而游说，实际上则更多的是为消除抗议，笼络反叛者。不过，国会中的实权派都没有占有首脑地位。谁将指挥指导委员会、议会首领和干部会议？将要遵循什么纲领？这个问题不久就很清楚了。雷尼不经意地认为民主党的政纲同政府是一致的，他说：“我们要推行罗斯福先生的纲领。”

行政首脑就是立法首脑。只是在总统办公室这一级，才对党派利益、纵横交错的立法集团和忙忙碌碌的官僚们提供统一的措施，以便处理全国性的问题。罗斯福的领导提供了统一的力量，但这个事实并不表明国会的对于政策没有影响。罗斯福往往以过分屈服于国会压力为代价来赢得国会的支持。1933年国会的显著特点是，拥护新政的情绪超过了罗斯福愿意付诸实施的界限，绝大多数国会议员比罗斯福更加倾向实行通货膨胀，要求政府少节约一些，对退伍军人、农庄主更慷慨些，公共工程更大一些，财经政策更坚决一些。国会尽管内部分裂，结果却促使罗斯福越来越偏左。

如果说罗斯福能驾驭变幻莫测的局势，那是因为他自己一直在运动之中。在整个百日期间，他基本上居于主动。他曾许下诺言，要建立一个强有力的领导，而他本人就活生生地体现了这句诺言。他精神愉快，笑逐颜开，信心十足，成了白宫生活的中心。早上还没下床，他就滔滔不绝地向他的助手论述他的主张，提出问题，发出指示，巨大的身躯下萎缩的双腿连被子也撑不起来。他坐在轮椅上，敏捷地穿过白宫走廊，轻巧地坐上办公椅，连续长时间地接见来访者，批阅信件，接电话，召开紧急会议。他从不怕累。柯立芝对待来访者有他一套方法：“不要回他们的话”，而罗斯福讲的话却比他的顾问们讲得多，比内阁成员讲得也多，甚至比来访的参议员们讲得还多。

一个强有力的领导——而且也是率直的领导。罗斯福的个性富有感染力的特点在于他的心胸开阔和他的谦虚。这正是他在第二次“炉边谈话”中给全国人民留下的印象。他说：“我不否认我们在做法上可能存在失误。我并不指望打出去的球每次都能命中。”他引用西奥多·罗斯福的话说，如果正确率能达到百分之七十五，他就很高兴了。经济情况已略显好转，但“我们不能自吹说已经恢复了繁荣”。在记者招待会上，罗斯福也是这么表明。“啊，关于银行业，我学到了不少的东西”，3月初在一片笑声中他这样说。4月末，他又说，政府又前进了十码。

“然而这是一场持久战。”

美国第一

国内出现的喧嚣的事件尽管令人忙得喘不过气来，但也无法遮掩舞台后面传来的海外危机的浪潮，国际形势已急剧恶化。希特勒既当上总理，在短短几个星期内，通过恐怖手段与颁布法令，便镇压了一切有组织的反对派，镇压了工会，宣布其他政党为非法，并着手建立极权主义统治。日本的军队已大举攻向中国的长城。东方的形势如此严重，罗斯福在第二次内阁会议上就郑重地讨论了有朝一日与日本作战的可能性。

不过，外交事务在罗斯福看来并未严重到足以改变选派美国驻外使节的陈规。忠诚的民主党人等待着委任作为对他们的酬报，而总统却没有使他们失望。约瑟夫·丹尼尔被派往墨西哥城。罗斯福的一个相交往年的老朋友，路易斯维尔的《信使报》编辑罗伯特·W·宾汉姆被派往英国。杰西·I·斯特劳斯曾资助过竞选，被选派往巴黎。罗斯福提议他在1920年的竞选伙伴詹姆斯·考克斯去柏林，考克斯谢绝了。但在国务院里，有一批职业外交官，其中包括副国务卿威廉·菲利普斯，此人从威尔逊时代起就是罗斯福的密友，还有经济学家赫伯特·菲利和远东问题专家斯坦利·K·霍恩贝克。因为赫利提议外交官的任命在职业外交官和政界各占一半，罗斯福保留了一些共和党人出使较次要的国家。

总统就职时，欧洲的经济问题正日益严重。他是以一个政治家的谨慎和个人外交敏感来处理这些问题的。日程上排在前面的议题是纷坛复杂的战争债务和货币稳定问题。这些问题不能再长久搁置不予解决了，因为早已计划在1933年的春天或夏天举行世界经济会议。1933年4、5月间，罗斯福和来访的一系列外国领导人讨论了经济问题，其中包括拉姆齐·麦克唐纳首相，爱德华·埃里奥总理。总统与他的客人，着重指出他们讨论的“探索性”，发表了空话连篇的如白开水似的声明。

罗斯福完全有理由保持谨慎态度。民主党纲领中的外交政策部分很含糊，只有陈词滥调。罗斯福在竞选中基本上忽略了外交事务。简直没有几项外交政策能算是他的政策。更重要的是，他在决定国内政策，以便把农产品和工业品价格提高一些。他害怕这种温和的通货膨胀会让外国输来的便宜货所冲垮。为了避免发生这种情况，总统从国会获得授权，把关税提到比斯穆特——霍利税率更高的水平。显而易见的是，罗斯福仍然相信，象他在3月4日讲过的，国际贸易关系固然重要，但与国内复兴相比却在其次。

然而来自对立面的压力也很强大。尽管罗斯福自己在二十年代即已转

而采纳一种比较倾向于民族主义的政策，但他党内的许多领导人却仍然赞赏威尔逊的国际主义传统。他们强调，如果说民主党人曾经维护过什么传统政策的话，那就是较低的关税壁垒。总统也不能忽视这股要求对国际间经济混乱状态采取正面攻势的强烈情绪，这种情绪在东海岸特别突出。

这些斗争的压力通过总统的亲信作用于总统。赫尔并不讳言，他盼望他这次出任国务卿，将成为他终生为扩大贸易和各国间的经济合作所作的努力的顶峰。内阁中的罗珀和斯旺森都是威尔逊时代的内阁成员，某些有影响的国会议员也是如此。另一方面，莫利、伊克斯、霍普金斯、特格韦尔和总统身边的其他人则坚持优先处理国内战线上的问题。总统的一些商业界朋友也这样认为。巴鲁克在7月初写信告诉他，“国内外都没有理由批评你优先解决内政问题的立场。”罗斯福私下表示对国际金融家不满，他觉得“阿姆斯特丹和安特卫普等地的那些家伙”的投机活动有损美元的地位。

既然这些人不能统一意见，委员会成员主张不一，不愉快的收场势必难免。在伦敦世界经济会议这个令人焦躁的公开场合，情况果不其然。尽管罗斯福早就为这次集会担心，但他在接待外国使节和为这次会议进行准备工作中担当了全球领袖的角色。然而，他的准备工作令人遗憾地出了纰漏。由他选派参加美国代表团的一批人，以赫尔为首，经济主张分歧，所长各异。在这次会议的参加者中，有些是当时最杰出的政治领袖和经济学家，令人产生奢望以为这次会议能找到一条改善各国间经济关系的道路。与会者普遍认为，很多事情要取决于美国代表团的观点和立场。可是在伦敦，美国人在一片混乱所造成的迷雾中彷徨无主，而莫利带着总统的最新指示到来，只能加剧代表团内部的紧张关系，同时也激起了外国代表的希望。

7月3日突然传来罗斯福措词严厉的指示，实际上批评会议“只是为了要实现少数几个大国”的人为的和暂时性的金融稳定而在浪费时间，而且也忽视了根本性的经济弊病。这封信使会议陷入一片混乱。正如一个观察家所写的：会议苟延残喘了几天，终于在粗鲁的回骂和普遍的失望中宣告破产。

罗斯福破坏了这次会议？他为什么会这样做呢？主要原因是，当与会者在伦敦展开辩论的时候，国内形势发生了变化。百日新政看来正使美国的金融状况趋于稳定，而罗斯福这时正在国内享有崇高的声誉，他不准备过早地把美元同外国货币拴在一起，因而使这种美好前景受到损害。经济学家对他的这种态度议论纷纷。有的斥责他的这种“民族主义”道路，而

英国的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这位管理货币的支持者，却写文章说罗斯福“非常正确”。从政治上看，总统正碰到了交叉的火力攻击。那些主张“先解决本国问题”的人为他的这一着喝采；但国际主义者则又吃惊又失望。赫尔回国时对他的这种做法表示十分气愤，对莫利的干涉大动干火。

美国出席了在日内瓦延宕了一年多的裁军会议，结果它也同样无果而终。1933年5月中旬，罗斯福直接向各国首脑发出一个振振有词的呼吁，号召世界各国订立一项“庄严而又明确的互不侵犯条约”。可是，裁军会议却打不破仇恨和恐惧的僵局，罗斯福由于1932年曾经否定国际联盟而捆住了自己的手脚，现在除了在集体安全计划中提供消极的合作外，别无良策。这次会议最后由于希特勒退出裁军会议和国际联盟而宣告失败。

这一年的另一个棘手之事是战争债务。在这个问题上，罗斯福同样谨慎小心。他不愿把这个问题当作总的国际经济问题中的一部分来处理；他甚至不愿意授权在伦敦的代表团讨论债务问题。他说：“这个权在爸爸手里——就在我手中。”

如果说，经济复兴的战役主要是在国内打响，那么，什么是打这一仗的总体战略呢？这位总统是个优秀的领袖——可是他要把美国人带到哪条路上去呢？随着百日即将结束，人们要从前几周的那些迅捷行动中寻求一种模式。

勿庸置疑，它有条不紊地继承了过去的政策。总统在他的措施中掌握住威尔逊改革的标准，这些措施是联邦对证券实行监控，对劳工表示友好，对商业展开调整。在资源保护和农业调整法方案的原理方面他是步堂兄西奥多的后尘。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的公有制特征反映出他剽窃了一点美国社会主义政纲。最奇怪的是，他把胡佛政府的诸如平衡预算和节约政府开支之类的方案也照搬过来了——而且有过之无不及。而他的外交政策则同二十年代的经济和政治上的民族主义相差无几。

连贯性——但当前又是如何？即使是最有智慧的政治思想家，无论他如何努力，也无法从那一片混乱中找出一贯性来。公平交易、新自由、新民族主义，二十年代的社团活动一个接着一个令人不安地接连而至。斥巨资于公共工程与执行节约法案，直接而广泛救济所体现的人道主义与克削退伍军人抚恤金的吝啬作法，农业调整法中提高关税的条文与国务院标榜的新国际主义，罗斯福强调政府作为社会改良的工具必须加强，而同时他又削减政府开支，包括政府工作人员的薪金，在这一切之间完全是矛盾，而别无其他。

然而罗斯福现在扮演的是实干家、实验家、橄榄球场上的四分卫的角色，一贯性只是次要的问题。“如果人家问你，田纳西河流域管理是根据什么政治思想建立的，那你如何回答呢？”在这项法案提交国会前不久，参议员诺里斯曾这样问他。“我要告诉他们，这既不是鱼，也不是鸡，”总统微笑着回答说，“但是，不管它是什么，对于田纳西河流域的人民却是极佳的美味。”

再没有什么东西比国家工业复兴法——从其制订方式和其主要条款上——更能阐释这种实用主义了。罗斯福说它有可能是美国国会有史以来所批准的一项最重要、意义最深远的法案。这个措施两年以来作为新政早期的主要动力，体现了它的希望和它的倾向。

罗斯福在国民俱乐部的讲话中含糊地预示了全国复兴署是直接由于在新旧政府交替时期由一批人在华盛顿分头建立的。有几个国会议员提出，要求修改反托拉斯法以防止“不公正和过分的”竞争的议案。华盛顿的商业界代表企图通过在工业、贸易和金融的主要部门建立比较强有力的协会或委员会，以取得某种自治权而摆脱无政府主义。另一些人则主张实行严格的经济节约计划，由政府设立一委员会来负责。工会领袖则迫切要求保护劳资谈判和改善劳动标准。有些人呼吁政府发放巨额工业贷款；另一些人则要求加强公共工程和直接救济。

起初，总统行动迟缓。他很明白，有股激进的关于全面经济政策的思潮在酝酿中，而他却想在转向建设措施以前先实施他的应付危机方案。此外，他还感到他的复兴主张还不够具体化。正是参议院迫使总统没有经过从容准备就采取了行动。4月16日，参议院以53票对30票批准了阿拉巴马州参议员雨果·L·布莱克提出的一项议案，即禁止每周工作五天以上或每天工作六小时以上的人所制造的产品参与州际贸易。这种死板的三十小时工作周议案颇使总统作难，尤其是因为在国会中这个议案得到了自由派和亲劳工集团的支持。就在布莱克议案在国会山上优势逐渐加大的时候，罗斯福开始更多地关注制订工业复兴纲领的可能性。他委托了一些人去探索和制订这种纲领。这项工作悄悄地开展，以免妨碍他同布莱克及其集团的友好关系。5月10日，他在白宫召集正在制订复兴纲领的各集团领导人开会。

在二个小时的讨论之中，涉及二十多条建议。最后总统指出，这批人的根本分歧在于究竟是制订一项大型公共工程方案，还是制订政府工业法典。有人说了一声：为什么不可两者兼得呢？总统赶紧说：“我想你说的

对。”并且当即指定了几个在场者“把自己关在一个房间里去搞”，拿不出协议，不要出来。

如此产生的议案在国会里也没有轻易地获得通过。各个集团从各个方面予以攻击，都说不能放松反托拉斯法，说这项法案“出卖”了工业界，或者说它把工业界组织得过于严密了，说这没有为通货膨胀进行准备。如果持异见的集团联合起来反对这个法案，罗斯福的方法就是把许多根本互相分歧的意见揉到一起争取国会里各方面人士的支持。这样会抵消反对派的表决力量吗？他的策略发挥了作用，但这只是因为大部分国会议员对他有一种几乎是盲目的信任——一个众议员称他为率领人民走出荒野的“摩西”，而且也因为要把棘手的政治问题留给总统运用其权力去作决定。布莱克议案就这样被置于次要地位了。

最终达成的议案是许多集团和各种观点相互折衷的结果。工业理事会能够草拟公平竞争的准则，可是这些准则必须得到总统的批准。反托拉斯法中没有了这些准则，但是垄断仍然是不允许的。这个措施的实质是工业可以实行自愿的自治，但是政府拥有严格控制发放许可证的权力，从而迫使商业界服从管理。在第七条（甲）中，对劳工作出一项语义含糊概括性的保证，即劳工有权通过他们的代表同雇主举行劳资谈判，在新准则中还同样模糊地规定了工资和工时的标准。在议案的另一个完全不同的题目下，授权政府斥资三十多亿美元巨大款项，大兴公共工程。

这项措施生效以后，国会于6月中旬休会，总统就动身去格罗顿。他在那里出席了小富兰克林的毕业典礼。然后他带着小儿子詹姆斯和少数几名水手登上了一艘供后勤用的纵帆船，心满意足地沿着新英格兰海岸驶向缅因州。沿途在停留处，他甚至忙里偷闲参加了一些政治性会议。在小帆船上，6月的晴空似乎也在向美国人民微笑。生产指数由3月份的五十六猛增至6月份的九十三。全国都已感到增加的救济费用、农业调整局和民间资源保护队的支票以及商业界增强的信心已经在发挥作用。一个领袖，一个在新英格兰多石的海岸边小船上的掌舵人，仍然是公众敬仰的中心。

“你怎么描叙他这个人呢？”威廉·艾伦·怀特那年春天在给伊克斯的信中写道：“究竟是我在大选中给他蒙骗了，还是他发展变化了？他任纽约州长的时候，我觉得他是一个在拉福莱特和罗斯福的影响下、在本世纪的头十年中发达起来的有两条腿的好州长。这类人物，我们并不缺，但并不是当总统的材料。……”

“我本来觉得你那位总统属于这一类。但他却不是，他变得更重要、

更沉着了，而最主要的是权力更大了！在我漫长而快活的一生中，我曾经是一个贪食者，我“食”过许多东西但却从未食言。我要再等六个月，而且，……如果我的那些话还放在盘子里，我就津津有味地吃它，咽下喉头，再咂咂嘴。”

第十章 他是全国人民的总统吗

罗斯福在其刚刚就任总统的头两年中，进行了一项关于行政管理的宏伟试验。他出任了国父、两党领袖和全国人民的总统。他以精湛的技艺充当了这个角色，充分运用了赋予他的任何一点政治权力以及行政活动。万一他这两党领袖的地位不稳，他就改弦更张。但在1933、1934这头两年中，他已置身于政党和集团之上，几乎成了一个拥有政治权力的立宪君主，这种滋味使他感到飘飘然了。

1934年8月，总统在威斯康星州对群众说：“新政的目标是在我们社会的富人和穷人之间、体力劳动者与脑力劳动者之间结成一种自由人的自愿的兄弟情谊，大家团结在一起，为共同的利益而共同奋斗。”这样的政府不会妨碍诚实的营业。他说，为了寻求社会正义，就不能采取剜肉补疮的办法。两个月后，他在一个银行家集会上声称，政府“从本质上讲，就是一切集团的领导和团结的外部表现”。他自己担当的总统角色也就是要在许多分歧的因素中找出对整个国家最有利的一致目标。贯穿在罗斯福1934年的所有讲话中的这个主题是，政府应当具有安抚、调和和统一各种主要利益的作用。在一个伟大而多元化的人民的多种利益中间，他是一个优秀的代理人。

作为全民的总统，罗斯福尽量使自己不卷入在他周围激烈进行的政治和思想斗争。他坚持不愿被卷入争论。他请求他的支持者代他承受压力，去答复那些从极右或极左方面对新政的抨击。而他自己却永远在激烈争吵的行政官员或国会议员之间充当一个仲裁人的角色。他的智囊们如果在政策上不能取得一致意见，他就一再吩咐：“把他们关到一间房里去，告诉他们不取得一致意见就不给午饭吃！”当特格韦尔和参议员科普兰因食物和药品立法问题而争得不分上下时，总统提议他们决一胜负，并愿为他们充当裁判。他告诉他的那些机构的领导人，有百分之十五的极左分子和百分之十五的极右分子由于政治原因或“纯系闹别扭”而反对他，他在二者中间展开活动，坚持自己的中间立场，不偏不倚地采取中庸之道。

全国都对这一充满着美好情绪的短暂时期大加赞赏，而得意扬扬地主

持这一时期活动的则是罗斯福本人。虽然新政遭到了一些尖锐的批评，但似乎人人都热爱这位总统。威廉·伦道夫·赫斯特在白宫作客。斯克里普斯—霍华德报系颂扬了他的新政。皮埃尔·杜邦和其他商人写信给他表示友好。农业界领袖支持他的新政。美国农场联合会的爱德·奥尼尔写道：“对我们来说，你就是二十世纪的安德鲁·杰克逊，你保障和维护了人民的权利。……”库格林神父为他辩护。威廉·格林和其他劳工领袖对白宫的主人除了赞许几乎没有别的话说。在大洋的另一边，有一个人似乎对谁也不喜欢，居然也讲他的好话。阿道夫·希特勒在 1933 年年中说：“我同情罗斯福总统，因为他越过国会、越过院外集团、越过顽固的官僚主义者，径自走向自己的目标。”

有一部分民主党人不能理解罗斯福的这种无党派路线。1934 年初，有个民主党人天真地建议总统参加民主党守护神的庆祝活动，总统温和地斥责了他。他不参加那年的杰斐逊节庆祝活动：“在这具有特殊意义的一年里，”他说，“我对全国最强烈的要求就是各党派的男男女女都来为国家复兴和建设的纲领贡献力量和才智——为此我曾一再吁请民主党人，也呼吁共和党人尽自己的力量。”尽管他热爱杰斐逊，但是，如果举办“无党派色彩的杰斐逊酒宴”，而在筹备委员会里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一样多，那不更好吗？人们借他的生日为残废儿童举行全国性的捐献活动，他也不加反对。

共和党的领导人也弄不明白。头几个月他们乐于不提抗议，并且自我陶醉于他们“先国后党”的爱国主义姿态。然而，慢慢地这个党从麻痹状态下醒转过来了。在最好的情况下，它的任务也是难以完成的。共和党的领导权在两次全国选举中丧失了十分之一。几乎被人遗忘的胡佛，甚至在共和党内也是个替罪羊。他和国会里平庸而行动迟缓的共和党领袖们同白宫里那位精神焕发、行动敏捷的人物相比，简直是不可同日而语。到 1934 年初，他们才竭力要当名符其实的反对党。

可是他们反对什么呢？罗斯福的非党派立场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在政治的竞技场上，他有时是右翼的四分卫，有时又是左翼的四分卫，有时又是中间派。就象在 1932 年竞选时那样，他在他的阵线两端都不留一点空隙，不给共和党以攻击的机会。确实，这个庞大的党本身由于这位总统反复无常的中庸之道而趋向于分裂为右派和左派。进步的共和党人诺里斯和麦克纳里虽然在他们党内属于少数派，却常博得白宫的笑脸和恩宠。

这种形势的一个值得注意的特点是，罗斯福在 1934 年和国会里的大

多数议员不同，在政策上依然采取比较温和和比较保守的立场。在银本位、通货膨胀、重新为抵押筹集资金、劳工、政府支出等问题上，总统都比国会右倾。同后期相反，在 1933 年和 1934 年，罗斯福的主要任务不是推动国会采取行动，而是以解除极端分子的武装，在各集团间寻求一致，并运用总统的各种权力和说服的武器来驾驭国会。

一位艺术化的政治家

判定美国总统是否伟大的传统标尺是总统驾驭国会的能力。无能的总统往往提不出纲领，或者他所提出的建议在那种迂回曲折和漫无止境的立法程序中变得支离破碎。坚强而有魄力的总统能够巧妙地或雷厉风行地在国会里通过他们的纲领并使他们的提案载入立法史册。接这个传统的标准，罗斯福——在白宫的头几年——是一位高明的总统，他以高明的领导手腕主宰了国会。

在那段喧闹的日子里，罗斯福如果停下来把他对付国会的方法统计出来，结果可能如下：

1. 用足宪法规定的权力，比如否决权。
2. 选择有利时机。
3. 在行政部门起草议案。
4. 持续不断地施加压力，但却要机智巧妙。
5. 用人必须再三斟酌。
6. 亲自说服国会领导人。
7. 将议案公之于世争取公众支持。

但如果总统把这些方法如此系统地罗列出来，那就不象他的为人了。他兴致勃勃，不按常规去解决立法问题，有时采用这个方法，有时采用另一种方法，视时而动。

他甚至尝试过在一段短时间内撒手不管。1934 年 3 月底，总统故意虚张声势地离开了华盛顿到巴哈马群岛去进行为期两周的深海钓鱼。白宫的压力缓和下来了。国会很快就成为一个老师不在，学生胡闹一通的教室。在民主党人中间，关于证券交易条例问题，爆发了一场争论。一百多名众议员，离开了他们的领袖，一起去支持一次将会诱发通货膨胀的再提供抵押经费法案。于是罗斯福从他的游艇上捎信给加纳和雷伯恩，让他们转告国会，“如果这种无知的法案获得批准，那么，破坏复兴的罪责全部由国会承担。而且我将毫不迟疑地把这一点公之于世。”加纳说，三十年来，他从未见过国会这样出奇的混乱。

这种撒手不管的试验令人失望地无果而终。罗斯福回来时，有一批国会议员去欢迎，他另有深意地说，他从梭子鱼和鲨鱼那里得到了一些教训。他又微笑着加了一句：“可我是个固执的人。”

总统的缰绳拉紧了，但总统却从来不曾真正地固执过。他主要是通过与会领袖们协商的方法来使他的纲领得到通过。他甚至否认有所谓“非有不可的立法”的说法。

“‘非如何如何不可’这个词很可怕”，他对记者们说，“我可不对国会讲‘非如何如何不可’。我从来不曾这样讲过，是不是？”他在笑声中完成了他的讲话。

罗斯福完全彻底地运用了宪法中赋予给他的权力。他又恢复了威尔逊的做法，亲自向国会提出国情咨文报告。他在适时提出的咨文里勾勒出总的建议。接着就授意行政部门草拟详细的立法提案而由态度友好的议员提出。个别的议员被吸收到制订政策的机构里去，即不算国会代表，也不算他们选区的代表，却作为政府的成员。总统经常会晤国会领袖和各委员会主席，偶尔也接见国会的其他议员。在实践中，他形成了一种由官僚和国会议员组成的“万能内阁”，为首的则是他本人。

总统也可以行使否决权。在他就任后的头两年中，他使用否决权的次数远远多于以前历届总统使用否决权的平均次数。他否决的那些议案中有许多是罗斯福让他的助手仔细审查过的特殊的立法议案。比否决更重要的是，总统动辙使用否决权相威胁。他经常通过国会领导人传话，某一即将交付表决的议案如不予以修改，他就要行使否决权。1934年有一次，国会通过了一项移民法案，罗斯福觉得其中有许多不公正的条款，他干脆建议两院通过一项共同决议将其撤销——否则他就要使用否决权。只有一次，这第七十三届国会战胜了罗斯福；这一次是在立法机构起来反对总统的节约纲领以后。

罗斯福不厌其烦而又娴熟地玩弄任免游戏。重要的职位都按总统拟订的名单分派给了在各州的“我们的朋友”；他又简单地以“与我不一致”为辞精心确定谁是反对派。一般事务他都委托法利去办，数以千计的申请职位的人在法利的办公室和他住的旅馆里把他紧紧包围，最后使得这位邮政部长仿佛躲避县官的传票似的，上下班都溜进溜出。法利蔑视惯例，他公开采纳随意授予官职的办法并使之系统化。当他的办公室外间挤满了来访者的时候，他不慌不忙地在房里走动，身后跟着一名速记员记下每个人的名字以及他们所要求做的那种工作。只是因为新成立的那些应急机构需

要任用各类文官以外的人员（到1934年7月这种职位约有十万之多），法利才有可能照顾那一批应该得到照顾的民主党人。

议员们也要找工作，总统精心给他们安排。民主党的一个众议员代表团向他抱怨各部门在人事任免上对他们的态度不佳。他立刻要求内阁在这个问题上要尽量照顾国会议员。然而，总统是很精明的，在第一届国会期间，他迟迟不分配工作，以考验对政府的支持。效果如何呢？据说，“他同国会的关系直到这届会期结束时都笼罩着一层象年轻的恋人之间那种最美好的期待的色彩。”

罗斯福并不绝然反对在背街小巷里买马的交易。1934年春，南卡罗来纳州的科顿·埃德·史密斯把总统任命特格韦尔为农业部副部长的事束之高阁。但是史密斯也企图让一个忠实支持者能当上美国联邦法院执行法官，此人除了与一个涉及杀人的轻微案件有些牵连外，名声颇佳。罗斯福同他做成了交易，而且高兴地笑着向诧异的特格韦尔说：“关于这件事，我希望你的关注和了解到此为止；但今天我却拿你做交易，换来了一个杀人犯！”

在同国会议员们打交道的时候，罗斯福往往要凭借他自己的魅力和机智。有一天，伊克斯十分赞赏地目睹总统处理一件棘手的任命问题。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鲁滨逊坚持要任命一个人担任印度事务专员，而伊克斯则认为此人根本不能胜任。一场激烈的争吵眼看马上爆发，总统邀请对立的双方喝茶。他先同鲁滨逊讨论一些即将付表决的议案，这些议案是总统和这位参议员都赞成的，从而造成一种友好的气氛。随后，他让鲁滨逊和伊克斯就那项任命各抒己见。未等他们争论起来，总统就把话题转向一般的政策问题。到了晚餐的时候，罗斯福轻松地对鲁滨逊说：“好，乔，你已经知道我反对什么了。……”鲁滨逊回答他没有什么好说的，于是就告别了。尽管如此，总统还是又等了一两天才任命了另一个人。

在充当他的那些喜欢争吵的助手们的调停者方面，罗斯福是个高手。伊克斯常发牢骚，内阁会议开完后，他还呆在那里嘟哝着。有时，烦闷的官员们觉得他们的首脑已经把他们遗忘了。他们往往以辞职相威胁，企图以此达到自己的目的——或者至少引起白宫的注意。总统对这些讨厌的小动作，一点也不动怒。但是他也有办法教训他们。一次，他听说有个重要的行政官员要辞职的传言，他就给这个人打了一个电话，他说：“唐，我刚听到一些不好的消息。赫尔国务卿扬言要辞职。他很生气，因为我拒绝他要把驻堪察加的使节撤职而任命那位使节为驻斯沃的亚大使馆的三等秘书的请求。”这位官员马上就领会了。他也意识到要以辞职相威胁的办法

确实是很愚蠢的。

罗斯福对待报界的态度也充分体现他擅长统治的艺术。他提供了那么多新闻材料，对那些报道白宫的记者态度十分友好，迅速而又轻松地就赢得了他们的同情。记者特别高兴的是，总统恢复了记者招待会，这使他们能够有机会直接提问。然而罗斯福比谁都知道得更清楚，记者招待会是一把双刃的剑；他可以通过它去争取更好的舆论，可是记者们也可以利用记者招待会使他失误。关键是看是否灵活地掌握在什么时候对于某个问题不予回答。

有一天，罗斯福指导各机关的首脑们如何处理与公众的关系时，他告诉他们他自己如何处理一个左右为难的质询。一个记者请他评论宾厄姆大使在伦敦呼吁加强美英关系的讲话。如果他很自然地表示支持宾厄姆，报界就会将总统的发言当作头条新闻大事渲染，这就可能对于正在同日本进行的海军谈判带来不利的影晌。如果他说“无可奉告”，则好象他有批评宾厄姆的意思。所以，他就简单地说，他还没有看到原文，事实上他已经看过了。

罗斯福操纵他的最有策略性的武器来对付国会。1933年12月，他在给豪斯上校的信中写道，“下一届国会比较容易对付，尽管它肯定会有所动作。”总统在这届国会里并没有获得去年那样接近全胜的纪录，但他还是使他的绝大部分政纲获得通过，并且摒弃了他不喜欢的议案。赫尔非常满意的是，国会通过了关税互惠法。按照总统的说法，这是一项刺激对外贸易的紧急措施而又不影响美国的任何“正当”或“重大”的利益。黄金储备法实际上就是按罗斯福要求的方式通过的；他称赞这个法案是一个关键性步骤，使政府把对美元的黄金价值的控制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农业补助扩大到棉花、烟草及其他农产品的种植者。总统提出的关于起草证券交易条例以及发行二十亿债券为农场抵押借款重新筹集资金等要求都变成了法律。

但在其他一些问题上，结果则完全两样。罗斯福要同白银集团协商了很多星期才达成交易，由财政部购进一大批白银来稳定国内白银市场。在一个明显的地区性问题，即圣劳伦斯河航道公约问题上，总统没有获得成功。这是据说是因为受到这条航道之害的各州的民主党参议员都投票加以反对，结果没有通过这个公约。国会两院又以压倒的多数决定总统对一项拨款法的否决无效。这项拨款法使被罗斯福削减了的政府雇员的薪金部分地得以恢复。

国会鞭长莫及之处，罗斯福就果断地采取行动。根据宪法，总统拥有承认或不承认外国政府的全权。1933年11月17日，罗斯福宣布恢复美国和苏联的外交关系，这是经过长时间讨价还价讲条件后才采取的行动。莫斯科保证不煽动妨害美国政治和社会秩序的革命活动，并保护在俄国的美国人的宗教信仰自由。两国间达成了扩大贸易的乐观的计划。尽管总统的一些朋友（还有他的母亲）反对承认苏联，但这一行动似乎受到绝大多数美国人的拥护，包括许多商人和共和党人。

国会通过的许多议案都批准授予总统巨大的权力。到七十三届国会闭幕时，他对和平时期的美国经济握有前所未有的控制权。但是，所有这些权力都不是他孜孜以求而获得的。有几次国会所以批准他有广泛的处理权完全是因为国会山上的各个派别在棘手的政治问题上裂缝太大，只好由白宫最后定夺才能取得协议。在农业救济、全国复兴法和关税等问题方面都是这样。权力，据说是会落入想要掌权的人们手里，但在这些情况下，也是由于形势的需要和国会产生的分歧而扩大了总统的权力。

总统对付国会的手段使全国目不暇接；但也使人产生困惑。在不为所动的人中，有一位在哈佛大学专攻国家政治学的优秀的学者，名叫F·彭德尔顿·赫林。赫林分析了罗斯福任期内的最初两届国会，他观察到总统控制权的基础并不稳固，都是诸如任免、政府基金和恩惠、国会领导人的合作和人民的危机心理之类。尽管如此，赫林认为政府仅仅是“给一直排到财政部大门口的领救济者的队伍维持了秩序而已”。组织比较强大的集团得到了它们想要的一切；弱勢的集团，诸如劳工和消费者，他们的处境就不那么好。总统的表现更多地象个精明的政客而不是个十字军战士。在组织起来的少数派面前，负责的行政领导显得无力。

赫林发问：“总统制是否能继续成为总统与国会各集团之间的一种危险的游戏，运用程序上的尔虞我诈而且以面包与马戏为代价来进行呢？”

这个问题提得十分尖锐——不过在1933年和1934年，美国人民更关心的正是“面包与马戏”，而不是不切实际的忧虑。

国家经纪人在起作用

如果说新政在开始几年里具有小恩小惠的性质，那么，中心圈则是全国复兴署，其领班以一种崭新的面貌出现在美国舞台上。休·S·约翰逊将军，看来还是一副老骑兵模样。容貌严峻坚毅，斜眼，讲话粗声粗气，但在这些表象下面却反映出种种古怪的脾气：他是个伤感主义者，一个同商人打交道的老手，精通买卖人的生意经，一个西点军人，又象个大喊大叫的杂耍演员那

样多变而引入注意。虽然约翰逊多年的上司伯纳德·巴鲁克对他的评语只是一个“不错的二号人物”，这位将军仍让总统青眼有加，让他掌管美国在和平时期前所未有的最大的一项试验——政府对经济的控制。

约翰逊的主要工作是诱使商人制订公平竞争的法规，这种法规一旦得到总统认可就具有完全的法律效力。在这位将军的监督下，各工业均有一个法规管理机构，而这些法规原是为了防止浪费性竞争，实现有规可循的价格和销售政策，并为工人提高工资，减少工时和改善工作环境。反托拉斯法将被削弱，以便商人们能在制订法规时充分合作。约翰逊原来也想接管这项法案中庞大的公共工程部分，但是罗斯福在最后一刻却把它交给伊克斯去管了。这可惹恼了将军，他当即以辞去全部工作相要挟。总统请帕金斯小姐“陪他去转转，让他消消气”。于是珀金斯驾车陪他在华盛顿周围兜了几小时，一直到他平息了自己的怒气，答应继续干他那部分工作。

这工作意义非同一般。没有几个星期，全国复兴署就象战斗的号令一样，突然在美国人民中间声名远扬。全国复兴署的鹰徽忽然出现在每家商店的橱窗里、杂志的封面上、电影里、合唱队姑娘们的身上。约翰逊行色匆匆地搭乘一架军用飞机从一个城市飞到另一个城市。每到一处必发表宣告，大吹牛皮，搞政治活动，讲俏皮话，尽力争取商人同意签署由匆匆聚集在华盛顿的那些工业界代表拟订的法规。将军成了复兴的象征；他曾一连几小时在五号街检阅极其热闹的游行队伍，应接不暇地向无尽的人流打招呼，而没有用那种被人鄙视的墨索里尼式的敬礼。自1917年以来，全国一直没有出现过如此激动人心的团结一致和共同前进的场面。

可是，路在何方呢？几乎从一开始，总统就失去了对全国复兴署的控制权。他有一天对内阁讲，约翰逊闯进总统办公室，上衣后摆翘着，递上三份法规要总统签署。罗斯福在批署最后一份的时候，约翰逊看了看表，说他要赶飞机，只有五分钟了。然后，他把那三份法规往兜里一塞，一溜烟走了。罗斯福快活地又说：“从那以后就再也没见过他了。”总统仅仅是个前台人物，以他的名义制订了一个详尽的重新就业协议，采取了上千的举措。约翰逊必须亲自把制订政策的大权委托给匆忙间召集来的商人。这些商人或许能代表，也许代表不了他们行业的行行色色的利益集团。在第一阵热潮中，全国复兴总署的工作范围异常广泛，以致这个机构几乎无法应付。一个最能说明问题的事例就是圣路易的一个擦鞋匠，他签署了重新就业协议，把工时减到每周四十小时，然而很快就要求全国复兴总署弥补他的工资损失。

全国复兴总署从根本上看是“纪经人国家”思想的外在化——也就是说，由政府代理各大利益集团采取行动，并在他们之间进行斡旋。全国复兴署是罗斯福要通过政府和各集团领袖友好合作以实现各集团间协作的计划而设立的组织机构。可是哪些人是领袖的？所以，在一片匆忙与混乱中，约翰逊同最接近他的企业界和劳工界的领袖们打交道，这并不奇怪。这些人最有号召力，组织得最好，而且在同政客和官僚机构打交道中也最有经验。谁是那个各种各样的消费者集团的代言人呢？一个消费者咨询委员会成立起来了，但是这个委员会比较不守中立，一个委员在该委员会成立后没有几周就怒气冲冲地退出了。

在1933年底，全国复兴署山鹰就在严酷的天气鼓翼了。“全国复兴法是至今通过的最糟的一个法案”，克利夫兰的几个失望的杂货商打电报给总统说。“全国复兴法意味着国家管得太宽”，巴尔的摩工人纠察队的一个工人举着的标语牌上这样写道。国会里提出了抗议。众议院劳工委员会主席威廉·康纳里，要求罗斯福转告约翰逊要同劳工的“真正代表”合作。罗斯福耐心地回答说，“作为一个比你年纪大得多的人”，他劝这位众议员不要在约翰逊的问题上走向极端。“我们自认为是自由派的人绝大多数都抱有共同的最终目标。……”但是总统也不得不正视那些抗议。1934年3月，他任命了一个由老改良主义者、辩护律师克拉伦斯·达罗领导的检查委员会。检查委员会很快就提出报告说，法规令比较强大的利益集团掌握了它们对工业的控制或扩大了控制权。罗斯福于是削减了全国复兴总署的权力，限制了它的管辖范围，把约翰逊体面地调出，并指派了一个比较听话的领导人唐纳德·里奇伯格接替他。但在全国复兴署成立刚刚两年还不到的时候，最高法院给了它以致命的打击，到此为止它已接近其组织上和政治上的崩溃了。

如果说全国复兴法是新政在商店和工厂的主要举措，那么，农业调整法就是新政在农业方面的主要动力了。这项措施的目的在于恢复农产品的平等价格——即使农产品同非农产品的价格关系恢复到1909-1914年的状况。达到这个目的必须征收同等的加工税以消除实际价格和平等价格之间的差别。贷款的目的是为了限制生产，其办法或者是出租土地，抑或是使土地不用于生产，或者在农户同意减少生产的时候给以一定的补偿——就象报纸上很快就宣传开了的“三头猪里杀一头，三条垌里犁一垌”。可是，同全国复兴法一样，农业调整法很快就显露出罗斯福的中间路线有着难以克服的困难。

这个法案产前的阵痛预示了诞生后的困难。它是由较大的农业组织和农业杂志按亨利·华莱士的指示草拟的。在早期制订政策的决定性阶段，组织上属于美国农机局联合会和全国保护农业社的较大的商业性农场主，他们的意见份量最为重要，而农业联合会虽然主要是代表边沿地带的较小的农场主并且承袭了旧的人民党传统，却没有参加。数以百万计的农民则什么组织也没有参加；他们缴不起会费，没有时间，不能旅行到五十英里以外去集会。而且，甚至在广大的中西部农场上务工的无数的农业工人、南方用谷物交租的佃农、文盲雇工、开着破旧的 T 型福特汽车随着庄稼的季节而四处流浪的季节工中间，也不存在真正的组织。自己动手种地的个体农民们，无论说话和面貌都很粗鲁，他们嘲笑那些从华盛顿回来打着领带穿着白衬衫的人，那就是他们看到的农业调整法的标志。

“基本”作物的种植者，即法案中指出的小麦、棉花、玉米和烟草的种植者们，很快就从交付给他们作为限制种植补偿的联邦支票中得到了补偿。而对于其他农民，这项措施仅仅唤起了他们的希望和期待而已。秋天的时候，罗斯福承认西部民怨沸腾。明尼苏达州的一个名叫奥尔生的农民给埃莉诺·罗斯福写了一封信，对农业的形势作了辛辣的描述。

信是费力地写在廉价的便条纸上的，字迹歪歪扭扭，奥尔生这样叙述他的“悲剧”。“我尽力试图保住我的农场，让我的孩子们吃饱，可是今年却很艰难。现钱很缺，很难弄到。……”

埃莉诺把这封信给总统看了。总统给奥尔生回信说：“我很高兴你写了信来，……你说农民生产的许多东西根本没有达到适当的水平，这话说得十分中肯。”他提到他自己在乔治亚州饲养的牛羊，并且表示希望农业调整法包括的范围要扩大。“现在我所能要求你做的就是，请相信我们是在老老实实地尽我们的最大努力，而且我们认为，虽然效果不佳，但我们确实是在改善现状。”

罗斯福的再一次保证，有一部分是能够兑现的。农业调整法的好处在 1934 年扩大到一些新的作物。农产品价格提高了，农业也繁荣一些了。然而不满情绪仍然存在。“大孩子”——从事商业的大农场主、农业公司、银行和保险公司——所得到的好处远远超过他们应得的。更糟糕的是，有人指控，农业调整法付给的支票使获得这笔钱的人能够去买机械；“用拖拉机把农业工人从土地上赶走”，而且实行“三条垅里犁一条”等办法，农场经理们不需要那么多农业劳工了。农民联合会指控这种“以限制产量保证利润的经济学”，并且坚持认为农业的困难不在于生产过剩，而在于

消费不足。但是他们的谴责不起作用。

佃农们抱怨说：“政府不让我们投入生产，我们只好靠救济维持生活了。”

罗斯福知道新政的真正关卡在于复兴。在 1933 年和 1934 年，他就如同一个医生关注一个发高烧的病人那样紧张关注着全国经济温度的升降起伏。

他就任后头一季度就业率直线上升，他很高兴。他骄傲地让记者们看一幅图表。那幅图表显示，农产品价格一直降到纸的底边以下——现在这条线又出现了，而且还在上升。然而在 7 月，证券市场行情猛跌，更糟的是，生产也下降了。总统对这次行情猛跌表示并不十分重视，认为那是投机商搞的把戏。“人人都有投机的时候，事情变化太快；那种情况完全会自然得到改正的。”他这样对新闻记者说，不过，他说，就业情况是好的。到 1933 年秋天，他也得为就业担心了：“恢复工作的人数还远远不够，”然而他觉得情况在好转。大约在这个时候，他在给加纳的信中说：事情“远不象纽约的那群人叫嚷的那么糟，不过失业问题仍然是很突出的。”

事情也真奇怪。情况似乎略微有些好转——全国复兴署越来越强有力；四处洋溢着一种复兴的气息——然而，那种干巴巴的复兴测量计——工资、物价、开支、就业——上升得颇不稳定，而且谁也无法预言其结果。形势看来很糟糕，因此，1933 年 9 月，总统指示国防部长德恩让军队准备流动厨房，以救济那些在地方上没有获得足够救济的贫苦人。到 1933 年底，总统已成惊弓之鸟，惊慌失措，正在寻找替罪羊了。他声称，价格下跌了，这是因为有些人不赞成全国复兴法法规，也因为“我们有些外国朋友”有意提高美元的兑换比值。令人吃惊的是，总统几乎也有了把不景气归咎于外国的思路——1932 年当胡佛利用这种想法时，他曾狠狠斥责过胡佛。

罗斯福在到处寻找解决办法的时候，采纳了康奈尔大学教授乔治·F·沃伦早已提出的一个建议。依照旧的货币量理论得出的这个建议是，提高黄金价值是恢复较高价格的决定性因素。1933 年 10 月，总统决定采纳这一建议。罗斯福采取了一个曾经被称做是“迄今最大胆的尝试，即向极广泛的民众简要说明复杂的经济学说和做法”。他在一次“炉边谈话”中向全国人民解释他关于购买黄金的计划。他以为自己辩护的口吻说：“这是一项政策而不是权宜之计。”但到政府的黄金市场成为一项长期政策的时候，沃伦的理论失败了；提高黄金价格并没有促使商品价格上涨。

“我们的困难不会那么快就解决，但我们在前进，而且我们的方向是正确的”，总统在广播讲话中宣称。1934 年，就业情况的确有所改善。其

原因主要还在于那些方案在罗斯福看来实质上是人道主义的而不是进行恢复的措施。

第一批这样的措施是霍普金斯执行的。当时他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主动，讲话也更尖锐。罗斯福告诉他，要迅速采取行动来拯救人民，因此尽管他的桌子还放在过道里，等待搬进他的办公室去，他就已坐下来工作了，仅仅几个小时，就划拨了几百万美元的救济金。在实行他自己那种牌号的新政政策时，他催促呵斥下属，惹翻各州的政客，全然不顾官僚机构的礼仪。在新政的头几个月，霍普金斯通过各州用去了好几亿美元，在1933年后期和1934年上半年又通过民政工程署在“快速”工程上花掉了几乎十亿美元。

霍普金斯主要不放心的是行动迅速。人家告诉他某项工程要在长远以后才能完成，他不客气地回答说，人们“不是长远以后才吃饭，他们天天要吃饭。”伊克斯和他的公共工程署的行动要迟缓得多。伊克斯生性多疑、脾气不好、固执倔强，人家叫他“诚实的哈罗德”，这使他很不好意思。他只在他认为已经弄清了工程的合法产权、经济价值和实用性以后才授权开工。然而到1934年，资金便从公共工程署源源流到承包商、制造商、工程师、工人、卡车司机、木匠、建筑师的口袋里，并且深深地汇入经济大动脉中。

除了这些，还有别的机构大量花钱。从胡佛时期承袭过来的复兴金融公司比过去贷出更多的款项。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开始在田纳西河流域将它那庞大的开发计划付诸实施。它把原先是经济上的无底洞的一个地区改造成一个刺激经济发展的基地。农业调整总署把钱交到农民手里，这笔钱很快就转到西尔斯、罗布克和当地的五金店去了，然后又回流到制造商、银行和工人手里。

罗斯福使用所有这一切手段，却又不是完全依赖其中的任何一个。作为全国人民的领袖，作为各主要有组织的利益集团的经纪人，他要采取中间路线。他采取了增加财政支出的政策，但也只作为预算取得平衡以前的临时措施。他赞同降低关税，但不能在损害美国重大利益的方面下调。他想要一个“通货再膨胀”式（reflationary）的价格上涨，但却不要“通货膨胀”式（inflationary）的价格上涨。他支持有组织的劳工，但仅仅支持到它与工业、劳工和农民同政府的合作相一致的程度。

罗斯福作为各主要利益集团之间的一个缓冲者，作为互相对立观点之间的调和者这一角色，再清楚不过地体现在1933年12月他在记者招待会

上发表的演讲中，他说：“我的工作就是阻止政府象他那样尽可能地花钱。那是他的工作。他努力想法不花钱，……而人民的观点是应当在公共工程方面再花上一百亿，在这两者之间有一处地方，我们就是要达到那个地方，我们正在努力制订一项计划。”

经纪人领导的政治活动

每个政治活动家都想利用简单的“看风使舵术”在大选中获胜——那就是意味着，细心权衡各集团的态度，舆论的倾向，政党的活动，然后采取一种到选举日最能赢得选票的立场。而一个领袖则不是这样，他会积极地拟订他的政策：他力求改变他周围的政治力量的灿烂群星，使它朝着更接近于他自己关于政治利益的概念的那个方向前进。

一个大党的领袖们的天才在于他们有力量围绕着热烈争论的政府问题揉合成一个选民的多数联合体，而且通过他们本人的领袖资质使这个多数来支持政府奉行的原则和行动纲领。例如杰斐逊在南方的种植园主、西部的谷物种植者、北方的劳工、边疆的居民、债务人及其他各阶层或其他集团成员中形成了他自己在全国的支持者。这批追随者大体上组织在共和党内，结果把他选入了白宫。杰克逊也是各阶层和各集团的经纪人，如同一切民族领袖必然是这种经纪人一样。然而他也是一个有明确的政府观念并且能赢得广大人民群众爱戴的多数党领袖。杰斐逊和杰克逊作为总统都为人民群众的大多数办事，他们在历史上代表着一个政治概念：广大的多数通过一个具有广泛基础的政党进行统治。

1933—1934年的罗斯福既不是杰斐逊，也不是杰克逊。他并不敢以左翼多数的领袖自居，一个建立新的政治力量阵线的政党领袖。在他看来，他的任务就是整治一个失调的经济制度，拯救人民于水火，实施一个一般都能接受的改革，而首要的是促进经济复兴。这些目的——尤其是最后这个目的——是要在各大利益集团的领导人中用温言相劝，进行调解，形成一个伟大的民族合作的伙伴关系，才能达到。

从一个政治领导的角度分析，罗斯福的“宏伟试验”采取的形式可以称作经纪人的领导。在他当政的前两年中，他似乎认为，他担任这个总统角色就是要同有组织的集团的领袖们打交道，并在他们之间达成妥协，尤其是在劳工、农民和商人等集团之间。如果“经纪人国家”的经济理论意味着逢场作戏，意味着一堆劲头十足但不协调的政府计划，意味着没有真正复兴的经济改善，那么，经纪人领导的政治活动可能就是以牺牲长远的战略性的进步取得眼前的政治好处了。

罗斯福不是什么理论家。要说他选择这条路线是出于什么明确的政治原则，事实上可能不是如此。他有个公共利益的概念，他的路线的出现和形成，只是大体上由于这个基本的理念，也由于他的政府的日常计划和应急性措施。也许他从来也没想到过，那个由商业界和劳工集团代表在起作用的国家复兴法，由大农场主集团支配的农业调整法居然会同本尼托·墨索里尼提倡的包含工人和雇主辛迪加的各阶级合作的国家有某些异曲同工之处。但是农业调整法的负责人乔治·皮克看到特殊利益集团的权力同国家不可分割，即便是在一个民主制国家也不可免。他坦率直接地说：“事实就是如此，任何一个民主政府也不可能同它所统治的国家有很大差别。如果在这个国家有一些集团居于统治地位，那么它们在政府推行的任何计划中也会占有主导地位。”

这种理念对于罗斯福的政治领导有着深刻的影响。这使得他对重大的政治和经济压力宁可作出比较消极的反应，而不作出更加积极的反应，也就是说，不是故意建立某种左的或右的投票联盟，以便彻底改造政权的基本模式。这意味着他不重视一个强大的投票联盟——一个由没有什么特权的农场主集团、无组织的或组织较差的广大产业工人、消费者、黑人及其他少数派集团组成的投票联盟未来的可能前景。总统放任国家复兴法和农业调整法对消费者的利益不加考虑，他对特格韦尔为保护消费者拟订的食品法和药物法没有对国会施加压力予以支持，他准许推迟实行关于失业和老年抚恤金的措施，他开始对于瓦格纳要加强劳工组织权利的努力不感兴趣，他对于将要讨论的反私刑法案立场不明而且态度冷淡，所有这些都是很重要的。

不过，从直接的政治成果来看，罗斯福的策略却是最有效的。1934年的国会选举日益迫近。这样一个非大选年，由于没有总统竞选给全国上千个州县地方选举指出一个总方向，美国的选举就分裂成四十八个州的竞技场，而每个竞技场反过来又呈现出游击战式的混乱斗争，针对着一些人物、人员任免、地方性问题以及诸如贪污腐化和犯罪等循环出现和无从解决的选举问题互相斗争。在候选人和他们本人所属的宗派争选票的混乱中几乎看不到政党及其政纲了。

总统为“全民的”利益负责，不受僵硬的政党思维的约束，也没有对一套既定纲领效忠的义务，因此他能够按各州的需要来调整他的策略。由于他表面上不介入州或地方竞选活动，甚至连民主党的在各州的政治活动都不参加，他就更加成功。实际上他还是插手许多关键性的争夺战。他对宾夕法尼

亚州的局势所作的处理最能说明他的实用和投机主义和灵活性了。

三十年代早期的宾夕法尼亚州提供了主要政治力量重新组合的素材。1934年州长是吉福德·平肖，他一度是林务主任，由于涉及一项名誉问题被塔夫驱逐，后来成了西奥多·罗斯福的公麋党人。平肖早就是共和党内进步分子的领导人，反对旧时的头头皮尤和格伦迪那样的老党员。1934年美国参议院改选时，出面竞争重选的是戴维·里德，共和党的一个老骨干。宾夕法尼亚州的民主党人在自由派人士中的部分选票被共和党进步分子夺走了，在六十年的漫长时间里没有得到过一个参议员席位，这次推出两个能干而无背景色彩的组织上的民主党人为候选人，决定约瑟夫·F·格菲为参议员候选人，乔治·厄尔为州长候选人。

罗斯福和平肖是老相识。他们都曾对抗过各自党内的“老卫士”，而平肖表现得比罗斯福更好斗，更露骨。平肖虽是共和党人，然而在1934年大力支持罗斯福，似乎很想结成某种政治联盟。1934年初，总统劝说平肖竞选参议员，并暗示民主党可能会提供支持。不过事情马上就表明，宾夕法尼亚州的民主党人不愿提这位州长的名，他们想给他们自己的人争取选票。于是，平肖只好在共和党初选中去竞选，他批评共和党的老卫士里德是梅隆的代理人，同时称颂罗斯福。但是罗斯福不偏不倚；他甚至不让伊克斯在初选时替平肖讲话，结果里德当选了。那位州长——还有他那位不屈不挠地为丈夫争求功名的妻子——这时试图拟出一个新的进步共和党人与民主党人的联合候选人名单，让平肖竞选参议员，厄尔竞选州长。宾夕法尼亚州的民主党对此不感兴趣，罗斯福也不帮忙。最后平肖出来支持他的头号政敌里德。

选举前不久，平肖写信给罗斯福，这时的平肖十分不满。平肖说，他本想继续支持罗斯福，但他不能支持格菲和厄尔。“民主党提名两个极不恰当的人竞选本州最高的两个公职，我反对他们，这不会使我与你为敌，除非你也做出这样的选择。……这取决于你。”

罗斯福的回信有点傲慢——也是向他说真话。他不明白平肖为什么要支持里德那样一个反动派。

“我亲爱的吉福德，我也知道，你不会见怪我这样说，你我曾一直以争取实现政府的原则为重——这些原则就是政府的意向和目标。你我从长期的公共活动的经验中也懂得，在选择帮助我们实现这些原则和目标的人物时，往往不能适得其人。我说的不是宾夕法尼亚州，但我确实知道在纽约州我就曾不得不通过许多我不喜欢甚至不信任的人工作——然而我已经

同他们共事并通过他们进行工作以达到终极目的。”

他最后写道，事情就是如此。如果他是平肖，他就不参与这场斗争。以这封信为分水岭，两人的关系就彻底破裂了。进步共和党人——民主党联盟一直也没有实现。

罗斯福在其他州也执行权宜策略。加利福尼亚州出现了一个特殊的问题。在那样一个混乱的州里，专门报道丑闻的老手和老资格的社会主义者厄普顿·辛克莱获得了民主党的提名竞选州长，支持他的还有“结束加州贫困计划”的数十万名支持者。这个计划要使加州的失业者在国营工厂和农场生产他们所渴望得到的东西。1934年8月底，辛克莱在预选中击败麦卡杜—乔治·克里尔派的惊人胜利使白宫大吃一惊。法利还会对民主党的初选获胜者发出通常的例行贺电吗？总统应该采取什么立场呢？当辛克莱以要求见总统逼着对这个事件表态时，总统决定亲自来驾驭事态发展。

辛克莱到达海德公园时，发现罗斯福非常可亲。总统兴致勃勃地讲故事，同情地倾听辛克莱描述他的计划，然后他友好地表示，过几个星期以后他要亲自出面支持“为使用而生产”的主张。他甚至讲了一个不可置信的故事，说他母亲在吃早饭的时候给他念辛克莱的作品《丛林》，因而败了他的胃口。他还摆出一副开明的样子对这个加州人说：“我前进的速度不能超出人民所能允许的范围。”

辛克莱完全被罗斯福的魅力倾倒了，但是，如果他以为他已削弱了这个老资格的激进分子要全面开展一场结束加州贫困的决心，那他就看错人了。到10月，加利福尼亚经历了它历史上最激烈的一场竞选活动，象克里尔这样的一些老民主党人纷纷抛弃了辛克莱。而对这种棘手的局面，罗斯福无动于衷。厄尔利对埃莉诺·罗斯福说，关于辛克莱当候选人的问题总统的指示是，“一，什么也别谈；二，什么也别做。”

其他行政官员并没有听从这个指令。货币审计官J·F·T·奥康纳回到他的故乡去观察局势，并试图劝辛克莱撤消竞选以支持本州和进步政党提名的候选人。奥康纳没有获得成功，于是就同争取连连连任的共和党候选人州长弗兰克·F·梅里亚姆谈了。不管是否做成了彻底的妥协，但结果是梅里亚姆发表了一些亲罗斯福的声明，总统却从来没有对辛克莱表示过支持或放出“为使用而生产”的话，共和党在选举中击败了民主党。

威斯康星州出现的又是另一种难以处理的局面。罗斯福有段时期曾经和参议员小罗伯特·拉福莱特和其他进步共和党人保持着密切的政治关系。1934年春，拉福莱特进步派与共和党划清了界限，成立了进步党。在参议

院内，拉福莱特曾经拥护罗斯福的方案，所以罗斯福希望他能继续当选。但威斯康星的民主党人却并不这样想。他们有他们自己的算盘，希望从进步党人和老共和党的分裂中获得好处。1932年，进步党曾与民主党人联合选出A·G·施梅德曼为州长，他是半个世纪以来的第一位民主党州长，这就令局势更复杂化了。现在，到了1934年，进步党有了他们自己的州长候选人菲立普·F·拉福莱特，而施梅德曼却又参加竞选，争取连任。

威斯康星州民主党人十分焦虑，极力要求罗斯福不要支持鲍勃·拉福莱特。而现已崛起的进步党人则要求承认“参议院内最好的新政拥护者”。罗斯福如何是好？罗斯福私下对记者说：“我个人希望他们能设法把鲍勃·拉斯福莱特送回到这里来。但是我不能强迫威斯康星的民主党人继续干下去，推选他为候选人。”威斯康星的民主党人由于没有总统的指示，就推举了一个老资格的民主党人同参议员拉福莱特对垒。

面对这种困境，罗斯福决定采取一种脚踏两只船的不偏不倚的立场。8月初在威斯康星州的格林贝发表讲话的时候，他与拉福莱特参议员和施梅德曼州长两人勾肩搭背，称赞他们合作得好。大选的结果使罗斯福很满意，却使威斯康星的民主党人很不愉快。拉福莱特兄弟都战胜了他们的民主党政敌，而当地的民主党仍然是一个软弱的反对党，无论在州内还是在华盛顿都缺乏对新政的支持。

明尼苏达州更汇集了各州政治的各种不同色彩。在这里也出现了一个新政第三党——农工党。也正是在此，民主党内宗派林立，由有后台的小头领们统治着。不过在明尼苏达州，有一个民主党小宗派过去事实上是农工党的助手。在明尼苏达州谁坚持罗斯福的政见呢？到1934年，老资格的民主党人怀疑罗斯福也许会承认农工党的州长弗洛依德·B·奥尔森和农工党参议员亨利克·希普斯特德，这两人都在竞选连任，和老资格的民主党人相对抗。

他们怀疑得十分正确。罗斯福亲笔写信给法利说：“不要插手明尼苏达州的事情——不要鼓励反对希普斯特德或奥尔森。”他向报界声称，关于明尼苏达州的问题，他本人也“左右为难”。结果，这两个农工党人打了一个漂亮的胜仗。

在新墨西哥州，罗斯福小时候的一个朋友，参议员布朗森·卡廷作为进步共和党候选人正在争取连任。总统和卡廷关于红利法案曾有过争论，而行政职务大都已任命了民主党人。卡廷同他的民主党对手丹尼斯·查维斯两人所获的票数相差不多，因此便作为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交给参议院裁决。卡廷为索

取某些选举誓词飞回新墨西哥州，路上因飞机失事丧命。后来据罗斯福说，他曾告诉卡廷，他愿意对查维斯另有安排，让他们不要再竞争了，但是卡廷拒绝了这个建议。罗斯福没有采取进一步的行动，而只是对记者说，卡廷是“我孩提时代的老朋友”，但查维斯是个称职的众议员。

罗斯福在记者招待会上说过：“我企图使人们相信这个想法，即如果我发现合适的人物，政党的标志就没有多少意义。”当然，他在一片轰笑声中附加一句说，这话不许记录。

右翼的分裂

总统的策略在选举中收到了效果。关于美国政治有一些为人们接受的惯例，总统所在的党在非总统选举和非大选年力量总要有所损失。1934年的情况却恰恰相反。在众议院，民主党的席位由313席增至322席；在参议院——简直不可思议地——由59席增至69席，而且民主党在不少州里还接替了州长职位。

加纳在致总统的信里的：“我们的一些朋友认为多数党头重脚轻。但如果掌握得当，众议院和参议院都没问题，我确信你是会安排好的。”

总统对某些战果特别感到满意。格菲和厄尔在宾夕法尼亚州获胜。小鲍勃·拉福莱特在威斯康星州大获全胜。奥尔森和希普斯特德在明尼苏达州大获全胜。皮特曼在内华达州，惠勒在蒙大拿州，还有一个名叫哈里·S·杜鲁门的初出茅庐者在密苏里州均操胜券。辛克莱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失败丝毫也没有使罗斯福感到不安。

这个结果不仅是对1934年罗斯福的策略的肯定，更是对罗斯福本人——对以他为代表的既令人兴奋而又模糊不清的新政的表扬。从西奥多·罗斯福以来，哪一个总统也没有象他这样凌驾于他的政府和他的时代之上。正当美国人期待白宫里有一个敢作敢为的人时候，他有了作为，至少做出了有作为的表现。正当他们需要信心的时候，他慷慨陈词，为前途排除疑虑；无论有什么错误，我们是“向前看”，是“在我们的道路上”，这是他在1933年、1934年出版的两本书的题名。正当美国人需要欢乐和愉快的时候，白宫里充满了他的笑声。

有些领袖有那么一种魅力，能使他们身边的朋友和僚属对他们热爱和崇拜，而他们对那个圈子以外的群众则表现得冷漠和疏远。另一些领袖的特性则恰恰相反。而罗斯福则不论对他身边的人，还是对广大群众，都卓越地表现了这两方面的天份。路易斯·豪说：“我同富兰克林·罗斯福很接近，就象他的跟班一样。他至今在我心目中仍是英雄。”豪是一个深藏不

露的人，这是他躺在华盛顿一家医院的病床上临死去时说的话。就连执拗粗暴的哈罗德·伊克斯也在罗斯福的魅力下被软化了。有一次他同罗斯福一起旅行，后来在日记中写道：“总统是个好伙伴——他非常聪明、机智，能攻善守。他兴趣广泛，而且非常富于人情味。”伊克斯在温泉看着人们蜂拥地围住罗斯福的汽车，对他歌唱、与他同声欢笑，对他象对一个快活的大哥哥，伊克斯说：“我从来没有看见过象他这样受爱戴的人。”

然而罗斯福最大的力量还在于他总是能摄住人心。在他当政的第二年，他就通过及时的行动，在公众面前和私下经常流露的欢乐情绪和巧妙地掌握公众舆论而保住了他众星捧月的地位。千百万人坐在收音机旁倾他那热情的鼓舞人心的话语；他在全各地广泛旅行和视察，数十万人看到了他们神采奕奕的总统。这些巡视使人民精神抖擞；也使罗斯福自己精神振奋。他相信 he 可以从人们的面容看到他们的心。有一次到西部视察后，他对应急委员会说到 1932 年和 1934 年人们脸上神情的变化时说：“你站在车后看人群，就能看出差别来了。他们是有希望的人民。他们的勇气都写在脸上。他们很欢快。他们知道他们面临极大困难，但是他们正在弄清情况。……”

所以，毫不奇怪的是，芝加哥的一名电焊工，或者亚特兰大的一位家庭主妇，或者韦科城的一个加油站老板，都会热情地写信给总统，向他倾诉他们的理想、忧虑和困难。但值得注意的是，身为领导的人们要求总统给以指点，给予帮助。1934 年末，麦金太尔告诉他的首脑说，出版商罗伊·霍华德曾“支持过新政”，现在要求进来取得新的启发，以免他因为误解而陷入歧途。商人、劳工领袖、银行家、报纸编辑、农场领导人离开白宫时没有一个不是轻松愉快，深受感动，如释重负。

他也需要人民，他伸出双手向他们表示欢迎。像英国社会主义者哈罗德·拉斯基这样一位客座教授，或者一个有头脑的优秀的商人，或者一个对某一外国写过生动报道的旅行家，或者象豪斯上校这样的资深政治家，或者一个来自西部的有敏锐洞察力的政客——这类人物当中，谁都可能被邀请去白宫作客。罗斯福夫人继续邀请各方面“有影响的”人士一起喝茶，费利克斯·富兰克福特也殷勤地派来一些有新思维的人。罗斯福利用来访者颇有些象比较内向的领袖利用书籍一样——作为情报的来源。

为了对公众施展他的魅力，罗斯福充分利用两大传媒——报纸和电台。在记者招待会上，他以开玩笑，敏捷巧妙的回答，个人的戏剧感，直呼人们名字的做法和平易近人的态度，继续深深地感染着记者们。记者招

待会上常常一阵阵地发出哄堂的笑声。

不过，罗斯福与人民联系的最重要的手段还是“炉边谈话”。第二天阅读报纸上呆板的报道，这些谈话显得有些呆板做作，成为一些虚情假意的套话。可是，在家庭起居室里聆听，这些谈话很清新，亲切，直接而且感人。这些广播谈话之所以能够成功，主要是因为罗斯福象是一位父亲对他自己的一家人讲话。他有意识地使他的谈话对象——人民——形象化。他忽略了传声器，演讲的时候，“时而点头，时而双手作出简单、自然而轻松愉快的姿势”。珀金斯小姐这样写道：“他面带微笑、精神自信，好象他真的就坐在前廊下或者就同他们一起坐在起居室里。”他的听众也会同他一起点头，微笑或者和他一起笑起来。

在当政的头两年，罗斯福被尊为全民的总统，地位显著提高。这局面能维护多久？他能使一个实际上团结的人民继续支持他吗？

不能。甚至就在他上任的头一年，就发出低声的嘀咕和不满。到1934年，反对派的行动就开始统一起来了，特别是右翼反对派。

右翼反对派是一个成份复杂的大杂烩。其中一部分是全国对新政的某些成分所产生的反应：十九世纪个人主义者对全国复兴法和农业调整法的反应；有限政府信仰者对罗斯福似乎正在建立的极权主义国家的反应；节约的支持者对政府开支的反应；劳工组织反对派对政客让工会领袖在新伙伴关系中身居高位的反对；对金本位制神圣不可侵犯性的狂热拥护者的回应。然而，在很多情况下，受益于新政的人民方面却有人憎恨罗斯福，这必然有其更深刻，更具普遍性的原因。在工商业界反罗斯福的浪潮中，反应了对失去了地位、尊严和阶级安全感的尖锐的怨恨。

总统对来自右翼，特别是他本阶级的人们说的刺耳的话十分在意。在给波士顿的一位银行家和他在哈佛时代的同班同学的一封信中，他十分反常，提到他听他的朋友所说的话，最后写道：“因为我感到这些话伤害了久远而真诚的友谊。”罗斯福听到商界关于他的谈论时大为光火。他在给一个商界朋友的信中写道：“你要是听到纽波特一些最有声望的人家餐桌上的谈话就好了。”他对记者们嘲讽地谈到“杰出的绅士们”在纽约聚餐时批评了他。

具有极大讽刺意味的是，罗斯福也同样抱怨那些人对他进行批评。他说那些指责是教条主义，不切实际。他的朋友詹姆斯·P·沃伯格因为金融政策而反对新政时，罗斯福写了一封信给他，他自己怀着极大的热情读了沃伯格写的书，接着他就鼓动沃伯格买一辆旧车，穿上他最破旧的衣服

到全国各地去转一圈。“等你回来的时候，把《货币的混乱》一书变动一下，我保证这本书可以多出几版！”总统大肆鼓吹这个事实，即保守派在批评新政，但却不提出任何建设性的替代方案。

和纽约那些不满意的人打交道是一回事，罗斯福轻蔑地把其中的一些人称为“投机商”或者叫“那一伙人”。可是在他自己的参谋队伍中间，反对的势力也有所发展，这又是另一回事了。当他的财政顾问 O·W·M·斯普位格在 1934 年末提出辞呈的时候，他气愤到了顶点。他觉得这个人没有就复兴提过任何建设性的建议，而且显然曾企图召开抗议新政财经政策的会议。总统在废纸上草草地给斯普拉格写了一封措词刻薄的信。他在信里声称，如果斯普拉格自己不辞职也会被解职。他说斯普拉格的行为已接近对政府不忠的边缘。不过，这封信始终没有寄出。还有一些顾问也辞职了，他们是农业调整署的皮克以及道格拉斯和艾奇逊。

保守的反对派公开地携手合作、组织起来的时候，罗斯福倒显得十分轻松。1934 年 8 月，美国自由联盟获准成立。这个组织致力于“教育人们认识尊重人权和财产权的必要性”，政府有责任保护上进心和企业，以及人们赚钱、储蓄和购置产业的权利。这个组织的成员或发言人中，拥有杜邦这样的工业家，威廉·S·努森这样的汽车制造商，J·霍华德·皮尤这样的石油资本家、函购商行总经理休厄尔·L·艾弗里这样有吸引力的人物，以及象艾尔·史密斯，米厄特·肖斯，约翰·W·戴维斯和班布里奇·科尔比这样著名的民主党人。总统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亲切地说：肖斯口袋里装着两条“戒律”而且已经掏出来了，——这两条“戒律”是保护财产的必要性和保护利润的必要性。那么，其他的戒律呢？罗斯福问道。什么叫爱你的邻居？他借用一绅士的“幽默而又不敬”的话表明，这个联盟相信两件事——热爱上帝，然后忘记你的邻居。

总统继续阐明：“这里说的两件事都没有提到社会应当关心，换句话说，政府应当关心使那些愿意工作的人有事可做。让人民免于挨饿，有房子住，生活小康，接受适当的教育，这些是政府关心的事。除了这些以外，另一件没有提到的事是，保护个人的生命和自由不受社会上某些企图以牺牲别人的利益而取得荣华富贵的势力之害。他们同别人一样有权得到政府的保护。我看说了这些以后没有必要再多置一词了，你们称之为——说教吗？”

到 1934 年秋，罗斯福与自由联盟保守派的分歧看来已无法弥补。他自己的情绪也越来越激烈。他对伊克斯说，大商人是有意采取同政府闹事

的策略。旧金山爆发了一次严重的大罢工，他指责那些“头脑发热”的青年劳工领袖，但他又说，那些保守党更希望发生这次罢工。当总统向记者提到他的就职演讲时，他的思想已远不是当初那种利益协调的状态了。他声称：“现在我要说，美国有一桩更可怕的事，就是有些人千方百计地要向美国人民灌输恐惧。”当他于1934年11月到隐士住地（Hermitage）访问后写信给加纳时，他所期望的已远不是全民的伙伴关系了，他写道：“我对老安迪·杰克逊了解得越多，我就越爱他。”

这就是同右翼破裂的开始。而左翼纠合起来的动乱势力却要严重得多。

第十一章 愤怒的葡萄

史学工作者早就观察到，社会运动有越出常轨的趋势。温和的改良分子从陈腐的政权夺到了权力，改变了事物的一般状态。接着，极端分子又从温和派手中把权夺走。一个罗伯斯庇尔淘汰了一个丹东；一个列宁取代了一个克伦斯基。促使人们起来造反的常常不是实际的痛苦，而是对美好事物的期盼。

新政头几年的危险也就在此。胡佛当政的那几年是社会的静止状态时期。萧条似乎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把人民冻结在呆滞状态。接着有了一个新领袖的救世良方，有了使人们感到振奋的面包和马戏，繁荣昌盛的局面重又来临。人们的生活改善了，期望也高了；期望一旦上升，反过来对复兴的不稳定状态也就感到不满。美国政治曾经是死水一潭，现在潮流澎湃，涌向那新的依稀可见的彼岸。

更为激进的领袖随着这股湍急的潮流给美国带来了新的信息。他们认识到，千百万人不但希望经济生活提高，而且也要社会得到拯救。他们的观点是正确的。在一个发生社会动荡、酝酿着新事物的时期，许多美国人急切地期望出现一些能够拨乱反正的领导人物，急切地盼望有一些能够控制这个似乎是敌对的世界的领导人物。这些美国人还没有都得到新政的好处，甚至罗斯福本人也还没有得到任何好处。南方的佃农、老年人、雇工、失业的年轻的大学毕业生、一年只干三个月的炼钢工人、农业季节性工人——全国复兴法和农业调整法还设有涉及到这几百万人。他们当中有许多人，特别是农村里的人，对罗斯福来说是爱莫能助。他们没有收音机，听不到他的声音；没有报纸，看不到他的面容。他们属于组织边缘的人群。

政治与大自然一样憎恶真空。在骚动的三十年代早期，这些新领袖就

忙于培育和控制不满情绪。他们的主要伎俩就是向那些对繁琐的新政感到厌烦和迷惑的人提出简单具体的解决办法，而且在提出这种办法时采取了一种直接的而具有戏剧性的手法。他们的呼吁是个人性质的而非正式的，是神秘的而非理性的。他们动用了群众示威，以及高举旗帜、呼喊口号、叫卖万应灵药等方式不自觉地顺从希特勒的劝告，即“把这个高傲的信念植根到小人物的心灵中去，即使他只是一个小毛虫，但也却是一条巨龙的一部分。”

这些洪大的潮流在 1935 年达到了顶点。就在这一年，罗斯福面对着这样一些人，他们转而反对政府，希望在新政的灰烬上筑起新的权力堡垒。

一群小狐狸

在罗斯福第一任期间，酷热的 6 月里的某天，一个有着狮子鼻、面颊上有酒窝、头上有鬃发的年青人大步迈进美国总统的办公室。他就是路易斯安那州的参议员休伊·P·朗，他怒气冲冲，来者不善。说了几句笑话后，他就话转正题。他说，休伊·P·朗曾在芝加哥成功地使罗斯福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而且，他还对政府的纲领表示过支持，可是罗斯福给了他什么好处呢？什么好处也没有。得到任命的却是他这位参议员在路易斯安那州的敌人，而且总统在其政府里还保留了几个他的老对头。

朗的红头发上顶着一顶水手草帽，帽子上有一条颜色鲜艳的飘带。在整个会见过程中，他没有取下这顶帽子，但有一次例外，这位参议员匆忙地摘下了帽子，用它轻轻拍着总统的膝盖倾吐他自己的愤怒。他这样无视对总统的举动，使坐在一边的法利大为不安。站在门口偷看的麦金太尔也气得直咬牙。但是罗斯福靠在椅背上似乎毫不介怀。他脸上一直带着轻松的微笑。他和蔼地但也是坚决地回答了朗的观点，既不责怪过去，也不对他许诺什么。

过了几分钟，这位参议员承认了失败。他摘了帽子，而且也没再戴。片刻以后，他告辞了。走出白宫，他对法利说：“天晓得来见这个家伙有什么用？我不能让他赞同我的任何决定。”这是罗斯福和朗的最后一次会见。不久后，这个路易斯安那州人就开始全面反对政府了。

朗的出身与罗斯福大相径庭。1893 年他出生于北路易斯安那州温教区的一间木屋里。这个教区人穷、收成不好、牲口瘦，是一个滋生政治抗议的地方。休伊从小就能说会道，精力充沛。十岁离家到拍卖商那里去找工做，在印刷所帮过佣、曾倒卖书籍，销售炊具和治“妇女病”的药。在图莱恩大学，他花八个月的时间修完了三年的法律课程，在路易斯安那法院

接受特别考试，于二十一岁时进入律师界。他“就是从那个法院出来竞选州长的”。

他的确参与竞选州长了——而且不限于此。休伊同大多数路易斯安那州的政客不同，他的手法特别。他攻击大公司而且挺认真。他击败了政界的老卫士，他许诺要免收学校的书本费，要改善道路和医院，要斥资修建更多的公共工程，因此他在选举中获胜。1928年在一阵旋风似的竞选以后，他当上了州长，避开了一次对他的弹劾，打垮了反对派。他的“民主理论”极为简单。“领袖有了一项纲领，他就出去进行解释，耐心地，更耐心地，一直解释到大家都明白了为止，”他解释说。而且一旦他当上州长，“他就不容忍老政客帮派，立法机构、法院、公司或任何人反对。”休伊确定没有容忍任何人的反对，几年之中，他就把路易斯安那州变成了他的个人领地。

随着他的地位日益巩固，休伊就在更广泛的范围内活动了。1930年他当选为参议员，他总算找到了完美的全国性的讲坛。在参议院里，他重重地击打尊敬的参议员们的脊梁，抨击“诺玛哈尔骑士富兰克林亲王”[诺玛哈尔是一艘快艇的名字，为文森特·阿斯特所有，罗斯福偶尔也使用这艘快艇。]“科恩·华莱士勋爵”，“芝加哥臭虫”伊克斯，斥责法利为投机商，并且把参议院办公大楼变成了他的“分享我们的财富运动”的全国总部。如果说他的手段暧昧，目标却是的确而又令人心动的：免费宅基，免费教育，廉价食品，退伍军人退役费，限制财产，两千美元的年最低收入。人皆为王，而休伊则是众王之首。

朗空言自吹说他在1936年要进白宫，最迟1940年也要进去。他到处寻找盟友，而其他领袖也以这个路易斯安那州人可能的下属的身份而出现。其中之一是底特律郊区罗亚尔欧克的库格林神父。一个身体结实脸上光洁的青年人，可是却擅长外交辞令。库格林在二十年代后期曾机智地求助于他的天然工具，无线电。他曾有过非凡的胜利。他在一次斥责“胡佛的繁荣”之后收到一百万封来信。他平均一星期要接到八万封信。当他那一百五十名助手打开邮件的时候，钱就会滚出来，据说一年达五十万美元之多。

库格林曾一度热情地支持罗斯福。“新政是基督的政策，”他说，他和罗斯福还曾友好地通讯。1934年9月库格林恳求海军任命他为神父时，罗斯福也为他向海军部门说情。但是，库格林的计划远远超过了罗斯福所能容忍之范围。他要求实行通货膨胀，一种“活的年薪”、将银行、货币和

国家资源全部收归国有。在 1934 年，他同罗斯福的关系突然降温，也许是因为政府发现了他的主要支持者是一个大的外币经营商。从“小花圣祠”发出的声音，开始是低沉而严肃的，然后变得热烈激昂而有哀怨，很快就转为批评罗斯福代表了“恶毒的资本家、犹太人、共产党人、国际银行家和财阀”。

同时在西部地平线上活动的第三个人物是个瘦瘦的戴眼镜的老头子，人称富朗西斯·E·汤森博士。过去曾是市镇卫生官员，几乎是一贫如洗。他接受了在加利福尼亚州附近传播的某些经济上的万能药剂。他对于本人和他同辈人的命运是很忧郁的——据传说，一天清晨，他从浴室的窗户望出去，看见有三个老妇人正在翻垃圾箱，想找点残羹剩饭吃。从那个时候开始，这个老人就开始了他的社会改革运动。他拿出一项计划——至少是为老年人的——这项计划非常概括而简洁，使人精神兴奋。六十岁以上的老人，假如——极好的附加条件——能在三十天内把钱花光，每月可得二百美元养老金。这笔钱来自“交易税”，这一大笔强迫性开支会使整个经济活跃起来。

汤森其人的真实情况很快就同传奇混为一谈，无法分清真假了。但是这个运动的来龙去脉是很清楚的。美国的人口正在老化；那种包含叔伯阿姨、爷爷奶奶的老式农村家庭已渐式微；自给自足的社会也正在褪变。成堆地围在这位医生身边的老人，他们的脸上深深地勾勒了一代人无情的故事；复杂的机器把他们抛出了工厂，新的手续他们不理解，也许集体向西部大迁徙已经无路再走了——最后来了个大萧条，随随便便地就把几百万老人碾碎在经济车轮底下了。

汤森运动以惊人的速度迅猛发展。1933 年 9 月——罗斯福的新政开始后的七个月——这位医生把他的计划投寄了一家地方报纸，一年之内，一千多个汤森俱乐部组织起来了。1935 年初又组织了一千个左右。随着新政的蜜月期逐渐消逝，这个事业的前景似乎越来越光明。它以人们的不满情绪作为原料，深深地扎下根去，它有着抗议运动的一些不可或缺的东西：一个作为这个运动象征的领袖；对于这种号召力的一种强烈的宗教性的误解；一项与老人的要求直接相关的计划，它是地地道道的“美国生活方式”，它摈斥激进的方法和“违反基督教教义”的方法。

罗斯福的朋友对反对者势力的发展感到震惊。白宫不断地接到报告，勾画由反罗斯福的演说煽动起来的大规模的群众集会。豪斯上校对总统提出忠告，朗可能象 1912 年西奥多·罗斯福整塔夫脱那样整他。卡车司机工

会的丹·托宾报告说，会员们——也都是些正派诚实的人——都在互相打听，他们是否应该组织“共享我们的财富”俱乐部，听了这个汇报后，连豪也担心了。1935年8月，白宫的一个助手斯坦利·海伊从西部回来，他的报告也令人沮丧。汤森运动充满活力而且发展迅猛。他这样警告白宫。他的估计是，1936年那些认为对汤森可以一笑置之的人们将要犯极大的错误。

猜测估计是一回事，真实的报道又另当别论。法利对朗的活动有了警惕，他要求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统计埃米尔·赫尔杰对朗在全国的力量做一次秘密的民意测验。赫尔杰的测验结果也发人深省。这个“众王之首”竟把总统1932年的选票也抢占了相当大的一部分。朗的势力还不限于路易斯安那州及其邻近的一些州；他在全国各地都得到出乎意料的支持——很可能足以使1936年的选举有利于共和党。更糟的是，他公开宣称说，“要拿下”他的几个对手在参议院的席位。这个威胁颇有点令人胆寒。1932年，朗曾侵入阿肯色州开展了一次如旋风似马戏式的飞快的竞选活动，支持海蒂·卡拉韦接替她已故丈夫的参议员席位。他宣传说：“一个可怜的小寡妇对六个大肚皮的恶霸。”最后，海蒂得的选票超过了她六个对手得票的总和。

罗斯福对这些小狐狸的反应怎样呢？他密切关注着朗记公司的活动，但并未过分吃惊。他似乎更关心共和党人——特别是拉福莱特和奈这样的进步共和党人——会趁火打劫，结果1936年会出现一个进步共和党的候选名单和一个朗的候选名单。总统写信给豪斯说：“毋庸置疑，形势很危险。可是到了决战的时候，这些家伙不可能都睡在一张床上，而且几乎可以绝对肯定地说，他们之间会打得不可开交。”

罗斯福很快就发现抗议运动的一个致命的弱点：他们选择的时机。他在给豪斯的信中说，1935年来个“免费的幕间表演”比1936年要好，因为1936年正戏就要上演。1935年3月，威尔逊的传记作者雷·斯坦纳德·贝克敦促他在全国摆出道义高尚的形象，他有些迟疑。他说，群众的心理，由于人类弱点的关系，不能长期同无休止的最高音调相协调。“威尔逊曾经触动了人们道德心，但他没有西奥多·罗斯福在具体问题上激发人民热情的魄力。”

总统继续写道：“连续不断的领导中还包括另一个思想。报上重要新闻天天重复一个人的名字，打开无线电，每天晚上听到的是同一个人的声音，人们就疲倦了。比如说，从去年11月起，假如我试图还维持1933年

和 1934 年的政策，那么，必然要登台表演的新演员们，朗和库格林以及约翰逊，就会使观众的视线偏离正戏本身！”但是，罗斯福同意这种看法，需要一个“团结的美国行动的新刺激的时刻终将会到来”，而且他会做好一切准备。

然而，现在还未到那样的时候。罗斯福对付与他分庭抗礼的领袖们的办法这时也还不是偏离对他们思想雷霆的注意力，而是在一些不分上下而微妙的混战中以智谋打败敌人获取胜利。

他对朗发动的攻势就是如此。官职已经授予路易斯安那州“众王之首”的政敌了，而且朗的那些身居非文官职务的支持者都被开除了。西奥多·毕尔波是一个由政府安排工作的密西西比州的政客，其使命就是要挡住朗对其邻近的州参议员的攻击。1935 年 8 月，政府的一个朋友在密西西比州初选中成功后，毕尔波打电报给罗斯福说：“对休伊·朗那个疯子”已经做了初步治疗，而且以后还要做更深入的治疗。罗斯福饶有兴趣地答道：“我在看你的本事。”联邦特工人员在路易斯安那州到处走访，检查朗及其一伙的财务问题。

库格林也一样，他摸到的是匕首而不是短剑。罗斯福最讨厌的事就是同这个神父正面冲突。内阁成员发表反对库格林的言论时，他就觉得不妥。总统宁愿通过知名的天主教人士，如底特律市的前市长富兰克·墨菲和僧侣统治集团与天主教教友组织中政府的朋友去做工作。关于库格林的广播网，罗斯福接到了一份详细的调查报告。法利在罗亚尔欧克邮局核对了神父的汇款收据，借以估量对这个神父所作的募捐基金的号召产生的反应波士顿的红衣主教奥康内尔送给白宫一项充满希望的报告，说这位神父将要被召往罗马，领导那里的美国学院。但结果却是空谈。

如果这些动作大部分都无效，罗斯福也不显得那么关心。他可以等待。但是在 1935 年的头几个月里，核心集团中有不少人看到，政府好象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总统在政治上似乎正在失去支持。

劳工：新的百万大军与新的领袖们

新政在劳工方面也调动起不断发展的生气勃勃的力量。或许罗斯福永远不会完全理解这些新的力量和被这些力量抬上权力宝座的新领袖们。他使得社会方面和立法方面发生变化，这些变化又急剧地改变了三十年代政治力量的对比，而他对自己在这些变化中所起的作用确实是很不自觉的。

大萧条部分瓦解了有组织的劳工的士气和力量。在二十年代，工会会员就逐渐减少了。1930 年以后，由于工人失业，由于储存着大批失业的工

人，罢工成为一种力量很小的而且往往是自杀性的武器。工会会员的数目急剧地下降。当工业风暴陡起时，工会领袖更是小心翼翼地竭力防范。在烟煤生产中心和纺织业中心，走投无路的工人接连举行零星罢工。可是因为没有良好的组织，往往在枪杀、逮捕、恐怖和漫无目标的破坏中完全失败。到1933年3月初，有组织劳工的力量，相对地说，大约只等于二十五年以前的力量。

新总统不无意中当了劳工运动再生的产婆。就象唤醒了其他阶层的人民一样，在那“百日”里，罗斯福的战斗精神和热情也唤醒了工人群众。但更有决定意义的是，全国复兴法中有一项条文，第七条（甲），其中提出：“受雇者有权通过他们自己选择的代表组织和资方举行劳资谈判。在任命代表时，他们将不受劳工雇主或其代理人的干涉、限制或压制。……”罗斯福和珀金斯小姐对这一条都没有起什么作用。这主要是由众议员和劳工领袖草拟的，是在要劳工参加国家复兴法的伟大“利益一致”的妥协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这么一条规定打开了繁复而可作多种解释的潘朵拉盒子；律师们对这一条的含义进行了无休止的争论。

可是劳工领袖的解释一目了然。他们对他们的组织人员说：“让法律讨论见鬼去吧。”约翰·刘易斯在整个矿区贴出几千条标语，这样写道：“罗斯福总统希望你们参加工会。”劳工组织工作人员高呼：“工联主义现在意味着对美国的忠诚。”随着1933年商业好转，工人们纷纷加入工会——加入矿工联合会，戴维·杜宾斯基的国际女服工人联合会，西德尼·希尔曼的服装工人联合会，纺织工人联合会，更有上万的工人进入了成立不久的橡胶轮胎、钢铁、汽车、炼铝、水泥、矿冶等工会。

抱怀疑态度的劳联领导人说，事实上是兴起了一个工人加入工会的运动。工人们举行群众集会，互相表示他们希望组织起来。

工联主义的发展，导致了一系列的罢工。纽约市出租汽车司机，新泽西州的造船机械工人，宾夕法尼亚州的炼铝业工人，密尔沃基的公共汽车司机、比尤特的铜矿工人，加利福尼亚州摘水果的季节工，杂货店员，新闻记者，皮货商，卡车司机，伐木工人都罢工了。1933年夏，罢工总人数比1930年和1931年罢工人数的总和还多。1934年和1935年，罢工浪潮一再高涨。西海岸码头工人举行罢工，它又波及奶车司机，木匠和其他工人。这反映了社会上普遍的混乱。赫尔和卡明斯这两位部长对这种局势感到震惊——总统当时正在海上旅行——珀金斯小姐发现他们在一本正经地商榷这是否就是《大英百科全书》上一篇文章所指的“总罢工”。

当罢工的浪潮淹没了全国复兴法的调解机构时，罗斯福成立了一个全国劳工理事会。这个理事会由他的老朋友纽约州的参议员罗伯特·瓦格纳主持。理事会开始的工作很有起色。但1933年底和1934年初，由于雇主不肯让步而瘫痪了。这时瓦格纳认识到，在全国复兴法设立的机构以外，还得有一条永久性的法律，从法律上规定支持工人通过自己选择的工会进行劳资谈判。1934年，总统仍然把他的全国复兴法规定的伙伴关系当作筹码不肯脱手。在总统不给予帮助的情况下，这位纽约参议员，劳工部长珀金斯和政府的一批劳工专家经过字斟句酌，草拟了一项立法议案，这项立法议案使第七条（甲）具备效力和准确性。这个议案受到雇主和报界的直接反对，而白宫的态度则飘乎不定。最后，罗斯福支持一项能在国会得到两党支持的妥协决议。依照这个决议，总统成立了一个临时性的全国劳工关系理事会。这项新法律在关键的问题上非常含糊。罗斯福还没有关于劳资谈判的政策；他仍然在接二连三的危机中采取笨拙的行动。

更多的危机正在酝酿之中。1933年和1934年的事件解放了劳工力量。这些力量使劳工运动的旧机构受到严重的压力。在大工业中心涌现出锐气逼人的青年领袖，这些人是在几个月前才离开装配线来组织工会，领导罢工，组织工人纠察队，同老板、工贼、警察、法官斗争。劳联迫切地要把这上百万的新工人组织起来。劳联当时主要还是以行业工会领袖为主，这些人有他们成形的招募成员的有效办法——把招募的成员放在“联合”工会里，由劳联领袖严格掌握，把他们留在招募站一直等到可以分配出去时止，按行业和工艺分到铁匠、木匠、电工、管工、金属薄板工以及其他几十个行业的工会中去。

在巨大的全国性的统一的产业王国如通用电机、美钢联、固特异、杜邦等公司面前，基层领袖们发现，这种零零碎碎的办法意味着分裂和软弱。准备支持他们的是少数劳联领袖：刘易斯、默里、希尔曼、杜宾斯基以及另外十几个人。行会与产业联合主义、劳工政治手腕、个人野心和宿怨相对，这种情形在即将开始的混战中要起什么作用，在战斗的烟尘和喧嚣中是模糊不清的，但联合会很快就从根本上动摇了。1935年秋，刘易斯及其追随者组织了产业组织联合会。

1935年11月23日刘易斯在致格林的信中说：“亲爱的先生和兄弟，从今天起我辞去美国劳工联合会副主席职务。”美国力量的组成中又加入了一个新的因素。

罗斯福对这一切怎么看呢？他不过是个旁观者。实际上他对工会内部

事务是不感兴趣。他似乎没有发现这个事实，即大大扩展了的劳工运动的政治含义已牢牢扎根于大规模生产的工业企业的百万工人之中。

但是，在政府关于劳资谈判的政策复杂性中以及工会首领之间的小冲突中却暗含有重要的问题和机会。这些是属于经济与政治势力的问题和机会。第七条（甲）着重于以政府的力量支持工会。现在的问题是要判定工会属于哪一类。很多问题取决于政府对有关谈判单位的性质、选举方法、行会与产业相对的代表权、公司工会的定义等问题的政策。比如，1934年3月，当罗斯福施加他的影响来支持汽车工人的某种比例代表制时，他削弱了工人反对厂方的自身团结和力量。当工会干事赞成公司级的工会和建立在多数裁定原则基础上的代表制选举时，他们在培植大产业工会的势力。

事情虽单调，但是很重要。约翰·L·刘易斯是够精明的，他很理解这对未来的影响。1935年在劳联的年会上，他照例用他粗嗓门大声问道：“难道我们不应对那些处境较差的伙伴们贡献我们自己的一些力量、知识和影响吗？……如果我们支援了他们，他们壮大起来了，他们地位的提高、力量的增长，到时候会使我们受益。……而今天行会可能站得住脚，就象巨风中高大坚挺的橡树那样，不畏雷电。将来终有一日，这种改变了的情况——现在事情变化很快——这些组织终将经不起雷电和巨风。”刘易斯在呼吁实行有意识地扩大劳工运动的政策，以便为劳工联盟建立雄厚的经济力量。

如果说罗斯福没有发现劳工运动的扩大是支持新政的政治联盟的潜力，部分原因就在于他对劳工运动的立场。他是以一种保护者和恩赐者的观点来看待劳工运动，而不是作为一个政治领袖来扶持他未来政治同盟军中的劳工这一侧翼。他关心的是他们的工资、工时和劳动条件；在他心目中，他们是有具体困难的人。这个情况很能说明问题，他向记者谈到一位汽车工人对他的访问时，丝毫没有触及这个重要的产业内的工会情形，而是逐句地引用了这些工人同他谈话中反映的一天挣十美元，可是一年只干六十五天活等问题。

在这个领域中，对罗斯福的领导的最大考验是如何对待瓦格纳法。在一定意义上讲，这是新政期间通过的最激进的立法，因为它通过赋予组织起来的劳工以经济和政治力量因而从根本上改变了全国的政局。与罗斯福的大部分改革方案和救济计划不同之处是这项法案正击中了现存劳资关系的要害。这个法案从根本上推动了建立强大的工会，工会反过来又为未来

的自由联合提供选票、金钱和组织。

不过，罗斯福对瓦格纳法案冷淡了好几个月。他只是在这个法案必然会通过的最后关头才发挥了自己的影响予以支持。在长时间里，他对雇工代表这个主要问题表现得特别冷漠，甚至到了迟钝的程度。1934年5月，他怀着怨恨情绪对记者们说：工人们爱选谁为代表就选谁——可以包括斯瓦特的阿孔德，皇家地理学会，一个工会，以至暹罗的皇太子。他看不到，问题的实质在于工人是否仍能由公司工会和各种少数派以及行会发言人代表，他们的分裂会减小工人在同雇主打交道中的力量，也不利于新的政治大军的形成。

1935年2月，当瓦格纳进一步向国会提交他的全国劳工关系议案时，他不仅没有得到总统的赞同与支持，而且在参议员鲁宾逊和哈里森试图将该议案置于死地时，他还必须尽力阻止罗斯福参与这一行动。在记者招待会上，当记者问及这个问题时，罗斯福依然很冷淡，否则就付诸托辞。瓦格纳几乎是单枪匹马地草拟了这项政治策略，争取到了劳联的老卫士的勉强支持。他在报界满怀敌视情绪和领导漠不关心的情况下，在1935年5月16日以63票对12票在参议院通过了这项法案。

十一天以后，最高法院宣布复兴法不具法律效力，其中包括这项法案给予成立工会的任何法律上的支持。从逻辑上也许可以设想，正是这个行动使总统的劳资谈判政策缺少了支柱，逼着他加入了瓦格纳营垒。但是，事实却不如此。5月24日，最高法院做出裁决的前三天，罗斯福站出来支持这个法案了。为什么呢？主要出于他那单纯的，对当前形势的讲求实用的反应。这项法案在参议院得到绝大多数支持而获通过，使人觉得众议院肯定也会予以通过。罗斯福既站出来支持这个法案，他就可以对一些尚未确定的重要条款发挥作用，而且他也可以就此摆脱那种可以被认为是政府失败的局面。他也可能受到过去基本上是同情他的纲领的商会领袖在5月初公开同他破裂的影响。最高法院的裁决只不过加强了那个早已下定的决心。

一旦他决定跳跃，他就以典型的罗斯福式的敏捷动作，把自己的重量投向天平。到了6月份，瓦格纳议案已经成为“必须通过的法案”。罗斯福帮了忙出了力，使之越过众议院里的障碍，他不理睬商业界强烈请求制止这项方案。在众议院没有点名就批准这项法案后，总统对众议院劳工委员会主席康纳利表示祝贺，他说：“这是向前大大迈进了一步。”

罗斯福就是以这样特别的方式首次与劳工建立了伙伴关系。

左！右！左！

罗斯福突然支持瓦格纳法案，表明了他在 1935 年所制订的政策。第七十四届国会的第一次会议成了美国近代史上总统领导国会的最奇妙的实例之一。这届国会通过了一些温和的新政议案以后，显然就要休会，却突然变得精力充沛，积极起来了。在 1935 年的炎热的夏天，通过了罗斯福第一任斯内几项最重要的法案。但是，如果说总统的行动有点左右摇摆，道理是很明显的。他是在巨大的压力下，不得不走一步看一步，谨慎从事。在具体问题面前，他被迫有时向左，有时向右，但是却坚持不懈地向着在他脑子里大体已经确定的目标前进。

1935 年 1 月，总统向国会提交国情咨文时，让人对于即将到来的剧烈变动没有什么预感。尽管他提到需要更多的社会正义，但语调颇为温和，而且要搞的是一个范围相当有限的计划。总统说：“假如我们愿意的话，我们可以使 1935 年真正成为一个有着良好感情、有着有目标的进步的时期而长存于人们的记忆之中。”他告诉那些善于接受新思想的国会议员们，他将要提出一项广泛的保障计划，包括自然资源、失业保险、老年保险以及改善住宅等措施。他许诺还要提出一项包罗广泛的公共工程和劳动救济计划。他还简单提到其他需要制订的方案，如扩大国家复兴法和改进税收的“方式与方法”。显然，要使新政更为明确，予以改进和巩固而不是漫无边际地扩大。

总统企图在左和右之间曲折前进。在好几个月的时间里，他的这个企图使他的计划有陷入立法泥淖而夭折的危险。中间道路还是行不通。

庞大的劳动救济法案尖刻地描述了中间道路的难处。“联邦政府必须而且必将停止现在这种救济的办法，”总统对国会说。他不愿意以发给现金或生活必需品或给予几小时刈草或耙枯叶的工作来进一步耗费人民的活力。议案中最激动人心的是，罗斯福要求斥资四十八亿美元——在和平时期这是一笔耸人听闻的巨款。参议院中进步党人要求拨款九十亿美元，某些保守的议员们则只愿给点“小恩小惠”。同这两者比较，四十八亿美元正是中庸之道。罗斯福也很小心翼翼，他让主持起草这项法案的人将这项法案提到众院委员会，而不使用伊克斯和霍普金斯这样有争论的人物（他们愿意掌管这笔款项）。

在众院领导人的稳妥操纵下，这项议案在下院比较顺利地通过了。可是到了参议院，情况就不同了。他们可以无限制地争论，右翼集团和左翼集团都猛烈抨击这项议案。保守派的目标很简单：减少拨款，把这项法案

变成贫困救济。劳工集团则希望扩大议案的有效范围。然而，他们首先希望能写进这样一项条款，即在此范围内的私人雇主必须付给工人丰厚工资。总统坚决反对这一条款。他宁可规定一种“可靠工资”，比如说一个月或许是五十美元，一方面为了可以进一步扩大救济范围，另一方面是为了安抚私人雇主的情绪，因为他们害怕工资方面的压力。先同左翼、嗣后又同右翼站在一起的，有主张实行通货膨胀的人们，以及那些想把这项计划变成一个“肉桶”以便回家打开而分肥的参议员和朗这样的冒险家。想混水摸鱼的是伊克斯和霍普金斯，他们征集议员来支持他们自己最喜欢的条款。

这些利益根本不同的集团，为了一项机会主义的政策联合起来了，它们以一票的多数批准了优厚工资修正案。罗斯福的策略是把议案退交委员会，借以暂时封杀这个决议案。总统发现他的事情很难办成。伊克斯感到总统精神不振，神态疲惫，缺乏他通常具有的那种战斗激情和轻快情绪。朗这时在参议院内却称王称霸。当罗斯福在优厚工资问题上寻求一项妥协方案时，那个“众王之首”却轻蔑地说：“我注意到报上有些赞成票投给优厚工资修正案了。任何人找工作要是先去求见别人而不先来求见我，我可是可不高兴的。……我可能要把价钱降低一些。”他还随便地进一步说：“我是十足的党派分子。我不清楚，现在我属于哪个党，但是我却拥护这个党。”

政府同自由派劳工集团达成了妥协，终于能够防止一个残缺不全的修正案，而将整个议案通过了。这次修正案获得通过，主要不是由于罗斯福——他在后一阶段正乘“诺马哈号”军舰出海，而且抱怨说参议院“令人心烦”，整个局面“在成年人来说简直是太幼稚了”。议案通过主要是依赖国会山上的政府领导人以及那些情愿在某些问题上进行妥协从而把有些问题留给总统处理的议员共同的努力。罗斯福不得不付出一些代价：最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条款，它规定在此议案范围内，凡年收入超过五千美元的雇员都必须经过参议院确认。

4月初救济法案通过，罗斯福取得这项胜利不过花了三个月时间。他曾呼吁参议院批准美国继续留在国际法庭，但是这个努力失败了，因为表示反对的电报如雪片一般飞来，而这些电报中有许多是在库格林的唆使下发来的。他的社会完全法案要求国家承担义务，制订一项通过联邦和州采取的行动来救济失业和贫困的计划。这项法案在各种势力的争斗之间摇摆，而这些同样的势力曾经几乎把救济法案扼死胎中。自由派对它的适用

范围有限，对它依靠州来参加救济这点感到失望。保守派则认为它走得太远了。一项退伍军人年金法案在众议院获得通过，它所获得的赞成票足以压倒预想中的总统否决票。

罗斯福从来没有象 1935 年春天那样在各种对立的政治势力压迫下处境艰辛。美国商会的发言人严厉地斥责政府。5 月中旬，进步党的参议员拉福莱特、惠勒、诺里斯和约翰逊在伊克斯和华莱士的支持下会晤了总统，敦促他维护总统的权威，他们说，这是全国所需要的。罗斯福的老顾问费利克斯·弗兰克福特报告，最高法院法官路易斯·布兰代斯捎信说，再不动悔之莫及。拉福莱特还提醒总统注意，西奥多·罗斯福就曾经同他党内人士有过公开斗争。

罗斯福对进步党人士许诺他会采取更加坚定的立场。但是尽管有来自左、右两方面和胸怀怨恨的煽动家施加的压力，这时他还准备坚持中间道路。他仍然把希望寄托于将全国复兴法延长两年。他对记者说，全国复兴法不是孤儿小安妮，而是一个“很活跃的妙龄女郎”，他预计延期两年的计划会获得通过。

但是，到了 5 月末，最高法院一致决定全国复兴法无效。主要理由是，国会越出州际贸易条款的范围行使权力，而且将过多的权力授予它力所不能及的范围。这对罗斯福的中间道路的中心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有四天的时间，全国在期望和等待，而总统却未表示态度。然后到 5 月 31 日，他在精心安排的一场表演中提出了答复。就在记者纷纷地来到他的办公桌前时，他们看到的是，一边放着一份摊开了的高等法院的决定，另一边则是十多份电报。埃莉诺·罗斯福也在场，手里正在织一只蓝袜子。总统靠在椅背上，点燃了一支烟，象平时一样，开玩笑地问记者们有什么新闻没有。一个记者问他是否愿意就全国复兴法谈谈他的观点。

“好啊，史蒂夫，如果你一定要我说的话。在早上刚刚起床的时候，就对人家提出这么一个问题可不大好。”但是总统很想发言。而且的确讲了，一讲差不多一个半小时。

他的发言并不象是一个被保守的法院惹恼了自由派的讲话。它是一个曾经执行一条温和路线并在商人、工人和农民之间帮着取得妥协的人所发表的长篇不同意见，因为现在他惊奇地发现他身后的支柱轰然倒塌了。他逐条引用了那一堆电报。他将这些电报称之为“哀婉动人的呼吁”。它们不是失业工人，也不是入地无门的农民打来的，发电报的是商人——印第安那州的药铺老板，马萨诸塞州的一个糖果商，乔治亚州的一个生意人，

一家大百货公司老板，一个雪茄烟店老板。总统把电报推到一边，戏剧性地停下一言不发。这个决定究竟是什么用意？这就是要使全国性的行动，集体的行动，大规模的合作搞不成嘛。显而易见，他之所以抨击这个决定并不是因为这个决定保守或同劳工对立，而是因为它反对政府采取全国性的政策帮助各个集团，其中包括商业界。

总统再三地强调这不是一个党派门户之见的问题。下一步往哪里走？“别叫它什么左呀右呀；那不过是中学一年级学生的语言，仅仅如此。那不是什么右或左。……”然后他又声讨法院。一种关于“州际贸易的过时的定义”。而且他同意记者引用他这个说法。

“罗斯福说：‘过时的决定’”，第二天全国各报头版消息兴奋不已。绝大多数人把这个比喻性的说法看成是新政人员对保守的法官们的批评。实际上罗斯福的这个说法很到位——他同认为全国性的问题可以由四十八个州分别解决的那些法官们的意见不一致。记者们逼着问他怎么对付处理最高法院决定的影响，总统说：“现在还不到时候。”

接着第二个“百日”来临了。

国会在法院作出裁决后已经有好几个星期无所事事，这时候受到刺激变得积极起来了。罗斯福亲自投身到立法斗争中去。他对于批评国会的侧翼不再过于小心了。他现在坦率地告诉国会领导人，某些议案是必须通过的。政府的联络员就散布在普通的国会议员之中，他们施加压力。到了下午较晚时候，他们就回来向总统报告。他们一提到某议员表现不佳，总统的那只大手马上就拿起电话，不消一会儿功夫，他就接通了那个议员，他好言安慰，又在命令中夹杂着协商。对于另外一批人，总统就口授一两句话的短信要求他们行动。他同他的助手们忙碌到深夜，同国会山上友好的领导人密切合作，他们总要比分裂的反对派胜过一筹。国会议员怨声连天，畏缩不前，故意拖拉，但到最后他们还是行动起来了。

在6月底以前，顺利通过了瓦格纳的劳工关系法，总统热心地签署了。社会完全法也以大多数的赞成票获得了通过。银行法和开发田纳西河流域法也加强了。为了保护农业调整法不被最高法院否决，它有了一些修改。控股公司法在政府加强压力的情况下通过了。制订这项法案原是要遏制大的公共事业控股公司对其子公司的操纵，罗斯福从1月份起就一直敦促制订这项法律。尽管商业界强烈抗议，议员们也抱怨总统对他们催逼得太紧，一项有争议的税收议案还是获得通过成了法律。

税收法案最能说明罗斯福的突然转换门庭。在他的1月咨文中他没有

提到这样的措施；他在预算咨文中建议不必再征新税。2月份他还在玩弄财政部的“共享财富”计划，迟至5月22日他好像仍在坚持他1月份的立场。6月19日，总统令人惊异地要求国会同意实施遗产税和财产税、赠予税，以防止偷漏遗产税。对“巨额个人收入”增收所得税，并根据公司规模分等征收公司所得税，并有股息税，以防漏税。正如一位参议员所说，总统使得国会“疲惫、厌烦、恼火而且混乱不堪”，然后启程去观看耶鲁—哈佛的划船联谊赛去了。

这是为什么呢？难道总统向左转了吗？

与过去相比，许多人都觉得罗斯福的方针似乎突然大幅度地向左转了，从头两年的中间道路转到左翼的指挥地位。从这种观点出发，就很容易做出进一步的推断，即罗斯福的向左转是为了应付劳工、农民、朗、库格林、汤森公司等正在招来的飓风。然而，这种理论与罗斯福行动的实际并不相符。他对于胸怀怨恨的煽动家们煽起的飓风采取的办法是，对那些头目们用谋略制胜，对于攻击稍作让步，而不剽窃左翼的思想意识。他没有利用存在的机会争取并使得自己与新的百万劳工结盟。

事情的真实情况是，许多股潮流、事件在一个关键时刻——1935年6月——汇集到一起，使得罗斯福留下了一个激进派的形象。最高法院令全国复兴法失效，从而取消了中间道路主要的组织手段。为了填补这个空白，罗斯福保存了第七条（甲）（以瓦格纳法的形式出现）和其他对左翼让步的条款。最高法院的判定使得全国复兴法不可能再拥有法律效力，它对某些工商集团过去是有吸引力的。这种局面的后果是，只要稍带全国复兴法中亲劳工的成分就意味着向左转变。

这是罗斯福采取新态度的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是，他同国会打交道的实际效果。1935年那样一年，要在进步派与保守派之间采取中间道路远比以前艰难。一点是，在1934年11月选举后，国会已在兴趣和思想意识上向左转了。1935年的头几个月，罗斯福的纲领曾受到左右两方的夹击猛攻，差一点宣告破产。国会政治的迫切需要推动他采取比较开明的纲领。他的新处境和他与国会里左翼的大多数的更加协调，带来了比第一个“百日”更为重要的一系列新举措，这是很有意义的。

新姿态主要还是屡遭右派冲击的结果。在这段时期里曾密切注视他的莫利回忆说，他一直是坚持中间道路的，“当他回顾这一切时，他象克莱夫一样，对他自己的稳健态度都感到惊异。”商业界暗地里进行的攻讦，绝大部分报纸上连篇累牍的声讨，自由联盟所代表的大商人和商会所代表

的较小的商人的公开背离，以及莫利等保守派顾问的疏远，都起了作用。右派的背离，尤其是在全国复兴法决定中，自动地把罗斯福推向左倾。

那种认为罗斯福只是由于全国复兴法的决定导致思想上的原因而向左转的理论，与罗斯福在其他方面发展的事实不相符。他的纲领中一直是既有自由派的措施也有正统派的措施。社会保险早就在研究中——1930年罗斯福就已是带头提倡失业保险的第一位重要的政治家，它之所以推迟到1935年，主要是因为政府在中和草拟方面有困难。在这届国会里总统一直敦促通过控股公司法。在有关全国复兴法的裁决宣布之前，他已经支持瓦格纳法了。如果最高法院的裁决反对废除黄金条款法，而最高法院没有5票对4票的多数支持政府的话，他原计划发表的演说就会在1935年2月触发一场严重的宪法危机。

总而言之，罗斯福并不是自觉地有计划冠冕堂皇地向左转的。他就像是一支游击队的指挥官，他的部队在深山中盲目地作战，穿过山谷和密林，突然间，半是计划半是机会式地走出了深山，在平原上会聚了。

在国会休会后不久，总统和报纸发行人罗伊·霍华德之间的书信往来清楚地证明，罗斯福并未对左派在思想上作出最终的承诺。霍华德告诫他，有些商业界人士同政府愈来愈势不两立了。他们认为税收法案是对商业界的报复。他们希望给工业以喘息的机会，能暂缓作进一步的试验。罗斯福在一封热情洋溢的回信中，为税收法案辩护，并主张经济要实现“明智的平衡”。但是，他又说，“政府的基本纲领现在已经基本实现。”现在正是“喘息的机会”——“肯定如此”，走了几步以后紧接着便得换个方向。

或许罗斯福在给霍华德的信中说的是实情。但事态发展以它自己的方式迫使领袖们采取新的立场。1935年立法上的巨大胜利放松了把罗斯福由中间道路引向党派偏见和政党领袖的力量。这第二个“百日”指向1935年的凯旋道路——也引向以后的失败。

第十二章 右派的咆哮

在1935年的最后一个多月，罗斯福似乎也得了个喘息机会。9月间在欢庆国会“光荣而宏伟”的欢呼声中，他离开了华盛顿乘火车视察全国，并在途中欣然参加博尔德水坝的落成典礼，他在给他母亲的信中说，洛杉矶有“百万热情的民众”恭候他。在圣迭戈，他发表演讲，提到了“恶意的内战和激烈的外战”的威胁，而且他又一次呼吁社会合作和协调。然后，他带着伊克斯和霍普金斯登上了“休斯敦号”巡洋舰，从容不迫地

南下游弋，通过巴拿马运河，又北上至查尔斯顿。

总统饶有兴致，一路上讲着长篇轶事，打扑克直到深夜，拿伊克斯和霍普金斯逗趣，钓起旗鱼就欢天喜地地大笑。回来后他还有时间去海德公园和温泉，同下级一同玩那种他喜欢的粗鲁而喧闹的游戏。当人家告诉他，他的性情和蔼的军事助手沃森“老爹”和格雷森海军上将两个开玩笑地争执谁在射击火鸡的狩猎中功劳较大，罗斯福这位总司令一本正经地搜集正式起诉，做出裁决，要把两人绑在相距百步的两棵树上，“各授弓箭一副，分别蒙上眼睛，各自学火鸡叫，然后再开始射击。……”

那确是个愉快的时光，不过也只是间歇而已。局势风云变幻。1933年10月，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12月，英法同意肢解海尔·塞拉西那个遭到围攻的国家。在国内，为了即将来临的选举年，各个集团正在形成。12月下旬，罗斯福对莫利说，他希望他的新年讲话是一篇“进攻性”的演说——确定1936年的基调。总统又一次精心布置舞台。尽管共和党人反对，他还是坚持在晚上举行一次两党联席会议，晚间的广播节目是他能够接触最广泛的听众的手段。

1936年1月3日晚，总统慢步从坡道走上议会讲台，谨慎地把他的夹鼻眼镜放在讲稿旁边，两手紧紧抓住讲台的边，开始发表演说。由于党际争斗，这天晚上的气氛显得紧张。

一如既往，他回顾了1933年3月他就职时国内那一片萧条景象。不过当时的国际形势基本上是和平的。南北美一直还保持着这种和平局面。在世界其他地区呢——“啊，有磨擦。”他现在如果是发表就职演说，他就不会只以一小段的篇幅对国际问题高谈阔论了。在欧洲和亚洲，敌意、侵略的趋势、扩军备战都有增无已，有一触即发之势，美国采取什么政策呢？

“这个政策是明确的，其永恒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对于参与不直接涉及南、北美洲的战争的任何国家，美国在两方之间保守中立。第一，我们不向交战国出售武器、弹药、装备，从而不鼓励他们从事战争。第二，我们设法不让交战国利用任何在数量上超过我国平时正常出口量的美国产品从事战争。”

罗斯福的声音突然变得更加慷慨激昂了。他那代表两党的官样文章讲完了，现在他开始了竞选演说。他说，在我们的国境内，同整个世界一样，民众的观点同那一小撮企图争权夺利的人是相互抵触的。“近几年来，我们亲眼看到政府被金融和工业集团所控制，这些集团为数不多，但政治上却控制一切。……”幸亏，这些集团并不代表美国真正的商业界的真实

心声。组成这个美国商业界实体的分子虽不善言词但却是比较重要的。“从 1933 年开始，他和国会就竞相在政府和大众之间建立一种新关系。他们呼吁人们放弃许多自私的私人利益，是的，号召从关心党派利益转而关心公共利益的理想。”联邦政府的控制权现在已回到了华盛顿。

罗斯福似乎要透露秘密似地压低了嗓门，在讲台上前俯后仰，他现在攻击别人了。民主党有人喝彩，有人发出叛逆的叫骂，而那少数几个共和党人则无可奈何地冷眼置之。

“根深蒂固的贪婪对我们极端仇恨。”这些集团于 1933 年退位之后，又企图“复辟那个为他们谋私利的政权”，罗斯福毫不容情地说了下去。“他们窃取了我国伟大国家宪法理想的外衣，来为他们可耻的私利服务。他们作为大的股票持有者集团的保卫者和信托人错误地试图把委托给他们财产和利益带到党派政治的领域中来了。他们——工商界里这些少数人——企图控制，而且常常已经控制和利用合法享有崇高荣誉的商会为他们谋私利；他们大肆渲染，在人民中散布恐怖和不和——他们还会‘成帮结伙’地来剥夺人民的自由权。

“如果他们上台，他们赋予政府的原则，已清楚地表现在他们中间许多人处理他们自己事务的各项原则上；对劳工、对股东、对消费者、对公众情绪……一概要实行独裁。”

这篇讲话充满了伤人的语言，远不是一年前那种温和的富于哲理的语调了。党派色彩浓厚的民主党人极为兴奋，认为这是总统竞选的开场白。罗斯福结束时说他的这次演说是一篇国情咨文，共和党议员们听了不禁大声嘲讽，说这篇讲话象竞选时发表的一篇重要的政治演说，但对于国家首脑来说，则是一篇充满忧郁的表演。自由联盟和其他保守组织积极准备答辩。激进派的反应则有褒有贬。他们喜欢那些入木三分的言词。但罗斯福的政纲何在？总统没有提出什么新的提案。还有几百万人失业，农民仍然走投无路，在这么一种情况下，他就躺在新政的成就上睡大觉了吗？

四天之后有了答案。

来自法院的火力攻击

好几个月来，一只沉重的司法巨掌制约着新政的最主要的部分。联邦地区法院颁布了一千多条禁令控制政府，不让它执行国会通过的法律。公司的律师走访对他们最有帮助的法院，他们得到的往往不仅是他们所要求颁布的禁令，而且法院还要就此大吹大擂地宣传一番。“不法掠夺！”一位法官对全国复兴法不屑一顾地这样说。到 1936 年初，上诉书已堆积如山，

等待着最高法院采取行动。

在那富丽堂皇、挂着红色帷幕的会议室内的座椅上，最高法院的九位老人肃穆地在巨大的围栏后面端坐着。他们高高在上，好象为党派政治所不可攀。在它的全部历史中，最高法院从未象它现在这样忠诚地符合于一般人认为庄严的法官应当具备的传统典型，这些法官阐释几乎是由于神授的灵感而制订的法律。正中坐着大法官休斯，他的面容削瘦，蓄着白山羊胡子，浓浓的眉毛。他的两边坐着其他八位任期均在十数年以上的尊严的老人。其中一位由塔夫脱总统任命，两位由威尔逊总统任命，其余也都是哈定、柯立芝和胡佛所任命，其中没有一个是富兰克林·罗斯福任命的。当时他们的平均年龄是七十一岁。

然而，如果说最高法院是一片沉寂，那么，正象霍姆斯大法官说的，这是旋涡中心的沉寂。在法院的面具下燃烧着对政治和政策的炽烈信念。法官也都是人。根据一个仔细研究司法制度的学者的说法，他们作出的决定不是宪法象寓言中鸛鸟那样从天外带来的，而是由于社会环境和经济环境所起的作用而产生的。绝大多数的大法官都曾经是寻求选票的政客；他们所有的人，无一例外，都是通过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上的熙熙攘攘的纷争而爬到他们的司法宝座上的。

和立法机关一样，法院也分为左中右三方人士。在右翼，紧紧抱成一团的有知识渊博的威利斯·范·德万特，他是一个老资格共和党人，曾在1896年协同麦金利击败了布赖恩；粗暴的詹姆斯·克拉克·麦克雷诺兹，先后相继是正流的民主党人，威尔逊的司法部长，目前是最高法院中最直率的保守派；留着颊须的乔治·苏瑟兰，1912曾是塔夫脱的人，1918年任美国律师协主会席，他竞选连任参议员失败后，1922年哈定总统给他一个最高法院的席位作为补偿；还有高大魁伟的皮尔斯·巴特勒，他是爱尔兰天主教铁路律师，保守的民主党人，是哈定在参议员诺里斯的强烈要求下任命的。把这些人联系在一起的主要纽带是他们在边境或靠近边境的边民生活的共同出身，他们对于自由主义思想，对于个人主义和自由竞争的共同信念。

“把握好大方向，”首席大法官塔夫脱在退休前不久这样告诫上述四人。他们这时还在稳着舵。

左翼是杰出的三人小组。最杰出的是满脸苦行僧相的路易·D·布兰代斯，这位出名的“民意鼓吹者”，威尔逊任命他到最高法院时曾遭到塔夫脱、鲁特和美国律师协会的另一五名前主席的激烈抗争。哈伦·F·斯通是一

一个面如花岗石雕的新英格兰人。在他得到默斯特学院校友任命到最高法院任职前，他曾任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院长和柯立芝总统的司法部长。满头白发的卡多佐，在胡佛总统应诺里斯和博拉的请求将他升职以前的许多年里，曾经是纽约州著名的法官和法律行家。

居于中间的则是“模棱两可的人物”：罗伯茨和首席大法官休斯。六十四岁的罗伯茨是最高法院里最年轻的大法官。在1930年胡佛选任他到最高法院以前，他曾经当过法学教授、公司律师和柯立芝总统执政时的石油案件检察官。休斯第一次被塔夫脱任命后，在1916年曾因要和威尔逊竞选总统而辞职，他先后当过哈定和柯立芝的国务卿，1930年又回到最高法院再任首席大法官。休斯也是罗斯福的老朋友，他对于宪法规定的抑制与平衡，有独到的理解。虽然总统曾定写信给卡多佐，表示愿意同最高法院的关系至少能部分地同他和奥尔巴尼上诉法院的关系处得一样“愉快”，但休斯除了官样文章的例行公事以外，小心谨慎地使最高法院同白宫保持着距离。

由于这三、四方面的分歧而摇摆不定，最高法院在批准三十年代的社会和经济措施时采纳了兼容并蓄的方针。它支持了州关于取消低押品赎回权的延期覆行法，州的确定价格立法和牛奶控制法。它以五对四票通过了国会关于在私人合同中黄金支付无效的决议，麦克雷诺兹为此勃然大怒，惊呼宪法精神“已不复存在”。然后在1935年春，在他施展的一连串陆陆续续的打击中，最高法院否决了铁路退休法，全国复兴法，弗雷泽——莱姆基农场抵押法等。对新政来说，最糟糕的是那四个保守派紧紧抱成一团和那些“摇晃人物”的难以逆料的行动。难道罗伯茨——或许休斯也一样——现在要长期加入到右派的队伍里去吗？

1936年1月3日正午，首席大法官按时拉开了中央帷幕。他和他的八位同仁突然出现在他们的座椅背后。书记官拖长嗓音连喊“肃静”，最后祈祷着：“上帝保佑美国”，大法官罗伯茨几乎没有看他面前的稿子，缓慢地准确地开始陈述最高法院对巴特勒案的意见，这涉及到农业调整法是否符合宪法的问题。这个案件同手上长满老茧的农民对华盛顿的官僚主义控制所表示的抗议无关，却涉及到一家破产的新英格兰纺织公司的产业管理人拒绝按此法案缴纳加工税的问题。他们的律师，年迈的保守的前参议员乔治·沃顿·佩珀攻击该法案违背宪法精神，他提出一项哀惋的恳求作为他的结论，即在他的一生中，人们决不要接受“受严密管辖的国家”来取代“自由的国家”。

法庭上挤满了听众，他们焦躁地盼着调查结果能有什么暗示，罗伯茨却又用平淡如水的语调不知终止地说下去。他首先回顾了一段往事，说到关于国会为了普遍的福利而实行征税和支出的权力和问题，汉密尔顿的卓识远见与麦迪森的狭隘见解的抗衡。当罗伯茨赞扬汉密尔顿的观点时，听众为之兴奋，以为农业调整法得以保全了。但事情决不是如此——现在罗伯茨强调，加工税不只是一种税收，而是一项计划的一部分。那么这项计划又是什么呢？依据农业调整法，“拨出这项税款，只用于偿付签字双方都恪守联邦政府规定的合同”。国会试图收买人们对它的顺从，但它却无力得逞。所谓的选择权仅仅是一个幻想。

接着罗伯茨又摆出一堆想象中的坏事——如果提出的国家权力得到认同，国会也许可以调整一下诸如鞋子、教育之类的事项。这就谈到了那个尽管被掩盖着但却是他的真正意图的核心。尽管罗伯茨在这个案件的早期曾经说过，最高法院无法判定法律的价值如何，它只能把宪法同法律条文进行对比，看后者是否“符合”前者——后为人们称之为司法审查的“自动售货机”理论。罗伯茨对立法权的整个主张提出了质问，从而也就违反了他自己的理论。总而言之，他就是对国会在行动中节制自己的能力没有信心，或者说对选举出国会的人民的智慧完全没有信心。他担心国会会成为一个“全民的国会，除了它自动加给自己的以外，不受任何约制。”关于这个立场，罗伯茨不但使那“坚定的四位”而且还使休斯给予支持。

“这是对宪法的扭曲，”斯通在为他自己、为布兰代斯和卡多佐表示不同意见时愤怒地声明，“法院不是唯一的必然被认为有治理能力的管理机构。不幸的是，国会和法院在行使其宪法赋予的职责时都可能摇摆不定，都可能犯下错误，然而，对于我们政府的伟大宪章所作的解释如果依据这样的假设：维护我们体制的责任完全落在政府三个部门中任何一个肩上，或者说，只有它才能使这些体制免于灭亡，那么，这种解释，从长期看，远比坦白地承认下列事实更可能‘消灭一个由不可摧毁的各州组成的不可摧毁的合众国中有权制订或修改宪法的组成部分’，这些事实是语言，甚至宪法的语言，可能明确表示它的含义，即：征税和支出的权力包括有条件地以金钱作为赠予来解决全国性的经济失调的权力”。

斯通提醒最高法院注意霍姆斯的有名的训诫：“必须记住，同法院一样立法机关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人民自由和幸福的最终捍卫者。”也许这婉转的嘲讽击中了要害，但是那“坚定的四位”仍然无动于衷。他们有表决权。

在白宫，当罗斯福正同国防部长德恩谈话的时候，一个秘书送来一个

写在纸条上的坏消息，把它放在总统面前。事后，热切的新闻记者把德恩团团围住，问他：“总统对这个消息的反应如何？”德恩说：“他只是把那张纸条摆在面前，笑了一笑。”

这一笑是有重大意义的。罗斯福对这个决定，不愿表示不同意见，未做“不合时宜”的评论。形势的发展已经不是这类谈话能起作用的时候了。司法部长罗伯特·H·杰克逊后来回忆说，巴特勒案件比过去任何别的决定都更使政府官员的思想转而考虑向最高法院挑战的必要性已迫在眉睫。罗斯福那一笑是一个战士对于即将到来的战斗自信的一笑，也许也是一个策略家看到他的对手做得过火时的一笑。

就在那个月的晚些时候，伊克斯在一次内阁会议后在日记中写道：从总统今天所说的和他在其他场合所说的话，可以看得很清楚，他毫不介意最高法院宣布所有新政法令不符合宪法，我看他确信最高法院等不到把新政法令摧毁，就会发现自己处境困难。而且他确信会出现真正的争论，到时候，我们可以向全国人民呼吁。就我个人来说，希望如此。

如果这就是罗斯福的策略的话，最高法院正好上了圈套。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获准有权出售威尔逊水坝所发的电力时，只有麦克雷诺一人表示异议。接着是一段间歇期。可是5月18日，拆台的工作又恢复了。在卡特对卡特煤炭资源公司案中，休斯同罗伯茨以及右派们站在一边，裁决1936年烟煤资源保护法的劳工条款无效。一周后，最高法院又以五对四票废除市政破产法，理由是它侵犯了各州处理其所属市政问题的权利。

1936年6月1日达到了顶峰。就在与全国代表大会举行日期相隔仅仅几周的时候，最高法院采取了一个肯定会使其陷入当年政治风暴中的措施。以另一个五对四票的表决结果，它又使纽约州最低工资法作废——实际上也就使其他州的最低工资法也作废了。研究最高法院的一位历史学家总结道：“也许这个决定比其他任何行动都更清楚地揭示了最高法院中这个狭隘的多数人的异想天开而又令人厌恶的决心，即他们排除立法机构对于经济与社会事物的干预。”虽然最高法院讲了许多漂亮话，谈到了各州保留的权力，但结果看来它还是同反对全国性的新政一样反对各州的新政。斯通在发表不同的意见时慷慨陈词，他警告说，立法机关必须有必要的经济权力，否则政府就起不了作用。休斯私下也为那“坚定的四位”的过火行动而深感苦恼。

罗斯福对这个决定的关键性后果要过问了。他说，最高法院是在创造一个联邦政府和州政府都不起作用的“真空地带”。

“你怎么能对付这种局面呢？”一个记者问他。

“关于这个问题我所要说的就是这些，”罗斯福答道。总统还不打算透露他的打算。

最高法院的行动造成的另一个后果就是立法计划必须比总统原来设想的更为完备才行。最高法院否决了农业调整法以后，国会惊慌失措，一直到华莱士和农业组织的领袖们制定出通过扩大 1935 年的土地资源保护法来控制收成的方法，才结束了这种状态。由于农业调整法被否决而使政府蒙受五亿美元的加工税损失以后，罗斯福根本不理睬众议院赋税委员会，就发出有关征收新税计划的具体指示。国会议员们认输了，他们在大选年投票赞成那些最投诸选民所好的号召物——对未分的利润和各种社团的收入分级征税，并针对由于巴特勒案的裁决而获利的那些加工者征收一种“额外收入”税。第二个“百日”和由于全国复兴法被否决而造成的真空中所留下的一项法案是沃尔什—希利法案，这个法案是旨在调整接受政府合同的企业中的劳动标准。

在其他问题上，总统对国会行使的控制权相当软弱。一个突出的例子是退伍军人抚恤金法案。前一年，罗斯福对国会发表的一次冠冕堂皇的口头咨文中已经否决了这个法案，国会勉强对他给予赞成。今年国会议员们害怕 11 月里退伍军人的愤怒，正在争夺避风所。罗斯福注意到他们处境困难，就放弃了他头一年充当的英勇角色，给国会送去一封措词苍白的短信，表示他没有改变主意。国会于是在总统投了否决权的情况下通过了这项法案。在大选年，对总统有利的政治活动显然对国会不利。用这种脚踏两条船而从中渔利的办法，总统和他的追随者又能多混一天。

法院的破坏所造成的最后一个后果是，它进一步坚定了罗斯福的左倾趋向。经过多年来在中间道路上摇摇晃晃以后，总统现在要采取一种战斗的，即使还有点模棱两可和局限性的进步主义。这样的发展引起了罗斯福同美国右派关系的全部问题。

保守的罗斯福

好几个月以来，从美国每一个乡村俱乐部的基层——伊克斯后来这样叫它——出现了一种对总统极为不满的情绪。这种不满的表现形式多样，从自由联盟和大企业协会的严肃声明到俱乐部、酒吧间的种种流言。其中有一些谈到总统的控制欲和自我中心主义的谣言非常滑稽可笑。人们是一笑置之，罗斯福自己则失声大笑。有一些谣传则卑鄙而猥亵，只能是暗地里的道听途说。还有一些则简直离奇古怪，还有传闻颇广的故事，说有人

听到白宫总统书房里传出了疯子的狂笑，说一些医生用手推车送走了一个瘫痪了的喋喋不休、言语不清的人。

罗斯福可以讥讽他的右翼政敌。有一次，乔治·厄尔向他说起了一个传说，使他勃然大怒。据说，1935年底，在费城那个高级的里顿豪斯俱乐部里，四个阔佬坐在图书室里一边喝酒，一边把总统和他的全部工作骂得一钱不值。过了一会儿，其中有一个偶然打开桃花心木的收音机。忽然他听到收音机播出一个很熟悉的声音，正在轻蔑地谈到“绅士们在温暖而考究的俱乐部里”批评新政。那正是罗斯福在亚特兰大发表的演说。

“天哪！”据厄尔说，其中另一位惊叫起来：“难道这个傻瓜能听到我们讲话吗？”

但是右派的积怨也使总统迷惑不解和失望。他并不希望引起这种积怨。难道不是他挽救资本主义制度吗？后来也就在这一年晚些时候，他讲了一个寓言，其中既有政治用心，但也带有确实实的迷惘。

“1933年夏天，一位戴着一顶丝质帽子的道貌岸然的老绅士从码头上掉到水里去了。他不会游泳。他的一个朋友跑上码头，潜入水里，把他拉了上来。可是那顶丝质帽子却随波漂流。这位老先生苏醒过来后，非常感激。他称赞他的朋友救了他的性命。可是，今天，三年过去了，这位老绅士却反过来责怪他的朋友，因为那顶丝质帽子掉了。”

这是怎么回事呢？人们通常这么以为：罗斯福背叛了他的阶级。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施塔特曾写道：“然而如果说他的阶级指的是制订政策、掌握大权的整个阶层，那么，说他的阶级背叛了他却也同样符合事实。”如果是这样，这又如何解释呢？

倘若是不以人们所熟悉的自由派或进步派的形象来看待罗斯福，而以代表伟大的美国保守传统的保守派来看待他，那么，事情就更加难以解释了。那种传统有其模糊和自相矛盾的方面，但是它的某些成分多年来却体现出它的顽强性和连续性。这些是：有机的社会观，它强制要求一种凌驾于直接的阶级或集团利益之上的民族与社会责任感；对过去、现在和未来三者的一致性的信仰，从而对一代人对另一代人的责任感所树立的信念；一种不可知的意识，包括认知人们的知识的局限性，尊重宗教信仰的传统形式；承认私有财产作为构成稳定的人际关系的基础的重要性；个人的教养品质或教养要求屏弃粗野行为和好出风头；要求对别人的需要和期望有敏感而且要了解这个事实：并非所有的变化都是改革，稳定也不是静止。

如果这就是传统的保守主义的一些主要特征，那么，从许多事件来

看，罗斯福好像就是一个保守分子。

在执政的头两年，在需要献身于超越于政党或集团或宗派影响的国家和整体利益时，罗斯福对保守主义的信念表现得非常忠诚。他号召全民一致努力克服经济危机；他贬低了党的作用和党派偏见。他宣告需要真正的利益一致，而他要使之具体化的全国复兴就是这个思想的制度化。他是全民的领袖，并且心甘情愿地使他的阶级利益服从于他全国利益的思想，并且同时，他还要使其他各种利益在全国计划中获得同等机会。

相信过去、现在和未来三者的一致性吗？埃德蒙·伯克的这个核心思想其实也是罗斯福头脑里的根本原则。这反映在他一心地关心他的先辈，关心达切斯县县志，关心地方风俗和传统；他一生对植树很有兴趣；这同时也反映在他热心民族遗产，不管他对此概念如何不清晰，民族遗产总是美国人一代一代传下去的。他的公共政策中最具有长远利益的事可能正是保护自然资源和人才资源。

罗斯福信仰宗教——“一个简朴的基督徒”，有一次罗斯福夫人曾这样叫他。他是在海德公园里的圣詹姆斯·埃皮斯科帕教堂受洗和被命名的，1928年又在那里成了教区会会员，象他父亲过去那样，他后来成为教区会的监护人。他喜欢赞美诗和圣歌，喜欢教堂里的仪式和礼拜。他的信仰热忱是不易判断的；这里面确实有一种浓厚的习惯因素，到教堂去做礼拜，对他来说，作为一个深思的机会至少同政治性和象征性的礼仪一样重要。虽然到晚年他对基尔克高尔德发生了兴趣，但是他把宗教当作一种哲学时对它就不大热心了。

相信个人产权吗？同美国渴望产权的大众的历代领袖一样，罗斯福并不想否定产权而是要更广泛地分配产权。他相信可以维持丈夫、妻子和他们的儿子一家人的生活的家庭农场。他相信要让工人自己有房屋；他做了长期而艰苦的关于重新定居试验，使人们有机会保护和耕种他们自己的家园。在罗斯福看来，这样的产业所有制同社团所有制不是程度上的差别，而是性质上的不同。他自己节俭持家，他是怀着热爱，审慎地经营他自己的资产的。

绅士这个名词除了其拘谨古板的含义不是罗斯福所具备的以外，他确实实绅士。“他正直，文明，谦和，”根室曾这样写道。他不喜欢粗鲁或庸俗；他从来不使用超过比较温和、比较通常的污秽的语言；他不愿意过分流露感情，而且希望别人也是如此。他希望人们彬彬有礼，讨厌在上流社会的中心场合所目睹的那种奢侈现象。他完美地表现他自己的感情与别

人一致的能力，当然是他的政治手腕的一部分。他经常对他的下级和他周围其他人的健康和福利表示关心和体贴。

罗斯福对变革的立场不是简简单单就能说明的。他热爱在政府里有革新有试验，这同保守派对不必要的变革产生的抵触正相冲突。同时，他对于他个人的事，诸如卧室和办公室的布置，则有一种古怪脾气，要求固定不变；他对海德公园的喜爱部分地也是由于他知道，在这个无情而又无常的世界上这里是一个安定的地方。而且，他考虑政府变革的含义就更为变革辩护，他认为要具有持久的重要价值，最主要的一条就是要有变革。美国的保守党人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通过诸如工厂法，社会福利服务等项改革已经表明，要保护持久的目的，就必须在机构上和法律上做一些小改革。从这个意义上讲，罗斯福也是一个保守派。

当然也不能过分强调这一点。罗斯福的机会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气质太重，因而很难把他归纳到哪一类教条式的传统，不论这种传统的意义多么广泛。另外，他还不相信这类保守主义思想，象社会需要有等级，人生来不平等，人的悲观论和潜力。他的思想开阔，几乎可容纳一切思想而似乎绝对不受某一种思想的束缚，他既有自由的激进的想法，也有保守的想法。然而倘若要有所权衡，他对保守主义传统要远比对其他思想接近得多。他能够象那些重要的保守派人士一样说——而且确实也说了：“如果你要保留什么，那你就推行改革吧。”

这个问题反复出现：如果从广义上讲，至少在他执政的头两年罗斯福是个保守派，那么，为什么美国的“保守派”不支持他？问题的答案在于，美国的右派并不遵照深刻的保守主义传统采取行动，而且也不真正关心持久的保守主义价值。真正的保守主义——伯克、约翰·亚当斯以及其他一些联邦主义者的保守主义——已经被那些把狭隘的利益裹在永恒原则的华丽外衣里的财团抛弃了。而人人看见他们关心的完全是暂时的一己利益。事实是到二十年代末，商业保守主义对它的“服务性”或保留功能，显得很不了解。它没有标准，没有传统，没有连贯性——只有一个装着迷信和旧框框的百宝囊。

右派错过了一个大好机会。在他第一任内有关键时刻——1935 年头几个月——罗斯福仍然在左派右派之间举棋不定，不能保持稳定的平衡。他还是坚持他的那个原则，即他能够代表凌驾一切的民族利益，他能够充当全民的领袖。新政的改革已经被商业界绝大部分成员所赞同；甚至继续存在的失业、劳工和朗记公司的抵制都不足以把他推向左倾。后来，商业界

似乎同总统宣战了；商会猛烈批评他的政纲，最高法院则将其部分予以否决。在第二个“百日”和1936年1月里，商业界得到了答案。

商业界为什么要宣战呢？部分是因为某些新政策措施制造麻烦而且费用惊人。税收是增加了，限制也多了，劳工确实是气焰嚣张，组织和质询的确是成倍地增加了。然而商业界的利润在1933年和1934年也大大地上升了；但正如罗斯福说的，虽然老绅士的帽子丢了，总还是把他的命救了嘛。商业界日益反对罗斯福，这无法只以自身利益的常理来解释。解释还存在于另两个领域，即意识方面和心理方面。

商业界成了它自己意识形态的俘虏。这个的关键概念就是信仰自由放任政策，认为政府不应干预人们的社会事务，尤其不应插手经济事务。十九世纪慷慨的自由主义被剥夺了其广泛的哲学意义并且被扭曲为一个狭隘而具有限制性的经济正统观。个人，实际上就是一个复杂的多面体，被简化成为“经济人”的笨拙的奴才。由于忘却“现实的人”同在他周围的世界通过许多不同的途径互相作用，由于忘记政府的制约只是他受到的许多制约中的一种，而且是最不重要的一种，由于忘记政府在经济和社会领域中已被扩大的功能并不一定会缩小而可能扩大个人自由，因此，极端个人主义者鼓吹抵制一切加在他身上的政府控制，便可通往自由人类之路。他们在自己周围，在他们的工人，他们的财产周围竖起了大牌子，上面写着：“不要政府干预！”

美国最高法院的见解对于这个中心思想表达得再庄重权威不过了。大法官们耍了一个奇妙的手段，居然利用显然是为了保护刚解放的黑人不受白人报复而通过的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把它变成了保护大公司对付政府控制的强大武器。最高法院的有些意见可能是摘引自亚当·史密斯，甚至是赫伯特·斯宾塞的关于经济个人主义论述。商业界反对罗斯福竟同法院方面的反抗不谋而合，这属必然。“坚定的四位”在法官席上只是重申了把他们的脚步从边境通过商业和政治方面的斗争而引导到法院这个合法讲坛的那些格言。由于大部分美国生活，政如索尔斯坦·维布伦所说，反映了法官们如此精湛地阐述的商业哲学，因此，经济个人主义的信条也就是有组织的律师、有组织的医生、报刊杂志发行人和大部分宗教界和教育界人士的信条。

然而，在这一切的后面，在人们的心灵里，还有远比象征和意识形态隐藏更深的因素。右派对罗斯福的强烈抵制只能用商业界的被剥夺感和不安定感来解释。罗斯福从他们身上剥夺掉的东西远比他们的陈腐观念和他

们的金钱更为重要——他大大伤害了他们的自尊心。那些自命为经济创业者的人们发现在他们所生活的圈子上，却让政治领袖们独占了新闻头条，受到赞美和欢呼，受人敬重。那些自以为为肩负着全国经济建设重任的人发现要他们自己承担经济衰退的责任。那些自命为主持正义和公民美德的人发现他们自己正在代乞讨选票的政客们受过。而政府却无休止地掌握越来越多的权力。“负责开销私人雇员的商业界在政府中却几乎没有任何发言权，”自由联盟这样报怨说。

一个观察敏锐的法国人对约瑟夫·肯尼迪说，罗斯福打破了一个在美国最深入人心的神话。他把财富观念和道德观念分开了。

可能正是因为这种心理上的被剥夺感的旧伤疤又被触痛了，所以才会发生1934年和1935年商业界的强烈抗议。1934年底，刘易斯·道格拉斯写信给总统表示，“最热切地”希望罗斯福真正努力平衡预算，不仅罗斯福的历史地位取决于此，“而且可以想见，西方文明的命运也直接取决于此。”在这里，他并不只是把政府的预算平衡表变成一个永恒的原则；他也是在坦露他自己承诺以商业原则办事的深刻的思想状态。1935年初，赫伯特·贝阿德·斯沃普写信给法利，谈到一种全体都只有有的恐惧感，这种恐惧感日益以不信赖总统的形式扩散。他在汇报一种早在第二个“百日”前就已开始存在的对罗斯福的基本上是毫无道理的厌恶，已使商业界的憎恨有了某种合理的基础。

因为右派方面的怀恨看来如此强烈而毫无道理，罗斯福就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特别是报界越来越强硬的抨击引起了他的警惕。1935年8月，总统想方设法搞到了赫斯特报系和赫斯特编辑给它的新闻社的一则命令：“老板指示，在一切提到政府税收的地方都用‘对成功者课重税’的说法，而不再用过去一直用的‘对勤俭者课重税’的提法。他也希望用‘不公平交易’（Raw Deal）一词来代替‘新政’（New Deal）一词。”罗斯福极为生气。他甚至指示下属写好一则新闻公报，“总统认为完全有必要向全体美国人通报刚刚送到他手里的一则情报。……”但是，主张更加慎重的劝告占了上风，这份通报没有发表。报界的大人物越来越嚣张了。1936年初，《芝加哥论坛报》已经提出了“把混蛋们赶出去”的口号作为他们的“政纲”，还警告说：“拯救你的国家只有二百零一天了！（或一百零一天，或十七天了。）你用什么行动来拯救它？”

当事实涉及狭隘的经济或社会小集团的私人财产，保守主义就被抛弃了。美国的右派没有能够摆脱它对于财产、神话和地位的关注，没有能

够依照英国和美国早年的伟大传统，来奉行一种保守主义的信条，这就大大影响了罗斯福领导的性质，也大大影响了左派对新政的态度。

罗斯福与激进派的斗争

1936年1月底，艾尔·史密斯在华盛顿双手挥舞，撇嘴做出人们的熟悉的猜猜样子，在自由同盟的欢呼和哄笑的人群面前批评新政。艾尔满头银发，消瘦的脸庞上布满了皱纹，可是他的幽默还是一如既往，辛辣尖刻。他大声宣称，智囊团成员乘社会主义者正在游泳，偷了他们的衣服逃之夭夭了。新政液化了阶级战斗。它已经接二连三地实行了社会主义政纲。在十几名杜邦、约翰·W·戴维斯、肖斯和拉斯科布的吹呼声中，史密斯以马克思主义威胁美国制度的阴暗调子结束了他的讲话。

罗斯福在这个月早些时候向国会发表的咨文中已直接向自由同盟提出了挑战，他没有因史密斯发出的“让开”的恐吓而苦恼。他早已把史密斯抛在了一边，而让他的下属去应付这种攻击。第二天晚上，伊克斯各极投入争论，引用了史密斯答复1928年胡佛指责社会主义时所说的话。当时艾尔说：强大的财团急于要阻碍进步的立法的时候总是叫嚷社会主义。参议员约瑟夫·鲁宾逊是史密斯1928年的竞选伙伴，狠狠批评这个“不愉快的战士”背弃了他的党。

最痛苦的答复倒不是来自奉行新政者，而是来自一个具有贵族风度、声音洪亮、身材修长而且风流倜傥的社会主义领袖。过了几天，诺曼·托马斯在电台广播中问道。新政是社会主义吗？他回答，肯定不是。——除非是人们故意夸张了罗斯福没有实行过社会主义政纲。托马斯一一列举新政改革。罗斯福把银行扶植起来，又交回给银行家了。控股公司立法吗？真正的社会主义要把控股公司国有化，而不是把它们拆散。罗斯福的社会保险法案是真正的社会保险纲领的一种愚蠢的模仿。全国复兴法吗？那是通过工业协作从而调整生产维持利润以稳定资本主义一种精心制订的计划。农业调整法本质上，那是对于限制产量采取补助办法以保证利润的资本主义计划。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那是国家资本主义。民间资源保护队则是强迫劳动。

托马斯宣称，罗斯福的口号绝对不是社会主义者提出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罗斯福大声宣扬的是：“无产者和小资产者联合起来，清除华尔街”。而这样的口号至少同安德鲁·杰克逊一样老掉牙了。

托马斯的讲话显然是一种政治花招。他是使尽全力地要使其层群众不为罗斯福的魅力所迷惑。即使如此，工会忙于他们自己的迫切问题，无暇

理会。瓦格纳法帮助他们组织起来。工人进步署和公共工程署正在安排人们就业。甚至社会主义的领袖们也背离他们的党到政府里去工作了。

但是作为意识形态分析，马托斯的答复是无可非议的。假如说社会主义有什么传统的原则的话，那它就意味着所有权的归属问题和对整个社会的资本、土地和工业的控制问题。除了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一项例外，新政里没有哪一项重要的内容属于此类。自由同盟把新政与社会主义等同起来只在这一方面好像有点道理：那就是社会主义者在推行社会主义化基本纲领的时候习惯于提出许多直接“实际”的改革。

罗斯福同他以前的党的主要领导人一样，对于利用社会主义政党纲领中的口号毫无不安——象失业补偿和公有住宅这样的口号。但是，他看不起社会主义化的核心概念。而且，他的这种情绪是经受过严峻考验的。1933年他要是把银行和铁路收归国有，国会很可能支持，但是他根本没有试图。他要改良资本主义而不是消灭资本主义。从这个意义上讲，他是个保守派。社会主义者正是因为有一套扎根于系统的哲学思想中的经济与社会理论学说，所以认出了罗斯福的真正的保守主义。自由同盟的参加者们则正是缺乏这样一种哲学，所以完全错误地评价了罗斯福的新政。

那么共产党人呢？在罗斯福执政的头两年，他们批评他的纲领是资本家的计谋，是以缺乏生气的自由主义伪装起来的法西斯主义。1934年，在该党的一项决议中这样写道：“罗斯福的‘新政’是那些银行家和托拉斯以千百万劳动者为牺牲而寻求摆脱危机的出路所采取的措施。罗斯福和资本家们在最无耻的迷惑性宣传的掩盖下，大大降低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对黑人群体加强恐怖统治，系统地否定现存的民权并在政治上加以侵犯。……”

接着，突然采取截然相反的立场。在希特勒上台的阴影胁迫下，莫斯科把革命策略抛到一边，号召建立反法西斯主义的社会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反法西斯阵线。美国共产党相应地来了一个彻底转变。现在必须把罗斯福当作一个反法西斯力量的领袖来支持。这个变化对共产党人是有利的，因为人民阵线的策略有利于他们打入生气勃勃的工会和其他进步团体。但他们这样地认可罗斯福是从机会主义出发，而不是从教条主义出发。

左翼无党派人士对于新政的敌对态度同样激烈。1935年春，海伍德·布龙把罗斯福叫做人民的头号公敌。这个胖乎乎、不修边幅的专栏作家嘲笑打入白宫的劳工领袖是着了罗斯福的魔陷入甜美的昏睡，一觉醒来，布龙说，得到了汽车法规之类的东西。《民族周刊》的华盛顿记者写道，说罗斯福是一个

战斗的激进派的传说同说罗斯福是一个专横的政客的神话一样地虚假。罗斯福不学无术——是一个只从事物的表象考虑问题和行事肤浅之辈。

甚至第二个“百日”更加激进的立法也没有改变左派的立场。他们认为，社会保险法软弱无力，真正的公共工程以失败告终，瓦格纳法是强加给总统的。甚至在罗斯福于1936年1月发表了那篇富于战斗性的演说以后，他们还是很漠然；认为这篇演说全是废话，并无实际的建议。激进派对于他们给罗斯福描绘的那幅既无理论又无方向的“快活的改革家”的画像，还是茫然不解；更可能的是他们看到了1935年恢复了活力的新政仅仅是变向的温和的改革纲领。如果许多激进派最后还是投了总统的赞成票，那并不是因为他们更爱罗斯福，而是因为他们对之于共和党，两害之下取其轻。

“州长，”罗斯福的一个老朋在第二个“百日”里对他说，“你看到今天早上的《时报》了吗？你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了。共产党已下决心对你表示友善了。”总统大笑。再没有什么比这种左派的支持更使他感到好笑了。

罗斯福对人们称他为激进派表示诧异，这基本上是做给人看的姿态。作为一个政治家，他非常清楚，这种称号在美国政界是带点侮辱性的标签。不过，他的反应里确有一种真正怀疑的因素。他知道采取的是某种中间道路；更重要的是，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不管是社会主义还是共产主义，所抱有的敌视使他觉得对他的指责十分没有根据。这不仅仅是意识形态上的敌意。它是心理上的敌意，也就是说，罗斯福不相信知识界激进主义所包含的那种教条的和系统的体系。

罗斯福确实是个杰出的“讲求实际的”人。他并没有全面改造美国的计划，有的则是许多改进这个或那个方面的措施。从“小玩意儿”的意义上来说，他倒是个有原创性的思想家：采取直接措施解决日常的具体问题。他的主张诸如在干旱地区营造防护林带；修筑有支线网的横贯大陆的公路；巨大的水坝和灌溉系统；佃农的重新安居工程；在林区的民间资源保护工作；在全国建立一连串小医院，农村电气化，地区性开发；建造桥梁、房屋和公园。上述计划并非惊人之举，但这些措施实际上都是建设具体的实际。使罗斯福信服的不是伟大的经济政治理论而是人们能够看得见、摸得到、用得上的具体成就。

但是，这一切在1935年和1936年却不大为美国人民所明白。当时的报界以一种不可思议的手法，歪曲的把罗斯福刻画成一个理论家，这是完全不真实的。漫画中的罗斯福是穿着睡衣、戴着睡帽，由一些古板的教授

们在身旁侍候着的痴呆的梦游人，奉行不切实际的知识理论。商业界杂志也批评他发表了“不实际的理论”。人们简直无法想象，在一个报刊杂志不惜泼墨成海，挥笔如林地报道白宫的国家，竟把总统的思想状态完全给颠倒了。

事实上，事情完全被弄得颠倒了。不实际的理论家不是罗斯福而恰恰是商人们自己。他们把每一个关于管理国家事务本领的问题都变成一个永恒的原则，这就使他们走上了一条恰恰是罗斯福所反对的道路。

罗斯福看到他的商业界朋友回到抽象理论中去，这种倾向使他颇为不满。他一再指责他们不谈具体问题。哈佛大学商学院院长在纽约《太阳报》上写文章指评总统后，罗斯福伤心地写信给他的朋友说，他曾经同这位院长谈过一小时话，“他向院长提了几个问题，院长对这些问题没有一个具体答复。”罗斯福在给经济学家兼银行家弗雷德·肯特的长信中，故意忘记肯特的一般议论，而要求对具体问题提出具体建议。

讲求实际的罗斯福同一个教条主义的商人的一场善意争论，最清楚地体现了两者之间的差别。此人是纽约的一个大房地产经纪人，罗斯福问这位商人，如果联邦政府不为每建一间住房提供五美元的资助，私人营造商能否倾向一下年收入在一千美元以下的家庭？这个房地产经纪人答道：住房从来是而且特别是一个私人的问题，同时也是绝对的地方性问题。无论在宪法里还是政府的计划中都没有授权或表明要联邦插手住房问题。他担心政府正走上了一条坦诚地说，他得叫它是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的道路。

“那么，我们对这些人怎么办呢？”罗斯福问道：“难道我们要强制他们去住贫民窟吗？……难道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对这些人不承担任何义务吗？难道社会作为一个整体要说明我们对这个问题毫无办法吗？”

他注意到这个房地产经纪人引用了林肯的话。另一位总统——克利夫兰——曾说过：摆在大家面前的是一个问题，而不是一个理论。罗斯福最后说：“我希望你给我提供办法。”

1936年初，罗斯福在为商业界报纸编辑举行记者招待会上仍持同一个调子。他谈到工业领袖时，说他等待他们来作出某种回答。但是他们并没有来，而是到全国去游说：“我们的预算必须平衡。我们的预算必须平衡！”

总统显然想答复道格拉斯和其他所有赞美这种用帐簿来举行圣餐仪式的脱离现实的人。

“预算平衡并不能使人们有活做。等我把失业者照顾以后，我立刻就会来平衡预算。换句话说，你们的这种说法对我毫无用处。”

“我明天就可以停止救济。但结果会怎样呢？你们倒说说看！你们知道结果会怎样。我不是指你们那家报纸老板的政策。作为一个人你们当然明白，假如明天我停止救济，那将会导致什么结果。这可是严肃的事。”

艾尔·史密斯在自由同盟集会上辛辣地攻击新政后的几天，罗斯福让他的助手从林肯言论中查找一段他模糊记得的话。这段话很快就找到了，放在他桌上：

“我所做的正是我知道怎样做才是最好的事——那是我能做到的最好的事；而且我准备坚持做到底。如果结果证明我做得对，现在对我的种种抨击就一文不值。如果结果证明我错了，即使一万个天使赌咒发誓说我做对了，那也于事无补。”

第十三章 实用主义的外交政策

罗斯福处理日常工作的实用主义原则在制订外交政策方面比在内政方面表现得更明白。这并不奇怪。1920年竞选运动中，他同考克斯参加国联，主张遵循集体安全原则，但是吃了亏。1932年，罗斯福作为候选人就放弃了加入国联的原则。这表明，为了达到眼前的利益，他对于过去的原则妥协让步可以走多远。

但是，罗斯福甚至就在稳坐总统宝座后也是谨慎地绕着外交政策问题的暗礁而行进。他害怕，他在政治上所受的爱戴和他的国内政策纲领会因此而受到损害。从表面上看，他对于伦敦经济会议的处理，他于1933年实行的民族主义的经济政策，他继续贯彻胡佛关于国联和战争贷款的政策，都是从威尔逊和考克斯的民主党以前的国际主义倾向作了有计划的和不断的让步。但是事实却不是如此。因为他在遵循这些政策同时，形成了他的一套国际合作措施，这使他能够根据政治条件的需要在孤立主义和国际主义之间来回摇摆。

从总统采取行动的政治气候和环境来看，要执行有原则的外交政策也颇不易。诚然，在一个半世纪以前，宪法的制订者们在外交政策上明智地给了总统大量的分配权和权力。但是，对条约的否决权却操在三分之一加一个参议员的手里，参议院或者众议院只要有大多数，或者它们的一个僵化的委员会的大多数，也可以否定绝大部分需要经费的国际计划。甚至就在以他为首的行政部门中，总统也面临各种分裂力量：外交官的派性，“喜欢注重礼仪形式”那一伙人中的某些人狭隘的阶级忠诚；勾心斗角的官僚间的纠纷；国务院那幢难看的旧大楼里的职业外交官和国会山上有权

有势的议员们之间古怪的结合。许多政客都已插手外交政策事务。

在华盛顿之外更有千千万万选民，他们手里掌握着外交政策制订者的命运。而这正是建立一贯的外交关系纲领的最不稳定的基础。这些选民中绝大多数对于三英里以外的事情一无所知。就象老话说的：他们对街上的狗打架远比对远方鲁里坦尼亚燃起了战火更关心。另一些人则僵化地遵守对其原来的祖国的忠诚。还有一些人则是那古老的恐惧和陈词滥调的俘虏，说什么：精明的外国外交官总是把山姆大叔当作笨蛋来耍，美国从来没有打过败仗，但也从来没有在任何一次和平会议上得胜，只有保持不参与缠人的联盟才能得救。

当然，这些只是供罗斯福制订其外交政策参考的一个方面。因为这些政策按其定义来说，反过来又受到外国政治气候的影响。纳粹思想意识的特性，法国国民议会里的力量对比，英国工党的外交政策态度，克里姆林宫内部无声的斗争，中国军阀的命运，这些都是国际力量对比的因素。日久天长，罗斯福阅读他的驻外大使们寄来的长信，同外国使节共进午餐，询问刚会见过麦克唐纳或戈林或墨索里尼的他的一些非官方代理人，翻阅国务院的经济专家提供的长篇研究报告，这时他必须对他不甚了了而其后果无法估量的重大问题做出判断。

更糟糕的是，这些力量还在不停地活动着。日本的一件谋杀案，法国的一次选举，南美的一场宫廷政变，唐宁街上一场关键性的内阁会议，亚洲千千万万人民日益加剧的苦难，在广大地区勃发起来的、看不分明的思想意识——所有这一切中的任何一点都可能打破不稳定的国际政治均势。美国也包涵在内。不仅它的政治受到了一般不可预见性的干扰，而且美国人民由于缺乏建立在长期外交经验基础上的稳健态度，往往阵发性地一会儿偏到这一种外交政策情绪，一会儿又偏向另一种外交政策情绪，从孤立主义转为中立主义，又再转为参与国际政治。

所以不令人奇怪罗斯福在外交政策的朦胧的原野上如履薄冰似地行动。难怪他 1934 年初在给一个朋友的信中这样写道：在目前的欧洲形势下，他感觉他自己很象是在一个没有门的墙上去找一扇门。形势可能好转，使他们能进行一些领导。然而，如果形势恶化，更迫切地需要领导，那又怎么办呢？

好邻居和好防护

因为没有制订外交政策的总方针，罗斯福就随机应变。结果产生了混乱的一堆互不相干的和有些自相矛盾的方针。总统在民主党原来的政治上

的国际主义和新政所包含的经济民族主义之间，在布赖恩民主党人的反帝国主义和传统的强权政治之间摇来摆去。

在这种政策不决过程中，罗斯福不大关心使他的政策适应一个更大的结构，而更多地是注意解决迫在眉睫的具体问题。从某种程度上讲，他在外交政策上同他在内政上一样，走的是中间道路。但是，他的中间道路也同样不是两种死极的哲学之间的一条直线，而仅仅是一种几何中线，使罗斯福借以抢风调向，由一种政策转为另一种政策。

在他第一任的整个任期内，令人烦恼的战争债务问题一直没有解决。罗斯福几乎丝毫没有背离胡佛的政策。国会曾经禁止政府减少或取消债款，他也不打算改变这种态度；但是他也知道，要人家完全偿还是不可能的。在这个死胡同里，总统探索了各种方案，在废纸上统计过许多次数字。这一切毫无结果。看着各国只作象征性的偿付或者根本一文不付，国会越来越着急了。结果在1934年通过了好战的老孤立主义者海勒姆·约翰逊提出的一项议案，禁止美国向违约国提供短期贷款。罗斯福在国务院和财政部的反对下向国会的孤立主义者妥协，签署了这个法案，使之成为法律。

裁军问题对于美国同其老盟邦之间的和谐关系是一个更严峻的挑战。罗斯福就任总统时，日内瓦的世界裁军会议陷入僵局已近一年之久。希特勒夺得权力使得会议前景更为黯淡。1933年5月，总统亲自向五十四国首脑发出号召，要求他们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消灭进攻性武器并加强限制军备和军队。过了几日，罗斯福和赫尔又授权美国派往日内瓦的代表团团长诺曼·戴维斯采取更进一步的行动。他声称，如果可以裁减军备，华盛顿不仅愿同其他国家磋商，而且愿意不参与任何旨在破坏反对一国破坏和平的集体努力，如果他们也认为这种努力是正确的话。

假如说这个毫无隐讳的声明是一个试探气球，那么，它很快就被四分之一以上国家的保留条款攻击。德国已经完成空军订货，它的工厂源源不断地运出化学药品、钢铁和小型武器。法国同过去一样害怕德国报复，坚持要求特殊保证。在国会山上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开会的那个古老而豪华的房间里，强有力的参议员们反对这个显示于国际主义的姿态。裁军会议不久又再度陷入僵局。

10月，希特勒宣布德国既退出裁军会议也退出国联。历史上规模空前的军备竞赛开始了。

裁军会议的破产促使罗斯福和赫尔返回来重新强调海军裁军。日本正在要求海军力量等重，罗斯福则想同英国联合，共同对付东方出现的这种

日益逼人的威胁。但是英国更为担心的是德国而不是日本的重整军备，因此不好合作。1934年11月，满怀愤怒的罗斯福告诉戴维斯，必须经常让英国外相约翰·西蒙爵士和“其他一些保守党人”注意这个简单的事实，那就是，即使英国被怀疑是想同日本合作而不同他们合作的话，他们也不得不为了美国的安全而诉诸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非的人民感情，努力明确地促使这些大英帝国的自治领清楚地明白，他们未来的安全是同美国联系在一起的。他还说，戴维斯会“非常了解如何以最狡猾的手段把这个思想传达到西蒙、张伯伦、鲍尔温和麦克唐纳的脑子里去。”

这是一个令人惊讶的措施——是威胁要使大英国帝国自治领不同情他们的宗主国，而且要同他建立以美国为核心的抗日联盟。这个努力归于失败；一个星期以后，赫尔命令戴维斯需要及早地公开而且明确地表示美英两国建立限制海军联盟。但是，罗斯福的威胁是很重要的，因为它是表明了强权政治的努力，即便在两个友好国家的外交关系华丽布章掩盖下是怎样显示出来的。

至于美国参加国际组织问题，罗斯福继续采取极其谨慎的作法。1933年圣诞节过后不久，他对伍德罗·威尔逊基金会说，国际联盟作为一个国际讨论的普通集会地点，作为解决争端的途径，作为协助解决劳工问题，健康问题和其他问题的一种力量，他向它致敬。美国在使用它的机构方面采取公开合作的态度。但是他继续说：我们不是它的成员国，我们也不打算成为成员国。”他曾一度想向国联派驻一名美国大使，可是他又怕孤立主义者对此有反应。而且他甚至在技术性的合作方面也很谨慎。当菲利普斯告诉他，农业部想派一名代表到国联的国际肉食贸易专家委员会去，罗斯福的答复是：“这会产生什么影响呢？向直属国联的正式委员会派遣代表，也许更进一步，将会成为正式参加国联？”

在国联之外，另有两个政治色彩比较温和的国际组织：国际劳工组织和常设国际仲裁法庭。在珀金斯小姐的建议下，参议院和众议院简单多数通过联合决议，授权参加国际劳工组织，成为一个会员国。罗斯福曾对她说过：他可以是美国总统，他可以赞成国际劳工组织，但他不能一个采取行动。结果，珀金斯小姐一个人行动起来了。在罗斯福的建议和祝福下——可是他再没有给予其他帮助——她艰难地、一步步地从皮特曼找到约翰逊又找到博拉，向他们解释早在国联成立以前就有国际劳工组织了，而且国际劳工组织并不是国联的组成部分，参加这个组织不存在任何丧失主权的问题。经过这样耐心地做了对外关系委员会的每个成员的工作以后，

她终于促使这项决议通过了。

参加国际法庭在政治上看来也可行的。民主、共和两党 1932 年的政纲都曾要求接受保卫美国主权的那个让步的条约草案。主要由于赫尔的提议，罗期福决定在 1935 年国会开始时就使它得到批准。可是一开始就出现重重困难。罗斯福的内阁长有分歧。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基·皮特曼很不热心，他要求罗斯福让鲁宾逊去领导这场斗争。罗斯福和赫尔一度认为他们在参议院有三分之二的绝对多数。然而，赫斯特、库格林神父、威尔·罗杰斯和其他人闪电似地动员了孤立主义者的舆论，电报潮水般地涌到国会山，许多参议员动摇了，这项措施未得通过。

尽管罗斯福没有象赫尔那样亲自参加这场斗争，这个挫折对他也很刺激。伊克斯在内阁会议上注意到罗斯福的笑声带有苦味，而且暗示他要打击那三十六名持不同意见的议员。罗斯福在给鲁宾逊的信中写道：这三十六个人如果到了天堂里，也要长时间地做许多检讨，就是说上帝也是反战的，他认为上帝是反战的。但是罗斯福的主要反应是觉得他必须等待公众意见。人们最后是会接受的。他在给伊莱休·鲁特的信中说：“但是今天坦率地说，到处的风向都对我们不利。”他给斯廷生写了信去，言词更为悲观：

“谢谢你那非常友好的来信。它使我鼓舞。你说得对，我们对敌人是清楚的。在一般情况下，他们在电台和其他场合的呼吁不会得逞。但是，现在不是正常的时候，群众容易激动，他们随时会信仰陌生的上帝。在其他每一个国家都是如此，在我们自己这里不会例外。”

“恐怕目前人们的常识也提不出新的办法。——但是不幸我的记忆力很好，我既不会忘却我们的敌人，也不会忘却我们的目的。”

在政府的外交政策中，最具有国际主义性质的是贸易协定计划。而对这项计划负主要责任的却是赫尔而不是罗斯福。罗斯福在他自己的政府里和党内仍继续徘徊于孤立主义和国际主义之间。

赫尔三十六岁第一次向国会发表讲话时就主张低关税；从那时起，他就一直为此而努力。现在，身为国务卿，这个顽强的田纳西州人看到他的有新时机来了。在 1932 年以前的那几年里，罗斯福给他的印象是赞成国与国之间有互惠关税协议。但是在第一个“百日”里，当赫尔企图推行他的主张时却马上遇到农业调整法和国家复兴法所强调的民族主义精神。他的贸易计划被倒置在一边。不过，在一个问题上赫尔和罗期福的意见完全一致。除非把权交给总统，关税是不可能大减的。要通过国会的铁掌实行低关税，不啻是让有特殊利益的议员们把它降低十分之一。只有总统可以

代表比较普遍的利益采取行动。

但是罗斯福愿意干吗？1933年他慢慢转向某种贸易协定计划。但是，当他组织一个委员会来协调对外贸易关系时，他选了一个非常反对降低关税的人来当首脑，这个人就是乔治·N·皮克。总统在推行贸易协定法案的同时，任命皮克为对外贸易顾问。赫尔听到他的这个任命时，十分惊诧。在这项议案成为法律后过了几个月，总统让皮克同德国谈判一项易货协定。赫尔和皮克在最惠国条款上发生了分歧。这时罗斯福要赫尔“找个晚上花一、两个钟头”同皮克好好谈谈这个问题。罗斯福还在给赫尔的信中说：“完全从理论上说，你跟我想象的一样，但有时候我们必须改变某个原则，以适应残酷而令人不悦的现实！”

这样的拉锯战不能继续下去。在赫尔的沉重压力下，总统最后终于转而反对皮克和他的以物易物的贸易计划。后来皮克发表了一个不满的声明辞职了。

赫尔也带头把睦邻理论应用到美洲其他国家，不过，在这方面他得到总统的大力支持。拉丁美洲因为被内部冲突和不满情绪弄得四分五裂，加上北面这位老大哥多年来的干预，他们对于民主党提出的不再插手拉丁美洲内政的诺言不太相信。只有具体的形势才能真正考验这个新方针，而早已成为美国监护对象的古巴提供了这样的考验。1933年哈瓦那接二连三地发生宫廷政变时，危险的形势眼看要威胁到美国在这个大国的商业利益。美国驻古巴大使萨姆纳·韦尔斯担心发生暴乱和军队政变，建立进行“严格限制的干涉”，但是这个建议被赫尔和罗斯福拒绝了。后来他们以废除限制古巴主权的普拉特修正案治愈了这个溃烂的恶瘤。为了进一步声明睦邻政策，罗斯福也从海地撤走了海军陆战队并且缓和了同巴拿马的关系。而这整个计划的高潮是赫尔在蒙得维的亚召开的第七届泛美会议上耐心地培植友好关系。美国国务卿以一个代表的身份出席这样的会议还是破天荒第一次。

到1936年，罗斯福可以说睦邻政策“已成事实，是积极、现实、恰当而有效的”。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他的原则立场最坚定的外交政策却基本上是一个消极的政策——一个不干涉政策，不管它会产生怎样积极的结果，本身还是消极的。当然，一贯的不干涉政策实属不易，但也比一向的干涉政策或集体安全政策要容易得多。

不论怎样，罗斯福并没有把他的赌注全都押在条约和不干涉政策上，作为睦邻政策的基础，至少在南北美洲之外的情况是这样。有了好保护才

能有好邻居，他的一些保护屏上枪矛林立。罗斯福就任后的第一周内，斯旺森就宣布，海军要按照条约的要求建设得强大起来。三个月后总统为此目的从全国复兴法拨了大约两亿五千万美元。然而在他第一任期间，军队建设是缓慢而又暗地里进行的。罗斯福不愿意不适当地公开防务。当麦金太尔在1934年初告诉他爱国组织要求他宣布举行“全国防务周”时，罗斯福的答复很明确：“不要干这种事。”

风暴之云和避难所

1934年底，在参议院办公大楼那间白大理石的委员会办公室里，坐着正在上演经过精心谋划的一出戏的舞台经理们。长条桌边正中坐着这出戏的主角，一个板起面孔、神色严肃的年轻的参议员，名叫杰拉尔德·P·奈；他的两边是美国孤立主义的其他支持者——阿瑟·H·范登堡，贝内特·钱普·克拉克，霍默·T·博恩。这出戏中的反派角色就多了：邪恶嗜血的“死亡贩子”，他们天天在委员会面前走过，承认他们的罪过。女主角则只有一个：一个超俗的精灵，人们总是向她呼吁但却永远见不到她的身影，即名叫“和平”的那位人物。挤在反派背后的合唱队，即引颈观望却又随着剧情的展开而生气地喃喃低语的观众。

这就是调查军火工业的奈委员会。就象其他许多著名的参议院调查案一样，奈的探针并不是寻找数据，而更多地是把众所周知的事以及人们理应怀疑的事加以戏剧性的夸张。可是指控却是富于戏剧性而骇人听闻的。军火商贿赂了政客，共享了专利的好处，瓜分了企业，赚了难以置信的巨额利润，而又偷税漏税——这一切都隐藏在那些肮脏的杀人武器买卖里。更糟的是，军火商为了攫取巨额利润还助长了战争危险。

参议院的听证很少受到美国公众舆论这样的重视。书铺报亭突然到处出现了刺眼而又可怕的大标题：“贩卖死亡的商人”正深陷在“钢铁、血泊和利润”之中；这是“一宗肮脏的买卖”。时间选得非常巧妙。在揭露的同时也有助于对卷入欧洲的争吵表示深深的讨厌。作家们忙于解释，1917年的事件不是因为德国的潜艇或中立权的概念，而是由于几个贪心的资本家造成的。归根到底，德国的罪过没有那么严重。美国人当了傻子，听信了骗子的宣传。

随着欧洲战争的阴云密布，千百万美国人祈祷：“可别再发生那样的事了”。妇女们组织了和平协会。大学生们组织了“未来战争的退伍军人会”，在他们必须上战场打仗和阵亡以前，现在就募集他们的补助金。孤立主义者在各地的势力都很强，尤其是在中西部，西北部和洛矶山脉一

带；经过一次又一次大选，这些地区把支持孤立主义事来的人物选进了国会，比如爱达荷州的威廉·E·博拉，内华达州的基·皮特曼，蒙大拿州的伯顿·惠勒，威斯康星州的小鲍勃·拉福莱特和北达科他州的奈等人。这个充满了激动和怨恨的事业现在变成了一种令人恐惧、几乎是原始的努力。

罗斯福在这一切事情上采取什么态度呢？阻止动员公众舆论对他的确十分重要，因为这种公众舆论反过来可能在他制订外交政策时给他限制。但是，总统对待奈进行的调查的态度是消极的。奈，本是共和党和一个孤立主义者，主要由于有关方面不负责任而让他当上了委员会主席。罗斯福随支持调查的舆论随波逐流，不仅一同参与谴责军火贸易，而且还让奈看了政府的文件，这可给那位要把银行家和外交官的欺骗加以戏剧化的参议员帮了大忙。更有甚者，他还容忍了——在某种程度上是鼓励了——奈的委员会的野心，他要利用人们对这国火商日益加剧的不满情绪当作一个工具来制订出一个僵硬的美国孤立主义政策。

在这个关键的时刻，罗斯福没有起到任何领导作用。群众痛恨军火商和发战争财的人，这种痛恨会使他们深深认为美国应当继绝与外国的关系，从而也不参与外国的战争。但这种情况原来不是不可避免的。对于战争的厌恶本来可能支持群众的愿望：即同其他国家一起合作，争取制止战争，从而结束丑恶的战争附属品，其中包括贩卖死亡的商人。但是，如要这样引导舆论则需要有积极主动的教育计划——总之，就是需要领导。而罗斯福却只是随波逐流。

由于孤立主义情绪所形成的巨大浪潮，孤立主义者在指挥他们的力量方面的杰出才干，政府的消极态度，欧洲的紧张局势，因此只可能有一条出路——全国都逃到避难所去，躲过立刻到来的暴风雨。在第二个“百日”里，国会山上的孤立主义者们加紧通过立法，要求总统在国外发生战事的时候，对一切交战国实行武器禁运。罗斯福和赫尔都支持这样的禁运授权，但他们还想要求国会授权总统区别对待侵略者和受害者，只对前者实行武器禁运。他们的理由是，这样的自由决定权会有助于阻止侵略。

但是孤立主义者却不同意。他们宣称，这种自由决定权肯定意味着卷入异国的争端。皮特曼态度敌对而又乖戾。他警告白宫说，总统如果坚持要“根据国联的愿望标明谁是侵略者的话”，那他是自投罗网。这位参议员还说，他到是愿意提出标出这么一条关于总统自由决定权的条款，但就怕总统会因这个条款而“吃亏”。

总统也的确吃了亏。两院都差不多一致通过了关于总统接受委托，实

行武器禁运的法案。罗斯福不敢抵制潮流；他还有一些紧急的国内法案需要通过，而孤立主义者威胁要以冗长的演说阻止法案的通过。总统签署了这个法案，但他提出警告说，如果条款不灵活，这就反过来可能把美国拖进战争，而不能使我们保持不卷入战争。

那么，罗斯福为什么要签署这个法案呢？主要是出于权宜方案。一则，法案中关于总统受委托实行武器禁运的条款的有效期只有六个月，罗斯福和赫尔的理由是，他们也许能在改动这一条款时争取总统自由决定权。再次，他们两人都喜欢这个法案的一个特点——制订了有关武器贸易的规则。更重要的是，墨索里尼几个月来已制订侵略塞俄比亚的计划。总统受委托对两国实行武器禁运对意大利，会比对埃塞俄比亚更加不利，由于它需要现代化武器并有船运输武器，而海尔·塞拉西只有装备了燧发枪的土著部队。当罗斯福严肃地对记者们说，这一法案“符合当前形势的需要”时，他更多地是指他那几乎是马基雅维里式的权宜之计。

事实就是这样：就在欧洲和亚洲的独裁者伺机挑起战争的时刻，罗斯福被取消了运用他的国家的力量反对侵略者的大权。

1935年8月底，当罗斯福在中立法案上随便地签名的时候，意大利的军队、坦克和飞机通过苏伊士运河涌入埃塞俄比亚。对各大国驻外使团中的军事和外交战略家们来说，中立法等于说明美国拒绝把它的力量放到国际政治的力量对比中去。但是，罗斯福又无法躲避日益逼近的冲突。

他和赫尔持续好几个月注视着这场冲突的到来。欧洲的政治家和外交家英国首相鲍尔温、外长塞缪尔·霍尔、法国总理皮埃尔·赖伐尔也是如此。在1935年，欧洲分裂的实质被集体安全的华丽语言和秘密谈判的暗影遮盖了，但有两件事却很清楚。一件是，英法由于更害怕希特勒，希望挑拨这两个独裁者，因而不愿意把同墨索里尼的关系搞到无可挽回的敌对地步。另一件就是，墨索里尼决心吞并埃塞俄比亚，而且还宁愿使用暴力。

罗斯福对于墨索里尼勉强有点钦慕之意；这个独裁者也对总统和他的新政回敬了几句善意的话。美国驻罗马大使布里肯里奇·朗1933年在来信中曾热情地称赞意大利的复兴，其中包括火车的正点。甚至就在发生侵略的前夕，朗还在精心制订计划，以割让一大片埃塞俄比亚领土给意大利，作为欧洲整个和解方案的一部分内容。1934年，罗斯福对于墨索里尼备战的反应更加模糊。一方面他相信战争会威胁到世界各地的和平，因此美国要被卷入。另一方面，他除了催促墨索里尼以和平方式解决问题外，不肯再前进一步，害怕被卷入漩涡。墨索里尼说，事情太迟了，意大利已经动

员了一百万军队，花了二十亿里拉。到了这个时候，罗斯福仍然希望意大利会采取以谈判手段解决问题的“体面的做法”。但是除了对埃塞俄比亚或集体安全表示道义上的支持外，他又不肯提出别的方案。赫尔表明，美国不会和国联一道实际制裁。

罗斯福在 1935 年 8 月底写给参议员乔塞亚·贝利的信中说：他现在对国际局势比对国内局势更为担心。他希望在他乘船出外旅行以前不要发生任何爆炸性事件。这是指总统计划要乘美舰“休斯顿号”做一次远航。但是爆炸性事件已迫在眉睫。1935 年 10 月日墨索里尼的军团开进了埃塞俄比亚。现在怎么办？

“休斯顿号”巡洋舰正在加利福尼亚州沿海一带平稳地破浪前进，这时，进攻的消息告诉了正在舰上的罗斯福。他对意大利的态度马上变得强硬起来。当有利于埃塞俄比亚的新闻发到舰上时，他大声叫好他的随行人员霍普金斯、伊克斯及其他人都同情埃塞俄比亚。总统曾经给赫尔留下了一项关于保守中立的声明草稿。赫尔努力设法了解是否正式的敌对行动已经存在时，罗斯福已等得十分不耐烦。他说：“他们在埃塞俄比亚上空投下了炸弹——那就是战争。为什么非要等墨索里尼自己这样说呢？”

赫尔在华盛顿有他自己的问题。他的一些顾问极力劝他不要发表中立宣言，因为这对国联理事会想要宣布意大利为侵略国家的行动不利。但是赫尔想抢在国联前头采取措施。他的理由直接来自制订美国外交政策过程中的决定因素——孤立主义者对美国同日内瓦合作的敌对态度。罗斯福发电报要他马上行动。他们两人都意识到事情在一定程度上有赖于同国联不扯上关系。

由于两个事件非常意外的巧合——中立条约获得通过和一个急需进口战争给养的国家侵犯了一个农业国，罗斯福的处境极为有利，他越是以中立的名义减少对意大利的出口，他就越是能够帮助对侵略者实行经济制裁。然而，整个策略的成功取决于是否能使公众看到日内瓦的行动和华盛顿的行动互不相干。总统和赫尔对这项任务完全胜任。当霍尔向他们询问是否要根据凯洛格公约采取某种行动时，他们断然地拒绝了。而且，他们很担心国联可能正式要求美国合作参与制裁，那就会遭到美国拒绝，而这种态度会形成对国联的努力泼冷水。于是他们给日内瓦打招呼，要他们不提出这样的要求。英法两国同意不提。

可是，中立法只对军火武器实行禁运。它并不禁运原料。那么，意大利就可以把原加工成为它的军队使用的武器。罗斯福和赫尔从一开始就看

到这是一大漏洞。总统要求国务院研究，一旦国联在制裁中涵括了铜和钢，美国有没有可能在禁运货单上增加铜和钢这两项物资。他甚至还准备大大限制中立国转口美国的出口货。罗斯福获知对于中立法不能延伸到这样广泛的程度，便退而求助于根据中立法的精神，实行“道义上的禁运”的办法。10月30日，他谴责在对意大利贸易中牟取暴利，而这种贸易也许会延长这场战争。

虽然有这些呼吁，对意大利出口的战争物资仍有增无减。11月15日，由于国联的制裁预定在三天以后才生效，赫尔严肃地警告人们不要增加诸如石油、铜、卡车和废钢的出口。他的警告中包括的物资超过了国联的制裁货单，那张货单中没有列出最重要的一项——石油。眼看其最薄的一侧受到威胁，意大利对赫尔的行动表示激烈抗议。

但是这个行动仍然只是“道义上的”。美国政府会真正采取有效行动吗？英国尤其急于要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它的“商人政府”害怕，假如国联对意大利实行石油禁运，美国石油商人不理睬赫尔的道义原则，就会占取整个意大利石油市场。英国也有对付赖伐尔这个老奸巨猾人物的问题，赖伐尔早就有意以放弃埃塞俄比亚来讨好墨索里尼，而且就是他故意推诿，使国联未能实行石油禁运。

于是英国大使直接赫尔提出了这个问题。如果国联实行石油禁运，美国是否会停止增加对意大利上的石油出口？赫尔有些犹豫。只有国会才能采取这样的行动。然而，如向国会呼吁，要求和国联一同禁运石油，则等于是把美国的政策同国联的集体安全体制可怕地关联起来，而这正是他和罗斯福努力回避的。他答道：“我们已经尽量地向前走了。”他无法代表国会表态。

美国政府对于孤立主义的倾向使唐宁街足智多谋的外交家们感到失望，他们便又转而考虑别的有效办法。霍尔和赖伐尔在巴黎就一项结束战争的计划达成条约，即肢解埃塞俄比亚，将它的大片领土割给墨索里尼。这个协议一公布，立刻引起了强烈的抗议。霍尔被撤职，而这计划也就化为泡影。但是这个肮脏的计划也粉碎了进行有效制裁的奢望。国联继续持模棱两可态度。战争继续进行下去。意大利军队深入埃塞俄比亚国土，放火，轰炸，还从云端往下喷撒毒瓦斯。

霍尔—赖伐尔计划使罗斯福和赫尔惊诧不已。总统非常愤怒，他说：“我们的英国朋友可悲地失败了。”海尔·塞拉西的同胞抵抗了好几个月。遭到国联的抛弃后，塞拉西皇帝在离开他的祖国前发表了一项最后号召：

世界各国人民是否意识到他的抗战不仅是为了保护的人民而且也是保护集体安全？难道他们对他为全人类而战视而不见？他的那些行动迟缓的盟邦都在哪里？

“假如他们终于不来，那和么我平和地预言，‘西方必然毁灭’。”

强权政治

埃塞俄比亚被出卖的事实使美国的国际主义者堕入困惑和沮丧的深渊。孤立主义者则讥讽山姆大叔又一次给欧洲外交家骗得好苦。大多数美国人只是困惑不解。至于罗斯福，自从进入白宫以来，他对国外的局势发展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困惑和忧虑。

1936年1月底，他写信给美国驻布加勒斯特公使说：“形势变幻莫测，对于欧洲的前途只能胡思乱想了。”他给驻巴黎大使斯特劳斯的信，语调更加悲观。总统说，整个欧洲局势一片黑暗。

“1933年5月以来，我对国际局势日益关注。从英国、法国和德国来的人中有的指出，过去三年每一次危机都对付过去了，人们抱着一种希望，在以后几年中连续发生每次危机都能以某种和平的方式应付过去。我希望这种观点是正确的，但是它却违反人们的常识。”

总统对国会发表了一个严肃警告：“这一时期以来在地球上那些地区，不仅人与人之间的和平和善意变得越来越少，而且事态竟已发展到这个地步，以致必须把日益增长的痛恨、日益明显的侵略倾向、日益增长的军备竞赛、日益尖锐的一触即发之势告诉南北美洲的人民，这样的局势中包涵着许多可能导致全面战争悲剧的因素。”这些国家的人民也许希望改变侵略政策，但是他们没有自由，他们盲目地狂热地崇拜那些想要夺占独裁大权的人。这样的国家在解决它们的问题时表现得没有耐性。

“因此，他们焦急地重新回到武力即法律的古老信条上去了，或者又回到那种异想天开的信念，即他们，而且只有他们，受命于上帝来完成一项使命，而地球上十五亿人中所有其他的人都必须向他们学习并且服从他们。”

这确是豪壮语——但它掩盖了罗斯福对待中立主义的态度中主要的模糊。表面上，他采取孤立主义的姿态，即武器禁运和贸易禁运使美国商人和其他人士不与战争发生纠纷，从而使美国不卷入战争。但暗地里他却采取国际主义立场，认为总统如果有自由决定权处理禁运问题，那就可以使美国在迫使侵略者不发动战争的基础上不参加战争。在这两种立场之间，巨大的分歧隐约可见。但是总统总不想让人民理解这一重大的分歧。他希望他们从事态发展中受到教育。对于罗斯福来说，不幸的是，诸如霍尔—

赖伐尔协议之类的事态发展又似乎朝着错误的方向教育人民。

时间非常紧迫。到了1936年2月，上一年9月制订的中立法就要到期了。罗斯福和赫尔希望从国会既获得关于战争物资“道义”禁运的合法基础，又能获得——对他们的整个战略来说这是关键性的——总统关于颁行这种禁运的自由决定权。当赫尔向国会吁请通过这两个新条款时，他碰到了无法先服的阻碍，不到一个星期他就打败了。为什么？

直接的原因是，国会山上孤立主义者的势力很大。约翰逊和博拉无情地批评赫尔的法案。他们充分利用一股孤立主义情绪的巨大浪潮，得意洋洋，这股浪潮是由于欧洲集体安全体制的失败和国内那位不辞疲劳的奈所揭发出的新的事实而被激发起来的。在奈和约翰逊及其一伙的领导下，孤立主义者迫使罗斯福和赫尔同意对1935年法案稍加修改，而使之延长。由于没有政府的指导方针，国际主义者站在一边毫无办法。

就在美国人民躲在他们避风港时，独裁者已拿起了屠刀。

1936年3月7日黎明，德国的先头部队强行进入莱茵兰。几小时以后，希特勒在柏林向国会里欢呼的议员们发表演讲，外国驻德外交官们在旁观看，漠然地一言不发。这位元首声称，他的部队已经出动，但德国是要和平的。他建议同法国签订为期二十五年的互不侵犯条约；双方都在边境上建立非军事区（其目的是要拆毁法国著名的马奇诺防线）；并同德国的东部邻国订立双边的互不侵犯条约（但不包托苏俄）。他软硬兼施，整整说了九十分钟；然后由几百名武装人员包围着走出了国会大厅。

法国犹豫不决，而且不知所措。后来才知道，希特勒手下有些将领反对这个措施，如果法国抵抗的话，希特勒的军队就不得不得回来。但是法国外交部不敢单独行动，唐宁街也在模棱两可之间。其他国家只是表示气愤。国联公开谴责德国破坏凡尔赛和约和洛迦诺条约的罪行。罗斯福和赫尔暗地里很重视这一步骤。但没有行动。

在罗斯福的整个第一届任期内，日本的军队、商人和官僚们都在巩固他们在亚洲大陆上的阵地。中国就象一个在太阳照射下霉烂的大果子，正从外面烂起。1933年热河被满洲国吞并，1935年日本军队强占察哈尔，1936年又侵入绥远，东京在摆脱了旧海军条约的桎梏后正在扩建它的舰队。虽然这一切在罗斯福和赫尔眼里都是不祥之兆，但更加不幸的却是日本军国主义极端分子对温和派的残酷斗争。

罗斯福总统就职后只过了一个月，就写信给豪斯说，他怀疑一位日本外交官对于美国总统把舰队留在太平洋的决定加以批评，是否是为了“讨

好国内高傲狭隘的群众，以免他回国时被暗杀。”这句话后来不幸言中了。1936年2月下旬的一个晚上，美国驻东京大使约瑟夫·格鲁邀请前首相斋藤和皇宫总监铃木贯太郎男爵观看电影《淘气的玛丽埃塔》；几小时后，斋藤遭暗杀，铃木受伤。叛乱分子被捕处决，然而日本的政客们惊诧地看到突发性的势力已经突然出现了。

欧洲局势的紧张与日俱增。1936年7月，意大利一个轰炸机中队进入战备状态，奉命到西班牙去执行任务。过了几天。弗郎西斯科·佛朗哥将军出任了反叛的摩尔人和西属摩洛哥的外国军团的领导人。民兵镇压了马德里和其他中心的军队反叛，但叛乱力量在北方和南方的声势大有发展。由于意大利和德国先发制人。伊比利亚半岛很快就成为了欧洲的战场。千千万万的意大利军队、航空兵、纳粹党人和技术人员涌进叛乱者控制的领土。不到几个星期，罗马和柏林就一起承认佛朗哥为西班牙的统治者。

罗斯福在给克劳德·鲍尔斯大使的信中说：“西班牙是多么可怕不幸的灾难！”他又说，但美国还要“全部”保持中立。英国和法国禁止其公民出售武器给西班牙政府；赫尔对美国出口实行道义上的禁运，虽然中立法不适用于内战。意大利和德国一致同意不干涉，但却不断地进行干涉。

1936年秋，德国和日本签订了反共产国际公约。轴心国现在可以铸成联合行动的战略计划了。意见分歧犹豫不决的民主国家在战略地位上遭到孤立主义者和绥靖主义者的破坏。

制订外交政策的政治家

记述是清晰的。罗斯福在其第一届总统任期内，作为一个外交政策的制订者，与其说他是政治家，不如说是采取中庸态度的政客。他看来几乎身不由己地随着孤立主义的巨大浪潮荡漾，而不是努力来改变群众支持孤立主义力量的态度和冷漠状态。

他希望人们从事实中得到教育；这个政策的错误在于欧洲和亚洲那些可怕的事实证明了美国由于担心自己被卷入外国纠纷而产生的怀疑和惊恐，却没有促使他们认识到需要民主国家采取集体行动。总之，需要采取一种决定性行动来作出清楚的解释，但罗斯福却没有作出解释。至少他可以避免主张完全不参与其他国家联合行动的孤立主义路线。但是在关键时刻——就在意大利进攻埃塞俄比亚前不久罗斯福批准中立法的时候——他谈到与其他国家进行合作，但“不卷入纠纷”。

这种随波逐流政策的可怕的影响后来才看得清楚，那是在外国侵略势力日益猖狂，而罗斯福企图重新掌握国内制订外交政策的控制权的时候。

但是当前的问题是：罗斯福为什么会容许他自己被孤立主义情绪弄得实际上毫无办法呢？他为什么不通过言论和行动，设法去改变群众的态度，从而把加在他自己身上的压力引向别处去呢？

如果我们考虑罗斯福的个人观点，这个谜就更难解开了。他私下扮演的角色是个国际主义者。他相信这样一种主张：美国的安全主要在于破坏战争的经济根源和社会根源，如果有战争爆发的危险，那么美国的安全就在于联合民主国家——包括美国——一起反对侵略国。但在公开场合，他谈的却是使美国继续不卷入其他国家的政治事务；总之，他往往唱着孤立主义者的调子。

假使考虑罗斯福总是强调民主国家需要领导的主张（虽然这个主张的含义不堪明确），那么上述那个疑团就变得更为神秘莫测。1933年底他在对伍德罗·威尔逊基金会发表讲演时曾坦白地说，“世界和平受到威胁，其过错不在世界人民而要责怪人民的政治领袖。”他说这话时想必已经认识到领袖的潜在力量。同时他又对法国政治家们长久使法国领导力量虚弱表示担心。他也许也清楚，只在两个极端之间奉行中间路线政策，不一定就会走上最明智的道路。就如在埃塞俄比亚问题上，英国和法国通过它们优柔寡断的行动既未能使墨索里尼离开德国的轨道也未能实现集体安全体制的理想。华盛顿的外交政策观念同样一团糟。

罗斯福对于外交政策问题私下和公开表现尖锐分歧的原因不止一个。第一，罗斯福的政党在国际问题上被等分为二。国际主义派集中在南方和边境诸州，而孤立主义者却在西部和中西部扎了根，双方力量相当。为了争取竞选提名，罗斯福在双方都有人质。1932年胜利当选所付的部分代价是，无条件地反对美国同国联的集体安全努力进行合作和遵循建立在不卷入国外纠纷基础上的审慎的中立政策。第二，罗斯福在竞选中是那样地忽略外交政策或者只是大概地谈论一下外交政策，因此他没有能使群众对外交政策明确他们的态度，后来也就无从发动他们支持国际主义。此外，在他第一任总统期间，他首先解决内政问题；如果在外交事务上采取强硬态度，则很可能疏远大批支持新政策的孤立主义派国会议员。的确，许多孤立主义者似乎都认为总统对外交政策表现的任何明显的兴趣基本上都违背了进步主义。

还有，总统把两方面人士留在自己身边。象赫尔、豪和摩根索这些人在政治光谱仪上一般属于国际主义者这一端，其他人象莫利、霍普金斯和休·约翰逊以及伊克斯则在另一边。伊克斯对于参议院关于国际仲裁法庭

作出的决定十分满意，打电话向希拉姆·约翰逊表示庆祝。他发现约翰逊“高兴得像个孩子”。新政政策的经济民族主义的发展，具有表示国际间的良好愿望和经济合作的华丽言词，这种发展既来源于这一分歧，却又加强了这一分歧。

然而，罗斯福采取谨慎态度的主要原因在于未来而不是过去。1936年的大选日益逼近，在这个时刻，他不愿去冒不必要的风险。重要的是，罗斯福和麦肯齐·金在华盛顿签订了一项贸易协定——一项颇有节制的条约后，1936年4月写信给金说：“从一种意义上讲，我们两人都在拿政治生命冒险。……”为了重新当选的近期目标也就是最高目标，他希望，领导的重担以后可以再挑起来。

第十四章 1936年：反法西斯联盟

《纽约时报》的安妮·奥黑尔·麦考密克在研究外国领导人的时候，发现他们在这段困难的岁月里憔悴了，衰老了。她写道：“紧张和焦虑在墨索里尼、希特勒、斯坦利·鲍尔温，甚至走马灯似的法国政府首脑的脸上刻下了无法抹掉的岁月痕迹。如果他们只身独处，乘他们不备时你看，他们显得疲惫、困惑，他们为掌权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罗斯福却不是这样。麦考密克夫人回国后惊异地发现，在他主持下发生的巨大的变动对他影响很小。“同他的前任们相较，总统职务在他身上留下的痕迹之少，谁也难比。他稍微有点发胖，头上有几缕银丝；除此而外，他比宣誓就职时显得更结实更健康了。他的面孔晒得黝黑，眼睛更加碧蓝明亮；从上次竞选运动以来过了四年严峻考验的年头，这双眼睛比过去更敏锐、好奇、友好而深不可测。”

如果说其他领导人被权力的重担压弯了腰，罗斯福却是满腔热情，轻松地挑起了他的担子。他喜欢当总统，而且几乎总是给人以胜任愉快的印象。他兴致勃勃、热情洋溢地执行着总统的各项任务：向塔利小姐口授致友人和下属的简短的短信，在白宫游泳池里溅水，让兴奋的记者们照像；办公桌上摆满了难以想象的华而不实的小玩意；接见印第安人、童子军、商人、穆斯社人，4—H俱乐部领导人、民主党妇女等派来的代表团；对同他共进午餐的客人讲家族祖先的长篇轶事；用几十支钢笔签署国会通过的法案，又认真地把每支用过的笔赠送给一本正经地站在总统大椅子背后的国会提案人；温和地和国会领导人，各机构的首长、党魁、外国使节商谈问题；同记者一边开玩笑，一边巧妙地应对他们提出的问题。

总统职位带来各种各样的多面任务，需要一个能胜任多种角色的人物来承担。罗斯福满怀信心而又轻易地从一个角色转为另一个角色。他是一个多面手。在主持他的应急机构的领导人的会议时，他是个精明的行政长官，有条有理地指挥着蔓生的官僚机构，耐心地教育他的下属要认识到行政管理的现实政治。在纵帆船上接待客人的时候，他无比亲切可爱。在民主党的会议上致词时，他又是个富有战斗性的领袖，果断、有魄力、自负，口气是武断的。在海德公园的森林中坐车游览时，他又是个乡绅，轻松，随便而又质朴。戴着高帽身穿晨礼服出席哈佛大学建校三百周年纪念会时，他则是国家元首，威严，庄重，令人敬畏。

在罗斯福的第一届总统任期期中，约翰·根室参加了罗斯福举行的一次招待会，他注意看总统的表情，对他以不可思议的灵敏更换一系列完全是戏剧性的姿态十分诧异。根室说，在二十分钟里，罗斯福脸上就显示了惊讶、好奇、仿佛受惊、真感兴趣、担心、说话故弄玄虚、半吞半吐、怜悯、决心、开玩笑、尊严以及无与伦比的魅力。当记者对罗斯福的话哄堂大笑时，他对自己听众的反应显然是满意的；这一阵笑声过后，总统把他那巨大的头颅向前略倾，表示感谢。

在表演所有这些角色时，罗斯福给人的印象是坦诚和朴实，而这些也正是他赢得人心的原因。有一天早晨，伊克斯被引进了总统的卧室。伊克斯发现他在卧室隔壁的盥洗室里刮脸。罗斯福请他坐在梳妆台前的凳子上，他们就这么交谈。随后，总统坐着轮椅回到他的床上躺下，人家服侍他穿衣服的时候，还在继续谈。他带上腰部支撑去接见一个代表团，接着回到房里取下那副支撑，重又休息。那天晚上，伊克斯感叹说，“我对这个人的朴实无华和魅力再一次深为感动。”然而这种表面上的朴实具有很大的欺骗性——伊克斯自己后来发现了这一点。

随着第一届任期最后一年的到来，政府工作人员注意到罗斯福的政治态度有些不同，而且对他自己控制的力量部署也作了一些改变。豪在4月份去世了，他直到去世都始终没有认真对待罗斯福争取胜利地重新当选的庞大计划。道格拉斯、艾奇逊和其他大多数保守派早已背离他了。到1936年，原来智囊团里的右翼人物只留下一个莫利——而且这个头发斑白焦虑不安的教授也呆不长了。有好几个月，他怀着日益警觉的心情观察着新政向左转。莫利忽而被罗斯福的魅力所折服，忽而又因为他的政策而痛苦，就这样勉强呆到6月的一个晚上。那一次在一个人数不多的聚会上，总统开始对他的新保守主义说了一些伤感情的话。莫利激动地予以反驳，

两人愤怒地吵了起来，原有的关系就此断绝了。

白宫里新面孔接替了老的。斯坦利·海伊，一个举止文雅、戴眼镜的青年人，他的宗教背景使他有可能向总统提供白宫里那些比较不虔诚的助手们称之为“灵感性的启示”。汤米·科科伦，一个粗鲁而又引人注目的律师，才三十六岁，他以讲笑话、唱爱尔兰民谣和摹拟表演而成为白宫内廷的幸臣。他的这种身份似乎不符合他越来越高的地位：他是政府内部意志坚强的牵线人，政客和官僚的操纵者。还有科科伦的“砂金孪生兄弟”本·科恩，一个不务实际的知识分子，在制订新政立法和处理法律细节上表现了卓越的才能。还有一些人在白宫的水银灯下进进出出，如昙花一现：罗伯特·H·杰克逊，威廉·O·道格拉斯，伊萨多·卢宾——这些人都是在一种变动着的社会秩序中有战斗性的法律和经济专家。

总统对他的智囊团控制得并不很紧。它的成员基本上就构成了他的立法、宣传和竞选班子，然而他始终没有把这个班子正式地予以制度化。他在需要的时候随时向各机构调人。总统的工作是在能抓就抓的慌乱情况下进行的，如召集人事会议，突然打个电话，在主要顾问之间传递小纸条等等。这个智囊团里最重要的成员仍然是埃莉诺·罗斯福。她不仅到处旅行，并在报上连载“我的一天”专栏，借此同百万群众进行联系，而且还不断地把一批批新人和新思想带进白宫。

不过，要是只突出这不到十名的白宫人物，那就可能抹煞了1936年在建立政府机构中起了重大作用的其他人物。因为，随着党代表大会和竞选日期的迫近，罗斯福显然是要把新政的执政者和按字母排列的各机构给美国带来的新福利和新希望作为竞选的基础好好拼一回。

政治成就

也许是因为罗斯福很明白新政给人民带来的基本上是好处，因而他对重新当选十分乐观。1935年11月，他对他的内阁讲：“明年我们要取胜并不难，但是我们要把这场竞选变成一场十字军东征。”他的乐观情绪一直延续到1936年头几个月，也许还会继续下去。因为新政纲领，部分出于有意，部分也是偶然，在大选之年达到了顶峰。

几乎一切考验都表明，1932年以来的经济高涨是十分乐观的。失业从1933年初的低点开始，减少了四百万左右；至少提供了六百万个工作机会。从1932年起，制造业的工资名单人数增加了一倍。股票价格增加了一倍多。1936年的工商业界倒闭厂家数目只有四年前的三分之一。1932年农民的全部现金收入锐减到四十亿美元，1935年恢复到了将近七十亿。

自 1933 年以来，资产增长了六倍。工业产量几乎翻一倍。

1936 年总统写信要求各机构负责人把他们的成绩详细统计上报，以便竞选时使用，他所收到的回答都强调新政在这一高涨中所起的重大作用。联邦和其他救济机构在三年期间大方地花了五十亿美元去执行工程计划并实行有关救济活动。另外还有四十亿美元用于公共工程：修道路、筑堤坝、开沟渠、进行公共建筑等等。农业调整署通过直接福利和偿还租让给农民等措施提供了一大笔收入。从胡佛政府接管过来的一个主要机构，建设金融公司，加紧了它的巨额贷款活动。

最重要的是——这是从长远看——社会保险计划，这在 1936 年开始执行了。其主要项目是关于失业和老年保险，还有一个小笔拨款用于公共卫生防疫。这项计划由所得税提供经费，开始税低率，过几年再提高。1936 年社会保险刚开始搞，数量也很少。福利不多，而且必须经过一段时间才能得到。政府的困难也很严重。因为钱是募来的而不是分配。这项计划在 1936 年产生的是紧宿通货的作用。然而，日益突出的事实是，联邦政府终于采取行动为美国人民未来的安全加强基础了。

新政的一个令人瞩目的方面是，它所援助过的团体范围广泛而且种类很多。受益于新政慷慨帮助的不仅有千百万农民和产业工人，还有归于其他方面的大批人。小产业主贷款公司做了大量援救工作，向抵押了家园的小产业主提供了一百多万贷款。工业进步署不仅使蓝领工人有工作，而且也使艺术家、作家、演员、教师就业，担任了充分照顾其自尊心的工作。全国青年署帮助了成千上万经济困难的中学生和高等院校学生继续求学。老人们可以指望获得他们的养老金。银行存户的存款安全有了保障。商人因为同政府签订的合同，提高了购买力和放宽了贷款的政策而得到了好处。

在冰冷的统计数字后面是一幅全国生气勃勃的景象。罗斯福和他的新政的影响就是唤起了被萧条的气氛所压抑的精力和雄心。对他们来说，新政不仅是一张数字的清单。它意味着一群农民在密苏里州的奥扎克高原架起电线。它包括着加利福尼亚州巍峨的大坝，科罗拉多州灌溉渠道的水闸，泽西市的一个医院，赫得逊河底隧道里来来往往的汽车。它意味着匹兹堡人们峰拥回去工作，俄亥俄州的一个寡妇得以维持生计，芝加哥的黑人看着贫民窟被拆除。它意味着乔治亚州的山头上种草保持水土，艾奥瓦州农民买了新拖拉机，田纳西州的河水清澈透明，川流不息，而过去这条河因为挟带着上游冲刷下来的大量表土泥沙而阻塞。

新政给人带来了新的生活条件；不仅如此，它还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带来了新的条件。过去那种工人对雇主、贷款人对抵押者、农民对托运人和中间商、佃农对地主、小商人对银行家的卑下态度可能大约还存在；然而新政的法律和新政的精神逐渐给这些关系灌输了美国人早就梦想的种种平等和自尊。1936年4月，罗斯福对一些青年民主党人说：“朋友们，社会创举还刚刚开始。”这种调整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创举是怀着热情——而且总起来说——是怀着善意进行的，而不是在痛苦和报复气氛中实现的。在某一场合下，罗斯福还能说这样的话：“美国再一次呈现了一派令人兴奋的气氛。”

当然，新政造成的转变过程中也存在严重的弊端。尽管到处在谈重新就业，但1936年美国还有八、九百万人没有工作。新政花去的钱没有明显地改善政府不易影响到的那些地区里上百万人的处境。工资额是增加了，但生活费用也高了。同1933年初相比，情况是改善了，但要同1929年相比则不是如此。某些计划，尤其是住房建筑计划，并没有顺利进行。在新政的大部分临时机构中，有一种随便凑合、浪费人力、效率低下的问题。而且，尽管新政的哲理是扩张，但对农民的纲领却基本上是限制性的。

然而，在1936年，这些事只有留待共和党去分析了。总统对他自己要起的作用确信无疑。他要宣扬新政的成果，要说明更好的日子还在前头。那就是要反复宣告1933年3月他看到的美国同1936年的美国是鲜明的对比。他决不允许冲淡这种对比的鲜明性。1936年初全国应急委员会向罗斯福提出一份统计表报及说明，暗示经济复苏是在1932年开始的。厄尔利指出这个说法根本不能接受。这份报告必须改补。

他写信告诉全国应急委员会：“总统坚决认为萧条的低点要定在1933年3月，或1933年初——其理由是明显的。”

在海德公园，总统站在他的专车平台上，这时人丛中突然发出清脆的喊声：

“老板，你现在是面对着大伙了。转过身来对着他们吧！”

罗斯福得意洋洋地摇晃着脑袋。也大声对答：“说的有道理。”

但是有多少道理呢？总统真正面对大家了吗？利用政绩，凭借日益增长的繁荣趋势来争取连选连任，这就足够了吗？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就可以采取守势，聚积力量到大选日再出来角逐。或者，这一战役还必须费一把劲才能获胜吗？假若如此，前面就还有一场艰苦激烈的战斗。

1936年的头几个月里，罗斯福全神贯注对付这个主要策略问题。并且，根据他的特点，他还是在两种策略之间徘徊，有时候甚至同时并用。

总统在年初似乎决定要搞防御性竞选。白宫传话给国会说，这一届国会时间不要长，集中解决拨款问题和通过日常的行政立法。一项调整接受政府合同企业的就业情况法案通过了，这是填补全国复兴法废除后所留下的空白。最高法院关于农业调整法的决定迫使国会通过一项新的农业提案，并且间接导致总统提出一个有争议的提议，即要征收社团盈余税以补偿国库的损失。但是总统既没有大力争取通过这项新税收，也没有大力争取实现有效的住房计划。他好像就准备依靠他已有的政绩了。

从政治上看，这种策略包括着把党的调子放得低些，并进行一些补偿的工作。民主党抱怨罗斯福几乎不提他的这个党了，甚至在杰斐逊纪念宴会的讲演里都没有提。3月，罗斯福想安慰一下商人，在白宫为商业部长罗珀的商业顾问委员会成员举行了一次为时很长的宴会。他又谈到削减开支，并且提出了在即将到来的选举中把商人组织起来的计划。他指示伊克斯召见诺里斯、约翰逊和其他共产党人以改进进步联盟。

野心更大的计划是要争取全国广大的宗教界、经济界和市民组织中的选票。美国政治基本上是集团政治。罗斯福的特点就是通过这些集团的领袖靠近这些集团。他成立了一个新组织，名叫“善邻联盟”，从名称上看，也无不好的内涵。斯坦利·海伊请求使用这些人的名义，如拉比·拉扎勒斯这样的宗教界领袖，铁路兄弟会的乔治·哈里逊这样的劳工界领袖，乔治·福斯特·皮博迪这样的市民组织领袖，丽莲·瓦尔德和嘉莉·查普曼·卡特这样的妇女界领袖。这个由虔诚、希望和争取女权运动这三方面力量组成的组织，表面上中立，没有党派色彩，其实是罗斯福争取选票的最好工具，其经费实际由民主党全国委员会负担。

4月末，罗斯福似乎还未下定决心究竟用“联合”十字军，还是依靠一党的战斗向反对他的商业集团发难。到暮春时节，策略一改，转而在答应扩大新政的基础上进行政党竞选。到5月初，他在暗地里谈话中抨击商业界和新闻界反对他，而且断言，他欢迎他们对他仇视。他在同莫利的最后一次长谈中，曾经说，现在国家需要的是，少作空谈和制造阻碍的批评，而要多一些的领导。

这个变化主要原因在于政治发展。到5月，共和党人在汇集力量，要在克利夫兰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更重要的是，在追求共和党总统提名的过程中，共和党有一个候选人显然已经展露头角。此人是阿尔夫·M·兰登。他是堪萨斯州长，一个成功的商人，他既不属于共和党的老卫士，也不属于共和党的自由派。他所具有的品质就是相信常识，才干一般，谨慎的自

由主义和磐石般的“稳健”，共和党领导人希望他的这种品质对于他们认为已经厌倦了白宫里丑角和英雄的人民具有魅力。不管根据什么标准衡量或从哪个方面来看，他都是个中产者，长得精明正直，戴着无边眼镜，头发稍带花白，这使他在上百万的其他中年人并不显得突出。在克利夫兰党代会上第一次投票中，兰登就可以压倒多数胜过了博拉。

此后把兰登当作笑料成了时髦的事。然而在1936年6月，这对民主党可不是开玩笑。仅此一事即非等闲：兰登在争取提名中大获全胜，盖过了博拉、范登堡和其他一些强有力的候选人。此外，共和党眼看现任总统身孚重望，新政带来的繁荣和改革又有明显的吸引力，于是就提出了一个温和的自由政纲。兰登本人不是什么反动的老古董，1912年他放弃了老卫士支持公麋分子，1936年他又以大胆提出他对该党政纲中某些要点的看法，使他自己显得比共和党要左几分，这就给全国以深刻印象。在1936年在末，尤其无法估量的是，同新政分道扬镳的阿尔·史密斯和杰斐逊派民主党的暗在影响。据说反对新政的民主党人也许要建立第三党。

面对保守派的这种动员，罗斯福发现库格林、汤森和朗等人的力量在别的地方仍在对他折磨。休伊·朗于1935年9月已在他那个州的州议会里被人暗杀，但这个路易斯安那州人在全国各地的追随者并没有因为他被暗杀而分裂。朗的一个组织者，一个名叫杰拉尔德·L·K·史密斯的相貌英俊、能说会道的路易斯安那州的牧师自告奋勇出来稳定局面，同全国各地保持联系。到1936年6月，这个拼凑起来的三家店要联合来成立一个联合党。他们联盟的唯一基础是仇恨罗斯福，认为罗斯福一旦失败，那么对于他们自己在以后的选举中的处境就会有利。

这种左右夹攻使罗斯福的威望在1936年6月突然有点下降。显而易见，他那敏锐的政治耳目已经觉察到了这点。6月初，最高法院对纽约最低工资法一案所采取的极右态度也许对于罗斯福也有所影响。总之，反对派的势力已经使他看到，他必须开展一个强有力的竞选运动才行。但是在一段时间里，罗斯福对于下列问题没有作出诺言：是否扩大新政？是否开展一场党派竞选运动？他对这些策略问题迟迟不作决定和方法是利用他的总统身份。

他对莫利说：“在这次竞选运动中，争论的焦点只有一个，那就是关于我自己。人民必须表态：究竟是支持我还是反对我。”

“我接受这个职责”

像所有的党代表大会一样，民主党在费城的全国大会也有它烟雾弥漫

的小房间——但这回却是一百五十英里以外白宫里总统的书房。罗斯福一直支配着大会的进程。政纲是他起草的，主要发言须经他过目，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主要决议由他定稿，而且还以他的接受提名演说把大会引向激励人心的顶点。

政纲当然是对新政的一连串的溢美词。有一条政纲反映了罗斯福的一项重要决策。讨厌的最高法院问题很不好办，若不以明文规定要求修改宪法，放宽国会对经济问题的权力，就得对这个问题保持沉默，或者——假设总统仍未形成他七个月后要向国会提出的计划——就只能肤浅地谈一下。在各种相互矛盾的建议的包围之下，罗斯福选择了泛泛而谈的办法。在提出全国性的问题要求采取全国性的行动以后，政纲谨慎地说：“如果这些问题不能由立法机关在宪法范围内有效地解决，我们就将寻求对宪法作出澄清性的修改，”以让州和联邦的立法机关在它们各自的权力范围内，通过恰当的法律去整顿商业，保护公共卫生和安全，并且也维护经济稳定。“由此，我们建议要维护宪法的本文和精神。”

不过政纲宣言是一个非常坦率而雄辩的文件。“我们认为下列事实是不言而喻的——一个现代文明国家的政府对它的公民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其中包括（1）保护家庭生活；（2）建立全体人民都有发展机会的民主制度；（3）帮助那些遭到困难打击的人们。”一方面在外交政策上模糊不清，另一方面在内政上则强烈呼吁继续并扩大新政。也许最能看出罗斯福当时的战斗思想是，就在这句话里许下了这样的诺言：“在我们的国土上消灭绑匪、强盗和巨富中的作恶者。”经过决议委员会的热烈争吵后，在罪犯和“作恶者”之间加了几个字，又加了一个句号，但仍然保持在同一段话里。

这一个句号之争颇能反映这次大会的进程。代表们没有任何要决定的。法利使这个大会开了五天。部分是由于他想使那些捐献了二十万美元使大会在这个兄弟之谊城市——费城——召开的本城商人认为他们的钱花得值得，部分是由于他看到让人们一连几天在广播里听民主党的宣传有好处，还有一部分原因是罗斯福希望象四年前一样在星期六晚上发表他的接受提名演讲。时间都浪费在冗长的演说、严肃的礼仪中了。代表们感兴趣的是唱歌，看种种噱头，以及目睹一伙艾尔·史密斯民主党人因为高呼他们崇拜的党魁名字而被撵出会场的情景。

但是这次大会确实也做了一个包涵着重要性的决定。总统仍然决心废除关于提名必须三分之二多数的规定。贝内特·钱普·克拉克是 1912 年成

为这项规定牺牲品的那个人的儿子，他对于自己能提议通过多数裁定原则而感到骄傲。南部人士因为获得关于增加他们地区的大会代表人数的保证而平静下来，只是随便地反对了一下。但是那位得克萨斯州州长却极力怀疑这项修改对 1940 年的影响。

到罗斯福的邻居约翰·E·马克在提名时提出总统的名字时，大会变成了一个政治狂欢会。马克说：“由于我们做好了战斗准备，由于我们拥有公正、权利和进步，所以我们准备在一位美国伟人富有才干的领导下采取更多的行动。而这位伟人就是我向你们提出的这位总统候选人，他已不再是一个州的公民，而是全国四十八个州所热烈拥戴的候选人，他的名字就是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在说出这个具有魅力的名字引起的高潮后，整个会场进行了长达一个小时的政治示威游行，代表们来回走动，热烈欢呼，喊哑了嗓子，他们挥舞旗帜，吹号角，高声呼叫，吹口哨。

总统候选人自己的兴奋劲儿一点也不亚于这些群众。他在电话里对马克大声说：“约翰，你真行！你已把评判者们掌握在自己手里——真棒极了。我希望他们能对你的委托人作出有利的裁决。行呀！你的嗓子好极了。从广播里听起来非常动听。简直了不起——”

当那些支持提名的发言平淡地继续进行的时候——这类发言人不下五十六位——罗斯福正在最后修改他的接受提名演说。这篇演说要给竞选定下主题。罗斯福又一次面临着这个问题：是做一个面向各个集团的甜言蜜语的轻松演说呢，还是做一个对本党群众讲话的派性演说；他又一次不能决定。开始时，他要莫利起草一个讲稿，强调团结合作的主题；后来他又让罗森曼和海伊搞了一个罗森曼本人以后称之为“强调经济自由必要性的、战斗的、赤手空拳的声明。”就在他被提名的前夕，当费城党代会上党内好斗分子发表了那些准备战斗的演说还在他耳边回响时，总统起草了一个草稿——次日一早他对记者们说：“作为一个爱讲和平的人，我觉得这个稿子太糟糕，我自己也不满意。”这篇讲稿里仍然有甜言蜜语和轻松，但也有别的主题。

星期六晚上，费城为了接待总统，进行了隆重的布置。“富兰克林运动场”的长板凳上坐满了人——多达十几万。天刚下过雨，但等到罗斯福乘的黑色大轿车慢慢驶上坡道，开到看台后面用帷幕隔开的地方时，繁星已在片片浮云间闪烁。总统微笑着从帷幕后面迈开他僵硬的腿慢慢往台前走。突然，他在周围的人丛中看到了那位须发雪白、和蔼可亲的埃德温·马卡姆的脸。总统正探身去握这位老诗人伸过来的手，不想身子失去平

衡，摔了下去。人家把他扶起来的时候，他的脸色苍白，浑身发抖，立刻就说：“给我拍打干净”。

不过，他只是在那一会儿沉不住气。过了一会儿，等到帷幕拉开，总统站在那儿——沉静、挺直、面带笑容。群众中爆发出疯狂热烈的欢呼。

罗斯福开始演讲时，很有分寸地谈到全国的统一。“我到这里来，不只是作为一党的领袖，不只是作为总统候选人，而是作为一个在很多关键时刻已被赋予重任而且仍然承担重任的人。”他既感谢他的民主党党员，也感觉其他党的党员在克服萧条中所做的无私的和没有党派偏见的努力。

“最近这几年的时光美国是难以忘却的，同时它也不会忘却，拯救国家于危难不只是一个政党的任务。这是我们大家共同关心的事业。我们一同努力，把我们的力量联合在一起，应用合乎人间情理的古老法则，一起度过了危难。在那些日子里，我们畏惧的是畏惧本身。……我们现在已克服了畏惧。”

总统的声音在温暖的夏夜里清晰地回响。“但是，坦率地说，我不能对你们讲现在一切都好了。猜忌的阴云，恶意和偏执的暗潮在许多地方出现。”甚至就在美国，如果美国人要维护华盛顿和杰斐逊曾经为之努力的政治和经济自由，现代文明的激流已提出了必须正视的新问题。1776年7月4日在费城消灭了政治专制。但是威胁着我们美国人的经济专制却出现了。

上百盏聚光灯使得总统在他周围黑暗中坐着的群众眼里更显得令人敬重。“这些在新的经济王朝里享有特权的王公们，渴望掌握权力，现已伸出手去，想要夺取对政府的控制，这是很正常的，也许是合乎人情的。他们创立了一个新的专制制度，却给它披上了法律认可的外衣。暴发户们想要把人民、人民的劳动以及财产组织起来为它们服务。最终，普通老百姓又一次面临着独立战争时期摆在民兵面前的问题。……”

“经济秩序的保皇派已经承认政治自由是政府该管的事，然而他们认为，经济奴役谁也管不着。他们不反对政府可以保护公民的投票权，然而他们不承认政府可以保护公民们的工作权利和生活权利。今天我们保证遵守下列这个原则，即自由不是一个两者各半的问题。假使普通老百姓在投票站保证获得平等权利，那么，他在市场也应当有平等机会。”

罗斯福的声音越来越有力。“这些经济保皇派抱怨我们要推翻美国的体制，但他们实际抱怨的是我们要取消他们的特权。”听众欢呼表示拥护。“我们既然忠于美国体制，那就要推翻这种权力。他们试图用国旗和宪法当做虎皮掩护自己，但这也是徒劳的。”罗斯福的话冲破了欢呼声：“我们

要民主不要专制……要自由的不要屈从……反对暴民统治和超特权阶级的独裁……这些就是我们国境内的死敌……”

罗斯福放低声音说。“政府可能犯错误，总统肯定会犯错误，但是不朽的但丁告诉我们，上帝的审判是把冷酷者的罪过和热心人的罪过放在不同的天平上称量的。一个慈悲为怀而偶犯错误的政府比一个铁石心肠一贯冷漠的政府要好得多。

“人间世事也有一种神奇的循环往复。对一些世代给予很多恩赐，对另一些世代则寄以很大希望。我们这一代美国人正是风云际会。……”

罗斯福抬眼凝望群众。

“我接受你们给我的使命。我要同——”

一阵欢呼声响彻整个体育场，淹没了最后的几个字：“同你们在一起。战斗不停，我决不后退。”象一个职业拳击师，罗斯福握着双手高举过头，然后又抓住约翰·加纳的手。总统慢慢地走回到他的轿车。在兴奋的群众的热烈欢呼声中，他绕场两周，最后他的轿车消逝在夜幕里。……

罗斯福从舞台中心回到了边厢。他发表了两、三次“非政治性的”献身演说。接着象一位总统所能享受的那样，摆脱一切杂务，隐藏起来，乘军舰沿新英格兰海岸一带游弋了两个星期。总统的假期在时间上经过认真安排。他完全心甘情愿地让共和党人去占领舞台；他自己的机会以后自会到来。他在给加纳的信中说：“在这场比赛的现阶段，共和党的最高司令部说得太多了。”

其他人却不象他这么镇静。看到兰登在报纸上越加锋芒毕露，伊克斯抱怨说，民主党的竞选运动已放任自流，而总统也正在自找失败。埃莉诺·罗斯福警告说，兰登的竞选总部行动迅速。没有罗斯福的直接安排，事情弄得一团糟，以至连厄尔利和海伊都感到不安。伊克斯抱怨说：“总统倒是笑容满面，又航行又钓鱼，而我们这些人却又担心又生气。”

总统当然能笑能乘船巡游了。从广义上来说，他从宣誓就职那天就一直在竞选连任，而且他在被提名前好几个月就已开动他的竞选工具了。他召回许多驻外使节来支持竞选；他给他们分配了宣传任务，包括准备一本《州长兰登的生平》，书中把这个堪萨斯州人描绘成一个恳求联邦政府救济的人；他已经指挥成立了象“善邻联盟”这样特殊的竞选集团，批阅了竞选小册子，帮助李曼重新被提名当州长来增强整个纽约的竞选班子；他命令他的竞选助手不要提任何共和党候选人。法利忘记了这最后一条禁令，提到那个共和党候选人时说他是个“典型的草原州”的州长，总统把他狠

狠地责备了一番。总统在给法利的信里指出，如果法利说“那些壮观的草原州之一”倒也无所谓，但是“典型的”一词出自一个纽约人之口，肯定是太抬举反对党了。

费城大会后又过了几个星期，法利使竞选总部在纽约积极开展活动了。全国主席给二千五百名民主党在各地的领导人发出信件，要他们对本地区形势做出评价。法利打指示说：他要的是真实情况。他就是根据这些材料和后来的估计才对大选结果做出了出色的准确判断。

法利建立了一般的竞选部门，包括商业界、退伍军人、外国语等等。民主党人特别关注劳工。刘易斯和产联其他领导人组织了劳动工非党同盟，一个在工业中心地区为罗斯福拉选票的接地气道的党派代理机构。它对竞选最重要的贡献可能是一笔五十万美元的捐款。在刘易斯的产联与劳联裂痕日益扩大的形势下，民主党人谨慎小心，不让他们与劳联的良好关系受到影响。政府官员暗中运动劳联领导人至少在 11 月以前要维系劳工队伍的团结。罗斯福同格林保持密切联系。这位劳联领导人造访海德公园后公开答应百分之九十的劳工选票会投给总统本人。

盛夏，就在法利组织党的竞选运动的时候，就在兰登和他那劲头十足的竞选伙伴富兰克·诺克斯在国内到处游说的时候，总统本人保持着超党派的姿态。事实上他紧密关注并指挥着竞选工作的各个方面，甚至连竞选小册子用什么样的纸张，什么颜色他都过问到了。但是，在公众面前，总统好像却在忙于总统公务。当然，作为总统，他可以继续利用已有的政绩。他把邮政局长列入文官条例管辖之内，借此回击共和党人批评民主党实行政党分赃制。他先发制人，成立了一个农作物保险委员会来保护农民不受农产品过剩的害处，以之对付兰登就农业问题发表的意见。

罗斯福作为总统也可以发表非党派性的声明，而且只会引起广大群众的好感。这样一种情况就是他在肖托夸发表的演讲。他说：他曾亲眼看见过战争。他曾看见过陆战，也看见过海战。他看见过伤员们流血。……他憎恨战争。他小心翼翼地绕过危险的政治暗礁，回到他的老方式，如回避象国联之类所涉及的政治许诺，但却警告说，只要世界上任何地方发生了战争，爱好和平的国家就可能被卷进去。他还说：“他曾经花去无数的时间而且将来也会花去无数的时间，考虑和盘算怎样使我们这个国家免于战祸。

大自然也给这位伪装超党派的总统帮了忙。1936 年夏季，从加拿大一直到得克萨斯一线大片土地干旱，颗粒无收。炙热的骄阳无情地晒干了溪流，枯死了禾苗，罗斯福决定出去“看看”。记者们问道：“视察旱情还能

有什么政治吗？”总统诚心地说：“不论哪个政府只要想把人类的痛苦同党派政治联系起来，那就会大大地损害这个政府的适当治理。”

这次巡视在政治上是极其成功的手段。总统在九个州发表了几十次不提政纲的演说。他会见了上万的选民，上万的选民也见到了他。他绝口不提竞选，只是即兴开玩笑时例外。而且他闭口不谈共和党对手。但是他经常拿他在1932年见到的情景同他现在看到的情景加以对比，甚至在干旱灾区也是如此。只是在这位政治家同地方官员开玩笑、谈政治的时候，巡视专列火车才带上竞选专车的色彩。罗斯福本人几乎好象有些神奇的力量，他巡视旱灾区时，一再使天降甘露。

然而这也是一次工作巡视。总统有机会同几十名联邦和地方官员交谈。在他德摩瓦内同州长们——包括堪萨斯州长——开会的时候，这种情况达到了顶点。召开这次会议也是为借农业救济问题把兰登带到“现场”，然而这个堪萨斯州州长有他自己的主张。罗斯福为了这次会面，曾仔细地听取了仔细的情况汇报。兰登在谈到某一点时说道：“你不会记得1933年你邀我到华盛顿，我们第一次谈话——”

罗斯福插话：“谈水的事？”

兰登说：“我很惊诧你不记得。”

总统遇到的主要困难不在兰登，倒是在奥克拉荷马州那位讲话坦诚的州长恩纳斯特·马尔兰。奥克拉荷马的旱情最严重。最后，这位奥克拉荷马州州长问道：“总统先生，明天我们回去，怎么同那十万饿的农民交待呢？”

“你就对他们讲，联邦机关正紧张地尽一切可能迅速处理。……你可以在一周内做成一些事，然而你无法做成非人力所能办到的事。”

“这对于饥饿的农民绝不是什么安慰，”这位州长固执地说。

“然则，你还能跟饥饿的农民说什么呢，州长？机器要尽快地转动，但也只能快到上帝所允许的程度。”

刚刚开始的战斗

赫伯特·贝阿德·斯沃普8月间写信给罗斯福说，在这个战役中，精明的手段是，“坚定而不野蛮，友善而不谈，充满希望而不悲观，富于人情味而不要太讲经济，坚持人人有出头的机会，而且，最重要的是，使人人都明白你是全体人民的总统……。”

罗斯福答道他完全同意这个话。”9月，当全国人民和政客们都在等待这位竞选老手开场的时候，罗斯福继续摆出一副无党派偏见的姿态。他对全国谈自然资源保护问题，对一次世界列强会议谈“人类工程学”的问

题，对“满足人类需要动员大会”、在全国集邮家大会、哈佛大学建校三百周年庆祝会等等场合发表演讲。在哈佛，大学生们他，但是他的一席话却把那些高潮的共和党校友也说得笑了起来。他说：“那个时候（指一百年前），哈佛的许多校友为全国的形势感到十分担心。安德鲁·杰克逊当时任总统。哈佛学院建院二百五十周年时，校友们又很担忧。当时是格罗夫·克利夫兰任总统。”停了一会儿，又说：“现在呢，三百周年校庆，我任总统。”

但是，总统对竞选运动仍不介意，不理睬共和党人和他们的攻击。一个记者开玩笑地问厄尔利：“斯蒂夫，你说，这次竞选会不会成了一个非政治性的运动？”

法利却不能推出这种高姿态。作为民主党力量的组织者，他是共和党冷嘲热讽的对象。天天有人批评他利用救济性工作和公共基金收买千百万张选票，攻击他经营民主党庞大的分赃机器，攻击他漠视邮政。共和党人是希望他们的子弹能掠过法利，击中罗斯福。但是，更可能的是，他们攻击这位邮政部长的连续的猛烈炮火却只是给罗斯福帮了忙，使他采用了凌驾于这场斗争之上的手段。

法利最大的困难，与其说是来自共和党人，倒不如说是来自民主党人。1934年罗斯福采取照顾两党的态度，使得民主党在六个州里处于分裂瓦解、怨声载道的状态。威斯康星州的民主党人警告法利不要再让政府向进步党人让步，他们选择了一位州长候选人同菲利普·拉福莱特抗衡。仍然控制着加利福尼亚州民主党组织的“结束加利福尼亚贫困会”对于成立第三党的想法未曾认真地考虑，但现在对罗斯福的支持也并不赞成。明尼苏达州的农工党人曾公开指责新政，然而现在已一致支持罗斯福，使民主党的一些派别遭到失败。恼火的民主党人只好迁怒法利，向他这位党的领导人要求全国性组织给予支持。

爱达荷州的形势可以作为法利面临的问题的一个典型。参议员博拉和罗斯福双方的朋友们有意扰劝法利撤回政府对博拉的民主党政敌的支持，作为这位爱达荷州参议员拥护罗斯福反对兰登的交换条件。爱达荷州民主党内反对本党提名的一派也支持做这笔交易。博拉也愿意合作。然而，法利告诉中间人，民主党的那位候选人坚决要争取。博拉在罗斯福和兰登之间还没有决定态度。

另一个亲罗斯福的非民主党参议员是内布拉斯加州的诺里斯——诺里斯是罗斯福特别亲信的人。1935年下半年，总统曾建议诺里斯再次参加

1936年竞选，然而这位内布拉斯加的白发老人却让初选大会结束而没有登记作候选人。他抨击共和党1936年的政纲，同共和党内重要成员断绝了联系，而且他继续攻击重要的民主党人包括法利搞党内分赃活动。然而他出来支持总统。这位参议员声称：“罗斯福就是民主党的政纲。”1936年夏末，他的几千名拥护者推举他做无党派候选人，诺里斯于是就同两党的正式候选人分庭抗礼人。民主党提名的候选人特里·M·卡彭特号召他本党的全国领导人支持他，但是毫无结果。对卡彭特来说，情形更加不妙的是，这个州的民主党主要领导人都出来支持诺里斯，反对本党候选人。卡彭特只有盼望罗斯福保持沉默。

总统在筹划他10月中旬的竞选活动时，对处理这类州的形势问题，仍然使用了他那种多面手的才干。他完全不干涉加利福尼亚、威斯康星和爱达荷等州，从而回避了这些州的敌对派别。他计划去明尼苏达州，然而在他到达以前，当地民主党人已经被诱使撤回了他们那个州的候选人而拥护农民劳工党人，因而罗斯福到这个州来的主要任务就是抚慰那些感情受了伤害未被列入候选名单的民主党领导人。至于在内布拉斯加州，他则准备一反在别处的回避态度，清楚而坦率地表态。

9月底，罗斯福在锡拉丘兹的纽约民主党大会上发表了一篇演讲，从而揭开了他正式竞选的序幕。他利用这个机会回击库格林、赫尔斯特等人关于共产党支持新政的指责。曾有人劝总统以谴责苏联违反条约协议来回去这些抨击。然而他确信只要发表一个断然声明也就够了。他声称：“我不曾寻求，现在也不寻求，而且也不需要任何共产主义或任何其他外国‘主义’的拥护者的支持，因为它们只是千方百计地想改变我们美国的民主制度。”他说，新政已经挽救了美国，使之免于1932年社会与经济崩溃所带来的共产主义威胁。自由主义保护了有远见的保守主义者，如果想保存传统，就实行改革吧！”

罗斯福尖刻地讥讽共和党人发表的那些“我也会这样做”的演说。“让我提醒你们，提醒全国人民，不要相信这种圆滑的遁词！”说到这里，罗斯福耸起眉毛，提高嗓门，几乎阴阳怪气的说。“当然罗，我们相信这一切都是该做的；我们相信社会保险，我们相信要使失业者就业，我们相信要挽救人们的家庭。凭良心，我们相信这一切措施，然而我们就是不相信现在政府对这些事情的做法。只要把这些事情交给我们去做。我们都会做，而且会做得更多，做得更好；最最最重要的是，我们做这些事，不要任何人花费分文。”

当罗斯福的竞选列车 10 月间慢慢驶过中西部的時候，他的进攻已经大概清楚了。他在列车平台上发表的谈话或在正式的演说中，再三强调三个简单主题：1933 年 3 月的情况和 1936 年 10 月的情况对比；新政在使国家摆脱衰退中所起的作用；美国人民——工人和商人、农民和消费者、州政府和全国政府——之间的相互依存。他用一些简单的例子把这些问题谈得恰到好处。

尽管总统有一次曾说：“他是在这里是宣布实行新政，而不是为新政辩护”，但令人惊讶的是，他在讲话中逐点答复了共和党人的攻击。他一再以如此简单的问题回答兰登攻击政府浪费和胡乱花钱的问题：“假如有人走到你面前说，‘跟你借八百美元，借了这八百美元，你的年收入要增加二千二百美元’，你借还是不借？”有个共和党演说家抨击他就象制造新汽车模型一样，一年制订一个农业计划。他接受了这个比喻，并且说，国家已经通过了 T 型农业经营法。查尔斯和玛丽·比尔德后来写道：“他的演说虽然不象韦伯斯特的演说那样洪亮和滔滔不绝，不象伍德罗·威尔逊的言词那样华美精简，但他那特有的散文体，尽管有时显得呆板重复，却往往闪耀着诗一般的热情，并且因为那些速度飞快的词句而显得生气勃勃。”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罗斯福在西行途中却避开未来的前景。他在新政的业绩上大做文章，但不拿新政许愿。他表明，如果他继续执政，新政还会扩大。然而这只是暗示而已。他的演说里充满了安抚商人、医生、甜菜种植者和其他人的言词。他几乎完全不提外交政策。

总统要表示坦白的时候，他总是做得很令人兴奋。这种情况例如他对诺里斯的许诺。总统在奥马哈发表讲话时说，在他自己的纽约州之外，他一直不参与州的选举事务。然而，对“我自己立下的这条规矩，我已做出——而且只要我活着——我将来还要做出一个有足够理由的例外。乔治·诺里斯的候选人资格是不受州和党的分解的限制的。”罗斯福直接呼吁欢呼的听众支持诺里斯再次当选。

罗斯福一直是一个轻松愉快的竞选人，他平易近人，机敏、随和、微笑着挥手致意，显然十分快活。在堪萨斯州的恩波里亚，他在人群中寻找拥护兰登的怀特编辑。总统亲切地说：“他要是在这儿就好了。每四年里有三年半时间，他都是我的一位很好的朋友。”

人群中一阵喧哗，怀特出场了。他一边登上列车后平台，一边故作惊讶地大声说：“别向我这灰白头发的老脑袋开枪了吧。”

“喂，比尔，见到你真是高兴，”罗总统说，接着他转身向人群说：

“现在我见到他了，我不想谈另外六个月的事。”这时两人握手，群众大笑，鼓掌声中，列车开走了。

两个大党间的阵容到10月底就分明了。联合党在十几个州里没有参加选举的机会，并且由于它那帮七拼八凑的奠基人之间的裂痕而分裂，显然站不住脚。库格林在联合党大会上脱掉了他那天主教神父的黑色外衣和黑色外衣和白色硬领，责骂罗斯福是叛徒，是骗子，所以搞得同人民很分裂。汤森10月间鼓动支持者们在那些不能选举联合党候选人威廉·莱姆姆基的州里，改选兰登。这个共和党候选人在一些城市里遭到不祥的嘘声和死寂的冷遇后，仍固执地大肆宣传他反对新政的路线。当然他对大多数报纸的支持和民主党人史密斯和戴维斯对新政的批评还寄以很高期望。另外，《文学文摘》在过去大选中搞民意测验是很准的，这次搞的民意测验表明，兰登肯定要胜过他的对手。

10月末，罗斯福出发到东北工业区去做一次为期十天的旅行。

这次旅行真是真正的凯旋之行，而不是竞选旅行。罗斯福本人说，这次旅行引起了“人们情绪最惊人的膨胀”，这是他从来没有见过的。罗斯福对伊克斯说，夹道欢迎他的人群简直出格了，他听到男男女女在欢呼：“他救了我一家”，“他给了我工作”。罗斯福乘着一辆敞篷汽车在整个英格兰巡回旅行，就连很有经验的记者对群众这种如痴如狂的热情也感到十分惊诧。夹道欢迎的人群不但在城里，就在郊外也是动辄数英里长。波士顿广场人声鼎沸，十五万人倾城而出。在康涅狄格州的各城市，这位候选人的随从人员——包括埃莉诺·罗斯福——几乎无法通过挤得人山人海的街道。在纽约市，罗斯福车行三十英里，没有哪一幢楼前人行道上不是挤满了人。

罗斯福向人群招手，同他们谈话，好象抓住了他的斗争精神。他的言词更锐利，他的语气更坚决。他在纽约许下承诺，说国家要制订立法改善居住条件。他在威尔克斯巴勒严厉地抨击那些“搞宣传战的雇主们”，批评他们把反社会保险法的小纸条偷偷装进工资袋里。他在布鲁克林说，有个任务尚待完成——摧毁“人们在机会与社会保险方面处于明显的不平等地位，这种情况不久以前使集团与集团间、地区与地区之间互相斗争。”

10月最后一天，罗斯福在麦迪逊广场公园里，面对狂热地颂扬他的群众，将他的竞选活动推向了热烈的高潮。

“……假如没有经过斗争就不会到达今天这一步，而且我敢肯定，没有斗争也别想往前迈进一步。

“在十二年的漫长时间里，美国曾被一个什么也不听、什么也不看、什么也不做的政府折磨着。全国人民真切地望着那个政府，然而那个政府却不看他们。九个崇拜金钱的荒诞年头，三个漫长的灾祸临头的年头！九个实候在行情自动收报机面前的疯狂年代，三个在饥饿线上挣扎的年代！九个迷恋海市蜃楼的愚蠢的年代，三个绝望的年代！朋友们，现在仍然有强大的势力企图恢复这样的政府，他们的理由是：对人类最漠不关心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

罗斯福的话总是被群众的热烈欢呼打断。他抓住群众的情绪巧妙地修改他事先拟就的演讲词。“这四年来，你们的这个政府，不是坐在那里转动两个大拇指碌碌无为，而是卷起袖子大干。而且我可以向你们保证，我们还将继续卷着袖子大干。

“我们必须同和平的顽敌——商业界和金融寡头、投机商、不顾后果的银行业、阶级对立、宗派主义、发战争财者等进行战斗。他们只把美国政府看作只是他们自己事情的一个附属品。而我们现在知道，那个有组织的富翁的政府和有组织的暴民政府是一样的危险。”

罗斯福的声音时而因气愤而严厉，又因激情而洪亮，而严肃，时而甚至有些兴高采烈。突然，他又用严肃的口吻说：“在我们的历史上，这些势力从来没有象它们现在这样联合起来反对一个候选人。他们一致恨我——而我却欢迎他们对我的痛恨。”

人丛中突然爆发出一一种沙哑的几乎象动物吼叫一样的声音，阵阵起伏。罗斯福又平和地继续说道：

“我想说，在我的第一届任期的政府里，自私和贪求权势的势力遇到了抵制。”他的话越说越急切，越说越激昂。“我要说——”这时，喝彩声、母牛的劲铃声、号角声、噼噼啪啪的声响，把他的话语全淹没了。

罗斯福要求说：“停一下！”这个老演员不愿让人家把他的精彩台词破坏了。欢呼声平息下去了。

“我要说，在我的第二届任期的政府里，这种势力要尝到厉害。”人群中的欢呼声似乎就如在拳击赛场上似的——这声音如此巨大，个人激动的唱歌声不大能够听到。

几天以前，兰登就站在总统现在站着的地方，他要求罗斯福说明假如他再次当选，将要执行什么方针。总统接受了挑战，以他自己的方式予以处理，他反复强调：“我们的战斗刚刚开始。”他说：

“这就是我对那些人的回答，他们不谈他们自己的计划而一味要求我

们陈述我们的目标。”他又说：

“我们一定要继续争取改善美国工人的工作条件。……我们一定要继续争取美国的家庭和农庄花的电费更加便宜。……我们一定要继续为了全国农民的利益进行努力。……我们一定要继续为男女青年……为残疾人、为盲人、为母亲们、为实行失业保险、老年保险而作出努力。我们一定要继续保护消费者……我们要继续有效地为提高消费者的购买力并为经常保持这种购买力而努力。

“并且也正是为了这些以及其他许许多多这样的事情，我们的战斗刚刚开始。……”

政治策略家：罗斯福

记者们花空心思，寻找词语。选举的结果是浪潮，是地震，是山崩，是1936年的大暴风雪。除了缅因和佛蒙特两个州以外，罗斯福在所有其他各州获胜。他以27,752,309票对16,682,524票击败了兰登，是历史上获得超过票数的最高纪录，在选举人投票中则是523票对8票——同法利的预言完全相同，是1820年以来最大的胜利。因为他的缘故，民主党在国会里已有的压倒多数扩大了。新众议院中，民主党将有334席，共和党89席，而原来是321-104；参议院里民主党75席，共和党只有17席，原来是70-23席。假如说这里有连带关系，那么，不少民主党人当选是沾了罗斯福的光。曾有人劝纽约州的莱曼和密执安州的富兰克·墨菲参加选举，帮罗斯福的忙；结果罗斯福远远跑在他们两人前头。

罗斯福的政治名声扶摇直上。观察家们争相赞赏他为杰出的政治家，最好的竞选能手。他的政治成功的秘诀究竟在哪里？他的某些伎俩与政治一般古老；有些则是新的。但不论新旧，它们都有一种奇特的罗斯福风格。如果要分类，大体如下：

赢得公众的舆论。罗斯福对于群众的情绪和群众的态度看得那样准，使得有人认为他在这方面有直觉或者有第六感官。事实上，他的了解扎根于扎实的、每日每时地积累人们在想什么的事实的基础之上。罗斯福每天看六、七报纸。他和许多人保持通讯联系。每个星期，白宫都要收到上万封信，汇报人们的看法和问题。他从群众中获取知识——他们对问题的看法，他们对他们的演说中某些段落的反应。作为总统，他享有特殊的优越地位。他可以通过善意的记者放出试探气球，试探公众的反应。他还掌握着一些特殊的投票站，总是事先收到其他投票站的情报。地区当局和州政府送来大量情报资料，州和地方党的领导人也送情报给他。一个规模庞大

的报纸情报部剪辑几百份报纸，汇编报纸摘要。

善于抓住时机。罗斯福在什么时间做什么事，也好像是凭直觉，实际上它主要也是事先算计好的。他的选择时机的基本立场是避免在他的手段和动员、行动迅猛的时候同他们敌对。例如，他认为，总统在国会开会期间可能会失去一些群众支持，他就应该等到国会休会以后再采取攻势。经常他的行动又很敏捷，不等反对派动员起来就干。罗斯福说过：“他就象一只猫，迅速冲一下，然后就松弛下来。”更多的时候，他是等待反对派的高潮过去采取行动。1936年的竞选运动中，他的政治顾问在初夏共和党势头还很大的时候，要他向兰登进攻。虽然他们给了他很大压力，然而他拒绝这样做。在他对罗森曼谈到政治潮流变得快的时候，他是认识到，公众意见和选举研究一向都证明公众舆论的一些部分是变幻莫测和反复无常的。

注意政治细节。罗斯福在处理日常政治事务，其中大多数是数不清的政客们的野心、希望以及想露头角的愿望等情况时，他都表现出很大的耐心。白宫的机构为此目的做了完密的组织。在竞选活动中，罗斯福的一名秘书给他写的一份备忘录如下：

1. 丹·托宾需要人家对他表示一点友好，新英格兰之行带他同去，如何？……
2. 杰米 [法利] 建议可以带约翰·J·奥康纳去新英格兰，因为他原本是马萨诸塞州的人——有点打乱了计划，等等。
3. 杰米提议康涅狄格州之行应该也包括去梅里登。那里是富兰克·马洛尼的故乡。……

再举纽黑文的民主党领导人戴维·E·菲茨杰拉德的事为例。1935年，白宫送给他一张总统亲自签名的照片。1936年菲茨杰拉德是罗斯福新英格兰之行的随行人员。对他的贺信总统复了信，称他为“亲爱的戴夫”。1940年，菲茨杰拉德给总统写了三封信，罗斯福对他的每一封来信都回以简短热情的复信。大选后，他给总统发了一封贺电，总统回复时把“亲爱的菲茨杰拉德先生”划掉，改为“亲爱的戴夫”。菲茨杰拉德在竞选中患了感冒，白宫送去鲜花表示关心。1941年又写了一封致“亲爱的戴夫”的信。一年后菲茨杰拉德谢世了，总统给他的遗妻子写了一封关切的慰问信，后者用颤抖的笔迹给总统复信说：“菲茨杰拉德先生一地是你的热诚的景仰者。……”

已经处理内部的派别之争。白宫很注意各集团内部的政治形势，以便

既与一切派别保持友好关系，并且避免同政治上有可疑倾向的某一派搞让步。黑人、犹太人、劳工组织、银行家、退伍军人内部的分歧都受到紧密关注。通过与全国性协会有长期接触的政府官员们，白宫深深卷入了一些集团的内部事务，但这总不是公开的。在这些集团内的亲罗斯福派往往总是采取守势，他们努力不让对立派别在竞选时使整个组织倒向反对罗斯福一边。

把反对派领袖和一般成员区别对待。把政敌的领袖同他们的支持者区别开来本是一种政治伎俩，然而没有几个政治家能象罗斯福这样一贯而又精细地使用这种手段。他几乎一直只是攻击“共和党的领导人”或“共和党的发言人”，而从来不针对地攻击共和党和共和党人。早在1930年罗斯福就对罗森曼说过：成千上万的人同他们一样看待政府。他们被吸收参加共和党是由于他们的家庭世代就是共和党——这是唯一的原因。有些人觉得当个民主党有失身分。他们村里的民主党人在社交界不象共和党那么‘体面’。因而千万不要去攻击共和党人，也不要去攻击共和党——只攻击共和党领导人。那么，任何共和党选民听到了都会自忖：啊，他指的不是我。……”

在自己的战场上进行战斗。从进攻的意义上说，这就是在对手的最弱点对他进攻，致使他在最不利的地位上迎接挑战。从防守的意义上说，这是指答复对手最极端最荒谬的攻击。1930年竞选中，共和党人抨击他对纽约市的情况处理不对，罗斯福差不多一直等到竞选运动将结束时才对这一指责给予答复。1936年他在麦迪逊广场花园发表演说，巧妙地把兰登企图置他守势一变而为以他特有的方式对新政进行辩护。

个人的魅力和政治上的技巧。任何政治技艺如果不是巧妙地用得恰到好处都不会收到良好的效果。罗斯福用来争取批评者的颇费心机的恭维话和他斗倒反对派领导人的那种卓越的机智，大大增强了他的全部策略。从一件事情可以看出他绝顶的机智，这就是他处理1936年约翰·L·刘易斯捐赠竞选经费的事。这位产联头目有一天带着一张二十五万美元的支票来到罗斯福的办公室，身后跟着一个摄影记者要记录下那个场面。罗斯福笑容满面地接待了他们，他是他拒绝接受那张支票。

他说：“约翰，这可不行。你留下这张支票，假如有了麻烦我会来找你。”

刘易斯只好走了，抱怨说他没有罗斯福精明。这倒是事实。在这以后的几个星期里，法利和一些支持罗斯福的无党派组织接二连三地来要钱。刘易斯坚持要有总统的亲笔信才给钱，企图以此来抵制这股浪潮，但是毫

无作用。罗斯福用口头嘱咐或者打电话支持这些要钱的人。最终，刘易斯的保险柜里几乎给掏掉了五十万美元——而报纸上却没有过多的报道。

这次胜利毫无疑问是罗斯福个人的胜利。“我就是大家争论的问题。”他曾经同莫利说过这样的话。法利的竞选宣传也完全围绕罗斯福个人。所以，大选后的庆贺也就理所当然地不是庆贺罗斯福的民主党，也不是他所献身的事业，而是集中在他个人身上。

在一片震天响的欢呼声中，对选举结果的一些方面也产生了疑虑。据一则报道说，罗斯福本人对于共和党在众参两院内力量锐减颇感不安。他估计没有一个强大的反对党，民主党本身有了压倒多数后，内部的分歧就会发展，变化无常的小派别就会相互斗来斗去。伊克斯明确地说，总统的胜利也连带使一些人获胜当选，而这些人如果失败，反倒是国家的幸事。另一方面，罗斯福对他自己的全胜又很得意。假如兰登胜胡佛一筹，他倒害怕“反动分子”会利用这个事实在下届国会中渔利。

这种个人获得的绝对优势的胜利还有别的内涵。一方面，这使选民委托给他的使命倒反而显得有些模糊不清了。他的竞选主要依靠新政的成绩；将来的新政将会怎么样呢？——继续目前的计划或予以扩大或转到新方向？虽然，到了竞选运动的最后关头，罗斯福发表了他那宏传的声明：“我们的斗争还只是开始。”这究竟只是竞选华丽词令呢，还是保证要扩大新政？

罗斯福得以胜利也使以他为首的民主党付出了一些代价。民主党组织在一些州里处于困境。纽约州的美国劳工党主要是由对两个大党都表示怀疑的工联主义者组成的，它吹嘘曾经支持总统的选民支持了它。这事有些古怪，但却很重要，这位民主党候选人大获全胜后没有几天，观察家就预言政党要改组，到1940年可能还要出现一个全国劳工党。

罗斯福个人胜利的另一个方面，是他的支持者的阶级构成的模糊不清。1932年各个不同收入的阶层聚集到他麾下，是因为在大萧条中他们都遭到了被剥夺的共同命运。在那一年，罗斯福在许多问题上采取的模糊态度有可能使不同阶级的人来投他的票。1936年又是什么状况呢？民意测验的结果表明，他的选民的阶级分裂在他第一届任期中就开始显现出来，到1936年这种分裂更扩大了。然而后来的研究又说明，这种分裂在1936年已不象有些人事先估计的那样尖锐。这一部分原因是总统的广泛号召力——他获得了不仅是占多数的穷人的选票，而且富人选票所占的比重也颇为惊人。

政治里面有这么一条恒定规律。据说：“一个党要取得完全的胜利，是要积累相对来说差距不大的多数，这是高明政治手腕的标志。”赢得绝大多数的选票可能涉及一些承诺，以致使胜利者在政治上感到为难。从这种观点看，罗斯福的压倒性式的惊人胜利是政治上的浪费。当然，他自己没有想到会大获全胜，而且也没有事后的认识。当然，这主要取决于他获得绝对优势的多数后进行统治时做出什么样的决定了。

但是，在 1936 年 11 月，作这样的推测确实显得太学究气了。罗斯福当时正处于他政治生涯的颠峰。当月下旬，他乘“印第安纳波利斯号”军舰到南美进行友好访问，他离开美国时，全国人民对他们的元首满怀友好的感情。在旅途中，他得到了休息，在里约热内卢和布宜诺斯艾利斯，他受到了盛大的迎接，他对群众比任何时候都更有魅力。

他热切地等待着将于 1937 年 1 月开始的第二任总统职务，而且充满着信心。因为宪法作了有关的修改，总统就职日期已不再自 3 月开始。国内一切都很顺利、安定——唯一让他担心的是国际局势。11 月底，他在给埃莉诺的信中写道：“……我还是很不喜欢欧洲的现状。”

第四卷 临渊蛟龙

第十五章 改组法院：对风险估计错误

这是个预示吗？罗斯福一向以好运出名；然而从1937年1月他的第二届任期开始的那天起，他似乎就倒霉了。凄风苦雨阵阵袭来，打湿了就职典礼的彩旗。湿淋淋的旗帜紧紧卷在旗杆上。聚集在国会圆形大厦前的权贵显要和普通观众都被雨淋透了。雨珠不停地打着罗斯福那本家藏旧圣经的玻璃纸封面，他面对首席大法官休斯，举手站立。

他们面对面地互相注视，老法官被雨打湿的胡须风中颤动，而表情刚毅坚定的罗斯福，他那突出的下巴特别引人注目。休斯在念到誓词中“保证维护美国宪法”这句话时，特别故意地提高了声调。罗斯福同样有力地重复了这句誓词。后来他说，当时他真想大声喊到，“是啊，但这是我所理解的宪法，它具有应付民主制度中任何新问题的灵活性，而不是你们法院用来阻止进步与民主的宪法。”

总统拿起沾满雨滴的讲演稿，发表就职演说了。“四年前，我们在这里集会举行总统就职典礼时，我们的共和国忧心如焚，但在精神上坚定不移。我们献身于实现一个梦想——使人人都享有谋求幸福所必要的安宁与和平的时代早早到来。我们这些共和国的公民曾经作出保证，要把那些亵渎我们古老信仰的人从我们的圣殿中驱逐出去；要不倦地、无所畏惧地争取结束当时停滞不前、悲观绝望的情况。急事先办，我们是从最紧迫的事情做起的。”

然而，“我们给自己订下的”誓约还不止这些。“我们本能地看到了一种更加深刻的需要——需要通过政府找到实现我们共同目标的一种手段，以使个人解决这个复杂的文明社会中不断产生的问题。我们一再努力在没有政府支援的情况下找到解决的办法，结果是一筹莫展，无所适从。由于，没有政府的支援，我们就不能使科学的作用在道义上受到控制。而要使科学成为有益于人类的公仆，而不是无情的主宰，这种控制就是不可缺少的。我们知道，要做到这点，就必须找到有效的办法来控制盲目的经济力量和盲目自私的人们。

这时大雨倾盆，雨水顺着罗斯福未戴帽子的头上流下来，使他的一些锐利的词句也失掉了锋芒。他说，人与人的关系变得日益错综复杂，所以

管理这种关系的权力——抑恶扬善的权力，也应随之加强。“我国的基本民主体制和我国人民的安全不是靠取消这种权力，而是要依赖把这种权力委托给这样一些人，他们在一定时期，经过诚实而自由的选举制度，可以由人民加以撤掉或继续留任。”坐在总统右侧不远处的首席大法官听出这句话的话外之音了吗？

总统现在谈到了将来的前景。“我们是否应当就此止步，从摆在我们面前的道路上转身回来？”他双眼望着人群。“我们在面临重大选择的时候，会听到各种意见。贪恋舒适的人说，‘呆一会儿吧。’机会主义者说，‘这种处境很好呀。’胆小的人问道，‘前面的路很难走吗？’”我们的国家早已摆脱了那种停滞不前的日子。然而，良知泯灭、玩忽职守、一意循私等现象又已经出现。下面这些情况就是对美国民主制度的挑战：

“我知道，我国有几千万公民——占全国人口相当大的一部分——这时候仍然未能得到按今天的最低标准所要求的大部分生活必需品。

“我知道，数百万家庭依靠极其稀少的收入勉强维持生活，而灾难的阴影时刻围绕着他们全家。

“我知道，在城市里和乡村中，数百万人仍在所谓的上流社会早在半个世纪以前就认为是不适于生活的条件下生活。

“我知道，千千万万的人被剥夺了受教育、休闲和改善他们自己和孩子命运的机会。

“我知道，千百万人无力购买工农业产品，而且由于自己的贫困而被剥夺为其他千百万的人工作和生产的机会。

“我知道，全国三分之一的人居住困难，衣衫耐烂，营养不良。

“我并不是以绝望的心情来为你们描述这幅图画。我满怀希望地为你们描绘——因为国家既然看到而且了解这种不合理现象，就要把经消灭掉。……”

“要维护一个有作为的民主制度，就要有很大的耐心来采用各种方法，要虚怀若谷。但是，从喧杂的呼声之中，可以了解到公众最需要的是什么。那么，政治领导就可以表达共同的理想，并帮助其实现。

“在这再度宣誓担任美国总统的时刻，我承担起领导美国人民沿着他们所选择的道路前进的庄严任务。……”

意外的行动

两星期后，罗斯福同休斯又面对面地在一起了——这一次是在别致的、灯火辉煌的白宫东厅。这是总统一年一度为法官们举行的晚宴。这个

场合的中心人物是总统和首席大法官，前者兴高采烈地摆烟嘴来强调他讲的传奇。两人兴致勃勃，谈笑风生。围绕他们依次而坐的是国家的显要——内阁成员、大法官、参议员、银行家，甚至还有吉恩·滕尼夫妇。

宴会的欢笑勉强隐藏了一种紧张气氛。最高法院的议事日程上排满了重要的新政提案。华盛顿谣言四起，据说罗斯福凭着大部分群众对他的拥护，打算对最高法院展开某种进攻。除总统本人外，出席宴会的人当中只有很少几个人知道流言的真相。司法部长卡明斯看着罗斯福和休斯，觉得秘密倒不如公开了为好。他对罗森曼抱怨说，“我觉得似乎就象个同谋犯。”另一方面，罗斯福也许正在品尝此时此刻的讽刺意味。在一场大战的前夜，一方的统帅正在为他的对手举行宴会呢。

然而总统的心情也有点紧张。以后两天，他仔细推敲致国会的咨文，字斟句酌地增删修改。他最关心的是他的计划要保密，连对某些最亲近的助手也没有泄露。2月4日，他通知内阁成员和国会领袖于次日举行特别会议。白宫速记员们被告知于次日早晨6点30分上班，为的是油印这次会议和记者招待会的文件。

第二天上午，内阁成员和议员们怀着惊异的心情在内阁的那间天花板很低的长形会议室里等待着。总统坐在手推车上很快地进来了。他高兴地向大家打过招呼以后，就直截了当地谈起要办的公事。他宣读了将在一小时后提交国会的咨文摘要，表示他有意接受最高法院的挑战。

一片沉默，鸦雀无声，他简述了他的计划。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凡年满七十岁后六个月仍不辞去法官职务者，总统有权任命一名新法官接替他，按这种方式任命的法官可多达六名。致国会的咨文以相当长的篇幅谈及司法工作的效率问题，法院内部壅塞，需要新鲜血液以及颁发禁令的问题等等。总统的提案还包括任命区级和巡回法院的法官问题。然而在冗长的法律词句中却隐藏他的主要建议——罗斯福要求给他这个权力，即在休斯的两侧安插六名支持新政的法官来威胁这位首席法官和他的弟兄们。

会上，人们的反应各不相同。伊克斯由于总统终于采取了行动而高兴不已。卡明斯颇有点高傲地玩弄着他的夹鼻眼镜，为自己早就参与了正在揭幕的这出戏而沾沾自喜。然而，公众代表团坐在那里，一个个呆若木鸡。加纳和雷伯恩一言不发。鲁宾逊满面忧愁，有气无力地表示拥护。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亨利·艾休尔斯特必定是想起了他在竞选运动中曾极力否认罗斯福打算改组法院，然而他仍然忠诚地发言支持这项提案。众议院议长班克黑德则始终板着脸孔，毫无表情。

会议实际上并没有进行讨论；总统没有向他的党的领袖们征求意见。会议一结束，他就坐着手推车去会见正在等待的报界人士。罗斯福主持这次会议时象个乐队指挥。他宣读致国会的咨文，不时作一点生动的发挥，他的话时常被阵阵笑声打断；总统把头一仰，也跟大家一起笑起来。他还一再要求咨文在发表前要绝对保密。

从白宫驱车返回国会山途中，加纳和他的几位同事仍旧不说话。众院司法委员会主席、得克萨斯州的哈顿·萨姆纳斯突然转身向大家说：“伙计们，这回我可赢了。”这些人把消息带到国会。咨文宣读以后，立法议员们在会议休息室里三五成群，互相询问，“你认为怎么样？”不到几小时，这项议案就把参众两院整整齐齐地分裂成两部分。得克萨斯州的两名代表象征着两个极端。在众院，新政派众议员莫里·马弗里克不等议会秘书宣读完毕，就一把抓起一份油印的草案，签上自己的名字往提案箱里一塞。在参院休息室里，加纳一只手捂着鼻子，用劲地晃动朝下的大拇指。

一个报信的人穿过广场跑往最高法院大厦。大法官们正在里面听取议论。只有布兰代斯一人事先得了信；那是在大法官们刚要进入法院以前，科科伦经过罗斯福同意“冲进法官更衣室”把消息告诉了他，布兰代斯当时就表示反对。这时，一个议会秘书从台上帷幕后面悄悄走出来，给每位大法官送上一份文件。庭上的律师意识到法官席上气氛骤然紧张，他的发言稍稍停顿了一下。休斯不安地在座位上转动。范·德万特脸色阴沉，巴特勒似乎在笑。然而审判官的神色很快恢复正常，审议继续进行。

这天下午，报纸以醒目的标题把消息传给公众。第二天上午，总统在床上边吃早餐，边看报纸。报纸社论中的一片恼怒的鼓噪并没有使他感到惊异。他早已估计到了；他把希望寄托在群众的支持上。事情的发展表明，这项提案一开始就把美国人民整整齐齐地分成两半。罗斯福能够动员多数人支持他的计划吗？他能够把这个多数转化为国会的行动吗？

罗斯福的这一动议的突然性，提出这个杰作时的那种明显得意的情绪，以及在制订过程中没有走漏一点风声，这些都给人这样一个印象：这个议案是大选后匆匆赶制出来的。实际上，罗斯福考虑对法院进行改革的问题已有两年多的时间了。

早在1935年法院对新政实行全面进攻以前，罗斯福就在考虑扩大法院编制，以支持他所提出的立法。他不能忍受法院在重大问题上反对他。关于这点情况很突出，因为他曾经作好准备，一旦法院在黄金问题上反对他，他就会向全国发表广播演说。法院当时只是以微弱的多数表示支持，

他才没有以发表总统声明和向国会呼吁的方式来同法院对抗。当法院废止了“全国复兴法”和其他措施后，总统认为必须采取行动的决心就更加坚决了。

然而，怎么办呢？有一段时间，罗斯福不很认真地考虑过修改宪法的问题。可能的办法有几种：直接扩大国会在具体的经济和社会事务方面的权力；授权给国会重新通过被法院否决的某项措施，从而使之“符合宪法”；要求最高法院在撤销国会某项法令时必须以六比三，甚至七比二的多数通过；对大法官的年龄加以限制，或者给他们规定任期，而不是终身制。最后，罗斯福决定不采用修改宪法的手段。因为这样做，即使顺利，也要有很长时间。更大的可能是，即便修正案能够得到参众两院三分之二的多数通过，也毫无可能越过宪法制订者精心设置的重重阻碍——四分之三的州立法机关或州议会的同意，尤其是因为这些机构都是代表保守派的、小市镇的利益和立场的。

总统后来说：“给他一千万美元，他就能使宪法的任何修正得不到必要多数的州的批准。”

由国会颁布一项法令，能不能解决问题呢？用限制最高法院权力的措施来直接向它挑战，这样的议案可能被最高法院本身宣布无效。但是，另有一个办法似乎确实符合宪法，因为它有先例可循。这就是如前几任总统做过的那样，设法说服国会授权任命新法官，从而增加法官人数。在最高法院里安插自己人，这种做法开始好像不合总统的口味，也许因为这种目的太明显了。可是，他一直重复考虑这个想法。历史上的一个先例强烈地提醒他——阿斯奎斯和劳合·乔治曾通过英王威胁英国上院说，如果它不承认下院的权威，就要采用任命新贵族的办法来改组上院。

罗斯福显然害怕直接向法院开火。他也许已意识到——如民意测验表明的那样——1935年末大多数人民是反对限制法院的否决权的。民主党1936年的竞选纲领只提到要作一种“澄清性质的修正”。在竞选运动中，胡佛和其他人都曾要求总统证实或否认他打算改组法院的计划。罗斯福不仅没有理会这个具体问题——老练的竞选人都会这样做——而且完全回避了最高法院问题。他的沉默无疑有助于他获得如此巨大的多数，然而这也意味着他并没有获得明确的授权对法院采取行动。

罗斯福在选举后的第一次内阁会议上提出了最高法院问题。他故意装出一副傻样，说他估计麦克雷诺兹到了一百零五岁还会坐在大法官席上。也许有必要向人民发出号召。他写信给《纽约每日新闻》的约瑟夫·帕特

森说，这个问题“必须直面”。但是如何正视呢？在罗斯福启程前往南美巡游前，他让卡明斯在华盛顿认真研究一大叠计划，考虑如何制服那九个老头子——或者至少其中五人。

12月的一天早晨，卡明斯正对着各种方案发呆，这时偶然看到前司法部长——现任大法官——麦克雷诺兹 1913 年提出的一项建议，提议除了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以外，任何联邦法官如果没有按照法律规定的年龄退休，总统应任命另一名法官来主持法庭，而其地位应在原法官之上。卡明斯暗想，为什么不把这个办法使用到最高法院上去呢？

“好主意！”据说卡明斯提出他的办法时，罗斯福兴奋得叫了起来。情况看来也的确如此。这个计划显然符合宪法。同其他大多数建议比较，它的性质十分平和，并不改变庄严的牵制与平衡制度。更重要的是，这个方案可以作为整个联邦司法制度建设的广泛计划的一部分向全国提出，与其说是为了实行自由主义，不如说是为了提高法院的工作效率和处理案件的速度。罗斯福喜欢把政治上的反对派加以个人化，所以在想到麦克雷诺兹害人终害己时，一定是暗暗得意。

留下的问题是怎样提出这个计划。罗斯福为什么要象搞阴谋活动那样严守秘密呢？他为什么突然地把计划告诉将在参院负责这场斗争的鲁宾逊；告诉不久前曾极力否认罗斯福有改组法院的任何计划的艾休尔斯特；告诉他的革新派老伙伴诺里斯，以及布兰代斯和斯通，雷伯恩和加纳，法利和伊克斯，甚至麦金太尔和厄尔利？罗斯福对法利解释说，他是担心报纸过早地把消息透露出去。这种解释不能使人相信。罗斯福是个精明的政治家，他不会为了保密而把主要领导人排斥于决策性的会议之外。并且，在公开宣布这个计划前的几个星期，罗斯福自己已把这项计划的精神实质透露给了《柯里尔》双周刊的一位撰稿人。

原因要更深一层——它深深潜藏在罗斯福的个性中。他认为是他个人打败了保守派，赢得了大选的胜利。现在保守派在司法领域内掘壕固守。战场已经摆开，就要对这个堡垒进行一场罗斯福式的进攻战，这种激动人心和痛快淋漓的情况就象他打垮共和党人时一样。他运用自己善于选择机会与掌握进退的天赋才干来部署这场战斗。在他最后发动进攻的时候，罗斯福的两种特征——他好作惊人之举的性格和他善于运用巧妙迂回的策略而不作正面强攻的天性——奇妙地结合在一起了。

这两种天性都没有帮他的忙。一家支持新政的报纸说，“太聪明——聪明过头了。”总统的许多自由派朋友被弄得不满。有些人曾希望罗斯福

直接向最高法院保守主义的否决权开火。另一些人则以他不够坦诚为由而放弃了这一运动。还有一些人则不赞同他的具体计划。几年以前罗斯福曾经责怪说，改革之所以缓慢，原因是自由派很难在方式方法上达成一致意见。这些话在 1937 年听起来几乎是对他的讽刺。

游击战

战线很快就形成了，然而并不是罗斯福喜欢的那个形式。共和党和民主党保守派气愤地加以反对，对此他并不觉得奇怪。这是意料中事。然而，告急的报告由参院送到白宫。布特·惠勒和海勒姆·约翰逊这两位著名的进步派人士也表示反对。持反对立场的还有民主党人、怀俄明州的约瑟夫·奥马奥尼，得克萨斯州的汤姆·康纳利，密苏里州的贝内特·克拉克，内布拉斯加州的埃德·伯克，以及另外十几个总统曾经认为是可靠的人。然而更严重的打击是，其中还有诺里斯。尽管他最终还是支持了这项提案，但是在罗斯福刚宣布这项计划的几小时以内，这位年老的内布拉斯加州人就坚决地说，“他不同情这个扩大最高法院的计划。”

致使罗斯福在竞选中大获全胜的“伟大联盟”正在发生变化。共和党也在发生分裂。他们知道，他们那支小小的队伍如果在两党之间直接交锋，是无法制服总统的，所以他们决定按兵不动，让民主党人去自相残杀。当胡佛、兰登及其他全国知名的领导人物要冲到扩音器前，把法院计划变成党派争端时，共和党国会议员麦克纳里、博拉以及范登堡急忙上去把他们拉开。1936 年 11 月以后就死气沉沉的“自由联盟”这时也保持缄默。罗斯福发现，同自己对垒的，不是共和党人而是他自己党内的伙伴。

罗斯福写信给克里尔说，“这将是多么激烈的一场战斗啊！我们需要集中一切，全力以赴。”对于来拜访者，他却满有信心地宣布，“人民是跟我在一起的。”他们是这样的吗？没有几天就可以清楚地明白，这项议案一直触及了美国人民感情的深处。抗议的声浪越来越多。《纽约先驱论坛报》用了头版八栏中的七栏来登载关于这项议案的消息。许多爱国团体立刻行动起来。新英格兰城镇的议员们召集群众集会。法律协会纷纷举行会议，提出谴责。邮件象潮水般地大量涌进国会办公室；有的参议员一天就收到上千封信件。国会议员们感到惊讶的不是抗议的巨大数量，而是它的激烈程度。专栏作家雷蒙德认为存在着一种普遍性的恐惧心理——一种不知道将发生什么事情的惊吓——以及对最高法院的深深的敬重。

许多抗议者声称他们属于中产阶级，拥有的产业不多，并对劳工和激进分子心存怀疑。而当时发生的一些情况正好加深了这种恐惧。1937 年的

头几个月爆发了一连串的静坐罢工。桀骜不驯的工人封锁工厂，反对厂主等场景，使那些要求维持法律和秩序的人深感不安。在保守的中产阶级的心目中，法院改组计划和劳工骚动之间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感情上的关系。威廉·艾伦·怀特写信给诺里斯说，对罗斯福的评击，这是第一次“不是来自上层阶层，而是来自基层”。

这场抗议运动并不完全是自发的。拼命鼓动的有罗斯福的老朋友弗兰克·甘尼特和其他著名的保守派分子。博拉鼓动甘尼特说，“加油干！”这位纽约出版商给这个运动捐赠了四万九千美元，并且从几千名捐助者那里又捐到十五万美元。报纸上登出整版整版的广告；广播中是一片慷慨激昂的演说；成千上万份演说稿从国会办公室免费寄到全国各地。然而这时仍然看不出有共和党领导人插手的任何迹象。

这股抗议浪潮带来的一个最早结果就是剥夺了罗斯福的这项议案的“讲求效率”的外衣，突出地揭露出它要使最高法院自由化的努力。总统突然改变方针，决定干脆就在这个根本问题上展开斗争。他决心直接向全国呼吁。2月下旬，他写信给一个朋友说，批评的来源是很集中的。他感到只要我们把情况告诉公众，整个问题就会得到广泛支持。

引人注意的是，他的第一个呼吁是针对自己的党而发的。3月4日，总统在“五月花饭店”一次民主党显要人物的庆功宴会上发表演说，呼吁他的党内伙伴拥护他的建议。罗斯福似乎情绪极高，但他的语调是严峻的、命令式的。他警告全党，只有对投票选举他们的大多数人毫不动摇，将来才能够再欢庆胜利。“去年11月我们曾发出警告，说战斗才刚开始。是不是有人真以为我们只是说说而已呢？噢，我是说了算数的，你们也要算数。”

总统宣称，一次新的危机已来临了——这次危机与四年前的不同，但却更加严重。这就是那些现在正在抬头的社会势力，其势头变得愈来愈激烈。总统仔细地谈到了正在各级法院手中的那些治世方略的命运。接着他的演说就达到了令人窒息的颠峰。

“要有勇气，我们才能大胆地思想，找到适合国家需要的办法。然而对于我们党来说，现在同以往一样，勇敢就是智慧。

“假如我们没有勇气去领导美国人民走向他们要去的地方，别人就会来领导。

“就在现在，我国有三分之一的人口营养不足，衣衫破烂，住房困难！

“就在现在，成千上万的农民不知道明年的价格是否能够支付他们的

抵押贷款的利息！

“就在现在，成千上万的男男女女每天长时间地在工厂里干活，而只得到微薄的工资！

“就在现在，成千上万名应当上学的儿童正在矿山和工厂里干活！

“就在现在，发生了从未有过的大规模罢工，耗费掉千百万美元！

“就在现在，春天的洪水正威胁着要再一次吞没我们的河谷地带！

“就在现在，长久干旱地带的黄沙正在不断地延伸！

“假如我们要对那些曾对我们表示信任的人恪守信义，如果我们要使民主体制获得维持，那么我要说，我们必须就在现在采取行动！”

几天以后，总统的一次“炉边谈话”的调子就低调和消极得多了。他又谈到四年前的情况，全国面临的“无声的危机”，最高法院在“三驾马车”的国家政治制度中未能与另外两匹马同心协力。应当把宪法从法院中挽救出来，使法院挽救自身。他直截了当地回答了关于准备在法院安插亲信的指责，说他无意任命“没有骨气的傀儡”。他详细解释了没有采取修改宪法这个办法的原因。他举出他个人忠于公民自由和宗教自由的经历。

“你们这些了解我的人，会接受我的庄严发誓，在民主制度正遭到攻击的这个世界上，我要努力使美国的民主制度获得成功。你们和我应当各尽其责。”

总统不仅是依靠雄辩的演讲。一开始白宫就组成了专门班子，在罗斯福的直接指导下积极展开攻势。他们向全国各地派出说客，同友好的立法界人士交流思想和论点，并向对这项议案表示不满或保持缄默的参议员们施加压力。施加压力的方式造成了民主党的公开分裂。科伦和政府的其他代理人至少也是毫不客气地要求参议员们拥护总统。对某些参议员，则以给予新的任命为诱饵，或者答应把联邦工程拨给他们的州，甚至向他们许愿，要任命他们担任法官等。对于其它参议员，还通过有关州的民主党组织向他们施加压力，比如芝加哥的凯利—纳什的政治机器和彭德格斯特的堪萨斯市组织。一些参议员——其中确有鲁宾逊本人——决不会忘记，这项议案如获通过，总统就可以分配六名最高法院大法官的席位，这是美国委任官职中最令人艳羡的美差。

罗斯福对人民的呼吁产生了一定影响。这项计划赢得的支持在3月中旬达到最高峰。然而最后的决定要由美国国会来做，而这里的情形却并不好。

罗斯福的助手们在国会山的活动不象惯常那样有效。一部分困难是詹姆斯·罗斯福造成的，他的父亲在1937年初指派他当一名助手。埃莉诺·

罗斯福估计到詹姆斯在工作中必然要遇到压力，因此不同意这项任命。但她的丈夫却认为，他固然身为总统，但是不能因此就不允许他自己的长子对他有所帮助。埃莉诺的疑虑为嗣后的事实所证实。詹姆斯作出的承诺似乎特别可靠，然而实际上并非如此；其他助手在国会山的努力受到损害；国会内的摩擦和不满发展了。

另一方面，参院反对派却极其巧妙和畅通无阻地活动着。相对说来，共和党人仍然保持沉默。在民主党方面，卡特·格拉斯表示道义上的愤怒，而惠勒和奥马奥尼则只有薄薄的一层自由派外衣。民主党中间派如纽约州的洛伊尔·S·科普兰，印第安纳州的弗雷德里克·范努伊斯和康纳利则极力拉票。与这些人相对的是新政主要骨干和一些主要出于个人对总统的忠诚而支持这项提案的参议员。还有二十来个参议员持犹豫态度，至少公开如此。

3月中旬，战场转移到参议院有回声的、多柱结构的会议厅，司法委员会在这里就这个议案举行意见听证会。卡明斯首先代表政府发言，反映总统原先关于提高最高法院工作效率的要求。司法部助理部长罗伯特·H·杰克逊接着发言，他勇敢地把问题拉回到实现法院自由化的主题上。两人都遭到一阵发难的质问。这场严密询问表演相当精彩，据说美国律师协会有十几位专家聚集华盛顿来提供子弹。后来的十天由政府的其他证人作证，其中包括美国劳联主席格林，政治学家爱德华·科温和查尔斯·格罗夫·海恩斯，《圣路易明星时报》编辑欧文·布兰特。最后轮到反对派作证。

国会意见听证会如果巧妙地加以运用，可以成为反对行政当局的有力工具。惠勒本人尽管不是司法委员会的成员，但通过他在这个委员会中的朋友已作好准备，使用它从侧翼来打击政府。这位蒙大拿州政治风云中的老将，每当处于反对派的地位时，就精神百倍。他不知倦怠，报复心强，足智多谋，而又往往暴跳如雷。虽然他郑重声明他热爱总统，然而也不是没有不满的理由；他很早就为提名罗斯福而积极奔走，但没有得到赏识，并且他知道，他在许多救济和改革措施方面，曾采取过比总统更加开明的立场。1924年，他毕竟是进步党著名的拉福莱特的竞选伙伴。

惠勒在委员会的会议上，对关于最高法院的提案发起了抨击。忽然，他拿出了反对派的法宝——首席大法官休斯的一封信，其中断然声明最高法院能够克尽职守，假如将它加以扩大，则会减低它的效率。在宣读这封信的短短几分钟内，人们明白地看到了这样三点：参院反对派和司法界政客之间结成了联盟，后者不声不响地尽一切力量反对这个计划；这个联盟针对罗斯福的最薄弱的一环发动进攻，即他以前提出的关于最高法院效率

不高的指责；休斯本人在这场斗争中运用了他的高超的政治手段。

对有关法院的计划，休斯表面上保持着他那一贯的宽厚态度。他说，“假如他们要我主持会议，我也可以主持。”但是这位老政治家的斗志被激发起来了。他要出来大胆地说话——然而面对传统加给法院的限制，他如何说才好呢？罗斯福提出效率不高作为理由，这正给他一个绝好的机会，使他能以提供情况作为借口来攻击这个计划。这位首席大法官甚至准备亲自到委员会作证，然而布兰代斯不同意，这样才采用写信的办法。首席大法官在周末加紧工作，以配合惠勒的时间表。他高兴地把信交给这位参议员说，“宝贝出世了。”

休斯的政治领导才能和精明干练与罗斯福伯仲之间。他告诉委员会说，他没有能够同每位大法官商谈，然而他深信他的这封信与他们的意见是一致的。事实上，至少有斯通这位大法官对于休斯未曾与他商量而感到不高兴，并且对信中部分内容有不同看法。也许首席大法官休斯已经知道或者怀疑斯通贬低他的名声，说他不是一个开明的法官，而且斯通通过《圣路易明星时报》的欧文·布兰特向白宫表明过自己的意见。可是不管怎样，休斯彻底实现了他的战略。

政府被休斯的反击弄得惊慌失措，这时只好无所作为地呆在一旁，等待委员会听取一个又一个证词。报刊和广播日复一日地充满了反对总统计划的论点。罗斯福在写信给一个朋友时曾希望“从现在开始，事情会发展得更快一些”，然而反对派看到了拖延对他们有利。更可怕的是，在委员会里，政府方面没有一个象博拉、惠勒或康纳利那样善于质问的人。总统由于保守秘密而遭殃。机智顽强的议会老手，参议员雨果·布莱克在年初就已离开了司法委员会。

从3月下旬到4月上旬这关键性的几星期中，公众对于这项计划的热情慢慢地、无可挽回地减退了。罗斯福两次演说所争取到的赞同既不稳定，也不深入；而且随着斗争持续地拖下去，这种支持彻底烟消云散了。大部分问题在于工人和农民内部的深刻分歧，罗斯福希望这两大利益集团的支持，因为他们同最高法院的关系关不融洽。这时，劳联因纠缠于同产联进行的阵地战而无暇他顾。因为这种分裂，地方民主党组织的争吵以及普遍的冷漠情绪，政府组织的一些劳工集会都失败了。各种农业组织的行动则表现得似乎根本就不曾有过“农业调整法”似的。强大的“美国农场联合会”的领袖们保持沉默；“保护农业社”则反对这项计划；最糟的是“农民联合会”分崩离析。农民领袖们的表现明显不是由于斤斤计较自己

的私利，而是反映了当时流行于美国中产阶级之中的一种普遍的感情：对于“法院的纯贞”的尊重；对于劳工骚动的恐惧；对于法律、秩序和财产权的关心。

在这种困难的情况下，罗斯福转向民主党求援。法利风尘仆仆，奔走于各地党组织之间，给那些没精打采的民主党议员打气，并且暗示要威胁要惩罚不忠分子。这一切都毫无作用——党在这个问题上缺乏魄力和战斗性。不但如此，参院外面的一些著名的民主党头面人物对于有关法院的争端采取了退避三舍的态度。在政府中，赫尔持沉默的敌对态度。在罗斯福自己的那一州，他的老战友、州长莱曼公开反对这项提案，甚至连党内最沉着的老将布朗克斯的博斯·弗林也持不赞成态度。

总统在4月初还是乐观的。科科伦、皮特曼、拉福莱特及其他一些人还在兴奋地报道有希望获胜。当参议员布莱克警告说，反对派已经下定了决心，并采用拖延战略时，罗斯福回答说：“我们可以把他们逼出来。假如拖延对他们有利，我们就要求尽快表决。”

伟大联盟出现了分裂

罗斯福错了。到了4月，关于法院的计划获胜的可能性几乎没有。总统根本无法在参众两院得到必要的多数。后来，4月12日又遭到了一次决定性的打击。休斯在气氛紧张、挤满了听众的法院审判厅里宣读了最高法院支持瓦格纳法的判决。

假如罗斯福在这一时期仍一如既往，对于政治逆流十分敏感，那么法院的变化就不会使他感到吃惊了。大选后几星期，当罗斯福和卡明斯正在考虑关于最高法院问题的方案时，罗伯茨曾私下告诉首席大法官，说他将投票赞成华盛顿的最低工资法和推翻几个月前的一项相反的判决。休斯高兴得差点要拥抱他了。但是，由于斯通病了一些时候，同时由于休斯看到对于改组法院计划表示让步有其不利之处，所以迟迟不作出最后的决定。到了3月底，就这个问题以及其他三个有利于政府的问题作出决定的时机似已成熟。这些情况仍不过是些一点点的征兆而已，对于罗斯福的计划没有多少影响。但是，两周后关于瓦格纳法的决定证明，休斯和罗伯茨同三个自由派人士确实是结合起来了。

首席大法官再次显得比总统高明一些。为了适应当时策略上的需要，他自己在具体立场上究竟有多大改了变，关于这点，宪法专家尚有某种争论。毋庸置疑，休斯在与4月12日的主要问题有关的几个问题上的立场，同他原来的态度比较，是一个重大转变；另一方面，就如大多数精于政治

活动的法官那样，首席大法官的立场也十分灵活，足以实现这一转变。他的这种新的立场，其政治意义超过了法律意义。他在最高法院中团结了一个支持他的巩固多数；他对总统的论点来了个釜底抽薪；他维护了劳工方面所珍视的一项议案，从而进一步驱除了他们对最高法院的疑虑——他做了这一切而又没有不适当地损害了最高法院的尊严。

表面上，罗斯福以一种无所谓的态度来对待最高法院所采取的行动。他对记者说，“整个上午我都高兴得哈哈大笑。”“我觉得太有趣了。”他把《先驱论坛报》对于这一决定的热烈支持同它两年前的态度进行比较，当时它赞成“自由联盟”的律师们认为瓦格纳法不符合宪法的意见。

“嗯，我觉得越来越有意思！”罗斯福在记者的哄笑声中继续说。“而且我还没有看过《华盛顿邮报》，也没有收到《芝加哥论坛报》。更没有阅读《波士顿先驱报》。今天是个十分令人高兴的日子……。”他津津有味地引用一位朋友对他说的话：无人地带已经不复存在了，然而“我们现在仍在‘罗伯茨地带’”。

总统的内心却是迷惑甚于愉快。他应当坚持进行这场同最高法院的斗争吗？他想必已经立即意识到休斯给予这项计划获胜的希望以惩罚性打击；他原来设想，索性让新政立法完全被否决，这样就可以把纷争尖锐地放到人民面前。并且，他很快了解到，鲁宾逊以及他的其他助手正在议论谋求妥协的问题。据说鲁宾逊告诉一位白宫人士说，“这项提案在参院引起了轩然大波。”“情况会更加不妙，然而如果总统想要妥协的话，我明天就可以为他争取另外几名法官。”但另一方面，鲁宾逊本人也成了问题。人们早就知道，这位阿肯色州的猛将将会补上第一个大法官空缺，从而实现其终生的愿望。可是，任命这位参议员充任法官显然就是承认他有功于罗斯福，而不是因为他有司法才能或笃信自由主义。并且，鲁宾逊只要进了最高法院，也可能向右转。所以必须要有其他任命来予以抵消。

罗斯福还有别的理由要坚持他的提议。他已经完全投入战斗，让步就意味着他的失败和惠勒及其他背叛者的胜利。他依然期望由他自己任命六名具有自由派思想的法官——他可以同他们建立良好的私人关系，如同他担任州长时同州法官的关系那样。重要的新政议案将来还会提交最高法院，假如没有武器来对付他们，这些大法官就会向右转。最后，总统仍然认为他可以获胜。在第一届任期内，他不是在前途迷茫的时候依靠坚持下去而把好些议案拯救了出来吗？

所以，他下令迅速地全力以赴。总统写信给议员戴维·刘易斯说，“我

们要坚持并加强这场斗争。”他好像为了显示自己必胜的信心，还计划于4月底到墨西哥湾去钓鱼。罗斯福仍然保持一种轻松愉快的神气。

4月21日，他写信给驻巴黎大使威廉·C·布利特说，“我很高兴收到你4月12日田园狂想曲般的来信，而且了解到法国政府患了春倦症。华盛顿也是一片春色，所以在最高法院问题上彼此恨不得将对方咬一口的参议员们，现在也成了温文尔雅的礼让君子了。……”

“我也被明媚的春光迷醉了。在这个世界上，我毫无牵挂。对于一个被报纸称为独裁者、正把政府推向彻底破产境地的总统来说，这该是很了不得的吧！”

最高法院的改变方针标志着与法院的斗争性质上的重大变化。问题已不再是罗斯福的新政与保守的法院之间的战争。现在是总统与国会之间的战争。几周后，法院支持了社会保险法，从而使法院这个机构进一步从这场斗争中拯救出来。然而法院成员并没有置身事外。休斯在5、6月间发表的讲话中仍毫无掩饰地就最高法院提案问题进行了抨击。

罗斯福于5月中旬垂钓归来。他斗志高昂。在乘火车的归途中同选区委员会的人们谈话以后，他对内阁说，他同以前一样深信人民仍然是拥护这项提案的。他又说，国会中反对这项提案的民主党人在选举中是要失败的。罗斯福暗地里警告加纳说，他这个总统曾经提携相当一批议员，使他们进入国会，他可以公开反对那些不赞成这项提案的民主党人。他把鲁宾逊和其他领导人请来，对他们的忧虑一笑置之，对他们担心谈到的背叛情况加以反驳，最后把他们打发回去继续战斗。

可是战斗情况依然不妙。希普斯特德出来反对这项提案，罗斯福所依赖的其他几名参议员也表示反对。一些党的领导人警告说，民主党的内部分裂正在加深。连白宫的一些助手也丧失了信心，主张谋求让步。其他新政议案同关于法院的提案一齐拖延下来了。接着，反对派在5月18日又打出了另一张牌。惠勒和博拉获知范·德万特准备退休，就传话给这位法官说，假如退休的时间同司法委员会投票反对关于法院的提案的时间恰好相合的话，将有助于这一计划的反对派。由于惠勒知道表决会是一个什么结果。5月18日上午，罗斯福看了范·德万特的退休申请书，随手写了几句冷漠而礼节的话表示接受。事后没有几分钟，参院司法委员会召开内部会议。会议否决了几个折衷方案，接着就以十票对八票决定总统的提案“不能通过”。委员会内部阵线的划分象征着“伟大联盟”的分裂；代表不同思想色彩的六名民主党人背叛了总统。

面对这一正在加深的分裂，罗斯福立刻改变策略，这一着时常使对手防不胜防。他转向谋求妥协。但是他的活动余地不幸由于种种原因而大受限制。一部分原因完全是运气不好，另一部分原因则是他处理问题的方式。范·德万特的退休不但使总统关于向最高法院输送新鲜血液的要求又少了一个证据，而且又尖锐地提出了这个老问题，即既要把大法官的位置送给鲁宾逊，又不得罪“真正的”自由派，而且还要使罗斯福关于这项提案的论据不会成为笑柄。范·德万特退休后没有几小时，反对派和支持这项提案的参议员就象事先约好的那样，挤到参院大厅前排鲁宾逊的桌子周围，和他热情握手，称他为“大法官先生”。参院实际上已经提名鲁宾逊填补这个空缺了。

在这种尴尬的局面下，罗斯福转而采用他所擅长的面对面直接劝说的手段。科科伦和杰克逊建议，让这项提案再经另一次会议讨论，或者就干脆承认失败，将这一争端求诉全国人民。同他们的建议相反，总统决心采用一个狡猾而又冒险的策略行动。他通过法利告诉鲁宾逊，这位参议员可以得到范·德万特的职位。接着，总统就召见鲁宾逊，表示可以接受关于这个提案的折衷方案。可是他补充说，有了新娘，还得有女伴娘。他要求鲁宾逊全权领导这个争取折衷方案的斗争。总统有意要使参院对于鲁宾逊的任命所表示的支持转为对自己有利。假如参议员们有意为他们的老同事效劳，他们就应该同意再任命几名大法官。这个计划的危险性在于：一切取决于鲁宾逊。

总统也并不那么信任这位多数党领袖。他对伊克斯埋怨说，鲁宾逊已经没有干劲，国会里没有领导。议长班克黑德在众院很不得力，雷伯恩一心想当议长，所以谁也不敢得罪。对于加纳，总统特别感到生气。这位副总统宣称他“耳鸣很厉害”，于是恰恰就在参院的斗争进入高潮时，跑到得克萨斯州去度他早已安排好的假期。可是，总统并没有直接向加纳流露他的感情。反而，在副总统离开几个星期以后，罗斯福在一封信中极尽劝诱之能事，敦促这位满腹牢骚的得克萨斯州人回来。总统深知加纳对于政府开支和劳工暴行心存怀疑，并且从他的人民主义的老观点出发，不相信银行家，因此总统预言明年将实行平衡预算，而且宣称，公众已经“非常厌恶产联和某些劳联工会中的极端分子，以及抵押（原文如此）信托公司所支持的格德勒之流的极端分子等等。”罗斯福最后以个人的口气提出请求。

“最后，为了证明你回来的必要，我还要告诉你，你不在这里使我多么想念你，并且也由于在和平地解决我国前所未有的许多重大问题中，你

作出了并将继续作出巨大的贡献。”可是，副总统仍然留在得克萨斯州。

加纳的静坐罢工象征着民主党的内部状态。不仅是关于最高法院的提案使“伟大联盟”发生了分裂。对于害怕劳工骚动日益高涨的保守派，对于不喜欢总统阴谋手法和个人处理党务的“老”自由派，对于尊重循序渐进和宪法传统的新政自由派等来说，对这个方案展开的进攻成了团结的基础。当有人要求罗斯福对劳资之间的僵持状态发表意见时，罗斯福为了要安慰那些人，便别有用心地说，“你们两家都讨厌透了。”刘易斯的抱怨和党内保守派冷冰冰的缄默表明，罗斯福企图周旋于各派之间，到头来没有获得任何一方的积极支持。

6月底，罗斯福又改变方针，这又再次表明他喜欢直接由个人处理问题。他在切萨皮克湾的杰斐逊岛安排了一个大规模的政治性郊游，民主党议员们应邀参加。这次郊游的目的是想通过三天的欢聚来排除党内的不和。总统兴致很高，在一株大槐树下，坐在手扶椅上，一面喝着啤酒，一面同一群只穿衬衣的立法议员们愉快地交谈。他甚至让得克萨斯州的马丁·戴斯把他拉进“欺骗民心的政客俱乐部”，而他则保证拥护一切有关支出的提案和卡住增加税收的提案，不做任何不利于他第三次连任的事情，不求始终如一，并不向国会提出引起争议的提案。

参议院内气氛阴沉，与这种田园风光形成鲜明对比。在那里，鲁宾逊一天天地会见各个民主党人，请求他们支持他的妥协方案。新方案是十分温和的，当一位法官年逾七十五岁仍不退休时，则可批准总统每年只任命一名副大法官。即便如此，鲁宾逊也觉得事情难办。他一般必须以他个人的名义恳求那些感到为难的参议员来帮助他实现他的一生愿望。当鲁宾逊在参院开始就这项提案进行辩论时，他使劲地挥舞手臂，向质问者回击。这时，记者们感到，他活象一头被敏捷的斗牛士逗得恼怒不堪、然后被他们的标枪刺中的老公牛。鲁宾逊日复一日大叫大嚷地威胁和说服反对派，并且一再拼命地盘算被他争取到的微小的多数。可是，他已走到了自己旅程的尽头。7月14日早上，他从旅馆的床上起来，走了一步，倒下去世了，手里还拿着一份《国会记录》。

把鲁宾逊的心脏震碎的那个打击同时也震断了这位多数党领袖的折衷方案所依赖的个人忠诚的纽带。大家纷纷反对这项提案。鲁宾逊刚在小石城安葬，那些乘火车伴送灵柩的国会议员们已经对这项提案展开辩论了。随同代表团去小石城的加纳，在返回华盛顿的火车的过道里逐个数人数。7月20日，他去向总统汇报。

罗斯福问道：“法院问题的形势怎么样，杰克？”

“你是要原貌的，还是加过工的，总统？”

罗斯福笑着说：“原样的吧。”

“那好。你输了，你的票数不足。”

未获成功却遭怨恨

有关最高法院的斗争草草地结束了。罗斯福要求加纳尽可能地安排一项最好的让步方案。可是由于最后几天的活动情况模糊不清，副总统究竟是否曾尽量保留这项提案的一些内容，或者干脆投降，就不得而知了。这时，没有人能控制国会。伊克斯埋怨说，“国会里简直乱成一团。”司法委员会十分恰当地承担了刽子手的角色，它提议将关于最高法院的提案重交审议。只有二十名参议员投票反对重提这项提案。一星期后，又经过一些修改，参议院草草通过了一项经过大加修改的提案，经总统勉强签署，成为法律。

关于最高法院的斗争的余波又同参院内关于民主党领袖位置的争夺纠缠在一起。密西西比州的帕特·哈里森和肯塔基州的艾尔本·W·巴克利为取得鲁宾逊的职位而进行了一场激烈的斗争，这场斗争由于使原来关系密切的俱乐部成员之间发生了分裂，所以变得更加严重。关于最高法院的斗争使早已对立的两种情绪激动。罗斯福同两位参议员的关系都好，可是有好几个理由使他更倾向于巴克利。这位肯塔基州人是个比较可靠的新政派，而且个人也更忠实于罗斯福；比如，他积极支持关于最高法院的提案，而哈里逊则持消极态度。再者，假如哈里逊获得了这个位置，他可能要辞去参院财政委员会主席的职务，而这个重要职位就会落入一位民主党保守派手中。

罗斯福显然有所倾向——可是他能否照此办理呢？如果他遵守总统不得干预参院内部事务的惯例，他就不能。罗斯福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表现了他的个性。表面上，他采取中立态度；他的确还曾写信给“我亲爱的艾尔本”，要求他为维护关于最高法院的提案的原则而继续斗争，可是巴克利既然是代理的多数党领袖，这种公开表示友谊的做法还是可以容许的。

总统在私下就丝毫不保持中立了。调查表明，参院的民主党人在这两个候选人之间差不多是平均地分裂为两派。每一票都很重要。哈里逊阵线中的突出的薄弱环节是参议员威廉·H·迪特里希，他担任参议员得于芝加哥的党魁爱德华·凯利的支持。罗斯福叫法利打电话给凯利，让他向迪特里希施加影响。法利加以拒绝，由于他曾经向有关的主要人员保证他不

干预这件事。所以总统找到霍普金斯和科科伦，他们则向迪特里希和其他人施加白宫的压力。哈里逊那一方面也起来施加压力。曾经保证投巴克利票的参议员哈里·杜鲁门只好向这位肯塔基人表示，要取消自己的承诺。改变态度的人当中有迪特里希，他从支持哈里逊转而支持巴克利。巴克利以一票获胜。这对总统是个重大胜利。可是此事使得早已伤了感情的参院更发脾气了。

关于最高法院的斗争过去以后，罗斯福着手重新获得对于一般立法计划的领导权。他对内阁说，国会对于已做的事情和留下未做的事情都应当负责。总统特别担心农业方面的形势。他说，假如明年农产品的价格下跌，很多民主党人就会在下次选举中落选。当罗斯福正在讲话时，伊克斯草草地在一张纸上写了一句话，递给法利：“总统好像在对副总统进行庭训。”

国会仍然陷于混乱之中。这届国会开始后不久，就在罗斯福的催促下通过了几项重要提案。其中一项就是格菲—文逊烟煤提案，规定政府和私人应在市场销售、价格控制和贸易实施方面进行合作。其余提案是，修订中立法案和延长贸易协定法。国会还颁布了农业租佃法，授权向农场佃户、租种农户和农业工人提供联邦贷款，帮助他们为自己购买农场。国会所做的这些，同总统在就职演说中就“全国三分之一的人口住房困难、衣衫褴褛、营养不良”等情况提出的艰巨任务比较起来，简直是微不足道的。

这种任务还能实现吗？7月底，有五项政府议案等待国会审议，即工资与工时、低价住房、行政部门改组、全国的农业计划和模仿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的基本方式建立七个地区性管理局。到了8月下旬国会休会时，这些议案中只有一项成为法律。这就是瓦格纳住房法案。值得注意的是，政府所获得的这个唯一的胜利，主要还是依靠瓦格纳和一群不辞劳苦的公共住房热心人士和院外活动分子，而不是由于总统的政绩。罗斯福确实帮助说服了众院一名关键性的委员会主席，要他把这项法案由委员会提交全体会议表决，不过这是在白宫犹豫了数周以后才采取行动的。

罗斯福方案的其余部分遭到了挫败，其理由也同样是值得注意的。失败的原因部分是由于罗斯福原来的打算，他本以为推迟其他主要法案，会促成法院改革的实现。后来，他似乎又转向另一极端，认为至少有一项议案——工资工时法——是深得人心的，它可以把由于法院改革问题而陷于分裂的民主党队伍团结起来。事实证明这两种估计都错了。

可是，罗斯福在立法方面遇到困难还有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这个原因反映了他的政治地位的战略上的弱点。问题在于，响应他的召唤而在

11月给予他个人支持的那个广泛的联盟已经四分五裂了。

工资工时法案遭到反对，说明这一联盟已经土崩瓦解了。当参议员布莱克于5月下旬提出他的“公平劳工标准法”时，罗斯福努力促使它获得通过。他说，“我们曾经答应过这件事，我们不能停步不前。”这项法案很快就遇到了麻烦。来自低工资各州的南部人士，包括哈里逊，在这个问题上反对了总统。劳工集团内部发生巨大分歧，这不仅是在产联和劳联的领导人之间，而且在这两大组织内部。这一切好像还不够，在主张低关税和支持高关税的民主党人之间，关于这项法案的一个保护性条款，又发生了纷争。南部的民主党领袖向法利和罗斯福施加压力，反对这项法案。经过一番斗争后，这项法案通过了参院，而罗斯福在把劳联主席格林请来，并且接受他的一些重要要求以后，才能使这项法案顺利通过了众院劳工委员会。接着，这个法案在规程委员会遇到共和党人和南部民主党人的联合反对而被否决了。民主党领导人召集了一次党的干部会议来支持这项提案，可是却没有什麼成果；到会的民主党员人数不足，不能成为一次正式的党的干部会议。

到了8月中旬，总统已经不想再为他的方案的其余部分战斗下去了。他决定秋天召到国会特别会议。他说，让议员们回到他们的选区去，等他们回来时，他们对新政的支持是会加强的。

可是，在休会前总统还有一项任务——一项很愉快的任务。范·德万特在最高法院里的位置仍然没有。

这是一件愉快的但却比较困难的任務。罗斯福要求一位可靠的新政人物，他必须比较年轻，南部人或西部人都可以，必须是个能干的律师，并且还要能够毫无困难地获得参院批准。最后一点是个难题，由于华盛顿的天气热得叫人发昏，参议员们的脾气变得更加厉害和难以捉摸。因为这个理由，总统倾向于选择一名新政派参议员。在参议员的几名人选中，他最后选中了布莱克，主要的理由是这位亚拉巴马州人曾全力支持罗斯福的政策；总统之所以属意于布莱克，还由于他将要再次进行一场艰苦的竞选斗争，也许还因为布莱克有个耳聋的独生子。尽管罗斯福对于布莱克在法律方面的才干评价不高，但他对于经过考验的自由主义者，比对于专家更为关注。虽然参院里也有人抱怨，但是惯常的情谊还是起了作用，经过短短的辩论后，布莱克得到了批准。

“雨果·布莱克终于进了美国最高法院，而经济界的保守派则气得坐立不安，总统则得意洋洋地四处张望伊克斯十分自得地在他的日记中写道。

总统的得意并不长久。大约一个星期后，布莱克赴欧洲休假，匹兹堡一家报纸以确凿的证据证明这位新法官曾经是三 K 党成员。据说，在讨论批准他的任命时展开的辩论中，布莱克既未承认，也未否认，这个传说是真实的。结果舆论大哗，新闻界对布莱克和总统进行了猛烈的攻击。

罗斯福对朋友说，“他不知道布莱克是三 K 党。这个问题很严重。”总统深感不安。他对记者说，只好等布莱克从欧洲回来再决定。他私下尽了一切努力。他叫伊克斯去找博拉，看他是否能帮忙渡过难关。惠勒和其他一些人要求总统对布莱克进行调查，罗斯福尤其需要博拉的拥护来证明总统无权进行调查。博拉完全同意。等到布莱克从欧洲回来时，罗斯福已到西部旅行去了，人们的目光都集中到这位大法官身上。

在新闻记者围攻下，布莱克来到电台，把他的问题摆在大概五千万听众面前。他批评了人们的偏执，举出他在国会中维护公民自由的成绩。接着，他用一种温柔的、别扭的南方声调承认他曾经是三 K 党成员，可是又说他早就已经同它断绝了关系。在重申他维护公民自由的成绩以后，他忧伤地说了一声“晚安”，便结束了讲话。

罗斯福对最高法院的战斗就这样宣告结束。

罗斯福的敌人们当然是十分高兴。在短短六个月内，总统就莫名其妙地摔了个大跟斗。在年初，他依靠 11 月所获得的巨大支持和在国会中享有的绝对多数，屹立在政治舞台上。那时，他似乎是不可战胜的。但是，现在他却打败了。

为什么这位政治舞台上的巨人遭到惨败呢？罗斯福的批评者们很快就作出了解释：骄者必败。罗斯福由于胜利冲昏了头脑，急急忙忙地向美国一个令人敬重的机构展开进攻。他过分自信，漫不经心地犯了一个又一个错误。权势冲昏了他的头脑。一些博学之士曾引用阿克顿勋爵的话说：“权力往往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导致绝对的腐败。”

事情真是这样简单吗？仔细研究一下关于法院的斗争，就可以看到实际情况比这种道德说教法要复杂得多。

在对法院进行改革的问题上，罗斯福并没有冒然从事。恰恰相反，他是在经过长期等待后，才在他认为是最有利的条件下，向最高法院动手的。他的方案不是仓促制造出来的；他研究了各种建议，从中找到一个既有机会通过国会，而又能达到他的目的的方案。他的方案也并不激进。同当时的一些宪政立法议案比较，这个提案确实是很让步的。

当时还另有一种说法，认为罗斯福过分自信，所以他一错再错，从而

在这项计划上遭到失败。同这场关于法院提案的斗争没有什么关系的人，如霍普金斯和伊克斯，积极实用这种说法。这种观点无法解释为什么 1936 年还十分精明的罗斯福，到了 1937 年就变成了傻瓜。如果说罗斯福没亲自指导这场斗争，错误是他的下属造成的。这种说法是错误的；他是从始至终亲自领导的。还有好些人归咎于罗斯福的古板，说他坚持原来的方案。但是，这种固执正是前一届任期内挽救了一些议案的那种品质，而当时则称之为坚定或果敢。在关于最高法院的这场战斗中，罗斯福确实犯了错误，然而他的对手也同样犯了错误。

所有这些解释都忽视了这种可能性：原来关于最高法院的方案根本就没有获得通过的机会。问题的关键在此。假如说，这个方案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的话，那么，法院的转变，范·德万特的辞职，鲁宾逊的死亡都只不过是这项法案遭到否决的几个阶段而已，而不是它不能获得通过的理由。

现在看来已很明白，关于最高法院的议案根本没有获得通过的可能性。罗斯福原来的提案根本就没有得到参院多数的支持。在众院，它势必碰到顽强古板的萨姆纳，随后还要碰到保守的规程委员会，它可以把这项议案压好几个星期不予处理。众院民主党领导人一开始就为这项议案在众院的前途担心。如果鲁宾逊还活着的话，他的折衷方案是可能通过参院的。但是，更大的可能是，这项提案在参院会因为遇到顽强的阻碍议事者而告失败，或者以后在众院被击败。

关于法院的改革无论如何都会是困难重重的。人们对于宪法的巨大尊敬，认为最高法院是宪法保护者的观点，大法官们（特别是休斯）具有的按照自己的方式进行回击的能力，在由大批律师所组成的国会中，那种根深蒂固的法治传统——所有这些全是阻碍。可是，在国会和全国也有许多人拥护对于法院的过分行为加以约制。对法院进行某种适度的改革无疑是可以通过的。

罗斯福提案的致命弱点一部分在于它的内容，一部分在于提出的形式。这个方案本身好像就是以一种含糊诡诈的态度来对街一个十分明确的问题。它只讨论司法效率而不触及思想意识；它的目标指向法院的直接人事问题，而不是法院造成的长期性问题。提出问题的方式——比如事情十分突然，罗斯福在大选时没有比较具体地摆出问题，他对这件事显然很感兴趣，他不愿意向内阁和国会领袖征求意见——这些都使他失去了一些可能的支持者。更重要的是，提出这个法案的方式使罗斯福不能组成一个支持这个法案的广泛联盟，并且也使他不能在发动进攻前解决各种各样的策

略上的细节问题——这些本是罗斯福十分擅长的幕后活动。

一位如此精明的政治家，在自己的法案尚未提出以前竟如此失策，部分是由于罗斯福本人的性格，部分是由于他对 1936 年底的政治情况的看法。

罗斯福显然变得很喜欢——也许他一向就喜欢——那种使全国惊讶，而叫敌人愤怒的计划中的戏剧性、紧张的悬念、舞台效果以及他本人运筹帷幄所起的作用。然而，问题还不止此。罗斯福完全以他个人的基础，才进行了一场竞选运动。他围绕他本人建立起一个克敌制胜的联盟——不是民主党，民主党的纲领，自由派的思想——而是他本人。他获得了惊人的胜利，完全没有理会那些怀疑者、叛逆者和挑剔者。他在竞选中使出的漂亮的手段，基本上都是他自己设计的。

罗斯福对关于法院的斗争所作的应对是他的竞选总统运动的必然结果。可是，这一次他所面临的是一系列新因素，那些老办法不灵了。这一回，他是要争取国会通过一项有争议的提案，而不是作为一个受尊敬的领袖。来为自己争取选票。他不能象以前那样运用自如，要取行胜利，就得把一些关键性的国会议员争取过来，并要通过错综复杂的关系。“伟大联盟”好像已经失去作用。斯坦利·海伊在总统支持下曾设法使“善邻联盟”活跃起来，但它毫无反应。在 11 月曾表现无比强大的工人和农民的队伍好像在春天已经瓦解。罗斯福求助于民主党，可是它却是一支松散和无组织的部队。他以一个“无声的危机”作为基础呼吁人们予以支持，但人民并没有看见任何危机。这已经不是 1933 年 3 月的情况了。

任命布莱克一事是整个问题在一个较小的规模上的重演。在这个问题上，罗斯福只询问了两三个人的意见，没有找过国会领袖国会山早就有人知道这个亚拉巴马州人同三 K 党有关系。在这件震惊一时的丑闻发生后，伊克斯说，假如罗斯福事先曾邀请一些领导人参与决策，他们是可以帮助保护总统的。结果却是罗斯福必须对一项个人作出的任命承担个人责任。布莱克继续担任大法官，特别是在公民自由方面获得得卓著成绩，可是当时对罗斯福并无好处。

总的来说，关于最高法院的斗争对总统的一次惨败。然而，这究竟不是一次致命的、无可挽回的失败，则有待以后形势的发展才能确定。多年后，总统看到法院作出了一连串有利于新政的裁决，这时他颇为高兴，认为自小败而大胜。然而，从国会和党内情况后来的发展看，还不如说他在战斗中失利，在战役中得胜，但是在整个战争中却打败了。

第十六章 罗斯福时代的经济衰退

罗斯福努力掩饰他在法院改革上的失败。他指出法院对一些新政议案采取了新的立场。他感到全国受到了教训，认识到有必要对宪法作广义的解释。可是他还是认为，斗争并未结束。“司法改革的一定会到来，正如上帝造人之确定无疑”，他写信给参议员格林说：“跟我一起干下去吧！”

私下里，这个失败使他深感痛心和震惊。法利看见他表面上同过去一样高兴，内心却因党内的反叛分子而非常不安。在内阁会议上，他朝着加纳说一些既是打趣又带嘲笑的话，而副总统则紧绷着他那长着粗密的白眉的面孔。在法院斗争令人心烦意乱的最后几个星期，罗斯福甚至好几次失去了通常那种泰然自若的神气。总统狠狠地把厄尔利训了一顿，因为后者就法院斗争发表了一篇讲话，报纸断章取义地作了报道。罗斯福甚至在白宫记者团面前大发雷霆；他之所以发火是由于林德利和其他记者把博斯·弗林的一次社交性访问说成是总统干预纽约市长职位之争的证据。罗斯福这次并不是偶然发火；他非把一次四十分钟的记者招待会变成了一大顿发火，还一再要林德利道歉。

更加突出的是罗斯福对待约翰逊将军的态度，这时他成了一个激烈反对新政的专栏作家。华盛顿传言说，尽然总统有言在先，但并非真心想把鲁宾逊安插在法院，总统对此大为恼火。约翰逊在他的专栏文章中指责罗斯福有意背信弃义，接着这位全国复兴署的原署长就被召开白宫。罗斯福一面读这篇专栏文章，一面挖苦地予以评论。总统第二天把后来的对话告诉了伊克斯：

“休，你这些东西要是写在老乔·鲁宾逊在世的时候，你知道他会怎么对你说吗？”

“不知道。”

“他就会说，休，你撒谎，你是个胆小鬼，是个流氓。”

约翰逊满脸通红，罗斯福又一字一句地把这句话复述了一遍。接着，据总统说，约翰逊哭了。

好玩的是，罗斯福的发火都跟报纸有关。他写信给驻西班牙大使鲍尔斯说，“那些自满而懒惰的报纸——要占全部报纸的百分之八十五——努力地反对政府要做的每一件事。刻画形势的最好说法是，1936年春、夏、秋天的竞选运动在1937年全年仍在积极地继续着。但是，选民们今天还和去年秋天一样是同我们站在一起的。”为了避开新闻记者和出版商，为

了再次体会一下群众的热情支持，为了在议会特别会议以前把他的计划交给人民，总统决定去西北部作一次巡航。

9月下旬，一长列总统专车离开首都驶经中西部的玉米地带，穿过怀俄明、爱达荷、蒙大拿、俄勒冈和华盛顿等州漫长的峡谷。竞选运动好象又在重演，罗斯福在车后的平台上侃侃而谈，同地方上的政治家们握手，同州长们和参议员们聊天。总统在博伊西对群众说：他觉得自己象安泰——“我通过同美国人民接触而重新获得力量。”然而当总统为大坝举行落成典礼和视察垦殖系统时，友好的记者认为他不是安泰，而是一位现代的保罗·布尼安，他在为建设中的庞大工程欢欣鼓舞时又在谈论将来的各种宏图了。

总统还打击了整党内的反叛分子。在内布拉斯加州，他故意不邀请曾经反对过法院法案的参议员爱德华·伯克来参加他的宴会。在蒙大拿，他一再赞扬默里而打击惠勒。在怀俄明州，没有邀请奥马奥尼，然而当这位参议员作为欢迎委员登上总统的专车时，罗斯福倒并不生气而是愉快地同他打招呼。可是后来他对卡斯珀的听众说，人民是不喜欢只是空谈目标而不取得动促其执行的政治家的。在博伊西——是警告全国的民主党的反叛分子吗？——罗斯福只是对共和党参议员博拉笑脸相迎。

旅途中，广大人民的反应使总统的精神为之振奋。他觉得人群好像超过了一年以前。他认识到人民并没有理解法院问题的本质，但他们仍然支持他提出的目标。在返回华盛顿的旅程中，他发表演讲要求扩大农业计划，实现工资工时立法，强调的是目标。接着10月5日在芝加哥，他忽然转变话题，引起了一阵轰动。

许许多多的人排列在总统经过的从车站到公共工程署大桥沿途，他要给这座桥举行落成典礼。罗斯福告诉人们说，他故意选择芝加哥来谈一个“肯定是关系到全国的”问题。很快他就谈到世界形势——他的说法是十六年来其他总统所未曾有过的。他间接地提到在西班牙和中国不断发展着的战争行动，以严肃的语调谈到文明的基础受到了猖狂一时的恐怖主义和国际间不法暴行的威胁。假如情况恶化，美国不能指望运气，西半球亦难免遭到侵犯。

“爱好和平的国家必须共同努力，反对那种撕毁条约和惨无人道的行为，这种局势今天已造成一种国际无政府状态和不安宁，仅仅依靠置身事外或保持中立是不能免遭其害的。”没有任何国家能够同这种广泛扩展的动乱隔开。“全世界百分之九十的人的和平、自由和安全遭到其余百分之

十的人的危害，这少数人要把国际秩序和法律统统推倒。”接着来的是罗斯福式的顶点。

“当某种传染性疾病开始蔓延的时候，为了保护居民的健康，防止病魔蔓延，社会许可并且共同对患者实行隔离。”总统很快接下去说，他决心采取一切切实可行的措施以避免卷入战争。他的演说以模糊的措词结束。他说：政府正采取措施以尽可能减少卷入的危险。然而处在一个信任和安全已完全消失的乱世，我们绝不会得到安宁。

人们高呼，表示拥护。回到火车上时，总统问塔利小姐，“你说怎么样，格雷斯？”她对群众的反应感到很激动，总统点头称是，说：“是呀，总算是做了。这件事非讲不可。”

然而总统的意向究竟如何？什么样的集体行动？什么样的隔离？回到华盛顿后，对罗斯福的强硬立场感到意外和震惊的赫尔保持沉默。党的其他领导人物也一句不说，出来说话的是反对党。和平主义者批评总统把人民推向战争的道路。孤立主义的国会议员扬言要对他进行弹劾。劳联通过决议反对卷入国外战争。国会收到的电报表明绝大多数人反对同国联在远东采取共同行动。

罗斯福后来对罗森曼说，“这种情况十分恐怖：你想领导，但回头一看，身后一个人也没有。”他对党的领袖不表态感到恼火，他们是应当表明立场的。他同自己的队伍被隔开了，不得不重新把关系建立起来。第二天，记者要求他解释这篇演说时，罗斯福就很小心了。他说，他的演说不是否定中立——甚至可以说是中立法扩大。

林德利说：“你说你所概述的情况同中立法毫无违背，可是我却觉得二者是绝对对立的，你的解释并没有使我明白。”

总统说：“细细想想吧，欧内斯特。”

“想了多年了。两者看来是根本对立的。假如你要同一个国家集团结盟，又怎么能保守中立呢？”

总统问：“你说什么？‘结盟’？你是说签订条约吗？”

林德利说那倒并不一定。他是指要和爱好和平的国家团结行动。”

“世界上还有许多没有试过的办法。”

林德利仍然很倔强，“然而，无论如何，这总不能算是一种中立态度吧——‘把侵略者’同‘世界上的其他国家隔离开’。”

“我可不能给你提供任何线索。还是你自己去创造吧。……”

几天以后总统更加收敛了。他宣布美国参加即将召开的关于远东局势

的华盛顿条约缔约国会议——这就明确地表明，对侵略国实行制裁的问题不存在了，至少当时是如此，因为日本和中国都是这个条约的签字国。

然而到了现在——1937年10月——在另一个领域，一场风暴又平地而起。

暴风骤雨

盛夏，股票已出现疲软现象。开始似乎是一种正常的滑落，人们也只提出了一般的解释——重新整顿，纠偏性的变动，诸如此类。然而情况迅速恶化。市场上出现了一阵阵抛售风暴，股票价格跌落到新的最低点。突然情况简直成了1929年的再现。委托抛售的函电从全国各地雪片般飞来，一天之内成交额就达到七百万股，连交易所自动收报机也几乎应接不暇。

内阁倾向于把这次下跌看作是一种人为的倾向；珀金斯小姐9月中旬报告说，统计人员估计商业活动不久就会回升。在一星期后的记者招待会上，总统甚至小心地表示了这样的愿望，即国家已经脱离了长期以来的基本紧张状态。一直到10月初，内阁成员还在谈论市场上的“纠偏性下跌。”

罗斯福处于一种自相矛盾的状态中。他认为经济情况基本上是好的。10月8日他对内阁说，他到各地去了一趟，知道情况是好的。农民的产品能卖到好价钱。他怀疑大财团对市场施加压力，同政府做对。“只要我们耐心等待，不动声色，情况自会好转。”然而总统在公开场合却不敢表示乐观。他最担心的是落到同胡佛一样尴尬的境地，三十年代初期，胡佛一再地发表充满希望的声明，结果成了无情的嘲讽。罗珀曾试图安抚他那个商业性的选区，罗斯福生气地对他说，“丹，我希望你不要再发表那些胡佛式的声明！”

按兵不动对罗斯福和对胡佛都一样无济于事。股票继续下跌；整个经济这时也开始下降。摩根索报告说，金融界极为不安。摩根索自己也极为不安。他对罗斯福说：“我们正直接走向另一次萧条。关键是，总统先生，我们该怎么办？”罗斯福很了解他这位财政部长，所以不会被吓住。他也没有被商人们纷至沓来的电报吓倒，这些人发出警告，提出建议，强烈要求有所措施——任何行动都行。他对记者嘲笑一位工业家，此人在一份长达三页的电报中称，他不是为大投机商或中等投机商说话，而是为那些从事一两万美金的小本经营的小投资者说话。

可是，经济下降的残酷事实是不能一笑置之的。11月初，珀金斯小姐在一次内阁会议上报告就业人数下降，而通常在这个时候是上升的。然后是长时间的讨论。当摩根索提议罗斯福公开地把当前情况同1933年初

的情况作一比较以稳定商业界时，总统面露难色，说：“啊，上帝、亨利，你是要我把记录重念一遍吗？”讨论的情况表明，内阁在行动方针上存在巨大分歧。摩根索、法利和罗珀要求对经济界持安慰态度，而伊克斯、珀金斯和华莱士则主张扩大新政策措施。政府的经济学家们也意见纷纷，无统一意见。

罗斯福几乎是如坠烟海不知所措。伊克斯从来没有见过他对事态的发展如此担心，急于从内阁拿个主意。从前曾经有一位总统，在两种对立的意见面前大声嚷道：“我真是搞不清这个税收问题。听听这边的意见，觉得好像很对。但是，上帝呀！我跟那边一谈，觉得他们也同样对。……天啊，这叫什么事呀！”也许罗斯福比哈定更有修养，然而其困惑之状并不少。他告诉记者说，他收到了两位知名经济学家的来信：

“一个说，整个问题是个资金周转的速度问题，因而用不着注意购买力的问题。另一位则说，不要考虑那个资金周转的代数公式；整个问题是一亿三千万人的购买力问题。”

总统最后差不多是哀叹地说：“这种研究简直是妙不可言。”

到11月中旬国会举行特别会议时，经济下降达到了十分严重的地步，已经不能公开地不予理睬了。总统对国会宣称，“自从你们8月休会以来，工业生产和工业利润在经过四年多相当稳定的发展后出现了明显的衰退。”他很快就补充说，在衰退开始前他已经觉察到经济情况不稳，又说下滑还没有达到严重的程度。“但是它已产生影响，使国民收入减少，这当然是令人关注的事情。”现在任务是遏止衰退的发展，又要为更长久的恢复奠定基础。

然而总统并没有向国会提交应付危机的计划。可能对恢复产生影响的两个项目——永久性的全国农业法和工资与工时法——都是正常会期遗留下来的。其它两项建议——行政改组和地区规划——也是一样。罗斯福之所以只是炒炒冷饭，说明他无法制订一项基本的经济纲领。

这种情况也许关系不大，因为这次特别会议本身就是乱糟糟的。参议院一开始在瓦格纳的反私刑法案上就遇到了一个怒气冲冲的阻挠议事者。在众院，罗斯福派的领导人经过许多交易才为一项请愿书征集了很多的签名，把工资工时法案从规程委员会里弄出来；接着由于劳联的某些派别和南部议员的反对，这项法案就象撞到了岩石一样，被彻底否决。农业法案的进展较快，但部长华莱士和农业局主席奥尼尔之间有分歧。行政改组和区域规划法案几乎毫无进展。圣诞节前不久国会休会时，罗斯福的四项提

案，一项也没有获得通过。

罗斯福的政敌们保持着警惕。他们还记得两年多以前总统在查尔斯登一次即兴发言中的一句话。“是的，我们在往回走——不是全部由于偶然，我的朋友们，也不是象车轮子那样转动一下，回到老地方。”罗斯福当时是这么说的。“我们比从前任何时候都更加稳固地回来了，由于我们原先这样计划的。别人怎么说，完全不必理睬。”现在共和党的一些演说家都讥讽地用这些话来奚落罗斯福。

有个记者谨慎地就这件事打听罗斯福的意见。总统没有生气。他说，1935年在查尔斯登是确有其事。“我们当时所做的是要在以后两年半的时间内，执行刺激金融和经济活动的政策，而且毫无疑问地收到了预期的效果。”然而，他补充说，以后对经济的刺激大大减少，“全国复兴法”和“农业调整法”已经被人搞得不象样子了。

罗斯福的答复不是完全真实。妨碍新政计划的不仅仅是最高法院。在寻求切实可行的经济政策时，总统自己就反复变卦。就象莫利后来尖锐地挖苦的那样，如果把他的各项政策看成是一个完整的计划的话，那就等于相信一个顽童卧室里收集的蛇标本、棒球赛照片、校旗、旧跑鞋等等是一位室内装饰家故意安排的设计。确实，罗斯福自己就自夸过他敢于试验。五年中，他曾经改变方向，转换速度，并且沿着自己的足迹往回走。

从经济上说，新政是一种装饰门面的机会主义货色。罗斯福曾试过紧缩经济，然后是扩大支出，后来又限制开支。他有时增加直接救济费用，时而增加公共工程支出。他曾经试行过有控制的通货膨胀，后来又实行物价管制。他曾经试验过经济上的民族主义，最后又鼓励赫尔的经济国际主义纲领。他的金融政策是七拼八凑的——放弃金本位，就沃伦价格理论进行了一次半途而废的试验，不认真地考虑膨胀的银本位经济政策，后来又同英法缔结了一项稳定金融的协议。

同时，试验毕竟只是达到目的的工具而不是目的本身。罗斯福也认识到这一点。他解释说，他的迂回曲折完全是为了一个目标——一种比较稳定的繁荣的经济，为人民群众提供较好的生活条件，尤其是对全国三分之一居住困难、衣衫破烂、营养不良的人。他说，在争取实现更伟大的成就的过程中，方法的改变不过是为了适应经济形势的改变。只要经济情况在好转中，这种说法倒还能令人信服。然而在1937年秋，这只不过是一种空洞的辩解罢了。

但是，罗斯福在一个经济问题上表现了一种顽强的坚定性和一贯性。这

就是平衡预算。当然，这并不是说他使预算得到了平衡——可是这始终是他的财政政策的中心目的。在第一届任期内，他翻来覆去地谈这个问题，直到它变成老掉牙了。1936年竞选期中，他曾经答应要平衡预算，1937年初他又满怀希望地估计一两年内预算即可平衡。在关于最高法院的斗争期间，罗斯福曾对加纳说：“我已说过几十遍了，预算将在1938年财政年度实现平衡。如果你还要我说的话，我可以再强调一遍，或者再说几十遍。”

奇怪的是，衰退好象只是更加坚定了总统要使预算得到平衡的决心。9月底他在邦维尔宣布，他预计“下个财政年度肯定会实现平衡。”他在记者招待会上又一再重复了这个声明。国会只愿意花钱而不愿意提高税收的倾向使他气愤，1937年整个秋天，他一直忙于设法削减开支。

这种努力在11月10日晚上达到了顶点。一直在要求总统消灭赤字的摩根索，向纽约政治科学院宣布，政府肯定是要使预算达到平衡的。这并不是什么新闻——但这却使罗斯福周围的新政派经济学家感到惊诧，因为在这篇演说发表前的一两天，他们从总统举行的一系列会议上得到的印象是，他正在考虑扩大支出的问题。他们还怀着希望猜想，摩根索是否是发言不慎？不是，实际上罗斯福事先已看过了这位部长的发言稿。

不管暗地里有多少怀疑，罗斯福表面上是坚定地要削减政府开支和平衡预算的。或许他希望作出这种保证就可以鼓舞商业界的信心，制止衰退继续发展。但是经济并无起色。

这是一个阴郁的12月，总统带了霍普金斯和伊克斯到墨西哥湾去钓鱼，可是此行由于他下颚感染发炎而不得不停止。伊克斯从来没有见过他那种无精打采、垂头丧气的样子；他甚至说，国会爱怎么做，就怎么做吧。12月中旬，日本轰炸机炸沉了美国炮艇“帕奈号”，炸死了三名美国人。假如日本不是恰恰在圣诞节前夕满足了美国的要求，一场危机眼看就要酿成。总统对全国发表的圣诞节祝词实际上就是一次宣扬“爱你们的敌人”的讲道。然而，1937年他最后的官方活动之一就是表示希望扩大美国的海军。爱你们的敌人吧——可是手里要拿着大棒。

为实现纲领而展开的内部斗争

新的一年——1938年——并没有给经济形势带来好转。商业指数继续下滑；对失业情况所作的特别调查证明了政府最担心的事情。失业人数在八百万到一千一百万之间。

总统保持着一副挺有信心的样子。他向国会发表了一篇长长的咨文，事实上是以十分认真的劝导口吻重申新政。他再次要求平衡预算，但假如

这个措施要使美国人挨饿或领取失业救济的话，那就作罢。罗斯福重提他的 1937 年的纲领，并保证他不会“使人民失望”。1 月初，他在杰克逊纪念日宴会上的演说就是呼吁“全国绝大部分公民”同他一起，按照杰斐逊、杰克逊和林肯的精神来制约极少数人的势力和特权。“我们知道会有少数人——在商人、银行家、工业家中只不过是一小撮——会拼命设法保持他们现在对我国工业和金融所拥有的独占性的控制权。同这一小群人会有一场战斗——我将高兴投入这场战斗，可是这又是一场决不与邪恶妥协的战斗——不获胜利，决不让步。”

总统在向国会发表演说以后，对众院共和党领袖斯内尔说，“伯特，就象纽约东区的人常说的那样，不是恳求他们，而是告知他们！”

然而告知他们些什么呢？事实上，罗斯福自己也茫然不知所措。对此他颇有自知之明。他担任了五年总统以后，在一场日益深化的经济危机中，还得重新学习经济译制中的那些奥妙方法，这实在使人觉得既恼人而又有吸引力。同以往一样，他更多地同人商量而不是请教书本。有一位纽约银行家曾经警告他不要去向那些不切实际的危险的理论家请教，总统写信给他，他会会见实业界人士比任何其他方面的人士都多。“如果你能够来到我的办公室，在我旁边坐上一个星期，那对你将大有好处，正象我每天大有收获一样，你也会在各方面大受其益。”总统再次同人们谈到深夜，仔细探讨他们的想法。

不幸的是，罗斯福越是向他周围人士和所召见的人们求教，他卷入自己的僚属、内阁、整个顾问班子在经济政策上的纷争而不能自拔的危险就愈大。并且他也愈来愈深地陷入了学院派经济学家们的论战之中。

秋季和初冬，罗斯福的保守派顾问好象占了上风。摩根索关于平稳预算的演说，罗斯福对这一问题一再提出的保证，大大宣扬节约政府开支的决心，在讲话中经常注意把大部分商人同极少数不法分子区别开来的做法——这些种种都是为了提高商业界的信心，鼓励投资者，支持股票市场。新年后不久，罗斯福在同记者举行的“预算讨论会”上说，最重要的事情是把下一个败政年度的预算支出削减五亿多美元。

总统的小心翼翼并没有使商业界感到欣慰，它主要是起了激起他周围的新政派分子的作用。到了 1937 年底，他们正把问题直接提交给人民。然而这只是一只弯回战术——他们的主要目标是要在罗斯福本人的经济思想中占据突出地位。

这时新政派已经成为一个相对稳定和统一的集团。他们在内阁中的领

袖是伊克斯、华莱士、珠金斯，还有到了1938年也许比上述这些人对罗斯福的影响都更大的霍普金斯。在这些知名人物背后是一群华盛顿从未有过的精明能干的谋士。热情奔放的科科伦和从前一样地证明，表现了他的非凡能力：即既擅长严格的技术性工作，又擅长辛苦的幕后政治交易。在这个时期中，一位影响越来越大的官员是联邦储备系统董事会主席，名叫马里纳·埃克尔斯，是一个来自犹他州的面孔尖尖的银行家。其它两个日益引人注目的明星是威廉·O·道格拉斯和罗伯特·H·杰克逊，前者当过教授现任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他有一头黄红色头发，后者是一位由于在司法部工作而出了名的纽约律师。在这些人后面有为他们提供图表、备忘录、进行分析的十几个不是很出名的经济学家和律师——劳工部的伊萨多·卢宾，农业部的莫迪凯·伊齐基尔，财政部的赫尔曼·奥利芬特，埃克尔斯手下的劳克林·柯利，霍普金斯手下的利昂·亨德森和戴维·K·奈尔斯。

1937年底，新政派分子东一批西一批地秘密集会，激烈讨论如何拯救新政。但是，在经济战略上他们有分歧。地道的凯恩斯派要求罗斯福开始执行更大规模的和更完善的支出计划。另一些人则要求采取老办法，剧烈打击托拉斯。新政派分子对当时罗斯福的政治倾向很不摸底，因此没有让他参与其事；再次，他们的策略是从左面增加压力来迫使他行动。

但是结果，罗斯福在一段时间内无意之中对于扩大开支派和主张打击托拉斯派之间的争端作了选择。秋天他曾在私下抱怨说，一些经济利益集团团结起来向他施加压力，这表明了总统的思想趋于哪个方向。杰克逊按照比新政早一个世纪的他的同姓人的传统，向商业界发起反击，把经济衰退归因于垄断者和投机商。伊克斯跟着抨击“六十家族”，他大声呼吁上述这些家族控制着美国经济。新政派并不仅仅是痛恨垄断者的经济权力而已，并且还严厉抨击他们企图攫取政治权力，试图对抗1936年人民的委托，甚至要把国家引向法西斯主义。伊克斯焦急地等待总统支持他们的进攻。罗斯福勉强支持了，但是他注意重申“缺乏公民品格”的只是极少数商业界人士。

打击托拉斯当时是件时髦的事情。要在新政与商业界之间挑拨冲突，要使罗斯福所面临的抉择更加艰难，再没有比这更好的东西了。因为商业界人士最主要的理由是，经济衰退直接来源于投资者对于罗斯福的政策和最终目的缺乏信心。缺乏信心意味着缺乏投资，投资不足意味着工业的车轮放慢。当新政派不留情地抨击商人的时候，商人们转过来要求罗斯福摒弃他的激进的顾问。

可是总统保持沉默。他仍然在摸索。只要他还没有看清道路，他就小心地周旋于新政派和保守派之间，避免得罪任何一派。而他则继续学习。1938 年的最开始几个星期，商人们应总统邀请不断地来到白宫，把他们的主张告诉他。政府在华盛顿还举办了一次小商人会议，这次会议十分混乱，以致不得不召来警察维持秩序。商业咨询委员会举行会议，其发言人艾夫里尔·哈里曼要求总统进行领导，以便他们团结在他周围，可是商人们怀疑总统仍旧毫无办法。其他一些集会的情况更加不好。在底特律，十万工人举行了一次要求救济的示威；三千名青年代表在华盛顿开会，要求制订一项“青年法”，以便给青年提供半工半读机会。

罗斯福必须有所行动，但又不知如何行动，他一会儿拣起这个方案，一会儿又求助那个方案。有一段时间，他在重新考虑恢复某种公共的和私人的全国规划的问题，尽言这不具备全国复兴法那样的规模。不久，他又改变方针；在同公用事业的巨头们交换意见后，他发言激烈反对公共事业控股公司，而这些公司本身就是一种私人性的方案。他抨击大企业在市场销售方面的种种做法，但又申明他并不倾向于任何形式的社会主义。如几年前的胡佛那样，总统警告不要降低工资；可他又对某些领域内价格过高，另外一些领域内价格过低的情况表示担心。罗斯福坚持说，他的全部政策旨在促进充分就业。但是，除了一些宽慰不实之词以外，他没有具体措施来支持他的政策。随着经济情况的恶化，全国所看到的只是一种凑凑合合、放任自流的政策。

一些经济学家推捉罗斯福增加政府支出，刺激经济，使商业界的活动能够繁荣起来。这些呼吁——许多学术界人士发出的——没有说动罗斯福，至少当时是如此。他认为，1933 年搞经济刺激是合适的，但在 1938 年并不适合需要，因为商业指数只下降了约三分之一。在这一点上，罗斯福多少是吃了当时环境的亏。他有两名亲信从思想上到工作上都对花钱有兴趣，但这时由于各自的因素而毫无作为。霍普金斯由于癌症不久前才进行了胃切除，1938 年的最初几周正在休养。而伊克斯为了把森林服务处从农业部夺过来置于他自己管理之下，几个月来投入了全部政治精力。

罗斯福现在受到的压力更大了，又象 1935 年初一样，他处于他所不能控制的力量和压迫之下，国会里的敌人讥讽他对经济衰退束手无策。他的朋友们则要求他重新承担起道义上的领导。华莱士写信说，“总统先生，你必须进行坚定而有信心的领导，这曾在 1933 年 3 月使你成为全国人民的幸福使者。”罗斯福能做的一切只不过是从小弄到足够的拨款，来应

付眼前必要的救济需要。他警告一位国会领袖说，假如国会削减救济费，他就在白宫前面挂出一块大牌子，上面写着“工人进步署不用在此提出要求”——还要画上一个大箭头指向国会山。

最终使总统动起来的是现实而不是理论。3月，股票市场的缓慢下降忽然变成了暴跌，别的指数也狂降不止。失业则继续上升。事实上。从去年9月开始的下降是这个国家所经历过的最严重的一次，连一些商业界领导人也小心翼翼地要求扩大开支。当罗斯福于3月下旬离开华盛顿去温泉时，他既担心又紧张。途中他在佐治亚州稍事停留，对于少数人的自私自利，对他认为实际上是法西斯主义的封建主义进行了他一生中最辛辣的抨击。这时霍普金斯已经重新开始活动，他带着新政派经济学家的备忘录在温泉同罗斯福见面，要求他批准一项大规模的支出计划。

罗斯福知道他必须有所行动了。他知道，为了人民——那些热爱他、曾经支持他的人民，他必需采取行动。在从佐治亚州返回华盛顿的火车上，他从窗户里看见那些平平凡凡的男男女女，他们——在他就职五年以后——依然在铁路边上等待着他，向他招手微笑。他对一位秘书说，“他们了解我们所要做的。”

一回到华盛顿，罗斯福就对摩根索说，他已经决定放弃平衡预算，重新扩大开支。当摩根索威胁要辞职时，总统回答说：“你就是不能辞职！”那样会使政府倒霉，而摩根索将会以临阵脱逃的罪名而载入史册。摩根索留下来了。

像过去一样，总统一旦改变主意，就决不再回头。4月中旬，他向国会提出了一个有关三十亿美元支出的计划，并在一次很长的“炉边谈话”中把这个新计划托付人民审议。两周以后，他要求国会对美国工业界经济实力集中的情况以及这种集中对竞争的低落所起的影响作一次彻底调查。国会对于他的建议反应强烈，没有几个星期就以绝对多数票通过法案，在下一个财政年度中拨出了三十亿美元的开支和贷款，而且成立了一个由参议员约瑟夫·C·奥马奥尼担任主席的“全国经济临时委员会”，其成员有参议员、众议员和政府官员，且有几十名专家，以便对经济情况作全面调查。短短几个月内，商业指数开始上攀，可大量的失业依然给经济罩上浓重的阴影。

经济学家罗斯福

在罗斯福第二任末期，一天，马里纳·埃克尔亲到白宫同总统讨论几个紧急的经济问题。本来安排他与总统共进午餐一小时——这是政府官员

要花好几个星期才争取得到的特权。但是使他很不高兴的是，他发现参议员麦卡杜插进来占了他的时间。当埃克尔斯终于走进总统的书房时，这位壮实的加利福尼亚州老人正站在罗斯福面前激动大谈他家乡的政治形势。

总统说，“请坐吧，马里纳。”他又对麦卡杜说：“马里纳和我就要吃午饭了。”

麦卡杜一心只想自己的问题，忽略了这个暗示。他说：“哪，不碍事，你们二位吃吧——你们吃你们的，我说我的。”

罗斯福伸手到他椅子旁边的热炉子上拿一个盘子，盘子很烫。他狼狈地来回换手，总算把它放到了埃克尔斯面前。总统摇晃着他那烫疼的手，埃克尔斯心里直着急，麦卡杜却还说个不停。他最后说：

“喏，富兰克林，你要记住。我最后给你留下一条建议。今后假如要在加利福尼亚州任命联邦法官的话，我希望你找我商谈，不要找那个狗娘养的唐尼。……”

麦卡杜终于走了。罗斯福对这一切一点不生气，这使埃克尔斯感到诧异。他弯身向前也谈起来。可是在侍者把餐具用车推走时，又有打岔的来了。法拉跳将进来，罗斯福从抽屉里拿出一个球，这条狗就为他主人表演衔回猎物的把戏，玩了好几分钟，埃克尔斯则有气无力地说些赞美的话。

“好啦，够了，”罗斯福对法拉说，“我得继续工作了”。埃克尔斯又开始谈，可是过了几分钟，他发现没有人听他的。罗斯福在屋里四处张望寻找法拉。忽然间总统叫道：“唉，我的天啊！马里纳，你看见了没有？”

埃克尔斯看见了。法拉正在角落里的地毯上干着不检点的事。罗斯福叫侍卫人员把法拉的鼻子按在它弄脏的地方，要它记住点，这就又耽搁了好几分钟。这时候埃克尔斯的时间就要到了。他带着一肚子气走了。他的同僚正在联邦储备大厦满怀期望地等待他。可是，他所能告诉他们的，只是加利福尼亚州的政治行情和法拉的所作所为。

这样的事发生过许多次。人们对于罗斯福处理公务的习惯感到惊奇——他可以参加一个又一个互相之间毫无关系的会议，就象一个在游艺室里的孩子时而玩这个玩具，时而玩那个玩具一样，他有本事把一件事全部抛开转而去作另一件事，特别是在人和事的无情压力之下他仍能安之若素，潇洒自如。当然，方法是本质的反映。罗斯福思想的敏锐和灵活非常适宜于新政的试验性阶段。1938年的罗斯福依然是个临时应变者，仍然是个实用主义者。

只有现实性是不够，罗斯福在衰退期间摸索和犹豫不决的情况反映了

他作为经济学家和思想家的短处。他不相信陈旧的教条式的经济理论，这在三十年代倒使他没有沦为一些冒险性主张的奴隶。然而，与此同时，这种不信任又切断了他同一位经济学家和一种经济学观点的关系，而这位经济学家和经济学观点是有可能为罗斯福在经济、政治和宪法方面的主要困难提供值得注意的解决办法的。

这人就是著名的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他既是一位学院院士，又是布卢姆斯伯里区一伙怪诞的家伙的领袖；不仅是经济学家，而且是个始而发财，接着亏本的投机商；既是剑桥大学的教师，又创立了保险公司。他既是个性性易怒的知识分子，同世界各地的实务家有密切关系，又是一个信仰自由资本主义的改良主义者。二十年来凯恩斯同其在经济学、工业和国际事务方面的非正统的观点向英国媒体挑战。他在1936年发表了他的经济学思想的杰作：《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通论》这本书里对人们尊重的理论和予以尊敬的名字进行的非难到处都是，古怪的名词和公式充满全书，中间还插进一些长篇的附件，读过此书者的人很少。但是它对美国自由派经济学家已经产生了明显的影响。

所以，在凯恩斯的佞屈罄于的文字下面闪耀着一个极其简单的中心思想。古典经济学家声诉，在景况不佳时期，政府即或不鼓励，也得容许实行低工资、低物价，而且大力平衡预算。在这一紧缩过程中，经过清理与净化之后，经济状况才会自己走上正常，并且好象从漫长的丘陵攀登高山那样，再次达到商业周期的顶峰。凯恩斯大胆地抨击这种观点。他向政府提出的建议的核心内容是，在萧条时期应当通过大幅度增加开支和降低税收的办法，故意造成预算的不平衡。只有通过消费者的大量花钱，政府或私人资本家的投资，经济才能恢复正常。

诚然，把任何单一的理论说成是一种“解决办法”是件危险的事情。并且，在经济学家和政策制订者当中，凯恩斯主义仍是一个争论很大的问题；其效果随着经济的性质、人民、条件以及时间的不同而受到很大限制。可是，有一点似乎很清楚，这就是，如果说实行赤字财政的主张有其紧急的实用性的话，那么，它是适用于三十年代的美国的，由于美国当时有一支失业大军，有丰富的原料，有一定的工业水平。

第一，赤字开支是符合宪法精神的。在一次社交聚会上，最高法院大法官斯通小声对珀金斯小姐说，“亲爱的，征税权足够满足你的一切需求了”，他事实上是在警告政府，同其他可能被司法活动所堵塞的途径相比较，它在整个财政领域内是有全权的。的确，著名的宪法问题权威，普林

斯顿大学的爱德华·S·科温教授就预言过“最高法院的衰落”，因为法院造成了一种难于从法律上对联邦拨款进行非难的局面，因此把开支和征税的大权留给了国会。

厉行巨额赤字开支的办法在政治上也是行得通的。尽管国会不停地大谈节约，可是至少在罗斯福前五年的任期内，它对花钱是积极的。国会议员愿意投票赞成一切开支提案而反对一切征税提案，这回来在政治上是老生常谈，可这二者的结合正好符合赤字开支。总统不时议论投入自己那份力量去反对国会中的增加开支派，例如关于退伍军人的退役费的情况，便是如此。假如罗斯福在1937年向国会提出的是扩大开支的讨划，可不是关于最高法院的计划和某些改革措施的话，那么，他也许既履行了他对三分之一住不好、吃不饱、穿不暖的人们所承担的义务，又提供了大量重新就业的机会。

赤字开支是非常适合罗斯福的思想和纲领的。他不是空谈理论的资本主义者；在担任总统的二十年前，他是一个推行新政的州参议员，支持过许多政府的控制措施和改革；充当威尔逊的助手和担任州长时，他信奉进步主义。他不是教条式的社会主义者；他从来未曾持有生产资料归中央政权所有的观点。既然他摈弃了这两种教条主义的解决办法，那么，在新政派正在探索一条可行的中间道路的时刻，凯恩斯的经济学确实是条中间道路。

作为一个注意实际的人，罗斯福是喜欢进行尝试的，“这能行吗？”对于大规模救济计划、退役金支出和金额膨胀来说，赤字开支在1935年和1936年起了作用。接着，就转而执行机反的政策；救济费削减了，商业银行的储备金要求提高了，银行拥有的债券减少了，增加贷款的速度减慢了。放弃赤字开支的这一转变关不起作用。这两次试验从不同的方向得出了同样的结论。罗斯福可能还会要求有机会继续进行试验，但是无限期地把国家当作实验室是不行的。

对于可能成为他面临的经济、政治、司法问题的理想解决办法的东西，为什么这位最注重实际的人竟会丧失机会呢？

这并不是由于凯恩斯无法与他接触。这样英国人曾经同总统通过信。1934年总统还曾和他会讨论。两人的关系颇为融洽，可是这位知识分子和这位政治家不是同一类人：罗斯福对于凯恩斯的“烦琐数字”将信将疑，而且有点惊奇地发现，与其说凯恩斯是个政治经济学家，不如说是个数学家；在凯恩斯这方面，却对总统在经济学上造诣不深而感到失望。

凯恩斯心情日益急躁地从英国注视着1937年后期的争骤衰退。1938

年2月1日，他给总统写了一封慷慨陈词的长信“三年前拜见时，承蒙热情接待。因而不揣冒昧，稍微说一下看法。……”在表示了自己并非无所不知以后，凯恩斯便对美国政府最近的经济政策有礼貌地提出了坦诚的批评。他说，1936的政府犯了“乐观的错误”。只是依靠了大规模的公共工程和其他投资，才有了复苏。政府在住房、公用设施、交通运输等耐用品方面，本来是有空前良好的机会去组织更多的投资的。

凯恩斯问道，投资没有增加，政府能不遭到批评吗？“对于住房问题的处理实在是很差劲的，”而建房可以大有助于复苏。至于公用事业，他们对政府提出诉讼是没有丝毫意义的。但是对于那些据说是很坏的控股公司，并没有人提出任何办法使之恢复原状。罗斯福应当做的是，要么同公用事业要好，要么就更强硬一点。凯恩斯倾向于将他们收归国有，可是假如舆论条件还不成熟，则“即使隔一个星期就非难公用事业一通”又有何益？至于铁路，要么就接管过来，要么就对经理们所面临的难题表示同情。

凯恩斯甚至就商人的性庆问题劝导总统。他警告说，他们有另外一套不同于政治家的幻想，因而需要不同的对待。可是，他们比政治家温和得多，对于虚荣的荣耀既是贪恋又是害怕，很容易被人说服去充当‘爱国者’，这时他们会茫然不知所措，甚至感到惊慌，但跃跃欲试的心情又使他们采取一种乐观的态度，或许有点虚浮，可又很缺乏自信心，感情很容易被美言所打动。你愿意怎样对待他们都行，只要你不把他们（甚至其中的大商人）看成豺狼虎豹，而是要看成天生的家畜，即便他们的教养很差，不象你所希望的那样受过训练。”

凯恩斯接着说，认为商人比政治家缺乏道德是不对的。“假如你把他们搞到激怒、固执、惊恐的状态，就像家畜在受到虐待时那样，那么国家的负担就不会为市场所分担；结果，民心就会转变方向。……”

最后凯恩斯说：“请原谅我这些坦诚的意见。”他列举了他热烈支持的美国政府的五、六项政策。“可是我非常担心，所有民主国家的进步事业将遭到损害，因为眼前的繁荣如果发生转变，将威胁民主国家的威信，而你对此却太掉以轻心。逆境并非一定要出现。但是，在现在的世界上要保持繁荣是非常困难的；而宝贵的时间又很容易失去。”

这种振振有词的号召并没有打动总统。他要摩根索代他给凯恩斯写封回信。总统未加修改地签署了摩根索拿来的陈词旧调的短信。两个月后罗斯福恢复了支出，但并不是凯恩斯要求的那种大规模支出。

罗斯福没有能利用凯恩斯及其主张，一部分原因在于当时错综复杂的

政治局势。罗斯福在 1932 年并没有一套完整的经济学系统，所以他便使用机会主义的手段，从左右两面攻击胡佛，既抨击他的政府无所作为，又抨击他的预算不能平衡。这样一来，至少从长远看，罗斯福就承担了平衡预算的义务，并且在他担任总统的年代中，他又在这个沼泽中越陷越深。预算越是不平衡，他就越是——严格地说是几十次地——固执说他有朝一日一定会使它平衡。他许下的承诺越多，那么，他给国会和党内的保守派提供的低押也就越多。在 1932 年和 1936 年的纲领中，他的个人立场都变成了党的策略。

未能利用凯恩斯及其主张的另一个原因在罗斯福的顾问们身上。其中有些人无理由地反对任何形式的大量支出。即使是那些倾向于采取新的经济计划的人们，也因为固于某种理论或政策而不能利用凯恩斯主张所具有的大的可能性。其中一些人主要关心稳定物价——他们是如此关心，以致他们想借此为打击大企业的主要依据。其他一些人担心通货膨胀甚于担心持续的失业现象。有的人主张通过提高税收对商业界实行惩罚——这也许是贤明政治，可同凯恩斯降低税收、增加开支的主张是相矛盾的。一些人对美国资本主义的前途缺乏信心，相信一种现实物质世界停滞论，不承认凯恩斯的经济学是一种根本出路。有的人则只相信用政府投资来刺激经济发展；政治可以给经济注入大剂量的购买力，就象在 1935 年和 1936 年的所做的那样，但是在这以后，商业就应当自己来管理自己。

甚而在他的自由派顾问们之间也存在分裂，这在一种程度上反映了罗斯的智囊团是随便拼凑起来的。即便这样，政府中彻底的凯恩斯主义者是很少的，而且大部分官卑职低，难于接近总统。再次，凯恩斯理论还很新鲜，以致某些统计和分析手段还不具备。

可是，罗斯福在经济领域内遭受挫折的主要原因既非由于政治形势，也不是由于他的顾问们有分歧。罗斯福以其政治上的足智多谋和随机应变，本来是能够突破党派和国会的限制的，至少在 1936 年和 1937 年初是如此。他也可以任意撤换他的顾问。他的主要问题是在思想方面。罗斯福完全不能作为一个思想家来抓住凯恩斯的经济学为他提供的机会。他之不能成为一位经济学家，只不过是思想上更大不足的一部分罢了。

这种不足的性质如何？罗斯福的脑子里非常活跃的，快速、锐利、敏捷、灵活。这说明在他的思想习惯方面。他看不起那种精雕细刻、细致入微的理论；他很少注意学术界人士经常给他送来的冗长而抽象的报告，建议他如何改革政府，如何把内阁作为一个机构来加强，如何对付国会。他

对抽象的东西感到讨厌。他思想上追求的是详细情况，是特定的、具体的东西。他总是用例证来回答概括性的问题——用某个行业，用堪萨斯州的一个农场，用海德公园里的一个问题，用威尔逊政府期间的某种形势。他喜欢于用具体的东西来回答问题。

他的工作习惯也反映了他的思想。他一天到晚，从早饭时急忙地浏览五、六种报纸，参加涉及十几个不同的问题的一连串会议，直到临睡前玩一会他收集的邮票，他的思想从一个题目跳到另一个题目，一个个题目拣起来，稍微地考虑，马上放下。他的思想习惯并不是杂乱无章，而一是段断奏的音乐。

罗斯福的精神生活方式是它的成功养成的。对于新闻记者，他善于妙语连珠。他喜欢卖弄他脑子里所装的对大量具体问题的令人难以置信的知识。有时候这里面也掺点假，由于总统会把话题转到一个他刚刚才知道的题目。可是对于刚刚出现的某个具体情况，他有掌握其所有特点与细节的卓越能力。比如，他了解每个州的错综复杂的政治形势和各种人物；他可以就住房、道路、人民、海德公园的历史一连谈上好几个钟头；他可以很内行地谈论好些工商业的活动和问题；他脑子里拿得出几百种关于物价、房租和工资的数字；他可以识别无数种鸟类、鱼类和树木；地理问题不会难倒他。

作为一个注重实际的人，他的许许多多批评者的无知一定也激发了他高傲的心情。好些实务家是一些已故经济学家的理论的奴隶，可罗斯福却可以用他们自己的事情及其与周围世界的关系的了解来揭穿他们的故弄玄虚。他愤怒地向朋友们抱怨商人提不出具体的建设性建议，这就是实践家反对理论家的可悲。罗斯福强调自己注重实际肯定也有一定过度的成分。漫画家们在 1938 年仍然把他描述成一个面目不清的理论家，旁边是一些呆头呆脑的智囊团成员；一位朋友曾经指责他说：“你基本上不是一个注重实际的人”，这位朋友在他孩童时代曾同他在海德公园的儿童室里一同做游戏，从那以后明显对他就甚少了解。

现在，命运以极大的讽刺把一种经济理论摆在这位讲求实际的人面前，而这种理论看起来却很不符合常识。鼓励支出，降低税收，反复地把这些办法作为一种正二八经的政策来执行，刻意造成巨额债务来达到繁荣——这种主张就其全部内容来说，只能说是一种奇怪的学术理论，可罗斯福在 1938 年就曾有过一肚子这类理论。政府扩大支出以刺激经济，以此作为一种临时性的紧急措施，他是理解的；可他无法理解把赤字开支作为

全面恢复经济的根本的和长远的办法。

赤字开支还对总统提出了一个独特的思想上的问题。假如说他在处理经济事务方面有某种贯性的话，那就是他在作经济决定时有一种习惯：要把两样相反的东西放在一起。“把你们锁在屋子里，不达成一致意见，就别出来，”对于一些在经济问题的前提上存在严重分裂的人们，他这样开玩笑地说——对于主张自由贸易的人和民族主义者，对于通货收缩论者和通货膨胀论者，对于托拉斯的反对者和集体主义者，对于开支论者和节约论者，他也都这么说。赤字开支的讨厌之处在于，假如只搞一半，它就不起作用。只有果断地予以实施，才会有用；否则，它只会因为增加公共债务而又没有充分提高支出和投资，而使商业界感到既生气而又忧虑。

总之，凯恩斯的办法包含着一种几乎是绝对的义务，而罗斯福却不是——一个愿意对任何一种政治或经济方法承担一切义务的人。他的思想就象气压计一样反映着在他周围对他个人和政策的压力。凯恩斯在三十年代曾说，“我们处在人类事务不寻常的一个转折点，只有解决了思想上的问题，我们才能得到挽救，除此，没有别的办法。”可是罗斯福的思想适应于处理各色各样的行动上和策略上的事务，而不适用于解决理性问题。

罗斯福作为经济学家的不足正如他作为政治家的成功一样突出。美国的民主政治的一大失败是它没有能证明一个伟大的国家可以给它的工人提供就业机会，给它的人民提供衣、食和住房。罗斯福没有能够做成的事，第二次世界大战却把它作为一种副产品而予以实现了，这使得共和党人后来指摘说，新政只能通过战争才结束了萧条。这也是罗斯福个人的失败。在他第二届任期的后一半时间内，这位曾在萧条问题上击败胡佛的人知道八百万或九百万人流落街头。他了解还有数百万人仍居住在低矮的小屋和经济公寓里，还有一些人生活在饥饿线上。1937年1月的伟大诺言会变成一个讽刺吗？

第十七章 波托马克河畔的困境

在大多数社会里，人民对于他们领袖的拥护往往同憎恨和畏惧密切地纠缠在一起。有的部落每年专门规定一个时间让人们向酋长扔秽物。在美国，就如杜利先生曾说过的那样，人们用砖头筑成凯旋门，当英雄走过时，他们就可以随手捡起砖头向他扔去。1938年初，伴随经济情况的恶化，罗斯福的威望也下降了。在那年夏季一次全国性的调查中，被征询者中只有一半人表示愿意选举罗斯福，假如当时要求他们投票的话。

上层阶层的怨恨和气愤比任何时期都严重、可怕。罗斯福遭到保守派的痛恨，其程度好像超过了布赖恩以来的任何一个美国进步主义者。一个公司的律师公开在华尔街募集一大笔捐款献给罗斯福，条件是他在五个月内辞职。

罗斯福的家庭只要出了问题，他的敌人就使劲攻击。在他担任总统初期，他的几个儿子经常在学校里闹点事，尤其是违反交通规则，报纸照例要大肆渲染。《星期六晚邮报》在一篇极力夸张的文章中指责詹姆斯利用家庭关系，得到了承保单。家庭中几起已成事实或正在办理中的离婚案引起公众注意，特别是在报纸的闲话栏内，成为要闻。尽管做父亲的尽可能地进行调解，可他并不希望他的孩子们的私生活要区分于他的公共生活。除了在家庭的小圈子里，他很少谈论这些问题，但是对他的子女的攻击——实际上是通过他们来对他攻击，使他痛心。因为最近十年以来他无暇顾及家庭事务和家庭问题，所以使他更加感到自尊心受到伤害。

乡村俱乐部里和宴会桌上流传着关于罗斯福的各种轶事。其中最有意思的一个是说：有个集邮家把他最珍贵的一些邮票拿到白宫请总统观赏，罗斯福趁他的客人不注意的时候，偷偷拿了其中最好的几张。一周以后，罗斯福夫人把这位收藏家约到纽约一家旅馆，偷偷把钱付给了他。那些追求时尚的男男女女，他们对什么都吹毛求疵，但对自己不断议论白宫主人这种毛病却理所当然，他们议论他的思想，他的腿，他的道德，他的家庭成员的道德等等，聊个没完没了。

罗斯福对于这些议论完全可以泰然处之，的确也早已如此。可他在其他阶级中的威望下降，却是另一回事了。对于人们态度的变化，他是十分敏感的。对于1938年和胡佛执政那几年之间的讨厌的相似之处，他决不能当之不存在。1938年，罗斯福不但在富裕阶层中，并且更重要的是在中等收入和低收入集团中失去了人民的支持。关于最高法院的斗争和布莱克的任命曾使人们反对新政，可也还赶不上罗斯福的经济衰退所达到的那个程度。

然而，人们的背弃究竟已经到了什么地步？1938年的重要事实是，大多数人对罗斯福丧失人心的预料在很大程度上超过了实际情况。1936年初至1938年底之间，他的威信在民意测验中的实际下降不过是百分之几而已。在1938年，即便他的声望下降到最低点时，他依然拥有大体上过半数人民的支持。这个多数也许比他在第一届任期内一些时候得到的支持还要多一点。不同的是，罗斯福在第一届任期内经常给人以甚得民心的印

象，而在 1938 年，这种印象已不复存在了。

人们对罗斯福的态度带有一种深深的矛盾现象。一方面，就他个人而论，差不多人人都很喜欢他。在被问到“总的说来，你是否喜欢他的个人品格”时，十个美国人中有八个在 1938 年春天回答说“喜欢”，只有一个回答“不喜欢”。黑人、一般贫民、工人和失业者积极支持罗斯福。西南部地区支持他的人数高达百分之九十八，其他一些地区也差别不大。尤其引人注意的是，不论是哪个职业集团——不管是经理，专业人员，还是业主——“投票赞成”总统个人的比例，都不少于该集团人数的四分之三。

新闻记者的报道与民意测验者调查的结果是相同的。“他们热爱罗斯福”，一位自由派记者理查德·纽伯格在同爱达荷的牧场工人，西雅图的车司机，克达伦的伐木者，太平洋联合铁路的司闸员，波特兰的电气工人以及其他一些人交谈后从西北部报道说。纽伯格发现，不管对新政有何反对，人民还是喜欢罗斯福的，因为他们认为他是在为他们谋利。很多人称他为“我们的总统”。只要他仍然是“我们的总统”，纽伯格得出结论说，那么，罗斯福就会继续在全国政治生活中起决定性作用。

可是，谈到罗斯福的基本经济目标和实现这些目标的方法，他的顾问班子以及他的许多政策，情况就不同了。在 1938 年春天被调查的人中，支持罗斯福的经济目标的人还不到一半；半数以上的人表示反对、怀疑或是不了解情况。不喜欢他的“办法”的人比喜欢的人要多得多。在黑人、穷人、中下层、中上层和富人这五大经济集团中，除前两个阶层外，其他几个阶层中的大多数人反对总统的办法。

贯穿在这种反对之中的，是人们对罗斯福的突出的政治权力具有的恐惧。对于这个抽象的问题，许多人认为，美国总统不应当有那样大的权力。在发表了意见的人们当中，大约有半数说罗斯福的权力太大，而在同意他的经济目标的人们当中，约有四分之一也有这种忧虑。对于总统权力太大的忧虑遍及各个经济阶级；尽管这种忧虑与各阶级对罗斯福及其政策的总的态度相似，但在中下阶级中却显得更加突出。

1938 年春天的媒体状况使总统骑虎难下。他的巨大力量寓于他个人的政治品性之中，在于他还能对选民产生魔术般的吸引力。他的弱点在于大多数的人对他的表面上强大的政治权力感到忧郁，就象一个妻子对待丈夫一样，她热爱她的愉快而又活泼的丈夫，可对他的判断力或自我克制能力却不那么放心。他能够把自己受人爱戴的名望转变为政治上的力量和领导吗？他能够把他仍然拥有的多数群众的拥戴转变为巩固和扩大新政所必需

的国会多数吗？他能够保持甚至加强自己的权力，而不致进一步恐吓那些对总统的权力已经感到害怕的人吗？

到了 1938 年春，国会山的事态发展使这些问题变得十分尖锐化了。

山雨欲来风满楼

1938 年 4 月，一位国会发言人打电话给白宫说，“看在上帝面上，千万不要再把富有争议的法案送来了。”

这是国会真正的心声。当时已是施行新政的第六个年头了，参议员和众议员从来没有象现在那样对罗斯福的领导犹豫不前。对于那些“必须通过”的法案，对于各种危机，对于指责国会为橡皮图章的作难，对于白宫里那些忙忙碌碌、好出风头的年轻狂热分子，他们已经感到讨厌了。就罗斯福个人而言，大部分议员在 1938 年，仍然同四、五年前一样喜欢他。然而，同一般人民一样，他们对于他的野心和权力，已经变得更加妒嫉和怀疑了。

尽管罗斯福同许多国会议员有个人关系，但这位新政总统同国会在政治上和心理上总有距离。仅仅在实行新政初期的危急日子里，总统和立法者们曾把他们历史上的冲突搁置了一下。这种冲突是宪法制订者精心加以设计并使之制度化的。国会有它自己的生活方式，同白宫那种快节奏的步调、紧张的气氛不同。事物在休息厅和会议室的那种平静而不拘束的气氛中比较平稳地发展。特别是参议员们，即便是辩论十分激烈的时刻，他们也仍然签署文件，或不紧不慢地交谈，从而体现了传统的政治活动方式：在十九世纪的会议厅的大理石廊柱和雕像之间展开活动。

在这种立法活动中主持其事者对自己的权力地位感到稳如泰山。三十年前，当罗斯福还仅是一个法律事务所办事员时就已进入国会的两名参议员和两名众议员，到了 1938 年仍在国会拥有席位。这四个人曾经见过六位总统就职，五位总统离职。他们当然期待在罗斯福也走了以后，依然留在国会里。大约有二百名议员是在罗斯福第一次就任以前就已进了参众两院的。这些人一二十年来一直连选连任，因而对于按照传统规定只能连任两届的总统，并不十分畏惧。许多国会领袖对于他们的州或选区内的支配几乎是不可动摇的。他们要么是曾为党在城市的组织尽过力，或者是同举足轻重的经济集团有关系，要么曾孜孜不倦地为自己的选民奔走效劳而博得了他们的欢心，要么自己拥有强大的政治组织。

国会里的一些规矩也巩固了国会领袖的权力。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论资排辈。提升为委员会主席的人肯定是多数党在该委员会中年资最长

者。主席一职意味着有权召开或不召开委员会会议，有权让法案立刻通过或者是否决掉，有权对委员会所属范围内的政策发表权威性意见。这些曾被伍德罗·威尔逊一度称之为“业主老爷”的议员们，同一心迎合选民的官僚，以及总部设在华盛顿的全国性重要组织的代理人保持着紧密联系。他们是一些老练的议会专家，对国会的一套规程和习惯了如指掌，懂得比如法定人数、议事规则、阻挠议事等等的微妙与差别，掌握一二十种设置障碍、进行推迟的办法。

因为南部是一党制，并且政治上变化缓慢，这样就必然使南部人能够积累年资，从而在民主党执政期内获取重要的委员会主席职位。1938年，主持参院两大财经委员会的是反对新政的民主党人：拨款委员会主席是弗吉尼亚州政界的首脑人物，精神抖擞、白发苍苍的卡特·格拉斯，商业委员会主席是密西西比州的那个天性幽默、肥胖的帕特·哈里森。负责农业和森林的是南卡罗来纳州固执成性的老科顿·埃德·史密斯。在1936年党的代表大会上，当一个黑人起来讲话时，他竟退出了会场，嘴里抱怨说，“这个人是黑皮肤——黑得跟墨水一样。”下院的许多委员会也是南部人把持的。负责农业委员会的是个得克萨斯州人，银行和货币是阿拉巴马州人，司法是得克萨斯州人，公共土地是路易斯安那州人，赋税委员会是北卡罗来纳州人。

南部人在国会势力很大的另一因素，可能是罗斯福为了在1932年得到提名而承担了义务。加纳之所以同意接受副总统提名，一部分就是由于罗斯福承认南部人、尤其是得克萨斯州人在国会中的势力。最重要的一项让步是雷伯恩是多数党领袖的继任者，接着再任众院议长。另一名竞争者，纽约的众议员约翰·奥康纳背弃了新政，部分理由就是因为总统答应了雷伯恩的要求。罗斯福还要偿还1932年对另外一些南部人欠下的债。

诚然，参众两院一些关键性委员会的主席是北部人。其中一些头面人物是罗斯福的老朋友，比如参院银行和货币委员会的瓦格纳，在众院劳工委员会的玛丽·T·诺登，他们一直是投票支持新政法案的。可是，一些偶然因素，官场中的俯仰斗争以及美国党派政治中的宗派主义和地方主义也让一些反对罗斯福新政的北部人士当了委员会主席：除了国会中那个权力最大的众院裁决委员会的头头，好斗的纽约州人奥康纳以外，仍有多年来与罗斯福的关系一直冷漠的纽约州参议员洛伊尔·S·科普兰，与罗斯福在最高法院问题上发生冲突、现在已被划在小圈子外的蒙大拿州的惠勒。

惠勒一次曾轻蔑地问一个白宫人员，“罗斯福算老几？各路诸侯中他

不过是一路而已。西北部是我的老家，南部是休伊·朗的天下。”他还提到其他地区的一些头面人物。但是总统同朗过不去，现在又同这位蒙大拿参议员作对。“他就象个国王，一心想罢黜诸侯。”

1938年的国会并无意废除新政。可它也不愿扩大新政，来实现罗斯福关于改善占全国人口三分之一的人们居住困难、衣衫破烂、营养不良状态的豪言壮语。

由于1936年的“土壤保持和国内土地的分配法”是一项匆匆通过的措施，它被用来补足最高法院废除原来的“农业调整法”所留下的空白，因而国会在1938年会议期间很快就通过了一项新的“农业调整法”。这个法案包括棉花、稻米、烟草以及小麦、玉米，给种植这类作物者规定限额，对于在分配面积内进行种植者和遵守规定的土壤保持方法者给予补助。政府还可以给予各种农产品贷款，以防止农产品大量过剩时价格猛跌和建立常平仓。假如三分之二的农民同意的话，还可以建立人为的市场控制，来管制剩余农产品。这项法案还包含运输费用调查、农产品新用途研究、购买剩余农产品以发给领取救济者。它为此后若干年联邦对农业的管制奠定了基础。

为农民做的事就是这些。对工人又如何呢？1938年中通过了一项没有任何实际内容的工资工时法案。国会在扩大新政方面所愿做的只是这些。等到要求授权罗斯福控制他自己管辖下的行政部门时，国会里的议员们就公开抵制了。

到了1938年初，对于国会能否通过工资工时法案，有的新政派分子已不抱希望。在1937年例会和特别会议期间，原来的提案已在南部民主党人和劳工集团之间被轧得粉碎。可是总统决心争取通过这个法案。尽管他对南部抛弃这项法案感到恼怒，但还是勉强作了让步，在法案中承认了南北部的工资差异，以争取南部人的票。他试探了劳联对它提供的支持需要多少代价。可罗斯福不肯过分地妥协。当众议员马丁·戴斯要求对南部再作出让步时，总统忍不住了。

他命令麦金太尔说，打电话给马丁·戴斯，告诉他，一个州就想改变全国性的工资工时法案，这种计划不但不合理，而且会在迫切需要购买力的阶层中破坏这个法案加强购买力的有效作用。总统认为，这是他所听到过的最没有道理、最危险的提议。还要告诉他，如果开始为石油工业立法，那就是在帮助和鼓励那些想排除罐头厂、乳酪厂和木材厂的人们，而这是毫无道理的。”

可是，有哪项法案能够不作“没有道理的”让步而获得通过呢？白宫和劳工部花了几周寻找一个方案。没有哪个办法能使各方面满意。4月中旬，众院劳工委员会面临严峻的选择，要么接受劳联提出的南部与北部不分的法案，要么赞成南部人支持的授权一个五人委员会来核准这种差别的草案。劳工委员会的委员们被围在这两大集团之间，企图推迟不决。罗斯福不答应他们这么做。劳工委员会投票否决南部人的草案后，主席玛丽·诺顿努力使那些提出抗议的委员们继续坐下来开会，直到把劳联提出的草案提交国会审议。

由于对南部和北部不加区分，因此法案在南部人控制的规程委员会里遭到激烈反对。要使法案脱离这个委员会，就必需有一份撤销申请书。然而，能得到这么多众议员在申请书上签名吗？这种事曾经成功过一次，可另一次则失败了。在这种困难情况下，政府耍了一个狡诈的政治花招。

参议员克劳德·佩珀是一个坚定的罗斯福派，他正在佛罗里达州为了获得重新提名而进行艰苦的斗争。许多观察家认为佩珀的希望似乎不大，可白宫掌握了真实情报，知道佩珀将会获胜。于是就产生了这样一种想法，认为假如能够劝说佩珀在竞选中赞成工资工时法案，那么，就可以把他后来的获胜说成是反映了南方对这项法案的反应。罗斯福的助手们给佩珀的竞选管理人至少送去了一万美元。这笔钱是助手们由于另外一笔交易而从二个无线电公司总经理那里要来的。

这个计谋成功了。5月3日，佩珀大获全胜。三天后，撤销申请书公开征集签名。涌向这份“光荣榜”的众议员是如此积极，以致众院的议事活动都给捣乱了。不到三个小时，就得到了必需的二百十八人的签名。5月24日，经过长达十二小时的激烈讨论后，众院以多数票通过了这项法案。由于众院这次通过的提案与一年前参院的那份草案有很大差异，因此直到最后一刻，这项法案仍然处于危险中。南部议员议论说要阻挠议事，格林则威胁说，如果重新加入关于区别对待的规定，他就要反对这个法案。可会议的一个委员会聪明地找到了一套折衷办法，这项法案终于在6月成为法律。

“就这样吧，”罗斯福在签署这项法案时如释重负地叹了口气说。这是失望的心情。这项法案在经过国会的漫长历程中已经大为修改，它对国民经济已经没有什么作用了。这也许是预示未来发展的一声叹息。工资工时法案是国会通过的罗斯福最后一项基本新政措施。在通过它在最后阶段，总统在国会中又遭逆到了一次令人吃惊的挫败，说明他已经不能支配立法了。

招致这次失败的那项议案，从表面上看，是罗斯福提出的议案中争议最小的。并且，这项议案本意在于满足商业界的坚决要求，他们认为应从效率和经济出发，改善行政管理。过去的总统，如塔夫脱和胡佛都曾提出过机构改革的提案，其大刀阔斧的程度不亚于罗斯福的提案。总统的提议是以路易斯·布朗洛为首的一批政治学家和公共管理专家制订的，建议要求增加白宫人员；加强总统的管理机构，包括由一名人事主任来替代由三人组成的“文官委员会”；“自下而上、自上而下、由里向外地”扩大择优录用制度，实际上要包括所有非决策性的职位；内阁中增加社会福利和公共工程两个部，将各个独立机构按职责归于各部；将帐目和交易的职责划归总统，并且加强对决算的独立控制，由审计长直接控制。

当罗斯福在1937年1月要求实行这些改革时，他遭到了国会的冷淡和沉默的拒绝。因为关于最高法院的法案占据了舞台中心，因此这项建议一连好几个月毫无进展。直到1938年2月底，机构改革问题才提到参院。

当时的情形极为不利。罗斯福仍然在萧条中挣扎。工资工时法案依然使国会处于分裂状态。在反对派的势力威胁下，罗斯福同他的十几名助手——伊克斯，法利，霍普金斯，科科伦，杰西·琼斯等人——一齐投入战斗。各州的政客接到了紧急电话，要他们向踌躇不决的参议员施加压力；并且炫耀诱人的钓饵；成交拉关系的交易。可是，尽管如此，这项议案也只不过是参院通过了几次试验性表决而已。

到了3月底，全国掀起了反对的风暴。机构改革被称为“独裁法案”。马萨诸塞州的参议员沃尔什说，这个问题是“向民主体制的心脏插进一把刺刀”。一位专栏作家声称，这是一场反对可能出现的希特勒的斗争。“维护宪政”委员会向全国雪片似地发出信件和广告。演讲者们在英格兰的城镇集会上大声呼吁，表示抗议。上百个保罗·里维尔骑着马，举着写有“反对独夫统治”字样的旗帜充满华盛顿，沿着宾夕法尼亚大街蹄声得得地行进。库格林神父在广播里发出愤怒的谴责。这是关于最高法院的斗争的重演——可能还更加尖锐，更加激烈。

在这场斗争中，一天，总统带着他那一贯的微笑坐在那里，新闻记者们一拥而入。总统的桌上摆着一把弯刀，这是人家送给他的一把土耳其马刀。罗斯福微笑着说，“他能在三十步以外把它插到墙上。”

一个记者问道。他能在宾夕法尼亚大街投多远？总统笑而不答。即便是弯刀，现在也没有任何用处了。当那项议案终于离开参院、进入众院时，风暴达到顶端。千千万万份谴责这项计划的电报飞向立法议员。因为

奥康纳和他的规程委员会反对这项计划，因而领导人无法确定有关这次辩论的具体规定。一开始他们就对法案失去了控制，很快这项法案就陷入议会的罗网之中。阻挠议事者无休止地利用议事规程、法定人数、个人特权问题来推迟审议。辩论一天天拖下去，强大的利益集团步步进逼，要求不要改组他们心爱的机关。

罗斯福被迫采取守势，他既要努力对付那些集团的压力，又要驱除被煽动起来的群众对总统权力过大而产生的担忧。考虑到在关于最高法院的斗争中，人们把他的失败归咎于做出的妥协太少，并且时间也太晚，所以他开始考虑让步问题。教育部免于改组，因为宗教集团普遍担心把它重新安排在其他政府机构中以后，则会加强联邦对它的控制。在退伍军人组织的抗议下，退伍军人管理局也免于改组。还有一些重要机构得以逃脱。最重要的妥协是关于总统权力这个关键性问题。原来的法案规定，只有在参众两院都有三分之二的多数反对时，国会才能否决总统关于机构改革的提案；经过让步，只需要多数票就可否决。这样一来，要击败总统的改组计划就容易多了。

罗斯福为驱散群众忧虑而采取的行动既突然，而又有戏剧性。半夜，留在温泉的记者们被召去拿总统发表的一份声明。声明说：

“（一）我不想当独裁者。

（二）我不具备成为一个成功的独裁者的条件。

（三）我的个人经验和我对当今的独裁制的全部理解，让我绝对不想以任何形式的独裁制来代替象美利坚合众国这样的民主制度。”

总统接着谴责这种“挖空心思故意制造的党派对立和政治上的对立”。他承诺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他都愿意在机构改革问题上同国会保持协调一致。最后他举出一些事例，证明“一些想使 1921 年至 1933 年间的执政者复辟的人，或者在由于某种不可告人的理由企图推翻现政府的人，无中生有地使人们产生了一些愚蠢的幻觉。”罗斯福的话语之激烈反映他当时是十分的心痛和恼怒。

这一切却毫无作用。4月8日，众院以 204 票对 196 票的微弱多数将议案退回委员会。表决结果一宣布，会厅里的议员们兴高采烈。白宫陷入困境。法利和厄尔利要求总统同国会调解。伊克斯因为失去了把森林署合并过来的机会而十分黯然，他请求总统继续斗争下去。科科伦却认为，总统应当自己决定究竟是象赫伯特·胡佛那样下台呢，还是象安德鲁·杰克逊那样退出政治舞台。但是罗斯福不愿再费劲地继续斗争了。他已转向另一

件更急迫的事情：他的支出方案。他写了一封信给多数党领袖雷伯恩，“感谢你这一场斗争……”他还说，对个人不记恩怨。

其实不是不搞报复——只是还不到时候。

咒语失去功效

1938年春天，休·约翰逊高兴地吹嘘说，“罗斯福的那套法宝不灵了。他已经不能只靠好听的口头承诺和讨人欢心的笑颜来拢络和率领他那支福斯泰夫式的杂牌军了。”全国报刊和电台的权威评论家们似乎也持相同的看法。罗斯福的咒语不灵了。但是，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关于这个问题，众说纷纭。

有人说，这位老牌政治家已经不如以往机敏了。但是，密切注视罗斯福的记者们却对此不以为然。总统的“炉边谈话”富有感染力，一如既往，对于来访者，他甚至比以前更讨人喜欢，更能打动人心，气宇轩昂的姿态也并未稍减。如果说有什么变化的话，那就是他的洞察力在担任总统的岁月中磨炼得更加敏锐了。在每半周举行一次的记者招待会的斗争中，总统总是游刃有余。有个参议员建议，对于故意捏造虚假新闻的报纸，应当判以重罪。当有人要求他对此建议发表意见时，他迅速答道，“我正在设法削减开支，我不想再多搞监狱！”某次在记者俱乐部的宴会上，几个记者想耍点小聪明把他难倒，就在一张菜单背面写道：“我谨任命赫伯特（也是一名记者）为驻北极大使，”然后摺叠起来把字遮住，并把这张菜单送给罗斯福，要他“签名”留念。当这一纸任命状退回时，他们发现“北”字已被罗斯福改成了“南”字，并且一板一眼地写道：“北极大使的位置上已经有人了。”

罗斯福的政治才能或机敏丝毫没有比以前逊色。但另外一种传言是，1936年的竞选胜利后罗斯福产生了刚愎自用的坏毛病，这使他在法院改革这场败仗中采取了笨拙的策略，而这次失败又打破了罗斯福用纸糊起来的政治神话。有人认为，假如法院提案提出的方式更为稳妥，或者寻求妥协的意愿更强一些，这项建议本来是可以通过的。如果此说能够成立，那么前一种解释也不无道理。但是回顾一下事情就很清楚，任何重要的法院改革提案，事实上，任何重要的行政改革提案都是不能在1937—38年的国会中顺利通过的。总的来说，罗斯福在国会中的失败，其原因其实远不是这么简单。

研究政治的人在探求这种更深层的原因时，往往注意到这一历史事实：杰斐逊、威尔逊、西奥多·罗斯福这样强有力的总统，他们在第二届

任期内没有不遇到极大的困难的。当一个总统的权力在规定的某一日期就要宣告结束的情况下，权力焦点就由白宫转向内阁成员和千方百计地想夺取王冠的那些参议员。罗斯福正是遇上了这种历史形势中固有的周期。从某种程度上说，情况的确如此。但是作为一位精明的政治家，罗斯福还有一种巨大的反抗力可以运用，即他对 1940 年提名的控制权。罗斯福对他的密友说——这话很快就众人皆知——获得提名的，将是一位符合总统标准的民主党新政派。其中深意就是，他打算自己挑选继承人。同时，也并不排除罗斯福自己参加竞选的可能性。罗斯福巧妙地玩弄这种可能性，甚至在他第二届任期开始后六个星期，虽然他在民主党的庆功宴会上笑谈他对 1941 年 1 月 20 日的打算，并且似乎排除了这种可能性，但其实也仍然如此。

另一种解释关于罗斯福失去对国会的领导权的则很简单。他们认为，在罗斯福的声望衰退期间，选民对他的好感已大大下降。国会议员们一发现自己的选区产生这种现象时，就赶紧重新调整阵营了。这种解释也有一些道理。但从另一方面看，罗斯福在关于最高法院的斗争中遭到挫败，是在他的经济衰退以前，他个人仍然享有很高的个人威望。再者，第一届任期内，他在人民中的声望曾大大下降，直到 1936 年才又上升。没有哪位国会议员敢肯定这位富有弹性的白宫政治家的声望不会再次反弹。

那么，对于国会的反抗又作何解释呢？并不令人惊奇的是，当时的观察家未能找到真正的解释。只有对罗斯福的第一届任期看得更加清楚，他与国会当时关系的实质显现出来以后，基本形势才一目了然。形势的实质是：在第一届任期内，罗斯福是依靠他的灵活手腕和主要是私人关系来同国会头目打交道，并且利用人们对危机的反应来控制国会；但他想的只是在国会取得近期的暂时胜利，而没有注意通过国会的一般议员建立起一种牢固地位。

一开始，罗斯福就以其一贯的实用主义精神，来对待国会中权力分配的实际情况。既然各委员会的领袖有权，他就同委员会的这些实权人物打交道。在进行这种接触的时候，他是十分擅长于讨人欢心，他处世所以圆滑得体，灵活变通，并且还善于把握时机，而且对于头头们本人的政治问题又是如此敏感，所以重要法案的成败往往取决于总统个人的运畴能力。他一再博得格拉斯、哈里逊、泰丁斯、萨姆纳、道顿这类人的支持，并不是因为他们本人喜欢新政，或者具体地支持某项法案，而是他们乐于和甘愿听命于总统个人。罗斯福的领导才能在于他能够敏捷而又十分得体地交

替使用说服、哄骗、奉承、欺诈、交际、承诺、讨价还价等手段。他在人事关系上的那种罕见的本能使他能采用最合适的办法使最不乐意合作的议员改变主意。

斯坦利·哈伊曾经一度担任总统助手他认为，“也许可以有把握这么一说，在 1933，1934 和 1935 那几年，前来拜访总统的有一定政治地位的人，其数目打破了记录。他们带着一种原有的反抗心情走进总统的办公室，出来时却当众宣布他们同意了原来他们并不同意的事情。”

一个办法只要能起作用，就是一个好办法，而这个办法确实也起了四年的作用。但它在第二个“百日”受到了严峻的考验。罗斯福却在 1935 年会期的末尾最终设法使得一头雾水的国会通过了新政的长期性立法，这是对他在推动、诱使和说服踌躇不前的立法者采取行动的能力的最后礼物。

但是也要付出代价。即便在一些重大议案在国会中经过讨论得到通过时，在平静的表面之下沸腾着对白宫的深刻不满情绪就爆发出来了。当 1935 年的纲领勾画出未来的前景轮廓以后，格拉斯等人就同政府决裂了。就连贝尔纳斯这样的忠实分子也埋怨说，他们不得不替白宫“忍受许多委屈”，他们快要崩溃了。当罗斯福狡猾地隐藏形迹，想法设法使国会通过法案时，议员们也必须改变自己的态度来为白宫撑腰。他们不得不代人受过，而现在他们却不愿再蒙冤屈了。

众院里面的不满情绪最为强烈。政府支持者对罗斯福抱怨说，党的组织和纪律已土崩瓦解了。白宫民主党筹划指导委员会总统与众院的党员之间的纽带实际上根本不重视。1935 年 7 月，霍普金斯同这个委员会举行一次团结会议，会上，委员们一个个站起来痛斥政府忽视下层，反对某些任命，甚至扬言要对白宫采取报复。

1935 年后期罗斯福有了一个喘息机会，1936 年他提出了一个有限的立法纲领，这使得内部必须注意团结，这种状态推迟了反抗。总统为了实现他帮助占全国人口三分之一的贫苦人民的纲领而努力，却也加剧了他在第二届任期内面临的严峻挑战。

新政是否都已经真正贯彻了？是否已成为过往云烟？被 1936 年拥护罗斯福的高潮卷进国会的那几十个年轻的新政派分子怎么样了？在国会形成支持扩大新政多数派的，是不是他们？

他们本来是可以对这个目标起作用的——但是他们始终没有得到过机会。因为罗斯福依靠德高望重的民主党人，对此他得付出另一笔代价，就是加强了这些领导人物在国会的势力。他承认了他们的政治地位，认可了

他们向政府索取特殊待遇的特权，他们几乎垄断了同白宫的往来。他没有鼓励国会的基层组织支持新政纲领。

1937年初，匹兹堡的民主党领袖戴维·劳伦斯要求总统召见民主党的三名新议员。罗斯福先是拖延，后来答应给予三分钟时间，最后甚至推迟了这个约会。1938年4月众议员肯特·凯勒写信给总统说，有一批敢作敢为的和进步的民主党人，大约有七十五名，另外还有一批不是民主党的进步分子，他们不畏险阻，一直忠实地追随着罗斯福。但罗斯福从来没有召见过其中任何一个人，征求过他们对政府政策的意见。他说，罗斯福只同一小撮国会头目们打交道。总统以其特有的风度叫麦金太尔让这位众议员去见他。但是，情况依旧。基层人物仍然游离于主要政治活动之外。一年后，又有一个友好的国会议员劝他同一般议员建立联系，分批邀请他们到白宫来。总统说，他很愿意邀请，但他的日程实在排满了。

罗斯福希望民主党立法议员继续承担对1936年党的纲领的责任。但是，国会议员对制订这个纲领几乎没有起过多少作用。归根到底，他们认为应当对选举他们的那个选区中的选民负责；因为毕竟决定他们是否留在国会的是他们选区中的选民，而且不仅如此，三十年代中期，美国的选民构成发生了具有深远影响的变化。

人们常说，工农两大集团的联盟创造了新政。但是也可以反过来说。下面的这种说法同样正确，而且具有更大的意义，即与其他十几个实力强大的集团并列，新政在美国促成了一个新的劳工运动和一个新的农民运动的诞生。这些具有政治倾向的集团在规模、人数和力量方面急剧膨胀，这种情况极大地改变了国会议员们当选或落选的县、镇、选区、管区的实力结构。

一个最突出的例子是劳工情况。各种工会虽然在萧条中大伤元气并被严重削弱，但却借助于全国复兴法第七条（甲）的规定和瓦格纳法征求到数百万新会员。到了1937年，产联已经完全同劳联分裂，并集中了数百万钢铁、汽车、橡胶、电器和其他大规模生产行业的工人。随着基层不断出现激进的青年领袖，工会的战斗性大大增强，精神面貌也为之一新。产联通过捐款和派遣它的组织者深入选区，帮了罗斯福的第二次竞选运动大忙。以后，激烈的劳工运动月复一月地在全国爆发为大规模示威、静坐罢工、无工会认可的停工、游行以及警察暴行等。

统帅这支劳工大军的是约翰·L·刘易斯，他浓眉大眼，粗犷强悍，是经常出现在全国报纸头版的新闻人物。连休伊本人也称他为“劳工运动的

休伊·朗”。这个粗壮的、矮鼻子的产联领袖可能是最能体现罗斯福第二届任斯的政治困境了。1938年，刘易斯已经抱怨罗斯福的“忘恩负义”。虽然刘易斯瞧不起商人，但他对政治却是一副商人嘴脸。他认为，总统既然得过好处，就应当知恩图报。可是，罗斯福却什么也不做？在静坐罢工的时候，他发表了那篇有名的“你们两家都要倒霉”的声明，采取了中立立场。他公开驳回了刘易斯认为白宫应当承认其1936年的朋友的要求。刘易斯恶言声称说，总统甚至采取封官许愿、把人拉进充满诱惑力的白宫小圈子的办法，从他身边挖走他的手下，特别是西德尼·希尔曼。他不满地说，罗斯福和霍普金斯刁难产联把“工人进步署”的工人组织起来的工作。刘易斯认为他忘恩负义。

即使这两个人都不是要挂头牌的名角，他们之间的冲突也是无法避免的。为了替自己的追随者撑腰，刘易斯在政治上就不得不向左转，并且采取直接行动。由于被选出的区域不同，而且需要国会支持，罗斯福不得不继续在权势集团之间寻求微妙的平衡。刘易斯嘲笑罗斯福以伟大的人道主义者和穷人的救护者的面貌出现；他说，罗斯福为人软弱，好耍花招，缺少诚信。罗斯福则不信任这位矿工头目，认为他随时可能破坏联盟，并在关键时刻拉他后腿。刘易斯正在进行紧张的活动，为自己组织的生存而奋斗，这时从他称之为罗斯福的“猫爪子”下面脱身出来。

如果说农民缺少这样一位杰出的领袖来代表他们的利益的话，那么，他们在反映新政对各种集团的影响方面，还是要比工人好得多。的确，当时几乎没有哪个组织象最强大的农业集团“美国农场管理机构联合会”那样，直接是依靠政府的扶助来扩充力量。因为组成“联合会”的县里的几千个农场管理机构本来是作为半官方机构而成立的。它们的分支机构负责新政农业计划的实际管理，同时它们又是联合会的非正式召募人。农业计划的发展使联合会的会员随之而增加，从1933年至1938年其数目增加了一倍以上。

联合会同新政的关系是很独特的：它在行政管理上同各种计划相联系，但政治上却是一支独立的力量，可以向罗斯福和华莱士施加压力。其他农业集团也很活跃。由于新政不断把好处送给养羊售毛者、甜菜种植者、猪肉生产者、养牛者、花生种植者和其他许多集团时，这些商品协会因而都十分兴旺。同时，协会愈大，它就越有实力对华盛顿施加压力。

这种情况也不断出现在美国生活的其他方面。“工人联盟”产生于“工人进步署”，它的一些领导人——其中有一些共产党员——不断地要求

更多更大的工程项目。“全国青年总署”则是各青年团体的利益中心。贷款和住房计划使许许多多有关的协会应运而生。同时，政府律师在组成“全国律师同业会”方面起了很大作用，它成为一个与保守的“美国律师协会”相抗衡的团体。

1938年罗斯福对《民族》周刊的编辑马克斯·莱纳说，“我们真是一个伟大的国度。民主制度的结构如此坚强而又富于弹性，它竟然能顺利地存在下去而又能容纳一个休伊·朗和一个约翰·L·刘易斯。”这确是独到的见解，但是并不完全。当一些强大的新势力在“伟大联盟”内部造成紧张状态，当这些势力象离心机一样把各地选出的议员扔进各自不同的轨道时，这时就十分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总统作为民族利益的中心，作为占多数的自由派的汇流点，作为政府行动的团结力量。这就是罗斯福在1938年春所面临的深刻的领导危机。

太少并且又太迟

1937年末，罗斯福写信给驻华沙大使比德尔说，勿庸置疑，德意日三国联合，其实力是惊人的。它们的狡猾、实力、成就以及其他一切可能的行动莫不如此。但是，对他自己制订的外交政策，罗斯福就不能这样说了。他在国内战线上余地很小；他要唤起全国注意国外日愈增长的危险局势，又遭到了国会的强烈反对。的确，总统在制订外交政策上显得特别软弱，因为他在这方面的纲领和战略比在内政方面还更加投机。

总统对于国际事务中的某些方面当然是有独到见解的。对他说来，意大利、日本、德国的侵略简直是“武装的流氓行径”，私下他肯定地这样说。他希望——当然仍是在私下说——英国外交部“再强硬一些”。他坚决反对为了求得和平而不惜一切代价，主张民主国家进行合作以维护和平。但是，在有关这种国际合作的类型，德意日参与和平计划的程度，特别是美国应当承担的义务等重大行动问题上，他却犹豫不决。1937年末和1938年，他还在寻求某种和平方案，不断求助于国会中那些赞成孤立主义的权势人物。

人们对于1937年10月他发表的那篇“隔离”演说反应冷淡，此后罗斯福又试图采取主动，但却走错了方向。他好久以来就曾考虑主持一次在海上举行的富有戏剧性的各国首脑会议。到了10月末，他认为采取一个不是那么引人注目的采取行动的时机已经成熟了，这就是停战日在白宫召集各国外交代表来听总统发表一项文告。萨姆纳·韦尔斯是直接为总统工作而对赫尔保持了相对独立性的助理国务卿，根据他的建议，这项文告建

议作出新的努力，就下列问题达成协议：国际和平关系的基本原则，各国人民根据平等条件获得世界原料的途径，以和平方式修改国际协议的办法，中立国家在战争这一灾难事件中的权利与义务。除了建议修改条约以取消凡尔赛条约的一些不平等的规定外，这个纲领确是很温和的。

这个计划未实施就夭折了。因为赫尔完全反对。他担心短短一两天的讨论会引起幻觉，不合时宜地激怒独裁者，此外不会产生任何实际效果。而正是罗斯福所欣赏的这种场面——华丽的白宫集会突然间戏剧性地变成罗斯福发表声明的世界讲坛——使这位毫无戏剧性的人物感到烦恼。可是，实际上，赫尔深信总统所支持的这些基本原则，他之所以反对的原因要深刻得多。一部分麻烦是由于韦尔斯在这项计划中所起的关键性作用。更重要的是，赫尔担心国会会反感直接由总统采取行动。作为一个善于讨好立法者和赢得他们欢心的老手，他害怕使国会接受国际主义的努力会功亏一篑。罗斯福只好暂时勉强放弃了这项计划。

民主国家的领袖们在浪费时间，而独裁者们却采取了行动。1937年11月，他们正式建立了罗马—柏林—东京轴心。日本军队深入侵略中国境内。布鲁塞尔会议在调和远东危机方面彻底失败。世界各国都在进行军备竞赛。11月5日，希特勒把他的将领们召到帝国议会，向他们公布征服东欧的计划，并命令他们对终将爆发的战争作好准备。德国将军们获知奥地利将成为元首名单上的第一个目标。

1938年元旦之后不久，罗斯福又在考虑召开一次国际会议。但是，这次他采纳了赫尔的建议，即先去试探英国的态度。英国的首相张伯伦的答复犹如一盆冷水。他在信中写道，总统的计划将会打破他对德意两国实行“某种绥靖”的努力。他抱怨说，为此目的，他已经做了几个月的努力，现在一切均已仔细布置妥当。罗斯福是否可以稍待片刻，别作破坏？

总统只有答应。但是，他对张伯伦信中透露的情况深感担心：张伯伦表示，他打算通过承认意大利对埃塞俄比亚的征服来安慰墨索里尼。罗斯福立即吁请张伯伦不要采取这个措施，因为这将严重影响美国公众舆论。赫尔毫不客气地告诉英国大使说，这种承认是一笔肮脏的政治交易，将在美国民众引起强烈反感。

张伯伦对罗斯福的断然回绝和彼此间由此而产生的磨擦使一位从大局之外密切注视着世界事务的人感到震惊。十年后，丘吉尔写道，首相拒绝了总统伸出的手，于是，不经过战争而将世界从法西斯魔掌中拯救出来的最后一线微弱的希望便破灭了。然而，与罗斯福不同，张伯伦已经打好他的如意算

盘，他的目的是最好引导轴心国不要进攻民主国家，而最低限度也要争取时间，重新武装。他的打算中的一个主要因素是，由于美国的孤立主义政策，不能指望罗斯福会加入战争来支持他提出的原则。张伯伦尖刻地说，最稳妥的办法是，不要指望从美国人那里得到任何东西，除了空话。

后来的情况是，张伯伦给罗斯福写了另一封比较诚恳的信，对他的建议表示欢迎。首相不得不这样做，完全是因为他的年轻的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的敦促，那时艾登刚休假完毕返回伦敦。他暗示说，张伯伦如不修改政策，他就要辞职。但是，现在为时已晚，希特勒已经断然采取行动了。

2月上旬，元首就已经把那些大胆地表示反对他的战争计划的将领们撤职，自任总司令，从而巩固了他在国内的军事地位。希特勒的目光立刻落在南面，那里是奥地利这块沃土，也是通往捷克斯洛伐克和更远地方的必由之路。希特勒把奥地利总理冯·许施尼格召到他在紧靠边境的贝希特斯加登的住所，对许施尼格又是诅咒，又是恐吓，达数小时之久。他吼道，他会象晴天霹雳，一夜间就突然出现在维也纳。并且责问许施尼格是否是想把奥地利变成第二个西班牙。许施尼格屈服于希特勒的要求，但他还想就奥地利的独立问题举行一次公民公决，以巩固他的地位。希特勒不能容忍。在墨索里尼默许和英国袖手旁观的情况下，他知道可以放心地动手了。3月12日，德国坦克和军队冲过边境，短短几小时内，奥地利就陷落到德军的手中。

消息传出，美国舆论沸腾。报纸社论表示愤慨。罗斯福保持沉默。但是几天后，他在赫尔发表的一篇正式声明上批道，“好！”然而，国务卿的声明是老调重弹，对“国际间的不法行为”表示坚决反对，对孤立主义提出警告，但却对美国的义务则只字不提。

罗斯福保持沉默，并在虚酿行动。他写信给一个朋友说，他处在一个很长的受教育的过程中，这个过程进展很慢，但很稳健。这个教育过程究竟有多慢呢？他的思想时常转到孤立主义者及其在国会中的领袖身上。他觉得一位波士顿学校校长转来的一封英国人的来信很有趣。

他回信说，那封信使人发生兴趣。对于美国的政治制度或美国公众对欧洲政治的想法，欧洲人连一点最起码的概念也没有，这的确很有趣。来信者建议美国总统赠送五百架飞机给英国，这一点特别令人高兴。这几乎使罗斯福自己觉得象个独裁者了！要是他去要求国会授予这种权力，你看吧，国会脸上或者《波士顿晚报》和《波士顿先驱报》的编辑们脸上会是个什么表情？且不说波士顿的爱尔兰人或堪萨斯的新英格兰人会做些什么了。……

编辑，国会议员，爱尔兰人，堪萨斯州人——他们能被罗斯福及时纠正过来吗？或是亡羊补牢地接受事实的教育吗？

事态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发展着。1938年的西班牙已成为世界战争的中心。成千上万的意大利“志愿军”，数以千计的德国军官和技术人员，轴心国大量的坦克、大炮和飞机支持佛朗哥的进攻。在国际纵队和后来苏联武器的支助下，西班牙政府两次击退了对马德里的激烈进攻。但是，1937年夏季共和派发动的阿拉贡攻势失败了；意大利军队占领了毕尔巴鄂；桑坦德和吉约失守了。国际联盟大会声称，在西班牙作战的是“真正的外国军团”。到了1938年，共和派的前景黯淡。

罗斯福一开始就支持共和派的斗争。他了解这场战争的国际性；他认为，由包括共产党人在内的人民阵线联盟控制的马德里政权是合法政权。然而，他在公开场合却严守中立。他的第一个重要举措——即在1936年的竞选中为公众所瞩目地采取的行动——是在向双方输出武器的问题上实行道义上的禁运。当几家美国出口商准备运出几船作战物资时，总统要求国会把中立法案中关于武器禁运的规定扩大到西班牙。在整个国会中只有一位农工党成员投票反对这项议案。有一艘载运飞机的船刚好驶离三海里的界限，但后来它却落到佛朗哥手里。

随着事态的进行，罗斯福对西班牙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愈来愈感到不安。不干涉实际上变成了“不同意不干涉”，因为不干涉政策对佛朗哥有利。德意两国飞机对格尔尼卡的圣城巴斯克的野蛮轰炸引起了美国舆论的愤慨。驻西班牙大使鲍尔斯警告政府说，佛朗哥、墨索里尼和希特勒正在利用禁运。伊克斯则公开地对他称之为美国在西班牙所起的可耻作用表示不满。在国务院里，韦尔斯感到严重不安；他看到佛朗哥的胜利，实际上意味着意大利在地中海地区取得了重大的战略性进展。甚至一些原先顽固的不干涉主义者，如诺曼·托马斯和参议员博拉，也反对罗斯福的政策，认为它既不公正，而且在事实上也不中立。

但同时也存在另一种意见和势力。英法等一、二十个国家奉行一种表面严格的不干涉政策，旨在使冲突局限于西班牙。罗斯福则不敢采取措施阻碍这种做法。他想修改政策的任何打算都遭到赫尔的顽强反对，而赫尔则得到在这一问题上积极追随英国的一批职业文官的支持。政府和国会几乎顽固不化地力主保持中立。这束缚住了罗斯福的手脚。

罗斯福在这些压力下犹豫不决。1938年春，他想取得对马德里的武器禁运。参议员奈曾提出排除禁运的议案，《纽约时报》声称罗斯福就要采取行动了。

但是接下来却什么动静也没有。伊克斯对总统说，这是美国历史上可耻的一页。罗斯福辩解说，解除禁运丝毫无助于解决问题，因为军火无法通过西班牙国境。等到伊克斯证明可以克服这个困难时，总统的态度又变了。他告诉伊克斯，那天上午他曾同议长讨论了这件事。取消禁运可能会导致在即将到来的秋季选举中会失去天主教徒的全部选票。罗斯福说，对此民主党议员是反对的。

真相大白——几天后，伊克斯在他的日记中愤怒地写道，真是肮脏交易，伊克斯继续写道，这充分证明许多人指出的，英美两国的天主教少数派支配了对西班牙的外交政策。

伊克斯只说对了一部分。在对西班牙的政策上，不仅国会小心谨慎，罗斯福本人也优柔寡断。1938年后期，当叛军向马德里进逼时，总统又动摇起来了，赫尔不得不再次说服他的这位上司不要采取行动。尽管如此，伊克斯还是涉及到了问题的核心。影响美国国境以外遥远地方的力量对比和事态发展的权力最终掌握在国会议员和支持他们的少数派集团的手里。白宫虽然果断但却未能予以挽救，因此波托马克河畔的国会僵局给世界投下了一道阴影。

第十八章 党内分歧

故事发生在威斯康星大学的牲畜馆。时间是1938年4月下旬，在一面有个圆圈套着十字的大旗下，一位身材修长、头发花白、面孔却显得有点孩子气的人正在向几千名全神贯注的听众发表演说。身穿带W大字母运动衫的足球队员在走廊里走来走去。发表演说的是威斯康星州州长菲利普·拉福莱特，他是著名勇士鲍勃的后代，年轻的参议员鲍勃的兄弟。这次集会是要成立一个新政党，美国进步党。

拉福莱特演讲结束时，头发蓬乱，衣衫不整，这时记者们确信，新的历史已经开始了——其意义又也许同八十四年前共和党在威斯康星州的里彭宣告成立一样。他们议论说，这个年轻的进步党人戳到了罗斯福的痛处。他正好打在新政经济纲领和新政政治纲领的最薄弱的要点上。拉福莱特认为，十年来，共和党和民主党一直举措失当。人民对于过多的救济福利、稀缺经济已经感到厌烦了。他们要求就业和社会保障。进步党将不是一个人民阵线，“不是为了权宜之计而将互相敌对的势力凑合在一起。”这显然是在嘲笑罗斯福及其联盟。新政的领袖对此作出什么样的反应呢？

看来，总统是对之不屑一顾的。当许多人被卷入这阵热潮的时候，他写信给驻罗马大使威廉·菲利普斯说，多数人似乎认为拉福莱特的新徽章无非是对□字徽的羞答答的模仿。现在这个进步党所要做的只是采用一种新式敬礼方法。他还建议他们要将双手高举过头，弯腰鞠躬。他嘲笑说这至少有助于保持良好的身材！

实际上罗斯福对这个新党的心情是复杂的。他知道拉福莱特这次组党经过认真策划，又得到农工和劳工领袖大力扶植。对于这个运动不能轻视。罗斯福固然希望这件事可以成为对民主党保守派的有益警告，因为这已经表明民主党有失去自由派支持的危险。整个事情取决于菲尔和鲍勃不要太过火。罗斯福告诉伊克斯，为了防止他们走得太远，他要邀请鲍勃到波托马克河上作一次巡航；他将向这位参议员提出，1940年以后他可以获得国务卿的职位，菲尔则可以接替他在参议院里的位置。

这是曾经屡试不爽的罗斯福式的战略，但似乎已来不及了。菲尔泰然地继续前进，争取中部北部各州的进步团体和第三党领袖的支持。同时，他的活动在警告民主党保守派方面也没起作用。在6月中旬休会的国会中，他们继续猛烈抨击新政。除了开支法案以外，第七十五届国会的主要成就是恢复了对农民的农业计划，对工人则是一个没有多大成效的工资工时法案。它通过了一项新的住房计划，但这个计划却难以受到那些“居住困难”的群众的欢迎。新政作为一项广泛的福利纲领来说几乎没有什么进展——同1937年1月所作的承诺相对照，更是微不足道。

逐渐罗斯福下定了决心——到了在党内摊牌的时间了。

对党内的保守派议员进行清洗，并不是什么新的办法。好几个月来，白宫一直在议论清洗的问题，特别是科科伦、伊克斯、霍普金斯等人。罗斯福最后竟然拿起这件武器，这一事实本身就反映了他在1938年春的几乎走投无路的心情。清洗不但直接违背总统第一届任期内不干预地方选举的总方针，甚至有可能，这会迫使他陷于他最不乐意的境地——同党内的人，其中一些人还是他的朋友，形成直接的公开的对立；以及使他自己几乎完全接受党的特别方法和特定观念。

罗斯福是愤怒和恼火达到极点才会走这一步。他在1938年春天的实际心情正是如此。尽管表面上他和往常一样亲切可近，但对于那些阉割他的纲领实质的破坏者，他一连几个月，内心愤怒烦恼不已。他曾一再在密友、甚至在来访者面前批评他的敌人——那些企图从规定中得到特权的院外活动集团成员，那些表面同意有改革的必要，但从来不同意罗斯福的做

法的虚伪小人，那些利用合法手段偷税漏税的百万富翁，那些撒谎吓唬人民的专栏作家和评论家，那些串通一气反对政府的传媒大亨，特别是那些依靠了他的帮助才拥有高官厚禄、而现在却在破坏他的纲领的国会议员。

在一个自由社会中，总统的报复只能针对上述最后一类人。当拉福莱特正在政治舞台混水摸鱼并在 1938 年 6 月发出要破坏“伟大联盟”的威胁时，罗斯福决心采取行动了。

驴和大棒

总统在 6 月下旬一个闷热的夜晚，打响了第一炮。他在一次“炉边谈话”中说，在“坚定的自由派纲领”基础上选出的第七十五届国会，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做。但另一方面，他说，它为国家所做的事情比二十年任何一届国会都要多。他列举了它所取得的许多成绩。他说有人曾劝他得过且过，安安逸逸当四年总统，不要把党的纲领看得太认真了。

罗斯福说在美国之前的历史上还没有见过矛头指向总统、参议员和众议员的行动一致的失败主义运动，但在本届国会里却出现了这样的情况。“我们也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乌合之众”，他们如同在内战时代那样，不惜任何代价，企求和平。总统又谈了一下经济形势。他说，工商界和政府的领导人都犯过错误。然而，政府犯的最大错误是未能及早通过农业法和工资工时法案，同时政府还以为劳工和资方不会犯什么错误。

罗斯福接着就转入正题。他说，国会初选和正式选举中的争端，就是自由派和保守派之间的争端，自由派认为新的情况要求新的解决办法，政府行动亦然，而后者认为个人主动性和私人发善心就可以解决国家的问题，他们要求恢复美国二十年代的那种不干涉政府。

对此，罗斯福公开宣言作为美国总统，他并不要求美国选民 11 月投民主党人的票而不投共和党人或任何其他党的票。作为总统，他也并不参加民主党预选。

然而，作为民主党首脑，他对于民主党 1936 年纲领中所提出的明确的自由主义的原则宣言承担了责任，他说他认为在下述情况下，他有充分的发言权，那就是在提名的几位民主党候选人之间，明显存在着有关这些原则问题，或者是涉及到明显地滥用罗斯福本人的名义。

“他提醒大家不要误会。如果一位候选人虽然也持自由主义观点，但在某个问题上曾经同他有分歧，他决不会因此而在州在预选中表示他的倾向性。他表示他更关心的是，候选人对时局的基本态度和他是否有实事求是地对待实际需要的真诚愿望。”总统又再次抨击那些“口是心非之辈。”

次日报纸用大字标题登出：“罗斯福向党内反叛分子宣战”。其实，这次宣战是模棱两可的。政客们急忙互探消息。总统怎样判定谁是保守派？标准是什么？是否只要投票反对改组最高法院方案就是保守派？罗斯福是否没有把话说清楚？他说他是党的领袖的身分而不是以总统的身分说话，又是暗含什么？

罗斯福乘坐一列包括十节车厢并有冷气设备的火车离开华盛顿，沿一条曲折的路线旅行全国。这时，思想状况就更加混乱了。罗斯福对每个州的策略似乎都不一样。在俄亥俄州，他对一位温和的新政派、正在进行预选的参议员罗伯特·巴克利表示温和的赞赏。在肯塔基州，总统可就没有这么温和了。他的忠实的参院领袖艾尔本·巴克利遭到州长“笑面虎”钱德勒的紧紧进逼，此人笑容可掬，擅长煽动人心，对他那一套政治机器抓得很紧。罗斯福急切盼望巴克利获胜，因为他的落选会使参院领袖席位落入帕特·哈里森之手，而这是他所不愿看到的，因此，他甚至欢迎约翰·L·刘易斯所作的愿对这场竞选效劳的表示。

迎来总统的火车以后，“笑面虎”敏捷地跳进敞篷汽车，坐到总统身边，享受了不该由他享受的敬礼。巴克利暗自不悦，罗斯福则神色安详，一如既往。但“笑面虎”马上得到他应得的惩罚。总统在演说中对巴克利评价很高，而把钱德勒贬斥为年轻人，说他还要经过多年磨炼才能有艾尔本·巴克利那样的经验和学问。“只要总统不能把你一脚踢开，你就保险了。”这个控制不住自己、决心至少要有个指头钩住总统衣角的笑面虎这么说。但只过了几个小时，罗斯福就连这一个指头也没让他抓住。他暗示说，钱德勒为了挤进参议院，曾向白宫提出了一桩任命法官的肮脏交易。

在随后的几站，总统说话的气概有如雄狮，但行动却象狡猾的狐狸。在俄克拉荷马州，他提到他的“老朋友”参议员艾尔默·托马斯，但他并没有冷落托马斯的竞选对手。在得克萨斯州，他对几位自由派众议员如林登·约翰逊和莫里·马弗里克笑脸相迎，而使反对最高法院法案的参议员康纳利十分冷落，甚而他在火车站台上宣布任命一位不是康纳利推荐的得克萨斯州人为联邦法官。在科罗拉多州，总统的故意冷落使得另一位最高法院法案的反对派、参议员阿尔瓦·亚当斯茶饭不思。但是，竞选中看来好象得到白宫支持的亚当斯的对手也没有得到热情接待。内华达州的参议员帕特·麦卡伦也是一样，但是聪明的帕特还是利用罗斯福而出了风头。在加利福尼亚州，罗斯福提到他的“老朋友”参议员麦卡杜，但那里的形势却是混乱的，因为麦卡杜的对手不是保守派，而是“每星期四赚三十美

元”运动的领导人，名叫谢里登·唐尼。

当总统被迎上“休斯敦号”、经过穿越巴拿巴运河的一段漫长的航行到达彭萨科拉、然后动身返回华盛顿的时候，初选的部分结果已经揭晓。结果可能让罗斯福很满意了。巴克利在肯塔基州大获全胜，同样大胜的是在俄克拉荷马州的托马斯。当然，亚当斯在科罗拉多州获胜，麦卡伦在内华达州呼声甚高，但罗斯福并没怎么插手这几起竞选。

此外，横贯全国的这次旅行对于总统来说是又一次凯旋之行。在俄亥俄州的马里塔，当一位矮小的老妇人跪下来，虔诚地用手轻拍他在尘土中留下的脚印，她这种行为实际上代表了很大一部分人的感情。群众的热情证明了共和党众议员布鲁斯·巴顿所说的：群众对罗斯福的感情是当时一种控制形势的政治影响。罗斯福的胜利纯粹出于他个人的魅力。法利在罗斯福“炉边谈话”发表后虽然公开支持总统而私下则对此表示不满，他这时正在阿拉斯加。加纳没有在得克萨斯州会见总统。报纸社论对总统干涉地方选举表示不满。漫画家把他画成一个骑驴者，挥舞大棒，踢人屁股，野心勃勃的猎人。

成功壮大了罗斯福的胆子，在向北行进的时候，罗斯福把他的注意力转向他的最大对手沃尔特·乔治，他是一位能干而有影响的佐治亚州参议员。这次的场面很富于戏剧性，就象事先准备好的一样。在乡间小镇巴尼斯维尔的讲台上同罗斯福坐在一起的有乔治本人，还有由政府劝说来同上述参议员竞选的一位羞答答的年轻律师劳伦斯·坎普，还有一群心情紧张的佐治亚州政界人物。从他开始讲话的那一刻起，罗斯福那种沉重而慎重的语调和神气就似乎是某种不祥的预兆。他说他曾在温泉住过多年，然后他转向南部所面临的问题以及按照自由派方针来进行政治领导的必要性，最后他开始针对现实问题。他谈到乔治：

“我要讲清楚，他现在是我个人的朋友，我希望他将来永远是我个人的朋友。他无疑是，并且肯定是，一位绅士，一位学者。……”但是，他和乔治在政治上就是没有达到一致。关键是对以下两个问题他们存在分歧，首先，候选人的历史是否表明，他一直以积极的战斗性的态度来支持党和政府今天所提出的广泛目标，尽管在细节上也许有不同意见；第二，候选人心里，在他的内心深处是否真正信仰这些目标？”

罗斯福说令他感到遗憾的是，就他的朋友、参议员乔治而言，老实说对这两个问题他都无法作出肯定的回答。听众中出现一阵轻微的骚动，乔治坐立不安，坎普则正襟危坐。

罗斯福走得更远。他在演说中把另一位候选人，那位神气活现板着脸面孔的前州长尤金·塔尔梅奇，贬为好说大话、善于许愿的人，对坎普则大加颂扬。对群众来说，最精采的场面是罗斯福转向乔治，同他握手。

这位参议员说，“总统先生，我要告诉你，我接受你的挑战。”

罗斯福面带微笑地回答说，“让我们永远做朋友。”

接着是南卡罗来纳州，这里是科顿·埃德·史密斯的势力范围。罗斯福再次表现出他的足智多谋。史密斯的竞争者，州长奥林·D·约翰斯登是在同总统谈了一次话后立刻在华盛顿展开竞选的，但现在罗斯福却采取一种模糊的态度。他在格林维尔的讲话结束时说了一句话，但没有点史密斯的名，他说，“我不相信哪个家庭或个人能够靠五十美分一天过日子。”这里暗地里责怪了一下科顿·埃德，因为他就是因为说过在南卡罗来纳州这个数目能行而闻名。

回到华盛顿后，总统对他的宿敌，马里兰州彬彬有礼的米勒德·泰丁斯打出了最重的一拳。他在记者招待会上斥责泰丁斯既要利用他的威望，又要利用泰丁斯的共和党保守派朋友的钱来从事竞选，他责成记者报道他的原话。他让马里兰州的政治家全部支持泰丁斯的预选对手即众议员戴维·J·刘易斯。他要求该州的一位政治领袖，前驻意大利大使布雷肯里奇·朗从财政上帮忙，亲自给予支持。9月的第一星期，他在马里兰州整整作了两天政治演讲，抨击泰丁斯。为了使他的竞选活动看来象得到了党的支持，总统把法利带在身边。这位民主党主席对这一套表演不屑一顾。他对记者说：不成功的。

确实是不成功。罗斯福的政治运气在短短几周降到他担任总统以来的最低点。

史密斯在南卡罗来纳州赢得压倒性胜利，泰丁斯在马里兰州以巨大多数当选。马弗里克和其他罗斯福派的人在得克萨斯州遭到挫败。乔治在佐治亚州遥遥领先，塔尔梅奇名列第二，而坎普不光彩地排在第三。那些对新政一心二意的人，或反对新政的人，如科罗拉多州的阿尔瓦·亚当斯，内华达州的帕特·麦卡伦，康涅狄格州的奥古斯丁·朗纳根，全部获胜。史密斯获胜后，罗斯福说了这么一句话：“需要多么漫长的时间，才能使过去成为现在啊！”

冲淡这一片黯淡前景的只有一点光明。这年早些时候，霍普金斯和科伦就曾劝说詹姆斯·费伊在曼哈顿的预选中，同他们讨厌的约翰·奥康纳竞选，后者利用他出任规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同罗斯福作对。费伊是个恰

当的人选，他的祖宗是土生土长的爱尔兰人，他参加过战争，同坦慕尼的头面人物有紧密的私人关系。霍普金斯通过拉瓜迪亚取得劳动党对费伊的支持，罗斯福同意去找《每日新闻》的帕特森支持这个新政派候选人。科科伦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到选区去竞选。当奥康纳尽全力以保全他的政治生命时，罗斯福找了颇不情愿的弗林“老板”来支助弗伊竞选。这几股力量凑起来，才在9月中旬以微弱的票数击败了奥康纳。

这时民主党与共和党正在争夺上百个众议员席位、三、四十个参议员席位，竞争激烈。在1936年的大胜之后，现在的民主党由于内部分裂，不能不面对可能失败的严峻现实。共和党知道最困难的时刻已经过去，它为敌人的内讧而幸灾乐祸，这时显得喜气洋洋。有的人甚至得意到了得意忘形的地步。威斯康星州共和党候选人的支持者拍电报给罗斯福，请他到威斯康星州来同他们支持的人对阵。他们说，总统的反对将保证候选人当选。

罗斯福没有理会这些嘲讽行为，但是竞选运动中的这种奇怪的发展方向，他却必须加以正视。人民的心理和情绪发生了变化。在许多起竞选中，问题已经不是那些传统的老一套可靠的东西，如繁荣、安全、改革、和平等等，而是一些含义模糊的令人望而却步的东西，例如州的权利、“橡皮图章”国会、总统权力、清党问题。在其他的一些竞选过程中，议员候选人陷入地方问题纠纷。例如在南卡罗来纳州，科顿·埃德举起了歧视黑人的旗帜，而不愿甘拜下风的约翰逊则揭露史密斯本人曾经投票表示愿让一个粗壮的黑人男子在火车上坐在他老婆和女儿旁边。在宾夕法尼亚州，主要争端不是新政，而是贪污；在密执安州，问题是静坐罢工；在加利福尼亚州，问题是州的养老金方案。

罗斯福作为党的领袖理应具有影响竞选运动方向的一定能力。在他自己竞选总统时，他可以运用他的非凡能力，使问题高度集中起来并且选择进攻时机，但现在却不同了，他无法控制局势。不是他控制竞选运动，而是运动把他席卷而去。

他不得不花很多时间来澄清他的立场。在竞选的最后几周，他发觉有必要支持密执安州州长弗兰克·墨菲，因为人们指控他背信弃义，对静坐罢工问题处理失当。他不得不反驳宾夕法尼亚州的共和党人，因为他们指责他之所以不管该州的事情，是因为当地的民主党人不合他的口味。他不得不澄清他之所以没有谈到明尼苏达州州长埃尔默·本森并不是因为他不支持他；他不得不宣布，在加利福尼亚州，虽然罗斯福反对唐尼的“每星期四赚三十美元”的纲领，他支持击败了麦卡杜的真正自由派人物唐尼，

他不得不表明他支持威斯康星的参议员 F·瑞安·达菲；他不得不声明支持纽约州州长莱曼和参议员瓦格纳为二轮竞选的候选人。既然要在全美竞选活动中到处扑漏洞，罗斯福当然不可能在竞选中处于游刃有余的地位。

选举前夕，罗斯福想把纷纭交错的各种问题集中到一个焦点上。他重申最主要的问题是继续推行新政的问题。在随意谈到他正在海德公园建立的“梦屋”（dream house）以后，他说社会利益同房屋不一样，它是随时在变化的。他警告说，西奥多·罗斯福和威尔逊时代带来的巨大利益在随后几届政府时期就完全不存在了。总统开始反击反对派。他指出，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还有老式保守的共和主义——都没有对美国民主形式的政府的继续存在形成威胁。但是警告说，如果美国的民主制度不再作为一种具有生命力的事物向前发展的话，……那么，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可能就会在老式的保守的派共和主义不自觉的支持下在美国发展起来。但是，政治上的紧急需要迫使罗斯福在全国联播节目的讲话中，主要谈纽约的候选人。

选举结果对民主党的打击比罗斯福预料的更惨重。共和党在众议院的力量几乎增长了一倍，由 88 席增加到 170 席，在参议院增加了 8 席。共和党一个席位也没丢。众院里的自由派减少了二分之一。瓦格纳和莱曼两人都在纽约州获胜，但是一位才华横溢、风度翩翩的青年地方律师托马斯·E·杜威差点把莱曼打败，成为 1940 年该党最有希望的总统提名人。共和党赢得了十多个州长职位，一些新的政治人物不断涌现。比如马萨诸塞州的莱弗里特·索顿斯托尔，俄亥俄州的约翰·布里克，明尼苏达州的哈罗德·史塔生。塔夫脱在俄亥俄州击败了巴尔克利，夺走了一个参议员席位，随后就把它变成了一个全国性演讲台。菲利普·拉福莱特在威斯康星州落选，墨菲和厄尔分别在密执安州和宾夕法尼亚州惨败。

罗斯福力图减少这种局面的影响。他告诉朋友说，人们并没有抛弃新政。问题是党内的宗派主义和地方组织的涣散和软弱。他指出马萨诸塞州的腐败问题，罗德岛州赛马场上舞弊的丑闻，康涅狄格州的停车场贿赂问题的斗争，波斯·弗兰克·黑格在泽西城的独裁作风，中西部的罢工，其他地方民主党候选人的庸碌无为。总之，总统一再提醒人们注意这一事实，即民主党在参众两院仍然拥有大多数。但是他对共和党和民主党内的新政反对派左右立法这个事实，能够无动于衷吗？

在选举后举行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一个记者问道，难道不会面对反对派的联盟吗？

总统回答说他认为他不会。

“我认为你会，”提问者在一片笑声中巧妙地回敬了一句。

“树木非常接近树林，”罗斯福神秘莫测地说了这么一句。

争夺权力

这位记者说对了，罗斯福也知道他是正确的。共和党人并不掩饰他们打算通过国会中的民主党保守派来围攻新政的企图。罗斯福也在关心着树林。欧洲的紧张局势会促使国内政治局势发生变化。他知道1940年他会有强大的武器来对付保守派。与此同时，他让外界看见的是一副满脸笑容的面孔。他甚至把一些报纸给他描绘的漫画拿来开玩笑。

12月在查珀尔希尔，他对一批充满青春活力的大学生听众说，“你们这些第一次见到我的同学们，你们在报纸上和广播中所看到的和听到的我至少是个魔鬼——是共产党的同谋，是富人的克星，是悠久传统的叛逆。你们有人可能认为我是‘经济保皇派’、‘邪恶的公用事业’和‘礼拜寺里的钱币兑换商’这些名称的发明人。六年来你们一直听说我想把国家投入战争，你们和你们的兄弟们都要被送到欧洲的血腥战场；我正在把国家领向破产的边缘；我每天早上都要吃一盘‘烤百万富翁’”。听众哄堂大笑。

“实际上，我是个性情非常温和的人——无论在国内事务和国外事务都讲求和平，笃信资本主义制度，至于早餐，我是个炒鸡蛋的爱好者。”

总统坚持新政，不理睬加纳和他所称的国会里“落后于时代的朋友们。”1939年1月，在立法者们面前他为其社会和经济改革政策辩护。他还试图证明他的纲领有助于国防建设因而是正确的，并说，国家已经告别了因实行社会改革计划而引起内部冲突的阶段。但他继续要求把国家的全部能力释放出来，加快恢复的进程，以巩固我们的改革，并给凡是愿意工作的男男女女提供工资足以维持生计的真正的工作。他再次要求实行一年前已被国会否决的法案，包括组织改革。

几天后，在杰克逊纪念日宴会上对党内所发表的一篇战斗性的演说中，罗斯福也没有表现出一点点妥协迹象。他欢迎共和党的地位有所恢复，他们现在不能再用票数太少来为自己缺乏纲领辩解了。他抱怨说，最近几年共和党的萎靡不振，使得一些反对真正民主的权势集团钻进了民主党，企图通过分裂民主党的机构来使之陷于瘫痪。他号召民主党人紧密团结，同其他政党的人和无党派人士结成紧密的联合。他预言骨子里十分保守的共和党领导仍然想“两面讨好，一面大谈其平衡预算，一面又支持趁机抢夺国库的行为”。他呼吁以民主党成为自由主义的党的方式来纪念安

德鲁·杰克逊，不要使民主党和共和党成为半斤八两。

总统的一些重要任命反映了他的不屈不挠的毅力。霍普金斯代替罗珀为商业部长，使商业界大为惊讶。密执安州传教士一样古板的墨菲接替卡明斯任司法部长。六年来一直为新政奔走的弗利克斯·弗兰克福特获得了从前属于霍姆斯、现在属于卡多佐的最高法院中的职位。威廉·道格拉斯取代了布兰代斯在高等法院的地位。这样一来，在新政的第六个年头，无论在政府中还是在最高法院内，自由派都占了稳定多数。

但是国会的情况却不是这样，随着1939年这届会议的举行，国会对新政的威胁愈来愈明显了。

国会里的保守派联盟当然并不是想要彻底废除新政，即使他们想这样办也办不到，因为他们没有三分之二的多数来压倒罗斯福的否决权。但是他们可以阻止新政向新的有争论的领域发展。国会虽然通过了一项经过删改的机构改革法案，一项修改过后放宽限制的社会安全法，和其他几项政府法案。但是，等到问题涉及目的是实现总统的经济恢复诺言的支出计划时，立法者们犹豫不决了。参议院通过了关于为货物迅速变现计划提供资金和为住房工程提供八百万美元贷款的法案，但这种救济性方案在众议院则是惹来一片谴责声，被否决掉了，救济拨款也被大大削减。

上述政治上的困境带来的必然结果是经济上的停滞。新政改革得到了自由派的最高法院和总统坚决支持的保证，而投资者主要由于对政府的怀疑却仍然止步不前，但国会不同意大规模的支出计划，即使是罗斯福提出的也不会同意。复兴政策被打中了要害。虽然经济情况比一年前已大有好转，结果仍有八百万到一千万人失业。

然而，有的议员甚至不满足于只是使新政停止不前，他们想彻底打碎它。为此，他们转向三种由国会来夺取行政权力的传统办法。

这几种办法中最强有力的也许是实行民意调查的权力。在罗斯福的第一届任期内，友好的议员如参议员布莱克曾经使用这个权力去动员公众舆论，支持新政措施。总统个人强有力时，几乎只身就制止了泰丁斯那样不怀好意的调查。但是现在，在他的第二届任期内，情况今非昔比了。1939年这届国会开幕后不久，加纳在一次内阁会议上就公开宣称，反对派正策划要对“工人进步署”和其他机构进行调查。他说，对此应当想个办法。总统回答说，“杰克，你是在对十一个丝毫无能为力的人说话。”他说，这事取决于包括加纳在内的两院议长和各委员会头目。这清楚地反映了在罗斯福的第二届任期期中，他的个人影响已经严重下滑了。

甚至在马丁·戴斯问题上，罗斯福也不得不谨慎对待。这个方脸庞、大个子的得克萨斯州人负责众院的“非美活动委员会”。罗斯福反对戴斯的不正当的调查方法，他认为戴斯攻击伊克斯、霍普金斯和珀金斯小姐以及其他新政派对待共产党态度软弱的政治危险很大。但是除了一篇怒气冲冲的对报界声明外，罗斯福并没有冒险对戴斯公开进行反击。当记者要求总统对这位得克萨斯州人指责罗斯福没有同他合作一事发表评论时，总统只是含糊其词地敷衍一阵。他对戴斯对待证人的态度感到不满，但只是间接地向委员会另外一个委员抱怨。当伊克斯准备在一篇题为“与富有者戴斯较量”的演说中指责戴斯，厄尔利打电话给他说，总统说了，“看在上帝面上，别这样做！”罗斯福希望通过对戴斯在国会里的领袖们做工作使他收敛一下。这种在他第一届任内行之有效的间接办法，现在似乎作用不大。1939年戴斯得到一大笔拨款，继续在共产主义问题上大肆渲染。

国会进攻的第二个传统工具是对政府的人事任用进行控制，在这上面国会又是忠于传统的。对人事任命最明显的控制就是必须取得参议院同意这一讲礼貌的古老惯例：如果他们的某个同事认为被提名者是个“令人厌恶的人”即反对派的成员的话，参议员们可以按某种不成文的默契抵制总统的任命。1939年1月，罗斯福公然蔑视这条规则，提名一名弗吉尼亚州人为联邦法官。此人与该州州长关系很好，但与参议员格拉斯和伯德不和。总统的提名遭到否决。罗斯福与格拉斯都公开发表了愤怒的声明。但是当公开争执结束后，参议院同意的惯例丝毫未被改变。

国会控制的第三个办法是它拥有每年对行政机构拨款的法律权限。反新政联盟可以在其权限以内削减对各种计划的拨款。但它不敢走得太远，因为不管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的反新政派，对这些计划的受益集团的反应都是很敏感的。这个联盟可以做而且已做的是，削减对国会里没有什么背景活动的拨款，即关于规划、研究、统计和经济分析、科研、行政管理、情报、人员配备等项的拨款，但从长远来说，这些活动对政府计划的期限和生命力的作用是会产生深远影响的。

形势的关键在于，1939年，国会里的联盟的领导们已从1937年和1938年的守势公开转为攻势。过去，他们满足于能够限制新政的扩展，现在他们要破坏重要的联邦计划，或者使之他们的目标服务。过去，他们努力反对总统控制立法部门；现在，他们要把自己的控制权延伸到行政部门。

总统对自己的机构行使控制权，往往是件棘手的事件。他控制再严，也会有一些松散的单位因为机构的庞大而逃脱他的控制。许多官员是长期

任职的人，他们只适应旧时的思想和方针。一般说来，只要总统知道他们的话，他可以将他们撤职。但对其中一些人，他是鞭长莫及。罗斯福在第一届任期之初就撤掉了“联邦贸易委员会”中一位留任的委员，主要原因是这个人对新政没有任何支持。但是最高法院后来裁决，应由国会来决定总统是否有权仅仅因为独立的政府官员不同意他的政策而予以撤职。所以许多官员对于总统这一领导职位的人选变更并不那么在意，而对于那种狭窄的职业特性和官僚集团传统反映却很敏锐。

政府内部如果有一些野心勃勃、始终不渝奉行自己纲领的人，则内部磨擦就很难避免。罗斯福手下的那一批争夺倾轧、争吵不休的僚属尤其如此。从最初最高级官员间就有激烈的冲突。火气大、好吵架的伊克斯无止无休地制造磨擦；他同休·约翰逊吵架，同摩根索、珀金斯小姐、霍普金斯吵架，也同总统府其他人吵架；他同华莱士之间的不和发展到两人面对面地大吵一场，口不择言，连对总统撒谎、不忠之类的话都骂出来了。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的三位委员个人之间和行政管理方面的矛盾尖锐到罗斯福不得不在白宫花很多时间来听取他们的申诉，最后把主席撤职才算了事。其他的幕后斗争而为报纸的专栏作家评论的标题和鸡尾酒会上的助人酒兴谈话资料。

罗斯福的个人品性和管理方法也助长了这种乱糟糟的情况。他随便授权，致使官员们发现大家在权限上相互牵扯，权责不明。尽管罗斯福当众表示不赞成公开争吵，但实际上是听之任之，有时甚至还表示欣赏。他认为行政官员之间互相砥励，一较短长，也不无好处。新政计划的临时实验的性质及其自相矛盾的特点也是引起激烈争执的另一根源。

对罗斯福的行政方式的批评的声音在他第二届任斯内逐渐滋长。这种批评给那些坚持“政府少干预实业、多办实事”的保守派鼓了劲，而一心想把政府官僚控制起来的那些国会议员则把这种批评当作现成的工具。但是认真研究美国政治制度具体要求和需要的专家学者们并不都同意对于作为行政首脑的罗斯福的这种批评。

罗斯福一再无视行政管理上的一条根本准则，即首长必须统筹调配他属下的人员和机构，他必须“事必躬亲”。就罗斯福所面临的形势来说，他蔑视那些老一套的教条是有道理的。比如说，过分强调严密组织、责任系统和控制系统，就会窒息他所喜爱的那种生气勃勃、生动活泼的局面。正如小阿瑟·斯莱辛格所说的，他那种含糊不清的授权办法“常常能考验人的进取心、能力和想象力，而其效果则远超过按固定模式办事所得的结

果。”特别的是，罗斯福自己承担起医治由于他的行政方法而造成的痛苦和创伤的责任。

罗斯福不信任抽象的组织，他是从人的角度来看待行政管理的。他的善于视察人们的细微的差异和复杂性的特性，简直使他堪称行政管理的天才。他对别人工作了解入微，给人留下深刻印象；遇到困难的时候，他就及时给予支持，使人放手去做。但是他却不是那种对人甜言蜜语、轻易奉承的阿谀者。他的一个政治助手也许从未得到过他对她的工作褒奖，但她却能感觉到“一种热情的、经常的、持续的支持，感到他关心和信任我，对我的想法有信心，而且有时对我的行为举止和我一样觉得满有意思。”

罗斯福之所以采取这种敢于放手的领导方式，不仅是因为，这可以使那种陈旧得发霉的政府机关恢复生机，启发新的思路。此外，还有别的原因。

罗斯福曾经多次地把个性和观点不同的人放在一个办公室，或者让他们同做一件事。他把国务院的一些重要任务交给莫利，后来又交给威尔斯，这些任务与赫尔的职责是相互交叉的。他让休·约翰逊同总顾问唐纳德·里奇伯格在“全国复兴总署”中互相制约。他给国防部长哈利·伍德林任命了一位老是同他的上司作对的助理部长。他授权伊克斯和霍普金斯两人都管公共工程；让伊克斯和华莱士两人管理资源保护和电力；让法利和他手下其他一些官僚去管授予官职以及其他政治职能等问题。

罗斯福使用这种似乎荒诞的做法，一部分原因是它非常符合他的个性。他不喜欢完全信赖某一个人。他喜欢自己是注意的中心、行动的中心，这套制度使他居于控制四面八方的行动的焦点。他善于并愿意扮演各种各样的角色，这使他能够在最有利的情况下，分别同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他的行政方法使他在政治事务方面消息灵通，因为他那些争吵不休的助手很快就向他提供了各方面的情况。

然而，罗斯福采取这套办法的主要考虑是，面对美国政治制度中的内在的各种离心力，他竭力试图保持对行政部门的控制。他采用在一个机构中建立互相制约的权力中心的办法，使每个官员都更不能失去白宫的支持；总统实际上成为每个官员必不可少的盟友和伙伴。他减少了官僚机构自我扩张的倾向；他扼制了任何联合起来反对他的企图。实际上，他把“分而治之”的老办法略加修改，使之为他所用。

在罗斯福看来，这是个权力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狭隘的效率问题。奇怪的是，他的办法跟斯大林的办法很相似。一个研究斯大林政治手腕的人曾说，他采用这种重叠授权的办法，是为了防止指挥部内任何一个单独

的环节作出重大决定，而不受到国家官僚政治的其他部门的干涉，这样在上层就把问题暴露出来。就将权力放在第一位这点而论，罗斯福同斯大林一样是个政治行政长官，虽然他们的目的毫不相同。

出于哪些方面的考虑，罗斯福才采取这种方针的呢？虽然他从来没有把行政上高度个人集权的这种办法以某种形式固定下来，而且的确也不重视对行政问题作抽象的阐释，但他也许是充分意识到他应该采用一系列办法来保持对他的机构的控制。他采取非正统的行政方法，肯定不是由于对正统方法的无知。他在海军和担任州长时间的实践使他对基本的管理问题有充分的了解。他向国会提出的行政机构改组的建议就是根据传统模式提出来的。他要求对拨款的具体项目有否决权也是一样，但他未得到这项授权。他的许多下属逐渐学会尊重他的办法，尽管这些办法曾使他们感到为难。1939年担任预算局局长的哈罗德·史密斯断言总统是位反复无常的行政长官。但是过了几年，当他进一步看清楚罗斯福的工作范围和基本情况以后，史密斯对罗伯特·舍伍德说，罗斯福也许是历史上最伟大的行政管理之一。史密斯的新的断言是：“他确实是个行政管理方面的艺术家。”

然而，要对罗斯福在行政方面的功绩作出最后评价，也得考虑到他的办法所造成的大量资源上的浪费和时间上的延误，更重要的是使罗斯福的计划——特别是复兴计划遭到削弱。好的领导不但应该激发人们的思想和活力，而且能将他们在建设性方面的观点协调一致。关于罗斯福容忍他的助手之间无休止的紧张和磨擦的问题，我们究竟能作出什么评价呢？这种内部互相间的攻讦，其主要作用当然是破坏性的而不会是建设性。在机构改革问题上，伊克斯要把林业部门从华莱士手里夺过来的神经战正是虚耗精力而毫无益处的例证。总统本人也承认他在执行新政上动摇不定。假如，象人们所说的那样，检验效率的唯一真正尺度是生存，那么，罗斯福当政时期的经济衰退，1939年持续增长的失业，1939年总统复兴提案的削弱就提出了一个严重的问题：他这个行政领导是否真正有效率。

罗斯福的做法理所当然地在他的僚属中引起不快和困惑。伊克斯有一次不禁脱口而出：“你这个人很了不起，但是在我认识的人中，你也是最难共事的。”

“因为我有时对下属太苛刻了？”罗斯福问道。

“不，你并不苛刻。但即使对那些忠实于你而你也完全相信其忠实的人们，你说话也不坦诚。你對自己手里的牌严守秘密。……”伊克斯继续说，如果总统信任他的顾问，他们的建议会使他不犯或者少犯错误。罗斯

福愉快地接受这个批评——但他并没有改变他的方法。

还有一次，民主党的政治家们敦促罗斯福任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一位委员为联邦法官，而司法部却支持一位政府检察官。双方争得不可开交，于是总统把两方面的代表召到白宫。双方各抒己见。

“我要跟你们讲，我自己的方案，”罗斯福说。“这两个人我都不不要。”他说出了他心目中的人选。“你们听说过此人吗？”双方都没有听说过。

“那好，”总统继续侃侃而谈。“他的父亲是个很杰出的人，有一次老头子坐在他的游艇上，一个巨浪把他冲下海去，接着又一个巨浪，把他冲回船上。这人真了不起！”他的客人所得到的总统的解释就是这些。不过事后证明罗斯福的任命是非常正确的。

作为一个行政管理艺术家，罗斯福必须依赖手边的材料工作。材料当然不够。因此要对作为行政首脑的罗斯福作出最后的评价，就必须分析他开辟新材料来源的能力。他用这些材料去造就一个既能鼓舞人心而又能使各级官员各尽职守的行政领导班子。最后，他进行有效的行政领导的能力，还要取决于他进行创造性政治领导的能力。

党的领袖——罗斯福

历史学家沃尔特·米利斯在1938年底评价道，新政“已经降低为一个没有纲领、没有有效的政治组织、没有广大群众性的党的力量支持、没有候选人的运动。”时间的推移并没有证明这个判断是错误的。它使这样一个问题显得更加突出了：在美国近代史上最大的一次选举胜利以后才仅仅两年，为什么这位当代最成功的竞选者就理应得到这样一种评价呢？

这个答案的一部分可以从罗斯福开始竞选总统以来就一直采用的那种政治策略中寻找。在1931年和1932年，他象任何野心勃勃的政治家那样，需要争取那些态度和利益各不相同的民主党领袖和集团的支持。民主党已深刻地分裂为不同思想、不同地区的许多小派别，所以罗斯福1932年开始竞选总统时的所依靠的就是这样一个五花八门、东拼西凑的大杂烩。胡佛在自己党内引起许多方面人士的不满，因而使一些共和党集团内部和独立的集团转而支持罗斯福。显而易见的结果是，1932年人民的授权必然是很不明确的，而明确的只有一点，就是罗斯福在对付萧条上必须有所动作，而不论其动作是什么。

罗斯福应乱世的召唤，慨然担当起国家领袖的神圣职责。他并不倚重民主党的支持，而是斡旋于各种互相对立的利益集团、政治势力和思想派别之间。在1933年的危机笼罩下，他的掇客式的领导方式是很起作用的。

他大得人心，推行了他的应付危机纲领，振奋起全国的精神。1934年的国会选举的成功不是对民主党的赞赏，而是总统得到广泛支持的证明。

随后不久，他那胡乱拼凑的追随者开始解散了。右派反抗，工人闹了起来，休伊·朗和其他一些人加紧他们骚扰性进攻。由于政治上的这些变化，加上部分新政措施被最高法院否决，以及需要使尚待批准的改革法案能获得通过，罗斯福作了一个巨大的、突然的、而又毫无计划的向左转的决策。这一转变就使他成为成员庞杂、并无固定形态的中间派和自由派大联合的领袖。总而言之，使他成了党派领袖。从1935年年中到1938年底，罗斯福放弃了充当各集团间掮客的角色，而担当起党派领袖的任务，指挥着他那中间派和左派的“伟大联盟”。

党派领袖这个角色，总统也扮演得十分出色，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在1936年竞选运动快结束的时候。1937年，他常谈到杰斐逊和杰克逊以及其他一些伟大的总统，他说，他们是大多数人民的伟大领袖。1938年，他曾试图对民主党做一些改良，使之成为人民中大多数人的工具。结果，这个努力归于失败——关于改组最高法院的斗争和有效的复兴措施遭受了挫败，而且清党问题罗斯福也以失败告终。

失败的原因很多。美国的宪法制度在设计时就注意到了要防止轻而易举利用群众的多数来控制政府。三十年代中期的经济复苏不但使全国民众增强了对自己的信心，减少了对行政管理者的依赖，而且增强了许多利益集团和领袖人物的力量和雄心，他们很快就越过新政策的罗斯福领导的界限而向前推进了。而且，要改革民主党的阵规陋俗使之现代化并非易事，不得连任三届总统的惯例也让许多人认为罗斯福的政治生涯快要告終了。不过，失败还来源于罗斯福在作为一个政治战略家方面的局限性。

局限在于罗斯福担当起党的领袖或多数派的领袖都不是出于经过深思熟虑和缜密计划的政治战略，而只是为了适应当下政治各种发展的需要。作为全国大多数人的领袖，他依靠的是他个人的声望、他的非同凡响的魅力或者是热烈的感召力。他并没有如他在1937年就职演说中阐述的那样，为扩大内容的新政建立一个牢靠而有组织的群众基础。没有这种群众基础，他在国会里就不能建立一个由基层议员组成的多数派集团来实现他的纲领。所以，关于最高法院的斗争后来逐渐演变成了一场国会斗争，而总统可以投入战斗的后备力量却微乎其微。

总而言之，罗斯福作为党的领袖并没有从战略上作出设计，没有就党的组织体系革新进行深谋远虑的、彻底的、长期的尝试。清党标志着他对

党的领导的破产。五年来，总统把不干预“地方”选举搞到了神圣不可侵犯的程度。当候选人——其中许多人是坚定的新政派——迫切地需要白宫支持时，麦金太尔或是厄尔利就拿“总统不参加地方选举”这条“牢不可破的”戒律来抵制他们。当政府的好朋友基·皮特曼 1934 年面对共和党和麦卡伦派民主党的联盟时，罗斯福仅仅是表白“我非常希望我能够在会议上公开发言，告诉内华达州，我百分之一千地支持你！”不过，“象对预选保持沉默这类事情正是我的工作性质对我的许多惩罚之一。”在 1934 年的选举期间，内阁成员向他请示他们是否能发表竞选演说时，罗斯福回答说，只能在他们自己的州内，其他地方则不允许。

罗斯福过去一向是小心谨慎，可是在 1938 年却一改往日作风，把政府的全部政治砝码——金钱、宣传、报纸影响、联邦官员以及他本人的政治声誉——都投入了地方选举，力图把他的政敌赶出权力圈子。他在主要方面遭到了失败，而他的失败的主要原因要归咎于他早期的政策。在遭受白宫五年的冷遇后，地方候选人和党内集团都不服总统的管教了。为什么必须服从呢？白宫并没有给他们什么好处。

实行清洗这项措施本身就是罗斯福典型的应急措施。虽然背叛党的问题好几个月来已很突出，清党的打算在 1938 年冬天已经形成，但是当局的做法绝大部分都显得在最后一刻是匆忙、不合式甚至是很笨拙的。在有的州，白宫的干预只是使得党内反对派更加对立，却不能保证使之落选。罗斯福自己采取的策略更是鲁莽从事与犹豫不决、面对面的正面对抗与诡辩的幕后活动二者奇怪的结合。

但是罗斯福作为党的领袖，其主要失败之处不是清党问题。问题在于他当了六年民主党全国领袖以后各个州的民主党的糟糕状况。例如，在宾夕法尼亚州，劳工、新政派、民主党保守派吵成一团，罗斯福把它形容为但丁的地狱。深刻的分歧使伊利诺伊州的民主党大伤元气；威斯康星、内布拉斯加和明尼苏达等州的民主党因为在 1934 年和 1936 年两度被白宫遗弃而无所作为。加利福尼亚州的党则分裂为有组织的民主党、“每星期四赚三十美元”运动的支持者和其他许多派别。

更重要的是纽约州民主党的情况，因为罗斯福对他自己那个州的政治形势了如指掌，而且也没有禁止干预该州事务。对于 1933 年纽约市市长的选举，他的干预是非常迂回巧妙的，以致若干年后政论家们仍在争论他支持的究竟是民主党的哪一派，他是否主要想让拉瓜迪亚当选。1936 年罗斯福鼓励纽约州成立工党以便有助于他再次当选。法利、弗利和其他的民

主党人指出，工党总有一天会反对该州的民主党，但罗斯福却嗤之以鼻，而后来果不其然。到1938年，纽约州的民主党的力量比过去许多年更加削弱，而且更加四分五裂。

这是罗斯福的特点，他认为1938年选举的失败的主要因素是各地民主党候选人和领导人的弱点。其实原因要复杂得多。总统没有从基层起建立更强大的党的体系，没有使之更直接地响应全国性的领导和更紧密地配合新政纲领和措施，这就留下了政治权力上的真空，而这个真空很快就被以在位的或正在争夺职位的州或地方领导人为中心的政治势力填补起来。罗斯福和他的新政大大强化了地方党的集团，也大大巩固了他们组成的利益集团。新政在全国范围内使各种利益集团摆脱了懒懒散散的状态而成为有潜力破坏罗斯福联盟的政治势力集团，与此同时，新政也促使地方集团摆脱白宫的束缚。

在罗斯福的第二届总统任期开始后不久，威廉·艾伦·怀特在信中对法利说，“如果我们亲爱的领袖在约翰·刘易斯和卡特·格拉斯两人之间找不出可以勾通之处的话，那么他就必须抡起大锤把两人间的堡垒打碎，不再管什么党不党，而是在大锤下的一片碎石上去拼凑他的政策吧。”这位有眼光的堪萨斯州人的评述很能代表当时许多自由派人士的希望。总统从他的帽子里变出了那么多只兔子，难道就不能再变出另一只来吗？

清党事件表明，他已经无能为力。帽子里面不可能再出来一只兔子。但是怀特的建议对作为党的领袖的罗斯福是一大考验。总统还有多大的活动余地？他有可能建立一个更强大的党？美国政党制度的特性，特别是民主党，是否排除了为实现总统在第二任就职演说中所提出的更广泛的新政而必须进行的基本改革的可能性？

从表面上看，习惯势力的确很强大。美国的党派制度并不容易改变。就政党制度主要方面来说，一个全国性的政党就是一些互相勾连的地方集团的控股公司，而这些集团又以控制着或正在争夺无数州的或地方的职位的人为中心——例如州长、县长、州立法委员、市长、地方检察官，美国参议员、县政专员、市政委员等等，大家又通过党的传统、总统的领导、以及一定程度上的共同主张而松散地联系起来。只要美国宪法制度还创造得出值得各州和地方通过选举去占有或争取的东西，那么政党就还会是无纪律和无中心的。

长期浸淫于复杂的美国地方政治的罗斯福，对于政党改革方面存在的困难是一清二楚的。他不愿与令人不快的地方领袖如黑格和凯利之辈闹

僵，就是他无意实行显而易见的改革的明证。总统或许也低估了从上而下地给党注入新生命力的可能性。

有的新政派担心民主党的衰败已令它不能成为实行进步政治的支柱，因此主张建立忠于新政的总统派，这种派系可以把党从地方性的争吵中解脱出来，使之致力于全国性的纲领。组织总统派的尝试夭折了。然而，要是总统给予鼓励和支持的话，本来是可能成功的。新政已经在党内激发起生气勃勃的因素，它们把纲领放在地方利益之上，它们关心的主要是改革和复兴的全国性政策。通过与这些力量合作，依靠他个人的威望和他对全国党的机构的控制，总统完全可以对付新政的反对派的，而且完全有可能使中立分子转而支持新政的。

这样做究竟会不会成功，谁也无法弄清楚，因为根本就没有试图这样做过。但令人感到矛盾的是，清党本身表明，长远的、经过良好组织的努力可能在许多州起作用。因为清党确曾在两种情况下成功了——在北部城市区，在那里曾有所规划而不完全是仓促上阵；在南部某些州，在那里白宫帮助的是地位巩固的当权者如奥康诺，而不是想搞掉某个地位巩固的反对派，如佩珀和巴克利。清党的结果的确划出了总统力所能及和势犹未尽的区域的大致分界线。要是罗斯福在第一届任期内曾经认真培育党内的新政派势力的话，前一种区域无疑地是会宽泛得多的。

不过他没有这样做。总统之所以没有重视他所领导的这个庞大的政治组织的潜力，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他为争取 1932 年的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作了巨大让步，现在他必须接受这种让步并承受牺牲，包括接受加纳和其他保守派进入权力内部核心。他在第一届任期内的成功，使得他的那种个人领导的办法看来似乎可行，凭着他无穷的智慧和个人魅力，他克服了一次又一次的难关。于是，罗斯福就不从长远着想去花功夫把党组织起来。作为一个目光短浅的政治家，罗斯福关心的是他个人的政治地位和选举地位，而不顾党要付出多大代价。运用他自己的政治手腕，总比去改善摇摇欲坠、散散漫漫的党组织要方便得多。

然而，罗斯福之所以未能把党建设起来，主要原因在于他不愿意充分承担党的领导的义务，在于他始终想保持选择策略路线、包括退却路线的灵活度。使罗斯福成为一个出色的策略家的那些个人特征——他的敏锐、他的善于扮演各种角色、他的能攻能守、特别是他个人魅力——却不适合进行艰苦的、长期的、坚定的努力来发展一个群众性的运动，以坚守一个贯彻始终的政治纲领。后一种情况必须在思想上和政治上采取一种既定的

战略——而这正是罗斯福所不愿承担的义务。

他从未忘记伍德罗·威尔逊的惨痛教训，他脱离了他的追随者，前进得太远了。遗憾的是，也许他也没有充分领会威尔逊的教导，“如果总统带头，党就不能不跟他走。”如果罗斯福曾按照精心选择的目标来领导和组织党，如果他曾号召农民、工人、领取救济者、白领工人、宗教和种族的少数集团等广大群众并使他们同党密切结合起来的话，如果他能充分运用他自己发动的有组织的运动来对付利益集团的联合势力的话，那么在第二届任内，新政在国内战线上的情况就会大不一样了。

所以只有对领导一词作最狭义的解释时，才能承认罗斯福是一个杰出的党的领袖。一方面他把党统一（也许是松散地）到一个纲领上；他给党带来了辉煌的胜利，他从思想上使它转向新的方向。另一方面，他使党服从于他的政治需要；他没有把它作为自由派思想和行动的源泉而充分利用其潜力；同他刚成为党的领袖时比较，他并没有使这个党更加强大一点，至少就其基础来说是如此。

然而，在评价他对党的领导时，有一个方面是可以为罗斯福辩护的。就在新政在国内进入尾声的时候，有一些新问题和新势力正成为全国和全世界关注的中心。不管他的变化无常和权宜应付的弱点如何，但也正是这些特点使他具有应付新情况的行动上的灵活性。在1938年和1939年世界事务中危机接踵而至的情况下，这种灵活性正是迫切需要的。

第十九章 外交：些许的指责与严正的抗议

总统在他那政治事件让人目不暇接的第二届任期里，似乎更渴望身边有个稳定的环境。他每天一般8时左右开始一天的活动：在床上进早餐，然后医生、海军将领罗斯·T·麦金太尔迅速地给他进行身体检查，然后翻阅一下《纽约时报》、《先驱论坛报》、《巴尔的摩太阳报》、《芝加哥论坛报》、《华盛顿邮报》、《华盛顿时代先驱报》这六份报纸，特别注意有关白宫的报道和社论。许多时候他还未起床或正在穿衣的时候，他的秘书或一位阁员、国会议员之类的人进来，就当天要办的事与总统说上轻松的话，轻松地开几句玩笑。十点半左右，他坐着轮椅，被推到办公室，开始一连串的短促的会晤，一直忙到吃过午餐，有时甚至持续到下午。然后的时间用于口授回信。当来信堆积特多的时候，总统晚上还得继续处理回信。来信甚多，他的解决办法就是回信要简短。“任何一封来信，一般只要简单答复两句即可，”这是他有一次对他的儿子詹姆斯的教导。

总统的工作室多年来都保持着旧貌，只是他的书桌上零乱地摆着的小玩艺越来越多，例如小人像、动物、打火机、旗帜，等等。他好象把这些小玩艺都看作自己的老朋友，和它们难舍难分。最能反映罗斯福个性的房间，与其说他在白宫侧翼行政大楼的那间办公室，不如说是二楼上他用作书房的那间椭圆形办公室。正是一个宽敞舒适的房间，窗上挂着深绿色窗帷，墙壁粉白，屋内摆满了印花布覆盖的家具，家庭小摆设，成堆的书籍、集邮册，以及柯里尔和伊弗斯的版画。此外，由于触目皆是海军油画和舰只模型——这些模型，有的放在架子上，有的放在瓶子里，或架在一些空隙处——这间房子充满了浓厚的海军情调。但是这种情调，只不过是旧日美国快艇驰骋海上、英勇迎敌的壮丽场景的缅怀，绝不是象征在一个扩军备战的世界里的疯狂的海军竞赛以及巨型的战舰、肮脏的油轮、成群的潜艇等灾难。

虽说罗斯福已经接近六十岁了，但这五、六年的白宫生涯给他的身体并未带来多大变化，有时他的脸显得歪斜，面色灰白，看来是苍老多了，但这往往是因为感冒头痛引起的；在华盛顿，他总是受到此病的折磨而深以为苦。一旦去温泉休养几天，晒晒太阳，或乘游艇在海上巡游一次，他脸上疲倦的皱纹也就立马消失，他的面色依然是健康的棕褐色，神采奕奕。他从来没有患过什么重病；1938年有天晚上，他在海德公园曾晕倒过一次，但几乎立即恢复了健康。

罗斯福身边的秘书也保持着相对稳定。1938年，厄尔利、麦金太尔、莱汉德小姐以及格雷斯·塔利都还忠实地随侍左右，詹姆斯·罗斯福在1938年中期结束了他的秘书职务，去梅奥诊所医治胃溃疡。总统的侍从武官沃森深得罗斯福及其秘书们的信赖，因此留下来加入了秘书处。1939年的机构改组法批准总统可以增加六名总统助理，并大肆宣称，这六名人选必须是一些“不计功名”的人物。但即便如此，他对这六名人员的挑选和任命也是操之甚慢。

罗斯福和他的全体僚属的关系可以说是亦庄亦谐；既不失总统职位及其个人的尊严，但有时候准许下属开开轻松的、甚至过火的玩笑。他总喜欢贬低沃森在钓鱼和打猎上的本事，也许常和厄尔利或麦金太尔就选举或其他的事情打赌。慕尼黑危机发生后不久，当时因肺部损伤去北卡罗来纳州养病的麦金太尔给莱汉德小姐写了一封短信。这封信与涌向白宫的那类信件相比，真是大异其趣。总统立刻欣然命笔：

我亲爱的麦金太尔先生：

我经常被一些事情所感动，但很少有象你给莱汉德小姐的信使我读后那么感动的。这是她偶尔给我看的少数私人信件之一。我们两人得感动都流泪了。

对我来说你在北卡罗来纳州深山中给我们以全力支持，其意义胜过赢得佛蒙特州。

你和你贤惠的妻子都是笃信上帝的人，这是值得高兴的，因为这就使你们两位不会纵酒，也不致走上歧路。

但愿你和全家没有因为共和党造成的大萧条受到严重的经济损失，还有能力为孩子们添置一些鞋袜。

你真是一个好公民，一旦我们要和希特勒开战，我相信你一定会第一个报名参军的。

你的朋友

弗兰克林·D·罗斯福

国际危机也没有特别地影响总统的工作习惯。他日理万机；打电话，与个别人交谈，责成有关部门答复正式信件，对私人信件亲自作答，给秘书和政府官员写短信，出席晚会。在一般情况下，他与赫尔取得密切的合作。这两人一个以灵活机动，足智多谋见长，一个以固执、谨慎、古板取胜；两人互为补充，相得益彰。但罗斯福行事的风格，总是不把自己局限于行政领域。他经常直接找态度冷漠、讲究实际的韦尔斯商谈国事，也同富有才干的伯利频频接触。此外他还和一大群大使、公使、罗马教皇、家里的老相识如考克斯和巴鲁克，以及无数的海外朋友等保持较为紧密的联系。他深知外交政策涉及面广，影响深远，为了寻觅主意，商量对策，他不仅找国务院人员，也找伊克斯、霍普金斯、华莱士等人探讨世界形势。

尽管总统总揽整个过程，但由此纷乱局面产生出来的任何对外政策，却并非由他一人制定。事实上，这些政策，与其说是国内制订的对外政策的既定计划和纲领，不如说是对国外事件的直接反应。外交官茶余饭后的闲聊，外交快件传递的冗长信件，外国领导人的官方声明，由轧轧作响的电讯仪器收录后经过翻译、油印、打上“秘密”字样的紧急电报——所有这些带来了国外事态纷繁芜杂的消息。由于仍然缺少一个稳健的战略，罗斯福和他的决策者们，在他第二届任期的后两年，为探索国际事态的意义，为地球上这个最强大的民主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如何能起作用而绞尽脑汁。

历史象纠缠在一起的很难理出一个头绪的多股线头。罗斯福既要专心致

志地应付国内事务，又要密切关注着国际事态的发展，他到底何时侧重于此，何时侧重于彼，其间是不存在急剧的转捩点的。尽管总统在随后的一次谈话里提到他要从“新政博士”这一角色转为“打胜仗博士”的角色，然而事态发展的无常，已不允许他进行这种单纯的转移。1938年3月正当他为解决国内工商业衰退的问题而弄得焦头烂额的时候，德国纳粹党征服了奥地利；同年稍晚时候，正当他开始清洗民主党内的保守分子，希特勒长驱直入，强占了苏台德区；1939年初，正当罗斯福疲于对付一个难以驾驭的国会，希特勒竟一口吞并了整个捷克斯洛伐克，并且进而窥伺新的目标了。

早期的“新政”尽管具有孤立主义的倾向，总统却从来也没有忘记过世界上其他地区，而现在，当他的第二届任期还刚及一半的时候，他决不让喧嚣的国际事件淹没了他在国内执行的自由主义的施政计划。一方面是国际局势迅速发展，另一方面是国内政治与经济情况变幻莫测，在这样的处境面前，如何建立一个务实可行的对外政策，而同时又让“新政”顺利实施——这就是罗斯福总统第二届任期后两年内的中心任务，这个任务甚至对于罗斯福政治上的圆通成熟也是一次严峻的考验。

慕尼黑：逃避风险，逃避义务

在吞并了奥地利一个月以后，希特勒向全国发出呼吁，再让他执政四年，以便巩固新的大德意志所获的成果。1938年4月11日，他取得梦寐以求的结果：百分之九十九的人民——包括奥地利人在内——投票支持他继续执政。希特勒再一次采取迅速行动；十天以后，他命令他的将军们草拟新的侵略计划。

他下一个目标已十分明确了，捷克斯洛伐克现在就象一截粗短的楔子，插进了新德意志帝国的心脏。捷克是凡尔赛条约的产物，也是它的标志；它是一个自豪的民主国家，国际联盟的支柱，法俄两国的盟友；国家虽小，却武器装备精良，供给充足，并有着天然屏障；但在希特勒的眼里，却是一个由劣等人种的斯拉夫民族组成的国家。对付这样一个国家，元首仍然采取了将军事、外交、心理三者的力量融为一体的高超战略。

对于希特勒来说，他可以在捷克斯洛伐克找到一个对于实现他的野心极其有用的借口；这就是苏台德区的大约三百万德意志人；这个少数民族一直在要求布拉格当局给予他们更多的自治权。苏台德人的一个纳粹党头子康拉德·亨莱因多年以来一直从希特勒处源源不断地得到经费接济。希特勒一方面公开声称要为一个受压迫的少数民族申冤，另一方面却又指使亨莱因“要提出永远难使我们感到满足的要求”。与此同时，他又极力策

划使布拉格在外交上完全陷于孤立。他充分利用波兰和罗马尼亚对苏联的恐惧心理，以便在捷克斯洛伐克一旦遭受侵略时，苏联不能通过这两个国家前来援救。他以能够分割捷克领土的前景来引诱波兰和匈牙利。至于西欧国家，希特勒精明地估计到，法国是不愿意打仗的；而对英国则强调苏台德人如何遭受压迫，因此，倘若为了他们回归祖国的要求而引起冲突，那是很拙劣的。为了他自己国土侧翼的安全，希特勒对罗马进行了一次国事访问。他知道墨索里尼对德国吞并奥地利还不满于心，所以向他慨然表示：两国在阿尔卑斯山脉的边界“永远不容侵犯”。

两股能够遏制希特勒的努力都被希特勒镇压下去了。一股阻力是他手下的一批将领；他们担心德国没有力量足以发动一场大规模的战争。希特勒对付这些将领，采用了软硬兼施的手段，把其中的一些老资格的将领抛在一边，而坚持了他的征服计划。另一个潜在的阻力就是俄国和西方联合的反对势力。但是希特勒采取战争行动的主要战略前提，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欧洲是离心离化的”。这一点是符合实际情况的。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两股势力在一个短暂期间，曾在联合的可能性：一小批军官和文官曾准备在希特勒下令进攻捷克的时候向他夺权。但他们的计划能否实现，还有赖于英法两国是否会支援布拉格。

英法两国会出兵支援吗？希特勒与西方国家首脑之间所持的不同态度乃问题的关键所在。希特勒为了消灭捷克斯洛伐克甘愿冒险发动一次全面战争，而后者却不愿为挽救捷克而冒战争风险。俄国和西方国家都各自担心彼此背叛，剩下自己单独地去应对日益强大的德国。

在这种强权政治的力量对比旗鼓相当的时刻，美国仍然显得无足轻重。它只好袖手旁观。1938年的春天罗斯福正忙于处理工商业的持续衰退，以及那个专找麻烦的国会，但他仍然密切地注意着欧洲事态的发展。他收到大量有关欧洲这盘复杂棋局的情报，情报十分多，其来源也十分广泛，叫总统有时高兴，有时失望。

对于事态发展的总趋势，总统是有他自己的看法的。在他看来，纳粹党徒和法西斯分子都是一群匪徒，最后势必要加以遏制。正因为如此，他对张伯伦的绥靖政策是深感担忧的。当罗斯福听说张伯伦准备承认墨索里尼征服埃塞俄比亚以换取一纸友好条约，他说：如果警察头目和一伙流氓达成一笔交易，其结果是双方都不吃亏，警察头子将成为一个英雄人物；然而，如果强盗反咬一口，警察头子就麻烦了。他感到张伯伦是下了太大的赌注。

当然这只是私下的看法，罗斯福并没采取公开的行动。总统仍旧只实行他的“轻微的指责，严正的抗议”的政策，而不愿在欧洲力量对比的天平上放上自己的砝码。“不冒风险，不承担义务”已成为白宫的格言了。当他听说一艘德国军舰将在西印度群岛附近停泊，他立刻下令一艘美国战舰同时开往那里。当德国要求美国提供氦气以便它制造空中飞船时，总统曾一度鼓动掌管此项物质配给的伊克斯尽力量拖延。这一时期赫尔则以发表抗议为能事。国务卿一再地谴责国际间的非法行径。当局势因希特勒试图侵占捷克而愈加紧张的时候，他严正地要求各国回到十年前签订的凯洛格反战条约上来。欧洲国家的当权者都把美国的这些宣言和声明视为迂腐而置之不理。意大利外交部长齐亚诺生性尖刻，他在他的日记里记载了下面这个轶事：某次一位正在意大利访问的美国客人在放一张当时流行的唱片，齐亚诺则洗耳恭听，然后他却放起他自己的唱片了。

看起来总统只愿意承担一项义务。8月中旬，他在加拿大安大略省的女王大学发表演讲时口头上向加拿大人保证说，他本人已在国务院草拟的一份文件上写进了这么一句话：如果加拿大国土受到任何另一个帝国的威胁，美国人民决不会站在一边袖手旁观。但是，纳粹的日程表上，下一个目标却是捷克斯洛伐克，而不是加拿大。

1938年夏末，希特勒已准备动手了。最后的方案已经拟订：准备部署三十六个师来攻占捷克。在纽伦堡，他面对一群疯狂叫嚷的纳粹党徒，提出了为苏台德人“伸张正义”的要求。9月剩下的那几天，事件层出不穷。张伯伦突然飞往德国，这使希特勒吃了一惊。但同时又感到高兴，窗外风雨交加，英国首相与德国前陆军下士在后者的贝希特斯加登山间别墅进行谈判。希特勒在会上宣称，他要和捷克人算帐，即使这意味着战争的爆发，他也在所不惜。

希特勒不计一切的狂妄态度把张伯伦吓晕了；他赶回伦敦，想了解一下内阁是否支持苏台德区德意志人和平脱离捷克斯洛伐克。希特勒继续做进攻的准备。一星期后，张伯伦带着他从本国和法国、捷克取来的关于和平移交苏台德区的条约，欣然返回德国（捷克的那份协议书是在对布拉格当局施加了重大压力后才取得的）。希特勒没有料到捷克人竟会如此软弱，惊愕之余，又感到失去侵占捷克的机会，难以解恨，于是又改变主意，坚持立刻实行军事占领。张伯伦大失所望，无奈只好返回伦敦；希特勒命令进攻部队返回战斗状态，整装待命；伦敦居民开始挖防空洞，海军舰队也已接到动员命令。张伯伦为了争取和平的最后机会，又转向墨索里尼求

助。这位黑衫党领袖因尚未做好战争准备，乃向希特勒进谏。通过墨索里尼以及希特勒周围的温和派的努力，希特勒最后同意和墨索里尼、张伯伦以及达拉第举行谈判。但希特勒要求通过和约获得他想凭借武力来夺取的东西。9月29日，四人在慕尼黑会晤，安排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分割。不久，德国军队兵不血刃地开进了苏台德区。

这一时期，罗斯福又在做什么呢？9月初，当欧洲危机更加迫近的时候，他正在马里兰州以泰丁斯为对手进行竞选活动。其后，梅奥诊所的外科医生在给詹姆斯的胃溃疡动手术的时候，他又在明尼苏达州度过一段坐立不安的日子。9月间危机进入高潮的那几天，他只好突然打断他竞选演说的计划，急急忙忙赶回华盛顿。他一眼就看出了当前形势的几个主要特点：希特勒决心吞并捷克；张伯伦坚持要求和平；苏台德区很有可能被夺走；即使战争因单方的让步而推迟，几年以内仍有可能发生。危机迫在眉睫，对此，美国能做些什么呢？

罗斯福又一次试图对国际形势施加影响，但同时又不准备承担义务，但这一次却是在国外危机迫在眉睫的时刻。他和赫尔一次又一次地呼吁国际合作，以抵制国际间的战争与侵略，但仅此而已，决不可陷入国外的战争纷争。捷克总统爱德华·贝奈斯吁请他劝告英法两国不要抛弃捷克人，但他却没有答应；张伯伦要求直接对美国人民发表广播讲话，他也不同意；有人建议他出来仲裁，他也加以拒绝。相反地，他却决定对所有下列国家发表公开声明，呼吁维护世界和平，他把这些国家分为：潜在的侵略者，旁观者，受侵略者。但公开的呼吁本身就提到美国不屑于卷入“政治纷争”，因而引起民主国家的婉拒中；而希特勒则大谈其苏台德人受压迫的老调，对上述呼吁极尽冷嘲热讽之能事。接着，总统又呼吁希特勒本人，要求同意在某个中立地点就国际危机举行会议，但美国不想卷入漩涡。希特勒对这封信不予理睬，因为事态已向有利于他的方向发展了。

1938年9月是美国一个狂风暴雨的月份。忙得喘不过气的新闻评论员夜以继日地工作着，给听众带来了灾信：东北部发生了飓风、海啸、洪水。穿插在这些新闻之间的，还有最新发布的有关国外的惊人的政治新闻。到9月底，雨过天晴，一望无际的天空，似乎更增加了慕尼黑会议结果突然带来的轻松气氛。“这两周真把我忙得够呛，”罗斯福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说，但仲夏一次海上的遨游，“才算使我恢复了元气，讨厌的是我的鼻涕至今还流个不停，前几天，我真想杀死希特勒，并割掉我的鼻子；今天，我对鼻子倒真抱有好感了，而对元首也无恶意了。”

但是，如释重负之感却深深蒙上了令人担心的阴影。慕尼黑会议如果能够保证持久的和平，那么付出这一代价也许不算太大。但是，正如伊克斯所说的，它能保证吗？因为希特勒本来就是一个精神病。赫尔针对条约发表了一个冷淡的声明，但一两天后，韦尔斯却公开声称，现在是建立一个以正义和法律为基础的新的世界秩序的大好时机。国内舆论界的意见纷纭，难以达成一致。孤立主义倾向比较严重的报纸对会议取得成果表示欢迎，其它报纸则对于会议对于未来产生的后果表示担忧。总统本人的态度似乎也很矛盾。在获悉希特勒表示同意召开慕尼黑会议后，他打电报给张伯伦，莫名其妙地称后者为“好人”，但对张伯伦的绥靖政策及其影响他又深表不安。他满面愁容地对伊克斯说，他担心英法两国会交出特立尼达和马提尼克两岛来讨好希特勒——如果他们果真那么做，他就要派出舰队先去占领。

英国却有一个人表示了毫不含糊的看法，这就是温斯顿·丘吉尔。他说这是一次完全的、绝对的失败。

1938年秋天，总统看到希特勒的好战气焰似乎更加嚣张，因此，他趁当时国际局势暂时缓和的空隙，重新审视他的对外政策。他经常地，甚而在尚未起床的时候，就把赫尔和韦尔斯找来讨论。满屋子都是报纸和公文信件，他手里拿着他的长烟嘴坐在那里一边比划一边挥舞着一份刚收到的电报，侃侃而谈，顾不上拾起一下他那快从肩上滑落下来的蓝色法兰绒小披肩；于是，他的观点慢慢地变得具体化了，他越来越肯定：绥靖政策是要付出很高代价的一种赌博，将来可能遭受失败，而美国也无法逃脱其后果。白宫窗外传来了花生小贩的说话声：“那一边炮声隆隆，这一边却无声响，只见松鼠在草坪上东窜西跳。”罗斯福评论说，小贩的话说得很对，但是他忘记了一个不幸的事实：国外的纷争、冲突和炮火，是越来越逼近美国了。

总统还是不愿把局势的严重性告诉全国人民。伊克斯劝他这样做，但罗斯福认为人民是不会相信他的。也许罗斯福担心美国人民对他已失去了信任；因为这时正是他发动了清洗，而共和党的孤立主义分子在国会选举中也颇为得势的1938年底。

总统不愿立即地打击中间阵线，因此他认为有把握的方面采取行动。他派遣了一个由两党组成的代表团前去利马参加美洲大陆国家代表大会。会上尽管阿根廷表示反对赫尔促成到会国家发表了一个共同行动宣言，以防止任何对西半球的外来威胁。纳粹在夸耀他们的空军实力，总统得知情

况以后也在制订计划加紧增强空军。当由于一个侨居法国的德籍犹太人在巴黎枪杀了一名德国使馆随员、德国掀起一场疯狂屠杀犹太人的浪潮时，总统公开地表示强烈震惊和厌恶，并召驻柏林大使回国述职，并加倍努力为逃亡的德国的难民提供援助。他也密切关注远东，在获得蒋介石继续抗日的保证后，他向蒋介石提供了两千五百万美元的贷款。

1939年的新年来临了。国会又将召开一次重要会议。在新年假期里，当总统的晚辈们在屋里蹦跳追逐、来宾们晚饭后观赏电影时，总统却在忙着公事；他一边翻着字迹潦草的笔记，一边口授格雷斯·塔利记录。1939年1月4日，他出席国会上的讲话锋芒毕露，急切的心情溢于言表的他说到：

“我们虽然已经避免了一场可能将全世界推入一片火海的战争；但事实越来越清楚地表明：世界和平并没有得到保证。

“在我们的周围，未曾公开宣布的战争——军事的和经济的，正在激烈地进行着。在我们的周围，新侵略的威胁——军事的和经济的，也正一步步地迫近……

“人的一生总不免要面临这样一个时刻：人们必须奋起捍卫的，不仅是他们的家园，而且还有信条和人道主义精神，这些是他们的宗教、他们的政治制度和他们的文明本身的基础。对宗教的捍卫，对民主的捍卫，以及对各民族间和睦相处的善良愿望的捍卫，都是有着共同目标的战斗。要挽救其中一个，我们现在就必须下定决心挽救所有的一切。……”敬畏上帝的所有民主国家，决不能纵容侵略行为而不提出任何有力的抗议。“舍战争而外，还有许多方法——但却是比仅说空话更为有力、更为有效的方法——可以使侵略者深刻了解我们人民的立场与信仰。”

对于这些方法是什么，罗斯福又把锋芒收敛了起来。他避开了要对中立政策进行具体改革的实质问题，而只是模棱两可地说：“我们已懂得，我们谨慎地想通过立法使我们的中立态度确立下来，但我们通过的中立法在实际运用中可能变得不平衡和不公正——实际上它可能帮助了侵略者，而使受侵略的一方反遭其害。”接着，他赶紧避开了这个话题，而大谈防卫的需要。

然而审慎和隐秘的策略具有本身的危险性。1938年，作为美国增加武器生产的计划中的一部分，罗斯福排除了障碍，为英法两国购买军火提供方便之门。他判定此事容易惹起麻烦，因此坚持要求保密。可惜的是，1939年1月末，美国生产的一架最新式轰炸机在加利福尼亚州坠毁，飞机残骸中发现了一具法国官员尸体，他是前来检验美国武器装备的。这样，

外国采购武器的整个内情迅速传开了，这对于总统来说，处境十分难堪。孤立主义分子大声喧哗，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进行调整。为了平息风波，罗斯福邀请参议员们来进行长时间的谈话。他坚决要求保密，但事后却传出谣言说，总统认为美国的边疆“是在莱茵河畔”。对此，孤立主义分子再一次表示强烈反对，而总统本人也是怒不可遏。他指责这样的报道是别有用心谎言，并说只有傻瓜才会说出这样的话来。

审慎行事并未收到预期的效果。接着，在1939年3月，欧洲事态又一次发生激剧的变化。

风云骤起

希特勒采取外交、威吓、侵略三管齐下的手段于3月15日攻下捷克斯洛伐克仅剩的一个邦——斯洛伐克，把它置于德国的“保护”之下。匈牙利捡起元首扔给它的一块骨头，一口吞下了卢森尼亚。事实似乎是，独裁者和军国主义者所到之处，无往而不胜。同时日本对斯普拉特利群岛提出了包括马尼拉西南的大片区域在内的领土要求。德国部队占领了梅梅尔。3月末，佛朗哥粉碎了共和政府的抵抗，攻占了马德里。多天以后，墨索里尼占领了阿尔巴尼亚。3月初，斯大林发表的声明，虽说不比侵略行为更为惊人，但却更具有不祥之兆：他警告西方国家不要“唆使德国人”向俄国进犯。

罗斯福神情严肃地阅读一封封电报。他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写道：他一生从未见过世界上出现这种矛盾互相交错、发展瞬息万变的局面。局势每天迅速变化，使他对眼前的事也无法找出一个明确的思绪。国务院一些官员的看法也存在分歧，他们不知希特勒下一步究竟是向东，还是向西进攻。张伯伦在得知希特勒的意向后，本来还坚持不改变他原来的路线；可是两周以后，他彻底改变了立场，宣布英国要确保波兰的独立。正是这个波兰，六个月前，它曾帮助摧毁了捷克斯洛伐克。

布拉格沦陷后，罗斯福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只不过是他的老一套外交手腕，即提出抗议和进行轻微的谴责。他批准了韦尔斯针对“无法无天的行径”所发表的抗议声明，并考虑对德国进口商品实行抵消关税然后罗斯福又间接地试探墨索里尼，警告他希特勒野心勃勃，探问这位法西斯领袖是否愿意采取主动，争取和平。但几天以后，墨索里尼悍然入侵阿尔巴尼亚，对罗斯福的试探不啻断然拒绝。在这以后的一段时间，局势稍呈平缓，总统连续几小时谈论瞬息万变的形势。对有些问题，他是心中有数。布拉格的命运足以证明，希特勒的目标不只是想使德国人团聚。安抚

政策是一个失败。虽然张伯伦的立场现在变得强硬了，战争的可能性因而也就增加了。但是一旦英法两国一败涂地，希特勒很可能施展军事与经济威慑双管齐下的战略，进而攻占拉丁美洲国家。

但是究竟采取什么行动呢？在所有的不愉快事件中，罗斯福感到震动最大的还是佛朗哥的上台，因为这恰好是他自己的政策导致的恶果。在他看来，禁运分明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他命令皮特曼加紧活动设法修改中立法案或予以废除。当这项议案仍在参议院的机器里慢慢讨论、拖延不决时，他决定采取另一个典型的罗斯福式的行动。

4月中旬，一个星期五的晚上，总统突然行动起来，向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发出完全相同的呼吁书。他呼吁他们把问题拿到会议桌面上来，实际上，也就是要他们暂时放下枪炮。他的这个呼吁的中心内容具有一个独特的手法——他直截了当地、毫不掩饰地问希特勒和墨索里尼，能不能答应不进攻三十一个国家，并将这些国家的名字一一列举出来。呼吁书的结尾把决定人类命运的责任寄托在大国首脑的身上。第二天，他对记者作解释时，一再强调——为了不使“国会山上我们的某些朋友”产生误解——呼吁书决没有背离他的“不卷入纠葛、不承担义务”政策。他说，他答应扮演的角色不是调停人，而是中间人，其作用就如邮政局、电报局一样。

1939年的春天是回光返照，罗斯福的呼吁象一缕带来希望的灿烂阳光。民主国家的政府和人民感到欢欣鼓舞；莫斯科也表示赞赏。但轴心国的领袖们却对之嗤之以鼻。当时正在访问墨索里尼的戈林嘲笑呼吁书的作者患有初期脑癫狂症；墨索里尼则讽刺说他更可能是蔓延性的麻痹。

但有力的反驳却来自希特勒。他在国会，为他的政策作了长时间的辩护后，对罗斯福的呼吁逐句地加以反驳，并使用了美国孤立主义分子的各种论证。关于三十一个国家的问题，希特勒说他已问过每个被点名的国家，它们是否感到德国侵略的威胁，它们都表示没有。希特勒的发言引起听众的一片喝彩声。他把自己和德国都打扮成为牺牲者，极尽渲染蛊惑之能事。

“罗斯福先生！”希特勒叫嚣说，“我完全理解：你仗着你们国家幅员广大，财力雄厚，自以为你对全世界的历史承担责任。……而我，亲爱的先生，却处身在一个比你的国家要小得多、也弱得多的地方。……”

尽管这篇冗长的讲话实质上只是一连串的反唇相讥，但希特勒使用反嘲的手法极为高明，讥刺美国在国际问题上无所作为的窘态又正中要害，因此很投合德国国内外舆论的心意。他只就他的对手的论点进行回击，而不回答有关他未来侵略意图这个核心问题（也许他是有意仿效罗斯福的做

法，因为罗斯福 1936 年在麦迪逊广场公园，为答复兰登的质问而发表的竞选演说中，也是采用这种以攻为守、避开主要问题的手法)。从当时效果看来，希特勒占了上风了；于是孤立主义分子大为得意；比如纳埃就讽刺说他是自讨没趣。总统对独裁者的无礼当然感到愤怒，但暂时也只有保持沉默。

现在只有一件武器可以使用了这就是希特勒提到的那种力量即美国的雄厚财力。罗斯福再一次为废除或者修改中立法案中关于武器禁运的条款而进行斗争。这个条款现在已引起民愤，因为一旦发生战争，它会强制总统对所有国家不管侵略者还是被侵略者一概不提供武器。

这一斗争仍然进行得很不顺利。从 1 月份以来，总统在议案问题上一直严格地遵守不干涉政策，放弃公开领导，也不施加私人影响。赫尔本人也不敢到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上作证。因此，许多事情只得依赖该委员会主席皮特曼；但这个内华州人却不胜任此任务；他对中立法案的重视，不如他对与他的选民有关的白银价格问题的关注；而委员会里的一些孤立主义分子如博拉、约翰逊、拉福莱特、登堡等人都是难以对付的。他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

在参院内受到了挫折，政府就只得转向众院。这一次，总统终于亲自出面了。他悄悄告诉众院领袖们说，取消禁运也许可以阻止欧洲爆发战争；而一旦爆发战争的话，取消禁运也会使轴心国取胜的可能性变小。他认为轴心国有二分之一取胜的可能性，对由此而带给美国的种种影响，他描绘出一幅黯淡的图画。

这些都徒劳无功。众院通过了一个新的提案，但保留了禁运条款的实质内容。罗斯福感到震惊，他考虑抛开法案，自我行事，但又不敢太过冒然。欧洲战云密布，罗斯福把参院领袖们召集到白宫来再次谈判。他把自己长期为争取和平而进行的斗争向他们作了总结后说：“我已放了我的最后一枪了。但我认为我的弹带上应该还有一发子弹。”他重申战争的可能性极大，美国必须趁早投入它的物质力量，否则时局将无法挽回。赫尔发言时，言词甚至比总统更为加重。

参议员们只穿衬衫，手里拿着饮料，舒舒服服地围坐在总统的书房里。最后博拉发言了。所有的人都把注意力转向这个有着一颗雄狮般的脑袋的老牌孤立主义分子。

他说这一年决不会发生任何战争，所有这些战争危险都是制造出来的是人为的。

赫尔这时表示他希望博拉能到他的办公室来读一下电报。博拉挥手不让赫尔说下去。他说他在欧洲有情报来源，他认为它们比国务院的消息更可靠。

赫尔听了这话真是欲哭无泪。罗斯福把身子靠到沙发上，保持沉默。过一会，加纳逐个询问是否有足够的票数，以便将废除禁运的提案提交参院会议讨论。最后，他转向总充：

“那么，船长，我们只好直面现实了。你没有足够的票数；事实也只是这样。”

实际上，也只好这样了。罗斯福仍然彬彬有礼，但他坚持参议员们必须承担责任，会议结束了。国会在8月初体会，禁运条款一字未动。

在这几个星期里，罗斯福一直处于困境，国会一面阻碍他在国际上的努力，一面限制他在国内的新政措施。但6月间英王偕王后前来访问美国却是一个令以鼓舞的插曲。对这次来访，总统事无巨细，均亲自过问。他亲自安排接待事宜，仔细而又热情，不亚于百老汇的一名导演。英王夫妇仪态端庄，彬彬有礼，王后举止优雅，神情庄重，令人拜倒，国王年轻英俊，热情恳切。各项欢迎仪式安排得十分完美，华盛顿五十万市民冒着盛夏酷暑欢迎英国王室；教养有素的英王在会见南卡罗来纳州的老资格的参议员史密斯时，甚至没有忘记问他是不是科顿·埃德·史密斯；白宫举行了国宴，席间总统发表了意味深长的祝酒词，凯特·史密斯和玛丽安·安德森演唱了歌曲，使宴会达到了高潮；英王夫妇照例去阿林顿公墓献花圈，驾车穿过纽约市夹道欢迎的群众前去参观世界博览会；贵宾参加了海德公园举行的野餐，品尝了红肠面包、烤豆、草莓脆饼；美国总统和英国国王举行会谈直到凌晨1点半钟，罗斯福轻拍英王的腿说：“年轻人，是该睡觉的时候了！”；最后则是海德公园车站上的告别仪式；当火车开动时，欢送的人群一起高唱起“往昔的时光”这首古老的苏格兰民歌；总统对着离去的车厢祝他们一路平安！万事如意！

不过，这次宏伟壮丽的接待仪式，在一个剑拔弩张、战云密布的世界里，也不过是一个短暂的欢乐插曲而已。实际上，就在此时此刻，战争已经来临了。这是一场神奇的战争：它包含军事威胁和讹诈，故意撒谎和中伤，制造紧张空气和挑拨煽动，新闻封锁和实物交易强权外交和货币暴贬，大嚷大叫的宣传攻势，群众集会，口号标语，游行示威，广播电台声嘶力竭的叫嚣。在这一片混乱的迷雾中，张伯伦和达拉第举棋不定，正在摸索一条出路。他们想联合斯大林共同对付希特勒，但又不敢支付斯大林

索要的代价。而波兰由于过分相信自己的军事力量，也不想和斯大林联合。然而，希特勒却直奔目标，波兰就是下一个进攻的目标。他愿意先让斯大林在东欧享有权势，因为他已盘算好以后再收回承诺。他一味搪塞心存怀疑的墨索里尼，向他保证说，英法两国决不会援助波兰，即便援助，也帮不了大忙，而且为时已晚。1939年8月24日，俄国人和德国人已签订了条约，斯大林向希特勒祝酒。至此，德国元首所谓的“巨大的政治序幕”已拉开了。一切都已安排妥当了。

1939年8月，华盛顿天气闷热窒人。罗斯福收到关于纳粹取得成功的全部报告。但在这个外交棋盘上，他却束手无策。当他获悉俄德两国已签署合约，而德国即将进攻波兰的恶耗后，他向希特勒发出一个最后的、几乎绝望的呼吁。他告诉德国元首说：波兰已接受了他进行调停的请求。“全世界都祈望德国也会接受这个请求。”

但希特勒的答复七天以后才到达。

1939年9月1日凌晨3时差10分，总统床边的电话铃响了，他立刻惊醒过来。

比尔·布利特告诉他，他刚接到托尼·比德尔从华沙打来的电话。比德尔说德军的几个师已经深入波兰领土，战斗非常激烈。并且根据已得到消息，说华沙上空已出现了敌机。接着他的电话被掐断了。

布利特又说了几句就把电话挂了。罗斯福接着打电话通知赫尔、韦尔斯和其他人。不久，这些人驾车穿过黑暗、空荡的街道，纷纷奔向他们的办公室。韦尔斯、赫尔和伯利听了一会希特勒对德国国会发表的讲话。希特勒宣布对波兰的进攻已经开始，并说要以暴制暴。他们也毫无办法。伯利说：不能再眼睁睁地看着欧洲遭到毁灭了。

在白宫，罗斯福又睡着了，直到6时半，布利特又打来电话说， he 已和达拉第谈过话，后者表示法国将派兵支援波兰。罗斯福一向神经坚强，之后又接着睡了几分钟，接着，肯尼迪大使从伦敦打来电话，报告英国也将参战。罗斯福此时完全清醒了，过了一会，韦尔斯和总统的秘书们都来到他的床前，等待命令。

总统开始把他长期准备就绪的应变计划付诸行动。这时他的思绪不断地把他带到二十年前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当时他床边的一个电话给他传来了海上最新进展的新闻。眼前这种危机情景对他似乎并不陌生，倒象是重新捡起一件打断了的例行公事。欧洲的政治家们也感觉象是重温1914年危机时期的噩梦。张伯伦悔之晚矣，向希特勒发出最后通牒，要求撤军。

9月3日（星期日）早晨，一群纳粹头目正聚集在柏林总理府内大厅，突然一名译员从人群挤过去，直接走进希特勒的书房，口译了最后通牒。当翻译完毕，希特勒缄默不语，好一会儿呆坐不动，然后，冲着一直强调英国不会作战的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恶声质问：现在怎么办，在外面大厅里，戈林回答说：如果祖国打输了这一仗，那么，求上帝保佑德国吧。

那晚，总统对他所谓的“整个的美国”发表了演说。他一开始就声明，直到那天清晨，他还一直幻想奇迹的出现，可以阻止战争爆发和制止对波兰的侵略。

你们必须在一开始就接受住国际间外交关系中存在的一个简单但却不更改的事实。只要世界任何一个地方的和平遭到了破坏，那么，世界所有国家的和平也就处于威胁之中。

我们大家都可以耸耸肩，轻松地说：发生冲突的地方距离我们美国大陆，距离我们整个美洲西半球有几千英里之遥，对我们美洲国家没有严重影响，美国所能做的就是不理不睬而是去照料好自己的事情。尽管我们热切地希望置身于纷争之外，但现实却迫使我们认识到：通过广播传来的每句话，在海上航行的每艘船，正在发生的每次战斗，都与美国的前途息息相关。……

我们的国家可以保持中立国地位，但我不能要求每个美国人在感情上也保持中立。甚至一个中立者也应该认清事实，甚至对于一个中立者，我们也不能要求他不违背良心。

我不止一次地说过：我经历过战争，我痛恨战争。这话我还要一次又一次说下去。……

总统表示我一定尽我所能不让和平在美国遭到扼杀。

在这以后的几天，德国部队和坦克更深入波兰的腹地，德国潜艇出没于世界的各个航道，而总统仔细地考虑了中立问题。战争爆发前不久，他曾以为，一旦战争发生，他就可以命令海关税务人员扣留德国船只；但司法部长竟声称这样一种行为一定会被解释为战争行动。当时以种种借口使停泊于纽约港的德国巨轮“不来梅号”推迟起航，几乎使它未能返回德国，这个事件确让总统感到满意。他还努力地推迟发表按中立法案规定必须发表的公告，以便利英法两国还有间隙购买军火。但这些都是无足轻重的行动。关键问题仍是废除禁运条款本身。总统把这个问题列为他在1939年秋天的主要任务。

他已下了赌注。措词文雅但流露出痛苦心情的呼吁书，源源不断地从

参战的民主国家寄来，请求美国提供物资援助，否则很难取胜，总统迅速采取行动。他召开了一次特别会议，要求国会废止禁运条款。他批评 1935 年的中立法案背离了美国传统的中立政策的。他表示对此很遗憾，国会竟然通过了那个法案；而他居然签署了那个法案，这同样使他感到遗憾。他告诫任何一个集团都不得擅用和平集团这个独一无二的名称。他说因为大家全都属于这个集团。

尽管这些话很率直，但罗斯福的行动却十分谨慎。在他提出废除中立法案的要求时，他强调通过不卷入纷争的手段来实现和平，而对他的主要目的是支持民主国家反抗侵略者避口不谈。他对国会施加一切可能的影响却又小心谨慎。他要求阁员和友好的国会议员们拉票。由于安排官职而造成的不满已设法予以消释。他把皮特曼及其一伙白银大亨收买过来，答应提高国内市场的白银价格。他还争取兰登和诺克斯的支持，是通过那些和上述二人有来往并与白宫比较接近的报界人物。他还要求州长和市长们给予赞助。一大批显著的商界人士也是他收买的对象。操纵媒体的大量工作则交给一些私人团体，特别是依靠威廉·艾伦·怀特的“修改中立法以争取和平的无党派委员会”。白宫暗地里和这些团体取得合作，而决不公开地去领导一场废除中立法运动。

“我简直是在鸡蛋上走路！”总统写信给加拿大总督特威兹穆尔勋爵时说，并恳请他把访美计划推迟到中立法斗争结束以后。他表示眼前他是什么不说，什么不看，什么也不听。他甚至取消了他本来要对民主党女党员所作的演讲；他中断一切其他事物，为废除中立法的斗争努力。关于参院内的斗争形势，他每天，有时每小时，都迅速收到报告。

国会山上，参议员们又在找麻烦了。孤立主义分子又重复他们的陈词烂调：不要理睬“欧洲那些好战分子”，不要卷入推行强权政治者的狡猾把戏，等等。但有一点他们却不幸言中，他们指出当时情况和 1917 年的参战有重大的相似：当时不是引起战争吗？美国总统不是偏袒了一方吗？暗地里不是承担了责任吗？为了偏袒一方，不是制造了种种口实吗？主张废除中立法的一派，对总统的意图了熟于胸，强调废除中立法的立足点正是为了不让美国陷入战争，并强调新的法案要求购买国付货款，用自己的船只运走。

立法者在相当大的压力下展开了争辩。北达科他州的一名国会议员写信给总统时表示可以完全相信他会投票支持撤销禁运条款。但十一天后，他却捎来一张口气悲观的条子，说他并未改变初衷，无奈来自家乡的请愿

书、信件、决议以及电报给他的压力太大，因此他不得不投票支持禁运了。这个议员又说担任一名众议员，已不再具有他初来时那样巨大的吸引力了。

最后，在德国侵占波兰一个月以后，即那年的10月底，参院以63对30票通过了取消禁运一案，立法措词中有不少妥协与含混之处。众院几天后也照样予以通过。尽管表面上谈什么非党派性质，但表决仍然遵循党派路线。

这时发生了一件比中立法更为影响深远的事——至少从长期来看是如此——总统10月间和一位名叫亚历山大·萨克斯的科学家举行了一次会谈。两个月前艾伯特·爱因斯坦曾写信给罗斯福，谈到有可能发展一种具有令人难以置信的巨大威力新炸弹；萨克斯这次来谈的就是关于核裂变这一领域里最近的发展情况，使人感到惊恐的是纳粹德国在这方面也取得了进展。最初罗斯福似乎不以为然，因此没有注意谛听，因为一切看来十分遥远，并且还处在理论阶段，但一旦领会到问题的全部重大内涵，他就立刻行动起来了。机器立即开始运转，未来的曼哈顿计划也就在之后的六个月中奠定了基础。由于罗斯福继续愿意为不可测的未来发展，冒险投下几十亿美元，这个计划一直持续进行，直到原子弹在广岛上空爆炸而达到了举世震惊的高潮。

但在1939年的秋天，这一切看来尚属遥远的将来。“在华盛顿这里，白宫是非常宁静的，”总统写信给肯尼迪说，“普遍的感觉静观其变，等着明天将会带来什么发展。”

作为政治领袖的罗斯福

早在1939年2月间，总统的一个朋友转给总统一封别人写给他本人的信。那人长期以来一直是支持政府的。但他的这封信表示不能理解罗斯福为什么如此谨慎，这表达了千千万万的美国人的心情，信的字里行间充满失望和愤慨：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崇拜的偶像FDR^①不要再躲躲闪闪，应当通过广播，向他的人民说几句实在话呢？我们的第一道防线是马奇诺防线。这是当然的，人人知道，我们不能坐视英法两国挨打。当然，我们应该准备支援他们——先支援它们军火，如果用军火来支援还不够的话，则拿出

^① FDR，罗斯福英文名字的缩写。

我们所有一切来支援。

为什么尽说空话不见行动呢？为什么要容忍那些躲进骑墙的参议员欺骗美国公众，使他们相信美国可以躲进另一次战争呢？为什么不向美国人民展现无情的现实以免悔之晚矣呢？我们大家都彻底了解：只要德国元首和意大利领袖相信我们将要参战——盖洛普民意测验也表明人民是要求参战的——那就根本不会发生战争。……

“别胡说什么为民主、为严格的中立创造和平的世界吧。更令人信服的现实却是：为了保全我们自己，我们最后必须遏制那些穷国采用武力或武力威胁去掠夺富国的无耻行为。……”

但是这封信中流露出来的全部激情并没有使总统有所感动。他告诉厄尔利说。对他非常感谢，他让厄尔利转告他非常高兴读到此人的信，而且刚好在他准备动身去海上巡游以前。……事情就这样了结了。其他人——甚至其他国家元首——都曾要求他出来带头反对侵略，他也不为所动。

相反地，总统的举措几乎是“谨慎”一词的反例。1939年初，他在取消禁运的斗争中曾一度显然是要急流勇退，他甚而叫皮特曼否认政府曾经插手他的提案。在另外的一些事情上，罗斯福完全采取回避态度。1939年1月，国会正在考虑关于改善关岛港口的建议。下面是当时一次记者招待会上的对话：

记者：“你对拨出五百万美元来加固关岛防御工程一事是赞成还是不赞成？”

罗斯福：“拨款五百万美元加固关岛防御工程，有这么一件事吗？”

记者：“这是我个人的理解。”

罗斯福：“‘加深港底’。”

记者：“我想你已明白我的意思了。……”（笑声）

记者：“为了不至于出现混乱，你能阐明一下你在关岛问题上的立场吗？”

罗斯福：“我不认为存在什么混乱。”

记者：“你赞成了？”

罗斯福：“不，我没有。”

经过更长时间的谈话后，总统说，有一项疏浚关岛海港的建议，他表示同意的。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自从1933年以来，罗斯福的名字一直是胸

襟坦荡、临危不惧的象征；而现在正值举国面临空前未有的最严重的国际局势时，他个人的领导魄力又到哪里去了呢？

当一个领袖不再符合他在人们心目中原来占据的象征性位置时，他的膜拜者总是迷恋着他的形象，而把种种错误推到他的一些顾问身上。1939年流传着这样的说法，认为罗斯福的麻烦其实是由于赫尔胆小怕事和肯尼迪信奉绥靖政策。这些猜测并不符合事实。不错，赫尔行动不够迅速果断，但他起来反对禁运法，却先于罗斯福表明立场；他把现存的立法称作是替代国际法确定原则的“一个断了尾巴、四肢不全的、可怜的”代替品。与这类话相比，罗斯福的话就显得温和得多了。至于肯尼迪，罗斯福是知道他同情张伯伦的绥靖政策和所谓的“克莱夫登派”，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因此而器重他。但罗斯福对他的这位大使却管得很严；当肯尼迪将他要到伦敦发表的一篇谈话稿送审时，总统和赫尔逐字逐句地加以推敲，力求使其措词与政府的既定政策相一致。

总统有他自己的策略。对他的谨慎态度存在另一种说法，认为这是由于遭到国会和人民的反对。一个国际间的或集体的安全纲领遭到了反对，这个问题当然不能轻易地置之不理。1937年曾就美国是否应当参加另一次世界大战的问题举行了一次民意测验，结果每二十人中有十九人明确表示反对。大部分的人都宁愿相信，国会会使美国避免卷入战争，而总统没有得到信任。“和平”与“中立”两个象征对他们具有强烈的吸引力，而他们往往把二者等同起来。当然，这些态度都或多或少缺乏稳定性和持久性，但它们却十分强烈。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后期是下件事件出现的一个时期：著名女飞行员劳拉·英戈尔斯从飞机上向白宫撒下“和平”传单；库格林神父和约翰·L·刘易斯大肆煽动孤立主义情绪；对某些人来说，法西斯主义就是“未来的潮流”。对二十年前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浩劫及其恶果的痛苦记忆，给人们的心上留下了隐隐作痛的硬伤疤。

不尊重人民的这种感情而企图一意孤行，显然是要酿成大错的。作为一个政治领袖，他的真正使命，就是要引导民意朝着接近他所认为的美国利益所在的方向前进。然而，一提起这个问题，势必又要接触到罗斯福领导艺术内在的矛盾本质。

因为，在国外令人震惊的事件的冲击下，人们的态度也慢慢地起着变化。大部分的美国人当然还是坚守着他们“不卷入战争”的立场。但从慕尼黑会议到战争爆发这段时期，很大一部分人都转向全力支援英法两国但自己不参战的立场。到1939年9月，约有百分之三十七的人民赞成积极

支援英国、法国和波兰；其中不到半数的人主张立刻或以后任何时候提供军事援助，而多数人则认为应只援助粮食和物资。这百分之三十七的主张干预的人面对着一个顽固的孤立主义集团，他们根本反对给双方任何援助。介于这两者之间的大约有百分之三十左右，他们主张，除非按现购自运的原则，否则美国应拒绝向任何一方出售武器。

正是这个人数众多的中间集团给总统提供了绝好的机会。因为，这批人一方面坚持要保住不介入的立场，另一方面又深知遭受袭击的国家需要美国的援助。这批人和主张干预的人联合起来，凝成一股很大的势力，对罗斯福关于不参战但要全力支援的政策给予了强大的支持。但这几百万的中间派是否可能认为，1939年实施的现购自运办法，并不意味着对交战国任何一方提供物质援助呢？不存在这种想法。以后的一次民意测验表明，有百分之九十的人赞成现购自运的办法，即使实际上只有英法两国得到了供给。毋庸置疑，这些中间派的态度也是混淆不清和左右摇摆的。但这一情况却给一个真正的领袖人物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因为这种肤浅的、游离不定的民意是最容易被改变的，正如 A·N·怀特黑德所说，某种局面对于拿破仑来说是个机会，而对于我们大多数人，则造成了无法控制的混乱。

罗斯福相信事件和现实本身会教育公众。他们确实受到了教育——但却不够迅速及时。每当侵略行动和美国舆论两者展开竞赛时，前者总占到了上风。1939年最初几个月是最大的考验。罗斯福的最大希望是他能对希特勒表明：对于纳粹准备进攻的那些国家，美国将给予物质援助。总统的策略是以一个周详的设想作基础的：如果要使美国不被拖入战争，万全之策就是把战争排除在世界之外。但他没有把舆论引导到他的那个“不参战但要全力支援”的立场上来，而是顺从舆论，随波逐流。事实上，有时——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他的那篇所谓“隔离”演说和以后的所谓“美国边疆延伸到莱茵河畔”的说法所引起的轩然大波都使他震惊——当舆论极力主张美国应承担更多的义务、为抗击侵略作出共同努力的时候，罗斯福却跟在舆论后面踟躇不前。

罗斯福眼前的问题当然不是一般的孤立主义情绪，而是盘踞在国会里的那个庞大的孤立主义集团。毫无疑问，他担心一项重大的议案一旦在国会山遭到了挫败，那么他想援助民主国家的希望也就永远破灭；国外的美国朋友一旦丧失信心，则绥靖气氛更会滋生蔓延。如果这就是罗斯福对付国会的策略，那么，1939年春天废除禁运条款的结局本身已表明他的策略失败了。也许，如果他反对禁运的立场表明得更早而且更公开和更连贯的

话，他完全可能在 1939 年春赢得那场斗争。而事实上，他只是在觉得他有把握取得国会中多数人的支持的时候，才发出战斗的号角，从而导致了那年 10 月对禁运条款的废除。这一次又是时势完成了教育公众的工作，失去的太晚了——而这一次时机又悲惨地失去的太晚了。

任何领袖都不能完全一意孤行。即使希特勒，也得对付他手下一批军人对他的抱怨和拆台；甚至斯大林也要和落后的农民以及党内与他争权的对手进行斗争。罗斯福的处境则显得更加困难，他是驾驶国家这只航船的船长，但许多水手争着要去掌舵，把帆的海员又各怀异心。这样的航船当然只能迂回曲折地绕过暗礁险滩，紧贴海岸缓缓前进，以便风暴骤起时可以安全地驶入港内。对一个伟大的政治领袖才能的考验，不在于他能否坚持自己的主张；而是首先在于他是否能够最大限度地利用他手头现有的资源，其次还在于他是否能创造新的材料来帮助他满足他的目的需要。

1939 年底，罗斯福已临近第二届任期的最后一年。这正是考验他是否具备上述两种领导才能的时候。他的目标的轮廓大体上一直是很鲜明的：即国家安全，人民富裕。但截至 1939 年底，这个目标还很遥远。经济情况从衰退那几年以来，尽管有所改善，但也只是恢复到三十年代中期那种动荡不安的水平，何况失业者还有几百万。总统又比大部分美国人看得更清楚：他们的国家面临严重的危险。

国家这只航船尚未抵岸，但也没有搁浅。那么，这位船长又是如何行使其职责的呢？

不可否认，那些暗礁和浅滩是很可怕的。企图另觅航线——即为新目标制订出一个自由化的纲领——安全抵达彼岸的任何尝试所遇到的直接障碍是，美国不存在一种前后一致的自由化传统；想要制订长远的经济规划所遇到的直接障碍是，人们对经济问题的知识有限。为了促使上下一心全力以赴去争取和平，反对侵略而需要建立一个前后一致的外交政策，却又遇到了在多数美国人的强烈的孤立主义情绪的抵触。达到这些目的所需的政治与行政手段，也同样难以创造出来；要想建立一个更强大的“总统党”来支持新政，却又和现存的政党制度下联邦性与派系性的组织结构发生了冲突。要想在国会中建立一个制订新政策的普通党员集团而作的任何努力，又被在国会里占有重要地位的老顽固派所粉碎。甚至要想建立一个更团结一致的行政部门而作的尝试也遇到了美国政治制度的离心倾向，以及公众对行政权力普遍存在的恐惧心理所造成的障碍。

但在这些宣告失败的战斗中，究竟哪些才是创造性的领导才能呢？我

们是否能说，罗斯福曾经做了努力却失败了呢？究竟是运气不佳，还是船员离心离德，或是船太破旧，以致他不能达到彼岸？或者说是因为他个人的过错？

仅以玩弄权术为本事的政客和具有创造性领导才能的政治家这二者之间，存在着一个重要的区别；前者承认既定的政治条件，然后制订出最能适应现存条件的活动内容和一套方针政策；后者则有意识地企图改变他所活动的政治环境，以便更好地领导人民朝他所要求的方向前进。前者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进行活动；后者则凭借自身的政治才干，加上坚韧不拔的毅力和信念，扩大他的活动天地。他所追逐的不仅是赢得选票，更主要的是有意识地去改变各种基本的政治力量，如舆论、党的权力、利益集团的压力、政治制度，等等。

曾经是一个时期——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在 1935 年——罗斯福以极其高明的手腕，利用一切有利时机，将他的新政目标变为法律。同时也有这样的时期——给人印象深刻的是在同最高法院较量的时期——他一再试探并发现他的权力所受到的外界限制。但有时他根本不作任何努力——特别是他在国会取得永久影响的时候；有时他所作的努力太少，而且也太晚；有时——如在实现党的巩固和改组以及经济纲领等任务中——他显得似乎缺少为完成任务所需的才智。

在他的第二届任期内，罗斯福好象已忘记他在 1933 年发表的那篇就职演说所总结的重大教训：果敢的决断足以改变某一形势的政治格局。那篇演说仅仅是一篇演说，而是一个有力的行动，其影响所及，曾掀起一股支持新政府的浪潮。一个领袖应当运用的一个最重要的工具乃是他本人——他本人的个性及其对其他人的影响。当群众的舆论被含糊地引向领袖所代表的方向，但还缺乏深度和真实的感情的时候，领袖和具体行动可以左右舆论，使之对自己有利。领袖是在各种政治势力处于均衡状态下开展活动的，而他的行动则可以整个平稳局面得以改变。当然，在 1937 年以后，仅有演讲已经不够了，因为危机感已经消失，民众的态度已经变得冷漠。但 1933 年的就职演说毕竟不失为一个标志，表明罗斯福一旦采取了果敢肯定的立场，其作为领袖的影响是不容低估的。

罗斯福未能建成一个推行新政的自由主义联盟和一个新的政党，这一点更是一个明显的例证。因为，当时材料都已具备，只待他进行正确的调整和塑造。当然，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大部分美国人作为一种无形的力量，是不支持按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这两条路线去重新组织政党的；

但 1938 年当罗斯福以总统的名义提出建议，要求抛弃旧的政党界线，并要求各个党派的自由主义者联合起来，支持自由主义的国会议员候选人时，赞同这个建议的人比反对的人增加了一倍。这里缺少的关键环节乃是罗斯福没有建立长期性的和有效的组织，以便为重新组织政党争取更有力的支持。尽管那次清洗失败了，但它却显示出北部及边疆各州重新建党的工作存在巨大的潜力。

在外交政策方面，罗斯福在公众舆论可能发生转变的关键时刻，没有给予人民所需要的指引。最明显的例子是在 1935 年和 1936 年，当时人民对于战争的恐惧本可加以引导，以利于他制订国际主义政策，而不是采取孤立主义政策。他对国外形势获得较多情报，对外交政策也更理解，但他却没有加以利用，以指导公众的看法。

的确，罗斯福在让人吃惊的程度上，受到他周围政治势力的摆布，而不是由他来主宰这些政治势力。在一个民主国家，势必发生这种情况。但民主体制也给富有创造性的政治领导提供了用武之地。制肘罗斯福手脚的势力，既是那种无法驾驭的政治环境，也源于他本人的行动和个性。他不能改造他的党，不能调整对外政策的态度，不能重行组织国会或官僚机构，而且也无法解决经济问题，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在使目的与手段如何很好的结合起来的问题上缺乏应有的献身精神。

罗斯福是否具有创造性的领导才能，是否在他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愿意改变他的政治处境——即他身上担负的种种压力，关于这些，一些与他最接近的顾问提供了考验。他的智囊团罗致了形形色色的人物，既有保守派，也有自由派，既有孤立主义者，也有国际主义者，在他第一届任期内，这些人协助他调和和对立的政策和思想。但是，即使这些个人随时进出，不断更替，这个智囊团在罗斯福负责民主党领导工作的后期，却仍然是一个混乱、分裂的集团；而当时，罗斯福在行动纲领方面所需要给予的指导必须更直接、更明确地针对着国内扩大了的新政的目标和在国外采取的更坚定的行动。他没有逼迫他的顾问们为他的新的需要服务，相反的地却让他们过分地限制了他自己的目的。他害怕对任何一个顾问或派别作出许诺，结果附属却过分地卷入所有这些派别的分裂中去。

罗斯福在一定意义上既受制于他的政治处境，同时又屈从于他自身。他的各派势力之间进行斡旋，而不愿重新加以组织；他以折中调和的态度去对付周围所有的人；他极力平衡了各集团之间、领袖之间的角逐和争斗，他出色地而又兴致勃勃地采用临时应付的手段。他厌恶空洞的理论，

对人们及其思想抱着难以满足的好奇心，对他周围势力的消长反应十分灵敏，所有这些习惯对罗斯福都起了阻碍作用。他缺少一个伟大的领导者应该具备的那种炽烈的、几乎是狂热的信念。

罗斯福与其说是一个伟大的富于创造性的领袖，倒不如说是一个精于处理事务的能手，一个卓越的理解国内外事务的行家。让他置身于一个重大的、具有决定意义的事件中——如国内的不景气，国外上演的赤裸裸的侵略——他可以一针见血地指出其问题所在，并把其含义解释给美国人民。但是，当危机不是那么触目惊心，但却也严重的时候，当解决危机需要理智上的领会和统一与持续的战略行动的时候，罗斯福只好宣布前功尽弃，一无所获，如对最高法院的改革、清洗、倾全国之力支持集体安全等活动，都是具体的例子。他一贯是一个出色的策略家，有时堪称一个有魄力的领袖；但他未能把策略技巧和战略部署二者结合起来，而这正是政治领导的最高本领。

不过最后，总统还要考虑他最后必须加以权衡的另一个重要因素，这就是 1940 年的大选。在即将到来的那个与他命运有关的、动荡不安的一年中，他的整个过去和整个未来都将经受考验。

第五卷 越过陷阱

第二十章 无声的斗争

1939年，圣诞节的前夜。罗斯福没有戴帽子，在薄暮的寒气中，站在华盛顿公共圣诞树旁的木制讲台上。几千名群众伸着脖子，希望看一眼总统那张宽大红润的脸。总统的讲话显得很严肃：“当前许多国家正处于战争和痛苦之中，我们在仍能享受和平的一些国家中，不要将这种和平生活只归功于我们的好运。相反，我们应该祈祷，让上帝赐予我们为他人而生活的力量——让我们的生活更接近‘登山训诫’的箴言。……”

远处印出灯火辉煌的白宫轮廓。窗上悬挂着色彩鲜艳的冬青花环。在灯光灿烂的东厅，矗立着一棵瑰丽的圣诞树，树枝上缀着白色和银色的饰物。厨房里的野味架上悬挂着野鸡、鹌鹑、鸭、松鸡、山鹑。数以万计的圣诞贺卡，成千的节日贺礼送到白宫，忙得仆役和职员们马不停蹄来。这些礼物都是全国人民送给总统的，其中有果饼、书、舰只模型、小摆设、甚至一只小雄鹿。

楼上团聚着罗斯福家族的四代人，闹闹哄哄，济济一堂。这几天他们从各地赶到这里，年纪最大的是从海德公园赶来的八十五岁莎拉，最小的是总统新添的刚满八个月的孙子。在总统亲自监督装饰的家庭圣诞树周围，堆满了各式各样的礼物，漫过腰际。就在这棵圣诞树旁，总统按照自己最重视的习惯，朗读狄更斯的《圣诞颂歌》。他一边朗读，一边扮演老吝啬鬼司克鲁奇和鬼怪的样子，连最小的孩子都看得入了迷。然后，全家上下都到总统卧室，把自己带来的红袜子挂在壁炉上。当孩子们道了晚安，和“爷爷”吻别后，总统把礼物塞进每只袜子里，其中有牙刷、指甲锉刀和彩纸包装的肥皂。

翌日清晨，孩子们一窝蜂闯入总统的卧室，争先恐后地去抢他们的袜子。这时候，罗斯福坐在床上，怀里躺着他的小孙子。满屋荡漾着孩子们欢乐的叫声，到处都是圣诞节包装纸。然后，他又帮助把家庭圣诞树周围堆积如山的礼品分给大家。在圣诞宴席上，他熟练地切着一只肥大的火鸡，主持有四十人参加的晚会。

次日降雪了。在圣诞节刚刚过去、新年即将到来的短暂期间，白宫仿佛覆盖在一床柔软的白毯下面，显得格外安静。它象征着一个和平的美

国。而几千英里之外，法国大兵正向着无人地带内那些遭炮火袭击的村庄展开小规模突击。德国坦克司令官们正眯着眼睛，透过瞄准器找寻目标。英国轰炸机手正俯瞰着他们投掷的炸弹划出长长的弧形，慢悠悠地往下落。但是即使在西线也是相对沉寂的——战争沉寂得以致某些美国人称之为“虚假的战争”。只有芬兰境内的战争才显得名副其实的。那个小国几周前遭到俄国的入侵，正进行着英勇的抵抗。

除夕来临。一百多万兴高采烈的男男女女，熙熙攘攘地挤满了“纽约时报广场”，他们欢呼喊叫。在白宫，总统请来了几位朋友和他安静地聚会。埃莉诺·罗斯福也在座。连日来，她参加了六次圣诞树仪式，出席了为儿童和穷人专办的一系列聚会，到教堂做礼拜，以及许许多多其他活动。即使如此，她还象往常一样精力充沛，兴趣盎然。将近午夜时分，总统的椭圆形小书房里的收音机打开了。在座的客人举着装有蛋酒的杯子，等待着。午夜钟声刚响，总统举起酒杯，用庄重的声调，一字一句地说：“为美利坚合众国干杯！”

1940年来到了。

斯芬克斯

人们一直认为1940年在美国历史上将是不平凡的一年。三年来，两党的政客们一直处心积虑，使用尔虞我诈的手段来迎接这个关键性的选举年。入秋以后，又有迹象表明，欧洲待命出动的军队和轰炸中队，将在新的一年中转入大规模行动。国外任何决定性的事件势必都会对美国产生严重的影响。

首先，1940年将要对斯芬克斯的谜作出解答：罗斯福是否会争取第三次连任？如果争取的话，他是否能获得成功？在华盛顿新闻记者俱乐部一次年会的聚餐会上，惯于用诗歌和唱词来嘲弄这位权势人物的衣冠楚楚的新闻记者们，展出了一个巨大的纸扎的斯芬克斯像，一个长长的烟嘴放在她带着微笑的嘴里。

记者们展出斯芬克斯像是有充分理由的；三年来，他们为了寻找答案用尽了种种狡诈手段。而对他们提出的问题，总统三年来也总是巧妙地加以回避，有时机智地反唇相讥，有时则是或真或假的愠怒。罗斯福不止一次使记者陷于困境，出尽洋相。但追问仍然一刻不停。在1939年最后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厄尔·戈德温使出了一个新招，他趁记者们纷纷进入会场时，兴高采烈地对总统说：

“我们祝愿你在1940年将遇到许多重大的事件！”

“不要说得这么暧昧嘛！”总统笑着回敬了一句。

“我们是从你这里学到的，总统先生，”戈德温又说。

“好啊！”总统继续笑着说，“你的话很耐听。”

总统对这件事内心深处有什么想法呢？人们对于一切蛛丝马迹，对于总统脱口而出的片言只语以及他的每一张任命名单，都要仔细加以推敲，猜度其可能的含义。到1940年，对于总统的意图所作的猜测已形成了一场全国性的猜谜游戏了。然而，大多数人的猜测都不乏武断或错误的假定，比如说罗斯福已决定再度参加竞选，或放弃竞选；他的一切行动都来源于这一不变的决定。

人们不理解他们的总统。罗斯福生性并不喜欢提前几年或甚至几个月就作出重大的政治决策，然后排除万难对这个决定加以坚持。他在大部分政治生涯中，经常的做法是给自己的行动路线留出两种选择的余地：在形势需要时，他可以舍此就彼；他掩护自己的退路，以便在突然撤退时，无后顾之忧；并且象狡猾的狐狸一样，故意使其踪迹混乱，让别人弄不清楚其真实意图。与他以往所面临的种种处境相比，这一回第三次竞选则更需要审慎地处理。

首先在于，总统对自己的愿望确实也不甚了了。到1940年座落在海德公园的粗石藏书馆和建在山顶上的“梦庐”都快要完成了，它们宛如请柬一样，经常召唤他重温海德公园的生活和撰写回忆录。特别是经过了几年焦虑忙碌的总统生涯，这些对他就显得特别有吸引力。在这一年里，他开始比以前更多地谈论达切斯县的生活及其历史等细节。除此以外，他在第二届总统任内所肩负的重担，遭到的挫折，也开始给他的健康造成严重的损害。圣诞节时期的紧张活动没有使他感到兴奋，而是疲惫不堪。1940年初，他患了一次流感，缠绵了几个星期才康复。他在晚年的倦怠之感已经开始了。

“不行，不行，丹，我真的干不了啦！”帕尔金小姐回忆起1940年初罗斯福对汽车司机工会主席托宾说过的一段话。“我得拐过这个弯去。我需要休息。我想回海德公园老家。我要去照顾我的树木。我在那里种植了大片的树木。我要让农场有收益。我得赶紧修好我那山顶上的小楼。我想写历史。不行，我真的干不了，丹。”

但事情并不那么简单。罗斯福不能不考虑逼他再度参加竞选的各种因素。他必须要争取被提名为候选人，否则一个反对新政的民主党人或者一个骑墙派就会被提名。而且，如果国际形势一旦恶化，譬如说，如果德国

看来会赢得这场战争的话，那么，他一定会接受提名。

某些人面临这样的处境，也许会心乱如麻，十分痛苦，使出浑身解数要作出决定。罗斯福却不这样行事。他所作的决定就是要保留他的决定。对他来说，待机而动有百利而无一弊。保留参加竞选的可能性，他就可以继续控制全国参与总统竞选活动的政客——他在党内的知己朋友，由他任命的高级官员，制订纲领的新政派——这些人只是在看准总统大势已去时，才会站到别人一边。他还可以轻轻松松地赢得民主党大会代表们的支持，包括那些在没有看准风向以前要支持中间势力的那些代表。他还可凭借他仅有的一点威望对国会施加影响。他可以保护他的实力地位以便与外国打交道，在国际舞台上产生重大影响。既然共和党在民主党开会前举行全国代表大会，因此他可以坐见分晓，看究竟谁是他的竞争对手。

这一切并无特别之处；历史上凡考虑竞选连任的总统，都知道伺机而动的妙处。但罗斯福能在进和退——参加竞选或不参加竞选——两种选择间，表现得如此老谋深算，得心应手，这却是他的独特之处。

当时有人指责罗斯福总统，说他以粉碎所有可能的对手的竞选机会来确保自己再度被提名为候选人。但事实正好相反。罗斯福采用了一系列既灵活而又大胆的步骤，帮助扶植了一大批可能参加总统候选提名的人。他的这种策略和他作为政治和行政领导所惯用的策略完全一致，即通过“各个击破”的办法来巩固自己的地位。现在他把这一策略运用到一个新的水平：他不但怂恿除他以外的所有候选人相互争夺，而且他还要扩大范围，以促使大批的角逐者为争取代表的选票而斗争。

罗斯福顽强地、警惕地使用这种手法。1938年春天，他私下鼓励霍普金斯参加1940年的总统竞选，在竞选策略方面给他出主意，并且说为了提高他的身价，准备任命他为商业部长。总统尽一切可能为霍普金斯建立威信，直到后者1939年身患重病才作罢。接着就在那一年，他任命前印第安纳州州长保罗·V·麦克纳特为新成立的联邦安全局局长。总统对这位仪表堂堂、满头白发的印第安纳州人的志愿十分赞赏，竟使麦克纳特最后觉得“其中大有文章”。在1939年和1940年初，罗斯福曾几次向赫尔表示——但又没有作出绝对承诺——希望赫尔当他的接班人。他在1940年初还对巴克利说，“白宫这里有人”主张将巴克利提名为下一届民主党的候选人（巴克利可没有上钩）。他又对纽约州州长莱曼说，他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完全有能力赢得他本州代表团的选票，并要求布朗克斯的弗林“老板”为此事作好安排。他还三番两次地激发杰克逊、华莱士和其他一

些核心人物的希望。

总统不放过使用伎俩的机会。他决不完全排斥他到时候再次出山担任总统的可能性。但他对来访者总是一再表示，他既不指望，也不打算竞选。白宫的亲信们还放出活来——“这可是内部消息”——总统不会当候选人。对于一再敦促他当候选人的来信一概不予回答。他坚持要求把芝加哥作为民主党代表大会的会场，因为他能依靠凯利“老板”使罗斯福的支持者占据会场。在有些州，总统候选人都必须向初选大会公开表明自己的意思，于是，罗斯福就私下安排好，保证不会有人提出他的候选资格问题，关于他自己的意图他仍旧秘而不宣，一面却派出使者去加利福尼亚等州在派系之间进行协调，让他们联合起来共同投“支持罗斯福的候选人”的一票。经过这一番煞费苦心的活动，罗斯福既保证了他一旦决定参加竞选时能够具有实力地位，同时也确保在提名遭到拒绝时有了退路。

如果决定竞选，罗斯福的主要问题倒不是如何取得提名资格——他有能力获得代表大会绝大多数人的支持，这一点是无可怀疑的——而是如何通过一种惹人醒目的方式得到提名，使人感到他正是为了响应一个强有力的和不可抗拒的召唤而出来任职的。党的召唤将先于选举时全国人民对他的召唤。总之，只有在7月党的大会上获胜，才有可能于11月在全国范围内取胜。

但是，在通往取胜的道路上，却有一个致命的障碍，即反对三度连任的传统，因此取胜变得更加必要。罗斯福十分清楚这个传统具有的巨大力量。不论宪法的起草人当初对“连任”问题如何存在着无法弥合的分歧，因而在行文上没有立下严密的阐释；同时也不论这个传统如何因为受到了个人和环境的偶然事件以及人民的深刻信念而得到了有力的支持，但这毕竟是一条不成文法，对此，罗斯福也不敢贸然违抗。那么，怎样绕过这个障碍呢？所有的民意测验都表明，绝大多数的人理论上都反对三度连任，而其中明确表示反对罗斯福的，则又占到多数。然而，再深追下去，则又有许多人认为，在某些情况下——特别是在危机时——总统再度参加竞选仍显得必要。

显然，罗斯福的任务——如果他最终决定参加竞选的话——就是要促使民主党全体一致通过一项草案来缓和这种反对三次连任的情绪。然而不幸的是，对于总统而言，他不能公开地花一点力气来促使这样一个草案获得通过。如果他提出这个要求，那只会更加剧反对三次连任的人们的害怕心理；他们害怕一个独裁的领袖拚命想抓更多的权力；这种害怕心理在总

统的第二届任期内始终对他是一种压力。因此，如果要再度竞选，一切还有待于民主党能自然提出一个草案。事实上，在白宫已经任职七年的罗斯福，认为他应该得到民主党的这种信任。

直到1940年初，罗斯福似乎还没有办法得到这种信任。有三个人成为他前进道路上的障碍，他们是赫尔、加纳和法利。

这是一个奇怪的组合。赫尔为人谨慎、稳重、彬彬有礼，他行动缓慢，但真干起来，却又坚持不懈。他为自己出身低微而感到自豪。已届六十八的高龄，他知道他漫长的政治生涯所剩的岁月不多了，他保持南部老一辈的传统观点，对新政的“过激主义”心怀畏惧。加纳，七十一岁，但身体结实得像核桃木，他的三色脸孔——白眉、碧眼、红肤——并不因年事增长而出现大的改变。他代表着新兴南部州的草原摩天大楼、巨型终点站、油井。对新政甚为反感，将之视为是反个人主义、反资本主义的不祥之物。法利只有五十一岁，这位身材魁伟、不知疲倦的党魁，在全国结交的朋友较前二人更多，但他联系最密切的还是城镇的政客，这批人对政策、政纲没有多大兴趣，而专注于测量每种风向以断定它对选票、交易、候选名单产生的影响。在这三人中，两个信奉南部新教，一个是爱尔兰天主教徒，思想上本无共同之点，但却因在不同程度上都反对新政而形成了三结合。

然而，政治上，这三个人的结合对罗斯福造成了不利的影响。加纳尽管向往着竞选总统，但主要目的还是不让罗斯福三次连任。赫尔愿意接受总统候选提名，只是不愿为此而四处奔走。法利一眼觊觎白宫的宝座，但他还可以等待一个时期。他可以在以赫尔或加纳为首的候选名单上争取一席副总统的位置，这样，四年以后，机会也就来了。在1939年和1940年初这段时期，他和其他两人一直保持密切的联系。三人串通一气，相互吹捧，并利用总统对他们的轻视，来挑动对总统的不满。他们联合起来共同反对的不是总统本人；他们自称是尊敬总统的，只是在原则上反对他三次连任，以及那伙肆无忌惮的人，他们都说，正是那伙人把总统引上了邪路。

罗斯福知道法利和赫尔、加纳两人过往甚密，他采用不同手法分别对付这三个潜在的竞争对手。

总统根本不考虑加纳的候选资格。“他根本不可能，”他对法利说。他和加纳之间一度有过的融洽关系早已冷淡下来。他们之间绝少接触，偶尔见面也是在内阁开会时候，加纳有时面红耳赤，怒目圆睁地和总统争论问题。总统私下暗示说，他即使背弃民主党的事业也不支持这个得克萨斯州

人去竞选总统。到1940年初，连他们之间的工作关系也几乎全部断绝；罗斯福甚至希望这位副总统不出席内阁会议。看到加纳为争当总统候选人而遭受的折磨，听说刘易斯公开骂他是一个“剥削劳工、打牌纵酒的坏老头”，同时又知道他为了争取黑人选民的选票而突然对一项反私刑议案改变了主意，罗斯福觉得非常高兴。

但法利的情况就不一样了。罗斯福不想开罪此人，因为他曾出色地完成过两次竞选活动。但总统面临的处境对他特别不利：根据宪法规定，同一州的两个人在政治上不能同时被列入一个党提出的候选人名单。而法利又无论如何不满足于准许他竞选副总统的许诺。他竞选总统的一切希望都以罗斯福不列入候选名单为前提。总统坚持说他不打算再次参加竞选，正是想借此使这位邮政部长清除怀疑。可是政治敏感性甚强的法利却始终保持警惕。罗斯福邀请芒德兰大主教为他当说客，但是法利不为所动，继续参加竞选。

至于赫尔，罗斯福还一直向他表白，希望这位田纳西州老人当他的继位人。他这一做法表面看来是有危险的，因为赫尔的背后有法利和加纳两人的支持。但罗斯福是对赫尔很了解。赫尔认为争取提名与他作为国务卿的地位不相称，而且感到罗斯福的支持对他是很必要的，因此宁愿等一等。与法利和加纳不同，他简直没有拉到什么支持；因此最终他完全要依靠总统。从另一方面看，如果罗斯福最后决定不参加竞选，那么赫尔将成为一个合适的折衷人选。

这一套错综复杂的政治权术，其中有多少是出自罗斯福本人的仔细策划，又有多少是在一团混乱中纯属偶然的事件？谁也不能断定。但可以肯定的是：罗斯福对自己的计划秘而不宣，以使混乱变得更加混乱，以便从中渔利。这个斯芬克斯正在一旁等着哩！

事件象风暴般袭来

战争爆发后几个星期，和每次在国际危机突发的时候一样，罗斯福在民意测验中的身价飞速上升。伊克斯指出罗斯福多少年来也不曾有过这么高的声望，罗斯福却回答说：“你且等着瞧吧，3月份我会象飞机俯冲似地猛降下来。”和以往一样，他真料事如神，对时间作了正确的估计。从各方面来说，1940年3月，罗斯福的声望即使就他的第二届任期来说也降到了最低点。

国际形势不是一片黑暗便是景象惨淡。3月里，苏联军队冲破了曼海姆防线，迫使芬兰接受了苏方口授的和约。总统对“芬兰惨遭蹂躏的情

况”感到震惊，想必深刻地感到美国对这个小国的援助完全不够，这种情况一方面由于赫尔的谨慎，同时也由于罗斯福对国内孤立主义分子的担心。这一次，他又只能发表几篇道义上的抗议和宣言，结果，又一次没有引起注意。整个冬天，俄国和德国在各自的利益范围内巩固势力——进展多大，还不清楚。

“虚假的战争”仍保持其缓慢的步伐，双方都利用冬季加强它们的军队。禁运的取消虽然使英法两国得以购买美国武器，但却得不偿失。首先，是因为盟国打算打一场长期的消耗战，所以暂时不急于订购武器；其次，是因为“现购自运”的折衷办法使美国船只退出了公海，这就更增加了德国对英国的封锁，这使得美国的全部船只看起来都被鱼雷击沉了。总统又想躲开法律规定，准许美国人的船舶改为巴拿马籍，但这个策略遭到赫尔和威廉·艾伦·怀特的反对时，他只得赶忙停止。怀特还写信说，早知总统会耍这个花招，他当初就不该为取消禁运那么卖力。

政府为保持美国的中立立场也不得不采用一些隐蔽手法。英国为了加紧封锁德国，便对美国船只实行搜查，检查美国邮件，侵犯美国“中立”区。美国政府一方面公开表示要坚决维护自己的中立权利，开始时还保持谨慎态度，对英国的侵犯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马虎过去；但后来事件接二连三地发生，并且有增无已，美国不免恼羞成怒。总统不得不告诉他的朋友、战争爆发后已任英国海军大臣的温斯顿·丘吉尔说：“我应该开诚布公地告诉你：这里存在很多公开责难之词。”但事件仍继续发生，有反英情绪的国会议员和诡辩家们却幸灾乐祸。

3月的形势也使罗斯福不得不放弃了对和平所抱有的任何幻想。刚从欧洲出使回来的韦尔斯报告说，他发现罗马对希特勒与俄国达成交易一事颇为愤怒，但仍寄希望于德国的胜利；柏林表示不获全胜决不罢手；巴黎笼罩着一片沮丧气氛；而伦敦则充满决心，甚至过分自信。此时，美国为了和平再主动地进行任何努力也毫无意义了。

在外交战线上屡遭挫折，罗斯福一时面临困境。全国舆论呈现僵持的局面：一方倾向于保持中立，一方主张对同盟国提供有力的支持和声援。1940年3月，全国的情绪，正如布利特大使所说的，很象慕尼黑会议前夕的英国。

在国内，罗斯福的领导威信已降到冰点。当然，每天还是有许多地区的民主党领袖给他送来新的声明，称他是党的希望的在，支持他参加第三届任期的竞争。总统扩大自己的领域、阻挠任何候选人领先的策略似乎正

在发生作用。麦克纳特就是一个例子。他在华盛顿这个百兽角逐的丛林里被咬得遍体鳞伤，因此不再是竞争被提名者队伍中领先的人物了。而罗斯福在早期的总统预选会上却遥遥领先于他所有的对手。但从更基本的意义来说，总统的地位仍然是岌岌可危的。

美国经济这个难以驾驭的怪物仍然以其惯有的不可预测性继续捣乱。3月初，才华横溢的财政部经济学家劳克林·柯里（现任总统的行政助手）就曾提醒总统说，经济情况正急剧恶化，因此敦促总统提出一个方案，以促进住房建筑和出口商品，并加快农业利益补偿。但好几个月来，罗斯福一直在做着和柯里的建议背道而驰的事，即紧缩预算。他对那些主张平衡预算的专家们的攻击一向就很敏感，而且又象大多数的经济学家一样，对巨额赤字开支的巨大可能性视若无睹，因此，只要不损害基本福利和国防规划，他对其他项目的预算则大加削减。他不准备制订什么新的规划。三年前，罗斯福就曾要求采取果断措施去解决占全国人口三分之一的人们缺衣少食、住房困难的问题，而同一个罗斯福现在对于要求他制订出提高保健、住房和教育条件的规划的呼吁却不予理睬。1940年初，罗斯福关于新政提出的唯一的一项扩展计划，不过是要在贫民区建立医院，而不久连这个微不足道的计划也被搁置脑后了。在1940年最初几个月期间，失业人数一直保持在七百万到一千万这一水平线上。

这并不表示罗斯福自己变得反对新政了，他只是按他的老一套政治规章办事，他在一个时期只能领导一条战线，而目前他是尽全力对付国外时局所涉及的重大政治问题。

面对这样的形势，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罗斯福在一段时间内实行了一种策略性的政治转移。他试图制订一种两党的的对外政策，为此，他力图争取共和党在国会和全国范围内给予他支持，并且设法不会与他自己的党疏离，也不致抛弃新政的实质。作为民主党的一个漂亮的姿态，他邀请参议院的共和党领袖麦克纳利和另外两名共和党人出席“杰克逊日”宴会。这几位心存怀疑的共和党人没有出席，总统事后打趣他们说，汉密尔顿和杰斐逊都是他所崇拜的英雄，并炫耀他自己不象大部分的前任总统那样党气十足。罗斯福向两党政策的转移使他恢复了自己作为全国领袖的象征性角色。但他却没有从共和党国会议员那里赢得多少选票；他们怀疑罗斯福的真正动机无非是想取得他们的支持，但并不愿意让他们帮助制订政策。现在还不是两党实行和解的时候。反对党在一些地区选举中已经获胜，并且感到11月的胜利业已在望。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在全国各地来

回穿梭，对现政府的政策和缺点大肆攻击。

然而，总统地位最薄弱的环节却在他的左翼。尽管他为劳联和产联之间的和解作了很大的努力，这两大组织仍旧出现严重裂痕。刘易斯仍然抱怨不断、一身反骨，骂罗斯福忘记了1936年产联帮了他的忙，现在竟“出卖”朋友。有些某年团体也在增加对总统的敌对情绪。有一次，总统在白宫南门廊发表演说，告诫美国青年代表大会的代表们，不能指望一夜间实现乌托邦，这时，一片倒彩声，响彻了严冬的天空。而极左分子中间也出现新的、更为邪恶的敌对情绪。

美国共产党在莫斯科的暗示下曾一度采取人民阵线的立场，对罗斯福政府抱友善的或至少是宽容的态度；但自苏德条约签订以后，美共不仅在国际问题上，而且在国内事务上都采取了突然的转变。他们认为罗斯福至多不过是资本家的一个克伦斯基式的小兵，说得坏些，则是一个拚命抓权的军国主义分子，一心想把他的国家拖入一场帝国主义战争。总统并不在意这种谩骂，因为他知道共产党的反对有多大价值。但他不敢而且也没有忽视他们在劳工部门、青年团体、报刊、工人进步署工人中间以及政府机关所进行的渗透活动。然而，在这个问题上，他象以前一样采取了旁敲侧击的办法，而不使用正面进攻的方式来加以解决。他把政府雇员中的嫌疑分子进行了监管，又和埃莉诺·罗斯福一起帮助工人联盟中非共产党领袖组织一个劳动进步署工人的新组织。

总统对国会的控制似乎比以前更软弱无力了。两党间惯有的宗派情绪，因为总统候选人提名的一场混战而加剧；参众两院已成为混战的中心场所。众院对全国劳工关系委员会进行的一次调查表明，这个重要的新政部门的内部行政管理很混乱。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正准备提出一项议案，罗斯福认为这项议案，虽然表面上声称确保行政管理上的公正，其实是一个想束缚新政机构的“愚蠢的”企图。一年前他曾签署了哈奇法案，尽管当时他也曾怀疑那个法案旨在限制他的任命权，而不是想要“澄清吏治”。现在哈奇法案的适用范围已扩大到用联邦经费雇用的州政府雇员。甚至赫尔的那个颇得民心的贸易协定要求延长三年期限也几乎不能取得充分的支持。加纳反对延长三年期限，使总统非常生气。一天晚上在伊克斯面前提及此事时，他甚至连声咒骂“该死，该死！”以渲泄他胸中的怨气。

这就是国内事务的一派黯淡景象，而当时正是希特勒再度出现于世界舞台上，大显威风的时候。

4月9日黎明，德国士兵越过没有设防的丹麦边界，半小时后，十二

艘德国驱逐舰在一片暴风雪中突然出现于挪威的纳尔维克港附近，鱼雷击沉了挪威舰艇，接着两千名德国步兵登陆。不久，更多的德军从汽艇和运输艇涌上挪威的沿海港口。丹麦的独立几小时内就荡然无存；两天后，挪威的主要港口也沦入纳粹的魔掌。

在开战后头几个小时内，局势尚不明朗，看来英、法可能对敌人进行抵抗。事实上，同盟国方面一直打算占领挪威的主要地区，但是他们迟了一步。德国人制订的作战计划是既彻底而又富于想象力的，他们执行时将武力、准确性、残酷手段、阴谋诡计、突然袭击等战术很好地结合在一起。相形之下，同盟国的抵抗却显得仓促应战，毫无计划，力量不足。英国部队登陆后与敌军交战，战斗软弱无力，旋即撤退。在严厉的讨伐声中，张伯伦准备辞职。丘吉尔即将继位。不久，希特勒趁盟军在遭受打击后尚未恢复过来，又发动了新的进攻。

5月10日，德军的炮火猛烈袭击荷、比边境。伞兵部队占领了飞机场，俯冲轰炸机刺耳的呼啸声撕裂了春天的晴空。在进攻部队的后面，德军的一百二十个步兵师和六千架战斗机，正准备投入战斗，而指挥这支强大的武装的乃是混世魔王希特勒。在向德军正式宣布战斗开始后，他说这场战争将“决定德意志民族今后一千年的命运”。盟国的五十万军队作好进攻准备，它们紧随比利时军队向前推进。

德军集中了坦克，出动了大批俯冲轰炸机高速向前推进，击溃了盟军的防线，并绕过盟军的两翼，实行大包抄。摩托部队和步兵从突破口一拥而入，一下子把比利时全境变成了一个等待防守部队陷入的巨大的陷阱。在五天的时间内，德国坦克已经冲破防御薄弱的阿登山区，并准备以闪电之势向法国北部逼进。5月15日，丘吉尔首相以“前海军人员”的名义向罗斯福发出急电，电文说：“局势迅速变成一片黑暗。……小国简直一个个地被碾成碎片。……墨索里尼即将匆忙上阵参与掠夺。……我们这里看来也要遭到进攻。……”嗣后几天，传来了一个又一个灾难的消息。

罗斯福在他称之为“暴风骤雨般袭来的事件”面前，表现出他对待危机的一贯素质：他很镇定、自信、清醒、热情，几乎若无其事。在收到丘吉尔来信的次日，他驱车前往国会，在一片欢呼声中，要求国会批准高达十亿美元的巨款，作为增加国防开支之用。他又要求立法者们订出“年产不少于五万架飞机”的指标，这使听者十分震惊。总统神情严肃；在场的记者们都看见总统紧捏讲台一角的手指关节已呈现白色。当他详细陈述战争和海军防务需要的时候，他听起来是坚决的。国会由于大势所趋，乃顺

应舆论潮流，很快批准了这几笔拨款，并且增加了数字。

德国装甲部队大批地冲过阿登山缺口，向西急转，直逼英吉利海峡，牵制了大批英法部队，使之困在海边。向敦刻尔克的撤退正在进行。大批群众肃静地伫立在时代广场上，等着观看《纽约时报》塔楼四面闪现出骇人听闻的新闻布告。5月26日晚上，总统正和几个人坐在书房里。他机械地搅着手里的鸡尾酒。没有笑语，也无闲话。一份份的电讯不断送来，他都匆匆过目，一边递给埃莉诺·罗斯福，一边低声叹息道，“全都是坏消息，坏消息。”当晚将近午夜时候，他面对扩音器发表全国演说。他说，上两周发生的事件，美国想要保持孤立主义的种种幻想得以破灭。但事已如此，现在也不必紧张不安。“在这个安息日晚上，在美国千千万万的家庭中间，让我们冷静地考虑一下，我们已做了什么，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全国应进一步加强战备，制造现代化的武器，扩张工厂的规模。过去几年“社会事业方面取得的重大成就”必须保持下去。对第五纵队要开展斗争，对制造不和与分裂的势力必须加以制止。“我们维护并建设一种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不仅属于美国，而且属于全人类。我们的职责是重大的，也是高尚的。”

但是发出这样的战斗号召是一回事，而要解决总统这几周所面临的艰难处境则是另一回事了。

英法两国首脑被逼得走投无路，自然只有求助于大西洋彼岸那个伟大而富有的民主国家。丘吉尔在5月15日的来信中告诫罗斯福说：“一个纳粹化的欧洲将要迅速实现”，要求罗斯福提供四五十艘旧驱逐舰，几百架最新式飞机，以及防空装备和弹药，并邀请美国海军舰队访问爱尔兰海港。总统最大可能地，鼓起足够的勇气答应了这些请求。他尽快地送去尽可能多的军事援助；但驱逐舰一项则需要获得国会批准，而目前提出这样的要求似乎不太合适。美国舰队正集中在夏威夷，以防日本利用危机搞突然袭击。

随着盟国军队防线的崩溃，英法两国求援的呼声越来越紧迫。丘吉尔警告说，如果英国一败涂地，新的领导人势必上台，他们将把英国舰队出卖给德国人以换取更好的和约。布利特大使转来法国的一封求救信，要求罗斯福总统发表声明，表示美国决不会让法国失败。总统只得回电告之：“这种事情，我是决不可能作的。”后来，为了筹措战争物资以及运输工具，总统正象韦尔斯所说的，遇到了挫折，仿佛“做了一场恶梦”。各种物资看起来都很短缺。海军部和陆军部当然渴望获得工厂源源不断地生产

出来新的武器装备。法律顾问们怀疑能否把这些装备合法地卖给盟国。陆军部长伍德林和其他一些高级官员则反对把重要的物资运往海外“零敲碎打地被浪费”。国会和全国上下完全赞成加强国防，但对于让我们美国出钱帮助盟国，则意见不能搭成一致。

总统想方设法东拼西凑地弄到一些装备，但在武力雄厚的德国面前，美国的支援显得寒碜。而他又不敢再发表强硬的宣言，甚至支援丘吉尔的驱逐舰也暂不送去了。

罗斯福外交上的努力也同样夭折。在重大事件纷至沓来的这段时期，他一再地呼吁墨索里尼不要参加战争。总统甚至表示愿意为他从中斡旋以说服盟国满足意大利在地中海的“合法愿望”。但随着希特勒军队进攻的节节胜利，意大利领袖也渴望最后能分得一杯羹。就在6月10日总统离开华盛顿前往弗吉尼亚大学演讲以前，布利特来电话，意大利将在下午向法国宣战，而法国人则对这个行动表示鄙夷，认为是“背后捅了一刀”，总统闻后既是愤慨而又忧虑。他启程去夏洛茨维尔，他的夫人和小罗斯福一同前往，后者即将毕业于弗吉尼亚大学法学院。总统心里反复捉摸“背后捅了一刀”这句话；如同他事后所说的，当时理智告诉他不要使用那句话，而旧军人的尚武精神却说“可以使用”。结果这种尚武精神占了上风。那天晚上，他详尽地讲述了他为阻止墨索里尼所作的努力后，以慎重的声调说：“在这1940年6月的第十天，握着匕首的那只手已经把刀拥进他的邻人的后背”。接着，他宣布了美国在此危急时刻的政策：

“我们美国人众志成城，将致力于两项明确的、不相冲突的事业，这就是对于抗暴者我们要尽全国的物力和财力给予支援；同时，我们自己也要充分利用和加快利用这些资源，以保证我们美洲国家本身有足够的武器装备和训练以巩固国防和应付突然事变。……”

“种种征兆和迹象都需要我们加快速度——全速向前推进。”

全速以赴，是目有最大的任务，因为法国已濒临崩溃。雷诺总理最后迫不得已，要求罗斯福使用武力或至少以武力相威胁来进行干预。对此，总统只能答复说，美国政府正加倍努力提供物资援助。罗斯福对美国舆论十分害怕，甚至当丘吉尔要求他公开宣布上述软弱无力的答复，以便给法国人民打气，他也拒绝了。雷诺在部长们一片要求停战的呼声中，再次恳求罗斯福领导美国参战；否则，他警告说，“法国就会象一个快淹死的人，即将遭受灭顶之灾。”与此同时，丘吉尔也提出警告：法国在海外能否继续抵抗下去，全靠总统的回答。罗斯福反复斟酌，最后致电答复。他钦佩法国进行的英勇抵抗，

并对事态发展“深表关注”。他正送来更多的物资援助，但是，他最后说，并于承担军事义务问题，则“只有国会才能作主”。

只有国会才能作主。就在发生这些重大事件的浪潮中却出现了一个小小的插曲，它提醒总统：国会山上到处布满险滩和暗礁。参院海军事务委员会主席沃尔什这个爱尔兰人和孤立主义分子，突出发现有二十艘新式鱼雷汽艇将要送往英国。海军部长查尔斯·爱迪生警告总统说，沃尔什大发雷霆，“威胁要强制通过立法禁止出售所有物资”，整个委员会是一片沸腾。罗斯福无可奈何，只得取消了这笔交易。

等到第二天（6月16日）总统的最后一封电报到达雷诺手中时，这位总理已是无路可走了。当天晚上，他就宣布辞职，一直要求停战的贝当元帅出来组织新内阁。五天以后，在贡比涅森林，法国在停战协定上签了字。二十二年前，就是在这个地方，法国人接受了德国人的投降。趾高气扬的德国元首出席了签字仪式。在场的记者看到他以高傲的神气注视着1918年法国为庆祝战败德国而树立的那个纪念碑。元首踌躇满志，目空一切，双手拍打着屁股，两腿叉开站着，双肩高高耸起，那种神气无疑在说：1918年的仇已经报了。

“我们需要罗斯福！”

人们难以置信，在这令人坐立不安的几周内，罗斯福仍然没有放松对国内政局的控制。他密切关注各州为派出代表团而进行的争夺。罗斯福在加利福尼亚、得克萨斯等州的的候选人竞争中所取得有胜利，使他暗自高兴。他同伊克斯、杰克逊、道路拉斯、科科兰以及其他鼓吹三次连任的人们协商关于党代会的筹备工作以及会上发言要点。他注视着杜威、塔夫脱、范登堡以及后来参加的温德尔·威尔基等共和党人之间的热烈角逐。但他始终不透露他自己的计划，甚至对白宫的亲密朋友也三缄其口。霍普金斯要厄尔利指示所有政府工作人员不要就三次连任问题发表意见，这也许是替总统发下来的话。

随着危机的加深，罗斯福在群众的威信也直线上升。千百万美国人，惧于外来威胁，都本能地支持他们的领袖，不再关注反对三次连任的传统了。但也决不是所有的美国人都不表示关注了——还有一个团体表示反对，总统对此特别感到不安。当国家正期待青年一代起来救亡图存、作出牺牲的时候，却有一部分大学生和青年组织向白宫请愿，表示他们反对国防，反对支援盟国。罗斯福愤怒地说：用“小东西”这个名称来叫这帮青年是最合适的了，但他也不敢对这个问题视而不见，因此让挨莉诺·罗斯

福于6月初在白宫安排一次特别晚会，他要亲自接待美国青年代表大会的领袖们。

这是一次对照鲜明的会晤。在白宫东厅里，聚集着青年领袖们，白人，黑人都有，他们彬彬有礼，却面无表情；而罗斯福总统，尽管当天从法国收到了使人沮丧的消息，但态度却从容不迫，和蔼可亲；罗斯福夫人则温良谦和，周旋于两代之间设法使他们彼此融洽；霍普金斯脸色苍白，神情紧张，坐在一旁，心里直怪这些年轻人太不理解他上司的苦衷。一开始，罗斯福就想方设法要建立一个同这些青年们靠近的共同基础。他谈到了报界反对新政的“过激”作法；解释他对西班牙内战采取的政策，是英法恐战思想所造成的结果；他谈到当前的争端在于民主政治和其他政治制度的对立。接着青年们提出了一连串的严厉质问。

一个与会者质问：南部各州有半数的人民没有投票权，那里的民主政治情况究竟如何？罗斯福答道：“关于民主问题，我们能够怎么办呢？……一两年内你也无法解决。”一个黑人代表质问：你又怎么解释武装部队的神族隔离？罗斯福要霍普金斯回答，霍普金斯说，甚至在黑人中间，对于这个问题也存在着两派不同的思想。中西部的一位基督教青年会领袖质问总统：为什么要强调国防的重要性，而对于社会保障却不大强调呢？罗斯福答道：“在我们的这种政治制度下，要同时抓两件同等重要的事情，并同样地加以强调，是有点困难的。可真难啊。”接着与会者发表了长篇演说：“已经发生的某种严重的事情”，使总统忘记了第一道防线——社会保险、教育、住房、穿衣、吃饭问题。枪炮和战舰耗掉了几十亿美元——而人民却一无所获。只责怪国会是不够的，试问总统的领导作用何在？“我们感到非常——怎么说呢？——我们感到非常憎恶，但同时也感到有些愤怒，因为总统和他的阁员们没有再一次把这一斗争诉诸人民！”

总统注视着发言者。“年轻人，我认为你说的话是诚恳的。你读过卡尔·桑德伯格的《林肯传》吗”

那个青年回答说没有读过。

“我想，读者都留下了这样的印象，林肯是一个非常忧郁的人，”罗斯福继续说，“因为他不能够在同一时间内做他想做的一切。有时林肯为了要取得一点进展，不得不进行妥协，我想你会找到这种例子。他只有妥协才能有所得。林肯也是那些被人称为‘政客’的不幸者之一，但他却是讲究实际的政客，因此才能给祖国做出许多贡献。他是一个忧郁的人，因为他不能一次完成全部事情。而这是谁也不能办到的。

“也许将来你当总统，会比我高明得多。也许有朝一日你会成为总统。如果你真能坐在这里，你就会知道，一味大声疾呼，你是永远不可能得到你想得到的东西的。”

如果说一部分有组织的青年感到被遗弃，心怀怨恨，那么，另一部分青年对于总统的感情却显得简单一些。到了1940年6月，已有成千名民主党政治活动家在为总统再度竞选而大肆鼓吹。他已经获得足够的代表票数，在候选人提名中可以轻易取胜。接着，在6月稍晚的时候，他采取了迅速果断的一着，从而大大地巩固了自己的地位。

就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在费城召开的前夕，总统任命了两名杰出的共和党为内阁阁员。一位是七十三岁的亨利·L·史汀生，被任命为国防部长。此人是一个富于斗争性的国际主义者，曾在塔夫脱和胡佛两位总统任内担任阁员；另一位是弗兰克·诺克斯，出任海军部长，他是芝加哥的报刊老板，1936年兰登的竞选伙伴，特德“叔叔”手下义勇骑兵团骑兵。共和党人原可以对这两次任命不予理睬，或者可以向罗斯福祝贺，因为他着手改革他的政府的这一步骤，正是共和党人打算在11月间完成的。但是，如罗斯福所料，共和党并不就此罢休。费城上空响起一阵歇斯底里的叫嚣，共和党内有人甚至扬言要把这两个叛徒开除出党。

“肮脏的政治！”共和党人对罗斯福大声叫骂。其实，从战争爆发时起，总统一直筹划组织一个两党内阁。他原希望除诺克斯以外，还要让兰登入阁，但因后者表示除非罗斯福公开宣布反对三次连任，否则不参加政府，于是罗斯福的计划便落空了。还有其他几个因素放慢了内阁改组的进程：罗斯福不愿撤销哈里·伍德林的国防部长职务；担心诺克斯的任命，会使诺克斯和他的宿敌凯利“老板”很难相处；让海军部长爱迪生任新泽西州州长一事，也还要和现任州长黑格“老板”从长计议。5月中旬，兰登仍对三次连任表示反对的时候，罗斯福采纳了弗兰克福特的主意，选中了史汀生；随后，他等待了两个星期，正当共和党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时，宣布了这一任命。一如往常，罗斯福选择时机又是恰到好处；既适应国外紧张局势的需要，也满足了国内政治斗争的要求。

共和党的全国大会在一片骚动中进行，总统则对之注意观察。杜威和塔夫脱在几轮投票中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后来在一片吼叫和赞美声中温德尔·威尔基突然一跃而赢得第六轮投票的辉煌胜利。一个公用事业巨头成了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这简直是美国政治生活中不曾有过的怪事！”伊克斯大声惊叹。这个大会似乎也激起了罗斯福的斗志。他向他的内阁成员表示，他要把

“总体国家”的观念和威尔基联系在一起，借此一扫其威风。

现在，随着国内外事件终于趋向明朗化，总统可以采取行动了。7月3日，他邀赫尔共进午餐。国务卿立刻看出总统的态度有了根本的变化。不错，罗斯福仍不屑于去竞选第三届连任。但当他谈及有人对他施加压力，要他不要拆党的台，他说话的语言颇“有点不耐烦，并充满怀疑”。他利用赫尔当候选人的种种弱点向赫尔进行试探。根据他那小心谨慎语气，这位年老的田纳西州人相信总统肯定会再次参加竞选。

尽管赫尔既是惊讶又感到迷惑，他却把这件事搁下了。即使他希望参加竞选，单凭他自己的力量采取行动，时间也是太迟了。至于加纳，他在总统候选人初选会中，已多次败于罗斯福，现在几乎已退出。不过，还剩下法利，需要与之一争高下。这个身材高大、秃头的政客也不会取胜。但是，他对罗斯福究竟能造成多大损害呢？到了7月，法利已经露出想要进行破坏的情绪。他对总统拒不向他透露自己的计划感到怨恨，对总统在有关一名天主教徒候选人的问题上态度暧昧十分气愤；而最使他感到愤怒的是，罗斯福拒不表态，不愿让另一位民主党人取得竞选总统的机会。法利带着这样一种情绪在7月初炎热的一天，到海德公园面见了他的上级。摄影记者们发现他们两人谈笑风生，但他们一离开，气氛就迅速地冷下来了。总统闲扯几句之后，耸了耸肩，朝着他的藏书室和山顶休养所挥一挥手说：

“吉姆，我不打算竞选了，我准备这样通知代表大会。“如果总统指望法利会劝他竞选，那他就失望了。

法利早已锻炼自己，不为总统的诱导所左右，他直截了当地说：“如果你说得明确的话，大会就不会提你的名。”接着法利简明扼要地阐发了他反对三次连任的理由。

“如果你是，你会怎么办呢？”总统最后问道。

“我就完全按照许多年前谢尔曼将军的做法——发表一个声明说：如果提了我的名，我不参加竞选，如果选举了我，我不就职。”

“吉姆，如果提名和竞选我都获得成功，在目前这样的局势下，我不能拒绝宣誓就职，即使我知道三十天后我会命归西天。”

法利永远无法忘记罗斯福当时的表情。他回忆说：“他把身子往后一靠，右手紧捏着椅子的扶手，左臂弯曲着，手指夹着一支香烟。他的眼色和面部表情都表明他非常认真。”谈话一度中断，接着他们又谈了许多话。等到这场政治猜谜表演结束后，彼此也都探明了对方的虚实。罗斯福知道

法利将在大会上提名，法利知道罗斯福要参加竞选，不过还有必要民主党发出一种有力的、无法控制的召唤。

第二天，法利离开华盛顿前去芝加哥，决定不让罗斯福得到党的那种召唤。一周以后，有史以来最不寻常的一次党代表大会开幕了。

1940年7月15日（星期一早晨，芝加哥体育场。会场中心外面的走廊是一条长长的集市，异常拥挤。小贩们大声叫卖纪念品、三角锦旗、汽水啤酒、热狗、爆玉米花、罗斯福照片。会场内一幅巨大的色彩黯淡的总统画像，透过烟雾俯视着聚集的人群。大会议厅的周围悬挂着鲜艳夺目的横幅旗布，一排排座位都反射出红的闪光。相比之下，主席台显得格外冷清。代表、候补代表以及观众熙来攘往，看起来都很垂丧。究竟会发生什么事呢？他们互相探听。投票结果又会怎样？谁也不知道。甚至那些“大人物”的心中也没有底儿。伊克斯紧锁眉头，从台上注视着场内情况，总统既没有向他面授机宜，其他核心人物也摸不透总统的心思。身材魁梧的吉姆·法利主持大会，他更用不着请示机宜。芝加哥市长凯利在欢迎词中提到了总统的名字，但是，甚至罗斯福这个具有魔力的名字对于没精打彩的代表和一半空着的会场也没有激起任何兴趣。

不一会儿，会场迅速传开了一种说法，认为只有去找霍普金斯，他一定知道个中奥妙。这时，霍普金斯正庸懒地伸着四肢，躺在“黑宝石”旅馆的床上。他的头发垂到他苍白的脸颊上，他穿着衬衫和宽大的裤子，使一身瘦骨更加突出。霍普金斯确有一条直接通到白宫的专用电话线，电话就安在他的浴室里，这是他唯一能够保密的地方。

可是就连霍普金斯本人也不知底细。

罗斯福正在把他自己那种古怪的角色扮演到最后一幕。他没有向任何人透露他的最后计划，难谁也没有发出指示——甚至对霍普金斯他也讳莫如深——因为他打定主意要让民主党自动发出召唤。他仍然想要一种发自内心、毫不含糊的召唤。他不阻拦霍普金斯、伊克斯等人为他争取这种召唤所作的努力，但他不会支持他们这样做。大会召开前夕，他们曾恳请总统发出行动号令，但他只报之以微笑，还是以那句老话作答：必须要大会作出决定。他说上帝一定会安排好一名候选人的。霍普金斯浴室里的电话成为他向总统汇报事态发展的渠道，而不是总统向他发布指示的工具。但是，这条私人专用线路以及这位病人在白宫里的住所都说明了霍普金斯本人的权威。

只有一次罗斯福确实直接采取行动，帮助这个召唤的实现。大会开幕后，

当总统已肯定法利是妨碍他取得全党一致支持他竞选连任的主要对象时，他打电话给法利，十分小心谨慎地暗示说没有必要举行一次投票了。法利暴躁地回答说：“愚蠢透顶。”罗斯福只得暂时把这事放下。不管怎样，总统过去一年实行的迂回战术正在显现出效果。现在再也找不到其他任何强有力的候选人了。甚至那些对罗斯福没有多少好感的民主党领袖们也愿意把这位最重要的拉票专家的名字列为候选人名单上的第一名。而那些坐以观变、持骑墙态度的人也能感党代表大会的情绪，它看中了罗斯福。

可是与会代表们仍然担忧，一是威尔基的名望，二是三次连任的问题，三是总统的计划。星期二的会场仍然是了无生气，代表们的演讲全是些夸夸其谈，华而不实，会场上人来人往，异常嘈杂。罗斯福派代表们也很担忧。法利会使出什么花招？加纳，法利等一伙人还会串通一气搞出什么联盟吗？贝尔纳斯、杰克逊和伊克斯三人炮制了一个方案，准备驾驭大会极力通过罗斯福的提名。霍普金斯仍未得到总统的指示，只得把他们的计划通知白宫。罗斯福不同意，霍普金斯回报三人说，罗斯福对大会开得死气沉沉毫不介意，大会必须按原定议程继续开下去。

伊克斯电告总统说：“大会已开得气息奄奄了，你的名誉和威望可能要受贬损。”他恳求他的上司来芝加哥加强领导。但没有回答。罗斯福还在等候党的召唤。为了给他的以退为进的策略打掩护，他使出了最后一手绝招。

星期二晚上，巴克利发表了一篇演说，但内容老套而又冗长重复。在发言到一半的时候，他偶然提到了罗斯福的名字，结果在场内引出了自发的示威。巴克利拼命敲着木槌，极力要使会场肃静下来，最后，他达到了高潮——宣读总统要他向大会发表的信。信上说，总统决不试图影响大会代表的选举和见解。巴克利把音量提高，大声继续说道：

“今晚，在总统的特别请求和授权下，我向大会明确宣布这个简单的事实：

“总统从来没有，而且今天也没有要求或是希望继续担任总统，或成为总统候选人，或接受党的代表大会提名竞选总统。”

会场一时一片安静。

“他以十分诚恳和真挚的心情表示：出席大会的全体代表完全有自由投票选举任何一位候选人。

“这就是美国总统要我向你们转达的话。”

全场震惊，一片沉默。代表们面面相觑，不知如何是好。突然间，从

四周扩音器里雷鸣般地迸发出一个声音：

“我们需要罗斯福！”

有些代表拿起他们的州旗，开始在通道里游行。扩音器里传出了大声叫唤，“大家需要罗斯福！”更多的代表加入游行行列。几百名参观者也从观众席上涌到了楼下会议厅。“全世界需要罗斯福！”队伍象一串巨蛇般向主席台前移动。在底层的一间房里，凯利市长手下的下水道总管——一个身材矮胖、大腹便便、嗓门很粗的人，把嘴唇紧贴着话筒，一个劲地喊着“罗斯福！”游行队伍呈现一片狂热，声嘶力竭地叫喊“罗斯福！”啦啦队，乐队，大叫大喊的群众汇成一股振聋发聩的声浪，但“罗斯福”的喊声仍清晰可辨。这个喊声现在变得如雷震耳，势不可挡，淹没了一切。人们挥舞着手里的小旗，踢翻椅子，推开旁人，蜂拥而至通道，不断喊着：“罗斯福！……罗斯福！……”

一小时后，秩序才得以恢复。但是现在高潮已过，转入尾声了。第二天，罗斯福的名字列入了候选人提名名单。年迈多病的参议员格拉斯声音嘶哑地说了几句简短的话，提名法利为总统候选人，但由于人们的走动声和间或发出的讥笑和嘘声，他的话几乎听不见了。有人提名加纳、泰丁斯和赫尔为候选人，得到附议，但捧场的人却少得可怜，整个会场涌动着一种急躁的情绪，结果是一榜定案：罗斯福 946 票，法利 72 票，加纳 61 票，泰丁斯 9 票，赫尔 5 票。然后，一直是民主党忠实支持者的法利提议鼓掌通过罗斯福为总统候选人，响起的是一片掌声和“赞成”的欢呼声。

在白宫，罗斯福坐在朋友和助手们中间，专注地谛听着大会进行情况。现在他既然已得到民主党的提名，便立即转而决定副总统人选。在这以前，他一直没有加以宣布，一方面的希望赫尔能够接受，另一方面他可以把副总统人选作为诱饵，悬而未决的时间越长，他争取大会给他支持的地位也就越是坚固。在他赢得候选人提名的那天晚上，他开始通知霍普金斯以及民主党其他领袖，他已选定了华莱士。总统感到这位农业部长是一个可以信赖的自由主义者，他在盛行孤立主义情绪的那些农业州里是有号召力的。但罗斯福决定的人选却使党的领袖们大为吃惊，他们抱怨说，华莱士是一个神秘主义者，一个不善言辞的哲学家，一个前共和党人，而政治上则是一个笨蛋。

罗斯福坚持己见，不予妥协。星期四早餐桌上，他对罗森曼说：“在知道他们提名是谁之前，我就决不发表我的接受提名演说。”

真正的困难并非华莱士，而是在芝加哥大会上已经有大批人抢着当副

总统候选人。例如杰西·琼斯、伊克斯、麦克纳特、贝尔纳斯以及其他许多人都在与会代表中频繁活动。有几个人都满以为自己已获得罗斯福的支持。路易斯·约翰逊在大会进行期间飞往华盛顿去见总统，回到芝加哥，在会场上到处活动，喜不自禁地逢人就说罗斯福已给他开了“绿灯”。他的朋友们都不相信，其中有一个忍不住说，“噢，路易斯，你得了吧！这个大会场里开了绿灯的候选人可多着呢。”当消息传来，说总统已经选定了华莱士，所有其他有希望入选者只好埋怨诅咒，自动退出，剩下的只有麦克纳特和众议会议长、亚拉巴马州的班克黑德两人，后者来自南部州，以“顽固守旧”自我标榜，他认为白宫曾经表示同意，如果他不参加总统候选人的提名竞选，他可以自由参加副总统人选的角逐。

至此，大会的情绪已变得难以驾驭。代表们是全力支持罗斯福的，而现在他们要凭自己的志愿前进了。埃莉诺·罗斯福这时灵机一动，从海德公园飞到芝加哥找代表们谈话；但她的文雅高尚的谈吐只不过带来暂时的平息。到星期四晚上代表们愤懑不服的情绪已升到顶点。在激烈的发言中，班克黑德赢得提名，并有人附议。麦克纳特退出竞选的声明在一片喧闹中几乎未惹人注意。观众席上坐满了为其他候选人捧场的人，凡是支持华莱士的发言都遭到他们的一片倒采和嘲笑。华莱士夫人坐在台上伤心地问埃莉诺·罗斯福：“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反对亨利？”

罗斯福坐在椭圆形房间的收音机旁，独自玩着纸牌，脸色一片凝重。他听着会场上的喧闹，又听到评论员描述这种情绪是对总统的专横独断的一种反抗。投票的时间接近了，他把纸牌推向一边，开始在记事本上写着。他叫罗森曼尽快“对文字进行润色”——他也许很快就要发表了。罗森曼一眼就看到上面的措词极为尖锐刻薄，罗斯福表示他无法与一个被自由主义和反动所分裂的党进行合作，他以拒绝接受提名为要挟，要求全党在上述二者之间作出选择，结尾写道：“我就是这样做。”

总统继续玩着他的纸牌。室外，沃森“老爹”要把发言稿撕掉，他愤怒地对罗森曼说：“谁当副总统，我根本不在乎，全国人民也不感兴趣。”“对国家唯一至关重要的，是坐在房里的那个人。”等到罗森曼带着改好的讲稿回到房间来时，沃森几乎要掉泪了。一直反对三届连任的莱汉德小姐则笑容满面。至于总统本人，罗森曼觉得从未见过总统的这种坚定的神色。

在芝加哥的大会上，唱票正在进行。华莱士和班克黑德两人的票数相互追逐。贝尔纳斯从这个代表团窜到那个代表团。气急败坏地直嚷：“看在上帝的面，你们究竟是要总统呢？还是要副总统？”

在椭圆形房间里，罗斯福等待投票结果。他的心弦绷得越来越紧。双方票数一直保持接近；班克黑德最后领先，但原来负责唱票的几个工业州的代表们这时全都投票支持华莱士。罗斯福终于赢得了这场斗争。但在7月的酷热气温下，他已显得疲惫不堪，汗水浸透的衬衫粘在身上，样子更为狼狈。他坐着轮椅，被推进他的卧室，同时通知芝加哥党代表大会，他即将前去致词。现在沃森眉开眼笑，而那位可爱的小姐则黯然伤神。几分钟后，罗斯福换了件新衬衣，头发梳得整整齐齐，踌躇满志地重又出来。

在芝加哥，扩音器传出了他那洪亮有力、急徐有致的声音：

“今晚，时间已经很晚了；但我感到大家宁愿让我现在对你们讲话，而不愿等到明天。

“今天晚上，我以激动万分的心情向你们讲话。我应该承认，此时我的心情是复杂的——因为，正象每个人在他的一生中早晚都会碰到的那样，我发现自己正处在两种矛盾的心理之中：一方面，我个人深切希望退休，另一方面，那个不声不响的、看不见的叫作‘良心’的东西，却又对我的这种做法不予同意。……

“我曾度过许多不眠之夜，我常扪心自问：作为三军的统帅，我号召千千万万的男女去报效祖国，号召他们练好本领为祖国效劳，而当全国人民同时也要求我尽个人的职责为祖国效劳的时候，我却加以拒绝，反躬自问：我有权利这样做吗？

“在目前这样的时期——局势异常紧张、危机四伏的时期，世界的一切问题都凝聚为一个简单的事实。这个事实就是武装侵略，取得成功的武装侵略，其目的就是要毁灭我们美国人为自己选择和建立的政府组织和社会形式。这是一个谁也不再怀疑——谁也无法忽视的事实。

“就象大多数和我年龄相当的人一样，我也有我自己的计划，我想享有自己选定的、自己感到称心如意的私生活，希望这种生活从1941年1月开始。可是，这样的计划，也如同其他许多计划一样，当时是在另一种世界局势下定下的，而现在看来却那么遥远，仿佛是在另一个星球上似的。今天，一切私人的计划，一切私人生活的安排，从某种意义上讲，都被人类面临的一个巨大的危险所否定了。……

“只有人民才能召唤他们自己的总统。如果人民向我发出了这样的召唤，我愿以最简单的语言向你们表示，我将在上帝的保佑下，继续贡献出我的全部才能和全部力量为你们服务。……”

第二十一章 老竞选高手，新竞选运动

“你可以想象，”总统7月18日在给他舅父弗雷德·德拉诺的信中说：“这几天发生的事给我的感受，与其说是兴奋，不如说是服从命运对我的安排。”在写给诺里斯的信中，他提到保守分子在这次大会上为了迫使他放弃竞选提名而制造出的那种“吓人的声势”，使他至今仍心有余悸，他在信的结尾写道，“尽管你我都感到疲倦‘想回老家’，但我们还得齐心协力，坚持到底。”

罗斯福对这次大会的结局完全可以感到非常满意。他狠狠地回击了保守分子，包括那些自从关于最高法院的那场斗争以来一直与他为敌的反罗斯福分子。大会成了捍卫新政的讲坛。他对诺里斯说，他已获得了一个“真正自由派”的竞选伙伴。他已赢得了他想要得到的党的召唤。从广泛的意义来说，他的等待时机和迂回的策略已经有了效果。第一次投票的结果表明，再也没有一个强有力的候选人可以对他构成威胁。各种反对势力始终没有联合起来。他击败了“仇恨者俱乐部”；这个组织，据他对诺里斯说，网罗了“惠勒、麦克伦、泰丁斯、格拉斯、约翰·J·奥康纳之流，以及几名从波士顿来的疯狂的爱尔兰人等古怪家伙”。他手里的这张王牌——不到最后，决不把拒绝提名的可能性加以否定——使他最终受益。

另一方面，罗斯福却输掉了他最需要的东西——全党一致表示了对完全支持。他所期待的那个掌声雷动、全体一致拥护的热烈场面，却遭到了法利等人的破坏。当时的情势是有讽刺意味的。罗斯福的被提名所以成为名副其实的党的召唤，这是因为其推动力不是来自他本人，而是来自白宫的行政班子以及党内几个领导人物，他自身的作用则是间接的。而他拒绝参与领导的做法，却使处于混乱状态的大会将领导权交给霍普金斯手中，而这也仅仅是因为人们认为他是罗斯福的全权代表。在许多代表的眼中，霍普金斯是罗斯福的爪牙。等到后来强行通过提名华莱士的决议时，白宫控制民主党的这一幕也就完成了它的最后一笔。

胜利的代价是高昂的。几百名代表心有不甘怀着反抗情绪离开芝加哥走上归程。代表们对华莱士的反感十分强烈，因此只好力劝他不在大会上发表接受提名的演说。党的领导发生了动摇。法利决心辞去党的主席职务。另有一些老资格党员——尤其是弗林——也都表示，霍普金斯如不退居次要地位，他们决不出来领导。伊克斯、麦克纳特以及其他行政领导人，对罗斯福选中华莱士也觉得痛心和愤怒。班克黑德有机会就说，罗斯

福手下那批人如何在芝加哥大会把他出卖了。加纳表示要卷铺盖，回得克萨斯州老家去，永远不再回来了。

共和党的一些报纸颇为自得，以头条新闻报道一大群反对三届连任的民主党人在大会结束后，将不支持大会通过的罗斯福—华莱士总统候选人名单，其中一部分人1936年的大选中就曾背叛过他们的党，但在四年后的今天，他们又更将历史重演。这些报纸还极力渲染，把党代表大会说成是被新政的决策人物所控制的秘密会议，听命于白宫走狗、过激分子、城市党魁，以及“来自下水道的声音”等的操纵。当然，新闻界都持反罗斯福的腔调；但罗斯福本身也有招致抨击的弱点。芝加哥的一场斗争并未获得全胜：尽管他赢得竞选提名，但使用的狡猾手段却加深了普遍的怀疑，认为他不光明坦荡。不怪乎几次民意测验表明，共和党的威信重又上升了，在两党争夺总统宝座的角逐中，据某些民意测验的结果看，双方已达到难分胜负的地步。

总统面临的主要麻烦根本不是上述这些情况；使他感到难办的却是一个躯干高大、不修边幅的人，此人在7月下旬的那段平静时期正忙着各处奔走，开展拉票活动，甚至科罗拉多州的牧人竞技场上也不乏他的足迹。政治舞台上又出现了一个光彩夺目的新人物。

嘶哑刺耳的嗓子

1940年仲夏时节，有关温德尔·威尔基这个人物的种种传说已开始逐渐蔓延。事实上，此人确有不凡身世。他诞生于1892年，兄弟姊妹六人，他排行第四，祖先是德国人，在十九世纪初叶革命动乱时期离开了祖国。威尔基从小生长在印第安纳州的一个政治气氛浓厚的知识分子家庭里，父亲当过教师、律师，是一个布里安派民主党人，母亲是律师，颇有口才，擅长演说。青年时代的威尔基当过教师，做过律师，参加过军，以后在阿克伦度过了十年的律师和商人生涯，于1929年迁居纽约，在公用事业界春风得意。1933年11月，罗斯福出任第一届总统的前几个星期，威尔基已成为颇具规模的“州与南方公司”的首脑。

以后七年，威尔基成了企业界批评新政最有力的代言人。他走遍全国，做了几百次演说，在几十种杂志上发表文章，对自由同盟的作法进行抨击。他把自己装扮成新政的主要受害者，是被过分揽权的政府压迫得不能翻身的一个诚实而有作为的实业家。事实上，新政的确一再地给他以打击：他要求推迟田纳西水利工程的企图遭到了否定；他为反对公用事业控股公司议案中的“死刑”条款所作的斗争也遭到了挫败；他为兰登竞选所

作的努力最终落空；最后他在法庭上斗争也告以失败。现在， he 可以和那个给他制造众多不幸的罪魁祸首直接进行公开的较量，这看起来是一个伟大的惩恶劝善的举动。

威尔基成了罗斯福最好的陪衬。他身材高大，喜欢说笑，颇具魅力，这些特点与总统相似；但在其他方面，这两个对手却相差甚远。威尔基头发蓬松，宽脸，阔下巴，身材高大，穿一身松垮起皱的衣服，他这副充满乡土气的装扮，对美国中产阶级很有吸引力。“态度十分自然，毫不矫揉造作，不虚张声势，不故作谦恭，也不巧言令色。……他具有象印第安纳州县政府广场上的办公楼前院那样的美国特色。……他是心地善良、性格坚强、待人坦率、办事能干的乡巴佬。”根据布思·塔尔金顿关于威尔基的描绘，我们可以看出这个印第安纳州人和白宫那位八面玲珑的人物形成多么鲜明的对照。

尽管外貌上常有几分土气，威尔基却是一个温文尔雅、见闻广博的纽约客。他博览群书，到处旅行。他擅长写作，经常给著名的报刊撰写书评，他能言善辩，知识渊博，在当时电台上最受欢迎的《情况介绍》节目中大放异彩。他多才多艺，通过他那有力的诚恳的谈话，赢得了广泛的听众。有个记者说，他是“一个善于把握时机的行家，善于在报纸出版以前刊登消息，或者发布辟谣声明。他对写好的讲稿作最后的润饰，或者即席发表演说，斟字酌句，无懈可击，使听者难以忘怀。他和出版商、编辑、记者周旋，手法也极为灵活得体，使他们感到完全应该获得他的感激和信任。”而且，七年的时间，他跑遍全国，单枪匹马和新政战斗，终于结识了那些现在已和白宫日益疏远的出版界名流如罗伊·霍华德及亨利·卢斯等人。

一开始，罗斯福就看出这位共和党候选人是一个最严重的威胁。眼前的这位人物显然非寻常人士，他既不是胡佛那样一本正经的工程师，也不是兰登那样对国内政治一窍不通的新手。罗斯福最初会见威尔基是在 1934 年 12 月。那次谈话表面上是友好的，但感情深处却是另回事。事后，罗斯福对别人说，他如何驳倒了他的来客，逼得他结结巴巴地认输。而威尔基则打电报给他的夫人（也是一位新政反对者）说：“魅力之说根本是夸张。我未说你对他的看法。”总统认为威尔基代表公用事业的这一背景，对他的取胜将产生不利影响；但共和党推出参议员麦克纳利作为副总统候选人，却多少淡化了想把威尔基和“利益集团”拴在一起的企图，因为麦克纳利长期以来支持政府权力和对农业的援助。

要把威尔基本人归入反动分子一类，也不是很容易的。他对新政的许

多主要改革措施，早就公开表示支持。他在二十年代对三 K 党持刻骨仇恨，因而博得了应有的“公民自由之友”的名声。并且，他也是一个国际主义者，在共和党召开全国代表大会的前一个月，就曾说：“谁如果认为欧洲事态发展的结局与己无关，谁就是一个短视、愚蠢、可笑的人。”威尔基也象许多其他热中于总统提名竞选的政客一样，他的观点也显得很灵活。仅此一点，民主党要想扣他一顶帽子，也就非常困难。真的，这位印第安纳州人曾是民主党的一员：他曾作为代表，出席了 1924 年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1932 年曾投了罗斯福一票，直到 1938 年，他还自称是民主党人，但后来退出了。

总的来说，罗斯福认为威尔基和麦克纳利是他的劲敌，是共和党所能提出的最强的候选人名单。民主党和共和党的这两次大会的性质增加了威尔基手头的资本。共和党的大会看来是开诚布公的，没有党魁操纵，相较之下，民主党的大会就显得俗气而欺诈。但实际上，威尔基身价提高归功于大量的金钱和宣传的声势；他在代表大会的第六轮投票中击败了杜威和塔夫脱这两个被称许“蒸汽压路机”的强大对手，使他看起来好象是拉哈特似的。

8 月中旬，威尔基在他的印第安纳州故乡发表了他接受总统竞选提名的演说。在场的听众密密麻麻——据有人说听众达二十五万人之多——天气闷热，人们穿着衬衫，站在树丛中，谛听威尔基激烈抨击那位竞选三次连任的候选人。“只有强者才能得到自由，”他带着浓重的鼻音、不甚清楚地高声喊着：“而且，也只有从事生产的人才能成为强者。”在这次及以后的多次讲话中，随着他的嗓音显得干涩，后来变得沙哑，最后模糊不清，他的基本策略也变得明确起来。新政主要的内政与外交政策，他可以接受；他将从三个主要方面对罗斯福进行攻击：权力独揽；阻挠恢复真正的繁荣；对外来威胁置之不理，未能尽快地重新武装全国。

威尔基一再宣称，他急切地等着要同那位“冠军”进行对抗。

可是，“冠军”却暂时不想出场应战。甚至在他被重新提名以前，罗斯福已经决定了他一旦参加竞选所应采取的策略。他将驻守华盛顿附近，以强调他作为三军统帅的作用；就一般性的竞选活动而言，他不屑于亲自出马。谁要反对他这么做，他也不予理睬。偶尔他去东部各州视察。这也是同他在 1936 年的策略有所不同的，当年他视察公共工程署的工程和旱灾区，而如今却是国防工厂以及海军兵站了。

“国外事态发展瞬间即变，责任在身，我不得不留在白宫，有时离开，

也不能走远，以便在必要时，我可以在几小时内回到我的办公桌旁，与华盛顿、甚至与欧洲、亚洲直接通电话联系。”罗斯福在接受总统提名演说曾说，“……我将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情再去参加纯政治性的争论了。”

与以前相同，这位老资格的总统竞选能手又为自己留出后路。

“但我十分愿意提请全国注意，要警惕歪曲事实，这种做法，不论有意或无意，有时是出自政治候选人之口。”他说这番话的实际效果自然是总统可以在他愿意的任何时刻参选。

罗斯福尽量利用他作为三军统帅的地位。他视察国防的旅行路线经过专门安排，以便他访问尽可能多的城镇。总统的随从人员尽一切方法不让州和地方的官员登上总统专车；但还是给报刊提供了充分机会来报道总统的行踪，如总统检阅陆军演习，或以欣赏的神情观看正在建造中的航空母舰等。在视察纽约州北部的国防设施时，总统会见了麦肯齐·金总理，双方同意成立一个常设性的联合国防委员会，以讨论西半球北半部的安全问题。

8月间，白宫的记者们想要罗斯福回答威尔基的锐利的攻击，却没有实现。罗斯福只是意在言外地说：“我不懂政治呀。”

总统的防守策略不仅是出于竞选的考虑。到1940年的仲夏，全国已在紧锣密鼓地重新武装自己，白宫必须迅速作出决定。因为罗斯福已经拒绝把中央对国防生产的控制交给他人，所以就更加需要他在位。当他在1940年5月底成立了国防咨询委员会的时候，该会一名委员威廉·S·努森问道，“老板是谁？”罗斯福笑着回答：“唔，大概就是我吧！”从行政的角度来看，这只是一个权宜的安排，但政治上，这种安排却使罗斯福有可能直接掌握难办但却是关键性的政策问题。

外交方面的进展也需要密切注意。法国沦陷后，各国的外交部门都在重新估量形势。各国和新成立的法兰西政府关系处于紧张状态，美国则显得进退两难。日本军界于7月中旬控制了日本内阁，他们对一些在希特勒闪电战后几乎失去防守的法属、荷属殖民地早已垂涎三尺。甚至更令人担心的问题却是美洲这个半球的防务，因为人们担心，希特勒很可能要强迫法国和荷兰让出它们在加勒比海的属地，或甚至直接采用进攻或渗透的手段予以占领。赫尔在7月底的哈瓦那会议上，使出漂亮的一招，哄骗大会通过他关于反对转让欧洲国家在新大陆的属地的一项计划。但当时的形势还存在着一大堆外交和军事上的棘手问题。

尽管面临着堆积如山的艰巨问题，罗斯福始终没有忘记他还需要处理竞选问题。他安排伊克斯去应对威尔基的接受提名演说。这位好斗的国务

卿指责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曾经是坦慕尼协会的成员，并说他曾经奉承过那个声名狼藉的公用事业大亨塞缪尔·英萨尔。罗斯福满心高兴地等着看两人即将展开的一场唇枪舌战。总统还要分出时间来进行党务的整顿；民主党这台机器，零件松弛，已有点运转不灵了。法利对他在芝加哥大会上的遭遇仍心存怨恨，尽管罗斯福极力挽留，但他执意辞退全国委员会主席职务，结果由弗林接替。“善邻联盟”既已徒有其名，只得另建立一个新的机构去吸引共和党人和无党派人士；它由诺里斯和拉瓜迪亚两人负责，科科伦以及其他行政助手参与协助。至此，罗斯福才用电话直接通知各城市的民主党党魁，要他们做好安排，他即将登台竞选了。

这时也正值内阁进行改组。罗斯福挑选了出身寒微的“小农”克劳德·R·威卡德出任农业部长，以代替华莱士，后者正不声不响地参加竞选活动。有病在身的霍普金斯为了直接协助总统工作，辞去了商业部长职务。罗斯福任命复兴金融公司的首脑杰塞琼斯去接替，以酬谢这个体形魁梧的得克萨斯人在芝加哥大会上对他的支持。他也乐于这样的一个人进入他的进攻班子，特别是在大选期间，这也可以恢复他所喜欢的那种政治均势。任命弗兰克·沃克为邮政部长，意味着在法利离开后，内阁仍保持着天主教的代表人物；而史汀生和诺克斯两人进入内阁，则又使内阁增强了两党色彩。那年夏天，有两位著名作家参加了霍普金斯和罗森曼的写作团体，撰写竞选演说，一位是剧作家罗伯特·舍伍德，另一位是诗人阿奇博尔德·麦克利什，后者在头一年被罗斯福任命为国会图书馆馆长。

这将是罗斯福为参政所进行的第九次竞选活动，第三次竞选总统。但是形势决定了这次将是一个不寻常的竞选运动。

狮子对海狮

“法国战役已经结束了，”6月中旬丘吉尔在下院对满座凝神细听的议员们说，“我预计不列颠之战就要开始了。这一战役将决定基督教文明的生死存亡。这一战役将决定我们英国人自己的命运，决定我们的制度和我们的帝国是否能永久延续下去。……希特勒知道，他必须在这个岛上将我们摧毁，否则他就会输掉这场战争。如果我们能顶住他，整个欧洲就可以重获自由，全世界人民就可以进入天地广阔、阳光普照的美好境地。但是，如果我们失败了，那么整个世界，包括美国，包括我们所熟悉、所珍视的一切都将堕入一个新的‘黑暗时代’的深渊，并且由于科学的滥用，这个新的黑暗时代会变得更为可怕，也许更为漫长。

“因此，让我们振作精神，肩负起我们的责任；我们担起了重任，这

样，如果我们的英帝国及其联邦延续一千年，那么后世会说：“这是他们最辉煌的时刻”。

四个星期以后，希特勒告诉他的陆海空三军将领：“英国无视它在军事上处与绝境的情况，至今仍不愿和我们达成任何妥协，因此，我决定开始准备，而且在必要时，对英国发动进攻。”这次军事行动的准备工作必须在8月中旬以前完成，行动的代号是“海狮”。德国元首强调说，要想获得成功，必须依靠空中优势，然后控制横跨英法海峡的海上通路，为进攻者提供登陆的跳板。

就在希特勒忙着调集大批舰船，部署了三支精锐部队，聚集了他那慑人魂魄的空军准备狂轰滥炸的时候，丘吉尔又向罗斯福求援了。他写信给总统，说明驱逐舰对于抗击海上入侵和保护英国给养线是不可或缺的。仅在过去十天，就有十一艘英国驱逐舰被纳粹德国击沉或击坏。丘吉尔要求美国必须马上给他五十至六十艘旧式的、经过修复的驱逐舰。他还说，紧接着的三个月将是至关键的时期——如果英国能安然度过这个阶段，则终将获胜。

“总统先生，”丘吉尔告诫说，“我怀着极大的敬意向你进言：在漫长的世界历史中，这是一件必须即时办理的事情。”

罗斯福能够做什么呢？他深知形势已十万火急，但政治上的阻碍却似乎是难以逾越的。参议员沃尔什的法案规定，总统只在海军部证明驱逐舰对美国国防不再有用的条件下才能向英国提供。但是最近海军官员的检验，证明这批驱逐舰还具有潜在的价值，国会为了减轻对纳税者的负担不愿意把它们当废铁转让。事情很清楚，沃尔什、惠勒、奈等一伙正等待机会要向他发起进攻了。对付他们，还得有一项特殊的立法才行。总统一度考虑这样的办法，他打算把这些驱逐舰卖给加拿大，条件是加拿大必须把军舰用来防御美洲这一半球，这样，加拿大的驱逐舰就可以供英国海防之用。但这个不甚高明的花招，还是放弃了。

最后不是总统、而是内阁的一个小宗派使这个僵局得以打破。史汀生、诺克斯、伊克斯等人坚持要采取行动。在8月2日的一次内阁会议上，诺克斯声称英国的处境比以前更加紧迫，他提出了一个私下早已流传的建议，即用驱逐舰去换取英国在美洲的军事基地。这个建议得到内阁的广泛支持。至于是否应当找威尔基商量的问题，内阁的意见存在着分歧。但罗斯福决心要取得他的支持。总统估计，此举既然需要通过立法程序，把威尔基拉进来，就可以争取共和党人在国会的支持。

总统在内阁会议上直接打电话给威廉·艾伦·怀特，让他找威尔基谈一谈。怀特十分乐观，因为那位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不是早就鼓动要全力支援英国吗？但等到怀特在科罗拉多州会见威尔基时，他才了解到威尔基只是个人名义赞助向英国提供驱逐舰的立法，但是不愿公开表示支持。威尔基的难处在于，共和党内的孤立主义分子（其中包括众议院的共和党领袖、现任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约瑟夫·马丁）在国会里有强大势力，他不敢开罪这伙人。

“我知道你们两位对于这个需要解决的问题不存在一丝半点的分歧”，怀特8月11日给总统回电说，“但说来可笑，关于你们的事，我却不能担保任何一方，因为我对你们两位，都是同样敬佩的。”

但是，现在罗斯福的处境极其窘迫，因为接到威尔基的拒绝时，不列颠之战正在英国东南部展开。8月8日，德国出动了二百架斯图卡式俯冲轰炸机和梅塞施米特式战斗机袭击英国的被护航的船队。四天以后，出现更多的飞机轰炸雷达站和飞机场。此后，轰炸更加频繁。13日，一千四百架纳粹飞机布满英国上空，两天后增至一千八百架，第三天则为一千七百架，这就是纳粹所谓的“神鹰攻势”，企图一举粉碎英国皇家空军，从而揭开全面入侵英国的序幕。

总统面对着进退两难的困境。他这个人对在政治斗争中被人逼得走投无路最为痛恨。美国人民听到电台评论员报道英国遭受的苦难，从照片上看到伦敦陷于一片火海，妇女孩子蜷缩在地铁里，全国上下都对英国抱以同情。怀特主办的“援助盟国以保卫美国委员会”，已发展为拥有六百个分会的庞大组织，它们就驱逐舰一事大肆宣传鼓动；几百万人在请愿书上签名；年迈多病的潘兴将军也出来呼吁，要求政府采取行动，以免失之过晚；报刊也敦促总统必须采取某种行动。

然而，这些巨大的呼声却刺痛了孤立主义者，他们的发言变得更为恶毒了。《芝加哥论坛报》提出警告说，把驱逐舰卖给一个交战国，这就是一种战争行为。就全国舆论而言，孤立主义者在整个国家毕竟不占多数，但它们如同以往一样，在国会山却有巩固的势力。当布利特大使发出警告说，英国一旦瓦解，希特勒就会转而进攻美国。参议员指责他的发言是一个“亿万富翁、新政战争贩子”的“类似叛国”的行为。罗斯福明白，驱逐舰议案要在国会获得通过，好则拖延几周，坏则遭到否决。这样就会对英国的士气以及进一步提供美援的希望造成可怕的影响。

更坏的是，国会正在为义务兵役制这个有争议的问题争执不休。提案人

是共和党众议员詹姆斯·W·沃兹沃思和内布拉斯加州的民主党参议员、现已成为坚定的反新政分子伯克。这项提案受到国防部长史汀生的大加声援，因为他正急着要为他新编的陆军师招兵买马。总统一直没有过问这一提案，直到8月2日，在史汀生等人的压力下，他才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非正式地表示支持“选征兵役训练案”。他的讲话在国会山又导致了一次轩然大波。“母亲请愿团”纷纷涌向国会议员的办公处，宗教和劳工领袖提出抗议，参议员惠勒叫嚣着一项征兵提案对希特勒来说，将是一次“最大的、最廉价的胜利”，甚至诺里斯也说，“这样下去，最后必然会变为独裁。”

事情的结果是，到8月中旬，总统的征兵案已提交国会，但被搁置，而从英国又传来了可怕的消息。总统考虑要提出一项驱逐舰议案，但他知道，即使国会得以通过，以为时太晚。他想利用过去曾经十分奏效的个人影响作最后一分钟的努力；他写了一封言词诚恳的长信给沃尔。他想驳斥沃尔什的一些论点如说“派遣驱舰就是战争行为”，“美国人认为要保证充当已经投降的法国以及英国的救星已来不及”，“希特勒会进行报复”等等。罗斯福说，现在不是妄谈一般性政治的时候。但是他却无法使这位马萨诸塞州的参议员被打动。

怎么办？几位普通公民在这危急时刻插手过问了。8月11日的《纽约时报》刊登了一封基调审慎的长信，说明在当前的立法条件下如何能够出售驱逐舰。来信的签名者是查尔斯·C·伯林厄姆、迪安·艾奇逊以及另外两位著名的律师。关于绕开国会来处理问题的办法，罗斯福自己也曾考虑过，但是，这种具有权威性的支持则对扩大舆论影响大为有利，为总统今后采取行动创造条件。沃尔什的顽固反对使总统最后下定决心按自己的主张采取行动。

但现在又出现了一种新的困难。丘吉尔原来一直准备宣布将英国在美洲的海军基地租借给美国，以此作为英国一方的自愿行动，不与驱逐舰的处理混为一谈。他对此解释道，把这两件事拴在一起想一揽子加以解决，这就容易成为一种商业交易，而人们就会开始计算金钱价值。颇具城府的英国首相也无疑地考虑到英国人会认为他们在交易中吃了大亏。罗斯福的看法恰好相反。从法律上说，他只能把移交驱逐舰给英国的做法，当作改进美国防务安排措施的一部分；从政治方面来说，他只有把这一项措施当成一笔美国式的公平合理的交易提出来，才能赢得人们普遍的支持，这样，他们就会说（按罗斯福以后的说法）：“我的上帝，白宫那位老荷兰佬、苏格兰佬作成了一笔好交易了！”

问题一度形成僵局，几乎显得不可商量。幸好国务院顾问格林·哈克沃思想出一个主意，把基地分成两部分来处理：一部分是百慕大群岛和纽芬兰的基地，直接作为英国的礼物租借给美国，其余的基地就用来与驱逐舰交换。这个妥协方案，罗斯福欣然接受，丘吉尔也勉强同意了。9月3日，所有法律上和外交上的阻碍都得到克服以后，罗斯福宣布了这项交易。

这一举动总算是及时的。不列颠之战8月底已开始向高潮发展，战斗日趋激烈。疲惫不堪、双眼布满红丝的空军战士们，迅速登机，升空迎击敌机，如果他们幸存，次日又腾空作战。纳粹遭受严重损失，但战斗形势对英国的战斗机司令部正转为不利。8月24日以后，接连两个星期，英国上千名空军驾驶员中，死亡和负重伤的几乎达到四分之一。飞机场满是弹坑，飞机制造厂也都被严重破坏。几百艘满载德国士兵的驳船，正沿着欧洲海岸向法国北部各港口逼进。9月3日，德军司令部宣布了入侵英国的作战日程。

但是执行“海狮”作战计划的最后命令始终没有被公布。柏林遭到轰炸，希特勒盛怒之下，把他的空中攻势集中到伦敦，企图让他的被打得一塌糊涂的战斗司令部松一口气。自此以后，德国空军再也不能保持它的制空权了。9月12日，德国海军首脑提醒元首说，英国舰队仍然保持着对英吉利海峡的控制权。发动入侵的日期一拖再拖，直到10月12日，希特勒只好把他的“海狮”计划束之高阁，等待来春。

至于那五十艘年势已高的驱逐舰在德国作出推迟侵略的决定中究竟起了什么作用，这个问题无法解答；当然它在纳粹对形势的全面估计中是一个次要的因素；但这一因素却正好发生在“海狮”计划悬而未决的时刻。甚至更重要的是关于驱逐舰的交易明确地标志着美国的中立宣告结束，现在已处于“有限战争”的状态。这一交易使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大为震惊，并迫使他们在考虑其全球战略时不得不更加认真地对待美国。9月稍晚的时候，这两个独裁者针对驱逐舰交易采取了相应的步骤，他们欢迎日本参加一项“三国条约”，希望这一行动将使美国被日本牵制住，使美国无暇顾及欧洲；同时也会使美国孤立主义分子的力量加强。

驱逐舰交易还使美国对于援助英国作出决定性的承诺。这意味着今后还要继续给予更多的军事援助，而美国也确实这么做了。“从此以后，”丘吉尔在下院里说，在某些事务中，为了共同的利益，“英国和美国已是有点难解难分地结合在一起了。”他又说：“对于这个发展过程，我并不感到担心，即便我要加以阻止，也不可能。谁也无法加以阻止。就象密西西比

河一样，它向前奔流，谁能阻挡它呢？那么，就让它向前奔流吧，让它不停地流吧——让他浩浩荡荡，一往无前，无所能挡，而又为人民造福，向着更广阔的天地，更美好的未来奔去。”

对于罗斯福本人来说，驱逐舰交易是一场巨大的政治冒险。他告诉朋友们说，他会因为这个问题而失去竞选。更有甚者，万一英国沦陷，纳粹控制了英国舰队，总统就会成为共和党人的理想的指责对象，因为到那时，五十艘驱逐舰就会被用来袭击它们的原来的主人了。当然，罗斯福事先曾得到丘吉尔的保证，驱逐舰决不会落入德国人手中。但是，谁能保证一个战败国的政府为了求和，究竟会采取什么行动？可是，罗斯福不但行动果敢，而且是敢于撇开国会为所欲为。

“国会在这件事上可要闹得天昏地暗了，”总统起草协定的时候对格鲁斯·塔利说，但他认为如果拖延事情，则会造成致命的错误。果然不出他的所料，国会怒火万丈，《圣路易邮报》在各主要报纸上刊登了一则宣传广告：“罗斯福先生今天已采取了战争行动。他也成了美国的第一个独裁者。……在历史上所有受骗的不动产交易中，这是最大的败笔。……”威尔基对交易本身表示赞同，只是反对躲开国会的做法，不久他就谴责这是“美国历史上历届总统中最独裁、最专横的做法”。

这就是罗斯福面临的全部问题，而当时距离大选只有两个月了。大部分选民支持他所达成的交易，但是，不论他在这笔交易中有什么收获，都会因为人们对他实现交易的方式方法产生反感而一笔勾销。罗斯福事先就知道他越过国会的做法只会加深人民对总统实行独裁的恐惧心理，这种心理多年来一直折磨着他。但他终于大胆地放手干了，并且担当了责任，担当了风险。总统在白宫的政治生涯中，特别是在他的第二届任期内，曾作过不少妥协，也许有过怯懦的行为。但他在1940年9月3日的作为却大大弥补了过去的缺憾。多年来，他一直在退避和躲闪，如果狐狸一般，现在却要摆出狮子的威风了。

丘吉尔一直期待总统对历史作出贡献，他的期望没有落空；但对罗斯福来说，却要等到大选日才能见成败。

两星期的闪电战

到9月末，竞选运动已开始罩上一层丑恶、不祥的色彩。当威尔基驱车穿过一些工业区时，他听到工人们对他的讥笑和诘问，看见他们向人行道吐口水并背过身去。在商业和金融区，人们向他身上抛撒五颜六色纸屑；而一旦他出现在肮脏的工厂区，水果、石子、鸡蛋和灯泡不断扔向

他。到处流传着有关他的德国祖籍的闲言碎语，说他的家乡贴着许多诅咒黑人的标语如“黑鬼，决不让你活到太阳落山！”等等。罗斯福当然也不能幸免。除了老套的诽谤以外，又增添了新的、别出心裁的诬蔑，传单上指控罗斯福家族因一人当上总统而全家获得了几百万美元的不义之财。埃利奥特·罗斯福被授军衔的消息传了出去，人们举着巨型标语牌游行，上面写着：“爸爸，我要当海军上校。”

费城的广告牌上贴着这样危言耸听的口号：“拯救你们的教会！”“独裁者仇恨宗教！”“干脆投共和党的票吧！”

总统仍没有开始竞选。9月中旬，他的确对汽车司机工会全会发表了一篇公认是政治性演说，但他却对如何保卫和平以及扩大新政的福利事业大谈特谈，结果甚至听众也不知道竞选运动已经开始了。而且，他还为新建的学校主持落成典礼，为庆祝利夫·埃里克森和哥伦布节日发表贺词，但在所有这些场合，他都仍然以国家元首和三军统帅的身分出席。

在这段时期，威尔基却不顺利。这个大个子，头发和以前相比更加蓬乱，声音更为嘶哑，但仍然吸引大批听众。他的困难是找不到一个可以取胜的政治立场，使他可以击败他的那个难以猜度的政敌。开始时，他抓住新政的两个方面予以猛烈抨击：一是就业，一是国防。他在这些方面有充分事实根据：失业率仍然很高；至于国防措施，罗斯福不是走在舆论的前面，而是落在后面；他墨守陈旧的行政领导习惯，没有建立一个统一的重整军备的组织。但当时就这几点来指控罗斯福是不合时宜的。因为战争使军火生产欣欣向荣：当威尔基在西北部发表演说的时候，大批工人回到飞机工厂和木材场工作；当他在匹兹堡发言时，钢铁厂正为新的订货单而紧张地开工。而罗斯福则成为一位催人振奋的三军统帅的象征。报纸和杂志上几乎每天都登有以大炮、坦克和军舰作为背景总统相片。

反对三届连任的理由似乎也不起作用了。威尔基认为把罗斯福看作国家不可缺少的人物是一种大失人心的论调，因而就此大作文章，予以抨击；但他这样做也仍然不能将他的敌人制服。民主党人对总统的意图了然于胸，因此对威尔基提出的问题不予理睬。而且9月间，国外的事态发展也帮助维持了一种局势紧急的气氛，在这种氛围中，选民们可能认为总统三次连任是可以接受的。不列颠之战仍在激烈进行；日本军队开进了印度支那；意大利正准备攻打希腊。

这位共和党挑战者还面临着他自己阵营内部的不同意见。威尔基夸耀自己获得党外人士的支持，主要依赖临时出现的几千个威尔基俱乐部，而

把共和党看成是一个同盟的但有点异己的力量，因此他一开始就把党内一些专管组织工作的人给得罪了。更糟的是，威尔基接受了新政的实质内容，而在某些问题上，比罗斯福有更进一步的国际主义立场。这就使党内某些负责组织工作的人抱怨说，威尔基不过是一个对对方论调予以附和的候选人罢了。他们拿民意测验来证明威尔基的这一套毫无魄力的竞选方法不起任何作用。

罗斯福本人促使威尔基决定重新估价他的竞选策略。在竞选运动开始初期，威尔基坚持以为那位“竞选三次连任的时候选人”在慕尼黑会议时期曾经同希特勒和墨索里尼通过电话，出卖了捷克。这话刺痛了罗斯福，因此，他在10月初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拿出一份《纽约时报》，上面登载的罗马发来的电讯说，轴心国希望罗斯福竞选失败。对此他不加评论，只是意味深长地对记者们说：“我不过摘引报刊的话给你们听听罢了。”

9月底，威尔基改变了策略。按他的说法，罗斯福如今不是一个绥靖主义者，而成了一名战争贩子。“他许下的我们的孩子不参加外国战争的诺言，就象他保证财政收支平衡的诺言一样，都是不算话的，”威尔基宣布说，他的语调现在变得象低音号一样低沉平板：“我们的孩子现在已经快要登上运输舰了。”威尔基感到他最后找到了一个可以制胜的题目，于是越来越走向极端，说话越来越过火了。

总统由于9月中旬通过了“选募合格兵员法”，因此更易于遭受上述攻击。这个法案得到两位总统候选人的支持，但由于新兵入伍登记日定在10月16日，第一次抽签定在10月29日，距离大选日恰好一周，这就使总统特别尴尬；尽管有人暗示，慎重起见，宜将登记和抽签推迟到大选以后，罗斯福不甘示弱，仍履行了他的职责。对于他宁愿称之为“检阅”的仪式，他发挥了象征性的和实际的领导作用。他在登记日向全国发表了漂亮的演说，并庄严地主持了第一次抽签仪式，监督人们从金鱼缸中抽出签条。

到10月中旬，威尔基指控罗斯福是战争贩子的叫嚣已经在民主党内部引起惊恐不安。这是一个重大的、激烈的、不可预测的问题。对战争产生的恐惧心理具有歇斯底里情绪，它已蔓延到整个竞选运动。特别是因为一些德籍或意籍美国人对于政府的不满，这种心理变得坚不可摧。共和党的演说家们提醒意籍美国人不要忘记罗斯福曾说过意大利“背后捅了一刀”的话，弗林送来了关于布朗克斯意大利人聚居区的让人不安的报告，而中西部的德国人也可能将平衡的局面打破；有关“爱尔兰籍”孤立主义者的选票的种种流言蜚语也在白宫传开了；在马萨诸塞州，参议员沃尔什

坚持他的孤立主义和反罗斯福的纲领来竞选连任。

新闻界反对罗斯福的情绪甚至比 1936 年更加激烈。罗斯福的一些老朋友，如罗伊·霍华德、《时代》、《生活》、《幸福》杂志的老板亨利·卢斯和《纽约每日新闻》的约·帕特森现在都公开反对三次连任，其实，罗斯福早已不把这些出版商看作自己的朋友了，但使他感到惊讶的却是《纽约时报》竟然也对威尔基公开表示支持。他在给约瑟夫·丹尼尔的信中，不屑地把《时报》编辑们说成不过是一批“自我标榜的学者”，但他感到痛心的是，这张对于东部无党派选民具有吸引力的报纸竟将立场改变了。

最令人不快的是民意测验结果。9 月间，测验表明罗斯福不太费力地领先于威尔基。然而，这些票数使罗斯福既感到高兴而又感到不安。他担心最后的投票数会表明威尔基赶上来了，给人的感觉就象赛马快到终线时，对手可能抢了先。罗斯福甚至向伊克斯推测说，如果美国民意测验研究所所长乔治·盖洛普存有出卖的心思的话，现在是他的最好的时机；盖洛普完全可以故意在票数问题上捣鬼，使民主党吃亏，而他自己可以把他的机构卖得一大笔钱。罗斯福对盖洛普的估计是错误的，但他不幸将投票结果的预测言中。由于威尔基关于战争贩子的叫嚷起了作用，加上不列颠之战暂时出现缓和，以及其他种种原因，10 月民意测验结果显示：威尔基的票数迅速追上罗斯福并取得领先地位。

这个变化完全足以引起罗斯福阵营阵角大乱。接连几个星期，信件和电报潮水般地涌到白宫，敦促总统挺身而出战斗。后来信件的浪潮风起云涌。全党同声向他大声呼救。伊克斯频繁地来到白宫，力劝总统赶紧采取行动，否则将要遭受失败。罗斯福对威尔基的竞选活动深感愤怒，终于在 10 月 18 日宣布他要公开予以反击，用五次演说来回答那个共和党人“有意歪曲的事实”。他传出话说，他的副手们可以磨拳擦掌找威尔基算帐。

“我要大干一场了，”罗斯福对伊克斯说。

“我就喜欢你大干一场，总统先生，”这位老勇士回答说。

大选前两周，竞选活动达到高潮，罗斯福机智地审察形势，给自己士气低落的营垒强有力的鼓舞，准确地看出敌人的弱点，狠狠地加以打击，在这些方面，他比任何一位指挥作战的司令官都更高明。而且，任何一位指挥官也不象他那样十分满意自己的工作。因为，对于罗斯福来说，特别值得庆幸的是，四年来一直用诽谤和攻击来损害他的各式各样的反动分子、孤立主义分子、故意阻挠议案通过者、厚颜无耻的劳工派和左翼分子等等，现在都象一群乌合之众纠集在一名候选人的旗帜之下，这位候选人，在罗斯福看来，

已将自己的灵魂出卖给他自己党内那些最坏的家伙了。

罗斯福渴望巡游全国各地作政治演说；但同时他必须谨慎行事。他用尽一切力量要确保他作为三军统帅这一象征性角色。他曾说过他决不到距离华盛顿超出十二小时旅程的地方，以防发生意外时需要他归来；不论什么地方盛邀他亲自露面，他决不改变既定方针。根据保密局禁止总统乘坐飞机的规定，总统只能去东北部几个地方进行竞选演说。罗斯福设法想乘汽车旅行，既可视察国防，又可进行竞选。但他也知道，通过无线电广播，他的声音可以传遍全国，这是他可以利用的最有力武器。利用电台尤其迫切需要，因为共和党在报界占有优势；而且这一工具特别合适，因为在扩音器前，威尔基的嗓音嘶哑刺耳，不能获得任何打动人心的效果。

10月23日晚上，罗斯福在费城开始竞选了。他宣布要用事实去回击种种歪曲，他宣称自己是一个“竞选老手”，“十分好斗”。他的话引起广大群众哄堂大笑。

在场的记者一致认为这位竞选行家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精神抖擞。他时而态度亲切，时而语带嘲讽，时而怨恨狡诈，时而挖苦愤怒，时而庄重严肃。他有时瞠目故作惊愕，有时则摇头摆脑放声大笑。“他真是集巴里莫尔演员世家之大成了！”一个记者惊叹地说。

他不慌不忙，斟字酌句地反驳威尔基关于秘密谅解的歪曲。

“我向你们，向我们国家的全体人民作出最庄严的保证：我们根本没有同任何其他政府，或者世界其他地方的任何国家通过任何直接或间接的形式签订任何秘密条约，承担任何秘密义务，作出任何秘密许诺，达成任何秘密谅解，以致把这个国家拖进任何战争或是为了实现任何其他目的”。

在共和党指责他的这届政府没有解决一个失业者的就业问题上，他予以反击说：

“我声明那些说法都是瞎话。我宣称，所有就业数字、生产数字、收入数字、全部商业活动数字都证明：那些说法都是编造的。

“在这次竞选中，共和党的领袖们为男女工人们流泪——流的是鳄鱼泪。正是他们在1932年曾有机会向劳工证明他们的爱，可是当时他们却没有这样做。

“早在1932年，如果工人失业，那些领袖们则宁愿让他们挨饿。

“早在1932年，他们不同意由工会代表劳方集体进行劳资谈判。

“早在1932年，他们出动大批军警和坦克来回答长期失业的工人们提出的要求。

“早在 1932 年，他们一想到要给劳工规定一个最低资度工或最大限度工时，就觉得恐怖，极力反对；他们根本不考虑失业工人的年老退休金或保险。

“八年以后，到了 1940 年，他们唱的又是另一种调子！这是通过大选之日讲坛上的共鸣板扬出洪亮的声音！它有弦外之音，它对你们说的其实是：‘投我们的票吧，投我们的票吧，投我们的票吧！’”

在谈到恢复经济的问题时，罗斯福援引《纽约时报》金融栏的材料来反驳它的社论论点。他以嘲弄的口吻反问：“《纽约时报》的撰写社论的人能够和他们自己编辑部的商业问题专家相识，那不是很好吗？”

五天以后的一个晚上，罗斯福出现在麦迪逊广场花园的讲台上。他在白天曾接连十四小时驱车走遍纽约市内大街小巷，与不下两百万听众见了面。他攻击共和党领袖“用国防作政治赌注”。他的抨击是合时宜的；因为意大利刚刚侵占了希腊。白天，总统几次中断他在街头的竞选活动，打电话给国务院。在麦迪逊广场花园发表演说时，他没有提到“背后捅了一刀”的话，只是对意大利和希腊两国人民深表同情。他演说的多数内容都是针对胡佛、塔夫脱、麦克纳利、范登堡等共和党领袖的。这些人过去反对他的国防措施，而现在又指责他的政府对武装部队供给不足，对此，罗斯福进行了猛烈的抨击。

“可是，他们现在作了一百八十度的大改变，”罗斯福说，语调充满了冷嘲热讽。“其中的玄妙，我想，大概与选举不无关系吧？”

罗森曼和舍伍德在起草这篇演说稿的时候，凭一时灵感，写进了“马丁、巴顿、费希”这个富于节奏而又意义双关的短语。他们把写有这个短语的草稿交给罗斯福，看他是否能领会其中节奏。他能领会：他反复将此处念了几遍，两眼闪闪发亮，配合节奏，摆动手指，表示他将如何使它达到更好的讽刺效果。顿时，麦迪逊广场花园爆发出阵阵哄笑，接着大家也跟着罗斯福一起重复念着这个短语。

上述马丁、巴顿、费希三人是威尔基最不中用的伙伴，他们遭受罗斯福的这番奚落，感到恼羞成怒。随着竞选运动进入新高潮，敌对情绪日益激烈，威尔基攻击对手的基调也越提越高了。10月30日，即罗斯福主持选募合格兵员抽签仪式的第二天，威尔基大声指责罗斯福一贯是个不讲信用、出尔反尔的人，如果选他为总统，不到半年，美国就会被拖进战争。

威尔基大放厥词的当天，罗斯福正在赴波士顿途中。这时民主党领袖们更加惊恐万状；盖洛普民意测验表明，从全国范围看来，威尔基已几乎

和罗斯福不相上下了，而在纽约州以及其他主要的州，则已超过罗斯福。罗斯福赴波士顿途中，每次停车在车后平台发表竞选演说时，总不断收到弗林等人的电报，催促他反击威尔基的攻讦。事实上，总统在整个竞选运动中对于实质问题已作了很大的让步，历次演说都重申他热爱和平与中立，以及他一贯重视国防的立场；而不再着重阐述他认为是至关重要的政策，即不怕冒战争的危险也要支援英国。但是，当他坐在他个人车辆里的一张低靠背椅子上时，霍普金斯递给他弗林拍来的电报，要他一定再次作出保证，不让美国人去参加国外战争。

“可是，他们究竟要我说多少遍呢？”罗斯福问道。“民主党的施政纲领里已经谈过这点，而且我也把它重复过一百次了。”

“事情很简单，”舍伍德说，“你必须再说一次——一而再，再而三地说。”

总统很喜欢舍伍德的这句话。不久，讲稿起草人在写到“你们的孩子决不会被送到国外去打仗”这句话时就犹豫起来了。过去罗斯福在讲话中总加上“除非一旦受到了攻击”这样的措词；就在那次芝加哥党代表大会上，他确实坚持要加上这样一个限制条件，以免不留余地，尽管他当时愿意在对外政策的要点方面作出其他让步。但这次他却不想加上这个附带条件了。罗森曼问他原因何在。

罗斯福板着面孔，神情严肃。他在威尔基的猛烈攻击下必须让步，只是他不愿表示承认。

“没有必要，”他简短地答了一句。“如果我们遭到袭击，那就不再是一场国外战争了。”

在抵达波士顿的当晚，罗斯福面对混乱嘈杂的群众，列举了“马丁、巴顿、费希”投票反对新政的记录，并把这个记录同共和党为拉票而向选民“大灌米汤”的作法相对比。他通过电台广播呼吁西部的农业选民，他反问：象马丁这个一度被威尔基描绘成“美国公共生活中的最优秀”的代表，一旦被共和党捧出来当农业部长，那将意味着什么？而对“美国千千万万的父母们”，罗斯福作出保证：

“你们的孩子决不会被送到国外去打仗。”（这句话以后被成千上万的孤立主义派演说家不断引用，加以讥讽。）

“这样的话，我以前曾经说过，但是我还要一而再、再而三地说。”

现在，罗斯福又面临一个新的威胁。两天以后的一个晚上，他在布鲁克林发表竞选演说时作出还击。原来，几天以前，共和党人大获全胜，因为约翰·L·刘易斯不但出来公开支持威尔基，并且宣布，如果罗斯福获胜，

他将辞去产联主席职务。这位满头黑发的原矿工头大声疾呼说，罗斯福的唯一动机和目的就是战争。他断言罗斯福一旦胜出，就等于对他自己投了不信任票。他终于能够和他所痛恨的那位圆滑的对手兵戎相见，进行搏斗了。但是他的这种做法却正好为总统所利用，因为当时共产党人也正在歇斯底里地攻击政府当局，罗斯福瞄准时机，狠狠地给予回击。

“现在有一个不祥之兆，”他在布鲁克林说，“国内的极端反动分子和极端激进分子已在共和党的内部结为一体了。”

“他们之间不存在可以互相结合的共同基础——这一点我们是知道的——如果说有共同基础的话，那只能是他们对权力的共同需求，以及他们对正常民主程序的没有耐心，他们都想在一夜间达到各自与民主政治相背的独裁目的。”演讲快结束时，罗斯福引用了费城一位共和党领袖的话：“总统唯一的支持者只是一些穷光蛋，就是那些收入不到一千二百美元或者连这个数学也不配挣的穷鬼，此外当然还有罗斯福家族。”

“好一个‘一千二百美元也不配挣的穷光蛋’！”罗斯福提高嗓门怒斥道。“这句话道破了共和党领导阶层的居心所在，而且这话却又是在耶稣纪元的年月里说的啊！”

“蔓延于共党党内的这种普遍情绪就是要直接挑起阶级仇恨和阶级蔑视，其用心十分恶毒，而且是反爱国主义的——对此，共和党的领袖们能够予以否认吗？”

“朋友们，我目前全力以赴与之斗争的就是他们的这种作法。……”

当白宫迅速采取行动，动员刘易斯管辖的各地区领袖们反对他们的矿工头目的时候，罗斯福在克利夫兰以他惯用的高昂调子结束了他的竞选活动。在克利夫兰发表的演说可能是他所撰写的讲稿中最艰难的一篇。直到发表演说的前夕，罗森曼和舍伍德才获得机会动笔，而两人已是心力交瘁了。两人在竞选火车上彻夜奋笔疾书，偶尔偷闲打个盹儿，他们的床上洒满了烤面包碎屑和乳酪块。到次日中午讲稿完成时，舍伍德惊讶地目睹总统面容的变化——眼睛下面出现黑圈，脸色灰暗，下颚松弛地低垂。这天早晨，总统一直出现在车后平台上，向群众致意，频繁握手；车到布法罗站时，他感到有必要对听众说，“你们的总统向你们保证，美国决不参加战争。”罗斯福这时已经精疲力竭了。

午餐席上，总统又谈起了在座者已听过多少遍的关于缅因河上捕虾人的拖沓无味的故事。舍伍德亲眼看见总统恢复了充沛的精力。不久，罗斯福便开玩笑地问道：“你们这三个刀斧手把我的讲稿弄得怎样了？”连接六

个小时，他一直对讲稿进行润饰加工，中途他曾停笔，戴上腿部支撑，由沃森“老爹”搀扶着走到车后平台上。当时车上一片嘈杂和混乱；列车在滂沱大雨中徐徐前进，车轮辘辘，富于节奏；来访的政客们絮絮叨叨纠缠不休；罗斯福和他的顾问们已经身心疲倦。而正是在这种条件下，他终于写成了一篇十分出色的演说。那天晚上，当罗斯福站在宏伟的礼堂里，出现四万名男女听众面前时，人们发自内心地向他欢呼。他在演说开始时，语调平静，但到结尾处他的话充满激情，具有个人的独特风格：

“这几年我们的民主事业在许多战线上取得了进展。我很荣幸在这段时期里成为你们的总统，这是我的最大的荣誉。任何有抱负的人也很难再有比这更高的奢望了。

“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有些任务在肩，昼夜不容懈怠。

“从头到尾，在我的心里有两个想法占据主导，这就是保障我们祖国大地的和平，使民主势力为美国的普通人民造福。

“七年以前，我依靠忠心耿耿的助手，依靠千千万万普通美国人的信任、忠诚和支持开始了我的总统事业。

“我们的道路是艰难的，我们是在黑暗中摸索前进，但我们终于稳步走上了康庄大道，光明就在不远处。

“只要我们遵循我们的民主信念所制订的路线和方向，我们的生活道路现在看来就更加明朗了。

“现在有一个巨大的风暴正在猛烈地袭击世界，给全世界人民造成了更大的困难。这场风暴幸好不是发生在我们这块土地上，这个事实本身正好说明了为什么我要忠诚地支持我们的同胞——是的，一定要忠诚地支持他们，直到我们到达那前方光明、安全的立足点。

“我们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在下届总统任期结束以前一定要达到。

“我们一定要达到目的；并且我们希望全世界也要达到这个目的。

“当下一届总统任期结束，将会有另一位总统出来，在以后的岁月里，又会出来更多的总统。我相信在未来的岁月里，‘总统’这个名词将使千千万万普通男女听起来感到莫大的鼓舞。

“我们的未来是属于我们美国人民的。

“未来的蓝图要靠我们去设计；未来的大厦要靠我们去建造。……”

未来难见分晓

竞选运动终于在充满火药味的气氛中收场。威尔基的噪音现在仍然显得暗哑，却又再一次发起进攻，声称第三届任期将会带来独裁和战争。大

选的前夕，罗斯福发表了一如既往的“不带党派色彩的”讲话，号召全体选民第二天参加投票，并帮助恢复团结的局面，然后，他引用四十年前格罗顿学校的那个古老的祷词来结束他的谈话：

“……愿上帝的恩泽为我们的祖国带来勤劳、智慧和礼仪，将我们拯救于暴力、争端和混乱之中，将傲慢、乖戾与罪恶从我们身边带走。保护我们的自由权利，把我们这个由许多不同种族、不同语言而聚居在一起的人民结成团结的整体。……”

第二天，五千万美国人——比历次多几百万人——涌向投票箱。罗斯福在海德公园投票处接见记者时，完全是一副平易近人、胸有成竹的神气。他从容不迫地摆出姿态，让记者们从各个角度拍下他的镜头。有人请他向树木挥挥手，他就说：“去爬树吗！”又说：“你们知道我是从来不向树木挥手的，除非树上有叶子。”但接着，他迎合了他们的要求，在照相机的咔嚓声中，向树木频频挥手。

当晚，他那幢俯瞰赫德森河的住宅灯火熄灭，静无声息。门廊前，那幅缀有盾牌、鹰徽和白星的总统旗在11月的微风中悠然飘荡。屋里充满了欢乐的气氛。全家大部分人都到齐了，此外还有一批至亲好友。他们三三两两地围着房内各个收音机。罗斯福坐在起居室的餐桌旁，桌上摆满大张大张的记分纸，和一排刚削好的铅笔。新闻收录机在一旁不停地响着。

起初，总统显得冷静认真。最先知道的选举结果是胜负未分。摩根索神情紧张，大惊小怪地闯进闯出。突然，总统的保镖迈克·赖利发现总统满脸大汗，原来选举结果出现了某种变化使他大为不安。这是赖利第一次看见总统手足无措。

“迈克，”罗斯福突然说，“我不想要任何人到这里见我。”

“对你全家人也这样吗，总统先生？”

“我已说过谁都不见，”罗斯福的回答很严厉。

赖利离开房间去禀告罗斯福夫人，并且阻拦摩根索第二次返身回到餐厅。客厅里，罗斯福端坐在他的图表前。他已脱去上衣，领带低垂，一件柔软的衬衫紧贴着他那宽大的双臂。新闻收录机不停地响着……

难道这就是整个结局吗？早知道会失败，还不如当初不再次竞选！所有他的私敌都聚集在一个阵营里：如大企业家威尔基，民主党反叛分子艾尔·史密斯及其一伙，报刊发生人赫斯特和霍华德，此外象约翰·刘易斯这样的叛徒，国会里的阻挠议案通过者，孤立主义分子和共产党，等等。这些人现在结成光怪陆离的一伙与他为敌。这个奇怪的联盟最后会把他打倒

吗？会由这帮人来写他在历史上的墓志铭吗？，会说他是一个为自由人民所不耻的、争权夺利的独裁者吗？

在霍博肯和圣路易斯，在米德尔城和南卡罗来纳州一所十字路口的学校里，正在计算选票，数字通过电话报告给，然后又通过有线电报与其他数字汇总，迅速地传送到州的首府，至此，数字再次汇总扩大，最后，由小型发送机唱读出来。这些黑色的数字表明总统暂时处于优势——从“百日”开始到驱逐舰交易，从社会保险措施到选募合格兵员法的颁布，总统敢作敢当的作风，直言不讳的谈吐，当机立断的果敢，伟大的建树都压在有利于总统一方的天平上；天平的另一端，也摆着他的种种过失，如他的妥协与逃避，他的秘密交易与幕后操纵，他未能实现的希望与停留在口头的许诺。

一缕青烟从那长长的烟嘴上袅袅升起。海德公园的选票结果还没有送来，但很可能对他不利。他好象从来都没有真正与海德公园分开过似的。他总感到自己身心有一部分是与那宁静的庄园、勤劳的农工、圣詹姆斯教堂、田野上的树木、潺潺的小河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他始终也没有完全离开过他母亲的那个天地，而这时他的母亲正和一些朋友坐在另一间房里。可是，他却始终没有在政治上争取到这个天地里的人们。

自动收报机吐出一连串黑色小字码，不但使罗斯福而且使整个新政经受着考验。这些无情的数字意味着对许多重大事件的一次总结——1933年的战斗号召，1935年酷热的夏天，穿越全国的长途旅行，关于最高法院的斗争，清党，对德意独裁者的呼吁，全国重整军备。美国的整个一代思想也受到了考验。新泽西州的八十个选区正在报告投票结果。那些住在纽瓦克贫民窟和泽西居民区的选民，不知会根据他们自己的信条作出怎样的判断？而他们的信条当年曾使麦金莱遭受挫败，也超出了威尔逊的理解，并以某种方式揉合了十多种不同的教义和传统。

从全国各个角落，一点一滴的论断通过自动收报器正源源不断地被传过来，并排列在计票纸条上。威尔基仍然呼声很高。来自纽约的第一批投票结果令人失望。纽约是美国的真正形象，新政联盟就是建立在这里的。纽约是罗斯福的政治帝国的核心、他的特德叔叔的州，那里的华尔街有着同他一样曾在其中工作过的许多法律事务所以及坦慕尼协会的老板们。纽约——这个州在1914年让他吃了大苦头，接着又在1920年使他难堪，而在1928年，仅以微弱的多数对他表示支持，到1930年支持他的则是压倒多数了。

一段段的烟灰从他的纸烟上落到地上；门外，迈克·赖利呆若木鸡地站着。难道吉姆·法利走向埃尔克斯全国大会的旅程就此告终了吗？难道载着罗斯福从奥尔巴尼飞到 1932 年芝加哥全国大会的飞机已到达它的飞行终点了吗？难道这整个一场巨大的冒险就随着“蓝鹰”一起消失殆尽了吗？纽约市的选票结果也正传送过来。在这次奇怪的选举中，甚至纽约市也变得不可靠了。那些从新政得到好处并且一直支持新政的城市群众如意大利人、犹太人、黑人、德国人、爱尔兰人，如今又会持什么态度呢？但是新政如今已不新了。由于希特勒改变了世界的政治面貌，其他更尖锐的问题也摆在人们的面前。罗斯福得到一份报告说，在纽约市选民中，只有犹太人坚决地站在他这一边。

选票结果纷纷传来。它们填充着一个个空白，这样不出今晚，将组成一幅镶嵌图，作出了答案。归根结底，投票者不是在进行对整体的判决，不是对新政的最后总和作出判决，因为，当它的各个部分一经加减，减下者与其说是一个量，倒不如说是一种精神。那载有累累硕果的不平静的七年岁月正在受到检验；然而，与其说它们遗留下的是业绩——尽管它们的丰碑会长存下去——倒不如说它们是体现着新政精神的三十年代那些峥嵘岁月的精华：敢作敢为、中庸之道、实验方法、热心兴建平面交叉道和贫民住宅这种精神已超出了意识形态的范畴，而象征着美国本土的传统。上述这一切与其说是体现了意识形态，不如说是体现了人们的良知。而今天晚上，就是要美国人民凭借他们的良知进行判断。……

不久，整幢房子开始骚动起来。图表上的数字开始转移方向，起初是缓慢地，接着急剧地发生了变化。消息传来，支持罗斯福的势力象潮水般迅速上涨，高潮持续到深更半夜。纽约、马萨诸塞、伊利诺伊、宾夕法尼亚等大的工业州都站到总统一边。至此，罗斯福已是喜不自禁。房门打开，家属和朋友们都蜂拥地进来，带来了更多的胜利喜读。然后，举行了传统的火炬游行。游行队伍从海德公园中心点出发，一路上摄影记者的闪光灯闪个不停。最后又是总统拉家常式的谈话：“我将仍然是你们一向熟悉的那个富兰克林·罗斯福。……”

与此同时，纽约康慕多旅馆的舞厅里聚集着几千名威尔基支持者，眉飞色舞地等候庆祝胜利。在一段时间里，大家欢欣鼓舞；接着，让人扫兴的消息不断传来，客人们陆陆续续地悄然退场，最后只剩下一伙神情沮丧的威尔基支持者。这位总统候选人晚间发表了一次简短的谈话，声音沙哑地喊道：“不要害怕，决不退场。”直到第二天，他才给罗斯福发去了贺电。

选举的最后结果表明罗斯福获得了最后的胜利。他所获的选票为 27, 243, 466 票对 22, 304, 755 票；选举人票为 449 票对 82 票。威尔基除在缅因、佛蒙特及六个农业州中获胜外，仅赢得印第安纳、密执安两州。而罗斯福除辛辛那提一个城市外，却在所有超过四十万人口的城市取得了胜利。另一方面，威尔基赢得的票数却比兰登 1936 年赢得的票数多 5, 000, 000 票；而罗斯福的超过票数与 1916 年以来历届总统相比，却是最少的。他在纽约州的超过票数——约 225, 000 票——是他从 1928 年竞选州长险遭失败以来最低的一次。

但尽管罗斯福在几乎所有的大集团中失去了若干选票，但在为数众多的、中等和中下水平收入的阶层中，他的票数只是稍有减少。他所以取得胜利，正是因为他继续获得这个阶层“群众”的有力支持。劳工阶级，包括煤矿工人，一直站在他一边。刘易斯算是白费心机，在政治舞台上，他终于完全败给罗斯福，因此他及时辞去了产联主席职务。有迹象表明，在 1940 年，阶级性投票比四年前更显得异常重要。“这个事实说来不太动听，但我还是要说，”底特律的一个汽车工会会员大选后不久对记者塞缪尔·卢贝尔说：“我们已开始有阶级意识了。”

如果说，威尔基向工人发出的关于经济问题的呼吁证明是无效的，那么他在战争问题上所造的舆论则的确夺走了罗斯福不少选票。那些亲德、亲意而反英的选民都突然转变立场反对罗斯福。犹太人、东海岸地区新英格兰人中的国际主义者以及不能忘记希特勒占领了他们“老家”的那些民族集团如波兰人和挪威人，则倾向罗斯福，因此这部分人一定程度上补偿了他所失去的选票。实际上，罗斯福在新英格兰北部地区所获票数比 1936 年有所增加，尽管数目不大。

罗斯福至少在两个方面无疑地是走运的：即欧洲的危机，以及经济复苏已经出现了最初的兴旺迹象。前者使威尔基对主要对外政策的攻击失去说服力；后者使得他攻击国内政策的重要论点——经济不景气——站不住脚。一次又一次的民意测验都清楚地表明，越是危机尖锐，倒向罗斯福的选民人数就越多。局势的紧迫看来也完全抵消了威尔基提出的关于三次连任的警告。

除了侥幸，还要归功于灵活的政治手腕。总统选择的政治时机十分合适，他的演说大部分极其睿智得体，而且对于敌人的弱点进行了最严重的打击。特别是他利用了广播这个可以和广大人民直接交流的工具，同时又利用了报刊这个威尔基自认是他最为擅长的工具，给威尔基以强烈的反

击。在利用广播方面，威尔基没有取得显著效果。尽管威尔基在报刊上得到更多好评，罗斯福却赢得更多重视；正如那句古老的政治格言所说：“名声不好总比默默无闻要好。”

归根结蒂，成败得失决定于罗斯福本人。他以军舰与大炮作为背景的竞选照片已显示出了实际效果；他作为一代人的首领的地位也同样产生了效果。他的胜利主要是他个人的胜利；民主党从1938年在众院一度失去优势之后，1940年只增加六个席位，而在参院却失去三个席位。罗斯福已开启了未来的局面，但未来对他的党，对他的政纲，对他的祖国，对他所在的世界将预示什么，谁也无法回答。

尾声 登峰造极

在罗斯福当选总统后一个月，希特勒便不顾一切地挑起世界大战。在对柏林军火工人的充满了火药味的一次演讲中，希特勒把这场世界大战描绘成一场大规模的阶级斗争。他指出：英美这些由资本家统治的富国，有几百万人失业；而在德国，人人都有工作，劳动具有至高无上的价值。“有两个世界相互对立着。……我们永远不能与那个世界取得和解。……我们可以击败世界上任何一个强国。……”

三个星期以后，罗斯福对这一挑战作出了回答，他在一次“炉边谈话”中，引述了希特勒的话之后，指出轴心国“不但承认，并且公然宣称他们的政治哲学与我们的政治哲学之间决不可能有永久的和平”。因此，罗斯福认为，侵略者如不放弃征服世界的想法，美国就不能鼓励和谈。

罗斯福说，他的这次当选是人民授命予他使美国成为一个巨大的“民主国家的军火库”。1940年最后几个星期，他慢慢地制订出作为租借法案基础的政策。根据租借法案，国会可以授权总统，在他认为如果哪个国家的国防对美国的完全来说是必要的，那么他就有权将武器装备租借给该国。丘吉尔私下曾经提醒他，英国已被削弱得奄奄一息；罗斯福对记者表示，他一心只想抛去那个“愚蠢、荒谬和古老的金元标志”。国会通过了租借法案，罗斯福终于赢得了一次立法胜利，这在组织全世界力量反抗特勒的工作中是一个里程碑。^①

至此一切顺利，甚至连孤立主义者也不得不承认：尤其在希特勒在巴

^① 我在序言中已说明了原因，这里有关世界大战的部分就从略了。“尾声”第三节中关于罗斯福性格的总结性看法，主要是以前面几章内容作为根据的。但我希望这些看法有助于了解“尾声”中所描述的事件的轮廓。——作者

尔干半岛和其他战场获得一系列辉煌胜利的时刻，这个法案是罗斯福当选时受命加快支援民主国家的行动所产生的必然结果。然而，如果形势一旦需要这个军火库不只是提供物质援助，那将会怎样呢？在大选期间，罗斯福曾被迫采取守势，把和平作为首要的题目。至于重整备，支援英国，驱逐舰交易，美洲半球的团结等问题，他都宣称是为了防止美国被迫卷入战争而采取的措施。当然，他在12月的一次“炉边谈话”中，曾经直接面对这种做法涉及的危险后果。“如果我们完全敢于说老实话，那么我们必须承认，不论我们采取任何行动都有冒险性。”但是他感到失言，迅速改口。他认为主要目的不是为了美国的安全，不是为了民主国家生存下去，也不是要毁灭纳粹主义，而是为了和平。

不久，客观形势迫使总统采取行动了。由于1941年初德国潜艇和战斗巡洋舰成群结队地出没于北大西洋一带，因此，问题的关键就是如何保证货物能够安全到达。丘吉尔送来了关于遭受重大损失的报告。直接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自然是立即派遣海军舰只护航，但是，罗斯福采取了审慎的策略——即把租借法案辩解为一个手段，可以用它来打败希特勒而又不会给美国带来严重的战争危险——结果却事与愿违，美国海军越是企图大力保护通往英国的运输线，就越有可能与德国发生直接冲突的事件。

罗斯福再一次陷入政府顾问的两种分歧意见——孤立主义者和干涉主义者两派之间的争执之中。白宫内部一度又出现了观望和改变方针的局面；罗斯福的顾问——史汀生、伊克斯等人——也重又抱怨总统放弃了领导。罗斯福应对事态的办法又是见机行事，回避躲闪。他公开下令要在目前已扩大的安全地带加强海军巡逻；暗中又发布命令，要求搜索德国舰只和飞机，并将它们的所在方位及时告诉英国部队。5月27日，工人纠察队带着反战标语牌在白宫门前来回示威，罗斯福发布了一项“全国处于无限期紧急状态”的宣言。但第二天他又冲淡了这一宣言的含义，否认他会依据新的方针采取任何积极措施。

霍普金斯说，罗斯福“宁可跟在舆论的后面亦步亦趋，而不愿意走在前面领导舆论”。这话很有道理。罗斯福对1941年民意测验地加以研究，结果，在公众舆论的综合因素中却没有涉及他本人的领导作用这一重要因素。在这方面，他和他的那位伟大的国际事务伙伴丘吉尔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丘吉尔在这年稍晚时候说“在战争时期，”“最危险的事情莫过于生活在盖洛普民意测验那种喜怒无常的气氛之中，总是不断地按脉和测量体温。……唯一的职责，唯一的安全措施就是要尽力做得正确，对你相信是

正确的事情，你就要一无反顾地去做，去说。”

作为战争首脑的罗斯福

6月22日纳粹突然进攻俄国的消息象晴天霹雳一般使华盛顿从安静的麻木状态中惊醒过来。许多美国人一时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他们一方面厌恶共产主义学说，同时又感到实际上有必要与俄国人合作共同反对纳粹主义。但是总统并不感到进退两难。当《自由》杂志的富尔顿·奥斯勒向总统送去一篇准备发表的题为“我们还要说‘让共产主义见鬼去吧’”的社论。罗斯福回信说，他认为俄国式的独裁和德国式的独裁都同样需要加以谴责，但有一点必须澄清，即目前对美国造成直接威胁的是德国。总统因此催促赶快给俄国送去支援物资，同时采取手段，事先防止有人对这种援助进行有组织的反对。

总统紧密地注意眼前的战术行动，而不大重视伟大的战略部署，因此，他和丘吉尔共同宣布的那个伟大的大西洋宪章，几乎只是7月间举行的大西洋会议的一个附属品。会议讨论的主要内容大部分都是两国事务密切相关的具体项目，如对生产、后勤、协调行动等问题以及谍报工作，都认真地加以考虑。伟大的宪章本身实际上都是匆忙间写在零星的纸上，作为消息发布的几项声明，但由于渴望获得总统领导和指示的美国人民予以接受，它便成为历史性的文献。

两国领导人共同宣示，“两国决不在领土以及其他方面寻求任何扩张，……两国尊重各国人民有权选择他们将在其管辖下生活的政府形式。……他们力图……使一切国家，不论大小、胜败，能发展通商贸易和享受全世界提供的原料。它们期望各国之间，实现最大程度上的合作，”以便得到社会完全和经济福利。“两国深信，世界各国，无论是出于精神上的原因还是现实的考虑，都必须放弃使用武力。……”

但是，仅有冠冕堂皇的词句本身是不够的。罗斯福将会采取什么行动呢？总统迟迟不采取决定性的动作——提供海军护航，下令在大西洋展开全面的海上进攻，甚至公开宣战——着实让他周围的活跃分子感到不安。但是总统仍然谨慎行事，他感到只有敌人采取了决定性行动，他才能用决定性行动给予报复。希特勒现正集中全力进攻俄国，不会对他采取决定性行动。希特勒还告诫他的海军将领们：不准制造事端，或进行挑衅。敌人没有采取公开行动，这就使总统所需要的武器——时机，即将一种局势变得戏剧化或对一次事件作出有利解释的时机。总统正是需要这样的时机以便激励人民，进而推动国会。因为，要取得立法机构的支持从来就不是容

易的。8月中旬，众院仅以一票多数，通过了延长选征兵役制一案，这至今仍使行政部门胆战心惊。

随后，1941年9月初发生了“格里尔号”驱逐舰事件，看来为罗斯福提供了所需要的时机。几个月前发布的总统命令已包含了这类事件。美国驱逐舰“格里尔号”在赴冰岛途中从英方获悉，附近发现一艘德国潜艇，便跟踪监视几小时，并定时将其位置通知英方；最后该潜艇向“格里尔号”发射两枚鱼雷，但均未命中；接着“格里尔号”投下深水炸弹，是否击中，情况不明。罗斯福马上抓住这个事件，在一次“炉边谈话”中，他指出“格里尔号”遭到袭击，至于事件的起因则只字未提。不久，罗斯福下令舰队：立刻建立全面海军护航，“发现目标立即射击”。

希特勒的海军将领们重又向元首请求，要对大西洋运输线发动全面进攻，但仍遭到拒绝。征服俄国是希特勒的目标；以后再收拾美国。但是，决定性事件却在另一个地方发生了。

在东京，1941年10月中旬，近卫文磨内阁一方面因受到有领土扩张野心的军国主义分子的反对，另一方面又因外国对日本在亚洲称霸的野心进行遏制，结果在内外交困下宣布下台，由好战的东条英机将军组织新政府。这一变化加剧了远东的僵持局面。东京方面表示愿意与华盛顿举行谈判以解决争端，但条件是美国必须接受日本策划已久的扩张计划。罗斯福和赫尔希望远东的局势稳定，但不想因此而牺牲中国，或放弃他们一贯宣扬的睦邻思想。东条和他的前任近卫不同，他的进一步扩张野心是不会拖延的。他夸口道：“一亿人民只要化为一个钢铁般的整体向前进，任何力量都不能阻挡我们。”

日本新内阁于是就玩弄两面派的招术。它继续和华盛顿举行会谈，但是会谈一旦破裂——至少象军国主义分子所希望的——便立即做出发动战争的决定。11月5日颁布作战命令并发出警告：“对荷兰、美国、英国一战不可避免。……”进攻的日期暂定于1941年12月8日。

于是，华盛顿和东京之间开始进行深入的谈判。罗斯福期望找到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权宜之计以便争取时间，而日本的谈判代表也真诚希望达成协议。但是从根本上来说，双方都坚持各自的立场，互不相让，日本一意想要扩张，美国则反对日本在东方进一步侵略。而所有的谈判都是在东条所订下的严格期限下进行的。

建议和反建议不断来往，都没有任何效果。12月初，总统已看出日本很快就要袭击了，但不知道它究竟在何处动手。华盛顿收到的情报大部

强调日本很可能出兵东南亚或南太平洋。12月6日晚，罗斯福仍在极力争取时间给日本天皇裕仁发出呼吁和警告；没知就在这个时候，日本航空母舰正驶向瓦胡岛的西北方向。

这天晚上，霍普金斯对罗斯福评论局势时指出，日本随时可能发动进攻。他惋惜美国不能首先发动进攻来防止任何突然袭击。

“不，”总统说，“我们不能那样做。我们是一个民主的国家，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但我们有一个好传统。……”

第二天（12月7日，星期日），刚过中午，罗斯福和霍普金斯才吃完午餐，电话突然响了，传来了诺克斯的声音。

“喂，是弗兰克吗？”

“总统先生，看来日本人已经进攻珍珠港了。”

“决不可能！”

投向珍珠港的炸弹，不仅粉碎了美国舰队，同时也打破了罗斯福战争政策的僵局。日本袭击珍珠港的消息传出后的最初几小时，人们在一片混乱中，只埋怨舰队缺少准备。康纳利抑止不住胸中怒气，向诺克斯一个劲地质问。另外一些人则认为总统应在他的战争咨文中详细检讨一下他的对日政策。

但总统却根本不会考虑这些。对他来说，唯一重要的事实，就是战争这一事实本身。“我们已卷入了，”他一再对他的顾问们说。第二天，他出席国会两院联席会议时严肃地要求国会宣布全国处于战争状态，他的演说中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战争状态已经存在。”关键性的行动已经发生了，因此总统不论言语或行为中都找不到任何替代说法。“战争状态已经存在”——是的，高潮只有几小时，然而它所带来的教训却是罗斯福平日的说教不能达到的。

“我想总统如释重负，感到比他这几个星期以来更加轻松，”一位阁员在走出总统书房时对另一位阁员说。珍珠港事件发生四天后，德国和意大利向美国宣战，这时，一个世界性的战线就形成了。

从总统在以后几星期中的表现看，人们也许会认为，过去的一切都是为了准备这个时刻的到来——也许正是如此。当时一位密切注视形势发展的观察家萨姆纳·韦尔斯说：罗斯福“表现了掌握和控制十分紧急的形势的高超才干，这是一位政治家最难能可贵的优点。”1933年的一切现象仿佛又重演了，但它却搬上了一个不知要大多少倍的舞台。罗斯福显得有条不紊，镇定自若，心情愉快，神态严肃，不知疲倦而又充满了信心。

现在他获得了全民的一致支持，可以运用他的非凡的才智使斗争各方都来维护一个共同的目标。工人和厂方之间的团结就是一个极好的实例。就在珍珠港事件发生的前一年，煤矿工人、造船工人、飞机发动机工人以及成千上万其他工人都举行了罢工。总统不得不把几个国防工厂抓在手里。“工会保障”是个中心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分歧如此之大，以致国家的主要调解机构难以运转。珍珠港事件发生的十天后的“热情洋溢、信心不足、轻松愉快而又显得庄重的”总统把劳资双方代表召到白宫，对他们说，如果他们能很快地在基本问题上达成一致，着手成立一个委员会制定一项关于工会安全的折衷方案，那将是一件“激动人心的事情”。后来证明这是战时政府的最具有创造性和伟大的业绩之一。

1942 年头几个月，当美国在广阔的太平洋战线上遭到惨败的时候，需要总统指挥全局，毫不动摇，日本军队吞下了关岛、威克岛和菲律宾。马来亚、缅甸、荷属东印度群岛也沦陷了。轴心国到处无情地推进：在北非，德国人把英国人赶回埃及；俄国似乎濒于瓦解；在大西洋，他们仍然使盟军遭受重大损失。日本人在阿留申群岛登陆，逼近印度边境，威胁澳大利亚。

在遭到失败、令人沮丧的那段漫长日子里，罗斯福不仅要做出意志坚强、信心百倍的样子，而且面对那些“日本第一论者”的压力，还必须坚持这个主要战略决策——即在遏制日本的同时，把主要力量用来对付德国，但“日本第一论者”却把日本视为美国唯一真正的敌人。罗斯福在沉重压力下工作，他必须在他自己的互相斗争的军事机构之间、在战区司令部之间、在国外战线和国内战线之间进行调停，同时对于俄国人和英国人的迫切的需要也要加以协调。和往常一样，比较棘手的问题被指挥系统无情地转到总统办公室；总统也象往常一样总是兴致勃勃地处理这一切，他从重大的战略问题快速地转到行政细节以及令人烦恼的人事问题；总象往常一样毫不疲倦地在那些喋喋不休的政治家、陆海军将领、议员、外交家和官僚们之间周旋。

总统也知道，他的士兵们缓慢的、十分勉强的后退是为了争取时间，以便把经济调整到高生产水平。珍珠港事件发生前的几个月，在几次改变权宜措施以后，1942 年 1 月他以战时生产机构来确立比较集中的动员指挥。1942 年主要的工作是开发与利用美国的巨大资源，同时需要坚韧不拔地克服通货膨胀，因为战争费用每天将近一亿美元。对于这项工作，罗斯福似乎又是早已训练有素。他已不需要再在两种令人痛苦的出路——开支

和预算平衡——之中作一抉择了，而对于那种抉择，他是从来没有经验的。形势已经替他作出了决定。现在他的任务就是抵挡住商人、劳工、农民制造通货膨胀的压力。多年来贯穿于他的经济思想中的信念——即平衡经济、利益协调、互利互让等观念——为他致力于实现经济稳定提供了不可或缺的背景。

就象他在和平时期不惜一切代价专心争取选举胜利而造成困难一样，罗斯福集中精神专注于当前的任务——争取军事胜利——也引起了一些难题。对霍普金斯来说这很好办，他反映他的领导的态度，对所有的政策都进行一种简单的考验：“对于赢得战争是否有利？”但是这样的一种考验往往会忽略赢得战争的更广泛的战略方面——赢得战争与保卫民主政治之间的关系。有两个事例可以说明这种窘状：

1942年初，罗斯福授权军方将西海岸的几千名美籍日本人迁走，把他们安置到内地的集中营去。对军方来说，这可谓明智的预防措施，但从长远看，这显然是同这个国家应予反对的一种主张的妥协。1942年9月，由于国会未能通过一项稳定生活费用、包括稳定农产品价格的议案，罗斯福很恼火，他简直是强令国会在三周内采取行动，而且发出警告，如果国会议员们仍不予采纳，他就要采取行动了。国会很不乐意地照办了。这是在一个为民主思想和民主作风而奋斗的国家里发生的惊人的夺权事件。

罗斯福也许会象八十年前另一位战时总统那样，为他的严厉行为进行辩护。林肯曾问道：“难道国家沦亡了，还能保住宪法吗？明智的办法是人们可以截去一枝来保全生命，而决不会为了挽救一枝而牺牲生命。”然而，民主制度下的人民往往面临这个根本的问题：什么是生命，什么是肢体？

作为和平时期领袖的罗斯福

1943年形势发生了逆转。5月，盟军把敌人赶出突尼斯。两个月后，他们进占西西里；再过两个月，攻入意大利；到1943年9月3日，意大利终于投降了。在其他地方，强大的反攻也日益猛烈。美军在瓜达尔卡纳尔岛和布纳横扫日军，在所罗门群岛、新乔治亚岛、新几内亚、塔拉瓦展开水陆两栖袭击。美英海军夺取了“大西洋战役”的胜利。而最具有决定意义的是，经过一番史诗般的围困以后，俄国人在年初迫使德国人从斯大林格勒溃退。

到1943年底，盟国的胜利基本已成定局。现在的问题不是他们是否会获胜，而是他们的胜利是否可能带来长久的和平。

这一年也是频繁举行重大国际会议的一年。战争的战略问题和战后和

平政策的问题被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来。罗斯福与丘吉尔在卡萨布兰卡、华盛顿和魁北克会晤；罗斯福、丘吉尔和蒋介石在开罗开会；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在德黑兰举行会议。在德黑兰会议上，棘手的第二战场问题终于得以解决。不久后，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将军被任命为最高统帅。

三巨头在德黑兰聚会，这是“人类历史上一次无与伦比的物质力量与政治权威的大汇合”。会前，罗斯福就对他能与斯大林建立切实可行、互相有利的个人关系充满信心。他的确做到了这点——只要谈判涉及到打败纳粹这个摆在眼前的问题。但是在关系到战后欧洲的权力模式这样的长远战略问题上，罗斯福总统由于全力观注于军事上的胜利，这使他在丘吉尔和斯大林面前处于不利的地位。不过，也许罗斯福认为，为了赢得战争和保障和平，最大的需要就是盟国实行合作这样一个可见的事实。

1943年圣诞节前夜，他在“炉边谈话”中对美国人民说：“可以说，我同斯大林元帅‘处得不错’。……并且我相信，我们今后同他和俄国人民仍会处得很好——一定很好。”他喜笑颜开地对珀金斯小姐谈，他是如何有意戏弄丘吉尔的英国派头、他的雪茄和他的习惯来打破和斯大林的冷淡局面的。

如果说罗斯福不得不以盟友的姿态同斯大林打交道，那么，他同样不得不以战斗姿态来对付希特勒。这场战斗不但包括陆海军的交锋，而且也包括意识形态。那位元首是个宣传天才，他对德国人民说，这场战争是一场人民群众反对世界上财阀统治的国家的战争。总统现在是盟国的主要宣传家，他拥有世界上四分之三的人民的赞同。他坚信，盟国为之战斗的事业的最高象征就是自由。希特勒妄图抹煞这个象征，声称除了剥削人民群众的自由外，它没有任何别的意义，罗斯福则极力强调自由是一个积极的概念，就是要拥有在战后获得和平及安全的自由。简言之，罗斯福被迫把达到战后目标的手段变成了争取胜利的手段；其后果之一就是在1943年召开的一系列“联合国”会议上开始对战后的社会和经济安排作出设计。

在这段时期里，国内战线上并不是风平浪静毫无争义的。伯恩斯、罗森曼、霍普金斯和总统的私人总管威廉·D·李海海军上将组成的“小内阁”努力消除重重障碍，解决机构之间的争端，但指挥战事却遵照总司令的一贯行政做法去处理。即使是某些“次要”的决定，他也不委派他人处理，而且他还继续使官员们和各机构互相牵制。同过去一样，结果是令人不快的。赫尔和韦尔斯之间的情绪严重对立，后者终于辞去了副国务卿的职务。在国际经济政策上，华莱士和琼斯公开地互相攻击，闹得总统最后

把两人都从这个领域调开。不过，国内关键的目标——实行动员而又不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还是实现了。

在党内和在国会内部，关于内政问题的斗争十分尖锐。珍珠港事件之后不久，罗斯福就以他特有的作风，要求在整个非常时期停止“在内政问题上的党派之争”。他甚至还建议这两个大党的全国组织转而搞民防。但是要停止党派之争何尝容易。根据不可改变的美国选举年历，1942年国会要进行中期选举。罗斯福小心地避免了威尔逊要求由民主党独占国会的错误；尽管如此，民主党还是几乎失去了对国会的控制。民主党在众议院的多数席位由91席减为14席，在参议院也丢了8席。

不变的政治年历也带来了1944年的总统选举。由于不能连任三次的惯例已被打破，总统得以避免使用1940年他在党代表大会前的迂回战术。所以，1944年7月中旬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前一周，罗斯福给民主党全国主席写了一封简单而又直率的信，说明如果“我们的总司令”——美国人民——对他下令的话，他将继续服务下去。

“我满心希望回到哈得逊河畔我的老家去，”罗斯福写道，但是，“我们这一代人正好生活在我们祖国遭到侵害之际，它的命运和我们所选择的政治制度正处于危亡时刻。”

然而，谈到副总统人选时，罗斯福又采取他以前那套做法。他不止对一个希望得到副总统职位的人半真半假地做了许诺。他不肯坦率地告知副总统华莱士，如果华莱士的提名问题使党代表大会发生分歧，他就不能给予支持，相反地他却写了一封信给华莱士说，他“个人”选中的正是华莱士。哈利·杜鲁门惊奇地发现他本人是总统正式选中的人选。这位密苏里州的参议员对罗斯福的亲信说，他愿意参加竞选，“但是总统为什么不早一些告诉我呢？”

在一件事情上，政治车轮转了一圈又回到了原处。1944年6月，罗斯福和罗森曼谈到一个他在四十年的政治生涯中曾多次考虑的问题：政党改组。“我们应该有两个真正的政党——一个自由主义的，另一个保守的”。民主党必须清除其内部的南部反动分子，而吸引共和党内的自由派。他希望罗森曼同威尔基去谈谈这个问题。此时威尔基刚被共和党正统派从竞选中排挤出来。7月初，威尔基在纽约同罗森曼举行的一次秘密会晤中，表示积极支持政党改组的主张。他愿意和总统一道来制订一个计划。但有一个问题，威尔基坚持他的立场：他要等到大选之后才能去见罗斯福。他还想在共和党内保留一定影响，他怕同总统进行合作会被人曲解为把自己

“出卖”给民主党了。

然而，罗斯福却想在大选前促成此事。他向来以为人狡猾、善于迂回著称，但这次却摔了跟斗。总统越是急于要尽早同威尔基会谈，威尔基则越是认为总统在玩弄竞选策略而非采取长远的战略行动。向报界透露关于罗斯福与威尔基间接联系的一系列新闻只会加大威尔基的怀疑。无论如何，这一切为时已晚；因为，威尔基一向随意浪费自己的精力，10月间因患冠状动脉血栓症而辞世。这一代改组政党的最好机会，也就因此而消逝了。

现在总统面临第四次竞选总统的活动——这一回他的对手是精力旺盛而又年轻的杜威。杜威在1942年曾因纽约州民主党内分歧而胜利当选为纽约州州长。罗斯福还是按照传统办法从事竞选：长途跋涉，各地巡视，在杜威大骂“疲惫不堪的老家伙”的时候，他却耐心地宣传“不要搞党派之争”。然后，在竞选的最后几个星期中，罗斯福展开一系列迅急的猛攻。第一个猛攻最具有摧毁性——在卡车司机工会发表演讲，回答共和党对“我的小狗法拉”的诽谤。一位民主党人说，从那以后，竞选运动就成了“罗斯福的狗和杜威的山羊”之间的竞争。

罗斯福以333张选举人票和大约360万张选民票的多数战胜杜威而当选新一任总统。这又一次证明了他杰出的竞选能力。这也是对他在军事上的卓越领导能力的表彰。6月，盟军势如破竹地在诺曼底登陆；夏天，美军将日本人逐出塞班岛和关岛；10月，他们在菲律宾登陆。随着大战如此快速地达到高潮，和平的问题就变得更加紧迫了。

摆在面前的是和平这个伟大的任务——但是，现在，随着胜利的临近，罗斯福已疲惫不堪了。战争岁月无休止的辛苦和紧张留下了痕迹。他是这样一位杰出的表演家，在人民面前，他可以抛去疲劳，表现出不减当年的样子。为了消除竞选运动中那些有关他的健康状况的谣言，他以精湛的技巧发表了那篇吃力不讨好的关于“法拉”的演说；他曾在飘泼的大雨中兴致极高地接连几小时驱车穿行纽约的大街。但是，如果不在这种时候，他的情况就大不相同了。他脸上无精打采，颓然倒在座椅上，双手颤抖不停。

然而，他可以从迟钝呆滞很快变得轻松愉快，甚至就在他的朋友们相互悄悄耳语表示他们关心的时候，又会有人说总统的精力并未稍减。

罗斯福又深感凄冷孤单，在白宫的人群中茕茕子立。他始终是部分地生活在以海德公园象征的世界中，所以他总是把那些代表那个世界的人留

在他身边。但是，他们逐渐地消逝了。萨拉·罗斯福在1941年去世了。总统对埃莉诺说或许她死得正是时候，因为她可能不喜欢战后的世界。1944年末，恩迪科特·皮博迪逝世。罗斯福在给他的遗孀的信中说：“从今以后，世事情趣将与往常不同。多年来我有赖于院长先生，实在远远超过其他许多人所了解的程度。……”麦金太尔1943年故去。翌年菜汉德小姐也逝去了。埃莉诺·罗斯福常常长期出外做战地视察，罗斯福的四个儿子都参军了。

1945年1月20日，罗斯福第四次宣誓就任总统；为了避免铺张浪费和节省精力，就职典礼没有在国会山而是在白宫前面举行。他只讲了几分钟的话。“就象今天我们为了争取战争的全面胜利而工作和战斗一样，在即将来临的岁月里，我们将努力争取公正的光荣的和平，持久的和平。……”就在总统讲话的时候，欧洲的盟军已开始取得胜利。希特勒的军队除了在匈牙利和意大利北部勉强支持外，其余都已经被退回德国本土。在太平洋战场上，美国军队正准备大举进攻离东京不到一千英里的岛屿。

总统在就职典礼上说：“如果我们在持久和平来临的时候，心存疑虑、不信任——或畏惧，我们就不能取得持久和平”；两星期后，他正是以这种精神在同丘吉尔和斯大林雅尔塔举行会晤的。罗斯福坚定地面对三大国合作这个最大的考验。他显得疲乏，精力不支，丘吉尔发现他的脸上有一种“透亮、纯净的神情，并且眼神恍惚”。但是，即使是在雅尔塔，他也能象过去一样快活、充满魅力，而且精神活泼。对于此次会议所涉及的广泛的问题，他的思维还像过去一样敏锐。

在雅尔塔，经过激烈的讨价还价以后达成了一系列的协议，任何国家都不能任意妄为。有关德国的战争赔款，设想中的世界性组织的投票权分配、法国在德国的占领区等问题以及其他一些问题，斯大林作出了让步。此外，还确定了俄国参加对日作战的日期。然而，斯大林提出的一些重大的要求也得到了满足。会议虽然没有把已被红军占领的波兰“给”他，但从协议的条款看来是有利于苏联将来对这个国家进行控制。在远东，千岛群岛和萨哈林岛南部给了斯大林，同时让他在华北拥有广阔的势力范围。

那么，罗斯福这个自称具有“马贩子”本领的人最后输了吗？许多人后来叫喊说他输了。但是，下结论时必须考虑这两个人不同的手法。罗斯福这个人，一贯讲求实选举，灵活机动。同过去一样，他几乎是全神贯注于眼前的直接任务——赢得战争的胜利。日本还没有被打败。军方的看法是，攻占其本土将耗费时日并且会遭到疯狂的抵抗。原子弹的第一次考

验也还为时尚早。他的海陆军将领们坚决认为——总统本人也同意——必须促使苏联向日本发动进攻。

但另一方面，斯大林却已经在考虑战后的政治安排了。这个顽强的农奴的儿子，是在流血和暴力的教训下长大的。他考虑问题，处理事务，往往比他的对手早走几步棋——这是他所以能打败竞争者的一个原因。此外，他对战后的世界不抱什么幻想；他的革命生涯和马克思信仰教育他，不管罗斯福和丘吉尔之流现在多么友好，历史的不可抗拒的规律则是各国关系还会出现新的紧张，苏联必须强大。丘吉尔也一样，深知胜利的政治含义；而且，纵使他颇有爱德华七世时代的浪漫主义气息，他也能看到未来的风暴——他不是曾经这样写过“人类的历史就是战争”吗？不过，与斯大林不同的是，丘吉尔的战略缺乏欧洲大陆的陆地势力来做后盾。

罗斯福在军事作战指挥上足以和这两人足以匹敌，但考虑和平问题时，因为他相信美好的日子就在前头，这就使他稍逊一筹了。就在雅尔塔会议前，他在就职演说里辛辣地引用了他的老校长皮博迪的话，人生总会有兴衰浮沉，但是“要记住这个伟大事实，文明本身发展的趋势总是向上的；如果在几个世纪的兴衰之间划一条中线，那么，这条线也是趋于上升的。”然而马克思和列宁给斯大林的教育似乎要比皮博迪给罗斯福的教育高明。

这至少是某些人在回顾战后那些令人痛苦失望的岁月时得出的结论。更晚几年的结论或许不一样。因为，除了雅尔塔会议对军事和政治方面的考虑外，还有一项罗斯福想献给世界的最重大成就——三大国合作。罗斯福的独特看法是，他认为从他给一个渴望获得领导的世界年阐明的这一成就中，可以看到赢得持久和平的最大希望。在向国会报告雅尔塔会议的时候，他多次谈到三大国精诚团结这个最重要的事实。后世在更加平静的年代回顾这段历史时，也许会把这看成是雅尔塔会议的最辉煌的成就，它使得意义最深远的马基雅维利式的策略相形见拙。

尽管如此，罗斯福也还有一个重大的——虽然是可以理解的——失算。他预计，再当四年美国总统，他就能使这个成为一体的世界存在下去，使之成为各国人民心目中的象征，并在斯大林和丘吉尔之间进行调停。但是时间正在迅速消逝。

罗斯福向国会报告雅尔塔会议的时候，声音非常地含糊不清。说话结结巴巴，时而停顿，时而插进一些无关的枝节问题。有时候，他的面部表情和他的言语又闪现他旧有的雄辩口才，可是一会儿又消失了。到最后几

个星期，他经常就是这样。他的身体蜷缩在坐椅里或在扶抱他的服务人员的两臂中；他的双手抖得厉害，甚至戴夹鼻眼镜和点燃香烟都要集中全部精神；他灰蓝色的眼睛有点蒙胧，脸上的肌肉松弛，背也变驼了。不过，有时候，他往日的快乐与活力又突然奇迹般地返回了。在华盛顿举行的最后一次记者招待会上，罗斯福又妙语连珠地从加拿大与新的和平组织的关系谈到纽约市的政治状况，又从雅尔塔谈到夜间棒球赛；这位总统又同以前一样敏捷、风趣、机智。

3月底，罗斯福到温泉去了。当列车驶进乔治亚小镇的时候，群众一如往常那样在伫立等候。在末尾的一节车厢里仍是和往常一样的忙乱。可是，也有与往常不同的地方。罗斯福庞大的身躯颓然倒在轮椅上，在推出站台时，他好象还有点坐不稳。他那曾经是很丰满壮实的脸显得消瘦了；他那坚定的下颌隐约间也在微微地颤动。人群低声议论开了。

但是还同往常一样，休息了几天以后，罗斯福脸上苍白的病容褪去，恢复了一些旧日的活力。医生给在华盛顿的埃莉诺·罗斯福发去报告以便使她安心。总统坐在他的小别墅里，眼望着和煦的阳光下翠绿的田野，他可以轻松一下了，看看他的新邮票，同爱犬法拉玩玩，回忆回忆过去，也想想未来。

这是4月初，战争即将达到顶峰。各个战场上每天都有捷报传来。美国人和盟军在欧洲正长驱直入德国的心脏地带。海军在太平洋上打退了战争中最为严重日本的空袭，进而加紧了对冲绳岛的夹击。这也是罗斯福的顶峰。他知道再用不了几个星期欧洲战争就要结束了。他也知道，德国战败后，日本也就无法长斯抵抗聚集起来对它进攻的力量。他还知道联合国家的代表们不久将在旧金山开会，成立一个永久性的和平组织，而且他知道美国将会参加这个组织。

这是休息的时候——是总统可以考虑他夏天要度过一个长假，考虑到英国去旅行的时候，是他甚至可以考虑重大使命一旦完成，他就不当总统的时候。他可以想想海德公园里那幢等待着他的房子，想想那摆满了书报、纪念品和图书馆。

这也是——虽然当时并没有人想到——最后一次看一看这位活着总统的时候。

民主的贵族

那些了解罗斯福的人只能在一点上意见完全一致——他是一个极为复杂，甚至是不可理解的人。伊克斯不止一次地惊呼：“我真对付不了他！”

许多同白宫里这个聪明的政治家打过交道的国会议员、政客、外交家和官僚都有同感。罗伯特·舍伍德说，他的性格不仅是复杂，而且矛盾到令人迷惑不解的程度。

这种矛盾一再使罗斯福的眷属感到茫然和不悦。他几乎从来都是和蔼可亲而又通情达理的，然而有些行为却又透露出一丝残酷的意味。在最大的压力下，他都能保持镇静和泰然处之；然而，如果有人在某些方面惹恼了他，他也会拿尖刻的言语来刺痛他的敌人。他有办法打发那些令人厌烦的人和自负的人，可是他却能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耐心听着伊克斯的抱怨和要求。他几乎是用一种满不在乎的态度篡改巨大的数字，可是却花不少时间去解决一些琐碎的问题，或者把一份电报删减到只剩十来个字。他喜欢新思想、新人物和新方案，但是他又希望他周围环境能有一种固定的性质。他机智地从一套政策转到另一套政策——从节约到支出，从中央规划到反托拉斯，从对外干涉到中立，从党的行动到全国行动。

在许多小事情上他没有一个固定准则：例如，他对有些努力工作的下属表示感谢，而对有些人则毫无表示；他干预某些行政事务，对另外一些事却又不加理睬；有些时候用四个人做一件事（弗林曾抱怨过这点），而在另外情况下又让一个人做四件事，对有些事情简直马马虎虎，而在另外一些事情上又异常的严肃。

更令人难以理解的性格是：在某些挑战面前，他表现出超群出众的勇气，而在另一些挑战面前，他又是那样优柔寡断。他做某些决定时是那样的刻不容缓、雷厉而行，而另一些事却一拖就好几个月，令人莫名其妙。他信守马基雅维利的忠告，即一位领导人物要有狮子般的勇猛，狐狸般的狡黠，这是毫不奇怪的。因为，长期以来，这已成为政治家的第一课了。可是他一会儿从狮子变成狐狸，一会儿又从狐狸变回狮子。因此，即使那些亲近他的人也会感到迷惑不解。

罗斯福的这种复杂性格部分来自政治生活的需要。格莱斯顿曾经说过，他结识政治家并对他们进行研究有六十年之久，但在他的心目中，他们仍是一些怪人。民主政治是一种高度竞争性的职业，一个成功的政治家必须知道怎样藏起手里的牌，以不同的态度应付不同的人物。罗斯福也是以身藏不露、迷惑别人为乐。不过，他的复杂性格的根源却比这些更深刻许多。

罗斯福之所以复杂主要是因为他本身就存在着深刻的矛盾。与他同时代的任何其他政治家相比，他更多地经历了两个世界之间的缓慢过渡。

在美国，他出生的阶级，成长的环境与贵族最为接近。在家里、在罗格顿学校、在哈佛大学、在波士顿和纽约的权贵人家，他形成了根本的信仰和永不失去的安全感和自信心。他的罗盘上的指针无论动荡得多么厉害，但因为他的出身最后还是指向正北。美国社会据以展开活动的一些重要前提也许不是那么明确，或者说有些含混不清，但却是很有意义的。这些前提是：人们只能在某些简单、传统的道德原则基础上共存；人的本质是善良的，不善者也可以借助榜样和训诫而变得善良；世界上虽有治乱安危，但总的趋势还是前进的；出身高贵者勿与邪恶妥协；仁人君子应参与政府以帮助不幸者，应该参与政治来实现清明政治。在上世纪和本世纪交替时，世界稳定、安全、和平、欣欣向荣似乎证实了这些思想的有效性。

罗斯福从这样一个世界被抛射出来，进入二十世纪的几个异乎寻常而又出乎意料阶段——一个以揭发名人丑事著称的十年；国内是实行威尔逊式的改革、国外是实现威尔逊式的理想主义的十年；战后以愤世嫉俗和反动为特点的十年；接着是太萧条，新政，国外则是残酷的武夫执政、新的大战爆发的紧张年代。

一些十九世纪的人感到无法适应新世纪；他们感到不安和害怕，他们象罗斯福一样仍然坚持旧的道德规范，对待事物墨守成规，并且象过去一样不信任政府；他们躲藏在他们的阶级壁垒之内。然而，罗斯福却轻易地越过了这些界限。他之所以能够这样是有原因的：因为在格罗顿学校和哈佛大学时期，他在社交界并不完全顺利——例如，他在坎布里奇试图参加一个最高级的俱乐部而未能成功——所以他并不绝对遵守旧的一套办法和制度；因为他受到了埃莉诺和西奥多·罗斯福的影响；因为他卷进了纽约州丰富多彩的政治生活；因为他朝气蓬勃、好奇而又野心勃勃。

在与他同时代的人中，也有一些人完全否定过去，他们在这个新奇的世界里，找到了某种固定的寄托之处。但是，罗斯福却又不如此。他并不把命运最后寄托在那个世界的任何部分——既不信仰威尔逊的理想主义，也不搞商人的惟利是图，既不相信激进主义，也不信仰国际主义。因为他适应能力强，因为他与形形色色的亲信接近，因为他无需反躬自问，因为他极其自信，所以在这个世界上的任何领域，他都能左右逢源，融洽相处。

一次成功导向另一次成功：罗斯福相信他自己能出色地担当多角色——党派领袖、实务家、官僚、海德公园的乡绅、州长、竞选人、战胜小儿麻痹症的英雄——这一切他都扮演得越来越得心应手。这是他为什么在白宫能游刃有余的原因，因为在当代，担任一个伟大的总统，必须一身多任。罗斯福

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优秀演员，他脸上的表情，他的姿态，他头部的倾斜表达他的感情；他念讲稿时，抑扬顿挫掌握得恰到好处，体现了他深得戏剧表演的要领。说他是优秀的演员还有更深层次的含义，这就在于，他不仅是按着预定的脚本，而且是用整个心身来演好他所扮演的角色。

结果就造就了一个不墨守陈规和政策的人，他灵活处事，犹如掎客，因为他必须在互相冲突的世界和经历之间斡旋。在某些人如胡佛这些人的眼中，由于这种高度的灵活性，他被看作是“变色龙”。确实，甚至他的某些朋友也认为他似乎是处于一种变动不居的状态，没有什么既定的方针，因为许多学说和教条他都弃而不用。这是很自然的，因为很难透过面具看出真容，他们看不到他内心的判明是非曲直的指针。

置身于两个世界之间的罗斯福，把他自己的生活划分为几个部分。其结果有时荒唐可笑，如他试图强迫互相反对的两派合作，而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不愿意。有时结果很不幸，因为罗斯福强把多种角色集于一身，在形势需要的时刻削弱了他进行坚强领导和作出长期战略决策和承诺的能力。这就使得美国社会上相互冲突的思想和力量不仅能从外部来打击他，而且也能从内部来分裂他，因为他既结合了也反映了这些力量。

不过，罗斯福的灵活性和机会主义也有很大的优越性。在一个社会变迁令人困惑的时代，他可以迅速采取行动来摆脱国内外危机。在一个实验具有极大重要性的时代，他能够试验某个方法，很快把它抛开，又转向其他办法。在一个美国人必须从事态的意义中获得教育的时代，他可以充当一个十分出色的解释者，因为他能够把许多社会现象说得头头是道。他领导着一个高度多元化的人民，领导着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他可以用瓦特·惠特曼的话来说：

难道我自相矛盾？

好，那我就自相矛盾吧。

（我无比浩瀚；我包罗万象。）

林肯·斯蒂芬斯曾经说过，西奥多·罗斯福是用他的臀部思考。富兰克林·罗斯福思考时，也许大脑也用得不多，但他是用五个感官，也许还有一个第六感官思考。他有一个雷达，指向四面八方，准确、敏感，把一切都完整地记录下来并把影象储契在灵敏的反应器里，这个反应器就是他的头脑。

难道这个人身上就没有一个坚强的核心、根本的个性、最终的信仰吗？看到他那从一个注意转到另一个主意的易变的头脑，他的访问者就很难相信在那明快开朗的言语背后还有什么坚如岩石或钢铁般的东西。但这

类东西确实是有的。罗斯福的面罩和和外衣揭开得越多，这个来自海德公园、格罗顿和哈佛的跨时代的人物就越发显现出来了。

不管是如何狡猾多变，罗斯福基本上是个有道德的人。他强烈地感觉到自己需要行善，以至于他认为他的所作所为都是正确的。我们说他基本上是个有道德的人，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的。他信仰善行并教人如何行善，而且认为人们最终是要行善的。他之所谓的“善”就是恩迪科特·皮博迪所解释的“十诫”和“金科玉律”。他指的是他在1932年说的，“我们总是要回过头去遵循人类行为的简单“法则”。他指的是他1933年签署证券买卖必须遵守诚信的法案时说的正直的老式准则。有趣的是罗斯福总是回顾以往去寻求他的道德规范；他并不想重新创造。

这些准则并不精确，罗斯福也并不希望他们精确。只要有了，也就行了。有一次埃莉诺·罗斯福跟他提起孩子们的宗教教育问题，他只说，让孩子们去教堂做礼拜，学他自己以前学过的那些就行了。他妻子执拗地问他：“可是你真的相信你学过的一切吗？”“我确实从来没考虑过这个问题”，他说，眼里闪着古怪疑惑的神色，“我觉得没有必要去想这类问题”。但他却要求别人明白他自己的简单的行为准则，并明白他是忠诚于那些准则的。理查德·惠特尼在财务上失职一事被曝光后，罗斯福的阔朋友们写信来恭维他没有利用这个不幸事件作为对华尔街进行政治攻击的筹码。总统对这些信件大为惊讶，他说：“真不知道他们把我们当成什么人了。”

这一套道德准则尽管含糊，但其中特别包含了一个对罗斯福和对的祖国十分重要的思想。这就是，一个人对他的同胞们的福利负有责任。这无非是萨拉·罗斯福的“贵人行为理应高尚”思想的发展，但是这个思想在二十世纪的新情况下却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因为，它奠基了罗斯福一个最重要但又最简单的思想基础——那就是，政府要积极担负起对大众福利的责任。这不是说，一切都要由政府本身来办，但凡是切实可行的事却一定要办。至于是由政府办，还是私人企业来办，那是做法的问题，它取决于多种因素——但是政府必须确保要办些事情。

这就是罗斯福的道德的实质；这就是在表象深深掩盖了的信仰的核心。

有的政客进行道德说教，因为这样做保险，因为他们要以这种方式证明在善与恶两者之间他们是站在善的一边的，因为这样他们就能迎合他们听众中最大的共同特征，而并非因为他们对自己的说教那么认真。罗斯福却决不是这样。在美国，可能没有任何一个政治家象罗斯福那样，曾经发表过这么多次主要是训诫而非阐明政策的演讲。他象传教士一样，盼望他的训诫会成

为人民的实用的道德准则。不过罗斯福本人的动作太象做戏了，以至于人们对他的说教往往一笑了之。实际上他自己却是非常认真的。

只有非常认真而又十分自信的人才会象罗斯福那样花费大量时间不仅要教育和提高他本国的人民，而且要去教育和提高那些在别人看来是不可救药的外国领导人。罗斯福一而再，再而三地向希特勒和其他独裁者传递信息，这种做法既使人觉得惋惜但却又几乎令人肃然起敬。当然，这部分地是为了使事实记录在案，但更主要的是它表现了罗斯福相信所有的人最终毕竟是善良的和有理性的。不管是国会议员也好，独裁者也罢，罗斯福始终不渝地希望同他的对手直接对话，这表明他相信自己具有说服力，尤其是自信处在他的地位，在基本的道义上他是正确的。

对于西奥多·罗斯福来说，总统职位就是“恶霸的布道场”。对富兰克林·罗斯福来说也是如此——“首先是个实行道义领导的地方。……”

那么，如何解释罗斯福的“另一面”——他的变化无常，他的善于折衷，他的翻云覆雨的手腕呢？为什么他常常表现得象只狐狸？

在使用手段方面，罗斯福不是一个固执的道德家，不论他对人们可能的改过自新和最终的善良与理性抱有什么希望和幻想，他对人的本性却没有多少幻想。他清楚有些人自私，没有理性，报复心重而且卑鄙。一位务实的政治家或实干家在日常的经历中会遇到那些真面目被野心和欲望暴露无遗的人。罗斯福从下面这样一批人那里受到了启示，诸如刘易斯那样凶悍的劳工领袖，墨菲和黑格那样的城市党魁，朗那样的农民霸王以及邪恶的化身希特勒及其同伙。他学会了运用权力。

罗斯福战胜了这些人，因为他喜欢权力而且需要权力。不仅如此，他更加需要维护权力地位从而可以领导和教育人民。为了夺取权力，掌握权力和维护权力地位，他不惜投身于尘土飞扬的竞技场，按照他敌对领袖的条件同他们格斗。他对自己的目标的正确性如此深信不疑，以至于愿意使用马基雅维利式手段；他确信道义在自己一边，这使他在斗争中更加有力。对于那些告诫他要谨慎从事的理想主义者，他多次回答说，首要而不可缺少的任务是夺取权力——即在选举中获胜。他要运用狐狸的狡猾手段去达到狮子的目的。

在战争年代中，罗斯福对基尔克高尔德产生了兴趣，这并不奇怪。罗斯福，这位丹麦神学家强调人的天性是罪恶的，帮助他认识到，为什么纳粹“是人而行为却像妖魔”。从皮博迪的说教到基尔克高德的实在哲理，从海德公园的世界到希特勒的世界，这是一条漫长曲折的道路。罗斯福能

够稳步走过这条道路而几乎没有使他最崇高的理想受到影响，他是那么勇敢而且那么生趣盎然，这是对他本人的最终的也是真正的考验。

霍姆斯说得对——二等才智、一等气质。从各个方面仔细审查罗斯福这个人的特点——作为一个思想家、组织者、操纵者、战略家——就会看到在他的伟大的才能中交织着各种弱点和缺陷。但是，站远一点，在他的人民和他的时代背景衬托下来观察他的整体，就会发现那个伟大的轮廓——他勇敢、快乐、敏感、朝气蓬勃、充满信心并且最主要的是关心他的同胞们的命运。他的行为和信念表明他是一个民主主义者，然而同时却又是 E·M·福斯特曾经描写过的人数有限的贵族成员之一——多情而不脆弱，体贴而不琐细，有胆识而又能宽容，能纵情欢笑又经得起戏谑。他不愧是一个快乐的勇士。

勇士回归故土

4月12日（星期四），这一天温泉的天气晴朗，令人心旷神怡。罗斯福坐在他的小别墅里欣赏他收藏的邮票。他身穿藏青色服装，打着一条哈佛红领带。一位画家正在给他画像。他坐在靠近壁炉的那张棕色皮椅里，看上去显得非常漂亮而且兴奋。由于某种原因，他从皮夹里把征兵证取出来，扔进了身边的一个篓子里。随后，他认真地阅读一叠报告。

突然，总统发出呻吟，手按太阳穴，使劲揉着——接着，它那大脑袋无力地向后垂下去。人们把他抬到床上，他始终喘着粗气但昏迷不醒，这样度过了大约四小时。他终于在下午4时35分与世长辞；这时距林肯逝世差不多八十年。

噩耗迅速传给了在华盛顿的埃莉诺·罗斯福。传给了哈里·杜鲁门，把他从国会山召到白宫。传给了温斯顿·丘吉尔，使他觉得自己好象遭到了沉重的一击。传给了远在前方作战的士兵、水手和海军陆战队；他们当中有四个战士收到母亲来信：“他一直至死忠于职守，这也正是他对你们的期望。”在国会大厦里，一位年轻的众议员寻找适当的词句来表达他这一代人的心情：“在所有的地方，在我所认识的人中，他是唯一的无所畏惧者。上帝！他承担了我们大家的重负。”人们到处哭泣，男男女女当着大众都毫不害羞地失声痛哭。

九个月以前，罗斯福曾说过：“我的心灵呼唤我回到哈得逊河畔的老家去。”现在他终于回去了。载着灵柩的列车在漆黑的南方夜幕笼罩下缓缓地驶向华盛顿。海军陆战队和陆军护卫披盖着黑纱和国旗的灵车穿过华盛顿的街道，不计其数的群众默默地站立在道路两旁。在白宫东厅举行了

简短的祭奠仪式后，灵柩重新安放在灵车上。罗斯福最后一次行进在这条熟悉的老路上，沿着宾夕法尼亚铁路干线，穿过费城，进入曼哈顿，然后跨过希尔门桥，沿哈得逊河北上。

灵柩抵达老家河边后，从列车里被移到由六匹棕马拉着的一辆灵车上。后面是单独的一匹马，戴着头罩，马镫朝后，左镫挂着一把剑——象征勇士已不在人间。卫队排成三列纵队，踏着缓慢而有节奏的送葬步伐，护送遗体攀登陡峭弯曲的山路，穿过阴暗的树林到达坡上一小块高地。亲人、朋友、老仆和随从以及士兵和水手们屏息肃立在故居后面玫瑰丛中的大片绿草地上。

哈得逊河上的微风吹来，树叶沙沙地响。军乐队奏起悲凉的挽歌。当棺木被轻轻地放进墓穴时，军鼓缓缓敲起，发出低沉的哀音，而塔普斯号角声也在耳际萦回。勇士重归故土了。